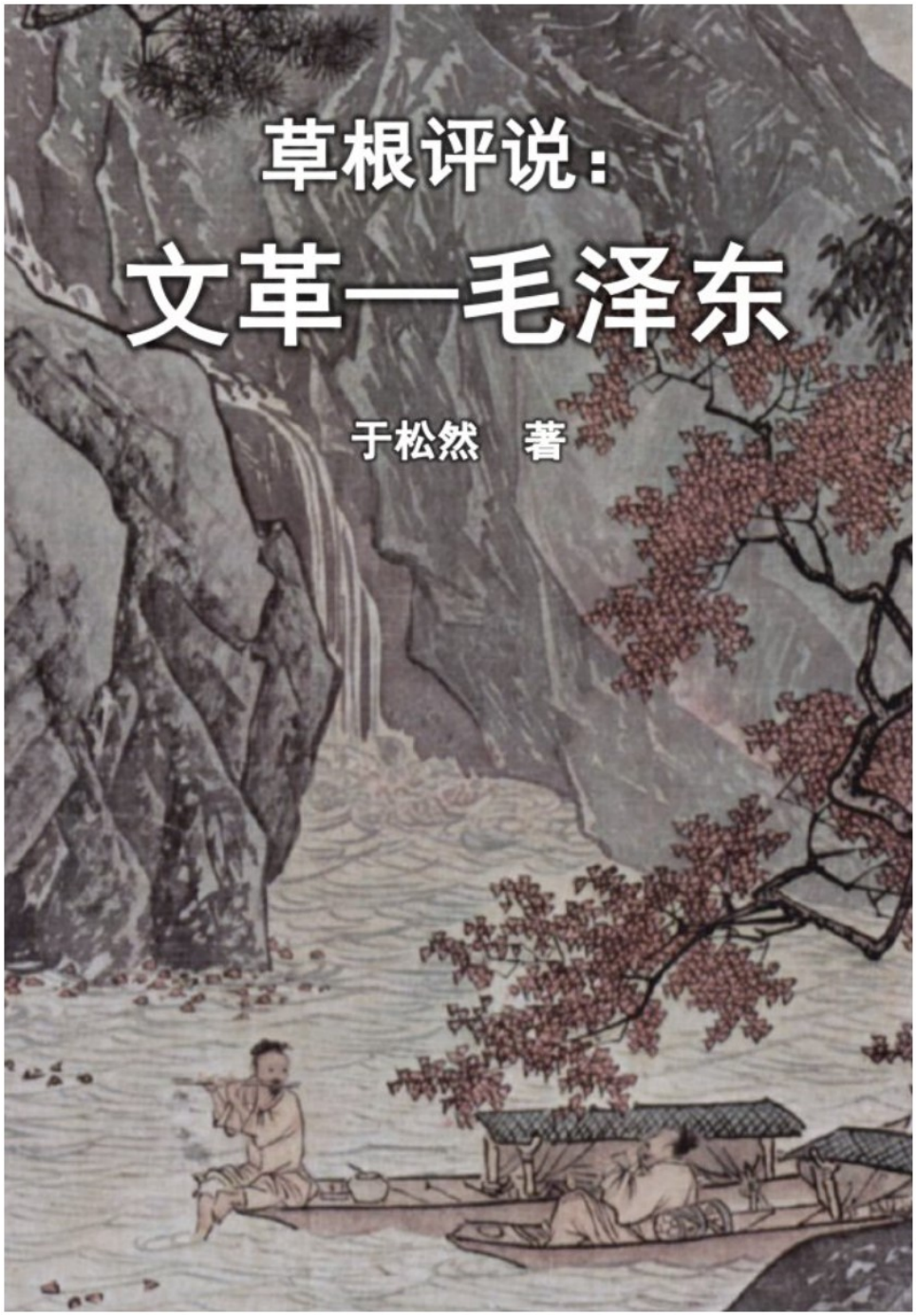

草根评说：
文革—毛泽东
于松然 著

01-《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大爆发

作者 于松然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用“层层剥笋”的谋略，一步接一步地完成了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了撤销有投靠刘、邓嫌疑的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强化了林彪元帅的权力。1966 年 1 月初，毛泽东又任命忠于自己的叶剑英元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命杨成武上将为代总参谋长，与林彪形成掎角之势。2 月 22 日，又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建制，防止罗瑞卿旧部滋事。之后，又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任命心腹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随着批斗罗瑞卿的深入，贺龙元帅在军中的影响力减弱，其权力也逐渐被毛边缘化。在这之前，毛怀疑彭德怀在军中势力没有肃清，便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任命彭德怀为三线副总指挥，把他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文武合璧。彭德怀的副将黄克诚，也被逐出北京，出任山西省有名无实的副省长。

1965 年 11 月 10 日，因“秘密录音事件”受到毛泽东怀疑的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下放到广东省委书记处任书记。为考验杨的忠诚，在罢黜后，毛泽东命他去“**看望**”王稼祥和陈云两位资深大员，观察他们的**动静**。在杨“看望”后，陈云心领神会，立即以书面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近况，意让毛泽东放心。在 11 月 19 日，杨还就这两次“**看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意在证明自己不辱使命，对毛不贰。1966 年 5 月，杨的忠诚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反被一贬再贬，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后又放逐到山西临汾，不久被隔离审查。

杨尚昆被罢黜后，毛任命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为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警备局局长，负责指挥毛的嫡系中央警卫团 8341 部队。

当采取了政治、军事等一系列反政变措施后，毛泽东认为万事俱备，时机已到，便开始借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名，向刘、邓的左右手——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兴师问罪。

1966 年 3 月 8 日到 29 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多次 6～7 级的强烈**地震**。以 22 日发生于宁晋县东南的 7.2 级地震强度最高。其中 6.8 级地震波及 142 个县市，7.2 级地震破坏范围包括 136 个县市；有感范围北到内蒙多伦，东到烟台，南到南京，西到铜川等广大地区。地震造成巨大破坏，共造成 8,182 人死亡，51,395 人受伤，破坏房屋 400 余万间，损坏桥梁 86 座。有人说，这是大难当头的先兆。由于笔者对“天人感应”说持保留态度，因而对地震与社会动荡的因果关系持怀疑立场。但日渐绷紧的阶级斗争的钢弦，却预示着烈度更高、

伤亡空前的“**人震**”即将来临。

当邢台人民在强烈地震摧残下作痛苦挣扎的时候，面对巨大破坏和重大伤亡，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依计开始了他超越地震烈度百倍以上的“人震”——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1966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不顾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猛烈抨击党内右派的社会基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又说：**“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为了夺权，全国学校都成了刘、邓帮凶，被他描成一团黑；知识分子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其余都成了革命对象。可悲啊，上层权斗，学者遭殃。**“他们先挑起斗争。”**这种倒打一耙，无异于狼吃羊的逻辑（1）。

3 月 28～30 日，毛泽东无视地震带来的重大伤亡，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刘、邓的左右手，数次对心腹康生说：**“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不经政治局讨论，毛本人就可以宣布打倒这个，解散那个，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多年高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然而他又贼喊捉贼地反问：**“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毛泽东不去体察灾情，却玩起了知识定义遊戏。4 月 14 日，他在《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写道：**“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

——为了权力，毛把知识定义为打仗、革命、做工和耕田。这是什么主义？当狼想要吃羊的时候，无论羊怎么做，狼总有吃的借口，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至情至理”地胡说八道。

毛泽东对救灾无动于衷，却对权力情有独钟。4 月 29 日，他在同党内谈关于彭真问题时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在权力斗争上，毛是铁面无情的：面对一个多年追随他、吹捧他的人，只要认定他当前威胁到他的权力，他会毫不犹豫地**“捅倒他”**。

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经过造神运动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说一不二、句句是真理的独裁者——绝代君王。

5 月 4 日到 26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一个由 17 名政治局委员和 6 名后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扩大到 76 人。其中，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党内左派，当时连中央后补委员都不是，不但列席了会议，还成了会议耀眼的明星。

为了彻底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林彪向陆定一投出了一颗“重榜炸弹”。他把一纸“证明”，摆放在政治局委员面前。重重心事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後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2）陆定一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这张“证明”是林彪的一箭双雕：即为自己老婆叶群正名，也“痛斥”陆定一和他的老婆严慰冰造谣惑众。面对这张大员之间勾心斗角的“证明”，高官们在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之后，很快还过神来，便狠批起陆定一来！

到此，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看到了他们高喊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看到了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迫切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为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原则性、迫切性和不可调和性付出 200～300 万个生命的**必要性**！！

天才的毛泽东，利用这次会议玩起了猫耍老鼠游戏，他要借刘少奇、邓小平的双手，导演一出自相残毁的绝代悲喜剧。

此时的党内右派首领刘少奇，极力掩盖自己的空虚和失落，不得不在三倍于政治局委员的左派面前，违心地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来主持会议。此时的党内左派首领毛泽东，则远在杭州遥控会议，观察着刘、邓的一举一动，业已露出胜利者的喜悦。这是“民主集中制”赋于他的特权：党的主席可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而通过遥控以观察政治局委员们的动静。

绝代悲喜剧之一是，在刘、邓主持下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斗，把早已打倒了的罗和“发配”到外地的杨硬拼合在一起，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撤消了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隔离审查。5 月 23 日，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任命李雪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这等于刘、邓举刀砍掉了自己的左右手。

这是自残，也许是不得已的自残。在中共权贵们的道德观念里，出卖好朋密友并对其落井下石，是“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保全自己最有价值的选择。更可笑的是，彭真在表决时，不仅举手赞成罢黜自己，在表态时还用“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反诘，来证明自己是全党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

对于自残，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以为耻地自欺欺人。6 月 27 日，他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分别对他们的左膀右臂，痛加鞭挞。

刘少奇说：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理直气壮地落井下石！

“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是讽嘲？抑或幸灾乐祸？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这位坚决不给知识分子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中宣部陆部长，可怜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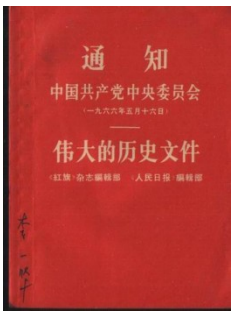
“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据信，安窃听器是经他批准的，杨尚昆是替罪羊而已。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先治罪，后侦讯，这是毛式独裁的惯例，是现代文明无罪推定的倒行逆施。

“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他没有想到，仅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便断然把炮口对准了他，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

邓小平说：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更大。”——善于看风使舵；与文革后他为“彭罗陆杨”平反的鲜明对比，成了中共赤文化的一大特色。



《五一六通知》

绝代悲喜剧之二是，5 月 16 日，在刘、邓主持下毫无阻挡地通过了打倒自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右图）。江青说，从“七千人大会”憋到现在，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五一六通知》是在 3 月底，毛泽东背着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成立的一个起草小组秘密起草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组员由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等。秘密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还撤销了《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4 月 24 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先一步通过了这个《通知》。

这种非组织活动非但没受到谴责，反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手段之高超，也不能不承认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造就了绝代独裁。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他对那些过去曾效忠过他但现在效忠不够的知识界文化人和官员们大加鞭挞：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狼要吃羊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但为了证明狼的“伟大、光荣、正确”即“伟光正”，找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由”，展示一下“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吃羊时就能“理直气壮”，被吃者也能“逆来顺受”，旁观者就会“心悦诚服”，全国上下都会振臂高呼“**万寿无疆**”！

《五一六通知》恶狠狠的批判《二月提纲》中提出的“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是“**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是把“**反对的锋芒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是虚伪“**资产阶级的博爱观**”，其目的是“**开辟一条……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等等。

此时的刘、邓已知自己在毛的心目中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处于非常不利的弱势地位。但他们不愿沦入“羊”群，还要千方百计地向毛表忠谄媚，力求毛的宽恕，力争保住自己“狼”的尊严。于是，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表态支持了这个《通知》。

5 月 18 日，林彪按照预先与毛达成的默契，在会议上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他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大讲特讲“**防止政变**”问题，有意制造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紧张气氛。然后他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紧握枪杆子的林彪声色俱厉的讲话，使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满了恐怖气氛，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与会者人人自危，为了自保，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总理周恩来也亦步亦趋地大讲“防止政变”，并不遗余力地领导落实防政变的各种政治、军事和组织措施。

领导七亿中国人的最高集团的权贵们，竟是这样一批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又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

绝代悲喜剧之三是，在刘、邓主持下批判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略）。

附 1、狼与小羊（伊索寓言）

一只小羊在河边喝水，狼见到后，便想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吃掉他。于是他跑到上游，恶狠狠地说小羊把河水搅浑浊了，使他喝不到清水。小羊回答说，他仅仅站在河边喝水，并且又在下游，根本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见此计不成，又说道：“我父亲去年被你骂过。”小羊说，那时他还没有出生。狼对他说：“不管你怎样辩解，反正我不会放过你。”

这说明，对恶人做任何正当的辩解也是无效的。

附 2、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河南省潢川人。1923 年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5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1930 年在上海跟刘莹结婚。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忧虑时事，1937 年 10 月，只身奔赴当时青年人向往的“灯塔与明灯”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对王实味极为反感。他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又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1942 年 6 月，延安掀起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周扬发文指责他文艺思想是托洛茨基文艺思想。1943 年 4 月 1 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审查结论不断升级，最后于 1947 年 7 月 1 日夜，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罪名，将王实味砍杀于一眼枯井中，时年四十一岁。

三十多年后，年迈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 1947 年已被处决，断然认定这是政治诬陷，便开始申诉。到了 1990 年 12 月，中共中央终于宣布了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时，其子已经五十五岁，面对平反决定，泪流满面。

02-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作者 于松然

5 月 31 日，手持“尚方宝剑”的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没有登报，没有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到文革小组组长陈伯

达手中。被夺权的《人民日报》社总编**吴冷西**这样回忆：

“在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 月 31 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一小小的政变’。”

1、横扫知识界

在大跃进中**吹破时空**的总编吴冷西，在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不得不谨慎小心地摇摆于毛、刘两派之间，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被“横扫”出人民日报。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缺点是没有“**指名道姓**”因而“**没有击中要害**”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右图）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中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

“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牛鬼蛇神”原是指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形象，后喻形形色色的丑恶或坏人。中共使用“牛鬼蛇神”词语，早见于《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批言中，那是毛泽东在 1963 年 5 月 9 日为这个文件写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共党的喉舌，它的社论就是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因此，自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一词便成了家喻户晓的政治概念。有人说，这种政治概念没有严格定义，模糊不清，易生歧意，很难准确掌握。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可以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正是毛泽东和中共权贵们所冀求的：**伸**，可置敌于死地，**缩**，可施人以恩惠——这是树立“绝对权威”不可或缺的手段。尽管如是，当时“牛鬼蛇神”的指向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泛指**教育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和文艺界中一切不愿学习毛泽东著作因而被视为没有改造好的学者、专家、教授、作家甚至学生，**泛指**支持和领导“牛鬼蛇神”的

校长、院长和政府官员，**泛指**早已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反动”子女，**泛指**被左派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党内右派成员，等等。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用不着法律条条界定，也用不着监察官起诉和法官断案，只用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句话：**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大多数老百姓呢？他们必须跟着起哄，否则，就有“牛鬼蛇神”的嫌疑。

陈伯达不过一个文弱书生，毛的一介秘书，刚刚上任文革小组组长，便立马横刀，怒吼天下，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社论》得到最高的谕示或授权，因而据有非凡的权威。

2、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借一张大字报的“东风”写成的。1966 年 5 月 25 日，北大哲学系总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矛头直指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右图）大字报点名的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在揭露批判北京和北大领导的同时，十分尖锐地、杀气腾腾地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张由毛授意、康生导演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刻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下令中央广播电台在 6 月 1 日以全文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应命在全文发表大字报的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7 月，毛泽东又对聂的大字报做了极高的评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显然,不仅要消灭他们的精神，还要消灭他们的肉体。这是恐怖的先声！这是**“红色恐怖”**的号角！毛泽东赞扬这种恐怖，《人民日报》欢呼这种恐怖，党内左派集团竭力鼓噪这种恐怖，充满血腥的红色恐怖终于被煽动了起来：几年间，红色恐怖肆意暴虐大陆中国，虐杀了数百万个无辜生灵。

对于聂元梓的大字报，官方主流媒体说是在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直接策划下写成的；但聂本人并不认同。聂在《聂元梓口述自传》一书中透露，由于她在四清运动中给陆平提了许多意见，陆平曾借机整她，结果与陆结怨很深。这次她想借《五一六通知》的“官理”来“摆平”她与陆平的私怨。为此，她请示曹轶欧：“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因为陆平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 于是“第一张马

列主义大字报”便贴到了北大校院内墙上。“请示”得那样恳切，答复得那样随意，而大字报要“**消灭一切**”的火药味那样浓烈，人们不能不否定聂的“回忆”：她想与死后横遭“鞭尸”的康生划清界限，因而否认康的策划。不管她是否想“划清界限”，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她要借助《通知》官报私仇，亦即借助钟馗打鬼。然而，她的公报私仇，使毛泽东有了严惩异己的借口。这里，人们再次看到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高招：**示意或授意忠实执行者，有目的的选择、鼓动和培训“群众”，使“群众”能够在实现其主要谋图上，表现出绝对忠诚和魔鬼般的虐杀勇气来！**

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横扫”社论见报、广播后，到6月5日，《人民日报》一口气连续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四篇社论。在《人民日报》煽动下，北京各大、中学校风起云涌，硝烟弥漫，红色恐怖氛围逐渐形成！

经毛泽东批准，6月3日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便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3、学校大乱

当《五一六通知》、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横扫》社论先后见报后，整个北京都被煽动起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生性酷爱自由学生们，被长期**封建党阀式奴化**教育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昔日平静的大、中学校的校园里，浮现着不安与骚动。在父辈的调教下，了解中共权力斗争、洞悉毛泽东动向的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们，凭借多年阶级斗争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生死搏斗已经来临，便率先成立他们的组织——红卫兵，把宣泄的矛头对准了《五一六通知》中界定的“阶级敌人”，而不是党阀式奴化教育的始作俑者。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他们给老师提意见，继而对老师进行大批判，接着便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由是，学校的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瘫。进入六月，几篇“横扫”社论见报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跟着大乱，全国各地学校也开始大乱起来。

6月16日，《人民日报》就南京大学发生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发表社论，支持南大大乱，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上海同济、交大、复大、科大等高校，激进学生贴出大字报，揭露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出现了赶走工作组的呼声；西安交大激进学生贴出了省委有黑帮的大字报，扬言要驱逐省委派的工作组……

进驻学校的工作组，是刘、邓的右派中央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作出的决定，意在“横扫”中，把“乱”控制在他们许可的范围内。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最高指示”却与此相反：“**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学生被他们煽动了起来，冲突事件、打人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6 月 18 日， 在聂元梓等毛左派人士的煽动下，北京大学东语、西语、化学、无线电等系，揪斗了 50 多位教师，为全国学校树立了榜样。史称“六一八事件”。

对“六一八事件”，作家林正德在《非常十年》里这样描写：

“六月十七日，从早晨到次日凌晨二点钟，在北大校园里，愤怒的学生群众到处围住‘黑帮’分子，高呼口号，揭露、控诉陆平‘黑帮’的罪恶，而这时工作组仍采取不过问的态度。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北大学生一片欢腾起来，热烈欢迎支持。

“十八日清晨五点，北大学生又继续斗争‘黑帮’分子。一阵阵无节奏的铜锣声在古老的北大红墙校园里刺耳地回响着，一队所谓‘黑帮’、‘牛鬼蛇神’的队伍正在校园里被游街，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两尺见方的黑牌，头上戴着高帽，第一顶帽子写的是‘牛’字，第二顶是‘鬼’字，第三顶是‘蛇’字，第四顶是‘神’字，合起来便是‘牛鬼蛇神’。

“这一天校园里到处都是人山人海，青年大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白炽化的程度。哲学楼、大饭厅、三十二斋、三十五斋、三十八斋（笔者：北大把楼叫成斋）、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就设立‘斗鬼台’，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陆平、彭佩云除外），人数多达五十余人，有的人一上午被揪斗了几次，他们有的挨打、有的罚跪、有的‘乘喷气式飞机’。

“那些‘黑帮’、‘牛鬼蛇神’们有的木然地任人摆布，有的挣扎反抗着，有的大声抗议，然而，当时的青年学生们都发了狂，反抗只能带来更可怕的报复，有的被吐了一脸的口水，有的挨了响亮的耳光，有的衣服被浇了墨汁，白衬变成黑衬衫，有的女教师衣服被拉脱了扣子，露出了雪白的胸脯……”

六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的一个常委和一些干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支持的学生马上举行了示威游行；支持院党委和工作组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两军对峙。

六月二十日早晨，北京师大学生**谭厚兰**等 17 人贴出“**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第一次把矛头直指工作组。孙友余时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北师大工作组组长。

六月二十日，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学生贴出了“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矛头也指向工作组。

在清华，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的大字报《“怀疑一切”万岁》受批后，六月二十一日，他用大字报号召向院党委、工作组夺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同激进学生尖锐对立，虽有数百学生被打成反革命，但在毛左派势力的支持下，各派势力紧紧跟上，造反、揪斗、打骂、辩论愈演愈烈，局面已失去控制。

为了“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没收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在横扫中，擅长乱中取胜的毛泽东，打开了放出罪恶的“潘多拉魔盒”（1），把左派学生中的贪婪、杀戮、暴虐分子，一一释放了出来，于是，**批、斗、扭、打、吊、辱骂、罚跪、戴高帽、躬腰、颈上吊砖、抄家、“坐喷气式”**等触及灵魂法被炮制了出来（下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式批斗法**。在毛泽东的左派暴虐学生面前，学者、专家、教授、作家、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书记、校长等“牛鬼蛇神”们，以及早已被毛打翻在地沦为弱势人群的“地富反坏右”们，他们的人格、尊严、信仰和毛在亲自制定的《宪法》里“恩施”于他们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统统丧失殆尽，被批斗得“威风扫地”，从而被推到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的境地！在毛泽东和《人民日报》的鼓动下，**红色法西斯恐怖局面，**终于形成！


揪斗反动技术权威

辱骂反革命学术、技术权威


体罚：“坐喷气式飞机”

4、刘、邓中计

此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也明白已被毛定为赫鲁晓夫式人物，但为了争取毛的宽容和谅解，便积极投入到领导这场被迫接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此，他一方面对迅猛而来的运动做出八条限制性规定，即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由于得不到毛的明确答复，刘少奇在六月上旬同其它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谈笑风生，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而对他所提的问题含糊其辞，不明确表态。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在政治斗争中，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可悲的是，紧跟毛泽东三十多年的刘少奇，竟不知是计，还以为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返京后，刘便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取代已经瘫痪了的校党组织，对运动实行直接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

6 月 13 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这是 1957 年反右时毛泽东曾用过的“阳谋”诡计的翻版。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刘少奇的悲剧在于他利令智昏，不知道为了打倒以他为首的党内右派，今天在他眼里的“牛鬼蛇神”，恰恰是毛泽东要依靠的左派力量。

在刘、邓工作组当权其间，被打成反革命的激进学生，纷纷变成了反工作组的急先锋。其中，北航学院的**韩爱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人，最为活跃；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却也是反工作组的干将。在这种控

制、反控制的红色恐怖中，名扬全国的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应劫破壳而出。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在想什么呢？此时的毛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级**深为不满，从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已看出来了。这种怨气在被反右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而这些年来积怨更深。这种积怨与高干子弟们“革命血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颠覆力量。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党内右派集团的反叛“蹩了一肚子恶气”的毛泽东，决计对党内右派集团施展与反右运动“阳谋”相反的阴谋诡计：一方面刻意容忍刘、邓派工作组控制运动，另一方面幕后唆使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人民日报》，煽动颠覆力量造反，进行反对工作组控制的斗争；他蓄意把水搅浑，制造对立，把老百姓对中共怨恨情绪引向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及其社会基础，为全面夺权做准备。

在控制和反控制的激烈较量中，聪明一世的刘少奇，完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毛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去。仓促上阵的工作组，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把数百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样一来，与造反的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发生。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海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了。

为了打击刘、邓和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毛泽东完全抛弃了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了分裂中共中央的“阳谋”：在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闹革命之后，发表了著名的“**支持闹事**”讲话。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为了促使革命走向激化，挫败工作组的求稳谋图，他又运用阴阳两面手法，在高唱“讲道理”的同时，使拳脚相加的打人合理化。1966年6月，面对工作组疲于控制的打人高潮，他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即所谓“**不主张打人**”的“最高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这是支持打人？抑或反对打人？请读者自己做判断。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作了个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长江。在特意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7月18日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

“**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江青、陈伯达等人到北大、清华等院校去，明里调查研究，实则煽

风点火，搜集刘、邓材料。7 月 25 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进行揭发批判。

江青登上讲台，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用颤抖着的尖细的声音狠批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了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江青的情绪随着欢呼声、口号声激动起来。忽然思想“走火”，竟大骂起毛岸青之妻北大学生张少华来：**“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张少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时骗他和她结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江青这一番话，使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明白，**江青婆媳之争**也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江青的讲话，逼得张少华仓皇出逃，在外地藏匿数月之久；后因生活无着，才不得不向周恩来求助。时任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聂元梓等当事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类似记载。

站在江青两边的康生、陈伯达显得十分尴尬。

江青讲话后，康生在台上大声宣布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一句话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对康生的谎言，那个被毛泽东任命为工作组组长、并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在《人民日报》社里搞了个“小小政变”的陈伯达，理直气壮地点头称是。

最后陈伯达讲话。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陈的“建议”就是命令。

在撤消了工作组同时，也推翻了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台下那些曾受工作组打压过的学生，瞬间从“反革命”变成了革命者。学生们的反抗精神获得了褒扬，于是，解放了，翻身了，当场有不少激进学生激动地哭了，反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的表态和江、康、陈等人的煽风点火，使刘、邓主持的党中央乱了方寸，陷入尴尬、沮丧，被迫下令撤出全部工作组。

1966 年 7 月 29 日，已经在毛泽东布下的火海中被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出无奈，露出苦衷。他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显然，刘少奇缺乏周恩来逆来顺受的“精明”和随机应变的“干练”。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直接向他兴师问罪。

附 1、潘多拉魔盒

潘多拉（Pandora，希腊语：Πανδώρα），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用粘土做成的人类的第一个女人。众神都努力打扮她，使她拥有更诱人的魅力。作为对盗取天火给人类带去光明的惩罚，宙斯把她送给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根据神话，潘多拉出于好奇，她打开了宙斯给她的一个装有祸害、灾难和瘟疫的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的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当她再盖上魔盒时，里面只剩下了希望。

03-第一波自杀风潮

作者 于松然

主人权斗，奴仆遭殃。《五一六通知》通过后，引发了从 1966 年 5 月到 7 月的第一波自杀风潮。这个“第一波”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波，也是中共“解放”中国人民、成立“新中国”十七年后的继土改、肃反、反右、“一化三改造”、大跃进和“四清”运动后的第七波自杀风潮。“新中国”成立后那六次风潮中，至少有 **100 万人**自杀。不同的是，文革第一波自杀风潮来势汹涌、迅猛，此时的**红色恐怖**已经充满血腥！

在毛泽东时代，自杀被界定为“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罪行，按毛泽东说法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要“**遗臭万年**”的。但许多无法忍受毛式批斗的人，却宁冒“遗臭万年”之“大不韪”而选择了自杀。据专家、学者推算，在第一波自杀风潮里，全国约有 **3～5 万人**，在“横扫”中自我了断！

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高级干部，可能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他是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 5 月 18 日自杀的。

邓拓是 1930 年就参加中共的老党员，五十年代，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多年。1956 年，由于持刘、周在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政策，使毛泽东的“反反冒进”思想在《人民日报》宣传力度不够，被毛斥为“**书生办报**”；1957 年反右时，又由于缺乏“引蛇出洞”的积极性，使《人民日报》内部反右成果不大，又被毛斥为“**死人办报**”。很快，总编辑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吴冷西取代。带着“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两顶帽子的邓拓，被迫降级到北京市委任副书记。对毛颇有微词的邓拓，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政见相同，一拍即合，在北京各报刊上开辟了一个叫《三家村札记》栏目，邓拓独办了个《燕山夜话》。他们在知识性、趣味性掩护下，以隐晦、曲折、暗喻、影射等社会主义笔法，抨击毛泽东“三面红旗”等政策，含蓄地指责其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赢得了许多读者。批评时政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但在毛泽东时代都是犯罪行为。随着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发展，彭真为了保护自己，他抛弃了邓拓，向毛泽东打了批邓拓的报告。于是，北京传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的顺口溜。彭的利令智昏，为毛泽东所

利用。毛倒刘、邓右派集团的部属是：批斗邓、吴、廖“三家村”，继而揪出彭真，最后打倒刘、邓。到5月8日，北京各大报刊出了毛泽东怒斥“三家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的讲话：“**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毛的怒斥，推动了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运动；毛左派集团的精英们也大喊大叫，要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5月16日，杀手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给邓拓致命一击，宣布他是叛徒；并且警告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这种显然来自“最高”的声音，把邓拓逼上了绝路。熟悉党内斗争的邓拓，深知任何自由主义和独立人格都是毛泽东的大敌，一旦《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所蕴涵的独立、自由主义精神被“最高”识破，便“罪责”难逃；他也深知，他不可能得到党内其他实力人物的理解和支持，得到的唯有落井下石。与其让“最高”折磨和“朋友”出卖，何如自我了断？于是，5月18日凌晨，他服毒自杀。

第二个殉难者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5月23日上午，年仅44岁的田自杀于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里，而另一说法是被汪东兴枪杀。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14岁时，他在报上与一个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被川中许多人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燕社”。1937年，15岁奔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后于1938年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8月到1966年5月，他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长达18年。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还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参与毛泽东、中共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平日毛泽东作诗词和写文章，常要引经据典，一般都由田家英查找和核对，成了毛泽东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被毛誉为不可多得的忠良才子。但大跃进以后，田的自由、独立思想与毛的专制、独裁品格，发生冲突，逐渐拉开了距离。《五一六通知》公布六天后，即1966年5月22日，他被以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和“最高最活论”、反对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篡改毛主席著作等罪名，被毛批为“**右派秘书**”，勒令“停职反省”，逐出中南海。

对于田家英的死，体制内作家们都把他说成是自杀，但在描述自杀时间、地点和自杀方式等细节上出入较大，有的闪烁其辞，也无尸检文件证明。更为甚者，他的女儿**曾自**，在回答香港著名记者陈鲁豫采访时，在首肯父亲死于**自杀**的同时，却又语焉不详地暗示：“然后，这时候我母亲在机关呢，中组部的安子文给她打电话。哎哟，我母亲说她当时头懵了，早晨走的时候，好好的，没想到他会有这种。然后旁边这些负责的人就揪着她的胳膊，她说把我揪得都生疼，都揪出手印来了，一定要你过去看。她看了。后来她认为，**看，就是让你证明认可他是自己去世的。**”

然而，一种不同的说法却广为流传，还有泄密的中央文件佐证：**田家英被汪东兴枪杀**。

在档案无限期尘封的今天，这种传说和文件是真是假？人们难以搞清。笔者权将知情者的描述摘录于后，供读者圣鉴。

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0 0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

“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

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0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 0九0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笔者：刘少奇）**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不久，内卫朱国华自杀身亡。

斯人已去四十年，疑云重重消释难。人们期待档案解密。

当人们为名人之死鸣不平时，却忘记了对小人物“自杀”的关注，尽管**朱国华**可能曾是汪东兴的“帮凶”。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像关注大人物那样去平等地对待小人物的命运呢？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的自杀。

江隆基，1905年生，陕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初，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校党委工作。1957年反右中，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紧跟中央的党性原则和毫不手软的对敌斗争作风，为毛泽东“引蛇出

洞”的“阳谋”立下了汗马大功：在八千多人的北京大学，成功地抓出了716（另说699）个右派分子，并用毛式批斗法对右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据说，其中有十多个死于非命。1959年1月，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反右9年后，1966年6月17日，得到省委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用毛式揪殴法（4）进行斗争。他们强迫江隆基跪在桌子上，扣上重十多斤的铁笼子。6月23日，兰州大学再次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等进行批斗。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这个得不到中共党组织谅解的功臣，终因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奋然自杀。他**先是施刑者，后为受刑者**，这就是他的历史。笔者这么说，不是说江隆基得到了什么“报应”，事实上许多曾助毛作祟的中共功臣，大都能安度晚年。这里仅仅说从反右到文革的发展逻辑：**反右是文革的必要准备，文革是反右的必然趋势**。

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胡揪乱斗之风甚嚣尘上。特别是当毛泽东那条**“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的“最高指示”传到社会上以后，那些学者、专家、教授和作家们，便首当其冲。由于忍受不了**“触及灵魂”**和**“没收反动思想”**等毛式批斗法的痛苦，“畏罪”自杀便成了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笔者搜集到的一些资料，从《五一六通知》公布到7月底的“横扫”中，自杀的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作家有：

傅洛焕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吴恕求　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
光开敏　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
李平心　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汪　钱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毛启爽　上海科技大学教授 教务长
朱代杰　北京铁道学院教授，自杀后妻子自杀。
徐　韬　上影制片厂海燕厂导演
姚　溱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高芸生　北京钢铁学院院长
李国全　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
李铁民　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
许世华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易光轸　北京市52中学副校长

“横扫”中专家、学者遭殃，也祸及学生、职员和家属。如，西安交大学生**沈丙辰、王永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沈新儿**，诗人闻捷的妻子**杜芳梅**，江苏省沙洲县凤王公社医生**缪志纯**和妻子**孙惠莲**，等等，都在“横扫”中纷纷自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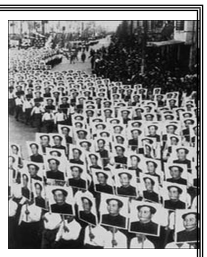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笔者搜集到的自杀资料不足全国自杀人数的千分之一，且未能搜集到“地富反坏右”等弱势人群的自杀资料。

附 1、 1966 年 5 月～7 月自杀身亡者名录表（37 位，略）

04-毛泽东的红卫兵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的红卫兵（左、中）；红卫兵游行示威（右）

“红卫兵”最早是北京市清华附中几个学生写的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 年 5 月 29 日，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张承志**等人，首先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个由工农兵、革命干部等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组成的组织，是个比较自由的团体，年龄多在 13～18 岁之间。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由于比较自由，许多学校便亦步亦趋，纷纷效法，也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来。然而，正是由于比较自由，便与刘，邓派出控制局面的工作组发生尖锐冲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便在工作组与红卫兵之间展开，而且愈演愈烈。由是，许多红卫兵被大权在握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其组织被勒令解散。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中，天才的毛泽东忽然发现，红卫兵组织可以成为他终结刘、邓权力的依靠力量。于是，他决定支持红卫兵组织。6 月 2 日，在他秘密授意下，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在军干子弟卜大华的带动下，100 多个学生在大字报上面签了名。秘密授意是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高招。接着，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鼓动、串连和捉笔、修改下，卜大华等几个中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出了《二论》和《三论》。至此，红卫兵组织已打上了权力的烙印，失去了自发、自由的动力。7 月 28 日，他们把《两论》交给了授意者江青，要她转呈毛泽东。

8 月 1 日，为了挫败刘、邓派工作组控制局面的努力，善于煽动勇敢分子、流氓无产者和痞子起来造反的毛泽东，接到《两论》后，按既定计划，给十几岁的中学生们写了一封回信，鼓动他们起来向党内右派官僚特权阶级造反。

回信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

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然而，两年后的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显然，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目的，是叫他们出来“闹一闹”，闹得刘、邓右派集团不得安宁，闹得刘、邓工作组无法控制局面，闹得他能借机镇压异己者，闹得他能借势夺权。这与他高度赞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面对毛在暗箱中的计谋，十几岁的红卫兵怎能理解？

毛泽东的回信，使备受刘、邓工作组压抑的红卫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迅即打出造反旗号，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心甘情愿地当起毛的打手、屠夫来。毛泽东幕后发动和操纵红卫兵的阴、阳两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青少年处在成长期，需要用体现现代文明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启迪他们的智慧，规范他们的言行，使他们成长为恪守社会公德的公民。但在毛泽东封建党阀式的革命式的教育中，一方面，他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说教，压制人类的自由天性，培养绝对服从的奴性，把青少年驯化成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他用阶级斗争说教，煽动仇恨，使敌视人权、自由的兽性得以张扬，从而使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勇敢分子，心目中充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社会性——是非不分、仁义不恭、理性丧失、出手凶狠。这种驯服工具的反社会性，从当时红卫兵的流行话语中已表现了出来：“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100％的修正主义！”他们最热衷的毛泽东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调教和鼓舞下，青少年学生“摇身”变成了红卫兵，一大批盲目仇视现代文明、行事残忍的小流氓、小痞子和小刽子手，被毛泽东制造了出来。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亦即所谓的“群众运动”，有丰富的经验，是发动群众的行家里手。每次运动前，他都能运筹于暗箱之中，然后发动盲从者和包括痞子、二愣子、勇敢分子、流氓无产者在内的“群众”，为他的政治目的冲锋陷阵。这次，他要借无知青少年红卫兵这口“刀”，砍向政敌——以刘、邓为首的右派集团以及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

毛泽东对《两论》的回信，煽起了反社会的狂热，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这封信所包涵的信息，立刻传遍了全国，各地学生们都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由此风靡全国，震惊世界。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卫兵的组织成分，也从学生，发展到教师、工人、干部、城市居民和农民，年龄也从青少年走向成年，

红卫兵与造反派也融合为一体。（痛定思痛，笔者紧急呼吁：北京天安门前，理应竖立一座**《红卫兵受难者纪念碑》**，每年 8 月 1 日，即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回信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的那一天，为纪念碑祭扫日。）

有人说，煽动红卫兵造反是步险棋，是走钢丝，但这正是毛泽东过人之处：集阴谋、煽动与控制于一身。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员的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股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由于十一中全会上遇到了党内右派集团的巨大阻力，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趁势穷追猛打”。他**充分利用**长期封建党阀式奴化教育和阶级斗争熏陶下所制造出来的盲目仇外的民族主义、阶级仇恨主义和仇恨人类文明的汪达尔主义（1）等反社会的狂热，**充分利用**几年来造神运动所营造的个人崇拜氛围，**充分利用**群众对官僚特权阶级的不满情绪和青年师生与工作组之间的尖锐对立，**充分利用**青年学生易于煽动的弱点和无所畏惧的造反精神，特别是**充分利用**他刚刚缔造的红卫兵们的无知和强悍，去冲击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镇压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因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亲自“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鼓动他们大造党内、外右派集团的反，全力支持他们进行全国大串连，造成“天下大乱”之势，借以把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红卫兵造反派袖标和胸章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天才的毛泽东，利用青、少年人的弱点，适时地把红卫兵捆绑在他设计好的战车上，让他们为他冲锋陷阵，充当炮灰。打上权力烙印的红卫兵们，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他们把造反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憎恶的知识分子和压抑他们的党内右派官僚特权阶级集团，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推崇为他们的**“红司令”**！

在 1957 年反右中，毛泽东把胆敢给他、给中共各级官员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并对其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镇压；但九年后，他却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提出“造反

有理”的口号，鼓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起来造反，批斗中共各级党组织和大小官员。从反右到鼓动造反，使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理无常是**”哲学的随意性，看到了他出尔反尔政治手腕的流痞性，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他为保卫个人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的卑劣人格，看到了他为保卫个人权力而制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使汪达尔人望尘莫及，不能不令汪达尔亡魂隔洋兴叹曰：“后生可畏！”

附 1、汪达尔主义

汪达尔主义是五世纪汪达尔人的特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汪达尔人**原先居住于奥得河畔，后经潘诺尼亚（今匈牙利）、高卢和西班牙进入北非。439 年，汪达尔人攻陷迦太基城，建立汪达尔王国。455 年，汪达尔人渡海攻入罗马，疯狂烧杀抢掠：他们藐视文明世界尊重的东西，肆意破坏文明世界视为珍贵的文物艺术，罗马古文物因而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毁灭文化的“汪达尔主义”成了野蛮行为的同义语**。建国九十五年后，即 534 年，汪达尔王国为拜占廷所灭。

05-敕训红卫兵

作者 于松然



1、毛“接见”红卫兵



2、林在讲话



3、毛、林研究讲话稿



4、毛接受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

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敕训红卫兵

在三个多月的八次“接见”中，毛泽东面对林彪等要员，只对红卫兵敕训了一句话：“**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在这里，毛泽东所谓的“思想革命”，是要颠覆真、善、美的儒释道文明和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毛惯用的策略是：由林彪、周恩来等人代表他按照事先决定好的内容讲话，将来不论讲话的后果如何，他都**保有自由评判的主动权**。

人们不会忘记，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第一次“接见”中，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见上图）。毛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女答：“**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 宋答：“是。”毛说：“要武嘛！”

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母校即高干子弟云集的师大女子附中，也随之改名为“要武中学”。自 6 月中旬以来，这所贵族学校的红卫兵们，已经以批、斗、抄、打闻名于京师。8 月 5 日下午，她们用棍棒和皮带将年逾五十的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开创了打死校长的先例。领导这个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就是当时**中共政治局后补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千金**，而这位千金，正是那个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第二天改名“宋要武”的**宋彬彬**。（著名学者**千家驹**说，宋彬彬双手沾满了八个人的鲜血，其中包括卞校长的鲜血！一位教过她的老师说：“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但在当局荫庇下，这位当年不可一世的千金，文革后为避嫌悄然移居美国，购房置业，在毫无悔意的岁月里闲庭信步，使卞仲耘等受难者不能瞑目——这是后话。）毛泽东倡导的“要武精神”，早在北师大女子附中已开“花”结果；改名“要武学校”后，“要武精神”波涛汹涌，迅速传遍全国。显然，毛泽东鼓动学生造反，就是鼓动学生批、斗、抄、游、打、烧、杀！

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讲话中，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加赞扬。他说：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号召红卫兵：**“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这就是文革中“四敢”、“四个打倒一反对”和“大破四旧”的来历。

在这次讲话中，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高调颂扬毛泽东道：

“毛主席是当代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他要求：**“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要红卫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就要**“彻底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林说的这句话，同毛泽东语录混合在一起，被红卫兵发展成了这样一句口头禅：**“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泽东思想中隐蔽很深的张献忠主义（1）的正本渊源。

“接见”就是煽风点火，按周恩来的说法，就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在“接见”的煽动下，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各路红卫兵，冲出校园，杀向社会。他们从批、到斗、到抄家劫舍、到大打出手，很快发展到充满血腥、使十数万无辜者丧生于**“红八月”**的大屠杀中，仅北京一地，就夺去了五千多人的生命权——“要武精神”得到了肆无忌惮地宣泄。对此，在“八三一”“接见”大会上，林彪高度赞扬说：

“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

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在“九一五”“接见”大会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再次高度赞扬红卫兵说：

“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

“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接见”及其讲话的“鼓舞”下，以阶级仇恨主义、民族仇恨主义、汪达尔主义和张献忠主义为代表的“要武精神”，被煽动了起来：妒忌、猜疑、争权、弄术和仇恨等人类兽性，找到了宣泄机会；**批、斗、抄、游、打、烧、杀**等红色暴虐，找到了发泄场合（图 08-7）。“红司令”的表彰，犹如火上浇油，红卫兵便有恃无恐地横行起来，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越烧越大。

下图：红卫兵“做得对！做得好！”“好得很！”



批（大批判）　**斗**（**薄熙来**的老父）　**游**（游街示众）

抄（查抄“牛鬼蛇神”的家）　**打**（街头被打死者）　**烧**（火烧民房）　**杀**（处决政治犯、思想犯）

但很快，红卫兵也开始分裂成以革命干部特别是以高级干部、将军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和以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骨干的平民红卫兵。红卫兵的造反对象也复杂起来：不仅党内外右派干部和知识分子遭殃，一些左派和中摇派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受到了红卫兵的批、斗、抄、游、打、烧、杀。对此，林彪“九一五”讲话中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警告说：

“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毛、林在这里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的政治概念，这将预示：以刘、邓

为首的党内右派，必将被戴上“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大帽子。

不忘造神的毛泽东，通过林彪之口，向红卫兵发出这样的号召：

“在我们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 8 月 31 日起，**“四个伟大”**从天安门上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叫响全国，又从《人民日报》上传遍全国。“四个伟大”成为人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必须颂扬的祝辞，大会、小会上必须高呼的口号。“四个伟大”还成了全国各地墙壁上、车厢上和橱窗上的主要标语（右图），还印在各种报章、书刊、工艺品和各种文件上，刷在介绍信、粮票、布票等用品上。以“四个伟大”为题材设计制作的“毛主席像章”，也有数亿枚之多。



“四个伟大”标语

此时已倒向左派的党内中间摇摆派头领周恩来，在“接见”中不甘落后，除“九一五”“接见”中大讲**“抓革命，促生产”**外，在多次讲话中，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大力赞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他说：

“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

他也不忘造神，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大讲特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说：

“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笔者：这是“四个伟大”的源头之一。）

“（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周恩来在“接见”时代表毛的讲话，煽起了“造反”、“破四旧”、“打砸抢”、“夺权”和“红八月”杀戮的熊熊烈火，给老百姓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显然，毛泽东和他的左右手林彪、周恩来，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但中共的“主旋律”规定：要无情地揭批林彪，要热情地颂扬毛、周，因此，**历史要按“主旋律”的规定打扮**。于是，遵命“主旋律”的学者、史学家们，便把灾难的罪责推到林彪一个人的身上。例如，席宣、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版）一书中写道：**“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又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首先抛出这个新罪名”**，等等，又有人为同官

方保持一致，漫天撒谎说，“毛泽东晚年错误被林彪利用”，林的这些讲话就是证明云云。

历史果真就是任由权力、任由御用精英们打扮的小姑娘吗？

请听：

8月18日“接见”中林彪说：**“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

8月31日“接见”时林彪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9月15日“接见”时林又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问好！”**



康生、江青、周恩来、林彪(讲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请看：（右图）

林彪“九一五”讲话时，毛泽东就站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讲稿；而录像显示，“接见”中林彪每次讲话，毛泽东都站在他的身边。

上面的文字和图片能否说明：**毛、林、周是三位一体**？或者说林、周屈从于毛的命令和压力在**“煽风”**？或者说林、周别有用心地利用毛的威望在**“点火”**？请读者自断。

遵命于“主旋律”的学者、史学家们，无法改变历史留下来的文字、图片和声音。但在档案尘封和资料垄断的条件下，他们却能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手法为“主旋律”服务，或根据“主旋律”的要求，有选择地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剪裁，或根据“主旋律”的要求，人为地张扬政治上有利的一面，回避不利的另一面，譬如颂毛、赞周、批判林，借以达到误导舆论的目的。

近些年披露的资料越来越多。资料表明，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会上的讲话，都是“写作班子”按毛的意图起草、经林和周阅读修改、**最后呈交毛审定的稿子**。这个“写作班子”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组织的，其成员有**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关锋**等。

为了证明林彪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煽风点火(刻意回避周恩来)，“主旋律”学者、史学家们说，“四个伟大”的发明人是林彪，并针对林彪讲话里的“四个伟大”著文说：“毛泽东对这个口号并不赞成”。言外之意是，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他们举例说：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辞去。”**“辞”者，告别、推让不受也，寓意颇深。

“主旋律”学者、史学家们甚至说毛泽东是被林彪“逼上梁山”的。他们引用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一封信里的话加以证明。在那封信里，“毛泽东”写道：**“我是被他们逼上**

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那封信是官方正式发布的。有人揭露为“伪而不劣”的假材料，称之为“真实的谎言”。这里姑且不论那封信的真伪，看看毛泽东在林彪讲话时的神态，你能看出他“**不高兴**”、他“**讨嫌**”吗？从林彪代表他讲“四个伟大”到“**不高兴**”，经历了 5 个月又 3 天，又从“**不高兴**”到“**讨嫌**”，经历了 3 年另 10 个半月。在漫长的数年里，面对“违命者”，他竟束手无策而任其发展？

过来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时代。那是个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是个“**毛主席著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时代。在毛说一不二的时代里，谁敢把他“逼上梁山”？试想，他如果正式提出不同意称颂他为“四个伟大”，谁敢不听？曾记否？为了迎合造神高潮，有人曾竭力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一句“不赞成”，便把他送了终，硬叫吹拍者碰了一鼻子灰。

谁发明了“四个伟大”？据悉：“四个伟大”最早源于“三个伟大”，那是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明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里又增加了“一个伟大”，第一次成就了“四个伟大”；其排列顺序据说是康生敲定的。8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社论，根据陈、周的“四个伟大”和康生敲定的排列顺序，第一次把“四个伟大”并列在一起。那篇社论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8 月 31 日，林彪根据陶铸等人起草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准的讲话稿，在天安门上叫响了“四个伟大”。对此，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撰文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共有’。”在“主旋律”作用下，趋炎附势的穆欣刻意回避了周恩来的创作权，回避了“四个伟大”的讲话稿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准的，回避了“四个伟大”是在毛的眼皮底下叫响的、而且还在全国大喊大叫了四五个年头：这些都是穆欣无法篡改的历史事实。史料表明：把“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归于**陈伯达**和**周恩来**，而把修改、推销权归在**毛、林、陶、康**等人名下，才符合历史的本貌。

从毛泽东表里不一的人格看来，“**我就不高兴**”是故作姿态的“谦”辞，而“**讨嫌**”则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洗刷。

1970 年 12 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已经**召开，毛、林分裂**已经**形成，中共**已经**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过几年的拼杀，红卫兵和造反派威风**已经**不再，毛的“伟光正”形象因而**已经**严重受损，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也因而**已经**有气无力，面临无可挽回地颓败。大智大勇的毛泽东，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只有自我洗刷并把罪责推给林彪，才能挽回造神运动的颓势。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讨嫌**”；但一句“讨嫌”，的确也把“四个伟大”送了终。

不能排除林彪、周恩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有“利用”毛权威的谋图；但毛泽东“利用”林、周、陈、康等的吹拍谄媚的人格、德性，从而达到颠覆刘、邓右派集团的谋图是无法排除的。

附 1、张献忠主义

张献忠(1606～1646 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1630 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1635 年参与荥阳之会，不久与李自成分裂。1638 年，张献忠受招安授副将。1639 年，重举反明大旗。1644 年 8 月 9 日攻破成都，号称秦王，以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国，8 月 16 日称帝。1646 年，张献忠中箭身亡。张献忠性格狡猾诡谲，嗜杀成性。据清史记载，明末四川约有四百万人，被张献忠杀了近三百万（史家对此有较大争议）。因此，张献忠主义就是**刀把子主义**、**杀伐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

06-三忠于、四无限

作者 于松然

在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中，如果说“学雷锋”是用青少年造神，“学大庆”、“学大寨”是用工人和农民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正名，“学解放军”是紧握军权，属第一波造神，那么，八次“接见”是毛泽东亲自上阵，率领他的左右手、扈从和护驾，利用数千万红卫兵的造反精神造神，借以直接达到颠覆刘、邓右派官僚集团的目的，属第二波造神。

红卫兵的造神同造反密不可分：造神为了造反，造反强化造神。到了 1967 年，红卫兵演变为造反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

红卫兵不辱使命。在“红司令”毛泽东的率领下，在林彪、周恩来、江青积极策划和督导下，逐渐形成了马列毛宗教行为规范的“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借助“忠字舞”、“语录歌”、“像章热”、“忠字台”、“万岁馆”等五彩缤纷的共产主义宗教形式，把中华大地打扮成了一个红海洋。

1.大跳“忠字舞”

据说，唐玄宗李隆基曾命乐工编导过忠字舞《圣寿乐》：宫女们身着五彩衣裙，舞姿婀娜，边唱边舞，敬祝皇帝万岁万万岁；终舞，躺身于地，组成“万岁”二字图案。观后，玄宗龙颜大悦。一千二百多年后的 1966 年到 1968 年，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忠字舞”，跳遍了全国城市和乡村，其规模和创意，令在冥府的唐玄宗望舞兴叹，自愧弗如。

毛式“忠字舞”舞蹈语汇，大都来源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是**周恩来**直接导演下于 1964 年 10 月 2 日首次演出的“杰作”。舞蹈多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和“语录歌”等歌曲伴唱、伴奏，掀起革命热情和制造崇拜氛围。下列各图为常见的舞姿语汇。（下图“忠字舞”）

“忠字舞”形形色色



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　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全世界人民想念你！　红小兵，志气大，牛鬼蛇神全不怕！　《毛主席语录》发给咱，毛主席就在咱身边！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　亲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有人说，“忠字舞”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舞姿僵直、生硬，有机械位移之感；虽舞蹈者身心洋溢着朝圣的庄严，激荡着革命的豪情，但舞姿粗糙、僵硬、稚拙，不能不让人顿生滑稽之感。

湖南人胡遐之曾以诗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

毛泽东死后，有人撰文批判“忠字舞”是偶像崇拜的形式主义，是荒诞愚昧的封建流毒，也有人说是林彪搞的政治阴谋，等等。笔者认为，前者“流毒”说尚能说得过去，后者“政治阴谋”说近乎胡说八道。如果“政治阴谋”说成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则难逃其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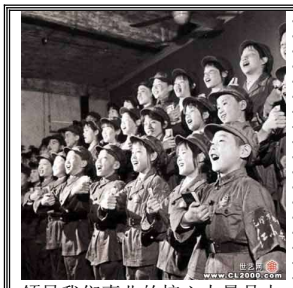
2.大唱“语录歌”、革命歌和样板戏

“语录歌”是根据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1966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2 日和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连续三次以整版篇幅登载“语录歌”后，同类歌曲便大量涌现，充斥华夏。

“语录歌”的代表作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因为我们是为

人民服务的》、《我们共产党人》、《造反有理》、《世界是你们的》等。（下图：大唱革命歌曲）

大唱革命歌曲五花八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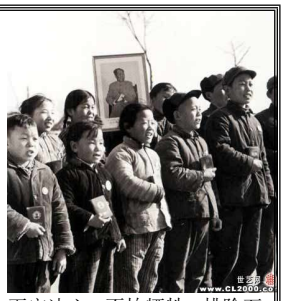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



革命的部伍，我们……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据报导，最早组织部队音乐工作者为《老三篇》语录谱写歌曲的是《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歌曲》编辑部。《老三篇》即《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著名作曲家**李劫夫**曾发过宏愿，要在有生之年把所有毛泽东语录谱成歌曲。据估计，约有 1,000 余段毛泽东语录被谱成了“语录歌”，林彪为颂扬毛泽东的《永远学习“老三篇”》也搀合其中。（下图：大唱毛泽东语录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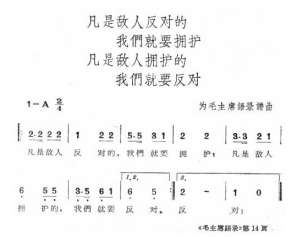


图 08-12：毛泽东“语录歌”



林彪语录歌搀合其中

戏剧界不敢落后，谱写了京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语录京剧”清唱。

外国人也来凑热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语录歌”，是由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谱成的。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过程中，中央音乐学院就主动地、有计划地教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演唱“语录歌”。1966 年底，在安徽省合肥市，工人红卫兵举行了一次毛主席语录歌曲演唱大会。从此，在会议前后，在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在游行行列中，在广播电台和红卫兵高架的高音喇叭里，在列车行进中，在车站码头、工矿商店、军营机关、农村田野……到处都有响亮的“语录歌”歌声。

在那个时代，笔者在北大荒曾多次见过，在火车上、汽车上，大小会上、田间地头上，

都有演唱“语录歌”活动。报纸、电台天天宣传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越唱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但在密山县农村中，笔者经常听到农民低声轻哼的曲调，大多还是“二人转”。

相对生命较长点的是“革命歌曲”，诸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还有流行 2～3 年的《革命造反歌》。歌词是：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据说《革命造反歌》初创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定型于 7 月 1 日。当时北大附中，在海淀区各中等学校红卫兵集会上，演唱了此歌。自此，歌声飞出校园，在社会上广为传唱。遗憾的是，笔者当年处于“牛鬼蛇神”边缘，没有资格也没学唱这首歌；写本文之前，也没有找到它的曲谱。

同《革命造反歌》相对的是《鬼嚎歌》：歌声凄凉、惨淡，像是从地狱传出来的。文革中，被打倒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牛鬼蛇神”，在监管人员督促、逼迫下，都要学唱这首《鬼嚎歌》。这是他们继戴高帽子、“坐喷气式飞机”、游街等毛式揪斗体罚后，进一步“触及灵魂”的“革命措施”，让已经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人们屈从于强权。人性的暴戾恣睢和卑鄙恶劣，尽在于斯。据说，许多大作家、学者，都曾受到这种惩罚。

笔者一介无名小卒。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有人怀疑父在台湾因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揪斗，竟同大作家、学者们一样，被迫唱那首凌辱人格的《鬼嚎歌》。记得词曲大致如下（有些音符无法写出）：



“语录歌”旋律简单，节奏容易上口，音域较窄，宜于多数未受专门训练过的群众演唱；但由于语录的论述语句不适于歌曲的音律节奏，又不容许删改，只能迁就，因而唱起来像念经一样，兴味索然。1971 年“九一三”林彪摔死后，毛的“伟光正”形象受到沉重打击，“语录歌”、“红宝书”同林彪一样，也折戟沉沙，很快从人民生活中消失。

3.毛主席像章热

“毛主席像章”亦称“红像章”，是以毛泽东头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据说：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年，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解放”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红像章”狂热，则是在文革中的1966年夏到1971年夏。

文革中，毛泽东像章热最早兴起于部队。“接见”高潮中，红卫兵组织开始批量向徽章厂订制。随着大串联的扩张，“红像章”南下、北上、东征、西进，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扩张。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佩戴起毛泽东像章时，显然向全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党和政府，要把“红像章”热推向高潮。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是：一跳“忠字舞”，二背“红宝书”，三戴“红像章”。

当时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各省、市、地、县革委会和红卫兵造反派团体，在召开重要大型会议时，都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在像章的设计和制作上，各地都在暗中较劲儿：看谁的设计更“独具匠心”，看谁制作得更加精致，更加豪华。在暗中较劲中，各地都想以此来“证明”：我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我们更加崇信毛泽东思想，我们更加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情侣结婚时，为了表示更加热爱、崇信、紧跟，把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当成了不可逾越的婚规！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多向左），半身像、全身像较少。像章多为红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或林彪的“紧跟”题词。也有以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也有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像章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大小不等。像章最大直径达20多厘米，因无法用别针，便用绸带挂在胸前。（下图：毛泽东像章种种）

像章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等20多种材质。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和手书“为人民服务”条形章，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军星儿”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



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5年间，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种类约4万余种，总数达22亿枚以上；其中，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10万枚。

有人统计，文革时制作“红像章”用铝达 6,000 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 21 战斗机的用铝量。当时全国铝材库存告罄，工业生产、飞机制造所用铝原料频频告急，老百姓的日常用的铝锅、铝勺也常脱销，当局不得不凭票按“计划”供应。

1969 年，周恩来针对全国上下的造神运动，提出了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了 7 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多，已做了 22 亿枚**。”毛泽东也不得不让步，但让步让得非常“高明”，比说“讨嫌”“四个伟大”技高一筹。他说：**“如果把像章的金属材料用来造飞机，保卫国家，将会有用得多**。”他怒斥官员和老百姓说：**“还我飞机！”**俨然是个“像章热”的反对者。见毛泽东对像章的反对态度如此坚决，中共中央大员们不敢怠慢，便紧紧跟上。1969 年 6 月，他们在下达的《关于宣传毛泽东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泽东像章**。”此后，制作像章热便戛然而止。

“还我飞机”，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反潮流的“伟大”精神；**“已做了 22 亿枚”**，使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但毛的“伟大”和周的“严肃”来得太晚了，他们竟让“像章热”随着红卫兵造反派猖獗横行了四五个年头。在这四五个年头里，**如果他们不是始作俑者，难道没有支持过？如果他们没有支持过，难道没有默许过？如果他们没有默许过，难道没有失察过？**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失察就应向人民道歉，就应引咎辞职。然而，毛、周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像章热”的反对者、批评者！这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教训人的讲话。面对由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造成的数千万饿殍的惨烈后果，他在那次讲话中毫无歉意地大弹**“缺乏经验论”**，并把它提升到深奥莫测的理论高度。他教训人道：**“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的高谈阔论，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巧言令色？什么叫卑鄙无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独特的、理直气壮的恶叉白赖？相比之下，在“像章热”上保持沉默的林彪，反而使人感到他相对诚实些。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摇旗呐喊的芸芸众生，看到了“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的悲惨下场后，才有所醒悟，“像章热”也随之逐渐冷却下来。毛泽东死后的 1980 年，中共中央在下发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文件中规定：**“毛泽东像章要大量回收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遥想当年，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顶着烈日迎“圣像”，冒着飞雪购“像章”，有时还要排着长队等待领导奖授“毛主席像章”。然而，曾几何时，星移斗转，风云变幻，“毛主席像章”竟被当成废品垃圾，用簸箕撮、麻袋装，进行全面清收，其场面令人难以释怀。据说，回收“毛主席像章”的废铝达千吨。


1977 年《上访者》

“像章热”真正冷却是在毛泽东死后。文革是个迫害猖獗的时代，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1977 年，人们开始为自己、为亲友在文革中所遭受到的迫害**鸣冤叫屈**；但在**“歌颂——迫害——再歌颂——再迫害”**这个周而复始怪圈的独裁社会里，戴着毛泽东像章上访，是个怪诞不经的蠢举，对上访不会产生影响。这位农民《上访者》（右图），看看他穿的那身破烂棉衣，便知道“大救星”毛泽东给了他什么。这不是“像章热”的继续，而是“像章热”的回光返照。

4、 红海洋

1966 年夏季席卷全国的红海洋，是用红油漆将街道两边墙体涂成红色寓意环境“革命化”的风潮。这一时尚的功能，是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为神化毛泽东和渲染造反气氛造势。

《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23 日第一版，发表了《好得很！》的社论。社论号召：**“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毛和他的喉舌《人民日报》鼓动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在房屋、院墙墙壁和机关、学校的大门上，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语、口号和毛泽东的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和形式多样的宣传画(下图)。

宣传画种种



于是，这种风潮旋即蔓延到全国城乡。各地商店、机关、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上，以及那里大门、院内、院外、室内、室外，都淹没在毛泽东语录和宣传画的红色油漆中，连厕所也不能幸免。此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牌坊，甚至还搞了许多敬祝毛泽东的神龛、庙堂。

在毛泽东的默许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中共大员们的鼓励下，出现了一代红卫兵的共识：**“‘红海洋’可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每一个角落，激励革命斗志，威慑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资力量，一个红彤彤的、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新世界就会降临！”**对此，有人著文评曰：“这是高贵的无知！傲岸的愚昧！”由于“红海洋”泛滥成灾，各地红油漆供销告急，库存告罄。

“红海洋”喧闹了几个月后，毛左当权派们终于发现，这种形式主义虽能推进造神，但这种“红色波谱”的大众艺术，正在被右派们利用，正在转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视线，**“阻截了充满批斗精神大字报场地，消蚀了造反派的革命斗志，瓦解了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于是，根据毛泽东的谕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红

海洋”遂猝然而终。

5.“三忠于、四无限”的来源和消亡

“三忠于、四无限”把毛泽东个人及其思想、政治选择做为中国党、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核心价值。这种立场和行为规范，是一种宗教观念，是马列主义教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必然滋蔓：它用权力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强迫老百姓像敬神一样去顶礼膜拜它。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初形式是**“四忠于”**，即“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据说始于 1966 年 7 月，后精炼演变为“三忠于”定型格式，结束于 1971 年 4 月。但笔者查对资料后认为，说“四忠于”始于 7 月已无案可查，但始于 1966 年 8 月 31 日周恩来在天安门上的讲话里，却有据在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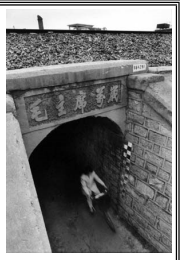
“四无限”即“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始于 1966 年 5 月 2 日《人民日报》，结束时间稍早，为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

这种宗教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共七大上。那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五十年代，对毛的个人崇拜就有很大发展，促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疯狂。1958 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中共第一副主席刘少奇说：**“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责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常委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中央常委康生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为了捍卫个人权力，在**“搞点个人崇拜”**思想指导下，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恶性发展起来。当时的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林彪，紧紧跟上，他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最活”**、**“顶峰”**等等，便应劫而生；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不甘落后，他的**“大立毛泽东思想”**、**“心中的红太阳”**、**“四忠于”**等等，便纷至沓来；甚至处境危险的邓小平也颂扬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下图发放“毛主席著作”)


庆祝发放“毛主席著作”

由此可见，“三忠于、四无限”的宗教行为规范，不是红卫兵、造反派或“革命群众”的创造，而是毛和他的权贵、御用精英们，按既定马列主义宗教观念和政策进行策划、诱导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之必然。





残留到二十一世纪初墙标、匾额

然而，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三年后的 1969 年 6 月 12 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规定：**“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为什么呢？因为，被“三忠于、四无限”推上权力峰巅的毛泽东，在“天上宫阙”颐指气使、扬扬得意了几个年头后，渐生“高处不胜寒”之感：在打倒并整死刘少奇后，逐渐又发觉**“当面说好话”**的林彪要**“背后下毒手”**了。于是，他在清算林彪前发出“最高指示”说：**“‘紧跟’、‘三忠于’、‘四无限’，讨嫌。‘跟’应当跟党，我历来是路线对了，我支持；错了，我反对，敢于反潮流。‘跟’不要跟个人，个人是会变的……”**多少年来主张**“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毛泽东，又一次抡起“反潮流”的大棒，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旋即变成了个人崇拜的反对者——真真一个出尔反尔、变化万端的弄权痞棍！于是，按“主旋律”节拍弹跳的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不敢怠慢，生生地把制造、推行个人崇拜的罪责，一古脑儿推到林彪一人身上，毛死后又延展到“四人帮”身上。——历史就这样被他们任意玩弄、打扮！

毛泽东死后，“三忠于、四无限”遭到了一些批判，被斥为封建化的个人崇拜，奴化和取消人民的自由思想；但批判都没敢触及产生这种邪道的体制根源

在中共的高层中，真正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大员少之又少比较突出的就是为人耿直的彭德怀元帅。然而，他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断肋骨，最后伤痛癌症不治，死于囚禁中！

毛泽东一手培植起来的红卫兵，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文革噩运中一群恶魔，给历史留下的是一堆遗臭万年的僵尸。（右图）



红卫兵僵尸

07-大字报、大批判

作者 于松然

引子——毛泽东的天才在于，消灭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他不会采用像民间传说“火烧庆功楼”那样的蠢办法，而是借“群众”之手即借红卫兵之手，用大批、大斗、大辩论和大破“四旧”的形式，去大造消灭有理的舆论，再以层层剥笋的战术，使大批、大斗、大辩论和大破“四旧”逐步升级到大虐杀的红色恐怖高度，从而名正言顺地达到逐个消灭对手之目的。下面为正文。

毛泽东一贯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的所谓“造成舆论”，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大批判——**妖魔化政敌**！

批判,其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词性有中性的一面；但多数用于否定，即对错误思想、言行进行批驳、谴责和否定。在中国，批判就是否定；“批判”前冠上一个“大”字，就是妖魔化的全面否定。

在毛泽东的中国,作为政治否定的话语方式，历史记录着大批判的轨迹：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 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 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7 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大批判,1965 年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批判，等等。这些后来被**中共否定了的几次批判、大批判**，当时都是那么“理直气壮”、“大义凛然”，调动“千军万马”，以“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矛头直指学者教授、文士墨客、政治异己和弱势群体，其威慑震骇力之强烈，足以使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到 1966 年，大批判已经普及、定型，其运用手段已达炉火纯青的高度。

从批判到大批判的“第一次飞跃”，是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产生的。那时，毛泽东给大批判规定了它的载体，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所谓**“四大”**。其实，当年的媒体报纸、杂志、电台都在搞大批判。作为“四大”之一的大字报，实际上承担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即大批判载体的功能，它同其他媒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类同于今日博客、BBS。如果说有区别，仅仅是没有编辑、审核、出版许可证而已。应该肯定，大字报是对媒体高度一元化的抗拒，是“舆论一律”极权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有限民主形式，同其他媒体一样可以为民主服务。但当这种形式**被权力占有**时，同其他媒体一样，会变成权力的喉舌，变成专政的工具，大字报不能例外。毛泽东利用“四大”引蛇出洞，结果右派上钩，大字报这种有限民主形式，变成了铺天盖地、一边倒地大批判大镇压右派的载体，终使 55 万右派分子束手待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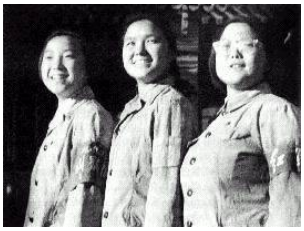

南大学生在校园内看批判校长的大字报

聂元梓那张被毛泽东赞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字报贴出后，大批判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亦即从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发展成唯我独尊，杀气腾腾！以康生、曹轶欧夫妇秘密打造的聂元梓大字报和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清华附中鼓动炮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及其《二论》《三论》小字报，都是大批判“第二次飞跃”的代表作。这种源自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大批判，都被毛左们打扮成群众的自发。这时的大批判，已经没有是非之分，没有矛盾性质的界限，一切都以人划线，唯毛是尊。到此，大字报同其他媒体一样，沦为毛泽东独裁权力的喉舌。（上图）

在大批判上，红卫兵堪称毛泽东的尖兵！

毛泽东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据此，有学者认为，红卫兵大造院校领导和教师的反，是对长期填鸭式、经院式、专制式教育路线的反叛；心理学家认为，反抗产生于压抑。应该承认，学者们的分析不无道理。在红卫兵运动和而后的造反派运动中，对压抑的反抗和对专制的反叛，都表现得非常鲜明。但笔者认为，在早期的红卫兵中，**反抗和反叛并非主流，主流是革命**！

早期的红卫兵由工、农、兵、革干、军干子弟等**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他们都是“自来红”，他们的领导骨干大多是中共高级官僚子弟，因而被人们称为“老红卫兵”，亦称“**贵族红卫兵**”。由于他们的骨干出身于官宦家庭，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便得到了中共院校工作组的信赖和支持。例如，邓小平的千金**邓榕**，同残杀校长的嫌犯宋仁穷上将的女公子**宋彬彬**一样，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右图）。



贵族红卫兵——邓小平三个女儿（左起）邓榕、邓楠、邓琳

贵族红卫兵自成立之日起，都把“**老子革命儿接班**”作为“当仁不让”的权利。他们得天独厚，能从长辈那里得到许多旁人难以得到的政治信息。在大革命面前，他们几乎没有观望，没有“第二次反右”的踌躇和忧患；“狼奶”的哺育，使他们的人类兽性一面急剧膨胀起来：他们自觉怀着父辈们嗜血的激情，踏着父辈们钻营的足迹，背诵着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用红色暴虐乖戾的语言充斥他们的大字报，使他们的大字报满天飞舞——应着毛泽东的革命鼓点弹跳。根据父辈们的指导或暗示，他们把大批判的矛头直指毛泽东选定的目标：旧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彭罗陆杨以及文艺黑线人物等，都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教育部、大中院校负责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技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出身“不好”的大、中学生等弱势人群，已被他们统称为“牛鬼蛇神”，都成了他们刀俎上的鱼肉，都成了他们任意屠宰的对象。

他们自以为得计，自以为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铁定的接班人；但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利令智昏使他们误判了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要他们为向他们父辈夺权作出牺牲。

为了打倒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毛泽东要发动年青无知的红卫兵特别是平民红卫兵，去为他冲锋陷阵。天才的毛泽东十分清楚，平民红卫兵同他们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工、农、兵家庭出身，没有什么权力背景。基于父辈反右前车之鉴，他们对“横扫”、“造反”，多冷眼旁观，或仅摇旗呐喊而已，不敢冒然造次；他们之所以要另立旗号，仅仅是看不惯贵族子弟们的专横跋扈。为了利用贵族红卫兵们拼杀，从而带动平民红卫兵起来造反，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里有意闪过一笔，不提他曾多次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向党内右派集团暗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算“文五界”即清算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牛鬼蛇神”和他们的支持者彭真等人，使高干们放手让他们的子弟出来革命，使贵族红卫兵无所顾忌，从而带动平民红卫兵造反。用革命鼓动反叛，毛的这一招“阳谋”，果然奏效。

以革命为己任的贵族红卫兵们，以大字报为武器，今天批张，明天批李，今日命令这个人坦白交待，明日勒令那个人低头认罪，他们俨然以无产阶级法官自居。他们又是一个无所

不包的管理者：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外交事务，小到街头修鞋和日常穿着，都在他们管辖之内。他们本能地喊出了纯血统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想革命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其不可一世的傲气宣泄无余！在贵族红卫兵表率和刺激下，各路平民红卫兵纷纷亮相，他们的反叛精神在革命口号掩护下，踩着贵族红卫兵的革命血迹，杀出校院，杀向社会。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阳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在革命红旗映射下，此时的红卫兵们，已经不满足于大字报的杀伤力，他们开始用拳头、皮鞭、棍棒和刀具来进行革命，使大批判实现了从精神折磨到肉体虐杀的飞跃，从而使人性之恶即人类兽性的一面，得到了淋漓的张扬和宣泄。

08-大破“四旧”

作者 于松然

大破“四旧”中的冰山一角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把藐视文明的破“**四旧**”、立“四新”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务。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自 8 月 9 日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各地报刊，都全文刊登《十六条》，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宣传。例如，《解放军报》在社论中提出：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显然，毛泽东要用丛林乌托邦“四新”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四新”，颠覆五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

在报纸和电台的鼓动下，以贵族红卫兵为先锋的各路红卫兵，纷纷杀向“四旧”。

1966 年 8 月 17 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起草了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四旧”的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第二天受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的鼓舞，他们印刷、散发了他们的《最后通牒》。20 日，北京各路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强行实施他们破旧立新的命令。他们谴责“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等港式发型，谴责“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谴责“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货色”。他们下令城市居民“一星期内销毁你们的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掉你们的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他们所说的“黄色书籍”，就是言情小说，所说的“低级下流的照片”，就是照相馆橱窗里的美女照。他们命令“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消（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许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由于红卫兵大破“四旧”的矛头首先指向广大老百姓，很快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恐慌。对此，在周恩来、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对老百姓的不满和恐慌做出了反应。8 月 21 日，《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发表了《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评论员文章，高度赞扬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革命精神。8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好得很！》的社论。社论说：**“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在中央喉舌助威声中，北京各路红卫兵高举破“四旧”大旗，在破“四旧”中大砍大杀，上海、天津、各省、自治区首府和部分中等城市红卫兵，紧跟其后，纷纷效法。由是，轰轰烈烈的大破“四旧”运动，迅猛席卷全国。

9 月 1 日，北京 26 中的红卫兵在《破旧立新一百例》中规定：“禁止戴手饰、耳环、长命锁等”，禁止“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立即停止出售”香水、雪花膏，“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儿童不许唱“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等等。为了实施禁令，他们便组织上街督促、检查，挨家挨户清理居民家的“四旧”，命令商店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还强行剪毁“奇装异服”。

在红卫兵的威逼下，许多商店、街道、学校，纷纷改为带有革命含义的名字。如：西方国家驻华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等等。8 月 24 日，北京红卫兵召开 40 万人的大会，隆重宣布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上海红卫兵闻风而动，发誓要用“铁扫帚彻底扫除”南京路上的“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天津红卫兵步其后尘，迅将最大的“劝业场”商场改名为“人民商场”。广州红卫兵紧紧跟上，旋将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铲掉康有为题写的“陶陶居”招牌，更名为“东风楼”。

红卫兵还提出改变交通信号的要求。他们说：“红色象征着前进、象征着革命。……而交通信号灯却与此背道而驰。红灯却成了停止车辆的信号，阻止我们前进，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革命。”要求把红灯改为通行信号。

红卫兵勒令资本家：“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不许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文革期间，没收私房 52 万间，上海市没收私房 124 万平方米，天津市从 8 月 27 日到 9 月 9 日，有 11,525 户“主动”交出私房 49,776 间。中共权宜之计的“赎买”政策，几天间被红卫兵推翻了。对此，毛泽东喜出望外，乐见其成。

大破“四旧”也指向下层贫苦个体户。天津市红卫兵发出通告：“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 对失业青年，红卫兵下令：“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立即做出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决定，其他各大城市纷纷效法。

当红卫兵在社会弱势群体中大破“四旧”时，一部分红卫兵很快把矛头指向官僚特权阶级。例如，8 月 24 日，沈阳 31 中的学生给辽宁省委贴出通牒：“你们各级高干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还雇用保姆、佣人。……我们通牒你们，限令你们一天答复，三天之内采取行动。”

为了支持红卫兵的“横扫”、破“四旧”和反工作组的造反行动，毛泽东下令警察不准镇压学生。于是，公安部下达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六条规定(详见第 10 章“公安六条”)。“公安六条”规定，各级政府“**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在红卫兵大破“四旧”中，的确冲击了一些需要改革的陈规陋习和社会不公；然而，在官方喉舌一片支持、赞扬的鼓噪声中，红卫兵肆无忌惮地冲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一切文明成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大破“四旧”行动全面升级，从而使打、砸、烧、抄家、游斗和驱赶，全面开花，人性之恶也因而找到了全面宣泄的舞台。

一打——在大破“四旧”期间，全国各地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摧残虐杀“牛鬼蛇神”事件不断发生。“牛鬼蛇神”是文革之初，毛泽东给持不同政见者订制的一顶新“帽子”。由于“**不主张打人**”的“最高指示”中有“**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条条，打人之风迅即在北京刮了起来。北京市六中，以“红五类”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在校内设立“劳改所”，关押抓来的“牛鬼蛇神”等“坏人”，对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折磨。据报导，仅北京市一中、六中两所中学，在“劳改所”里打死、打伤、致残者达 200 人以上。在六中的刑讯室里，红卫兵在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右图）



一打：红色恐怖

这条标语，印证了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反人类罪行的疯狂，记录了红卫兵法西斯罪行的暴虐！其时，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从长白山到青藏高原，从内蒙草地到东海岸边，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哪里没有屈死的冤魂，哪里就没有

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哪里就是反革命的天下！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暴力畅通无阻。

据知情人披露，1966 年 10 月，在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至今还不准普通群众查阅的资料。这个资料提供的数字是：在 8 月下旬到 9 月底的 40 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 1,772 人。但一些专家和目击者们则认为，实际被打死者可能高达五千人。又据报导，9 月 1 日至 25 日，上海市区 489 所中学中，有 361 所中学有打人行动，被打者高达万余人，打死 11 人。其他地方呢？由于档案尘封，新闻被控，检查受制，知情者惧惮，许多回忆录作者对敏感问题，不是闪烁其辞、避重就轻，便是推卸责任、掩饰真相，偶有真言者，也痛遭当局封杀。因此，知情者、目击者的文章、专著和报导，不得不按“主旋律”的规则定稿，读者也就难知其真相。但据看过有关档案资料的专家们论证，1966 年的红色恐怖中，全国至少有十万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被打死、虐杀！

二砸——在破“四旧”中，各类宗教均被列为革命对象，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寺庙遭到破坏(下图)。1966 年 8 月 23 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红卫兵 273 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8 月 24 日，北京 10 多所学校的红卫兵，冲击了天主教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26 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布，接受红卫兵和群众的“要求”，取缔了这个修女会，接管了修女会办的圣心学校。28 日，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 8 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修女出境。北京有红卫兵提出“消灭伊斯兰教”，被周恩来制止。各地不断发生砸庙、毁寺事件。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和徐家汇天主教堂，先后被砸。著名的佛教圣地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破坏：15 座寺庙中自唐朝以来铸造塑建的 479 尊佛像、395 尊菩萨和 649 尊罗汉，珍藏千年的 54 部藏经书，503 副贝叶像，大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焚烧掉；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品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 60 余吨。在回族聚集的宁夏海原县，大破“四旧”的三、四天里，就有 67 座清真寺、17 座寺庙被拆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无数个价值连城的小佛像头被砸掉。哈尔滨的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他们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还强迫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



二砸：砸佛像

被毛泽东批判过的海瑞、武训、孔子等历史人物，也在劫难逃：海南岛红卫兵捣毁了海瑞墓；山东柳林红卫兵砸了武训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死了两千多年的孔子也难逃厄运，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等庙碑和泥胎塑像，被疯狂捣毁。

进入 9 月，破“四旧”风暴更猛烈。**同兴**在他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 1958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 6843 处文物古迹中，有 4922 处被毁掉。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从各个炼铜厂里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 117 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 320 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 18.5 万件，古旧图书 236 万册，其他各

类杂项文物 53 万多件。著名文学家**阿英**写道：

“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佛像取乐，游人行至山顶，见到那些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革命，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几乎没有一个幸免。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要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三烧——8 月 23 日，在《造反歌》的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臂着红卫兵袖标的少男少女，闯进了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他们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接着他们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即文艺界精英们常坐的一张张沙发上，都戳上一个个大窟窿，发泄他们对精神贵族们的怒火；然后他们打开库房翻箱倒柜，把库房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泼上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他们又命令文艺界精英们，跪在火堆四周陪罪。著名作家**老舍**跪在其中，当他遭到红卫兵揪斗、毒打后，第二天投湖自杀。



三烧：火烧图书经卷(左)、匾额条幅(右)

除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少量被毛的左派认可的著作外，其他中外报章、书刊、史著、外文书籍、古今中外名著和古籍字画等，以及名胜古迹和有纪念意义建筑上的木质匾额、条幅、对联，都被红卫兵当成“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查抄，并付之一炬。(上图)

四抄家——红卫兵对所谓“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等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其私人财产，时称为“抄家”。(右下图)



四抄：查抄一个中学教师的家

据统计，8、9 月期间，**北京市**有 33，695 户被抄家，被没收的物品计有：黄金 103,131 两，白银 345,212 两，现金 55,459,919 元，外币 4,478 万元，文物、玉器 613,618 件；各区、县抄收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 330.51 万多件，价值达 1,867 万元。

在**上海**，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25 日止，全市共抄家 157,700 户，占全市总户数 241 万户的 6.5%，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 1,231 户；全市 6 万多工商业者遭抄家，几乎无一幸免；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 64.9 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 90.7 万件，钻戒、钻石 4 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 27 万余件，美钞 334 万元，其他外币 330 余万元，银元 239 万元，现金、存款、公债 3.76 亿元。

从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共查抄了 1.2 万户人家，抄出 1.3 万辆汽车的财物，装满了约 6 万平方米的 52 座临时仓库。其中，现金 556 万元，存款 4,050 万元，公债 261 万元，黄金 4 万多两，金银饰品 6 万多件，银元 60 多万元。

据**武汉市**不完全统计，红卫兵查抄 2.1 万户人家。全市抄出黄金 1,110 斤，白银 1,800 斤，银元 26.7 万块，现金和存款 440 万元。查抄和揪斗中，发生自杀事件 112 起，死亡 62 人，游斗折磨致死 32 人。

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 64,056 户。查抄搜缴的财物中，仅图书、字画和文物达 17 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三盆盆景。

笔者家处中原一小城，不到两岁的幼儿手戴一副银镯，在街上遭到红卫兵查抄，从幼儿手上强行掠夺而去。小儿大哭，抱着他的外婆差点晕倒。

大破“四旧”的捷报，频频传到北京。对于这种有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法西斯暴行，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大破“四旧”的一线指挥官们，喜形于色。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兴高采烈地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 据占有档案资料的史学家丁抒披露，全国约有一千万户被抄家。

8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86 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抄他家时的粗暴情景，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由于章在 1920 年曾资助过困难中的毛泽东两万银元，毛泽东知恩报恩，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章士钊由是免受非难。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 月 1 日，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即派江青，代表他去安抚受惊扰的宋庆龄，使宋躲过了一劫。

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参加者、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76 岁高龄的**李达**，就没有那么幸运。当时，他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1966 年 7 月 19 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解救他。毛泽东见信后，即时写了**“转任重同志酌处”**的批语（“任重”系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由于是“酌处”，他依然继续遭揪斗、抄家，8 月 24 日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的批语，证明他是毁灭文明的汪达尔主义者，是大破“四旧”法西斯暴行的总后台，而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中共大员，则是他的前台代表、各路红卫兵的指挥官。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之一的**高皋**说：“66 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而且整个家里头，用几个大汽车给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各地所抄出的财物中，大量是生活用品，如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搁置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露蚀。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廉价处理。据知情者披露：**线装古籍抄来品，充塞了毛泽东的书架，古玩字画战利文物，成了康生的收藏品**。



五游斗：游斗当今“皇上”的老父习仲勋

五游斗——破“四旧”中，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刑满释放人员、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人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毛异己分子、代表“封、资、修”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宗教人士等，这些当年被统称为“牛鬼蛇神”的人士，都是红卫兵的活靶子，其中大多数人都惨遭到红卫兵的揪斗、抄家、游街示众(上图：游街示众当今“皇上”习近平的老父当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在北京，除民建外，其他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中，有 104 人被揪斗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 31 人，民盟 36 人，民进 8 人，农工民主党 8 人，九三学社 8 人，工商联 13 人。其时，中共制定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被毛泽东、周恩来等官僚特权阶级和他们豢养的红卫兵们，糟蹋成一具戴着美丽面具的僵尸！

六驱赶——即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等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清扫出城，驱赶到农村。破“四旧”运动中，在周恩来政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发布通令，把那些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家属的市民，驱逐出北京。后来驱赶范围又扩大到右派分子、资本家、以及被中共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据报导，在 1966 年夏天，北京城区有 10 万、全国 50～60 万弱势居民，被抄家、没收财产、注销户口，逐出城镇，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

由于档案尘封，新闻被控，检查受制，知情者惧惮，回忆录作者按“主旋律”定稿，老百姓很难知其全貌。因此，笔者上述所列数据，很可能只是红卫兵大破“四旧”中的一些凤

毛麟角。但对毛泽东和中央大员们来说，全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取得了多大“战果”，他们应当很清楚。

据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回忆：

“1966 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其实，吴德不是不知道，早在 8 月 23 日毛泽东就对他们说过：“**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

在毛泽东看来，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等严重侵犯人权的反人类暴行（1），不过是“动动”而已。岂止于此？在“八一八”、“八三一”和“九一五”的“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站在毛泽东身边，大声号召大破“四旧”，高度赞扬红卫兵在破“四旧”中侵犯人权的法西斯暴行“**做得对，做得好！**”“**好得很！**”这再次证明，毛泽东和中共是颠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洗劫文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汪达尔主义**，而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一本摆在橱窗里供人欣赏的花瓶而已！

在这里，笔者敬请读者关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和在他们领导下的中共，在文革的“横扫”、破“四旧”和而后的夺权、全面内战、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夷平沙甸等运动中，都犯了哪几宗“**危害人类罪**”？请读者参照附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号自断！

在大破“四旧”高潮中，中共其他大员们的态度呢？

大破“四旧”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犯罪！写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决议里的破“四旧”条条，是中共左、中、右派大员们共同作祟的结果：对以毛泽东为首、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为中枢的左派集团来说，破“四旧”是他们发动起来的，旨在大破“四旧”中发动红卫兵，借其无知和蛮悍来摧毁刘、邓右派集团；对以刘、邓为首的右派集团来说，为了对抗摧毁，他们利用固有的强大权力，在大破“四旧”中转移方向，将毛的压力引向中、下层，挑起上、下冲突并从中渔利。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许多人都是打、砸、烧、杀洗劫文明的暴徒，就是中共各派共同施暴的证明！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这种罄竹难书的法西斯暴行没有得到清算！今天，那些御用精英们，那些专家、教授和作家们，紧跟“主旋律”的乐谱弹跳，摈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于不顾，鼓吹明主治国和权威理政，千方百计把秦始皇等暴君“论证”成“明主”，甚至美化成“仁君”，借以为拒绝选票绑架民主的一党专政涂脂抹粉的同时，为“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及其破“四旧”等运动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评功摆好！痛定思痛，笔者已无法忍住那句一吐为快的话：迄**今不能清算毛泽东以告慰在其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是我中华民族的耻辱和悲哀！**

附 1、反人类罪——危害人类罪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规约》将“危害人类罪”归纳为 11 宗罪：（略）

09-大辩血统论

作者 于松然

1966 年 7 月 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贵族红卫兵贴出了这样一副“鬼见愁”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杨健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中，把“鬼见愁”对联斥为“法西斯式的、反人道的封建理论”是很有见地的。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鬼见愁”对联同间接从德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一样，是直接从德国引进的**希特勒主义**，两者同是被德国人抛弃的德国货：

▲**上联**——是雅利安、日耳曼民族拥有“**最优秀血液**”的种族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下联——是“**血液污染**”的反犹太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横批——是**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在中国的有机化合物。△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引发了强烈震动：围观者，传抄者，颂扬者，批评者，比比皆是。8 月，这副对联传入北大、清华等北京大专院校后，旋即传遍全国。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最形象、最具煽动力的口号。几乎一夜之间，出身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等“红五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英雄”、“好汉”，他们趾高气扬，左右通达；几乎一夜之间，出身“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和而后增加的资本家、“走资派”统称为“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贱民”、“混蛋”，他们低三下四，左右是难。尽管有人批评这幅对联不符合“**毛主席‘重在表现’政策**”，尽管陈伯达也批判了这个“血统论”，说它是出自封建君主世袭制的“错误观点”，但不少人特别是高干子弟们，依然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

“鬼见愁”对联的出现，是刚刚兴起两个月的红卫兵运动分裂为贵族红卫兵和平民红卫兵的重要标志。

在贵族子弟们“好得很”的高呼下，“鬼见愁”对联继续广传远播，而且还出现了《鬼

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不同的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赤色骂：“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以贵族子弟为主的“红旗战斗小组”，在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中,宣誓了他们的希特勒主义：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贵族子弟们像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党卫队一样，用大字报宣泄了他们的不可一世：

“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
“要是想革命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鬼见愁”传入北师大女子附中后，立即生效。1966 年 8 月 4 日上午，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这个班有 40 多名学生，其中：10 人是“自来黑”，即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属“狗崽子”；10 人是“自来红”，即“红五类”家庭出身，大多数是高干子弟，属当然接班人；其余 20 多名出身于“不红不黑”家庭，称“红外围”。斗争会开始，10 名“自来红”坐在椅子上，“红外围”坐在地上，10 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面，面对“自来红”挨斗。一个“自来红”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自来黑”们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自来红”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时“自来红”还动手打、用脚踢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

“鬼见愁”在北大附中里横行霸道。高三的男学生**朱彤**，因父是右派分子而惨遭毒打，并把他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爬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分子。当班里“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哀求高干子弟红卫兵头头**彭小蒙**同学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出于对“黑五类”家庭出身同学的“义愤”，这位被毛泽东表彰并亲自接见过的彭小蒙，毫不留情地把万红揪到教室里批斗。批斗万红时，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恶作剧地突然把凳子抽走，把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鬼见愁”对联也左右了当时的“大辩论”：在辩论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份；如果所报的家庭成份属于“黑五类”，会马上被轰下台。因此，当时的“大辩论”舞台，成了“红五类”红卫兵横眉怒目、指点山河的专区。

在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上，**谭力夫**脱颖而出，成了捍卫贵族纯“血统论”的骁将。

谭力夫何许人也？这位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前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谭政文的公子。其父虽已过世四年，但在贵族大院内外，谭力夫与贵族们的血脉息息相通。周恩来对其家关爱有加；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等，都是他家庭座上常客；据传，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他的干爹；在贵族大院和学校里，他还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贵族子女交往甚密，堪为好友。三十年后，已挤身于高级干部的谭力夫，以谭斌名子出了几本书，自誉“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这位“一身正气”的谭立夫，于1966年6月，在以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支持下，在工大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被任命为红卫兵总队长，同当时的工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高干子弟刘京(后飞黄腾达官至公安部副部长)的合作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工大300多师生打成“黑帮”、“右派”和“牛鬼蛇神”，出尽了风头。当他发现有些红卫兵向共产党老干部造反时，特别发现“黑五类”子女们蠢蠢欲动时，敏锐地察觉到右派要翻天，贵族子女的“责任感”，使他突发了只**许贵族革命、不许别人造反的决心**。见到“鬼见愁”对联后，8月12日，便与刘京合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他们写道：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

“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

谭、刘文章虽然受到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的“劝阻”，但却得到了**关锋**的明确支持。8月，他在国务院接待室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关锋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血统论”是中共阶级路线的本质反映。在中央文革“劝阻”和明确支持下，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了措词蛮横的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红五类”子弟的共鸣，使他须臾变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充斥着**“只许我革命、不许人造反”**的骄横和霸气。在抨击各种对“鬼见愁”指责的同时，他说：

“我爱讲老实话。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谁敢？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

“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

“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破口大骂，骂出了他的“一身正气”，骂出了他未来的飞黄腾达，同时，也骂出了平民红卫兵的崛起和快速壮大。

1966年10月，谭政文生前腐化堕落问题被人揭发，谭立夫已跌到“黑七类”家庭出身的边缘。而此时，陈伯达代表中共批判“血统论”的报告已广为传播，谭立夫由是失宠，当年被捕入狱。周恩来的态度耐人寻味。1966年11月15日，他在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

兵代表时说：**“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1967 年 5 月 29 日，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谭力夫被释放出狱。被恩准出狱的谭立夫，摇身一变，成了军官，旋即遁形于部队之中。文革后，已更名谭斌的谭立夫，以文革“受害人”的身份，著书立说，踏入青云直上的官僚坦途，先后担当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和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等要职。

正当贵族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鬼见愁”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使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正当谭立夫为“血统论”推波助澜肆意诋毁和迫害“黑五类”子女的时候，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拍案而起，投笔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义正词严地批判。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写道：(图 09-9)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图 09-9：《出身论》

遇罗克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他在《出身论》中写道：**“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遇罗克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抨击了刘、邓右派集团工作组的极左面孔：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笔者：意指大兴县的大屠杀），**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

《出身论》还从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批判了“血统论”；批判中引用了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话，作为立论的论据。《出身论》1966 年 9 月定稿。原《中学文革报》在发表《出身论》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

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

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人的深切同情和强烈支持：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都在传播遇罗克的文章。一时间，遇罗克成了当时中国备受污辱、损害的最底层老百姓的代言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横行，固然与贵族子弟们当然革命、当然接班的思潮有关，但长期以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路线”，则是这种思潮发生、发展和肆虐的根本原因。例如：提干要填出身，查三代，只有“根正苗红”者才能得到提拔；在高等学校招生中，成绩优秀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会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等等，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腐朽思想，是毛左派集团**政治上走封建社会主义道路**的活标。“血统论”一经提出，便横行霸道，其根源就在于此。《出身论》以毛泽东语录立论，是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种无可奈何的、哭笑不得的、充满历史滑稽的选择。但这可悲的历史幽默，却触怒了中共当局。它的鹰犬、中央文革小组笔杆子、大权在握的**戚本禹**，诬蔑《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一句话，把热血青年遇罗克送上了断头台：1970 年 3 月 5 日，年仅二十七岁的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枪杀于北京体育场。（但据其弟遇罗文回忆：“1970 年 3 月 5 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一个鼓吹“血统论”，一个批判“血统论”，一个挤身高官，一个死于非命：“一身正气”颐养天年的谭立夫和父母右派备受歧视的遇罗克，两人在人格和遭际上的鲜明对比，给毛泽东和中共的人权史，写下了无法抹去的最黑暗、最可耻的一页。

“血统论”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为了打倒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清除他们的社会基础，他借助贵族红卫兵的“血统论”以及他们目空一切的骄横、霸气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取得令他欢心鼓舞的“辉煌”战果。但当他按照他打倒刘、邓战略部署把斗争矛头转向刘、邓右派集团成员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他发现，在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立下汗马大功的高干子弟们，正在利用“血统论”来“保爹保娘”。因此，他决定抛弃贵族红卫兵，谕示中央文革小组批判“血统论”。

1966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谕示，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中，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他说：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陈对“血统论”的批判是可贵的，尽管批判是轻描淡写的。由于毛泽东的中共拒绝承认“血统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的必然产物，因

此，同是批判“血统论”，陈伯达高官照做，人权先驱遇罗克却被中共“依法”枪杀！

10-大斗走资派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命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血统论”，因为他本人就是血统论的制造者，而是为了支持平民红卫兵造反，压制贵族红卫兵“保爹保娘”，从而实现他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的目的。

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谕旨，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报告在捎带着批判“血统论”的同时，公开而激烈地批判了刘、邓右派集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会上，林彪指名道姓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他还按毛常用的倒打一耙策略，斥责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分别作了检讨。毛泽东并没因而放过他们。会后，毛泽东通过林彪、周恩来和他的一线代理中央文革成员，率先在北京掀起了批判刘、邓右派集团的高潮，发出了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的信号。

早在 1966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在“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中说：**“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 1966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如果在十年前，抑或十年后，这是必须坚决镇压的百分之百的右派言论；但此一时彼一时也。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由是，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尽管“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民主的进步，但对毛泽东来说，**“民主是手段”**：当年，他借“民主”牌打败了蒋介石，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今天，他再次祭起“民主”这块法宝，借以打倒刘、邓，实现其向右派集团夺权的目的。

从毛泽东以上言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刘、邓右派集团反抗势力面前，为了独霸权力，他不惜全国大乱，不惜亿万生灵涂炭而号召全面内战。于是，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他的 73 岁生日宴席上，发出了**“祝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的号召，开始向刘、邓右派集团全面夺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法避免的内讧！

全面内战从北京开始。1966 年 10 月 28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以平民为主力的各路红卫兵，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指挥下，开始全面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内讧战斗，为毛左集团夺权而冲锋陷阵。在揪斗“走资派”的内战中，受到批判的贵族红卫兵也不示弱，他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揪斗左派和中间派的领导干部，也给他们戴上“走资派”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的帽子。一时间，揪斗当权派成风。

1、应劫而生的《群丑图》（图 1）

1966 年 10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的口号鼓舞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形成狂潮。十七年来，那些曾经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和将军们，那些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肆意践踏人权的各级权贵们，在红卫兵、造反派面前，都不得不低下他们那颗尊贵的头颅，去接受蹂躏和迫害。在中共左、右两派权力内讧中，1967 年初，一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漫画《**群丑图**》，应劫而生。



图 1：**群丑图**　作者：**翁如兰**

这幅曾被誉为“文革第一图”的《群丑图》，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反响。据说，几个月间，全国翻印数高达百万幅以上。与此同时，其他漫画也派生了出来。如《百丑图》，即用 100 个当权派的人物头像进行丑化处理的漫画，翻印颇多；也有流行时间较短的局部地区、行业的《百丑图》、《群丑图》和单个人物漫画。其中，罗瑞卿口衔匕首漫画颇有影响，影射这位惨遭迫害的总参谋长，当年任公安部长时曾杀人如麻……

《群丑图》作者**翁如兰**，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高才女生。她运用漫画头大身体小的技法，把画中人物描绘得十分像似，也没有刻意丑化，显示了她的艺术功力和素养；《群丑图》是一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丑式写真漫画，即打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旗号，去反映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显示了作者政治洞察力之敏锐。

画家在《群丑图》上所描绘的 39 个人物，都是文革中毛泽东要打倒的高级官员，或者是文革初期毛要消灭的“牛鬼蛇神”，体现了毛借“造反有理”去打倒和消灭政敌的权力情结。在画家的笔下，人们看到了毛的政敌们曾经的高贵身份和他们反毛的主要“罪行”：

1、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毛打倒的“彭罗

陆杨反党集团”第三号主犯。

2、邓　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第一个自杀的高官，是遭毛批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作者。

3、吴　晗：北京市副市长，是遭毛批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是文革前夕遭毛重点批判的第一人，彭真死党。

4、廖沫沙：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是遭毛批的《三家村札记》和《有鬼无害》的作者，彭真死党。

5、周　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文化部第一号领导人。

6、夏　衍：文化部副部长，电影界第一号领导人，周扬死党。

7、林默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胡风冤案主要制造者之一。

8、田　汉：《国歌》歌词创作者，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是遭毛批的《谢瑶环》的作者，周扬死党，文革中自杀身亡。

9、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济南市副市长，周扬死党。

10、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是遭毛批的《李秀成之死》的作者，周扬死党。

11、郑天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彭真死党。

12、蒋南翔：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刘、邓死党。

13、陆　平：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邓死党，被毛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的被点名批判者。

14、严慰冰：陆定一夫人。

15、刘　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死党，文革中自杀身亡。

16、彭　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刘、邓死党，“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犯。

17、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第四号主犯。

18、肖向荣：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将，贺（龙）、罗（瑞卿）死党。

19、陈鹤桥：中共中央军委通信兵部政治委员，少将，贺、罗死党。

20、罗瑞卿：解放军总参谋长，大将，跳楼负重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第二号主犯。

21、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组织部部长，中将，贺、罗死党。

22、王光美：刘少奇夫人。

23、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邓死党。

24、薄一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刘、邓死党。

25、贺　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元帅，刘、邓死党。

26、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中国头号政敌。

27、林　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刘、邓死党。

28、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邓死党。

29、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邓死党。

30、万　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刘、邓死党。

31、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宣传部部长，中将，贺、罗死党。

32、邓小平：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总书记，是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中国第二号政敌。

33、吕正操：铁道部部长，上将，刘、邓死党。

34、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刘、邓死党。

35、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邓死党。

36、陶　铸：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保皇派”头头。

37、肖望东：文化部副部长（第一号领导），中将，刘、邓死党。

38、钱信忠：卫生部部长，少将，刘、邓死党。

39、王任重：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死党。

此外，尾随最后是杀伐成性的“东纠”、“西纠”、“联动”等，是以贵族子弟为骨干的“保爹保娘”的红卫兵组织。

显然，这是一幅讽刺毛共的政治漫画。画家用古代官员出巡形式，把毛的政敌们排列成“S”形队伍，向着“资本主义”悬崖走去，其风格独特。“S”形队伍的排列顺序，也颇具匠心：从毛的政敌们所持的“道具”，便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发展过程，符合历史记录。因此，可以这么说，《群丑图》是文革运动初期情景的真实写照，因而展现了漫画的艺术美！

什么是美？尽管人们的看法多有不同，定义分歧较大，但笔者认为，“**真**”和与真有密切关联的“**善**”，应当是美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丑图》的丑式写真是美的展示。

首先，《群丑图》的美是展示了她的“真”。画家所描绘的 39 个高级官员和一些“保爹保娘”红卫兵组织，没有一个不是文革初期毛泽东要打倒或要消灭的对象；这些对象手持的“道具”和从喇叭吹出来的声音，没有一个不是毛泽东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暴行的历史见证。其次，《群丑图》的美还在于她婉约其“善”。善者，仁义礼智信也。“解放”后的十七年间，导致五千多万人死亡的毛泽东暴政，《群丑图》中的人物，不是毛的屠夫、刽子手，便是毛的帮凶和吹鼓手，毛所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他们都有份，都脱离不了干系。文革中，他们被毛视为异己，仅仅是**因权内讧**而已。不仅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毛泽东死后，便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重登政治舞台，用一党专政的铁拳，残酷镇压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使他们得以打着为革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权钱交易的腐败，把自己和他们的后代，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特权阶级**，蹿升为**红色资产阶级**，亦即策驭成腰缠亿万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由此可见，他们的灵魂是丑恶的，肮脏的，揭露他们的伪善和罪恶，让中国人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就是写真，因而是美的**善举**。一位俄罗斯著名学者说：“**美是生活**。”《群丑图》以丑式写真形式，揭示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荒诞、恶劣和无奈，因而被誉为“文革第一图”，是实至名归的。

《群丑图》的美是通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在“舆论一律”的专政下，这种表现手法是画家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幅展示艺术美的《群丑图》，周恩来表态说：“**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毛泽东旋即下令：“**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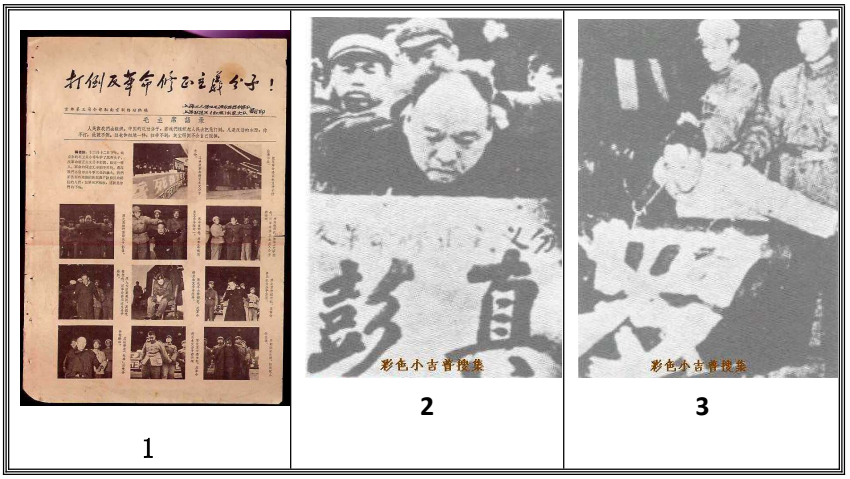
《群丑图》“**反动**”吗？“**丑化**”吗？看看以下各节里毛、周对付政敌的批、斗、抄、游、打、烧、杀等手段，人们只能用野蛮、邪恶和法西斯去定义；而这种野蛮、邪恶和法西斯手段，与毛的“丑化说”和周的“反动说”，无法类比，与《群丑图》对 39 人的丑式写真，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2、揪斗北京“走资派”

周恩来指责《群丑图》“**反动**”，毛泽东则说是“**丑化**”。显然，他俩都在指责，翁女士笔下人物的命运被歪曲了。历史果真如周、毛所说的那样吗？请看，翁女士笔下人物在文革中的凄惨经历：

在 1966 年 5 月 4 日到 26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北京市委第一书纪兼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毛泽东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2 月 12 日下午，北京市红卫兵揪斗了彭真、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 9 名当权派(图 2-1)；在此之前，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已先后被红卫兵揪斗多次。12 月 23 日凌晨，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红卫兵造反派，再次揪斗彭真(图 2-2)等多人，连跳楼骨折不能行动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也被用箩筐抬到斗争会上，再从箩筐内架出，坐上“喷气式飞机”(图 2-3)。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性，可见其一斑。

图 2：揪斗当权派



揪斗当权派的风暴，很快从学校刮到北京市委，刮到中央各机关部委。

12 月 12 日下午，同彭真一起被揪斗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哲学家**杨献珍**、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图 3)



图 3：揪斗陆定一、林枫、万里；杨献珍和郑天翔暂缺

在揪斗风暴中，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们，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主任们，已经多次批斗过的“死老虎”即文艺界失宠的御用精英们，都先后被各派红卫兵揪出来批斗。（图 4）



图 4 说明：1. **范瑾**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2. **周扬** 中宣部副部长　3. **许立群** 中宣部副部长　4. **齐燕铭** 马列主义理论家　5. **夏衍** 马列主义电影家　6. **田汉** 马列主义戏剧家　7. **刘仁** 北京市副市长　8. **吴祖光** 马列主义导演

曾几何时，这些曾在一个系统、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在一个学术界里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头面大人物，其中有不少人双手还沾着老百姓的鲜血，竟遭红卫兵如此暴虐、蹂躏，历史将如何评说呢？有人说，他们中许多人作恶多端，例如周扬、林默涵，时人称其为“文艺恶棍”，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都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因此，他们是罪有应得；但也有人认为，他们都曾是中共的功臣，红卫兵这样对待他们，叫人寒心。笔者则认为，即便是罪大恶极的坏蛋，也要通过法律程序给予惩治，因此，无论是**毛式批斗法**或者是在此基础上升级而来的**毛式揪殴法**（见后），都是毛泽东的中共对人类现代文明的野蛮践踏！

毛泽东的中共对异己官员们的批斗、揪殴的残酷性和法西斯性，与《群丑图》对 39 个高级官员所谓“**丑化**”“**反动**”的丑式写真，其野蛮、邪恶程度，毫无类比之处！

3、羞辱王光美

毛泽东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但在他的鼓动和默许下，现实中被批斗的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远比《群丑图》中的丑式写真要野蛮、邪恶、残忍得多！

1967 年 1 月 6 日，在毛泽东前台代表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策划下，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在毛泽东的红卫兵面前，刘少奇已经没有了国家主席的尊严，他无可奈何地按红卫兵的要求留下妻子，独自悻悻而返。井冈山红卫兵把王光美带到清华大学后，王光美签下了随叫随到的保证书。

4 月 10 日，经毛泽东默许和中央文革批准，蒯大富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有毛的政敌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黑帮”现场陪斗（图 5）。这种继承中国封建血缘关系的“株连罪”，在文革前已是中共的**准**政策。到了文革，中国人对这种封建株连罪，已习以为常了，尽管毛泽东还在高唱他的**“划清界线”**和**“重在表现”**的颂歌。据统计，因刘少奇一案而受株连的案件，高达两万两千多起，死伤数百人。



图 5：揪斗王光美——大会会场



肆意丑化王光美

刘少奇听到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后，极为愤怒。他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王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要她代我受过**？”刘的“愤怒”很值得同情；但他可能不愿去想，他是这种封建株连罪的积极推行者，他同毛泽东一起，制造了这种现代中国不成文的**株连法**。

在批斗会上，王光美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过的旗袍，戴过的项链，被红卫兵批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红卫兵们把事前准备好的瘦得难穿的旗袍，强迫王光美穿到身上，又把事先用乒乓球特制的“项链”，硬套在王光美的脖颈上……面对这种毫无人道的恶意丑化和侮辱，王光美提出抗议；但遭到回应的是“要武”式的“触及灵魂”：拳打脚踢！

4、揪斗八级“走资派”

周恩来说《群丑图》**“打击面太宽”**，说的是不是实话？

在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清晰地发现自己已沦为党内少数派，反对他的不仅中央大有人在，而地方各级尤甚。在毛看来，这是一大股不可小觑的复辟势力。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多么准确。然而，他无法扭转乾坤。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确信他个人意志的强大“神力”，足以使“地球停止运转”！

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及其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态度，对北京红卫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党政机关的精神，得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忠实执行者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强而有力的支持，使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先驱和表率。

敢于造**官僚特权阶级**的反，敢于把领导干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对于长期备受官僚特权阶级专权压制的青年学生和平民老百姓来说，诱惑力太强了。于是，红卫兵造

反派组织，在全国各地蜂拥而起，斗争矛头直指曾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当权派。湖南省红卫兵造反派，率先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八级司令部”**。

所谓“八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八个层级。换言之，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连“兵头将尾”的小小生产队队长也不放过。10 月 29 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得意忘形地说：**“到了 9 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

全国各地“八级司令部”里的当权派，大多数被揪出示众了。他们中的中、上层官员，大多数都能上镜头，但县以下官员，难有如此“殊荣”。遗憾的是，即使是上层官员，他们的镜头大多数也被尘封在密档中，不许老百姓目睹。值得庆幸的是，有少数正直的摄影记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冒着监牢危险，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能在“主旋律”的密封中，窥见到毛泽东的罪恶记录。对此，人们应向少数正直的摄影记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致谢！

下面一组图片，据信是当年《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的记录。(图 6)



图 6：批斗黑龙江省委当权派

上行：批斗省长李范五（左） 批斗副书记王一伦（中） 戴高帽的省委成员（右）

下行：批斗省委副书记陈雷（左） 戴高帽+“坐喷气式”批斗（中） 批斗省委书记任仲夷（右）

其他各地也不落后，批斗当权派的镜头也不少，只是人物或地点难以确定。(:图 7)



图 7：各地批斗各级当权派

到此，**毛式批斗法**已逐步升级为全新版本——**毛式揪殴法**：抄家、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奸污、吊打或打死！在批斗版本升级的同时，“打击面”也在急剧扩大，数年间，上千万人挨批挨斗，其中被打死、拷死、逼死、整死、囚死的官员和群众，应在百万以上。这是周氏胡言《群丑图》**“打击面太宽”**的多少倍？

经过两年多的批、斗、抄、游、打、烧、杀和派性武斗，导致 200～300 万人丧生、一千多万人伤残后，毛泽东击败了刘、邓右派集团，夺了他们的权，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闲庭信步”地出现在摄影家的镜头里。请看一组“闲庭信步”图片，也许对你有所启迪。(图 8)



闲庭信步——（从左到右）1. 毛与林彪 2. 毛与周恩来 3. 毛与江青 4. 毛与通房“秘书”

作家鄢烈山这样描写施刑者：**“加害者与其说是在行刑，还不如说在完成一件毁人不倦的艺术品。她是带着创作的激情和审美快感来工作的。……她是在欣赏，欣赏大权在握肆行己志的惟我独尊，品味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乐趣。”**这是否是“闲庭信步”的注脚？

在“闲庭信步”中，毛、林、周、江领导下的中共，犯了危害人类的**滔天大罪！**其罪行的严重性和法西斯性，使《群丑图》的所谓“丑化”相形见绌！

11-红卫兵大沉浮：为平民红卫兵的覆亡放声大哭

作者 于松然

陈伯达所作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后，对“血统论”的争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红卫兵的进一步分裂。

在“横扫”和破“四旧”中为急先锋的贵族红卫兵，在党内左中右派共同支持下，制造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在批、斗、抄、游、打、烧、杀的同时，还私设监狱，制造了大量无辜群众的伤亡事件(详见“红八月”)。但当毛泽东决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走资派”全面夺权时，他们开始“**干挠**”起毛泽东设计的“斗争大方向”来，成了毛左集团必欲搬开的绊脚石。然而，“当然接班”的权力情结，使他们先后在北京西城区、东城区和海甸区，成立了武装纠察队，简称“西纠”、“东纠”和“海纠”，以武力与毛泽东相对抗。

为了搬开绊脚石，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批判了“血统论”之后，贵族红卫兵迅即失势，被贬之为“保爹保娘派”，泛称“保皇派”(1)。为了进一步打击红色贵族势力，1966 年 11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针对贵族红卫兵的暴行，发出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批

准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自此，一些无视通告打人、杀人的贵族红卫兵，相继被捕。

以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反路线”为己任的平民红卫兵，则在毛左派及其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成了毛泽东向刘、邓右派兴师问罪的急先锋，蹿升为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被毛和中央文革褒誉为左派或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保爹保娘”的贵族红卫兵，则被贬斥为右派“保皇派”。“造反”与“保皇”两派在党内左、右两派势力的支持下，横眉怒目，针锋相对，因而武斗不断，其规模也迅速升级。

1、贵族红卫兵的覆灭（略）
2、平民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沉浮（略）
3、 为平民红卫兵的覆亡放声大哭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和王大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其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到了1968年夏，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完成了夺权任务，先后组成了新的以毛左派为主的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为毛夺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毛泽东决定终结平民红卫兵的活动。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五大领袖”。毛泽东警告他们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尽管“五大领袖”争辩说，把杀人放火都归到他们头上“不公平”，“**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言外之意，杀人放火多都是贵族红卫兵和“保皇派”所为。毛泽东还是毫不留情警告：“**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此刻，毛泽东所借助红卫兵的那口屠刀，已经完成了使命，狡兔死，走狗烹，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1966年他批准公安部下达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毛泽东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平民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作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平民红卫兵的使命已经结束。做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学生，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红司令”的心计和手段：他们的单纯、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为毛所利用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是为保卫毛主席而披荆斩棘而冲锋陷阵的，应该是毛的功臣；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暴戾恣睢和穷凶极恶为毛所推崇，仅仅因为他们是口杀人的刀；他们更无法知道，他们朦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价值观，本来就为毛所增恶、所不容，他们原本就不是毛心目中的依靠力量。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杀过人、放过火，当打倒刘、邓的任务基本完成时，他们的利用价值也随之告罄，在任一借口下，都会被无情抛弃，这是必然的。满脸委曲的“五大领袖”们，忽然发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所崇敬、所依靠的“红司令”，竟然那么无情，又那么陌生！难以名状的失落感，使他们面面相觑，继而泫然相涕，蒯大富则放声大哭。不过，林彪临走时给他们的赠言，也许对他们有所启迪。林彪说：“**别哭了……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为了给终结红卫兵使命找个令人信服的根据，8 月 8 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此时，在**“理无常是”**哲学海洋里游弋的毛泽东，与他在两年前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善于”出尔反尔的毛泽东，不可能忘记两年来的所作所为：1966 年 8 月，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同年 8～11 月，在天安门上，他先后八次“接见”了 1,200 多万红卫兵，还通过林彪和周恩来的嘴，大声赞扬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残暴精神，说他们**“做得对，做得好！”“好得狠！”**到了 1967 年 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赞扬红卫兵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善弄权术的毛泽东，当时丝毫不露**“历来如此”**的玄机。显而易见，他向红卫兵发出**“就歼灭之”**的狠话，暴露了他利用红卫兵的无知、暴戾的险恶祸心！

贵族红卫兵与平民红卫兵及其五大领袖发迹、得宠、威武和结局，发人深省。终使人们悟到，在毛泽东的导演下：左派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结局，虽令人扼腕，但的确是罪有应得的替罪羊；右派贵族红卫兵、造反派的结局，虽令人不齿，但的确是血债累累的既得利益者！

在中共专政极权下，平民红卫兵与贵族红卫兵的不同结局是必然的，因为平民红卫兵批斗的是中共当权派，而贵族红卫兵残害屠戮的是弱势群体，尽管双方都在党内左右派支持下进行了武斗。两种不同结局，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手段阴险、狡诈、反复无常及其机会主义的无道性，也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反人类的封建血统论政策的一贯性。

平民红卫领袖们的泫然相涕和蒯大富的大哭，证明他们愚蠢有余而省悟不足。他们也许认为，他们是他们红司令毛泽东的功臣，让他们当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是不公正的。然而，自他们从 1966 年 6 月被他们的红司令高捧而横空出世，到 1968 年 7 月 28 日遭他们的红司令遗弃而扫地出门，在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在他们红司令的指挥下，同他们的对手贵族红卫兵一样，都干尽了坏事，双手都沾满了血污，都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罪犯！

令人悲哀的是，在一党专政下，中华民族已变成了一个健忘的民族——长期以来，在权贵和御用史家、学者、作家们的鼓噪下，亿万百姓在赞扬毛泽东取缔红卫兵的同时，却对同一个毛泽东在制造、支持和统率红卫兵中所犯下的反人类大罪视而不见！

附 1、“保皇派”

“保皇派”一词不准确。当年的“皇”是毛泽东，而“保皇派”保的是毛的右派臣子们。“保爹保娘派”一词也欠准确，因为“保皇派”保的不一定是他的爹娘，保的是右派当权派。不过，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说，本文也权按此名。

12-利用红卫兵大屠杀

作者 于松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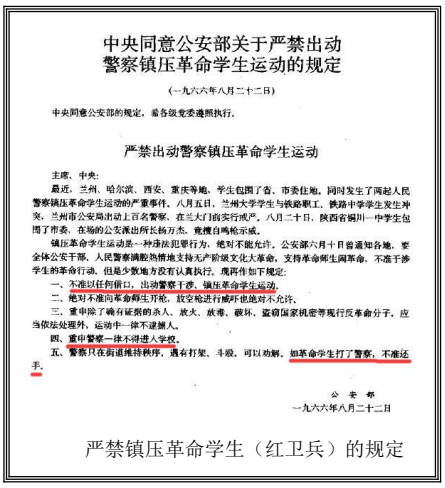
公安六条和“要动动”

在红卫兵大破“四旧”和胡批乱斗的疯狂中，人们已经看不惯了。地方官员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纷纷派出军警干涉学生造反。有二十年代湖南“**痞子运动**”成功经验的毛泽东，一心要在六十年代发动一次使天下大乱的新的“痞子运动”，并在乱中取胜。当他听到军警干涉学生造反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他斥责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副帅林彪闻风在 8 月 21 日下达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谢部长怎敢怠慢？立即起草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文件，经毛点头后，迅速发布全国。历史载明，文件所指的“革命学生运动”，就是毛泽东在 8 月 1 日写回信给清华附中的十几岁中学生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夺权从而发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文件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图）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
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公 安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严禁镇压革命学生（红卫兵）的规定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 8 月 5 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 8 月 2 0 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 6 月 10 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公安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的“最高指示”，鼓励无知的学生和地痞、流氓们，像在“横扫”、“破四旧”中那样，可以任意批、斗、打、砸、烧、抄、杀。据此，谢富治秉承毛的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圣意”，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座谈会上，就打死人事件明确表态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这就是著名的“**杀人无罪**”讲话。打人、杀人之风迅即合法化——新的“痞子运动”在毛的权力鼓动和保护下，变本加厉地疯狂起来。

当全国媒体口径一致地热情讴歌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时候，**当**全国报纸千篇一律地天天把红卫兵的活动作为头版新闻热情报导的时候，**当**人们从官方发行的新闻纪录影片中看到千千万万个红卫兵高呼着“万岁”涌过天安门广场、红卫兵的领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着毛泽东欢呼雀跃的时候，**当**毛泽东笑容可掬地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寄予无限信赖和支持的时候，**当**天真的人们正在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欢欣鼓舞的时候，**许多善良人可能没有想到**，一股鲜血淋淋的浊流正在以“合法”的形式肆虐中华大地，正在“合法”地用无辜人的鲜血涂抹“三忠于”、“四无限”的红海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被当年红卫兵引以为荣的“**红八月**”(一般指 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鼓动、支持、保护下的恣意暴虐和鲜血涂抹的“红八月”里,以贵族红卫兵为首的各路红卫兵，正在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真、善、美的华夏文明，正在穷凶极恶地颠覆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

在人性之恶得到宣泄和张扬的“红八月”里，打死人“英雄”、打死人“光荣”的氛围已经形成。八月上旬的一天，由于毛泽东在 8 月 1 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回信中，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其负责人高干子女学痞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北京日报》摄影记者便到北大附中采访，拍摄该校开展文革情况的照片。为了迎接采访，**彭小蒙**组织了一次批斗常务副校长、化学教师**刘美德**大会。当时有孕在身的刘美德被逼爬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学痞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踏在她背上，摆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造型，由记者拍摄。这一造型来源于毛泽东 1927 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者拍完照片后，这个学痞一脚把刘美德踹下桌子。后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因先天性受伤而夭折。当《北京日报》记者拍摄的时候，踩踏老师的学生异常兴奋，把照片见报，当作今生今世莫大荣誉。可惜这张照片没有刊登，被尘封在档案里，人们至今未能见到。

在打死人“英雄”、打死人“光荣”的氛围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十四岁的初中生学痞刘 xx，曾炫耀自己打死过三个人的“英雄行为”。后见风向有变，便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说自己年幼无知，“打死过三个人”是为追求“光荣”而造假，妄自尊大称“英雄”。——你相信她的话吗？

1966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曾被透露过但至今也不准许老百姓查阅的材料。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从 8 月下旬到 9 月底的 40 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 1,772 人（1）。但是，根据当年“红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和而后从事独立调查、研究

的学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超过 5,000 人。全国呢？专家们估算，仅 1966 年，至少有十万以上的人惨遭杀戮！北京究竟打死了 1,772 还是 5,000？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其中有多少是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多少是下层无辜百姓？在档案尘封和调查扼制的严密监控下，人们无法知道确切数字（2）。9 月 5 日，毛的打手中央文革小组，在内部《简报》上，把红卫兵的流氓大屠杀称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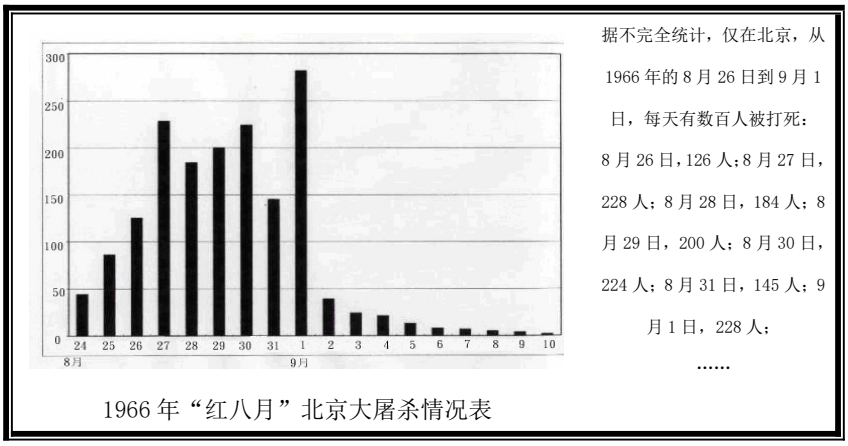
红卫兵大规模的抄杀行动，显然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破“四旧”刚开始不久，林彪将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 109 号《简报》，呈送给毛泽东。8 月 20 日，毛泽东在《简报》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他毫无保留地支持了“红八月”里红卫兵的大抄杀，使挂常在他嘴上那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教，变成了一张美丽的“画皮”！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上规模的屠杀，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大屠杀，也是中共“解放”中国人民、成立“新中国”十七年后的第二次大屠杀。“新中国”第一次大屠杀是 1950～1953 年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共约杀掉 300～400 万人！不同的是，第一次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政府行为，这次主要是借刀：借“群众”即借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的刀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进行的屠杀！

人们可能对大规模屠杀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人民日报》多次宣扬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怎么会允许红卫兵胡打乱杀呢？事实上也有不少干部出面制止过打杀，但红卫兵们懂得“伟大领袖”的真意吗？纵观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群众运动**，初期都是**“打破条条框框”**、**“放手发动群众”**，而且都要先拿奉公守法的“传统敌人”祭旗，换句话说，就是“宁左勿右”。所谓“宁左勿右”，就是在运动初期的一段时期中，造成一个群众“积极参加”的乱批、斗、打、抄、杀的无政府主义恐怖局面。——这就是最高统帅**“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信条。毛泽东 8 月 23 日说的**“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就是这种信条的故伎重演。而此次的毛氏“过正”，就是要借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的“刀”，首先镇压战战兢兢做人的“黑五类”弱势群体，借以儆戒一切潜在的异己者，继而乘风借势镇压一切反抗者。于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教，变成了失去法律支撑的官样文章；出面制止打杀的干部，不是出于良心再现，就是不得不作的官样行为；而贵族红卫兵们，特别是十几岁的“娃娃”们，在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下，很快读懂了“伟大领袖”的真意，毫无顾忌地成了“红色恐怖”的急先锋。可怜那些被称为“吸血鬼”、“寄生虫”等“人民仇敌”的“地富反坏右”们，在十多年前已经丧失了“宪法”赋予他们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和权利，在而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运动”来“运动”去，早已被整治得战战兢兢，在社会最底层、最贫困中挣扎，这次上层权力拼杀，他们又像翻烧饼那样被翻了出来，再次被拿来祭旗！

文革后，不少中共要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证明”：毛泽东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显然，在横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哲学的国度里，这种“证明”在“主旋律”作用下，就会把**谎言变成真理**。

附 1、 “红八月”部分血案统计表（据说是官方统计）



1966年“红八月”北京大屠杀情况表

附2、1966年8月～12月部分被枪杀、打死、监毙和重伤不治身亡者名录表
（笔者搜集到的133位罹难者名单）（略）

13-文革第一轮大屠杀——血雨腥风泛校园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而他所支持聂元梓的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则明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因此，各地“诸侯”为了自保，都纷纷找出几个“替罪羊”当牺牲，来“祭祀”上层权力斗争，以表示紧跟、崇敬、效忠并祈求平安。

在这种中共伦理共识的氛围里，中共江苏省委头头们，首先把曾写过一本书并再三向省委表示“烧书认错”的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和他的妻子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抛出，作为江苏省的“黑帮”进行批判——不准他俩认错!不准他俩投降!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件发出后的第三天，即1966年8月3日傍晚，在江苏省委的示意和放纵下，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流氓学生，冲进吴天石和李敬仪的家，把他们拉到南京师范学院内已经搭好的高台上进行批斗。批斗中，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的身上，并进行了殴打和“游街”。李敬仪当天被打死，时年53岁；吴天石被殴致重伤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56岁。事后尸检报告中说，吴身上骨折就有六处。在著名的“**不**

主张打人”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李敬仪很可能是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师，而她和她的丈夫，很可能是被学生打死的第一对夫妇教育工作者。

也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件发出后的第三天，天才诗人、学者、翻译家、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右图），成了北京第一个受难者。



图 10-2：吴兴华和他的两个女儿

吴兴华(1921～1966)，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年 16 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

我应该用些什么来回报世界的宽容？/——如同经文里所说：无赖的流浪之子/期待着雷霆、闪电和连山烧起的烽火/烧焦羞耻的容颜，沾染着绝望的泪；/寻到如旧的笑容，如旧日张开的手臂——/我，在德行里睡眠，罪恶里游荡的人/曾抬头看见青天，在天幕后面有目光/不见辉煌的马，载着如流星的灵魂，/来去在大气当中；我看见永远的幸福/照耀着如一圈光，无边而纯洁，在周围/黑暗如夜间潮水，从四面怒吼着奔上来/一触着她的边缘，便悄悄退了下去……/今天啊，我用眼泪来证实昔日的梦境，/投身在你的脚下，我立起一个善人。

他在诗歌、学术研究、翻译三个领域齐头并进，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陈寅恪、钱钟书同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学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诗歌创作上，他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意境、汉语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力图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在学术研究上，他学贯中西，博通文史，他的《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等著作，被海外学者誉为现代中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少数几位学人之一；在翻译领域里，他的《尤利西斯》、《神曲》等译稿，被誉为译林神品。

他的才华令人瞠目，他的命运却令人扼腕。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进入校园“劳改队”并被红卫兵殴打和抄家。这位“被暴虐的缪斯”，1966 年 8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校内“劳改”时，被红卫兵殴打后又强迫他喝从化工厂流入的污水，迅即中毒，不治身亡。就这样，一代天才毁灭在毛的红卫兵手中，终年 45 岁。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件发出后，拥有一半以上高干子弟被时人称为“皇家女子学校”的北京师大女子附中，迎“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仁穷上将的18岁女儿**宋彬彬**和邓小平的女公子16岁的**邓榕**，成了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工作组撤走后，贵族红卫兵主导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喝狼奶长大”的红卫兵，根据“红司令”“**要放手发动群众**”和“**不要怕出乱子**”的教导，一改工作组掌权时那种“冷冷清清”的局面，提着棍子，拎着皮带，对学校校长和老师们进行了“触及灵魂”的毛式揪斗殴戮。1966年8月5日那一天，她们把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明**和副主任**汪玉冰**打成重伤，而副校长**卞仲耘**，这个有十七年教龄的50岁妇女，当天即在南京师院李敬仪被打死后的第三天，便倒毙在“喝狼奶长大”的女红卫兵们的棍棒拳脚下。（下图）

对于**卞仲耘**被暴打致死的过程，笔者根据目击者林莽、伏生等人的回忆录和王友琴等人的调查文章，综合简述如下：

“8月5日的下午，师大女附中的大操场上人群沸腾，敲击声、嘈杂声和嚎叫声响彻校园。只见女红卫兵们压着五个“黑帮”在操场台子上批斗，然后把他们揪下台子进行游斗。他们是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没有正校长，卞是校党总支书记主持全校工作)、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明和副主任汪玉冰。他们有的被戴上高帽子，有的脖子上挂着写着‘反革命黑帮xxx’打着红叉的牌子；他们的‘脸全被墨汁涂黑，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他们被红卫兵强迫一边敲着破锣、铁簸箕，一边大声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等等。

“游斗‘黑帮’的两边，都有女红卫兵押着，她们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红布黄字，手上握着短棍和木制长枪。一发现哪个‘黑帮’不喊或喊得不够响，照头就是一棍，‘像敲击木盒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目击者看到，其中一个手持大棒‘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的‘竟是xx’。（据说，由于她是大名鼎鼎的高贵千金，名子太敏感了，为了安全，作者不得不以“xx”代之。）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

“被骂为‘装死’的卞仲耘，躺在地上，‘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当七点来钟校工把‘装死’的卞仲耘拉到医院时，卞已死了1个多小时！”



图10-3：卞仲耘和当年红卫兵公布她的尸体照(右)

卞校长被打死后，风云激变。“八一八”那天，据信，得知打死卞仲耘的**毛泽东**(其爱女李讷曾是卞的学生，江青也曾约见过卞)，在天安门前，公开接受杀人嫌犯**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并号召“**要武**”。他的言行分明表示，他坚决支持红卫兵批、斗、打、抄、杀

的反人类的“革命行动”。于是，揪斗打杀温度直线上升，使 1966 年 8 月，迅速演变成疯狂的鲜血淋漓的“**红八月**”。

在反人类的“要武”精神推动下，北京六中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大多数都参加了被周恩来委以重任的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西城区纠察队”，成了杀戮成性的“西纠”队员。他们把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改造成一座监狱。在监狱的屋顶上，他们搭了一个岗楼，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灯泡，昼夜监视被关压的“罪犯”。这个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学校，引领当时许多外校红卫兵前往参观、学习。

在这座监狱里，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岁”口号，用来镇慑“犯人”。在监狱存活的一百多天中，六中有 9 名老师，自始至终都被关押在这里。他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经常挨打挨骂，还遭受跪煤渣、跪板凳的体罚。据报导：一位老师股骨被打成骨折；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作练拳的活靶子打，引起了胃出血；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放出一个月后，便死在家里；此外，还有一些为数不详的人关在这里，关押时间长短不一。

又据报导：六中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三人先后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

当年的红卫兵报报导：六中红卫兵头头王 xx、陈 xx，听到徐霈田曾说过“西纠”的“坏话”后，便决定拿已七十六岁高龄的老校工开刀，借以恐吓其他反“西纠”者。10 月 3 日下午，他们把徐挟持到监狱里，对徐说：“给你洗洗澡。”他们先用冷水冲身后再用热水浇身办法去折磨老人。当听到老人“冷啊”“热啊”的惨叫声时，他们竟开怀放声大笑。第二天，他们把奄奄一息的老人，吊死在监狱后院的厕所里，谎报老人“畏罪”上吊自杀！

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文革中升级为“资本家”；文革前，他当过班长，曾与一些学痞有所龃龉；文革中，他竟敢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不符合党的政策；大串连时，他又未经六中红卫兵组织批准，竟敢擅自到外地串连，等等。他的出身和言行，证明他是个“狗崽子”。“西纠”决定对这个不忘反动老子的“混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66 年 9 月 27 日，当王光华从外地刚回到北京，就被“西纠”头头粟 xx 绑架到这座监狱里。一群“西纠”学痞，把他围了起来，其中一个揪着他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今天要触及触及你的灵魂。”说着便拳打脚踢起来；有的则拿着军训用的木枪和木棍毒打他；有的则一边打一边用“要武斗，不要文斗”的暗语大声喊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在连续不断地毒打下，9 月 28 日晚，王光华惨死在狱中，时年 19 岁。

令人尊敬的**王友琴**教授，曾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学生，是当年许多血腥现场的目击者和见证者。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排除万难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向垄断、屏蔽、扭曲历史和阻挠调查的邪恶行径挑战：通过十多年的独立、困难重重地调查研究，为七百多个**下层弱势受难者**树了碑、立了传，为被扭曲了的文革史增添了上百万字真实的珍贵资料。

根据王友琴教授的独立调查和其他一些目击者的回忆，人们从“红八月”的一些文章中，看到了部分校园里的屠杀：

8 月 17 日，北京 101 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

8 月 18 日，还是在这个 101 中学，红卫兵怀疑归国华侨的**体育教员**是个特务和坏分子，

便把他扔到学校池塘里。他几次挣扎出池塘边，都被红卫兵用石头打了下去。最后他精疲力尽，终于沉没下去，死于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

8 月 19 日，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台上，血流一地。

同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

8 月 22 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

8 月 25 日上午，北师大第二附中高三学生**曹滨海**，遭本班红卫兵抄家。据说，当时曹滨海奋起反抗，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幸免遇害，而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进学校，打死在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关在狱中的曹滨海虽未被打死，却从此精神失常。

同樊希曼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该校语文老师**靳正宇**和校负责人**姜培良**。

8 月 25 日夜里，红卫兵把已经被关押在校园中的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梁光琪，女，时年 54 岁，已经担任这所女子中学的负责人三年多。她被打死之前，她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

8 月 26 日，在清华附中学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几乎死去。在其他多个班级里，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了头发和遭到殴打。

8 月 27 日，北大附中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抄家中抓来的校外人员。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 岁，六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已无从查考。

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 36 岁的男教员**孙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目击者说，一群女红卫兵在操场上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孙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烂打飞了，形同裸体。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在西安市小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子弟为骨干的“红色恐怖队”，揪斗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姓王的**中学老师（女）。因其美丽便冠以“资产阶级分子”的“罪名”，被拉到桌子上继而又被拉到桌下批斗，百般耍弄和毒打，最后被活活打死于桌下。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文革后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66 年 8 月 26 日到 28 日，是北京“打全堂”（评剧术语）的时候。8 月 26 日，她听到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从那天开始，她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在遭毒打、侮辱的“打全堂”中，自杀身亡。

此外，据各方报导和回忆，在那年夏天被打死在校园中的还有：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

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语文老师**齐惠芹**；

北京 138 中学书记**张冰洁**；（她在国务院工作的丈夫向国务院领导反映，请求帮助。上面说，“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们也管不了”。）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
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
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
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
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
南京第十三中学数学教师**韩康**和体育教师**夏忠谋**；
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师**王泠**和**王伯恭**；
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红卫兵把一个 18 岁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

据知情人披露，1966 年夏天，仅北京西城区就有一百多名教师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上面纪录的四五十个受难者，仅仅是被打死者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受难者死无其所，冤情难申。——这是毛泽东发出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的“最高指示”的后果之一。

也许有人质疑上面的记录：但你是否应该首先质疑：为什么文革档案 40 年后仍不解密？为什么对文革血案不认真调查反而阻挠民间自费调查？为什么封杀一切揭露文革屠杀的文章？为什么不追究凶手和组织者的责任？为什么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案置若罔闻？


①.1966.8.18，毛、宋彬彬在天安门前



②.2005 年初，宋母、宋彬彬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八宝山宋任穷追悼会上

何止于此！中共在继续扭曲、掩盖历史的同时，还在继续有领导地谱写着它那最黑暗、最无耻的篇章：1966 年 8 月 18 日，18 岁的杀人嫌疑人**宋彬彬**在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后，便改名宋要武（右图①），在“红八月”大屠杀的血浪中，大显身手（据国内著名学者千家驹《自撰年谱》中记载，宋彬彬双手沾染了八个受难者的鲜血），又是打死校长卞仲耘的重大嫌犯之一；三十九年后的 2005 年初，在八宝山国务院副总理宋任穷追悼会上，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慰问宋夫人的同时，毫无顾忌地慰问了为了避嫌被父母用权保送而悄然移居美国的**杀人嫌犯宋彬彬**（上图②）。卞仲耘和那些在“红八月”里惨遭屠戮的受难者的在天之灵，如果看见这张逍遥法外的宋彬彬继续招摇过市的图片，能安然瞑目吗？

2014 年 1 月，为了洗刷“杀人嫌犯”的恶名，从美国归来的宋彬彬，出人意料地向文革中受伤害师生“道歉”！已九十三岁高龄的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周一发表声明（1），指摘宋彬彬等人借“道歉”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由于中共拒绝清算文革，遏制调查，王晶垚为妻子伸冤而寻求“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期望，可能路遥遥而难及；宋彬彬想以“道歉”来洗刷“杀人嫌犯”的恶名，恐也梦迢迢而

难圆，尽管她有官方支持。

附 1、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1966 年 8 月 5 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 3 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 5 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 8 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 年 8 月 18 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宋彬彬从此改名为宋要武。

1966 年 8 月 18 日之后，北京市又有 1772 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 48 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2014 年 1 月 12 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 年 1 月 27 日

14-文革第一轮大屠杀——血花四溅染街巷

作者 于松然

1981 年 3 月 26 日，“中法 81 中刑监字第 222 号”文件，宣判刘文秀无罪，同时，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刘文秀和**李文波**何许人也？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李文波》一文中写道：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 1966 年 9 月 10 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 1966 年 9 月 25 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

人们通过周恩来的讲话得知，在“红八月”里数千名被打死的北京居民之中，**李文波**的姓名“幸运”地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给历史留下权力无法抹掉的篇章。



李文波蒙难处

根据王友琴等学者调查和目击者的回忆：李文波，男，1914 年生，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居民，平时以修自行车为生。因有一处住宅（右图），被定为小业主。1966 年 8 月 25 日，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领导，给他家引来了北京女子十五中的红卫兵“小将”。杀气腾腾的“小将”们，**非法**闯进屋里，勒令李文波、刘文秀夫妇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因没有如愿，她们便翻箱倒柜、掀破屋顶进行全面非法搜查；又因一无所获，她们便气急败坏地用棍棒殴打起李、刘来。面对那些肆意践踏法律、毫无人性的禽兽，52 岁的李文波忍无可忍，**依法**奋起自卫，拿起菜刀大喊道：“我跟你们拼了！”见势不妙，女红卫兵纷纷逃离。不多时，十多名持棒男女红卫兵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当场把李文波打死。年过半百的刘文秀，见丈夫被活活打死，痛不欲生地大骂红卫兵是“土匪！”“强盗！”大喊“拼了！”奋起搏斗，终被制伏。血案发生后不久，曾自诩“**我对待敌人从来不手软**”的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颠倒黑白，将李文波夫妇**合法自卫**定性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属“阶级报复事件”；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了打死李文波的红卫兵，夸奖他们是“英雄”；接着，他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以“行凶杀人”的莫须有罪名，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被红卫兵打死的李文波死刑。1966 年 9 月 13 日，刘文秀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一起千古覆盆大冤，就这样公然地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面前！**刘文秀**也因而成为中共和周恩来“依法”枪杀的反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人！

李文波、刘文秀夫妇依法自卫的所谓“阶级报复事件”，被周恩来和红卫兵颠倒黑白，大肆宣扬，激起了红卫兵们阵阵狂戮。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此时，李文波的合法自卫又被升级为“白色恐怖”。李文波被打死后的七天里，数千名各路红卫兵丧心病狂，“用红色恐怖来还击”所谓的“白色恐怖”，血洗李文波家所处的崇文区榄杆市一带，无数人惨遭毒打，十多名无辜者倒毙在他们的棍棒之下！

十四年又七个多月后，迫于正义呼声，中共虽不得不重新判决，宣判**刘文秀无罪**，但拒

绝宣判李文波无罪。由此可见，文革后的中共，不愿幡然悔悟，彻底自新，仍坚持当年大屠杀“合法”理念：**非法抄杀合法；合法自卫非法**！

在“**红八月**”大屠杀的高潮中，对“阶级敌人”从不心慈手软的总理周恩来，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中共对红卫兵无法无天地抄家和打杀行动的支持。9 月 1 日，面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他在高唱“**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同时，宣布说：“**所以**(你们)**在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这就是“敬爱的周总理”著名的“**支持抄杀**”弱势人群讲话。四十年后，没见有被砍伤的“**女十五中的同学**”出来现身“证明”，也没人见到有女红卫兵被砍伤的资料。

什么是“暗藏”？什么叫“逃亡”？什么算“反动”？毋庸法令规定，勿须政策界定，无用检察推定，不要法院审定，在毛主席号召、周总理拍板后，一切交由居委会那些“只会加减，不识乘除”的大妈大婶们去认定，最后，再把决定和执行鞭刑、棒刑、死刑的权力交给熟背《毛主席语录》的十几岁红卫兵“娃娃”们——这就是毛泽东发明的、周恩来积极执行的“**群众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政府总理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下，红卫兵抄家抄红了眼、杀人杀黑了脸！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学者的调查和目击者的叙述，人们看见了“**红八月**”里血溅街巷的红光：

1966 年 8 月 23 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 29 名“牛鬼蛇神”，被她们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强迫他们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在火堆四周，十几岁的红卫兵“女将”们，拎着皮带，提着棍棒，柳眉杏眼，怒视“牛鬼蛇神”，发现有稍不如意者，便用皮带抽或棍子打，对他们进行“触及灵魂”式的毛式批斗。著名作家老舍，在“批斗”之后的第二天，便纵身跳入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里自杀身亡。

1966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 2 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厂胡同 6 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邻居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 70 来岁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去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老先生叫左庆明，十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 50 来岁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毒打，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到，只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来车拉走了他们的尸体。

8 月 27 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一个退休女会计**孙启坤**。

8 月 28 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 93 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一个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红卫兵恼羞成怒，把李丛贞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为了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一个打他的红卫兵，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割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他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下来。

8 月 29 日，据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一个红卫兵说，在“红八月”里，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就打死了十多个人。其中，8 月 29 日，高二的一些红卫兵，跑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把与他们观点相左的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珉**老人打死。

在北京市 1966 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 20 号的**韩模宁**一家**五口**，傍晚，被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全部杀害。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的是当地派出所民警罗 xx。笔者判断：这很可能与报复杀人相关。

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而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一名被控有“反革命罪”的**年轻女子**，被捆抱在柱子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其背。由于此女拒绝认“罪”，直到贴身衬衫被抽烂了，也一声不吭。于是，她被翻身背绑柱上，狠抽其胸乳。没打几下，只听女子惨叫一声，头耷拉了下去，便香消玉碎，魂断京都。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后，尖叫一声，在街巷里疯狂奔跑……

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竟然踩踏她的肚子，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一群红卫兵在崇文门附近，抄了一个“**地主婆**”寡妇的家。他们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拎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上灌下去，直把寡妇活活烫死。

汪芝麻胡同的居民**傅毅茹、周康玉、张洁凤**等人，是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抄家时先后被红卫兵打死。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但因她的已故夫君曾是“旧社会”的小官僚，自然“罪”不当恕，抄家又从褥垫下搜出一把短刀，更是“罪”不容赦，瞬即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独居小院周康玉女士，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后代，自然在劫难逃，打成重伤后，挣扎着上吊而死。第三位张洁凤女士，人们尚不知道他历史上的“污点”，便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红卫兵轮番上阵，用皮带抽打，当即撒手人寰。

据北京市八中红卫兵组织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像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于是，他们杀向社会，终于干出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他们抓住了一个专同红卫兵作对的名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毛式“触及灵魂”式的殴打和木枪捅刺。目击者这样写道：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至今，无人知道“西山老大”姓甚名谁？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流氓头子”是谁给他定的性？知情者、官方对此讳莫如深，试图把他从历史中抹掉。



孙静珍和她的幼女

“红八月”的腥风从北京刮向全国，也刮到了河南省许昌市。笔者暗访，1966 年 8 月 27 日，地区印刷厂党委书记**朱普华**和厂长**杨新喜**，为了自我保护，表示“紧跟”，招来了县完中的红卫兵，查抄曾当过国民党上尉军医的厂医**祝泽民**的家。抄家时祝泽民逃脱，其妻 48 岁的**孙静珍**（右图）被抓到印刷厂内，当天惨遭毒打而死。厂工人李 x 参与毒打，曾用铁杵捅其阴部。孙死后，印刷厂领导派人用一领苇薄卷住尸体，埋葬于东关乱坟岗。祝泽民的逃跑还株连六个子女：大女儿祝蕴毅，遭批斗，剪秃头发；大儿子祝鸿昌，被红卫兵抓住吊打，幸免于难；幼女被从楼上甩下，侥幸被树枝挡了一下，幸未摔死，遗脑震荡；其他子女逃脱。

在“红八月”的腥风里，许昌市区至少有七八个居民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安怀街居民**王铁锤**、烟厂职工**刘星火**等，都死在红卫兵乱棒之下。在禹县神垕镇，五十岁的钧瓷技师**贾成**，技术精湛，为人耿直，被红卫兵揪斗，打得皮开肉绽，逃跑时遭追杀，跳入钧瓷窑中，被炼成一捧焦灰！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李文波》一文中还写道：

“1966 年 8 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随同那场残忍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

面对着这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笔者没有能力将他们一一列出；王友琴教授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独立调查，所掌握的“红八月”受难者名单，也不足北京“历史的黑洞中”受难者的十分之一！全国呢？笔者在 30 多年后的暗访得知，仅中原小城许昌，“红八月”里，至少有七八个人遇难！遗憾的是，因无官方支持，笔者暗访得到的信息，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大多数遇难者饮恨而亡，消失在“**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之中。

从“历史的黑洞中”找出“红八月”受难者名字，并为他们树碑立传，笔者虽没有能力做到，但只要受难者的亲友、目击者和耳闻者，能消除顾虑，排除干扰，勇敢地说出或写出

所见所闻，施刑者能良心再现，勇敢地忏悔、致歉，正义者能像王友琴等学者那样，顽强地进行调查，同时，见闻者和正义者联合起来，齐心协力，追讨杀人凶手和策划者，并向中共当权者施压，敦促他们改邪归正，解密档案，支持调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就会使**“无名无声的死亡群”**里的每一个受难者，大白于天下，冤情得到申张，从而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抚慰！

15-文革第一轮大屠杀——血渍斑斑大驱逐

作者 于松然

“红八月”期间，一场“保卫首都”大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北京，约十万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驱赶到农村。当时官方所有“喉舌”，对中共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导，力图把这种**违宪**行动，消泯在无声无息之中。

但中国老百姓在“红八月”半年后，还是从政府的布告里，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充满血泪的、反人类的大驱逐事件。

1967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时称《三一八布告》。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布告命令被遣送走又**“私自返回北京”**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文中可以看出驱赶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即“黑五类”，还包括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摘帽右派”和他们的“家属”等，即“黑六类”及其亲属，而当时大量存在的“小业主”，原属“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驱逐中，都被升级为“资本家”加以驱赶。在布告里，“表现不好”同“牛鬼蛇神”一样，是个界线含糊、弹性很大的词语，这种可以随政治标的的变化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使中共掌门人和各级权贵们，都握有生杀大权。

这个布告公开以政府名义，确认了野蛮驱赶这种大规模“奸污”宪法的“合法”性。而“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则再次暴露了他们的欺骗、虚弱和无耻！

“红八月”大驱逐行动，早在 1962 年就开始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阶级成份净化成“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由于有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条，它的第九十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条条规定，因而使他们暂时找不到驱赶的借口，从而使他们暂时没有付诸实施。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最高指示”。周恩来闻风而动，立刻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意见书，经毛泽东批准后立即实施。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不仅增调七十和一八九两个主力师驻京进行威慑，还制定了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驱逐“成份不好”居民的长期计划。但也因有碍于毛泽东《宪法》的有关规定，苦于找不到适当“理由”作借口，迫使大规模驱逐计划再次“搁浅”。

1966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发布了“**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的“最高指示”后，红色恐怖已经形成，给驱赶居民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为了保护党内右派中的朋友和实现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他采用了与毛同样的“借刀”计——利用红卫兵。

据传：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等机构中实力人物的指使下，1966 年 8 月 23 日，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第二天，“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应声也发出了《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传单。通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这种政出多门的作法，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8 月 25 日，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 31 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周借“西纠”的刀，力图在平衡左派红卫兵的同时，来执行他的大规模驱逐居民计划。紧接着，一些类似组织迎风成立，如“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

据悉，“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者**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大员的支持——他们都是当时活跃在台上的党内中摇派权贵。由于周的“亲自关怀”，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许明**和**李梦夫**、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梁健**等多名政要，都成了“西纠”的核心参谋；“西纠”的宣言、通令、通告等文件，许多都是经过他们手或起草、或修改、或审定的，而他们的子女，也多是“西纠”的骨干。由于周的“亲自关怀”，石油工业部为“西纠”做了妥善安排：为他们提供了两间办公室，安装了直通电话机，一辆嘎斯 69 卡车供他们调遣，夜间值班人员都能穿上合适的军大衣，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全部由石油部核消，等等。由于周的“亲自关怀”，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西纠”成员“光荣”地承担起了天安门上下维持秩序的纠察工作。

1966 年 8 月 29 日，在核心参谋们的合谋下，“西纠”发布了大规模驱逐居民的“第四号通令”。**“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笔者：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给出路就是**“滚出北京”**。在“红八月”里，“西纠”的这个大规模驱逐令统一了其他红卫兵的通告。由于根子粗、后台硬，“西纠”的驱逐令像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效，各路红卫兵都在警察的帮助下，积极而迅速地用暴力执行之。

在要么被打死、要么“滚出北京”中，那些被中共反复清算过多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战战兢兢做人的“黑五类”弱势人群，以及小业主、资本家和所谓的“牛鬼蛇神”等新增加的弱势群体，都默默而痛苦地选择了“滚出”，忍气吞声吞泪地离开了他们久居的、宪法赋予他们**“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利的北京。

在政府、警察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主持执行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赶行动。驱赶行动包括：抄家、没收财产、注销户口、殴打、处理反抗驱逐而被打死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有的直接被红卫兵押解到农村，等等。在北京火车站，为被驱逐者设立了特别入口，由红卫兵把守。很多被驱逐者在车站遭殴打，有的被打死。被驱逐者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为了减轻运输负担，他们的家具都被没收，每人只准带少量的衣服和炊具。

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便让阶级成份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 8 月下旬至 9 月的 40 天里，北京全市有 8.5 万人在被抄家后，赶出了北京。另一说法是：8 月 13 日至 9 月 15 日，北京 9 个城区和近郊区，共驱赶 7.7 万人。还有一说法：在 1966 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约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 2%。

北京红卫兵的驱逐革命，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到 10 月 10 日止，上海全市已有 9,260 余居民被驱赶到农村。在广西南宁市，有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

被驱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又有报导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统计，到 10 月 10 日，有 2,650 人被戴上“黑五类”的帽子，他与他们的家庭被驱赶出齐市。又据知情人披露，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上说，到 10 月 3 日为止，全国各地从城市里驱赶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分子 141,700 名，资本家和房产主 11,100 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 名，上述人员的家属 182,300 名，驱赶总数为 397,400 名。此外据称，在大驱逐中，“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 起，没收黄金 118.8 万两。

但有学者认为，在“红八月”的大驱逐中，全国至少有 50～60 万城市**弱势人群**被驱赶到农村，他们的家财被没收，估计有一万多人在驱赶中死亡。

据报导：被驱逐的居民中，有很多是随子女在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人。当由红卫兵押送他们回原籍时，不少人被剃成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多次凌辱、殴打，其中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例如，1966 年 8 月 29 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就打死了**一个老年女人**。1966 年夏天，有些上海人曾在火车站上，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了**多具尸体**。1966 年 9 月，在广州市十一中召开的学生大会上，三个来广州串连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红卫兵，在指责广州死气沉沉后，向中学生介绍了他们在北京包括驱赶在内的“革命行动”。他们自鸣得意地说：“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 10 个、20 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口掉（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在押解中，弱势者究竟死了多少**？

又据报导，被驱赶者到农村后，农村也把他们当成“专政对象”，他们中有的人，一到农村，便遭批斗。例如，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何洁夫**、**高吉章**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红八月”里，他们同北农大其他 67 人一起，被逐出了北农大，强行驱赶到广西农村。1967 年 11 月 14 日，何洁夫在“群众专政”中，被村民打死。又如，被驱赶者中，许多人是年老体弱者，在吃、穿、居住等生活条件突然恶化下，他们遭到了贫困、病患和专政的三重交迫，很快便倒毙在农村里。**驱赶到农村的弱势者，究竟又死了多少**？

1966 年年底，根据毛泽东宽猛相济、恩威并举的人治战术思想，中共对红卫兵在“红八月”里乱杀乱打的作法进行了“限制”和“纠偏”，红卫兵打人和驱赶等乱法情况，才有所缓和。

在这种情势下，有些在农村挣扎着活了下来的被驱逐者，看到了重回北京的希望。他们利用中共昭示的“宽”和“恩”，即所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等指示和承诺，到京上访，试图重返北京。但《三一八布告》使他们的希望化成泡影。

不仅如此，有些被驱逐者因上访而获新罪。如北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师**胡秀正**和八中物理教师**张连元**夫妇，全家被驱逐到农村的理由是：张父是“漏划地主”。到农村后，他们对照当年土改政策，认为其父在四清运动中被订为“漏划地主”不实，因而上访；然而，上访使他们获得了“翻四清运动的案”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两项新罪名。胡秀正不服惨遭批斗，终因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在上访中，弱势者因新罪名又死了多少**？

周恩来的“借刀”计没有完全成功。1967 年初，“西纠”等打杀成性的贵族红卫兵组织，被毛左派以“保皇派”罪名加以取缔。做为“西纠”的总后台，周恩来险些被打倒。“西纠”虽倒，但他的大驱逐“功劳”却被中共肯定，《三一八布告》就是证明。

毛泽东曾说过：**“人死应开庆祝会”**。在档案尘封，拒绝调查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知道在大驱逐中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知道“庆祝会”的规模，因而没有机会表达对“庆祝会”的愤慨和谴责！

16-文革第一轮大屠杀——鲜血淋漓东方红

作者 于松然

万木惊呆天地暗，
黑烟滚滚冲霄汉。
杀气腾腾心肌颤，
哀声怨，
抢夺人命李恩元！

五入村中驳誓干，
刀光剑影手中看。
虎口难生抛里万，
同心劝，
留得整数梁山汉。（作者注：108 个生命）

这首标题为《渔家傲. **反对杀害无辜**》的词，是当年中共北京市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张连和**所写。

据报导：在“红八月”里，在毛泽东“要武精神”和“血统论”的蛊惑下，北京市昌平和大兴两县农村，拿“黑五类”及其家属等弱势群体开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群体灭绝性大屠杀。其中，昌平屠杀人数比大兴县多。据披露：昌平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的黄土南店大队，在 1966 年 8 月底，就**打死了 19 人**；离定陵不远的黑山寨大队，地主分子**王占保**全家被揪出批斗，王占保和他的**儿子**都惨死在乱棍之下,九岁的**孙子**也没逃脱，被从野地里抓回来，当众撕成两半。由于昌平县信息控制比较严密，杀人又比较分散，集中报导不多，因而群体杀人事件显现得没有大兴县那么突出，其屠杀名气也没有大兴县那么大。

1986 年 9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名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书。书中披露，从 196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大兴县 13 个公社 48 个大队，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1）

有资料显示，位于北京大兴县的西部的东方红公社（现北臧村乡），从 1966 年 8 月 27 日就开始杀人，共**杀 98 人**。其中：新立村**杀 53 人**，马村**杀 34 人**，六合庄**杀 11 人**。

张连和在一篇《**五进马村劝停杀——文革大兴县屠杀侧记**》中写道：

“‘八三一’（笔者：1966 年 8 月 31 日）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振元**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 10 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 8 月 31 日夜至 9 月 3 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 34 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 108 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张连和目击了马村大队的群体灭绝大屠杀。他写道：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 5 间厢房 3 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着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 70 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倒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 30 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张连和后来对人说，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都在那次屠杀中死于非命。

张连和在他的《五进马村劝停杀》文中还写道：

“原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 8 月 27 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 9 月 3 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那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词中“抢夺人命李恩元”的**李恩元**是什么人？此人是北京市大兴县东方红公社马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人权学者**遇罗文**在北京坐监时，遇上了一个被狱中犯人起了个外号叫“屠户”的犯人，他就是马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遇罗文写道：

“据监中犯人们传扬，别的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的马村则不然。他们头一天把‘黑五类’老人用棍棒打死，把‘黑五类’婴幼儿劈成两半，然后把‘黑五类’青少年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双手，拴住拇指吊起来，再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为了不让青年人死得太快，多受些罪，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在这种折磨和毒打下，全部死掉。对于“黑五类”少年，他们也不放过：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他们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他们还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被迫停止了屠杀。由于‘屠户’是执行者，不久便被无罪释放！”

遇罗文还曾到北臧公社作过调查。他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王先生是北臧村人，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副村长，他的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他们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

他们说，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精心策划。比如，为了顺利杀害一家人，凶手们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叫被害人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被害人没有还过神来就被勒死，然后接着叫他家的其他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电线，人一出来就触电身亡，连气都没有出。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可以毫无顾虑地为所欲为。他们说，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孙儿说：“奶奶，迷眼。”老人痛苦而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最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去要人，单位不放，算躲过了这场劫难。可在村里的表姐和她的三个儿女都没有躲过去，全部遇难，其中一个上中学女儿，被活活打死在放学的路上。

王先生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1966 年 8 月 27 日那天，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大人和小孩押来陪斗，让他们跪在玻璃碴上，并用棍棒朝他们的头上、脸上乱打，当场把陪斗的大人和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吓得学生们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害校长的命。

他们说，刽子手行凶的动机，不少是出于个人恩怨，有的仅仅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私利。有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便急于杀人赖帐。例如，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份，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议。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贫农，欠了陈家的钱，为了赖账，拿起杀猪

的通条，不由分说，将这一家人扎死。更有甚者，有好吃懒做、娶不到媳妇的癞皮光棍，也趁杀“黑五类”之机，夺其妻女当老婆，美其名曰“给你换换成份”。

他们说，并不是所有贫下中农都是刽子手。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车把式，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想救她一命，便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车子的颠簸把女孩儿震醒，打手发现后，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式怒不可遏，扔下鞭子不干了。

“屠户”怎么被迫停止了屠杀？张连和写道：

“9 月 1 日凌晨 1 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于是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硬是在他们举着棍棒的中间“冲”到村东口第一道防线处。他们仍不让进村，后在王书记“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的厉声硬语中，才经过请示放我们进了村。……在我们站在刑场旁边儿观看他们施威的时候，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后来，王书记又把我和刘克一叫进屋内，进一步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便杀人犯法”等进行说服教育。**李恩元**他们说，我们已经杀红了眼，骑虎难下，停杀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人一把杀猪刀子，磨得贼亮，说到激烈处，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刘克一一个箭步窜到王书记身边护住，如果发生火并，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

张连和认为：“一场极小范围的无辜之人被杀事件被制止了。这在大兴县来说，虽然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但毕竟是**挽救了一百多口人的性命**，功不可没。”于是，他赋诗一首，“权当佐证”。

七绝　**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
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
阴转多晴把党夸。

尽管笔者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无法苟同，但当“**阴转多晴把党夸**”的时候，人们应感谢大兴县县委书记**王振元**和《五进马村劝停杀》的作者**张连和**等人，是他们**挽救了 108 人的性命**。除此而外，我们还能“**夸**”谁呢？

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红卫兵眼里，不过一个小小“股级”当权派，竟敢如此大胆地杀人！在“县太爷”县委书记面前，竟敢“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明目张胆地威胁他的顶头上司！他的后台是谁？根子多硬？

当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他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吴德把大屠杀的责任推到村支部书记和群众身上，并把支书抓了起来。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但为什么抓起来后又很快放掉？例如这个“屠户”李恩元，关了不久便被无罪释放。这一关一放，使吴德的“调查”露出了破绽：**隐情很深**。后台呢？根子呢？吴德有意回避。

对此，张连和写道：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行动快的‘公社’和‘大队’都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监管起来，随时拉出来批斗，进而杀害。”

显然，这挑动仇恨、制造对立的进行“村村见血”式土改运动的恶果之一。是哪“股腥风刮到大兴县”？张连和写道：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大兴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语录’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行动，‘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打、砸、抢、杀，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思想和行动中遭受毒打或杀戮。”

尽管张连和没有指名道姓说出“屠户”李恩元的后台、根子，尽管还有隐情没敢说出，但却明明白白地道出了那个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仅此一点，就比**吴德**诚实得多。因此，当我们“**夸**”县委王书记和张连和等人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夸**”、去歌颂那些中共权贵们？恰恰相反，我们却有责任去谴责中共、中共大员们和他的掌门人毛泽东：正是他们为了私利，为了权力，不惜撕毁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去制造混乱，破坏安定；正是他们，为了私利和权力，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和“**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的乱打乱杀的动员令；正是他们，为了私利和权力，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蛊惑人心，去制造和支撑这种**反人类的兽性大屠杀**！

附 1、 大兴县大屠杀部分统计表

公社名称	大队名称	屠杀时间	屠杀人数
大兴县	全县合计	1966.8.24～9.1	325
大辛庄公社	公社合计	1966.8.31～9.1	130 多（？）
	黎明大队	1966.8.31	60 多（？）
	中心大队	（杀 106 人）	20 多（？）

	昕生大队		20 多（？）
	红升大队		2
	杨各庄大队	1966.9.1	20 多（？）
	东黄垡大队		
	东梁各庄大队		1
东方红公社（北臧乡）	**公社合计**	1966.8.24～9.1	**98**
	新立村大队	1966.8.24～9.1	53
	马村大队		34
	六合庄大队		11
其他公社	**其他公社合计**		**97 以下**（？）

17-文革第一轮大屠杀——无碑纪念

作者 于松然

东方红、大辛庄的无碑纪念

从北京农村大屠杀的规模、时间、方法和口实上看，无论是大兴县的屠杀，或者是昌平县的屠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如果说大辛庄公社的屠杀与东方红公社的屠杀有什么不同的话，仅仅是遇罗文在大辛庄发现了大屠杀高一级的组织者——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为首的“九人小组”。

所谓“高一级的组织者”，在红卫兵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科级芝麻官。一个公社、乡镇一级的头头，竟敢如此大胆地组织大屠杀，如果没有更高的根子、后台，他们敢吗？

当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为了力挺“主旋律”，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大员**吴德，**说谎时脸不红，心不跳，说得轻松，道得坦然，其**撒谎功夫十分了得。**然而，大辛庄由中共公社党委头头们动员、组织和威迫屠杀的事实，却给了**吴德**大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给**吴**大人一记耳光的还不止于此。有档案资料披露：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 1966 年 8 月 26 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这个“**八二六讲话**”与“**杀人无罪**”讲话精神一致。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因此，有调查者认为，大兴县屠杀组织实施者高、胡和李恩元等人，很可能接受来自于县公安局的指令。这一切在

吴大人的回忆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一个县公安局敢于组织如此大规模屠杀，没有更高当局的指令他们敢吗？是谁指令县公安局呢？这仍是个谜。

据李福荣说，在受害人亲友的努力追究下，几年后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 8 年徒刑，但随后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 8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 8 年徒刑；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

当局处理高、胡等人是不得已的，甚至是违心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执行者；如果不是民愤太大，他们不会处理他们，甚至还会表彰他们。为了维护党和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他们必须把真相隐蔽得很深很深！

究竟是谁指令、指挥或默许了这场北京农村大屠杀？更高的根子、后台在哪里？这里有很深的隐情待揭发。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大人知道这个隐情，但他不说，却瞒天欺下；县公安局清楚这个隐情，但拒绝调查；直接组织、指挥大屠杀的高福兴、胡德福和李恩元，也可能知道部分隐情，但他们不敢说；调查者也没找到更高更大的根子、后台，仅仅判断农村大屠杀与北京城区里红卫兵的大屠杀有关，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杀人无罪”和“八二六讲话”的两次讲话有关。由于中共当权者掩盖真相，遏抑调查，终使遇罗文的努力无果而终。

尽管调查受阻，笔者仍然认为：指令或暗示县公安局组织屠杀者，应来自于高层或最高层。指令或暗示直接来自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或来自于左派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甚至直接受命于林彪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来自于左派林、江等人，吴德对此会大书特书，因为，揭批他们的罪行，符合“毛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中共党的权威结论，同“主旋律”完全合拍。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反人类的野蛮抄杀大加赞扬，说“**是大好事**”，因此，笔者大胆推测：北京农村大屠杀的指令或暗示，很可能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有关，特别是与当时处于一线支持、组织红卫兵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的**周恩来及其支持者有关**，因为，在屠杀弱势群体上，以周为代表的右派比以毛江为代表的左派更邪乎，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又受到毛江左派的迫害。笔者猜想是否正确，让历史去验证吧！

如今，埋葬受难者的“万人坑”和填满受难者遗体的井，都被填平了，上面绿意昂然的庄稼和窗明几净的楼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有力“见证”。那些大屠杀所遗留下的斑斑血渍，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似乎已经被“**导向**”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冤魂屈骨，在“主旋律”的催眠曲中，好像也将被“**遗忘**”分解得无影无踪！

这里不应该竖一座纪念碑吗？在“主旋律”的督导中，谁能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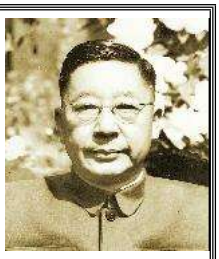
18-第二波自杀风潮

作者 于松然

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发出后，毛式批斗法在进一步发展中升级为**毛式揪殴法**，很快形成了从 1966 年 8 月到 1967 年中期的第二波自杀风潮。

在“红八月”里，由于无法忍受毛式揪殴法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自我了断成了他们抗议迫害、结束苦难的首项选择。在这里，笔者从掌握的一百多名自杀者名单中挑出几人，以儆省未来。

老　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的作者。他的作品语言生动、幽默、诙谐，风格独特，受到国内外读者喜爱。北京市政府曾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被当时的文艺界一把手、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推誉为中国五大语言大师之一。那五大语言大师是：**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在文革中，前三位挣扎着活到了文革结束，老舍和赵树理却没有那么幸运。1966 年 8 月 24 日晚，老舍因不堪迫害，怀揣《毛主席诗词》，投北京太平湖自杀。（右图）


著名作家老舍

老舍投湖自杀前，曾亲口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8 月 23 日，他以**“我没有问题”**的姿态主动参加了北京市文联组织的批斗会。会上女作家**草明，**为了保护自己，突然向他发难，揭发了他把《骆驼祥子》版权卖给美国“不要人民币要美元”的“罪行”。于是，他遭到了女八中红卫兵整整一天的批斗、折磨和毒打。当天深夜，打伤后的老舍被送回家。在家里，他告诉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第二天，他带着“三个理解”，揣着《毛主席诗词》，在太平湖边期待了整整一天，傍晚投水自尽。

一个作家没有留下只字遗嘱，也是少见的。在太平湖一整天，他在想什么？他在读《毛主席诗词》吗？他会读，因为毛泽东“理解”他，知道他在“解放”后所写的东西，都是讴歌党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但不可能整天在读。也许他在过滤他的一生。

在“旧社会”，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像一只孤傲的苍鹰在天空自由飞翔，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一批世人称道的作品，赢得了荣誉和尊严。从美国回到“新社会”后，他拥护和欢呼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因而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很高的荣誉。信任、荣誉，使他与自由、民主和人权拉开了距离。他奋笔疾书，写出了《龙须沟》等许多艺术平平但配合政治、讴歌新时代的遵命文字。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命运已同共产党紧紧连结在一起。“解放”初期，在斗争一个“白吃了他（一个卖油饼的老人）的油饼”的“恶霸”时，他义愤填膺，告诫**“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高喊**“该打！该打！”**而不论“恶霸”的罪名是谁人推定、谁人判决。在反胡风中，他对同他共事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大加鞭挞，痛斥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云云。在反右中，他毫不留情地判定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揭露农村生活真实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在反右运动的“巨大胜利”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朋友纷纷中箭落马，严峻的形

势可能促使他有所反思。1957 年，他推出了艺术造诣较高的三幕话剧《**茶馆**》，好像要与“遵命文学”拉开一定距离。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他写了不少应景文字。如他在《陈各庄上养猪多》中，就写下这样句子：**“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茶馆》相比，前者是艺术，后者是垃圾，可见他的内心世界充满着矛盾：在遵命和相对自由之间困惑、搏斗和挣扎。到了六十年代，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已与党内右派、中间派合拍。也许他还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当遭到毛左派敌视时，他还陶醉在**“我没有问题”**上！

他这十六七年的心迹和境遇，是一代中国许多作家、学者的缩影：他们在塑造别人愚昧、冥顽、奴隶意识和奴性灵魂的同时，也被中共伦理共识塑造成盲从、违心、昧着良心和相互攻讦的党棍，如**草明**辈那样；他们在为专制独裁修桥铺路的同时，也使自己失掉了人格、良心和恻隐之心，最终也把自己的精神甚至肉体，都埋葬在这条通向荒诞而野蛮的路上。

1966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说：**“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老舍被列入敌对势力。显然，他说的“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毛泽东，不但不理解他，还要革他的命；他说的“总理最了解我的”周恩来，正处于“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百忙中，可能没有想到或无暇保护他。他对妻子说“三个理解”的那句话，是自我安慰？还是有所期待？抑或是自嘲？人们可以去想象。

他站在太平湖边，有所期待地读着《毛主席诗词》，回顾着走过的一生，内心激烈地搏斗着。整整一天没有人理睬他。他被抛弃了，他悔恨地绝望了，傍黑，他纵身跳了下去。

也许有人指责笔者对受难者过于苛刻，缺乏同情心。笔者认为：历史不仅在于同情，更在于真实，在于“殷鉴不远”——吸取教训！

傅雷朱梅馥夫妇，一对文革殉难者。

1966 年 9 月 3 日凌晨，翻译巨匠**傅雷**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左右，他的夫人**朱梅馥**吊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右图）



傅雷朱梅馥夫妇和儿子傅聪

傅雷，1908 年 4 月 7 日生于上海南汇,1924 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中,1927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1931 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 年起闭门译书，翻译了法国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翻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鉴赏力。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命运几乎一样：他们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建设新中国”的感召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也获得了一些奖历，被政府指定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或挂名什么长等荣誉闲职。但随着**“思想改造”、“批胡风”、“一化三改造”**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专制独裁主义冲突起来，因而受到了冲击和打压，他们的“统战”价值也随之衰减以致告罄。挨到1957年，他们中许多人跌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阳谋”**圈套中，成了“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具有民主意识的傅雷焉能例外？1958年，他在“反右补课”中，被以“亲美”、“反苏”的罪名，后补打成右派。

当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他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朋友们说：“我快要走了！”但生命只有一次，强烈的本能使他对生存抱有一线希望。

在自杀前的“红八月”里，他在给儿媳的一封信中，曾表露愿意向专制独裁低头认“错”的心扉：**“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他想错了。**毛泽东不准投降！**毛要把他心目中的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他的嫡系造反派的话来说，叫“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生存之路被堵死了，自我了断成了他和他的同路人们的唯一选择！

从8月底开始，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戴高帽、罚跪、辱骂和殴打，他，傅雷，一代名扬中外文化巨人的尊严和权利，**不，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一个普通人做人的最基本权利，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9月3日凌晨，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剧毒药水仰首喝下，离开了人间，享年58岁。同傅雷共同生活了34年的妻子朱梅馥，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在辗转绻曲中死去。她痛苦地抽泣者，从容地扶正丈夫的遗体，擦掉丈夫遗体上的血污，摆放好他们晚上才写好的遗书（1），然后从被单上撕下两段布条，搓成绳子，在丈夫走后约两小时，吊死在铁窗横框上，终年53岁！（笔者读着他俩的遗书，不禁老泪横流！）

傅雷夫妇的死，像“瘟疫”一样向周围扩散！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上海交响乐团钢琴家29岁的**顾圣婴**及其**母亲**、**胞弟**三人，面对毫无人性的迫害，分别于9月6日、9月9日和1967年初自杀，紧随傅雷夫妇撒手而去，离开了这个野蛮、残忍、令人诅咒的世界！

其他自杀名家（略）

据笔者了解，仅1966年的夏天，夫妇同时、或全家自杀的还有：

上海市医药公司职员**王德明**，同父母三人一起自杀；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同妻子、儿子、女儿全家四人一起自杀；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一级教授**黄国璋**和夫人同时自杀；
北京新华社摄影记者**陈正清**同夫人何慧，遭批斗后同时自杀，留下四个未成年孩子；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学家**胡正祥**教授同夫人双双自杀；

上海华东师大外语教师**吴迪生**同夫人双双上吊；

北京四中数学教师**苏庭伍**和妻子地理教师**汪含英**同时自杀；

北京库司胡同在丹麦使馆工作的**无名氏**居民，夫妻双双吊死；

天津市前资本家**李 xx** 同妻子一起自杀；

北京第 65 中学生**边涌珍**的父亲和母亲，双双自杀；

天津文化用品公司职工**张宗颖**和妻子**吕乃朴**，夫妻双双自杀；儿子张佑慈因扬言要“给父母报仇”的“反革命罪行”，被判刑 15 年。

据专家们估计，1966 年 8 月 1 日到 1967 年中期的第二波自杀风潮中，全国约有 10～15 万人丧生。笔者搜集到的 143 个自杀者名单（略），仅占这一时期自杀总量的千分之一左右！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附 1、 傅雷的遗书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笔者：傅雷长子，逃亡英国的青年钢琴家）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 55.29 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剩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见，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由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妮给敏儿与 XXX，但恐怕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 53.30 元，作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便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19-权力对抗：十月进击

作者 于松然

一. 十月进击

1967 年 5 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时说：“**《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什么呢？在“横扫”、破“四旧”运动中，特别是在批工作组和发动红卫兵运动中，他遇到党内右派集团的顽强抵抗，因而发现了一条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是这条路级的嚣张表现；“**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是这条路线对他的公然挑衅。对此，毛十分恼火，决定乘胜追击，不给刘、邓喘息机会，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他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善搞**群众运动**即暴民政治的高手毛泽东，通过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煽起了红卫兵造反狂热；他还通过免费供吃、供喝、供穿、供住和供车的红卫兵大串连，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使红卫兵纵欲天下，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枪弹和炮灰；他还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指导“横扫”和大破“四旧”，鼓励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肆意践踏人权，任意屠杀弱势群体，培植他们暴戾恣睢的兽性。毛泽东的“群众”终于被发动了起来。他要借助“群众”的暴力乘胜追击，为向刘、邓全面夺权扫清道路。

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向党内右派发动总攻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按照毛泽东的圣谕，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高调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吹响**十月进击**的号角。会上，毛泽东借红卫兵造反之势，严厉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陶铸和其他中央大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迫使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等大员，协调一致地按照毛泽东的统一口径，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指责他们是“**一条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起者和推行者，等等。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一线推动和指挥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揪斗包括那些“想不通”在内的各级当权派的狂潮，席卷全国。

对此，三十多年后，当年被毛泽东投入监牢的枪手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一书中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认为那是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以自己为革命对象”，主要革“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的命，破“四旧”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等等。这位临终不忘颂扬恩师的枪手，却忘记了他不该忘记也不可能忘记的几件大事：他“**忘记**”了毛泽东授权和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那篇社论号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忘记**”了他本人在毛泽东授意下起草的包括破“四旧”在内的《十六条》，那个文件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他“**忘记**”了他本人参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个讲话大反“四旧”，大声赞扬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好得很**”；他还“**忘记**”了毛泽东发出的“**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的“最高指示”，那个指示酿造了全国十万人丧生的“红八月”大屠杀，等等。尽管我们没有理由否定“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这句话的真实性，但也没有理由因毛要批判“资反路线”就去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如果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是句真话，那么，是否可以证明，“**大破‘四旧’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犯罪**”的这个历史公论不可推翻？是否还可以证明，王力这位当年毛的枪手，正是“集体犯罪”中的重要罪犯，因而他的倒台是罪有应得？枪手的“反思”，有意回避毛泽东为打倒刘、邓所设计的“**层层剝笋**”的战略战术：批《海瑞罢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舆论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大破“四旧”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大破“四旧”所煽起来的红卫兵疯狂，为批判刘、邓党内右派势力的“资反路线”，积聚了能量，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制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首先在学校里发动，接着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扩展。北京红卫兵遵照指示，派出学生到各地“串连”，发动和指导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共建政十七年来，尤其是在 1957 年反右以后，那些省部级大员们，那些地、县级官老爷们，甚至一个小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在他们面前，都是党的化身，都是真理的传人，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各级官老爷面前，他们只能诚惶诚恐地躬身哈腰，听从他们“一贯正确”的训导，服从他们“一贯正确”的驱使，听凭他们“一贯正确”的宰割。因此，他们多么希望能站起身来，挺起胸来，同“一贯正确”的官老爷们**平等对话**！毛泽东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但在毛、周、江左派的统一指挥下，不平等对话的毛式揪殴法，**强暴**了他们“平等对话”的愿望：全国从中央到各地，各级党委和单位的主要领导者，许多人被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分子——拉到台上批斗、殴打。“回去仍然不通”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中央局”级大员，自然首当其冲，使毛泽东能在“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中得以让毛的“群众”用毛式揪殴法去“**检验**”他们。

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老百姓的批判锋芒，并不局限在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问题上：他们还要借机批判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的当权派，**清算**他们文革前的种种恶行、劣迹：

他们批斗那些曾欺压过老百姓、对老百姓进行过打击报复的当权派；他们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公开给文革前受过政治迫害的老百姓平反昭雪；他们还要求党、政、军各级当权派，向在“四清”运动中受迫害的老百姓赔礼道歉、平反昭雪，甚至要求那些因错划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解回乡的老百姓回城、复职；上海临时工、合同工

的工人们，则提出了取消等级歧视政策，要求与国营工、集体工政治待遇平等，经济上同工同酬，等等。

这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对此，湖南红卫兵造反派杨曦光先生，首先提出“两种文革”的概念：一种是“**毛泽东文革**”，一种是“**群众文革**”。在“群众文革”里，就体现这种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里，这些民主诉求原本是“非法”的，但为了打倒右派当权派，毛泽东便赐予老百姓以“大民主”，让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暂时“合法”化。显然，这是毛的权宜之计。尽管老百姓借助毛倡导的所谓的“大民主”，向当权派提出的一些民主诉求是合理的，但在独裁的政治氛围里，这些合理的民主诉求，只能是一种原始的、初级的淹没在批判“资反路线”汪洋大海里的微弱呼声。如果将这种微弱的民主呼声理直气壮化，就会遭到毛泽东的无情镇压：上海工人合理的经济要求，被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批判，杨曦光因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打成反革命并判十年徒刑，就是这种“理直气壮”民主诉求的结局！

应当指出的是，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同红卫兵造反派用新的不平等对话——毛式揪殴法揪殴当权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前者是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体现，后者是痞子、流氓无产者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法西斯暴政。面对这种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毛泽东因要利用其不满情绪打倒右派，故能暂时容忍前者，积极支持后者；但对于在“横扫”和破“四旧”中积极支持贵族红卫兵的党内右派和中间派来说，这两种政治诉求，都是无法容忍的洪水猛兽！

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那些当年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大权旁落，成了众矢之的；那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运动中暴虐无比的为毛泽东立下赫赫战功的贵族红卫兵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变成了令人不齿的“保皇派”。但很快他们“清醒”起来，联手成立了右派造反组织，以打着狠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派”的造反旗号，与左派造反派相抗衡。

1966 年 12 月 26 日，在批“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迎来了的毛泽东 73 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在中南海游泳池摆了一桌寿宴，邀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参宴，江青当然其中。席间，当人们举杯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站起身来，举杯向赴宴者发出了令人惊愕的号召：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这是著名的“**生日号召**”——这是支持左派造反派用武力向右派夺权的号召！尽管事后御用精英们把这句狂言修改成“为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干杯”，但赴宴权贵们已经领悟到了“伟大领袖”号召的“精神实质”：**消灭一切反抗者**！于是，在四天后的 12 月 30 日，参宴者张春桥，便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所在地的康平路上，导演了“生日号召”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绞杀上海赤卫队，打伤 91 人；“生日号召”后不到一个月的 1967 年 1 月 25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地区，发生激烈枪战，两天之内双方打死 29 人（另一说 24 人），打伤 80 人……自此，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全国全面内战**”，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对此，毛泽东有“最高指示”在先。1966 年 10 月，他在批复给林彪呈送的“快报”上，赤裸裸地展现了魔王的杀戮心态：

“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毛泽东为什么号召自己领导下的国家全面内战呢？枪手王力在他的《反思》中说，是毛泽东怕“**中国改变颜色**。”这是枪手给魔王的开脱和粉饰。实际上，这种所谓“中国改变颜色”的说教，亦即乌托邦共产理想主义的说教，是毛泽东和王力等精英们对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所做的“理论”包装，因而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最大谎言。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右派势力的强大阻力，使位极人臣的毛泽东，倍感孤立，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多月中，一边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发现，受他支持的左派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虽已活跃起来，但各地党内右派扶植的右派造反派，势力日益强大，迫使左派造反派处于少数受压的境地。党内右派势力的反抗，使他有理由认为，全国政权的大部分权力，还在刘、邓党内右派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形成了刘、邓复辟的党内基础，从而使他的政令很难贯彻到全国。这种权大而不逞的局面，使他深感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他越来越感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内决斗形势已经形成。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权力情结**使他决心对权力来一个根本解决。他从重庆左派红卫兵通过制造“一二四”武斗（详见第 13 章“纵火”）取得胜利的事件中得到启示：支持左派造反派剥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重组干部队伍，把刘、邓党内右派势力排除于各级权力之外。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置荼毒生灵于不顾，利用造神运动在芸芸众生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借酒发飚，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内战”。1967 年 2 月 3 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政府领导卡博、巴卢库谈话时，暴露了他当时的心机：**“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这个深藏于毛泽东心底的**权力情结**，被他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等一类“理论”包装起来；而那个耸人听闻的发展成为“全面内战”的“**全面较量**”，又被中央文革包括王力在内的左派精英们，论证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毛的包装和王等的“论证”，使这个伪命题，在中国横行霸道了许多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历史再次证明：古往今来的大奸大恶们，都善以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之名，弄权欺世，强奸民意，从而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诱迫黎面黔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为了不给党内右派当权派们喘息的机会，在 12 月，毛泽东命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 10 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动员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到了 1967 年年初，毛泽东下令取缔了周恩来为后台的、以“保爹保娘”为目的的“联动”等贵族红卫兵组织，打倒了支持各地党内右派当权派的中共常委陶铸，以敲打周恩来。由于预见到党内右派当权派可能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造反派，1 月 13 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详见第 12 章一），限制各地当权派的权力，并警告他们说：**“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由于批“资反路线”和斗“走资派”受到

了党内右派激烈反抗，特别是面对各地右派造反派势力迅速膨胀左派造反派处境相对困难的形势，根据毛泽东提议，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要“**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决定要求军队“**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是毛泽东运用权力，为改变左派造反派受压处境所采取的专政措施。

在毛、周，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鼓动和领导下，北京红得发紫的红卫兵组织，诸如聂元梓麾下的“新北大”、蒯大富旄下的“井冈山兵团”等，纷纷组成了名目繁多的类同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宣传队”等造反组织，把手伸向全国各地，从而构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首都红卫兵各司令部——驻各地联络站**”行之有效的指挥和反馈系统；与此同时，北京派出的密使、公使，也纷纷在各地主要城市登场、亮相。——全国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也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通过三个多月的步步进逼，毛泽东支持的左派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与右派“保皇派”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样，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全面夺权战略部署的毛泽东，用中共中央主席的权力，把批判“资反路线”和揪斗“走资派”的**十月进击**，推向高潮，从而为在全国全面夺取刘、邓右派的权力，做好了准备。

20-权力对抗：一月拼杀

作者 于松然

一月拼杀

毛泽东的**十月进击**，并没有使党内右派束手待毙，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左右拼杀。

1966 年 10 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次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吃饭。饭间，江青对陈说，她“**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笔者：中共华东局书记)，**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要求陈“**站出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13 岁参加红军被誉为“红小鬼”的陈丕显，自恃清白无把柄可抓，竟不买江青的帐，借口有病休养为由，婉绝了江要他打倒曹、魏的指令。可悲的是，“不识抬举”的“红小鬼”，竟不懂得“**毛泽东≥江青**”政治公式的可怕，婉绝就会使自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疑于引火烧身！果然，上海造反派喊出了令他追悔莫及的口号：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曾经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造反派面前，威风扫地。



“一月风暴”中被打倒的上海市头头

1967 年元月 6 日，在毛泽东直接策划和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又称“一月风暴”（右图）。对此，“一月风暴”的总导演毛泽东于 8 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在毛泽东的制导下，山西、黑龙江等省，步上海后尘，相继夺权。自此，“一月风暴”发展为全国夺权风暴！

“一月风暴”的前奏，是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

1、卧轨对抗

1966 年 11 月 7 日，在毛泽东御用工具北京红卫兵设在上海联络站的鼓动下，上海工人造反派贴出了海报：定于 11 月 9 日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向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清楚地写着：**“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等。接着，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明确答复说，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因此，曹认为，成立“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在请示了养病中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后，做出了“三不”决定，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上海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三项严正要求”和“三不决定”的对抗，都有中央文件和中央大员的支持，矛盾迅速激化。

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11 月 9 日下午两点，“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曹荻秋不但不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还拒绝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要求。“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当晚决定“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王率领两千多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安亭车站接到市委命令，不准这一列车北上。9 日深夜，当列车开到安亭时，被安排停到铁道部材料厂的专用线上。上海市委的决定激怒了造反工人。几次谈判破裂后，10 日上午，工人们**卧轨**，导致京沪铁路全线中断 36 小时，酿成了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引发高层权力博弈。

上海告急电话打到了国务院、中央文革。总理周恩来立即派主管工交的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去同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商量。商量后，陈伯达果断地采取了三条紧急措施：1、《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要求工人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2、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身份通过铁路部门向安亭发去电报，告诫“工总司”造反派们“**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中央不同意两千多人上京告状，但可以派 10～15 个人赴京；3、指派副组长张春桥为特使，赴沪调解。

陈伯达的前两条措施传到安亭后，受到了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等待张春桥的到来。12 日下午，当张春桥一行来到安亭时，他们向张提出了五条要求。出人意料的是，张完全赞同他们的要求。13 日，张春桥在他答复的五条要求手稿上签了字。现照当年手稿抄录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 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至此，安亭事件以“工总司”的胜利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失败而告终！

王洪文率领北上告状的“工总司”人员回到了上海，他们像凯旋归来的英雄那样，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

“工总司”的胜利使上海市委沮丧而愤怒。他们打电话找中央领导：中共中央常委、副总理李富春躲而不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哼哼哈哈而言他，表明李、陈已改变了立场，都站在张春桥一边。他们深感被耍弄、被出卖了；但令他们宽慰的是，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竟敢与上海市委对抗，特别是敢于对抗中共中央常委陶铸、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大员，他吃了豹子胆了？旁观者一看便知：他有“尚方宝剑”在手。

尽管张春桥没有炫耀他的“尚方宝剑”，却不自觉地露了一露“剑鞘”。13 日下午，张春桥在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他泄露了天机：**“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并十分得意地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这是中央希望的”吗？采取三条紧急措施的陈伯达，不到一天便来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突显**中共机会主义文化**的魅力；李富春虽没急转弯，却把**中共避嫌文化**表演得恰到好处；只有受周恩来支持的陶铸例外。陶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并强硬地表示说：**“就是**

要把它压下去！”

“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什么？9 月 14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工、农、交通、财贸等部门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面对不到两个月的既定方针，陈伯达怎敢来个 180 度大转弯呢？显然他已被告知了上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陶铸，因不知道上意，便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正在忙于“接见”红卫兵的毛泽东知道：发动工人、农民造反远比发动无知的青年学生困难得多，因为经过“三面红旗”严酷教训的工人和农民，懂得口号、红旗与吃饭的关系；他们比较务实，不像小毛孩子那样一触即跳，因此，那里基本上是右派的势力范围。为了防止工人农民干涉学生，9 月 7 日，他批准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并在文件上批复道：

“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 月 7 日的《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与 9 月 14 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通知。然而，安亭事件使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以工人、农民同红卫兵学生相结合的造反组织，更具有正统性，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杀伤力，因而更具有夺权威力。因此他推翻了九月的两个通知的规定，对江青、张春桥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如此这般”的内容，但在 11 月 16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对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违犯中央两个通知规定的做法，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成功地导演了“安亭事件”这出“折子戏”；他的天才还在于：把**“如此这般”**的“唱词”偷换成**“先斩后奏”**和**“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并为出尔反尔的流氓行径，找到了政痞式的“理论”根据。于是，在“如此这般”之后的 12 月，他先后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 10 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两个文件，鼓动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从九月的两个“通知”到十二月的一个“规定”和一个“指示”，毛泽东把他那“理无常是”的政痞哲学，演绎到令人厌恶的境界。

2、绞杀赤卫队

1966 年 11 月 30 日下午，“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即“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12 月 1 日，王洪文率领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12 月 2 日，“工总司”派兵占领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遂停止发行。12 月 5 日，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压力下，王一平、宋季文两人代表上海市委，被迫同意并草签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2 月 10 日，曾经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不得不代表上海市委正式签了字。“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主要内容是：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事件以“工总司”、“红革会”的全胜而告终。

曾经独霸一方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委头头们甘心失败吗？经过秘密而紧张的策划，准备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复制《解放日报》事件，借以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示威。12 月 29 日，号称有 80 万人之众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出约 3 万多人占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他们高呼着“打倒曹老头”口号，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并要曹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上午，曹荻秋在市委会议室里，像演戏一样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并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赤卫队”头头们认为，他们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撤离上海市委。他们打算像“工总司”、“红委会”在占领《解放日报》社之后洋洋得意地撤离那样率领他们的将士凯旋而归，但为时已晚——“工总司”人马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

“赤卫队”是在上海市委策划下成立的。11 月 25 日，由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王玉玺**出面组建上海工人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对抗。上海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里召开筹建“赤卫队”的秘密会议。据说，曹荻秋出席了秘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表示承认和支持“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26 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跟“工总司”造反派不同的是，“赤卫队”里中共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这“六多”，注定它是个保守组织，即“保皇派”。但为了不带“保皇派”的帽子，他们也打出了造反旗号，高呼起“炮轰上海市委”、“揪斗曹荻秋”等口号。可悲的是曹荻秋，策划成立“赤卫队”的本意是对抗“工总司”，借以舒缓对上海市委和他本人的压力，谁知弄巧成拙，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刚被“工总司”揪斗，又遭“赤卫队”批判，自己人也不敢放过他！

但最可悲的还是冥顽不灵的芸芸众生，他们在对立双方蛊惑人心的煽动下，争先恐后地去充当权力的炮灰！

正当“赤卫队”准备撤离的时候，他们发现道路已被堵死，“工总司”十几万人马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张春桥早已料到曹荻秋利用“赤卫队”假造反的计谋，而“赤卫队”也已成了“工总司”夺权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在聆听了“伟大领袖”“**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指示后，便产生了绞杀“赤卫队”打算。机会终于来了。当他听到 3 万“赤卫队”占领上海市委后，便密令王洪文**绞杀**。王洪文不敢怠慢，急令副手耿金章成立“联合指挥部”，调集人马围困住“赤卫队”。30 日凌晨 2 时左右，“工总司”在耿司令的指挥下，向“赤卫队”发动进攻。他们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人，就拳打、脚踢、皮带抽、棍子夯。到早晨 6 点多，战斗结束，“工总司”大获全胜。是役，“赤卫队”被抓 300 多人，伤 91 人，被“俘”2 万多，“赤卫队”袖章全部被收缴，还缴获数

百箱饼干。被“俘”的“赤卫队”员，被迫排成单行，分六路灰溜溜地逃出康平路。此后，“赤卫队”一蹶不振。事后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上海康平路战斗，是毛泽东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后发生的第一起大规模**内**战。这次战斗，不仅为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夺权扫清了道路，还为全国各省市**武力夺权**树立了榜样。

3、特使聂元梓赴上海点火（略）

4、导演夺权

1967 年 1 月 6 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数百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在“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传下命令：向上海拍发贺电。周恩来、陈伯达等大员不敢怠慢，11 日，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紧急跟上，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夺权，并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月革命”夺权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造反派，响应号召，先后夺了本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是个另类：他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交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

不光赵紫阳；除愚昧无知者外，多数人都能看出：**这出“一月革命”连续剧，台上主角是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和王洪文；聂元梓、蒯大富也“反串”其中；摇旗呐喊、跑龙套和当炮灰的是上海工人和红卫兵；其总导演是中国人民的雇主、董事长毛泽东。**

据事后透露，1967 年 1 月 3 日夜，在北京平安里三号的《解放军报》社办公楼里，一场夺权风暴在秘密策划中。根据“总导”的圣旨，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来到这里，会见昨天才乘飞机来北京的上海“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常委陈阿大和王的秘书廖祖康。会见时，点火特使聂元梓也在座。当听到王洪文汇报上海政局混乱、“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时，张春桥当即明确提出夺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随即又表态说：“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他要王洪文等立即回上海，做好夺权的准备。——这种暗箱里的阴谋活动，在毛的红色辞典里，叫“光明正大”！

1967 年 1 月 4 日，根据“总导”安排，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飞到上海。在张、姚、王等人的密谋下，1 月 6 日，由“工总司”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大会上，尽管主角张、姚两人没有登台，但会场上的四幅巨标，明确了他俩接管上海权力的主导

地位：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北京精英们，迅速把那四幅巨标赞誉为“上海人民的心声”；但却对毛“发动群众”的“暗箱”谋划视而不见，有意掩盖了“总导”幕后的决定作用。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落入钦差大臣手中后，“总导”自然喜不自禁地下令发贺电。

然而，事态发展并不尽如上意。尽管张、姚已接管了权力，尽管已发去了贺电，但倔犟的“曹老头”曹荻秋，公然与毛的中共对抗，他毫不畏惧地宣称：**“我是按法律程序选出来的，我仍然是上海市市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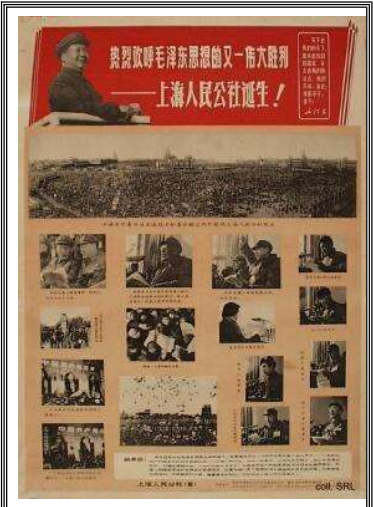
对此，钦差大臣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扑”。12 日，他们便还以颜色，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张春桥传扬了毛泽东曾多次念叨过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借以弹压反抗者，批判“法律程序说”，为夺权的合法性张目。

“曹老头”们没有被镇住。他们成功地利用矛盾，收买了势力强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使他们与“工总司”决裂。当被告知张、姚要夺权时，“红革会”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1 月 25 日，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了上海党政首脑机关的二十三枚印章。也许他们以为，“夺”了印章才算夺权成功；“曹老头”们可没有红卫兵们那么天真，但他们却乐意把印章交给“嘴上没毛”的年轻人，而绝不愿交给那两个钦差大臣支持的“工总司”。

为了警告反对夺权的右派头头们，如“曹老头”等，在中央文革头头们的暗示下，北京红卫兵呼应上海“一月风暴”，便拿被毛骂为“走资派”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开刀祭旗，1 月 22 日，他们把张打死在北京矿业学院里，借以恐吓上海的“曹老头”们。

但上海的“曹老头”们没被吓住。1 月 28 日，“红革会”决议“干掉张、姚”，街头上“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的大字标语，很快被“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的大字标语所取代。1 月 29 日，“红革会”又决定：30 日上午，组织十万人“炮打张春桥”的大游行。

在大联合、大夺权道路上阔步前进的时候，“红革会”的倒戈，使张、姚两位钦差大臣大为恼火。在得到“总导”指令后，立即采取了镇压措施：一方面通过中央军委命令上海驻军支持“工总司”，一方面命令以驻军为后盾的“工总司”，出动数十辆卡车和数万人上街，赶在“红革会”出动前，把守各个路口，把十万反张大游行扼杀掉。对抗结果，“红革会”土崩瓦解！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2 月 5 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成了上海市的新主人。（右图）

在新主人面前，上海“红革会”的红卫兵付出了惨痛代价：两千五百多人被整，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四百四十多人在“学习班”里受审，自杀五人，逼疯六人，毒打致残十多人。五个多月前，即 1966 年 8 月 22 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文件，成了一张废纸。倔犟的曹荻秋，孤军奋战，因寡不敌众，被抓进“学习班”，并被定为“叛徒”，终被打倒、罢免。曹荻秋是个忠于共产党的党员，1965 年始任上海市长，在任职期间，逮捕并处决了为民主、自由呐喊的自由圣女**林昭**；但他并没有因而将功折罪，在“一月风暴”后，被罢免、关押，1976 年 3 月 29 日，病死于上海狱中。

“**学习班**”这个集改造、批斗、审讯、囚禁和劳教于一体的专政组织，被“创造”了出来。这个借“学习”和“群众”之名进行迫害的政治组织，在文革中被广泛采用，其专政的暴虐程度随全国和各地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本来用行政措施就可以解决权力更迭的所谓“一月革命”的上海夺权风暴，以“连续剧”的编、导、演职人员的全胜而落幕！

人们或许要问：按照当时毛泽东的权势，“**一个指头便捅倒**”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有人论证说，因党内右派势力强大才有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看一看毛的一张大字报就能推倒刘少奇的事实，这种“论证”是不充分的。当你考察了“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运作方法后，你就会发现毛式阶级斗争策略的一贯性：毛泽东为了达到分而治之从而战胜政敌的目的，就要利用权力制造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他的“群众”即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的勇敢分子带头，发动一部分群众、并把他们捆绑在他的战车上，造成多数人拥护他的假象，借以威吓和镇压包括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大多数群众。对于这种运作方法，毛泽东称之为群众运动。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中，他屡试不爽。如今，在他导演的上海夺权风暴中，他要如法炮制，把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犹如“村村见血”的土改运动那样。

在“**夺权！夺权！**”超高音的声浪里，由于众多工人、学生、红卫兵和市民被声浪震得浑浑噩噩，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了被权力任意耍弄的群氓：当他们为夺权摇旗呐喊的时候，甚至当他们为夺权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的行动，除了能成

全少数暴发户外，他们自己的贫困境况，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改善，他们的自由权利，也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保障。

21-权力对抗：二月角斗

作者 于松然

二月角斗

1、京西宾馆大拍案（略）

为了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在军队中的势力，毛泽东借贺龙兵变的谣传，向军队发出“最高指示”说，**军队里也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此，军队也要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怀仁堂内外硝烟弥漫

为了支持各地居于少数、处境困难的左派夺权，毛泽东命令军队“支左”。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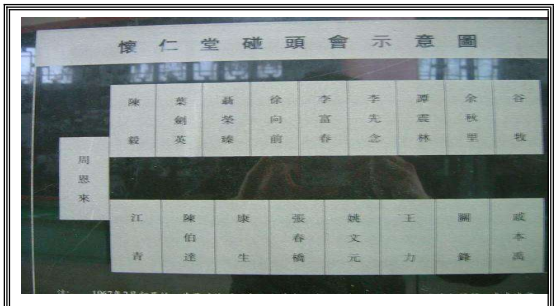
“大闹京西宾馆”使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进一步安抚他们，让他们在“支左”中做出贡献。善于玩弄权术的毛泽东，故作姿态，以批评军队将领们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来笼络军心。2 月 10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常委陶铸），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江二人。其实，批陶铸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就像屡屡干过的“先斩后奏”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帐。实际上，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以取代中央书记处，是毛泽东全面夺权的重要谋略。一时间，毛批评陈、江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并明确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使党内、军内的右派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的搞法憋了一肚子气，也知道文革作祟者是毛泽东，但因惧于毛的权威和手段，便想借毛批中央文革的机会，拿江青、陈伯达出出气。

机会被他们找到了。

2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狠批毛泽东的打手中央文革。叶剑英指着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捌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徐不是不知道，中央文革只效忠毛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为毛所导演；但他们不敢碰硬，不妨也拿软柿子捏捏。中央文革成员因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冒然造次，会上处于守势，偶尔出来辩解一下。2 月 16 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上图）

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会上指斥中央文革成员：**“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泪水夺眶而出。末了，他愤怒地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将去，被周恩来拍案叫回。陈毅更是怒火中烧，炮口直指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他忿忿地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他提到了延安整风，幸灾乐祸又抱怨地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笔者：这次文革被打倒的大员），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没有反过毛主席的人。”“总理（在延安）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谭震林的泪水和陈毅的怒斥令人同情；但在“红八月”里，面对十数万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面对数百被斩草除根的绝户，却未见大员们一滴眼泪，未闻大员们的一声怒斥！谭、陈的怒斥，史称**“大闹怀仁堂”**，被毛左派称为**“二月逆流”**。

盛怒之下，谭震林在会后写信给林彪，大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扬言**“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林将谭信转给了毛泽东。



1967 年 2 月 16 日怀仁堂常委碰头会上排座次

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当上层权贵们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里唇枪舌战、拍桌瞪眼的时候下面各地当权派在中央元勋们的暗中支持下，纷纷向中央文革示威，以软性消极怠工，直接与毛左派相对抗，有的甚至对毛左造反派拉起了硬弓，动了真刀真枪，大开杀戒。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省机关内造反派刚刚组建时，便提着省委、省政府的几十枚公章交给了造反派，表示交权，使全省处于无政府状态；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见大

势不好要挨斗，便自我了断而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比较聪明，中央工作会议后，他便拨款支持右派造反派，使右派造反派变成保护当权派的保皇组织，他躲进军区里暗中指挥……

在“二月逆流”中，除了软性对抗外，还有硬性对抗。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自命“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派军队支左，为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在开国元勋们的支持下，一些支左的军队将领，很快与地方右派当权派勾结在一起：他们把维护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保皇”组织，装扮成造反派加以支持，而真正的左派造反派，则被他们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例如，四川省军区和驻军，同他支持的右派造反派组织，从 1967 年 2 月 24 日到 3 月中旬，就抓捕了左派造反派十多万人，其中，成都抓捕两万多，重庆市取缔和捣毁左派造反派组织 118 个，迫其自动解散 146 个，抓捕 2,253 人。四川省军区打击左派造反派的行动，被史称为“**二月镇反**”。最恶劣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根据军委传达的毛泽东关于“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精神，在叶剑英的默许下，大开杀戒。在 1967 年 2 月 23 日，他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左派造反派 169 人，击伤数百人，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惨案**”！

听到怀仁堂内外这种复杂形势的汇报后，毛泽东龙颜顿显愠色。在 2 月 18 日的一次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大发雷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惯于逢场作戏的他，指着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接着他危言耸听地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他越说越有气，言辞尖刻极端起来：“**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说罢，怒不可遏地甩袖而去。按康生的说法，“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此时，对中共大员心慈手软的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收拾残局，也不得不秉承“伟大领袖”的脾性严肃处置他的得力助手们。碰头会决定：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所谓“请假检讨”就是停职写检查，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称谓。（其实，在中共的词典里，这种词语同“黑帮”、“牛鬼蛇神”一样，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当权者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和好恶加以伸缩。因此，“请假检讨”可以是停职反省写检查，也可以是监禁式隔离审查，如现行的“双规”，还可以是服刑坐牢，如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因被命令“请假检讨”后投入秦城监狱，一坐十五年。）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陈、谭、徐三人被严厉批判后从轻发落，暂时失掉了权力。他们下级就没有那么幸运：赵永夫被撤职，批斗后投进了监狱！

大闹**怀仁堂**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胜利、党内右派将领、元老们受挫而告终。

军队将帅、元老右派们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这种各有胜负但文革小组占了上风的对抗，激化并加速了权力结构的分裂。就在毛泽东“龙颜顿显愠色”后不久，下面还是发生了向毛示威的“二月镇反”和“二二三惨案”。

军队将帅、元老右派们受挫后，善弄权术的毛泽东，指令精英打手们于 1967 年 2 月 23 日和 2 月 24 日，先后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和文章：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明眼一看便知，这是毛泽东在玩弄软硬兼施的权术：在鞭打军队右派将帅和党内元老之后，及时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加以抚慰。

*　　*　　*　　*　　*　　*　　*

本章结语：从十月进击、一月拼杀到二月角斗，上层权力的对抗和搏斗，使中国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导致亿万人挨批挨整，千万人致伤致残，两百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

22-“七二〇事件”

作者 于松然

1、毛到武汉

善于运筹内战的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拟定了乱中夺权的计划。他认为，乱可以打破秩序，从而打破刘、邓长期构建起来的权力结构。1966 年 7 月 8 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 8 月 2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到 1966 年年底，面对右派越来越激烈反抗，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反抗，善于从“敌我力量对比变化”中决策的毛泽东，决心把“**乱中取胜**”变为“内战中取胜”。12 月 26 日，在他的生日宴上，他向亲随宠臣们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在 1967 年 4 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号召打内战。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5 月 25 日，他对全面内战大加赞赏说：“**北京也在分裂成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 月 13 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全国全面内战”终于被毛泽东煽动了起来，其中武汉尤甚！

1967 年 7 月 14 日晚，胸怀“内战中取胜”自信的毛泽东，乘他的专列来到了武汉。先期于上午到达武汉的周恩来，将他接入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奉命到达武汉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大员，同随同毛泽东前来的大员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等和随同周恩来前来的李作鹏等，分别住进了东湖宾舘百花一号和百花二号。

一年前的武汉，毛泽东曾在这里出尽了风头：他兴致勃勃地畅游长江，五千人伴游，十万人立岸欢呼，气势磅礴，巍巍壮观，令人叹为观止。一年后的武汉，已今非昔比。在他的**“全面内战”**的煽动下，大武汉已变成了大武斗天下：由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工造总司”等左派造反派和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右派造反派，两军对垒，武斗频发，不可调和。此行之前，毛泽东已经有了“内战中取胜”腹案：**大联合夺权——夺取刘、邓右派集团的权力**。为此，他修改了“全面内战”的方针，鼓励大联合。他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亲自解决两派纷争，促进两派联合，为全国各地“内战中取胜”——大联合夺权，树立一个样板。

2、武汉混战

天才的毛泽东低估了武汉形势，错估了他的臣民的精神状态。

当北京的将帅元老同中央文革成员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里唇枪舌战的时候，以司令陈再道上将为首的武汉军区，于 1967 年 2 月 18 日发表《严正声明》，谴责造反派的“二八声明”是毒草，因为他们在声明里主张**“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严正声明》促使造反派分裂：一派主“乱”，认为“二八声明”是“香花”，是谓左派；另一派主“稳”，认为“二八声明”是“毒草”，是谓右派。武汉军区以“稳定军队”为借口，从 2 月 21 日到 2 月 24 日，动用数十个连的兵力“支右”，向军事院校左派造反派采取行动，四天中摧毁和解散左派造反组织 24 个，逮捕左派造反派主要领导 175 人，宣布行政管制 43 人，被迫自杀 2 人。1967 年 3 月 17 日，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联手，宣布解散武汉最早、号称拥有 48 万成员的左派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并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大小头头 485 人。

武汉军区对左派造反派的镇压行动，使中央文革非常恼火。他们一方面在 4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向武汉军区施压，一方面鼓励受压的左派造反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以“三钢”、“三新”为首的支持“工人总部”的左派造反派，喊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他们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释放被捕人员的要求，为此，他们组织上万名学生静坐示威，强化了对军区的冲击。

为了对付中央文革和左派造反派，武汉军区打着“支左”的旗号，被他们坚定支持的右派造反派——号称拥有 130 万成员的“百万雄师”，于 5 日 16 日正式成立。以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百万雄师”成员，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基层的市民：有工人、贫下中农，有待遇较好的国营工厂的工人，有收入相对稳定的基层干部，他们都是中共基层政权的依靠力量，是精神上有优越感的组群，都属于“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同生活艰辛的集体工、临时工和一般贫苦市民，比较起来，相对富裕得多，政治地位也相对优越得多。以出身好、成员纯的“百万雄师”，是名符其实的右派；但他们一成立，便打着“左派”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成份混杂的以贫苦老百姓和学生为基础力量的左派造反派。他们骂左派造反派是牛鬼蛇神，是“老右翻天”，放言：**“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在武汉军区、驻军独立师、29师和各级人武部的支持下，“百万雄师”的“铁帚”扫向左派造反派：“谁替工总翻案，谁就是反革命”。左、右造反派矛盾迅速激化。在武汉5～7月里，由“百万雄师”挑起的大小规模的武斗数十起，造成数千人伤亡。其中：

6月17日，双方数千人马在汉口六渡桥处发生武斗。据不完全统计，死100多人，重伤300多人。6月24日，在汉口大智路，“百万雄师”调动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7,800多名武斗人员，向左派“工造总司”占据的武汉市文化局大楼进攻。以中共党员、团员为主的复员军人敢死队，冲进大楼，当场打死28人。其中，广播员**朱庆芳**，是个16岁的小姑娘，看见冲进来的敢死队队员，吓得跪地向“叔叔们”、“大哥们”求饶，却被残忍地活活打死。

武汉连续发生的大规模镇压左派造反派的武斗，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同中央军委一起，在6月26日向武汉军区发电责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对此，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经过半个月的酝酿，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对“626来电”做出了回答。会议认为：**“军区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陈司令的“回答”，公然对抗中央文革。

3、毛的决定

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听取了汇报后，当即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1、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解散“工总”是错误的，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2、“工总”、“三司”、“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3、“百万雄师”是右派保守组织，但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据记载，支持中央文革的“三条方针”是18日敲定的。但实际上，在毛来武汉之前已经形成：**“走，去武汉保陈再道。”**毛来武汉前说的这句反话，就足以证明。

解决方针交给了周恩来等人去执行。15日，毛泽东派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会同军区领导人，反复去江边踏勘和筹办游泳事宜，打算在16日纪念畅游长江一周年之际，再次畅游，再掀一次崇拜高潮。由于“百万雄师”在15日提前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游行中与左派造反派发生冲突，打死了几个人，酿成了“七一五惨案”。消息传来，畅游计划告吹！

7月15～18日，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并主持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18日，根据毛泽东业已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周恩来会议讲话中以“建议”的口吻命令称：**军区在“支左”**

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之前的17日晚上，周恩来已单独向陈再道、钟汉华传达毛的三条方针，劝他俩做好工作，争取主动。陈再道当时表示想不通。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尽管如此，7月19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在恭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的同时，都被迫在会上做了检查。

4、**右派反抗——王力历险**

陈再道说“我做不通”是实话。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后，部队里出现了动乱。

18日的扩大会议一结束，负责在武汉市“支左”工作的独立师**蔡炳臣**政委，怒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当天夜里，独立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蔡政委在传达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怀龙**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第二天牛师长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拍桌子，摔椅子，大叫“**拼了**”。

在牛、蔡师首长的感染下，独立师的战士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王力的“四点指示”。

其实，本没有什么王力的“四点指示”，那是周恩来在传达毛的“三条方针”时，将第一条方针分解成“检讨”和“平反”两部分，因而使毛的“三条方针”变成了他的“四点建议”。由于王力权大气粗，言语蛮横，蔑视武汉军区，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批评军区领导时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蔡炳臣政委在传达扩大会议精神时，蓄意张冠李戴，将体现“三条方针”的周恩来“四点建议”，说成王力的“四点指示”。于是，以讹传讹，周的“四点建议”变成了王力“四点指示”。

军区负责人要独立师领导做战士工作。一个副师长和一个副政委来到军区大院“做工作”时，对战士们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吧**。”

午夜，独立师六台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炳臣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对此,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政委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炳臣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是夜，六部宣传车大喊大叫着批驳“四点指示”，半个夜晚跑遍了武汉三镇。

19日晚，要为“工总”翻案的消息传到370医院后，驻院军人连打三次电话问独立师师部。当师部回电证实后，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许多人大

喊大叫：**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

处在武汉“支左”第一线的独立师，已经走到了“兵变”的边缘。

本来“百万雄师”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三条方针极为不满，因知道是“最高指示”，便强压怒火，也不敢挑战周恩来和谢富治。19 日，王力在武汉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批评军区领导时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接着，王力又在水利学院对左派“三钢”大加赞扬：**“(武汉问题)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消息飞快传了出去，“百万雄师”终于找到了替罪羊，把满腔怒火齐向王力发泄。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笔者：“谭氏”指“血统论”鼓吹者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 3,200 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独立师、29 师的一些干部战士，高呼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当天晚上，军区大院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有“支左”军车和“百万雄师”车辆 273 辆，“支左”军人、“百万雄师”和看热闹的市民有 13,000 多人。他们继续要求谢、王接见，并扬言要与王力辩论“四条指示”。

“百万雄师”的核心领导，已经被告知，“三条方针”是毛泽东确定的，而这个“巨无霸”现就在东湖宾馆里。他们没有精明政治家的远见，愚蠢地决定采取类清君侧行动，揪斗王力，向毛泽东示威，压他改变方针。他们一方面向下隐瞒毛在东湖的信息，一方面同“支左”军人联手，迅速成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到夜半时分，东湖四周都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控制起来，使毛泽东、王力等成了瓮中之鳖。

在毛泽东亲自督导下，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终于在他的眼皮下暴发了。

7 月 20 日凌晨，武汉独立师的六辆卡车，装载数十名独立师和 29 师的全副武装的军人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去东湖造王力的反。他们封锁北门，冲进西大门，解除了哨兵武装，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找到了谢富治和王力。他们质问谢、王，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打成反革命？他们用冲锋枪枪口对准谢、王，威胁他们，要他们宣布“百万雄师”是革命派。他们在草坪上，把前来解围的他们的司令陈再道，打翻在地，骂他是“投降派”。在同谢、王辩论中，愤怒的造反派依照“专揪”计划，将王力绑架上车，掳劫到军区。

历史值得遗憾的是，陈再道上将不过一介武夫，他错过了取而代之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

7月20日上午九时，开始批斗王力。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此起彼伏，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将反剪着双手的王力推到阳台上示众。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造反派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当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时，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时，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这种顶牛式的回答，激起更加愤怒的呼声，有人喊出了“王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批斗中，王力遭到了围攻殴打，脚踝骨折，还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

与围攻王力的同时，“百万雄师”向毛泽东示威的大游行开始。据统计，大游行各种汽车有396辆，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独立师）、8216（29师）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成装甲车10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有的军人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左派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

与此同时，独立师散发了“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

“百万雄师”也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由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公然挑战毛泽东，武汉军区领导层十分害拍。政委**钟汉华**和副司令**叶明、孔庆德**等人来到大院内，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愤怒的造反派和军人根本不听。面对事态，钟汉华大声喊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可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呀！**”他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位“百万雄师”造反派愤怒地指责他说：“钟政委，你太不像话了。”

后来还是副司令孔庆德急中生智，使事件发生了逆转。他与29师政委**张昭剑**咬了一阵子耳朵后，促使支持“百万雄师”的张昭剑临阵倒戈，调29师两个连的兵力，与军区警卫营密切配合，利用吃饭的机会，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转移到29师师部的六号楼，当晚，又利用夜幕将王力秘密转移到西山，脱离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控制区。

5、毛泽东夜半逃生 （回本章目录）

瓮中的毛泽东，已成了惊弓之鸟。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急促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这里！”惊魂未定的毛泽东，又被“咣当”推开的门声吓了一跳。警卫员**小高**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

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学张学良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在惊涛骇浪中数十年的毛泽东，很快冷静了下来。他要小高要通**刘丰**的电话。

电话很快要通了。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等待什么！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恨恨地吸了一口烟，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乘着夜幕和树丛、花丛的掩护，急步向后院走去。

当穿越一段草丛时，毛泽东“哎哟”了一声。杨代总长弯腰一看，发现领袖没穿鞋子，一双拖鞋被荆棘扎透了。他慌忙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领袖穿上，自己穿上领袖那双拖鞋，慌乱中忘记了检查领袖脚上是否有伤口。不过，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满意地笑着说：**“难为你了**。”过后，每当代总长想起那段疏忽事，内心好生不安，但当想到“难为你了”那句话后，心地又轻松得多了。

三个人急匆匆地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又翻过了一个斜坡，来到了东湖后门。所幸那里无人把守。

小高拧开了“将军锁”，打开后门，他们纵步来到停在沙滩上刘丰为领袖准备的轿车旁。毛泽东突然仰天笑道：**“陈再道一头蠢驴。在后门放上一个班，我们就难以走脱。真乃天助我也！”**说罢，钻入轿车，飞也似地奔向戒备森严的专列。

专列虽然戒备森严，但在动乱的武汉极不安全。众人劝他迅速离开武汉，正合他的打算。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国内旅行从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向代总长下达命令。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善于巧设疑兵的领袖说：“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半途，他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命令道：“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的确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从汽车上下来，朝飞机走过来。

杨成武说：“你们看见了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惊讶不已的战士们立刻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毛泽东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这时，毛泽东才示意杨成武告诉机长：“去上海！”

21 日上午 11 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6、左派反击

1967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在谈到武汉问题时，发出了“最高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这种左右逢源、始终主动的话语权，是毛泽东独自享有的。但对这种“左右逢源”的“最高指示”，大员们是心领神会的。

7 月 22 日，下午两点多，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到了北京。领会了最新“最高指示”的北京大员们，组织了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谢、王、李等英雄们。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先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向武汉军区示威。

当晚，林彪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历史表明，21 日下午，包围武汉的军事部署已经开始：会议期间，25 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火速向武汉开进；15 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已运动到距武汉四、五十公里的黄陂；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已先达汉口口岸待命……

22 日凌晨，在最新“最高指示”前，中央文革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组织“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的肇事者。同时胁迫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余将领于 23 日飞抵北京，参加“学习班”。在京西宾馆，陈、钟遭到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斗。

24 日，空 15 军的多支队伍，开进武汉市，迅速部属到指定位置。25 军也到达要地，东海舰队 30 多艘舰艇也先后云集到武汉。“支右”的独立师，被调出武汉整训。

25 日，毛左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回京，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都出席了大会。

当天，在武汉，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呼着“打倒陈再道”、“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

“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口号，向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示威。

26日，业已瘫痪了的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指出：一、“七二〇事件”是严重政治事件；二、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立即给“工人总部”平反，向朱洪霞、胡厚民等赔礼道歉，并恢复名誉；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7月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罪行。空军司令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便领着刘丰等将领冲了进去，抓掉陈、钟等五个人的领章、帽徽，进行拳打脚踢，把陈放倒在地。据说，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对此“很有意见”。在另一次批斗会上，目击者写道：**“陈再道下午就尝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厉害，今天一上台就吓得手脚不灵，浑身冒冷汗，站在那里活像一堆没了筋骨的死肉。”**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令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指控为“黑后台”。同时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提升“七二〇事件”功臣武空副政委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自1967年7月26日到8月2日的一个星期里，《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主要喉舌，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抨击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把**“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的“精神实质”推向高潮。这些社论、报导是：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北京支持你们！》

……

在左派反击中，许多落井下石之徒沓沓亮相，纷纷“反戈一击”：

8月17日，扮演“支右”脚色的独立师，以左派姿态发表了《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七二〇”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的调查报告，表示效忠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10月28日，曾大肆镇压左派造反派的“百万雄师”打手们，摇身变成左派“公安联司”，也以左派姿态发表了《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文章，揭露“百万雄师”的罪恶活动，等等。

1967年7月27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土崩瓦解，尽管他们在24日做最后挣扎：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在高呼“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的同时，继续狂呼“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历史清楚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从7月14日到21日的7天里，毛泽东不但没有树立起一个大联合夺权的样板，反而鼓动仇恨，加剧冲突，使武斗规模更大，更加血腥！

武汉惨局

同全国左派造反派一样，他们的头头大多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平民出身。“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们过着无权无保障的贫民生活，他们对中共官僚特权阶级深恶痛绝，因而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成了他们的渴求，也成了他们造反力量的渊源。但在十七年中，他们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想的熏陶下，“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如过眼云烟，已丧失殆尽。他们从贵族红卫兵、右派造反派那里，看到人类兽性张扬的价值。因此，当他们被套到造反战车上时，他们便走到了他们渴求的反面，用你死我活回敬对方，在冲锋陷阵中，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同北京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一样，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个卒子，他们看不见中共党内左、中、右派之间的冲突，**只是权力再分配上的较量，没有根本利害上的冲突**，无论那一派都是官僚特权阶级，而毛泽东则是这个特权阶级的总代表。因此，当“卒”子“过河”后，他们会发现，一旦左派把右派打倒，或不得已与右派成功妥协，他们的价值转瞬即逝，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他们这些“过河卒子”。那时，后悔晚矣！

“七二〇事件”后，左派造反派胜利了；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好一阵子得意，好一阵子疯狂！得意中，他们趾高气扬地目空一切；疯狂中，他们清剿残余“百匪”，残忍地报复杀人，主动或积极协同军方追捕逃亡的“百匪”头目，等等。据湖北省委统计，“七二〇事件”之后，在“清剿”与反“清剿”的战斗中：全省被打伤、打死的人高达 18.4 万；在武汉，打伤、打残者高达 6.6 万人，打死 600 多人；其中，多数是曾经不可一世过的又被骂为“百匪”的“百万雄师”成员。——这就是毛泽东来武汉树立大联合样板的成果！

左派造反派的出身背景形成的思想意识，证明他们不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们在革委会中得意了不到两年，因看不惯中共特权阶级的专横跋扈，打起了“反复旧”的旗帜，与新贵们对抗。很快，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中纷纷落马，右派政变成功后，他们的头头如**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等被追判重刑，其中曾诵诗铭志“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的“工总”头头**胡厚民**，因“顽固不化”，拒绝认罪，被科以 20 年重刑，九十年代死于狱中。

左派造反派没有右派造反派幸运。右派宫廷政变成功后，湖北省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研究后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于是，曾在 1967 年 7 月 18 日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1978 年 11 月 26 日被邓小平彻底平反（右图）。“百万雄师”平反后，他的一号头目**俞文斌**，这个曾组织过数十次武斗，造成数万人伤亡的罪孽深重、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文革中虽坐狱四年（据说他曾亲手射杀过多人），文革后却得到补偿：他先后荣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等要职。



邓小平为“百万雄师”平反

“七二〇事件”的制造者呢？支持武汉左派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四人帮”，同

与事件没有太大关系的林彪一起，被推上了镇压“百万雄师”的被告席；而另一个事件制造者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则在被撤职而“委屈”了几年后，又返回了大军区领导的任上。当年大肆批判“百万雄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呢？他们摇身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成了“百万雄师”赞扬者，没有丝毫知耻负疚的表示。

“七二〇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和现场导演毛泽东呢？在中共党内右派掌权后，林彪、“四人帮”成了他的替罪羊，他本人则在右派蓄意掩盖下，仍旧是那样“伟大、光荣、正确”！

23-分裂军队挑动武斗的“八四指示”

作者 于松然

“七二〇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由于右派军方和地方右派当权派的联合支持，右派造反派很快形成了对左派造反派的压倒优势，武汉拥有 130 万之众的“百万雄师”，以数倍的“兵力”压倒了以“三钢”、“三新”为首的左派造反派，郑州十多万人的“十大总部”，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区区数千人的左派“二七公社”，等等，就是这种党、政、军内右派联合支持的结果。因此，全国各地左派造反派，纷纷向中央文革告急，尽管“百万雄师”在中央巨大压力下已土崩瓦解。

军队“支右”举动，使善弄权术的毛泽东大失所望。为了不使夺权斗争毁于右派将领之手，毛泽东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做出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两项重大决定。

1967 年 8 月 4 号，穷兵黩武的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下达了“**应大量武装左派**”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高指示”。史称“**八四指示**”。这封信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宣读并交付执行。在毛泽东看来，“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相辅相成，都是制约党、政、军内右派当权派专政的手段：不把专政权力交给他的“群众”，“武装左派”会变成“武装右派”，“走资派”就会专“群众”的政；没有“武装左派”，右派就会当道，“群众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上海“武装左派”工人和学生，确保了左派政权的稳固；北京“红八月”里的喋血，鼓舞了各路红卫兵“横扫”、破“四旧”的士气，就是“群众专政”的典范。

1、武装左派——鼓动抢枪

早在“八四指示”前，毛泽东已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并在高层传开。7 月 18 日，他在东湖梅岭一号对周、谢、王等近臣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他还夸“钢工总”工事修得好，表示要去看看。——这就是后来称谓的“**七一八讲话**”。当获悉毛泽东“武装左派”的谈话后，7 月 22 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便提出了“**文攻武卫**”口号，号召左派造反派武装自卫。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8 月 11 日，在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时，他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有人说，“武装左派”的左派，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由谁来界定？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毛泽东喜欢政策的模糊性**。模糊性使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有了广阔的游刃空间：左或右均可按“政治需要”和“个人好恶”来界定，而且能使界定达到左右逢源、横竖是理的境界。这是毛泽东的重要统治权术之一。

在毛的“七一八讲话”特别是“**应大量武装左派**”的“八四指示”在上层传达后，“支左”部队向造反派发枪和造反派主动夺枪事件，相继在多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并很快形成了抢劫武器运动；冲击军事机关、抢掠武器库事件也从武汉、北京向全国蔓延，各地左、右造反派纷纷加入了抢劫武器行列。

8 月初，林彪感到事态严重，有些坐不住了，他要下文严禁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枪枝，但毛泽东否决了他的计划。8 月 5 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的计划批示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显然，他支持夺枪；一句话打消了林的计划。这就是后来所称谓的“**八五批示**”。

8 月 1 日，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发表了。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的社论，再次强调了毛泽东“武装左派”和“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向军内右派将领发起猛烈攻击。

从“七一八讲话”到“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人们看到了一条分裂军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决心要与他“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军队分道扬镳！

但形势並没有完全按毛的意志发展，毛的乱军的谋图受到了强烈的对抗。“八四指示”后，各地右派造反派从中汲取教训，在各地右派将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他们也像左派那样，疯狂地抢夺枪枝弹药，胆大到敢于把支援友邦越南的“抗美援越”军用列车洗劫一空。很快，他们不仅在人数上而且武器装备上，都对左派造反派构成优势，成了各地武斗主要挑起者。这样，右派将领们成功地将“支左”变成了“支右”。

据曾担任过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道远**回忆：“1967 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还发来文件，有‘武装左派’的精神。我和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几个人去找时任 15 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要求发枪。**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单给你们发枪其它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我马上召集会议，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他还说：“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还打过靶，此事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

据不完全披露，在毛泽东“七一八讲话”后的一个多月中，发生了数十起抢劫武器事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在**浙江**，7 月 21 日，温州军分区所属的 6515 部队 6 分队、防化连及军械库的武器，遭两大派组织抢劫。被抢武器中，除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外，还有 60 炮、82 炮、122 榴弹炮等重武器。8 月 5 日，受驻浙江 20 军支持的右派造反派“省联总”头头

张永生等人，组织千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骗开大门，强行砸开仓库，将 1,000 多件枪械和价值约 40 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9 日，张永生再次组织上千人，抢走省军区军械一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手榴弹万余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5 日和 9 日，两次共抢劫走长短枪 1,900 余支，轻重机枪 523 挺，炮 40 门，子弹 120 万余发，手榴弹 1.69 万余枚。

在**四川**，7 月下旬以后，泸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就被造反派抢劫 21 次，被抢步枪 2,481 支，轻机枪 115 挺，重机枪 12 挺，手榴弹 115 枚，各种炮 72 门，子弹 28.4 万多发。8 月下旬，重庆市北碚地区造反派武斗人员 2,000 余人，冲进 404 团营区，抢走枪支 3,000 支，轻重机枪 49 挺，炮 16 门，枪弹 16 万发，手榴弹 8,000 枚，打死指战员 2 人，抓走 18 人。

在其他省市（略）

由于军队内“支左”分歧严重，使造反派抢枪、武斗的规模不断升级。

对此，毛泽东对他的“八四指示”所引发的全面大屠杀毫无悔意。1968 年 7 月 28 日，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时，他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武斗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造成 100 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伤残的“全面内战”，竟获得了他的赞扬，再次凸现了他嗜血的本性。——这就是曾被御用作家们描绘为**“怕泪、怕血、怕死人”**的“伟大领袖”！

2、群众专政

对于“八四指示”中的**“群众专政”**问题，毛泽东解释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在“横扫”、“红八月”和而后的武斗中，抓人、私设公堂、打人、杀人和大兴、昌平大屠杀等野蛮暴行，都被毛泽东肯定了。一年后的 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时，再次肯定了北京的“群众专政”：**“过去北京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谓的“群众专政”，就是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它的实质是**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论的有力证据之一！

在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号召下，特别是在北京红卫兵和民兵大屠杀被最高领袖赞扬之后，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迅即丧失功能；与此同时，“抓促小组”、“群众专政法庭”、“人民最高法庭”、“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名目繁多的“群众政法机关”，在毛的“群众”痞子、无氓无产者的组织下，纷纷登台亮相，开始疯狂地反人类的大屠杀。

“群众专政”颠覆了“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的华夏文明，解放了人的兽性，使法制崩溃，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在这种人造的政治情势中，毛泽东的那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变成了人们效法“说一套，做一套”的样板。其中：

1967 年以湖南省道县的“群众专政”为最。据官方统计，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的 66 天里，道县全县 36 个公社 1,590 个生产队，经“抓促小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杀 4,193 人，逼迫自杀 326 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 10 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共杀 3,503 人，逼迫自杀 1,071 人。全地区（包括道县）被杀 7,696 人，逼迫自杀 1,397 人，致伤致残 2,146 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 3,576 人，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贫下中农 1,049 人，其他成份 411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

1968 年以广西的“群众专政”为最。据报导，在 1968 年广西全省杀死的十多万人中，有 4～6 万人是在省革筹委（政府）的“七三布告”号召镇压“阶级敌人”后，由县、公社、大队等政权机构用“群众专政”的办法杀死的。其中杀人上千规模的市县有：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3,681 人，其中，国家干部 51 人，教师 87 人，工人 27 人，集体工 75 人，农民、居民 3,441 人，176 户全家灭绝；**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3,138 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 263 人，教师 156 人，学生 47 人，居民 106 人，农民 1,311 人，其它 1,255 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 2,051 人，其中，国家干部 326 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 3,222 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 500 人以上，287 个大队都参与屠杀；**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 1,128 人，其中，干部、工人 556 人；**天等县**杀死、害死 1,651 人；**上思县**杀害了 1,701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 1．33%。

毛泽东领导下的“群众专政”，仅在中国贫苦的农村，从 1966 年 8～9 月以北京大兴县为代表的大屠杀起，再到 1967 年 8～10 月以湖南道县为代表的大屠杀，直到 1968 年 8～9 月以广西宾阳为代表的大屠杀为止，毛泽东就完成了从杀几百人再到杀几千人直到杀几万人的**“群众”屠戮三级跳**！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群众专政”中，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甘肃、江西等省的县城和农村，都发生过与道县、宾阳类似的屠杀，其规模、时间和波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在毛泽东有领导的“群众专政”屠杀中，中共各级权力部门都有不俗的表现：乡社和大队一级肆无忌惮地大砍大杀，但也有不少地方按兵不动；县级暗中支持或公开纵容，但相当多的县级作壁上观；省、地市级装聋作哑或熟视无睹；“群众专政”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呢？他们在号召、鼓励和怂恿之后，便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和形势的发展，最后出来“纠偏”，继续扮演“**大救星**”的脚色！

据估算，在 1966 年之夏到 1968 年之秋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县城和农村，有 10～30 万人被“群众专政”杀害，伤残不计其数。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实质上是纵容、煽动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3、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 年的夏天，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当人们听到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最高指示”后，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被裹胁到“群众专政”中，并在那里呐喊、疯狂、颤栗和呻吟！但疯狂的造反派们并不满足，他们高举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革命红旗，把“**解放全人类**”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群众专政**”，推出国界。1967 年 1 月 25 日，69 名留学生回国途中，到苏联莫斯科红场上造反。他们高声朗读着毛的

“反帝”“反修”语录，扬言要对苏共修正主义实行“群众专政”，因而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导致多人挨打负伤，酿成了红场血案。在巴黎的留学生，当听说留学生在红场上挨了打、流了血后，立刻带上刷子，提上油漆桶，列队前往苏联驻法大使馆前写抗议标语。当他们走到半路时，便被法国警察截住，不仅挨了打，还被法警用囚车押送机场，逐出法国。

“解放全人类”的“群众专政”在国外失利后，造反派把“反帝”、“反修”的目标，指向外国驻华使馆。

1966～1967 年间，由于红卫兵、造反派的造反行动，使中国与已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国家，先后发生过外交纠纷。继 6 月 18 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 月 3 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后，到了 8 月，疯狂的红卫兵先后火烧了印尼驻华大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处。

为了“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的中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周恩来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受命于中共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政变，处决了一批高级将领。然而，政变失败了。政变失败后，拥有 200 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遭到了残酷镇压，数十万印尼华人也因而丧生。1967 年 8 月 5 日上午，上千印尼人，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狂呼着反华口号，冲进了大使馆，打伤了四名中国外交官，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当晚 8 时，他们决定对印尼实行“群众专政”：他们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制造了第一起火烧外国大使馆事件。

火烧外国驻华使馆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右图)


火烧英国代办处

近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很难避免国内造反和“群众专政”的影响，而大陆驻港机构，已奉命在港输出革命。

8 月初，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年报》等三家中共报纸，奉命刊登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号召香港民众起来造反，推翻港英当局和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当香港的主人。香港舆论哗然。港英当局立即采取行动，武力查封了三家报社，并逮捕了 19 名新闻记者和三家报社的 34 名工作人员。香港政府这一举措，犹如火上浇油，激怒了中共支持的港九地区造反派，他们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港九，要让“群众专政”取代港英当局。8 月 4 日，首都新闻界召开盛大集会，“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斗争”，中共中央大员们和受毛泽东、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姚登山，都亲临现场，为大会助威。几天后，广州地区的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摸过尖沙嘴港穗分界线，缴了港英当局边防警察的枪。8 月 7 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可以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8 月 16 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要求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

香港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楼价暴跌 90％；8 月 4 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开来香港压惊。

8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的“滔天罪行”，要求港英当局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三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与报社工作人员。接着，他们在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与此同时，由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对代办处采取“革命行动”。

8 月 22 日晚，外交通牒的四十八小时时限到时，外交部“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人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由外语学院、外交部为主的约千人红卫兵和造反派，于 22 时 40 分，分别从西墙、北墙、正门三面冲进代办处。他们在代办处内进行革命：捣砸各类器物，放火焚烧东、西院楼，烧毁了卧室、车房、油库和 9 辆汽车，烧光了室内存放的档案，对英国进行了一次令世界瞠目的“群众专政”。

据报导，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英国临时代办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纷纷逃离代办处：临时代办逃到使馆后面的印度使馆，躲在大门后；逃到芬兰使馆的两位姑娘，受到了保护；几位女士，逃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被拒于使馆门外，惊恐万状……

当年，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恩做了这样的记载：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群）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的排外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导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红卫兵涌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点燃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破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

“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齐躲进了保险库，……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通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当年，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 5000 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像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像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召开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

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行动**。”

8 月底，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一场外交史上的大丑闻，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本已孤立的中国外交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及其左派的倒行逆施，颠覆了保护外国使节的现代文明，使党内右派抓住了左派的把柄，有了反击的口实。

24-挫败“清君侧”

作者 于松然

“八四指示”后，国内形势迅速恶化，支持中共的基本群众怨声载道，军队已处于分裂的边缘。对此，右派高级将帅们忧心忡忡，担心他们用血肉打下来的江山会因“武装左派”而毁于一旦，使他们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继“二月逆流”失败后，他们悄悄重整旗鼓，悄悄“逆流”而上，李商隐的两句诗在“逆流”中悄悄扩散：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1、主动妥协

熟读经史的毛泽东，对古代“清君侧”的史事如数家珍，十分清楚：

——汉景帝初年，刘氏宗室诸侯国势力强大，往往与朝廷分庭抗礼，威胁中央权力。御史大夫晁错向皇帝上疏，建议削藩，为汉景帝采纳。对此，当时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藩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为了平息叛乱，汉景帝将晁错杀掉，但叛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景帝始决心平叛。三个多月后，刘濞被杀，叛乱方止。

——唐武则天称帝后，男妾专权，引起朝廷大臣们的不满。神龙之春，宰相张柬之趁武则天重病卧床时，发动政变，带军队进宫杀掉了张易之两兄弟，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宰相武力“**清君侧**”，取得了成功。（这是深藏于毛泽东心底的“张柬之情结”，因而是他制造系列冤案的“秘密情结”。）

——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讨伐奸臣杨国忠”的名义，从幽州（今日北京）起兵，直捣京都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清君侧**”取得了成功，迫使玄宗杀了杨国忠，勒死杨贵妃，但他却兵败被杀，而唐朝也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清君侧**”事件，当属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年轻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接受齐泰、黄子澄等大臣的削藩建议，着手进行削藩。盘踞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对此极为不满，他打着“诛杀齐、黄，清君

侧”的旗号，发兵攻入南京，废朱允炆，自立为帝，改年号为永乐，是谓明成祖。

熟悉这些历史事件的毛泽东，听到李商隐诗句的传闻后，不免有些吃惊！

抢劫武器运动的快速发展，使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涉外事件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使中国威信扫地，这都是他始料不及的，而党内右派和中间势力的暗中手脚，又使局面快速向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着实令他头痛。他十分清楚，他是这种恶化局面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澜者。他的“伟大、光荣、正确”光环也使他从未公开做过自责，更不用说下“罪己诏”了；但他的天才在于：处变不惊和冷静观察。

毛泽东发现，在造反派中两股令他担心的“逆流”正在形成，正在给恶化的形势推波助澜。一股是左派造反派，他们像群脱缰的烈马，不听招呼，任意狂奔，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控制，正在向右派异化；其中，有的竟提出“巴黎公社选举原则”，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有的大反“血统论”，力图批判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已经超越了他设定的造反底线，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右派。另一股是右派造反派，他们已经极左化：任意揪斗、残害中共当权派，任意制造事端、挑起武斗、镇压左派势力，任意制造红色恐怖，实行红色大屠杀。

对于左派造反派，他早有所料：他们是一股可以利用不可以重用的势力，他们只能充当向右派当权派即“走资派”夺权的主力和炮灰，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诉求，注定是新生政权的专政对象。对于右派造反派，他早有定论：只要他们能摆脱党内右派的控制，并反戈一击，同左派联合夺取“走资派”的权力，他们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但他最担心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对于前者，一个命令就可以镇压下去；而后者则不那么简单，他们在党、政、军内有靠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镇压他们势必引起链锁反应。

他已看准了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夺权动向：他们以“以乱制乱”为策略，支持和纵容右派造反派，力图把水搅混，借以干扰和转移向“走资派”夺权的大方向；他们蓄意挑起事端，滥杀无辜，制造党群、干群间的对立，为重新掌权制造口实，创造条件；他们挑动右派将领，以“支左”名义“支右”，镇压左派造反派，制造军队的分裂。

在反夺权的动向里，他还看到了“三老四帅”的影子。元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和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大员，在“二月逆流”中，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没有伤及他们的元气。一旦局势继续恶化，在下面，他们会得到强悍将军们的支持，在上面，他们会得到朱德、刘伯承等老右倾们的联手，甚至还可能得到周恩来、林彪等人的青睐；他们就会重新扛起反对中央文革的大旗，效法古代“清君侧”的故事，发动政变，逮捕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大员，武力要挟他就范。到那时，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毁于一旦。

毛泽东冷静观察之后，他做出了以下判断：为了不让“八四指示”发展成右派发动清君侧政变的口实，必须用稳住军队、强调秩序和纪律的策略，来挫败右派政变的谋图。于是，他开始调整自批《海瑞罢官》以来的进攻态势，亦即弱化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烈度，约束红卫兵、造反派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倾向，强调大联合，强调“复课闹革命”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等等，不断向右派示好，8 月 12 日，他又发出了“**‘党内、军内一小撮’提法不策略**”的指示，淡化他早先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主动与党内、军内右

派修好，并做好了与右派适当妥协的计划。

但妥协计划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时日。期间，如果有一个鲁莽将军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揭竿而起呢？怎么办？

正当他为实施新的谋略冥思苦想的时候，周恩来的“建议”送上门来。

8 月 4、5 两日，毛泽东发出了“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后，周恩来听到了“清君侧”的唐诗，也触到了军内“清君侧”的潜流，预感到中共大厦将面临倾覆的危险。

在文革中，周恩来同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并肩战斗，都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但他同江、陈等人并不完全同路。在“横扫”、破“四旧”和镇压弱势群体上，他们志同道合，目标一致；但在如何对待干部、对待军队特别是对待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八四指示”后，他们的分歧更加鲜明。

周恩来十分清楚，毛泽东并不信任他，一直通过中央文革对他实行监督：江青经常指责他“和稀泥”，甚至拿“伍豪事件”要挟他，就是这种监督的证明。他早想扳倒以江青为头领的江左们，苦于没有机会；“八四指示”后，江左们更加飞扬跋扈，特别令他反感的是，江左们根本不把他这个总理放在眼里，肆意在他主管的外交部里寻衅滋事。当听到毛泽东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后，他发现了转机，开始寻找整治江左们的机会。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他决定派代总长杨成武代表他，向毛泽东秘密进谏：状告中央文革小组，并报告他的提防“清君侧”的建议。

为此，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据《周恩来外交文选》记载，8 月 25 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话中，他向杨成武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他特别提到了**王力**在 8 月 7 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提到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连锁反应怎么办？他要杨向毛报告他的主要建议：**“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经验老道的周恩来，并不直接状告“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策动者的后台老板江青，而把矛头对准江青的亲信**王力、关锋、戚本禹**，力图斩断江的左右手，并让江左集团的王、关、戚当替罪羊；也不直说军内“清君侧”的潜流，而突出毛泽东当前最关心的军队稳定问题，暗示毛泽东应自“清江侧”，以挫败他人“清君侧”。据说，周恩来后来曾这样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但对王、关、戚的后台老板——毛泽东的前台打手江青的分裂、破坏活动，却视而不见。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奏折”后，领悟到周的暗示。经过整整一天的掂量、权衡，他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

2、 抛出忠君打手“王关戚”

据报导， 8 月 25 日上午，杨成武在周恩来处受领任务后，当即肩负重任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的“建议”。他还按周恩来的布置，带去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等人起草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等文稿，面呈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看着他早已看过并曾加以认可了的文稿，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先去休息，说“**考虑考虑**”再说。经过整整一夜的掂量和权衡，他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上午，他召见杨成武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敢怠慢？安排好飞机后，迅速回到毛泽东的住处，聆听“最高指示”。

毛泽东狠狠吸了一口烟，吐出后，在弥漫的烟雾中缓缓地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赶忙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做出了记录的架式。只听毛泽东不紧不慢、一字一板地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 月 26 日下午，杨成武乘机飞回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异常兴奋，当即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解决。他决定晚上在钓鱼台召开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小型碰头会，并嘱秘书在会场外布置十多名军警，随时执行逮捕任务。考虑到王、关、戚都是中央文革大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老谋深算的周恩来，采取分化战术：把计划密告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取得了陈的支持，分化了小组的领导层，确保了逮捕行动的顺利进行。

是晚，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先后走进会场，坐到指定的位置上。除陈伯达外，他们都不知将要发生的事，都在谈论者近几天发生的文革新闻。

碰头会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肃地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

与会者都习惯地拿出笔记本和笔，做好了记录“重要决定”的准备。王力、关锋、戚本禹“三大才子”，不仅做好了记录准备，按照他们的思惟定势，他们还要猜想这个“重要决定”可能内容，甚至联想到这个“可能内容”将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当周恩来照本宣读杨成武的记录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大变，颤抖的右手已无法运笔记录了。不知情的江青，顿时脸色大变，一下损失了三员大将，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事先已被告知的陈伯达，正襟危坐，目光迷惘，已经在思考这个“重要决定”对他的工作的重大影响了。

“**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后，在会场外等候的军警迅速走了进来，把王力和关锋逮到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地方。从轻发落的戚本禹，几个月后，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经过秘密穿梭，不费一枪一弹，周恩来成功达到了“清江侧”的目的！

从周恩来一个人的秘密“奏折”，经杨成武一个人的秘密穿梭，到毛泽东一个人的秘密决定，最后到周恩来等几个人的秘密执行，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中共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及其运作方式：**独断加暗箱**——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又一大特色。

”王关戚“何许人也？王者**王力**，原中共中联部副部长，曾当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宣传组组长(宣传部部长)；关者**关锋**，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戚者**戚本禹**，原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秘书局局长。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央文化革

命小组宣告成立。王、关、戚三人，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时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同时被尊称为“中央首长”，因而，同时发飙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

王力（1921～1996），原名王光宾，1921 年 8 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 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期间，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过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在中联部，他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十次去莫斯科，成了《九评》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1965 年 9 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起草工作。1966 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了中央权力中枢。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和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上的历次讲话文稿中，都有他的手迹。他善于揣摩“圣意”，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一号笔杆子；他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促成“七二〇事件”中，曾大显身手，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一大功臣。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他效法“伟大领袖”口吻说的“八七讲话”，成了他倒台入狱的罪证。这位曾在 7 月 25 日天安门广场上，被一百多万人热烈吹呼为“胜利归来的英雄”的他，刚当了一个月另一天英雄，便从巅峰上跌落下来，跌进了秦城监狱。

关锋（1919～2005），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 年 7 月，生于山东庆云县。1933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等职。1956 年，调任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38 年改名为关锋，使用至今。1964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他立马跟上，撰文大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来，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1966 年 4 月，他被钦点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不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工作。由于他善于揣摩“圣意”，很快取得了信任，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二号笔杆子。他伙同戚本禹成了揪斗彭德怀的策划者和主使者。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主持《解放军报》、《红旗》工作中，他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又一大功臣。然而，到了 1967 年 8 月 1 日，他主持的“八一社论”，学着领袖的口吻，大讲起“揪军内一小撮”来，受到了毛的赞许。但由于“理无常是”哲学水平不高，他没有料到，不到半个月，“伟大领袖”竟改变了口气，使他栽了个大跟头，一下子栽进了秦城监狱！

戚本禹（1931～），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 年生于上海市，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初，他从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1963 年，他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给李秀成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如，他在文章中说，李是太平天国的叛徒。他的这个观点，虽受到了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好感。毛在他的文章旁边，批了否定李秀成的 16 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他由此而发迹。1964 年，戚本禹得到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政治上十分敏感且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当看到姚文

元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批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受到了启发，很快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再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姚文导致吴晗夫妇监毙，女儿神经错乱自杀于狱中，戚文致使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于北大校园。1966 年 5 月 22 日，他取代田家英掌管秘书室工作，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密大权。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的自杀，使他很快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5 月 28 日，35 岁的他，荣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挤进权力中枢，一跃成了“中央首长”。年轻得志，血气方刚，权欲强烈，头脑发烧，其革命热度远非王力、关锋所能攀比，成了中央文革第一大杀手。由于他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经常深入第一线，亲自策划、指挥红卫兵和造反派造反、夺权，又被誉为“戚大帅”。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戚大帅”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属，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例如：他指挥红卫兵把毛的死敌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打断了彭的肋骨；3 月底，他著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把刘气得口吐鲜血；8 月 5 日，他组织和指挥红卫兵造反派在中南海内造反，批斗刘、邓、陶，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翻在地；8 月上、中旬，他同中央文革其他要员，支持姚登山打倒陈毅，夺外交部的权，支持向港英当局发最后通牒，最终导致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他这种不顾一切的打手脚色，使他成了党内右派眼中钉，肉中刺，当领袖改变方略向右派妥协时，他不可避免成为牺牲品。随着他的倒台，一大批人因株连而遭清洗，仅北京市一地，就“清理”出戚派人物 150 多个。党内右派政变成功后，恶迹斑斑的王力和关锋，都被免于起诉，而这位为毛泽东立过大功的“戚大帅”，却被判 18 年徒刑。正是：

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打倒他的功臣王、关、戚呢？

善于用真假搀和来打扮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说，一是王力于当年 8 月 7 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观点极左，二是王力、关锋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的那篇“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他们甚至指证说，毛泽东看到“八一社论”和“八七讲话”后，忿怒地批道：**“大、大、大毒草！”**

实际情况并非像御用史家们说的那样。作为毛泽东的打手，不论是“八一社论”，还是“八七讲话”，或是策划外交部造反派的“揪陈大军”揪斗陈毅，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事件，都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决定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全面内战”**、**“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等一系列“最高指示”逻辑发展的结果。

王力“八七讲话”的极左观点是什么呢？王在讲话中说，要打倒陈毅，要夺外交部的权。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等等。

那么，在夺外交部的权和揪陈毅问题上，毛泽东持什么观点呢？**“全国展开全面内战”**

是他号召的，**“一月夺权”**和尔后的全国夺权风暴是他煽起来的，造陈毅的反，夺外交部的权，他也是支持的。7 月 1 日，他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王力“八七讲话”后的 8 月 17 日，他还在说：**“外交部问题，对陈毅我也不那么高兴。……对陈毅这样的人，我，林总，总理有什么办法，这是要靠红卫兵……”**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指毛）**的原话的重复**。”

紧跟毛泽东状告王、关、戚的周恩来，在夺权和揪斗陈毅问题上又持什么立场？1967 年 1 月 17 日，他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说：**“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1 月 20 日，他在接见二机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巴黎公社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我们是用暴力保护你们夺权**。”1 月 21 日，他在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时说：**“政治统帅一切，要全面夺权**。”1 月 29 日，他在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有些单位不一定是这样也要夺……”**4 月 26 日，他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说：**“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5 月 12 日，他在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其他九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谈话时说：**“外交部夺权我是支持的**。”但揪出王、关、戚后，他改口了。9 月 2 日，他在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说：**“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还借机清理经常给他制造麻烦的江青的打手们。他向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吴德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明确交代：**“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结果“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应当肯定的是，他始终是保陈毅的。

在外交部夺权和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不过是一个前台打手。之于**“揪军内一小撮”**，既不是关锋的发明，也不是王力的创造。

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就在《通知》的文稿中，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段文字，就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原始版本。之后，毛泽东便开始逐步实现他制定的揪斗军内**“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计划：1 月 8 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上将被揪斗；18 日，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被打倒；19 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一批高级将领，被拉到北京十万人大会上批斗，身负重伤的罗，还坐了残酷的“喷气式”；26 日，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被揪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

1967 年 1 月 10 日，关锋会同王力和军报其他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上报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他们在建议中非常谨慎，没有敢使用毛泽东**“一批”**的估量，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比**“批”**量小得多的“一小撮”和“极少数”等量词。他们在建议中说：“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五一六通知》的合理延伸，是对**“一批”**范围的谨慎压缩。对此，江青划圈表示同意，林彪批“完全同意”。自此，“军内一小

撮”的提法正式登场。

7 月 25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大会。会上，旗帜鲜明地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大员都参加了大会。当时康生说，他请示过毛泽东，说毛主席完全赞同。1967 年 7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经毛泽东审定的这封信中，明确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自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席卷中国。例如 ，“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等等，充斥了全国大、小报刊的头版和首页，“八一社论”不过其中之一而已。

为了呼应“揪军内一小撮”声浪，毛泽东在 8 月初，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表达了对“军内一小撮”将帅“支右”不“支左”的愤慨。直到 8 月 12 日，国内形势恶化到快要失控的时候，特别是听到“清君侧”的传闻，他那颗发烧的大脑才开始冷却，才不得不发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的指示，主动为“揪军内一小撮”降温。但“提法不策略”不等于否定“提法”；然而，御用上层精英们，却以此迫不及待地制造出了个毛泽东怒批**“大、大、大毒草”**的谎言。

由此可见，无论是“八一社论”的“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八七讲话”中的“揪陈毅和夺外交部的权”，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的集体“产品”。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拿他的功臣王、关、戚问罪呢？

当听到周恩来要他自清江侧的暗示后，熟读历史书籍的毛泽东，立刻想到了曹操**借头平兵怨**的故事。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描写了这样一段故事。曹操与袁术战于寿春。时曹操率兵 17 万，日费粮食浩大，又逢各地大旱，接济不及，虽向孙策借粮 10 万斛，也只能解得燃眉之急。适逢仓官王垕入禀：“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曹操巧设“阳谋”告诉他：**“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说：“士兵怨愤，如何？”曹说：**“我自有良策**。”王垕遂遵命照办。因兵士食不果腹，遂生怨愤，军心不稳。曹操乃密召王垕来见，说：**“我欲借你一物，以压众怨，你可不要吝惜啊**。”王垕莫名其妙，问道：“丞相欲借我何物？”曹操不动声色，凛凛可畏地说：**“我欲借你人头示众！**”王垕大惊失色，力辩：“我无罪……”曹操成竹在胸：**“我也知你无罪，但不杀你，军必生变。你死后，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不必多虑**。”王垕还要申辩，曹操喝令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王头于高竿，出示榜文曰：**“王垕故行小斛，克扣军饷，盗窃官仓，军法从事！**”蒙在鼓里的众兵士们，欢声雷动，怨忿顿解，只差没呼“万寿无疆”了。化解矛盾，赢得军心，突现刁雄曹操“伟大、光荣、正确”的魅力。

掂量和权衡了整整一夜后，毛泽东决定依典复制曹操借头史：他向杨成武口述了他清除王、关、戚的决定。显然，这个决定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决定；但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霸道，安抚了将帅，稳定了军心，从而挫败了少数将领清君侧的谋图。

在毛泽东的权弄下，功臣王、关、戚，稀里糊涂地当了“王垕”，成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所幸没被斩首。

也许良心再现，1967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给他的检讨信上批道：“**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做出了“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的曹式安抚。

9 月 24 日，外交部保陈毅派的刘华秋和毛的表侄孙女王海容，急想探听毛泽东对打倒王、关、戚的真实态度。毛泽东也不避讳，对他们吟出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唐诗，表达了他对“王关戚”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惋惜之情。

毛泽东权术史不断证明，他每次搞权力平衡，都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因此，虽已改称“王关戚”三人为“同志”，却难以免除他们的牢狱之苦。

25-全面内战起因

作者 于松然

1、纵火者兼灭火者

1980 年 11 月，在中共政治局的连续会议上，首次公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斗情况、军队介入情况和武斗造成伤亡人数等文件档案。其中：

“**各地原始档案上报汇总武斗伤亡人数**：根据一九七九年四月，全国各地公安、民政部门、各地驻军原始档案，上报汇总：文化大革命武斗伤亡人数：1,234,700 人。其中群众、干部、学生死亡 143,720 人，公安民警死亡 8,467 人，军人 31,086 人。另有失踪者 274,500 多人。”

“**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省区**：文革期间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省区有十二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四川省、黑龙江省、河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陕西省、山西省。”

“**武斗伤亡超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文革期间武斗伤亡超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二个：乌鲁木齐、石河子、郑州、开封、兰州、武汉、平顶山、新乡、合肥、芜湖、蚌埠、宜昌、思茅、昆明、金华、温州、南宁、邵阳、长沙、冷水江、石家庄、保定、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重庆、宜宾、南昌、湛江、贵阳、遵义、西安、宝鸡、枣庄、曲阜、徐州、南通、鞍山、丹东、湘潭、太原、包头。”

又据文革史学者们估计，文革武斗死难者约 50～60 万人，但也有人认为，武斗死亡不下百万。笔者倾向于前者。

从这个系列数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纵火者的身影。

善于运筹内战的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拟定了乱中夺权的计划。他认为，乱可以打破秩序，从而打破刘、邓长期构建起来的权力结构。为此，他成了一个颠覆刘、邓秩序的纵火者。毛泽东这种纵火脚色，都被历史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1966 年 6 月 1 日，他下令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北大聂元梓的被他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向全国传递了他要武力夺权的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从而吹响了用红色恐怖血染中华大地的号角！

同年 7 月 8 日鼓吹“大乱”。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8 月 1 日，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说：“**造反有理。**”鼓动他们起来造反，揪斗、打倒以刘、邓为首的右派当权派——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

8 月 2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鼓吹“大乱”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又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到 1966 年年底，面对右派越来越激烈反抗，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激烈反抗，善于从敌我力量对比变化中决策的他，决心把“**乱中取胜**”变为“**内战中取胜**”。12 月 26 日，在他的生日宴上，他高举酒杯向宠臣们发出号召：“**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在 1967 年 4 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号召打内战。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5 月 25 日，他对全面内战大加赞赏说：“**北京也在分裂成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7 月 13 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鼓吹打死人。他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又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7 月 18 日，在武汉，他赞扬武斗。他对周恩来、谢富治说：“**钢工总的工事很好，我还要去看看。**”

在他的授意下，7 月 22 日，江青向郑州左派造反派“二七公社”，举起了“**文攻武卫**”的战旗，令他们以武力击败右派造反派“十大总部”。

他对许多将领“支右”不“支左”行径，早有戒备。善弄权术的他，对军队将领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说军队内有“一小撮”野心家、“走资派”，甚至还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无情拷打、处死一些将领，如彭德怀、贺龙、许光达、陶勇等，严厉警告将领们不得三心二意，要紧跟着他，另一方面，又给他们以信任，赞誉他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委以“支左”的重任，要他们在“支左”中“立新功”。

7 月 28 日，他继续赞扬武斗道：“**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8月4日，他下令“**武装左派**”，以武力对抗军队中右派将领“支右”不“支左”的“阴谋”，支持左派造反派的“**文攻武卫**”，演变成“**武攻武卫**”。

9月18日　他在视察路经长沙时，召见湖南省军政领导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他对他们说：“**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当黎原说到“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时，他说：“**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他还肯定了黎原“发枪”的作法。他说：“**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又送回来，给你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就抢跑了，这是个好经验**。”

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赞扬武斗。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又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个名符其实的文革**纵火者**。

但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权谋大师。他一生信奉“一分为二”的“理无常是”哲学，他不会满足于纵火者一种脚色，他还要扮演灭火者脚色。这种双重脚色，能使他左右逢源、横竖是理，从而确保他的表演能充分地体现出“伟光正”的本色。因此，文革以来，在作为一个肆无忌惮的纵火者脚色的同时，他的另一面——积极**灭火者**脚色，在历史记录里也得到了充分地展示：

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当他看见红卫兵强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伤人的野蛮行为后，便对《人民日报》发出指示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7年1月22日，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时，他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注：廖、刘、苏都是高级将领）

同年9月16日，他在浙江对武斗提出批评:“**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

12月，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为了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他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7年9月5日，他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的《**九五命令**》；1968年，他签发了“**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七三布告**》；紧接着，他又签发了“**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的《**七二四布告**》；7月28日，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那里的武斗。他警告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1970年12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一不赞成武斗，二不赞成虐待俘虏**。

毛泽东两种脚色的表演，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软硬兼施的权棍：他既是一个“为革命”的

纵火者，又是一个“为人民”的灭火者。由此可见，毛泽东打着为革命为人民旗号发动的内战，是场名符其实的**文革无义战**。

对此，有人认为，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他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口蜜腹剑的历史，都是他人格分裂的证明：一方面以权谋为中心，推重谎言，崇信“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目的，强奸道德”的哲学，甚至是“可以和魔鬼结盟”的魑魅魍魉，另一方面不忘往脸上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和耿耿为革命的“公仆”，一个人间无法类比的天使或大救星。有人甚至说，他人格分裂最为鲜明的是：一面是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是个道德败坏的小人！

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的病态表现。双重人格，人皆有之：“崇高与卑劣共存，坚强与怯懦同在，真诚与虚伪并行”，是双重人格的自然态，毛泽东不能例外。所谓双重人格，有心理学家说：“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心理学家们还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阶段，在个人的意识层上只有一种身份，称为主体人格。此时个人的情感、思想和言行，都能按照主体人格的方式活动，不会显示出另一身份的痕迹。但当受到精神刺激之后，可能突然转变为另一完全不同的身份，一切情感、思想和言行都会按照后继人格的方式行事。美国精神病医生则将双（多）重人格界定为“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据此，有些心理学家进一步认为：双重人格为人的常态，而人格分裂则是个人人格分裂的病态表现。

笔者不是心理学家。但依据心理学家们对双重人格的定义和对人格分裂病态的论述，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他“情感、思想和言行”的反复无常，看到他对权力渴求的“主体人格”和不惜牺牲一切的“后继人格”之间的相互“突然转变”，而这些“反复无常”或“突然转变”，显示他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据此，笔者认为，毛泽东既纵火，又灭火，完全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态行为。

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拥有七亿人的中国，被一个人格分裂的狂人玩弄于孤掌之中，难道不是我中华民族的悲剧吗？

但毛泽东的人格属智能型，人格分裂的病态却成全了他“权谋盖世”的天才。为了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他不惜生灵涂炭，号召“全国全面内战”。在发动内战前期，他曾多次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那是平衡权术的假言，而“全面内战”、“武装左派”，则是他内心的真语。与此相反，在内战后期，夺权目的达到了，他要鸣金收兵，那时他说他反对武斗就是真话，而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纯系舞台戏言。由此可见，人格分裂的毛泽东，是个天才的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权棍或曰权力谋略家。

在天才的权力谋略家毛泽东的愚弄、蛊惑和导演下，全面展开了**文革无义战**：数百万红卫兵、造反派，高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激烈地展开了武装夺权大拼杀，数千万群众稀里糊涂地跟着摇旗呐喊，数亿人在怅然自失中默默冷眼旁观——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惨烈场面：50～60 万人在“保卫毛主席”的枪炮声中，“义无反顾”地成了短命“烈士”，一百多万伤残者，也随之成了“荣军”过客。

记者李肃写道：“在这场中国人奇怪的内战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始终保持

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中清除异己，巩固统治。他，就是一手导演这场内战的毛泽东。”正是：

权棍施惑术，导演文革无义战；伏尸数十万，血染万里江山！

2、 纵火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他七十三岁生日的寿宴上，发出了令人惊愕的“生日号召”：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已经是说一不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怎么会号召全国全面内战呢？是造谣？还是丑化？

笔者在前面“十月进击”一节中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右派势力的强大阻力，使位极人臣的毛泽东，倍感孤立，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多月中，一边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发现，受他支持的左派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虽已活跃起来，但各地党内右派扶植的右派造反派，势力依然强大，左派造反派处于少数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党内右派势力的反抗，使他有理由认为，全国政权的大部分权力，还在刘、邓党内右派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形成了刘、邓复辟的党内基础，从而使他的政令很难贯彻到全国。这种权大而不逞的局面，使他深感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内决斗形势已经形成。对此，1967 年 2 月 3 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的政府领导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裸露了他当时的心机：‘**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因此，他决心对权力来一个根本解决。他从重庆左派红卫兵通过制造‘一二四’武斗取得胜利的事件中得到启示：支持左派造反派剥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重组干部队伍，把刘、邓党内右派势力排除于各级权力之外。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置生灵荼毒于不顾，利用造神运动在芸芸众生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借酒发狂，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内战’。”

那么，重庆“一二**四**”**武斗**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8 月 28 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分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同一些反对造反的群众发生冲突。

为了稳住重庆，9 月初，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示意，可以效仿国务院支持成立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即“西纠”那样，建立**重庆工人纠察队**。到了 9 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很快建立了起来。由于是各级中共组织、各地公安和各单位保卫部门发起的，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都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左派造反派无法匹敌。“工纠”中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认为造反就是“右派翻天”，这就注定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左派造反派势不两立；他们人多势众，且有各级党政权力撑腰，这也注定他们在与左派造反派发生矛盾冲突时，往往居于上风。尽管他们人多势众，却被骂成令人不齿的“保皇派”。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炮打司令部”，

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人，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等等。这时他们才发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为了稳住阵脚，争取主动，甩掉“保皇派”的帽子，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一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便调整策略，改“工纠”的组织名称为“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他们接过造反大旗，决定于 12 月 4 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十多万“工纠”队员参加的大会，学着左派造反派那样，将大会定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以此来证明，他们是造反派，不是保皇派。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演出”，怎能逃过左派造反派的眼睛。消息传出后，重庆左派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12 月 3 日上午，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联席会议，制定了冲击大会主席台方案。由于冲击主席台必然引起武斗，他们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并计划将三辆救护车，安排停放到主席台后边的马路上。为下一步斗争做准备，他们还计划在武斗开始后，迅速占领和控制住火葬场。

也许当事者迷，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等人，都是政治角斗场上的老手，竟没有识破红卫兵娃娃们的诡计。12 月 4 日，“工纠”组织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如期召开。

令大会主持人没有想到的是，大会刚开始，十多万“工纠”队员参加的大会，竟被千余名左派红卫兵所控制。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红卫兵，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主席台，夺过话筒，抓住“工纠”写的“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标语，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进行了激烈批判。他们说，当我们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口号时，“工纠”竟敢提出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的“反革命口号”，是可忍？孰不可忍？台下的左派红卫兵冲着“工纠”队员，高呼挑衅性的口号：“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工人纠察队员被激怒了，双方发生了口角争执，继而推搡抓扯，接着便是拳脚相加……大规模武斗，终于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上发生了。

军警迅速介入，迅速将对立双方隔离，大会也因而迅速流产。

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抓住有利战机，发动哀兵攻势。他们以受害者身份血泪控诉重庆市委和“工纠”的暴行：他们声明，他们在“一二四血案”中，伤亡 200 多人；他们从控制的火葬场抬出五具待火化的尸体，摆放在重庆市委门前进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他们通电中央文革和全国红卫兵造反派，“强烈抗议”重庆市委和工人纠察队的暴行；接着，他们又组成了“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告状——他们把中共妖魔化敌人的诡诈权术，运用得精妙绝伦，表演得有声有色。

他们的宣传攻势收到了立竿见影效果。当“一二四血案”传到北京和各地后，引起全国震惊和激愤。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来电慰问左派红卫兵，各地造反派纷纷致电重庆红卫兵造反派，表示坚决和他们站在一起。策动和帮助重大“八一五”制造这次武斗的“红卫兵首都三司”，于 12 月 17 日发起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

胜利誓师大会”。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提到：“在重庆，……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重庆“八一五”代表在会上作了 40 分钟慷慨激昂的讲话。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莅临大会，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

在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全国左派红卫兵造反派的声讨声中，重庆工人纠察队和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土崩瓦解，重庆市委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尽管后来的调查证明，“一二四事件”只打伤了人，没有打死人。

重庆“一二四事件”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是以左派造反派胜利告终的一次大规模武斗。重庆左派红卫兵造反的胜利，鼓舞了毛泽东，使他看到了通过内战战胜刘、邓右派的光明前景。于是，他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在毛泽东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的第四天，即 12 月 30 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所在地的康平路上，发生了号召内战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双方伤残 91 人；不足一个月以后的 1967 年 1 月 25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地区，发生激烈枪战，两天内战中，双方打死 29 人，打伤 80 多人……自此，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全国性内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有权就有理”的中共赤文化。无论是左派造反派或右派造反派，他们长期腌渍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一切”、“驯服工具论”和“对敌人手软就是对革命残忍”等血腥专制思想的染缸里，一朝权在手，他们便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容分辩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有权就有理”的薰陶下，他们便理直气壮地要为攫取权力而拼杀。

26-文革第二轮大屠杀

作者 于松然

为了向刘、邓右派夺权，毛泽东在 1967 年初便发出了“**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以粉碎右派的反抗。为此，他下令“支左”部队“**可以开枪自卫**”；到 8 月 4 日，他又下令“武装左派”。但到 1968 年 7 月，他的夺权目的基本达到时，特别是他与右派做出妥协声明要“解放”右派干部后，左派造反派、红卫兵的利用价值由是告终，而且已经变成了他的累赘。于是，1968 年 7 月 28 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向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发出严重警告：“**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就歼灭之！**”随后，便下令全国各地展开对“不听劝告”的左派造反派进行武装围剿。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选择规模较大的中共武力镇压事件，简介于后，以飨读者。

1、镇压西宁“二二三事件”

1967 年 2 月 23 日上午 11 点左右，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二炮驻青某军副军长**张晓川**等将领的直接策划下，调动 13 个连的兵力，对占据《青海日报》社的左派“八一八”战斗兵团发起攻击。二十多分钟后，军区部队攻占了报社，占领报社的左派造反派全部就歼！是役，打死左派造反派 169 人，打伤致残 178 人，俘虏 1,000 多人，部队伤亡 50 人，其中死 4 人。这就是著名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青海二二三事件”是中共上层左、右两派在京西宾館和怀仁堂政治角力的继续，也是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省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钩心斗角的总暴发。维护官僚体制反对毛泽东造反政策的赵永夫，在中央军委右派高级将帅的支持下，利用造反策略，一举夺了话不投机又支持“八一八”造反的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并把他软禁起来。这个事件也是中共军内右派对左派造反派的第一次血腥镇压！

一位现场目击者写道：“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23 日下午，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帅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西宁大街上，也出现了“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标语。

有中央军委撑腰，赵永夫的胆子更大了。事件发生后，他下令省军区会同省公安厅联手逮捕左派造反派 4,131 人，拘留 2,522 人，管制 3,504 人。又据报导：“1967 年 2 月 26 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 所大学、12 所中专、职校、35 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 2 月 26 日到 3 月 5 日持续武斗，曾出动 T55 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 2,177 人伤亡，其中死亡 822 人。”（待档案解密核实）赵永夫也变成了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英雄，被招到北京作报告。

毛泽东对青海省的屠杀并不介意，因为是他发出“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指示；但在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的反复状告下，特别是“二月逆流”的威胁使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拿赵司令是问，令周恩来处理。领了旨意的周恩来，于 3 月 24 日迅速下达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指责赵永夫夺司令员的权是**“反革命政变”**，开枪屠杀是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并把“赵永夫隔离收审”。但十多年后，左派被赶下台，青海省委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表示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律予以平反昭雪。中央军委迅速作出了**“赵永夫受了冤屈”**的结论，使刽子手以正军职级别离休，寿终正寝于 1987 年 10 月 18 日。

那些惨死的冤魂们，当他们倒在刽子手赵永夫枪口下后，他们才明白：他们被愚弄了；他们不过是毛泽东手里一捧任意抛撒的炮灰！

2、湖南怀化大镇压事件

1967 年 8～11 月，湖南省怀化市左派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左派对抗，发生武装冲突。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都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与军队对垒。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 37,7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 13,300 多人，军队伤亡 430 人。

3、四川宜宾大镇压

1967 年 6 月到 1968 年 3 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造反派，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的不同观点，发生激烈冲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 1968 年 3 月 15 日先后表态说，**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之流的迫害**。应着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表态，拥护刘、张的左派“红旗”，在武斗中占了上风，先后发动了三次由部队和民兵直接参加的“武装支泸”行动，力图歼灭炮打刘、张的泸州右派“红联站”。但到了 1968 年 7 月，当毛泽东夺权战略开始转移左派利用价值因而告罄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及时重新表态，严厉批评了左派的“支泸行动”，并将“支泸”后台刘结挺和张西廷绳之以“法”，迫使“支泸”组织和指挥者宜滨地区革委会主任王茂聚自杀身亡。由是，泸州武斗形势大变，风光一时的左派“红旗”，最终惨遭灭顶之灾。后据统计，在部队直接参加下的泸州镇压，双方投入兵力高达 17 万之多，伤亡 43,800 多人，其中枪杀 21,100 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 15 个月之久。

一个当年的左派造反派回忆四十年前的经历后，写道：“40 年后想想，当造反派一文不值：武斗平息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除王洪文控制的上海和少数地区外，几乎没有造反派掌权。四川省的刘结挺、张西廷被打倒，宜宾王茂聚自杀，郭什么被打倒，造反派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泸州周之良、赵殿国被判刑劳改，我们沙湾造反总部的头头某某，被‘红联站’人打的七生九死，还被扔进监狱，我本人也在‘一批双清’中以可笑的‘反军乱军’（我算老几！）等大帽子压着坐了几次‘学习班’，幸好我不曾坦白交待，不然也没此闲心坐在这里念文革经了！造反派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卸磨杀驴**！敢造反的绝不是好驴，该杀！于是有训子孙：不要参加党派**当炮灰**！”

4、 安徽蚌埠、淮南大镇压

1968 年 5～9 月，安徽省蚌埠、淮南两地 85 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他们打着要揪“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的造反旗号，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 12 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前往调查，毛泽东也派汪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调查后，中央文革和汪东兴认为，第二次造反是“搞反攻倒算”，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经毛泽东同意，新生的安徽省革委会，从合肥等地调动 5 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进行围剿。在长达 35 天围剿、追捕中，有 7,3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 3,433 人，军队、民兵伤亡 525 人，827 间建筑被损毁。因镇压有功，12 军军长李德生，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飞黄腾达，由一不见经传的少将，先后擢拜为大军区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直飞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5、广东海南岛儋县“六八戡乱平暴”事件

1968 年 8 月，在“八月戡乱平暴”事件中，**全县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有 700 多人**，烧毁民房 700 多间，设置临时监狱 500 多所，“依法”关押的群众高达 5 万多人，其中，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和逼供信，致伤致残者数以千计。

6、陕西宝鸡镇压群众起义事件

1968 年 12 月到 **19**69 年 2 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7 万名职工中，有 45,400 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297 人被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面对野蛮暴政，当地老百姓已忍无可忍，他们在第二天揭竿而起，武装反抗当局的“清队”暴虐。驻军谎报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并依毛、周谕示，对老百姓展开军事镇压。他们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两个月的武装镇压中，**打死 13,300 多人，打伤致残多达 35,000 多人**。

27-人兽之间——虐杀俘虏

作者 于松然

当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被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颠覆，人类“天使”一面就会被压制，包裹着罪恶的“潘多拉魔盒”就会被打开，人类的兽性便被解放出来，从而能使“解放”后的中国人性泯灭，道德沦丧，许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善良的人在内，都蜕变成了痞子和流氓无产者。

在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拼杀和武装镇压中，虐待和滥杀俘虏的兽行，成了“**全国全面内战**”中普遍存在的一大特色。

据《**文革 40 年祭**》一文记载：河北雄县三十八军支持一派用大炮攻打对立派别，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俘穿肩胛骨，女俘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笔者：这都是从土改和镇反中继承下来的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笔者曾目睹过铁丝穿锁骨)，游街示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 286 人，自杀 20 人；乱打滥杀包括矛刺、刀砍、石砸、枪打、绞决，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在一次审讯后，一下子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缴械后，遭到肆意报复。作家赵瑜采访后记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据《**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一文记载：1967 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在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对“温联总”被俘成员进行报复——打、砸、抄家、游斗和逼供，成了家常便饭。更令人发指的是，胜利者发明了空前绝后的惩罚手段：“爬棺材底”和“吮尸汁”。在温州“工总司”“烈士”的棺木集中供奉处，俘虏们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然后强迫他们一个个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时值酷暑，尸体腐烂，腐汁漏

出，又威逼俘虏们张嘴吮吸。

《**泸州武斗亲历记**》的作者**唐伟励**，是当时四川泸州市沙湾公社的农民。他在文中写道：

“大概是到‘革大’的第三、四天的中午，因为天热，沙湾总部和‘红司警卫连’的人都在食堂外面的过道上吃饭，只见二男一女押着一个头蒙黑布的俘虏走来。警卫连负责关押俘虏的任务，押俘虏来的人留下一个看俘虏另两个进办公室做什么去了（应该是办交接）。吃饭的红旗战士纷纷跟过去看，几十个人把俘虏围在中间，交头接耳地像看什么珍稀动物似的。俘虏是个男子，瘦高个，穿一身发白了的旧军装，头上被蒙了黑布，估计不到 30 岁。看着看着，不知是谁叫了一声：‘他妈的裤子上有血，肯定是杀过人的！’本来打起武斗两派的人都和仇人般分外眼红，经这样一叫群情立即激愤起来。叫喊的声音刚落，一个满脸胡渣的人上前一脚就把俘虏踢倒在地，于是几根钢钎同时戳向了俘虏背上。大概是钢钎的钢火不好，间或那俘虏的骨头特硬，钢钎戳到那人背上‘空空’响就是戳不进里头去。胡渣人骂道：‘妈的逼，看你硬得过钢钎！’说着，把钢钎插到俘虏身下一下子把他挑转过来，抡傢伙在俘虏的胸口上用力一戳，就听‘噗’地一声钢钎钻进俘虏的胸膛中，一绞一拉，殷红的鲜血随着钢钎喷了出来！在这个杀人的过程中，有三点是需要特别交待的：一是我真没看见俘虏身上那有血；其二，当围观的人对俘虏动手的前前后后，押他来的人站在一旁像和他无关似地根本不去阻止；第三，那个穿一身旧军装的瘦高男子，在被踢倒到被钢钎扎进胸膛的全过程中，至死竟然没有哼一声！过去看电影小说，看那些被敌人严刑拷打、火烧铁烙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只认为那不过是艺术形象而已，世界上那会有如此坚强的人。这一次算是开了眼界，世界上竟然还真有这样宁死不屈的人！这个可怜的‘红联站’人是什么特殊材料做出来的呢！恐怕只有天知道。时过 40 年，现在回忆起那场景来，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仍使我心悸不已！”

一位知情者在《**文革八县联防打中江**》一文中写道：

“联军入城后，进驻一切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公共场所，民宅。他们抢窃粮食仓库，银行，开枪打杀百姓的鸡鸭猪狗。反正被占领地的一切都归胜利者所有。对于所有的‘战俘’，不管男女老幼，全部脸上用锅烟墨涂黑，双手反剪，关在几处强占的平房里，并有持枪的联军士兵把守。

“联军审讯俘虏的做法非常特别，几个人搭张桌子，到‘战俘营’里随便抓一个来，先一顿拳脚后，便怒斥对方：‘干了多少坏事，老实交代。’对方回答稍不如意，‘法庭’便宣布，我们代表中江县人民，判你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将俘虏推出去，随便到一个地方实施枪毙。

“比我年长的一位老哥向我讲述了一件事情：攻下中江后不久，我们每人发了二十元。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百元大抄，十元即是最大面额。这二十元对当时的低工资收入的中国人来讲，相当于一个中下级收入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我们用这二十元买了些酒肉，放开肚子吃喝，因战斗暂时结束了，可以开怀畅饮一下。在烈性酒充满血液后，人人云里雾里，昏昏然然。这时，有人提议，我们去拉几个俘虏来枪毙玩，怎么样？其中的有几个人附和。

“晚上，到一个‘俘虏营’中随便抓了五六个（到底是五六个，还是六七个，我的这位老哥说记不起了）。这位老哥说，他们几个人把俘虏用解放牌汽车押到一条河边，在汽车强光照射下，这些俘虏被強迫沿河跪下成一字型。一位头头大声吼道：‘我们代表全体中江县人民宣布你们死刑，希望你们来世当造反派。’一阵枪声，俘虏全部倒地。俘虏中有个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一个造反派突发奇想说：‘这么小的年纪，看看她那里长毛了没有。’于

是，他把‘六三式’步枪挺上刺刀，戳开了女尸的裤子，用双手将裤子撕开，然后高叫：‘嗨，有毛了。’然后扬长而去。

“更有些报私仇者，当着人家父亲的面，众目睽睽之下，强奸别人的妻女。关于强奸妇女的事件，不知发生多少。只要联军士兵愿意，到俘虏群中找一个女俘虏就行了。”

1968 年 7 月 14 日，在广西梧州平桂矿区召开庆祝胜利追悼“烈士”的万人大会。为“祭奠革命烈士”，会后枪杀俘虏 16 人。平桂大战共杀俘虏 297 人。

在湖南湘潭易家湾，从 1967 年 8 月 10 日到 9 月 20 日，前后大战 40 天，双方死 92 人，受伤人员上百。武斗中，双方都虐杀战俘。“工联”派的“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在埋葬他们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数名战俘，活活垫了棺，以报复湘潭“红色怒火”枪杀他们 7 名“工联”人员祭坟。

据披露的广州市档案馆材料记载：在派性武斗中，经常发生将对立派人员打死后吊在公共场合示众的事件。他们把尸体吊在繁华的北京路、越秀路的大榕树或其他大树上，制造惨不忍睹的红色恐怖，以震慑敌对者。仅 1967 年 7～9 月间，在广州市区和郊区，记录在案的悬吊尸体，高达二百多具。

作家**秦牧**这样记述他在广州街头所见：

“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

“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

“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中国虐杀俘虏的暴行，与美国在伊拉克的虐俘丑闻相比，任何一个正直而知耻的中国人，都羞于面对，更不要说指责他人了！

但在无情的虐杀中，也出现过人性闪光，使我中华民族真、善、美的文明传统，得已绵延不绝！

在《**震惊全国的文革“江津杀俘事件”**》一文中，记录了杀俘过程。笔者**择要改写**如下：

1967 年 9 月 6 日，四川江津县“九七”派攻陷“红总”派据点战斗中，战死 9 人，击毙“红总”派 4 人，抓获 15 名战俘。

9 月 6 日晚，“九七”派“舰队”胜利返航，江津县通泰门码头已挤满了欢迎人群。当人们看见抬着 9 具“烈士”尸体上岸后，引发了呼天抢地的哭嚎声。

率领“舰队”出征的何司令，登高向欢迎人群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以毛泽东**“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来勉励大家，他以毛泽东**“化悲痛为力量”**、**“掩埋好同志的尸体，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前进”**的话来鼓励死者亲属们，他又用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来激励

“九七”战士……“烈士”亲属被激怒了，“九七”战士被激怒了，他们冲向战俘，用拳打、脚踢和牙咬，来发泄他们的仇恨。从通泰门码头到民工纪念堂的路上，“红总”派战俘们，被夹道的人群辱骂、毒打；在众目睽睽之下，好几名战俘的耳朵、鼻子被咬掉、撕裂，一个个连滚带爬，鲜血淋漓。在第二天的“九七”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仇恨又被进一步煽动起来。悲痛欲绝的“烈士”亲属们，好友们，或用刀砍，或用手榴弹砸，当场活活打死 4 名战俘，当晚又杀了 4 个。

9 月 8 日，在“烈士”亲属和好友的强烈要求下，“九七”派司令部根据“**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高指示”，决定当晚在船上处决另外 7 名战俘。

午夜，在“九七”派森严戒备下，包括白沙中学十五岁学生**魏炳炎**在内的 7 名战俘，被捆着、嘴里塞着布条，用汽车押送到江边。行刑队员们，个个戴着钢盔，穿着清一色的劳保服，人人手持枪械，两人挟一个，将已吓瘫了的战俘们架到汽车轮渡船上。

战俘魏炳炎忽然发现，在左边挟着他的是他白沙镇的邻居——长风厂工人**许智清**。求生的本能使他张口向许求救，但嘴里塞着布团无法说话，本能又使他扭着头拼命给许使眼色。令他失望的是，从小经常一同到长江里游泳、踩水、嬉戏的大哥哥许智清，此时面色冷峻如铁，视若仇敌。

当船到公园一带江心时，刽子手们开始杀人。已经站立不稳的魏炳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被推到船边，遭半自动步枪射杀后推入江中。终于轮到他了。朦朦中，他被许智清推到了船边。他仰天长哼一声，紧闭双眼，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突然，砰地一声，震得他双眼火星四溅，接着被一脚踹入江中。清凉江水的刺激，使他很快清醒：他没有死。凭着好水性，他游离危险区，被一只渔船救起。他死里逃生，跑到成都，声泪俱下地向四川省“革筹组”报告了江津虐杀俘虏经过，华夏为之震撼。

28-愚弄的见证——重庆红卫兵公墓

作者 于松然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只剩下不知不觉的日子无缘无故的欢笑。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曾经血雨腥风、遍野哀号。
谁都无路可逃，无路可逃。
你也曾伤痕累累，
你也曾命如芥草。
可是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今天的餐桌上，
连动物的尸体都是那么美丽高雅地细刻精雕。
你什么都遗忘了都遗忘了，
只留下那么心安理得的快乐消遥。
你也曾蒙冤受辱，埋头弯腰，

谁没有撒野一把，疯狂一遭。
你也曾因生而跪，
你也曾因死而逃。
可是你什么都遗忘了，什么都遗忘了。
阳光下，你在孜孜不倦地，
教给孩子们做人的诀窍。
走过的路都忘记了，都忘记了，
有多少明枪暗炮、鸡鸣狗盗，
有几颗活着的心还在蹦跳？
你难道没沾过血污？
你难道没迷过心窍？
可走过的路都忘记了都忘记了。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
哪个方向是你子子孙孙的人生目标。

这是摄影家**田太权**一组摄影作品上的题词。



重庆红卫兵公墓远眺

摄影作品的背景是重庆沙坪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公墓：纵横交错地排列着 113 座坟墓，掩埋了 400 多个亡魂，被时人称之为“**重庆红卫兵公墓**”。（上图）

从 1967 年 7 月 8 日起，到 10 月底的三个多月中，崇拜“**枪杆子里出政权**”信条的重庆市造反派，为争夺市革委的控制权，在“**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下，制造了 20 多次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战斗从使用冷兵器开始，逐步升级到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坦克、高射炮、舰艇等现代化武器，从巷战发展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伤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三个多月里，炸毁房屋数千间，击沉船只 3 艘，重创 12 艘，打死近千人，伤残难以计数。

“八一五”和“反到底”是重庆市势不两立的两大红卫兵造反组织，前者得到驻军和军分区的支持，后者由省军区和省“革筹组”撑腰。

请看，两派旗帜鲜明，“不可调和”：

“**反到底**”——“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高举着“反到底”的战旗，高呼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口号，**向“八一五”开炮**！

“**八一五**”——“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高举着“八一五”的战旗，高呼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口号，**向“反到底”轰击**！

这是“**全国全面内战**”中司空见惯的一大奇观！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也是一个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的一大奇观！

在这匪夷所思的大奇观中，近千名红卫兵造反派，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为了缅怀“烈

士”，“八一五”决定在沙坪坝地区沙坪公园角落里修建公墓，以纪念400多位为“八一五”献身的“烈士”。于是，一座“重庆红卫兵公墓”应劫而生。

人们可以从墓碑上看到一个个活鲜鲜的名字，老的有50多岁，小的才刚刚14岁！

在一块“红警区新十九中红卫兵八一五战斗团”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十四岁男生**邹卫远**的名字，其上款是：（他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英勇牺牲！”

在一块“警备区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墓碑上，镌刻着九位“八一五”“烈士”的名字，其中有十四岁女生**杨武惠**和十六岁“校花”**唐明渝**。据一位当年处于杨、唐等死难现场的幸存着陈国英回忆：“唐明渝当时才16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

人们还可以从墓碑上看到一句句激动人心的、效忠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头。**”“**砍头何所惧，革命志不移。**”“**敢上刀山下大海，誓死保卫毛主席。**”……

《孙子》曰：“**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不诡也。**”毛泽东以马恩列斯为师，行老庄孙武之道，合二而一，可谓权谋天才！

人们还可以从墓碑铭文上感受到战斗的激烈：“**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姓名省略）**等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充满仇恨的暴言戾语，使曾身临其境的人们，仿佛又听到了当年拼杀的“战鼓”！

不！那不是鼓，那是喇叭，是架在楼顶上、汽车上、树干上、电杆上的银灰色的声压超过一百分贝的高音喇叭。

喇叭尖叫声，像撕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把人们从梦幻中击醒！

喇叭尖叫声，又像万里晴空中的一声霹雳，把人们的心灵震懵！

喇叭尖叫声，好似战鼓，以它那尖锐刺耳的声波，朗诵着《毛主席语录》，**煽动仇恨**，理直气壮！激励人们去猜忌！去构陷！去揭批！

喇叭尖叫声，又似号角，以它那超高分贝的音响，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挑动仇恨**，响遏行云！鼓舞人们去夺权！去拼杀！去牺牲！

……

在充满仇恨的尖叫声中，全国各地涌现出50～60万个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英雄”！

一切都过去了——在仇恨的喧嚣中，数十万个“保卫毛主席”的“烈士”走了；在“主旋律”悄悄“扫除痕迹”中，一座全国唯一的、唤醒记忆的“重庆红卫兵公墓”，侥幸存“活”

了下来。

一切都过去了——在仇恨的喧闹中，高举酒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的伟人走了；在万众注目中，广场上突兀而起一座供人顶礼膜拜的神坛庙堂。

一切都过去了——“原罪”拉出了一群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要用“审判”来洗掉沾满双手的血污；再造一件“伟大、光荣、正确”的“皇帝新衣”，给恣意制造仇恨的嗜血魔王穿上。

一切都过去了——面对孤零零的公墓，“八一五”派司令**周劲松**说，“**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 15 年牢**”，一个服刑三年的“反到底”派头头也说，“**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他俩分明在说，仇恨难忘！他俩分明在说，他们已还清了文化大革命的血债，从此，谁也不欠谁人的帐！

一切都过去了——没见有人去为仇恨买单，也不见有人去忏悔，更没见有人去谢罪！“原罪”用“导向”来掩盖地上的血污，再用“遗忘”来埋藏野蛮、邪恶、愚弄和荒唐！

一切都过去了——历史不会因“主旋律”的强暴而消亡。在生生不息的长流里，冲刷“导向”，荡涤“遗忘”，漂白谎言，泯没仇恨，继续谱写真、善、美的人性篇章……

笔者谨借**毛清江**的《**文革祭**》，权作本章的结束语。

文革祭 （毛清江作于 2005 年 10 月 10 日）

蓦然回望，悲愤满腔，一九六六，灾祸突降；
乌云压顶，长夜未央，日月失色，天地无光；
暴君蟊贼，混世魔王，伪善嘴脸，蛇蝎肚肠；
醉心权位，施展伎俩，只手云雨，兴风作浪；
名曰文革，实为国殇，纳粹行径，封建勾当；
剪除异己，诛杀同党，宠信奸佞，戕害忠良；
摧毁文化，毒化课堂，图书焚烧，文物遭殃；
邪恶横行，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愚昧高亢；
人妖颠倒，黑白无常，挑动群众，拉派结帮；
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同胞相残，狠如虎狼；
经济崩溃，斗争为纲，文字狱兴，武斗疯狂；
祸国殃民，自称帝皇，个人崇拜，无耻荒唐；
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接班人名，写进党章；
内外交困，前途迷茫，国家民族，元气大伤；
作恶自毙，余孽落网，十年浩劫，终成绝响；
冲破禁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势不可挡；
可恨僵尸，高居庙堂，腊肉腐臭，阴魂游荡；
涂脂抹粉，欲盖弥彰，有待来日，鞭尸清场；
审判罪魁，披露真相，告慰冤魂，正义伸张；
自由歌飞，民主旗扬，法制建立，人权保障；

中华复兴，国运隆昌，大道宽广，前程辉煌；
感慨行文，永志不忘，痛定思痛，奋发图强。

29-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

作者 于松然

1966 年 8 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十六条》时，“封疆大吏”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在小组会上，都表示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态度。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李连忙遮掩说：“通了！通了！” 李打哈哈，怎能逃出毛泽东的眼睛？

新的考验很快摆到阎红彦面前。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阎红彦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去揭发邓小平的问题。会上，谢富治上将对他的老领导邓小平大加鞭挞，揭发其**“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生性过“刚”的阎红彦，本来就看不惯谢富治落井下石的德行，他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赵增益（时任昆明市委第一书记）：“你知道不知道？”回答是“不知道”。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会议因此不欢而散。不幸的是，在当“革命派”还是当“走资派”的考验上，他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积极争当“革命派”，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识时务地按毛、江所指进行检举揭发，落井下石，因而便不由自主地跌入“走资派”泥潭，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阎红彦跌入“走资派”泥潭后，本来形势十分严峻的云南，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冲击并占据了省委办公楼，抄了阎红彦的家，迫使他无法履行职责。

为了对付混乱局面，支持阎红彦工作，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出决议：“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并把阎的家安排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11 月，年近六十的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甚至有时从早晨 8 时斗到晚上 8 时，不能吃一点东西，没能喝一口水。

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等等。此时，不识时务的阎红彦，已被毛、江的中央正式列入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中。于是，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标语、大字报。受到

支持的昆明红卫兵造反派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1967 年 1 月 4 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1 月 8 日凌晨 1 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电话里陈伯达对阎红彦咆哮说：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本来就看不起“阉宦”陈伯达的阎红彦，反唇相骂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圣旨在身的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的指责，让激动万分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清晨 4 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地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阎红彦在临终前，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是谁逼死的？真正的凶手是谁？按中共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中央文革不仅把阎红彦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单，授权昆明造反派宣布他是“走资派”，阎红彦死后，还下令不准开追悼会，等等，就足以证明。

但在笔者看来，那个“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恰恰是中共最不愿反思、最不愿忏悔的表现。

1967 年 1 月 12 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时说：**“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接着 1 月 13 日，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向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去支持电说：**“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当阎红彦的死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时，当谭震林在大闹怀仁堂中为阎死鸣不平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的记录传到毛泽东眼前时，毛有什么反应？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所谓的“无产阶级震怒”,大骂谭震林等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

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而对阎红彦的死未表丝毫哀悼或惋惜之情。从毛泽东冷若冰霜的态度上来看，同周恩来一样：阎红彦之死是咎由自取。

显然，逼死阎红彦的真正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对阎红彦的死冷若冰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么，为什么阎本人说是**“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呢？在株连成风的毛泽东独裁下，任何公开直接反毛者，都会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为了抗毛，把反对的矛头对准毛的打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良策，也是保护妻儿、亲友不受肆虐的最好选择！

从历史看，阎红彦是个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对毛的怨气由来已久，而这种积怨，最终使他走向毁灭！

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就产生了井冈山派和宝塔山（延安城东南）派的分野：前者以井冈山败逃到陕北的精英为代表，他们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后者以陕北土生土长的领袖为核心，其中包括阎红彦，他们则认为他们拯救了党中央。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同诉求。

众所周知，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八万六千多中央红军，被迫从瑞金出发，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已被国民党政府军荡平了的井冈山湘赣根据地，开始了死伤惨重的、前途未卜的漫漫遁途。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几经险阻，到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不足 8,000 人。因此，在宝塔山派看来，没有他们的庇护，井冈山派难逃灭顶之灾。但毛泽东并不看重他们，而仅仅想利用他们。为了站稳脚跟，权谋大师毛泽东依托和利用中共中央的权势，对宝塔山派玩了个**“捉放曹”**的闹剧，摇身一变，成了宝塔山派领军人物刘志丹、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救命大恩人，初步稳住了宝塔山派的军心。但不久，宝塔山派内发出了要毛泽东另辟根据地的呼声。震惊之余，权谋大师又耍了个借刀计，让潜在的对手刘志丹和他的亲信杨琪、杨森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光荣牺牲”**。(据说，延安党史馆证实：刘志丹是被警卫员从背后开枪击毙的，而这个出身中央红军的警卫员，以“被敌人买通”罪被处决。另一说法：刘被特派员裴周玉击毙。)为了控制住流痞成性的陕北红军，权谋大师又来了个换头术，把比较听话的、善于投机钻营而流氓成性的大麻子高岗扶植起来，让他当了中央西北局书记，成了群龙无首的陕北红军新头领。扶植高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刘志丹派在利益和权力上的诉求，从而使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此时，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阎红彦，刚从苏联返回陕北，手中已无兵权，但对重用高岗很反感。在阎红彦看来，作为刘志丹副手的高岗，同刘志丹一样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帮土匪，他们不能代表宝塔山派。阎说，在陕北，他们打家劫舍，到处**“抢东西，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对此，在三甲塬整顿时，负责整顿的阎红彦就清洗过他们军中的地痞、流氓 300 多人，还开除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此人在“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因此，阎红彦认为，只有已病逝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只有他和他的追随着，则应代表宝塔山派获得权力。可惜毛泽东没有看重他，甚至有意压着他，使他耿耿于怀。

陕北根据地开创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有等档案解密后由史学家们去了结。从流传的资料看来，阎红彦确有过高估价自己的地方，至少性格刚而少柔，缺乏政治家应具备的钻营手腕。

1964 年 12 月 2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毛的一语道破了红军时代的天机。

有人这样描述红军时代：**“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没钱花了便抓人，叫人家拿洋钱赎人，一手交银元，一手放人；不拿钱，撕票：这不叫绑票，叫“打土豪”。没饭吃了，便拿着枪去**“借”**粮，还装模作样地打个借条什么的：面对带枪者，你敢不“借”？在陕北，大官们可以随军带着“妻妾”，随时发泄，逃跑也不忘用驴驮着她们跑。在井冈山，没有陕北人那么土气，她们可以穿上军服，扎上皮带，挎上手枪，俨然一名战士，不叫“压寨夫人”，叫秘书，或升级叫秘书兼妻子。例如毛泽东，在 1928 年，当他的发妻杨开慧(1930 年 11 月被害)还在监狱里服刑时，便“纳”土匪王佐、袁文才麾下挎着手枪的 17 岁战士**贺子珍**为“秘书”。小官呢？当兵呢？不是曾鼓励过他们像 1927 年毛泽东宣扬的那样**“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吗？“迎闯王，不纳粮！”至今还被某些专家、教授津津乐道。“不纳粮”千军万马吃什么？但这种胡说八道却大有市场。不近女色的阎红彦，想用土匪、流氓等罪名告倒高岗，是告错了地方。

不可否认，革命者也有另一面。当懂得“水可载舟，亦能覆舟”道理后，他们也能自我约束，即在裸露魔鬼一面的同时，也不忘张扬天使一面；两张脸皮的变换，随政治、军事需要的变化而飘忽。于是，“奸一民女，如奸我母”，被闯王叫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准调戏妇女”**等较有人性的条款，便被毛泽东唱了出来，——这就是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禅机。如今，在“主旋律”作用下，经过一代接一代作家们的努力 ，“高大全”的“佛面”被塑造出来，擦掉血污的屠刀，装饰成“革命文物”。由此可见，在革命洪流中打游击的阎红彦，很可能也有两张脸皮表演；他把刘、高说成土匪，似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到 1942 年，机会来了。在 10 月召开总结陕甘宁边区历史经验的高干会议前，高岗主动与阎红彦修好，但被阎拒绝。阎不为名利许愿所动，严词以对：**“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得到毛泽东宠信的高岗恼羞成怒，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有野心”。对阎、高之争，毛泽东很快以党中央的名义表了态：**“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阎红彦败下阵来，还挨了整，自然又憋了一肚子气。

1945 年，阎红彦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会议，对大会选举高岗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表示不满。会后，他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高岗问题，提出了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望中央注意和要求记录存档的“几条意见”。记录存了档，但“几条意见”没被采纳。在同年 7 月，在召开的第二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

即解决刘、阎分争（实为高、阎分争）的会议上，阎红彦受到了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得胜后的高岗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阎红彦又一次败阵。

陕北刘、阎之争或称高、阎之争，使毛泽东坐收渔翁之利：既可以淡化“陕北救了党中央”的不逊之议，还可顺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强化对宝塔山派的监控，从而进一步巩固井冈山派的主导地位。历史就这样为毛泽东积累、制造了“伟光正”的条件。

1954 年，又一次机会给了阎红彦：高岗因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被毛泽东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他那强奸、诱奸、玩弄一百多女性的流氓丑闻也被揭了出来，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 40 多名，迫使高岗自杀了结。但高岗的倒台并没有给阎红彦带来升迁的机会，还在副省级上徘徊。令他困惑的是，高岗党羽习仲勋、贾拓夫在高倒台后，都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还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级和部长级的高职，就连曾被他清洗出游击队的刘子丹弟弟刘景范，也当上了地质部副部长，而他本人仅免强进入后补中央委员序列，外放当了个副省级的四川省辖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8 年 3 月，终于有了转机。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公开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又当众宣布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此时的阎红彦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计谋，对毛的“道歉”已经没有兴趣。

1959 年 8 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独当一面。也许是长期压抑的结果，使他良心再现，天使一面张扬起来；但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他不得不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在三年饥馑中，由于他和他的前任或被迫或忠实地执行了毛的政策，使浮肿病蔓延，饿殍环生，从而使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13 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他在调查时发现，“三面红旗”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特别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为了吃一顿饭，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滚了一身泥。他动情了，良心使他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政策产生了恶感。1961 年 5 月 9 日，他不顾朋友和助手们的劝阻，冲着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而被打倒的教训上书，公然批评毛的人民公社政策，大胆提出了他的意见：社队规格**“该小就小”**，甚至**“可以包产到户”**；**“办不办公共食堂，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耕牛、大牲畜归生产队所有”**等等。这些公然同毛泽东**“一大二公”**相对立的意见，是抗上犯忌的，不仅自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会株连众多他人。他的上书，着实让朋友和助手们为他、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批示说**“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

可惜，阎红彦不懂权谋大师**“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以为毛接受批评，竟大胆作为起来。

1961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6 日，他在昆明西山召开的云南省委工作会议上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他对邓小平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他大胆地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该集体不集体是路线问题；**

不该集体你硬集体也是路线问题。”“按空气办事是危险的”。1962 年 12 月 21 日，他在中共云南省委批转的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公开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明确主张，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比较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经过通盘调整以后，云南省政治和生产形势有了好转，出现了国民经济比较协调的发展景象。1966 年，粮食总产量比 1960 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 2.01 头，居全国第一位；边民外逃也得了控制。阎的这些较为开明的政策，**被视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声**。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阎红彦被赞誉为“生产书记”。

创造了云南黄金时期的“生产书记”阎红彦，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他针对阎的“该单干的坚持单干”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作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阎红彦面临受惩处的危险。

有人说性格决定一切。刚而乏柔的阎红彦，没有悬崖勒马，没有低头认错，反而固执地坚持他的对抗。1966 年 4 月，阎红彦明确倡导**“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落实在生产、生活上**”，又公开与林彪的“四个第一”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叫板。于是，毛泽东和毛的意志执行者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周恩来，便把他打入“走资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中。他最后走向自杀的命运，为势所必然！

30-拖死国家主席刘少奇

作者于松然

1966 年 12 月 25 日，北京红卫兵“三司”，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彻底打倒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凌晨，约 5,000 名红卫兵的人流，迅急地涌到这里，几辆安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上，插满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旗帜。在红卫兵和数万围观者的仰视中，一个头着军帽、身披军大衣、眼戴近视镜、仪表文质彬彬的青年人，即席发表演讲。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口若悬河的他，以其极富煽动性的语音，激起台下阵阵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突然，高音喇叭中传出他声嘶力竭地呼号：

“打倒刘少奇！”

这是全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蒯大富吃豹子胆了？事后人们知道，这是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根据毛泽东发出的**“要公开批判刘少奇**”的“最高指示”所导演出来的大作。于是，全国各地红卫兵们，纷纷学步北京，开始组织游行示威，亦步亦趋地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

刘少奇曾说过：**“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听命于中央文革一心上爬的蒯大富等人，接过“拍马好”论，把枪口对准了“拍马好”论的发明者。这是历史的幽默？抑或历史的嘲讽？

原来，1966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代表毛泽东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支持。这篇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激烈指责他们所代表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公然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路线。然而，在几天后的 24 日会上，毛泽东却对刘、邓“网开一面”。他郑重地说：**“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在 25 日会上，他又说：**“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这种“打一把，拉一把”的权术，被御用精英们捧为“领导艺术”！

应该承认，毛**“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的理由是充足的。远的不说，从“解放”后开始，1950 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三年多，接着便是 1950～1951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1952 年的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4 年的批高岗、斗饶漱石和批俞平伯、斗胡风运动，1955 年的肃反运动，1957 年的反右运动，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拔“白旗”运动，1959 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运动，1960 年的反后进运动，1963～1966 年的“四清”运动，等等，制造了数百万件冤假错案，导致数千万人惨死，数百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千万人被打、抓、管、关和发配，无辜受株连一个多亿。从 1949 年到 1966 年的十七年间，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中华大地，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假恶丑横行天下，批斗杀甚嚣尘上，从而为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的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这场悲剧的主帅，而刘少奇则是其头号帮凶。

毛对刘、邓“网开一面”的恩惠，一个多月中刘、邓竟无任何表示。长期在毛泽东手下工作的刘、邓，对毛的权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熟悉毛泽东的**“二皮脸”**，一张是“佛”脸，一张是“魔”面，在**“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理论支配下，两张脸变来变去，交互使用，其“精神实质”难以琢磨。因此，他们对毛的“恩惠”采取观望态度。但这在毛泽东看来，分明是大逆不道，分明是负隅顽抗，其“无产阶级震怒”可想而知。不用命令，善于察言观色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康生、戚本禹等人，便洞悉到“伟大领袖”的“精神实质”。

12 月 18 日，在周、江的支持下，**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司令**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向他布置了中央文革小组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计划。12 月 24 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按计划扇风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 月 26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按计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 月 27 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根据中央文革的布置，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报告。

红卫兵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按计划煽动起来。到 25 日，按计划由蒯大富带头，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喊遍全国。

毛泽东迅速表达了对红卫兵们的支持。12 月 28 日他说：**“现在看起来，对刘少奇问题**

不能象过去那样内外有别了，现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这样，毛泽东用天才的“阳谋”，完成了他“走群众路线”的杰作！

期间，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动员她“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在中共伦理共识文化熏陶下的刘涛，为了自保，果然出卖生父，贴出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也来了个落井下石！

1967 年 1 月 1 日清晨 6 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进来者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涂写了两条大字标语：**“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

1967 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 月 3 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姚文元在文的一条注释中明确写道：**“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大人物”指的是刘少奇。这是中共官方喉舌报刊，第一次公开用不点名的点名方式攻击刘少奇。

1 月 3 日傍晚，中南海造反派出动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达 40 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1 月 6 日傍晚，北京“三司”，成功地上演了“智擒王光美”闹剧。（详见第 09 章）

1 月 8 日，周恩来紧跟毛泽东，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在京革命造反派的讲话时，他振臂高呼：**“我们要彻底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垮！”**

为了显示伟人的宽大胸怀，1 月 13 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一见面，毛泽东满面春风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苦笑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聪明一世的刘少奇，竟然以为毛不知这个骗局！

据报导，这次会见，毛泽东态度和蔼，姿态高雅。刘少奇则不识时务地、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独生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这一番话，使毛泽东犹遭五雷贯顶。他强压怒火，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阵子，火压了下去，终于开口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专门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从书名可以看出，毛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向他低头认错。

由于刘少奇没有低头认错，遂被毛推定为死不悔改，批斗迅即升级。

1 月 18 日，即毛找刘谈话后的第 5 天，中南海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刘少奇办公室，二话不说，将电话线扯断，撤了刘的电话。

3 月 3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 年第 5 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之前的 2 月 23 日，毛泽东在对此文作些修改后批示道：**“看过，写得很好。”**

戚本禹在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章在揭露和批判刘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和刘说要当“红色卖办”之后，用匕首直刺刘少奇的心窝：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 1962 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这篇经毛泽东修改和首肯的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悲愤之极的刘少奇，把刊有这篇文章的《红旗》往桌上一摔，愤怒地说：**“假话！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卖办’？这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说着说着，“哇”地一声，一股鲜血夺腔喷出……退一万步论，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就是“彻底的卖国主义”吗？就是反革命吗？这是什么逻辑？当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之时，造谣、诽谤、栽赃和诬陷，便成了马列毛革命者的必然选择，因而横行无阻。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对付对手的伎俩，刘少奇过去也曾多次使用过；令人哀叹的是，当别人又用这种伎俩对付他时，竟忿怒得口吐鲜血。可怜呀可悲！

反“二月逆流”后，党内右派溃不成军，实权完全操纵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手里。一些

高层领导，倒的倒，垮的垮，人人自危，谁也不敢站出来为刘少奇开脱。然而，一个党外人士、曾当过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章士钊**，自恃年高且曾有恩于毛，其养女**章含之**做为英语教师，又零距离服务于毛，毅然致信毛泽东替刘少奇讲情，却成了墙倒众人推中唯一侠义之举。章在信中说：

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不要打倒。

见信后，毛泽东当即回信如下：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3 月 10 日

随信附去的是当时中央所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罪状的材料。章士钊读了这些材料之后，仰天长叹，对养女章含之说，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

4 月 10 日，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揪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高级干部做陪斗。

接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遭批判。1967 年 5 月 8 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而早在 1962 年 8 月，曾赞扬过《修养》又面谕康生要刘少奇尽快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毛泽东，此时却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在赞扬这篇批《修养》文章的同时，还在文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1967 年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号召全党批《修养》！

7 月 9 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发起了“揪刘行动”。在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这就是名震全国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1967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去武汉。他前脚走，批斗刘少奇“大火”，便在北京中南海内外燃烧起来。毫无疑问，江青领了“圣旨”。

中央文革向北京各路红卫兵下达了批斗刘少奇的命令。7 月 17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首先发出了《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勒令刘少奇于 7 月 22 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7 月 18 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年近七十的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多小时。对此，曾亲临现场的人回忆道：**“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斗他们的人。许多是秘书局的干部。（右图）



刘少奇做梦也没想到……

1967 年 8 月 5 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配发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 300 万人的誓师大会，声讨刘、邓、陶。而在同一天，大会后的中南海内，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批斗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肆意谩骂和野蛮扭打。他的每一次辩解，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打断，他的每一次张口，都招来一本本语录本劈打，**打得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办公室。

经过残酷批斗的刘少奇，似乎有所醒悟。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正如章士钊所言，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无论他如何辩白或抗议，都没有用了。在中南海的小规模斗争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毛主席语录》本敲打他的嘴和脸，喝令“不准放毒！”刘少奇的嘴也就从此闭上，再也没有作任何辩解和抗议。

刘少奇同其他挨批、挨斗、挨打的官员一样，到了无法忍受迫害时，才想起了《宪法》。在“一化三改造”中，在“反右”中，在“肃反”中，在大跃进和反彭德怀中，在“四清”中，甚至在文革初期的“横扫”、破“四旧”和“红八月”里对无辜者的抄、打、屠杀中，面对无数人挨批、挨斗、挨打、挨罚、自杀、枪杀，面对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试问国家主席刘少奇：你什么时候想到过《宪法》？你什么时候用《宪法》来约束过自己侵犯人权的行径？你什么时候用《宪法》来规劝过毛泽东独断和暴虐？当然，人们不会忘记，你对“三面红旗”罪孽的良心反思，大胆地指责其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们也不会忘记，你策略而谨慎地采取“三自一包”等修正主义补救措施，缓解了毛泽东一意孤行给广大农民带去的饥馑和灾难！

从集体遗忘《宪法》到受害时才想起《宪法》，是一个令中国每个人都要认真反思的沉重话题。可惜，这种反思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没真正实现，许多人还在幽梦中酣睡！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一张废纸时，迫害刘少奇的行动紧锣密鼓地逐步升级。

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为代表的帽子不足以定罪，也不能令人信服，寻觅其他罪行便成了毛左派的当务之急。机会终于出现，东北有人揭发刘少奇曾被捕叛变过。1967 年 6 月 3 日，以周恩来挂帅、江青、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负责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迅速成立。

据报导，为了查找刘的叛变罪行，专案组在东北三省查阅了 245 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却一无所获。面对这种状况，专案组并不死心。他们把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名单、奉天军警宪特名单和奉天钞厂职工名单，编印成花名册，分发到东北三省各市、县、街道和农村，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并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他们找到了十多个证人。接着，他们展开了对证人的攻心战：在四个证人自杀未遂的情况下，依靠诱供、逼供和酷刑等刑讯手段，最终找到了几条刘少奇叛变的“根据”，终于完成了毛、周、江等中央领导交给的重大政治任务。

为了证明王光美是美国战略特务，周、江领导下的专案组，批准逮捕了几个有关证人。其中，一个证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另一个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两个教授均为重病在身的老人，又都在狱中的反复提审中审毙。据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披露，1967 年 11 月 9 日，在江青等人圈阅的专案组审毙张重一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因张犯（笔者：张重一）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又据披露，在张重一咽气前的最后一次审讯中，审讯录音带录下了审问者和张重一临终前的对白：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张：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话没说完，张气绝身亡。）

“审毙报告”和“临终对白”，使人们看到了毛式无产阶级专政的野蛮和邪恶。

1968 年 9 月 16 日，刘少奇专案组（此前，刘、王专案组已分开）终于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江青**大笔一挥，在《审查报告》上写下这么一段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

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周恩来批示说：**“此人该杀**。”9 月 29 日，**林彪**在《审查报告》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专案组建议对刘处以极刑，但毛泽东不同意判刘死刑，却默认其他处置方法。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会上只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一人反对，成了一百多个中央委员中的唯一另类。

对于这段历史，著名传记作家是这样描述的：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什么叫**“极不正常的情况”**呢？作者迴避了。据报导：第八届中央委员 97 名，候补中央委员 73 名，合计 170 人；其中，被毛、林、周和中央文革等认定为“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等罪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高达 121 人，占总数的 71.2%，他们都被剝夺了参加全会的资格；在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 10 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 40 人，仅占中央委员人数的 41.2%；为了凑够党章“规定”的半数以上之数，便“依规”从候补委员中晋级 10 人，使中央委员人数过半，达到了 50 人；与会的中央候补委员 19 人，仅占应与会人数的 26%，除 10 人晋为中央委员外，剩下 9 人与会。又据报导：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成员共 133 人，其中正式成员 59 人，占参加会议总人数的 44.4%，而由毛泽东指定与会的非正式成员，高达 74 人，占参加会议总人数的 55.6%。据此有人推定，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个非法的全会。在这个“非法的全会”上，中共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双开除了。

此外，著名传记作家在**“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一段话中，有意迴避了专案组总负责人**周恩来**的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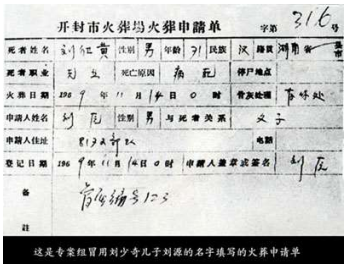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的时机，选定在 1968 年 11 月 24 日，即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一天。这是一种**“致刘少奇于死地”**精神摧残。果然，听罢决议，刘少奇高烧 40 度！

1969 年 10 月 17 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在重病之中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披着盈尺白发，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被武装押送到河南开封囚禁。又有报导说：**“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

到了开封，刘少奇陷于持续高烧之中。对此，《文革十年史》一书中这样描写：“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

松动。”





左：刘少奇在人大会上做《宪法》修改报告　中：刘少奇死于囚室　右：火葬申请单

又据《**刘少奇最后 27 天的<监护日记>**》一文披露：

“在**北京特派员**的严密监控下，在缺医、少药最后断药的着意安排下，在没咽气的前几天已经做好了火化准备的情况下，刘少奇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了难以名状折磨和摧残。这位钦定不判死刑的国家主席，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毛泽东默许下，在没有一个亲属在场的情况下，被**拖死在开封囚室里**。火化时，根据北京特派员的事先安排，执行者在火葬申请单‘死人姓名’一栏里，将刘少奇名字改称为‘**刘卫黄**’，而在‘申请人’一栏里，又冒充刘少奇小儿子刘源，填上了‘刘原’两字：执行者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共官方设计的‘历史’纪录！”（上图）

当接到刘少奇死亡报告后，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自作孽，不得活！**”

历史记录了这样一组数字：株连刘案或为刘鸣不平而被逮捕法办的有 28,000 多人；被批、斗、开除党籍和撤职下放的达十万人以上；令人遗憾的是，因刘案被处决的人数不详。笔者不得不拾遗补阙：仅在本书第 18 章“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血案中，记录了因同情、支持刘少奇、高呼“**刘主席万岁**”的福建农民，有 21 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 12 人被逼自杀身亡，8 人被打伤致死，还有为数不详的“犯人”妻子、母亲，被逼自杀身亡；在第 19 章“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中，记录了陆兰秀、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等四人，因替刘鸣不平而惨遭处决的经过。

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惨死，有人在《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中写道：“**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但笔者认为，中国人应为这种悲剧默哀！

笔者还认为，中国人应当从刘少奇的悲剧中看到：他的“反动路线”是他曾一度对冷酷无情的毛泽东思想做过微不足道的**民主化反思**；他的“修正主义”是他曾一度对残忍暴虐的无产阶级专政做过无足轻重的**人性化修剪**。因此，中国人应当记住：刘少奇的这些“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曾给苦难中的人民带来过短暂生机；尽管他不可能会立地成佛！

31-放过总理周恩来

作者 于松然

1967 年 5 月初，在抓叛徒的风浪中，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从 1930 年的旧报纸里，翻到一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认为挖出了个大叛徒，便迅速上报到中央文革请功。伍豪是周恩来化名，“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无疑是一颗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的重磅炸弹。早对周恩来在打倒“走资派”中所持的中间立场和在处理“二月逆流”中的和稀泥态度很不满意的江青，对红卫兵的发现，如获至宝。5 月 17 日，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就“伍豪事件”写信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本人，直接向周发难。信中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影印件。

周恩来已有所料。5 月 19 日，他断然否认“伍豪启事”。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为防不测，这一天，他把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与之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将其拍照下来，印制多份。就绪之后的当天，他即亲笔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令周恩来意外的是，对这个简单而明白的问题，毛泽东竟这样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的批示等于说：**“挂起来**！”

为什么说“伍豪事件”是个“简单而明白的问题”？其一，“启事”发生在 1931 年 12 月，当时周恩来已潜到了江西中央根据地；其次，在 1932 年 3 月，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布告辟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其三，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启事”已作了否定的结论。显然，“伍豪事件”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但三十五年后，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怎么又成了个问题呢？这是中共整人赤文化之使然！

“伍豪事件”是由“**顾顺章灭门事件**”引发出来的事件，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

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负责人。1931 年 4 月 25 日，顾在汉口被捕后即叛变，供出他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将顾叛变的绝密情报，迅速报告给周恩来。周得到情报后，抢在中统特务动手之前，迅即组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转移。据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当顾顺章还没有来得及出卖中共中央机关而中央机关正在仓皇撤离时，周恩来人格的另一面迅速展现：他当即立断，**消灭顾顺章全家，斩草除根，以儆效尤**。于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大案，便在上海出现！

在四月底一个漆黑的夜里，**周恩来**亲率**康生**和**宋再生、王竹友、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龙章**等中共特工红队人员，分坐两辆小汽车，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今威海路陕西路）802 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幢二层结构的新式楼房。房间里陈设堂皇，一楼客厅摆放着成套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子。楼里住着顾顺章妻子**张杏华**和八岁女儿**顾利群**，同住的还有顾的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爱宝**，小舅子**张长庚**，顾姨母的女儿**叶小妹**。这就是用苏俄卢布供养的顾顺章八口之家。周恩来带领杀手，鱼贯般地闪进 802 号。当是时，张杏华正在二楼陪着顾的好友**朱完白**夫妇和**斯励**打麻将，而张长庚当晚住校不在家里。周恩来看见了正在打牌的斯励，不觉苦笑了一下。1927 年“四一二”清党时，周恩来和顾顺章被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抓获，却被他的弟弟斯励放走。斯励自然成了周和顾的恩公，也成了顾家的座上客。但一不作、二不休，**“对待敌人从来不手软”**的周恩来，脸一沉，下达了执行的命令。九人一齐动手，人不知、鬼不觉，先后用细麻绳勒杀了顾顺章家庭主要成员（放过顾的八岁女儿）和包括**斯励**在内的牌友等 8 人。勒杀之后，趁着夜幕，他们将尸体深埋好，上面栽上花草，作得干净利索，不留一点痕迹。**事毕，从不抽烟的周恩来，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又缓缓吐了出来**。那天晚上究竟杀了多少，说法不一。据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极好的美籍作家韩素音说，杀了 17 人，留下了一个 12 岁的男孩和一个 8 岁女孩。但有的资料说杀了 7 人或 9 人，也有说多达 30 多人。又据周恩来为申辩“伍豪事件”上交给毛泽东的《大事纪》中说：**“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 10 人**。”

顾案发生四个月后，王竹友被捕，供出了上述案情。国民党当局向法租界当局接洽，会同法警方，按王竹友指认的地址挖掘尸体。消息传出后，市民挤满墙头，爬在树上，围观挖掘。在充满怀疑和期待下，人们在毫无痕迹的花草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终于在八尺深处，挖出了被勒杀的 8 具尸体。接着，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挖掘出了三十多具尸体，其中，有顾顺章的哥哥中共地下工作者**顾维桢夫妇**，顾维桢的妻弟中共地下工作者**吴克昌夫妇**。这些尸体都是被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下令或亲手勒杀的所谓动摇、叛变嫌疑分子。挖掘出的尸体使全上海市为之惊颤！灭门和屠戮新闻不胫而走，传遍全国，震撼世界。1972 年来访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周恩来亲切握手后，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特别关照了这件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灭门大血案。他写道：**“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

历史是无情的。它昭示了周恩来对中共忠诚和对敌人凶狠的历史形象！

当年上海报纸上登出照片：顾顺章抱尸大哭，发誓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

1931 年 9 月 1 日，国民党当局悬赏两万大洋，缉拿周恩来或人头，而此时，周恩来正在潜向中央苏区的途中；11 月，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而此时，周恩来已潜入中央苏区。由于没有抓住周恩来，离间中共中央领袖关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便被炮制了出来。

国民党这种笨拙的离间计，当年没有得逞，但在三十五年后的文革中，却起到了作用。

当看到一个佼佼者在他面前点头哈腰、诚惶诚恐的样子，毛泽东便油然产生一种快意和满足。因此，为了控制周恩来，使其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把“伍豪事件”挂起来，是个理想的选择。但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不公正的，是一个令他难咽的苦瓜。周恩来无法怨天尤人，因为，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把毛泽东推上了说一不二的九五帝王之尊。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个不得不重用又不得不警惕的特殊人物；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的才智过人，嗜权如命，但居高临下的霸气和不择手段整人的残酷性，难免众怨，他早晚必取而代之。毛、周的关系史，就是一部即联合又争斗、充满恩恩怨怨的历史。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屠杀顾顺章全家和亲朋好友之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大搞肃反，开展轰轰烈烈反“AB 团”的运动。他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用残酷的肉刑进行“逼供信”，即抓起来就逼，一逼就供，一供便信，一信便杀。先后屠戮所谓“AB 团”和“社会民主党”成员等异己分子万余人(另说：有大约七万人被冠以 AB 团分子遇害)，其中，在红二十军，包括军长、政委在内的副排级以上干部近 800 人，全部被处决！这就是著名的中央苏区肃反，史称“AB 团事件”。

12 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为了夺权而笼络人心，周恩来批评毛泽东肃反扩大化，并在 1932 年 10 日的宁都会议上，罢了毛泽东的官，夺了他的兵权，迫使他离开军队。自此，周取毛而代之，并同王稼祥和苏俄特使德国人李德，组成了中央苏区军事三巨头。

周、毛怨恨也由此引发，使毛泽东耿耿于怀，终生难忘。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化了三巨头的权力，使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坐冷板凳长达两年之久，成了他一生中最为失意、最为落寞日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恩来等人不得不突围向云贵方向逃跑，这给毛泽东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周恩来等人率队逃跑前，处决了近万名俘虏、伤病员和动摇嫌疑分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同时，周恩来等人，还以打游击的名义，将异己的中央要员如患肺病的瞿秋白、患疟疾的毛泽东等人，留在中央苏区，让他们在国民党围剿中自生自灭。不久，留在苏区的瞿秋白，在福建上杭濯田附近被国民党抓获，1935 年 6 月 18 日，被杀于长汀。

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能看破周恩来等人的借刀计。在疟疾康复中的他，紧紧跟在他熟悉的队伍后面，没有执行周恩来等人要他留下的命令。翻盘机会终于来了，在清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反客为主，对中共头头博古和三巨头，大张挞伐，赢得了一些将领的支持，但却无法撼动博古和三巨头的地位。然而，周恩来的突然倒戈，成全了毛泽东，使张闻天取代了博古，撵走德国人李德，换上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毛、周积怨并没缓和。在延安，毛泽东借助刘少奇、贺龙、彭真、高岗、康生等人之力，爬上了中共权力峰巅。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借批王明左倾路线之名，整肃对手周恩来。正当周恩来处境险恶之时，1943 年 12 月 22 日，苏俄党魁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首领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密电要求**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密电说：“**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政治上是错误的**。”莫斯科的支持，使毛泽东不敢对周下

狠手，周也因而保住了他的权力。

领教了毛的报复手段后，周恩来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开始用“太极软功”与毛周旋。1957年，当他在经济上反冒进的举措被毛斥为“**离右派只有50米的错误**”后，他立马改弦更张，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1958年经济计划，完全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张安排。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他同刘少奇一样，成了毛的主要帮手和积极执行人。1959年，当中国农村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他不顾人民的死活，着意拉开与“**右派**”的距离，力图完全甩掉“**50米的错误**”，把出口粮食从1958年的266万吨，提高到415万吨，出口量猛增56%！他这种改正“错误”的丑行，加速和扩大了中国的饥馑发展，至少增加了1,000万个饿殍。在饿殍遍野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派别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左、中、右三派。善于左顾右盼的周恩来，摇摆于左右之间，没有像右派刘少奇、邓小平那样，把大跃进失败的责任，用暗示的方式推到左派毛泽东的身上，巧妙地往自己身上贴金，而是主动承担经济失误的责任。他没往毛身上泼粪，使处境困难的毛泽东舒缓了一口气。

在谋划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中，天才的毛泽东充分利用周与刘、邓的矛盾，把老对手周恩来，当作可团结的对象加以利用。果不出所料，周恩来在“**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中，亲临一线，指挥红卫兵打、砸、抄、烧、杀，可谓赤膊上阵，废寝忘食，为毛打倒刘、邓党内右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汗马大功。对此，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当斗争的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发现，周在高喊“打倒”的同时，却在暗中保护党内右派和中间派的老干部，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不过，毛也发现，周恩来虽有暗保“走资派”的嫌疑，但在保谁、打倒谁上，都在看他的眼色行事，没敢擅自做主。为了打倒党内右派，团结中间派，毛泽东做出决断：**放过周恩来，把“伍豪事件”挂起来**；同时又默许中央文革，利用“五一六”红卫兵来敲打周恩来，使他不敢轻举妄动！

周恩来卑躬屈膝的“太极软功”也收到了效果，使他涉过险滩，稳坐第三把交椅！

32-文革第三轮大屠杀——“群众专政”在湘南

作者 于松然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左派**”和“**专政是群众专政**”的指示——著名的“**八四指示**”。对于“群众专政”问题，毛泽东曾解释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1966年的“横扫”、破“四旧”和而后的武斗中随便抓人、打人、私设公堂、杀人以及大兴、昌平县为代表的农村滥杀无辜等那些曾使全国十万多人丧生的野蛮暴行，都被毛泽东纳入到“群众专政”中加以肯定了。由此可见，毛

泽东所谓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同他一贯倡导、标榜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其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中共党和政府，蔑视个人自由、人权，蓄意违宪、犯法，制造出一种混乱的无政府局面，动员、唆使包括那些无法无天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等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所谓“群众”，在混乱中对守法公民（老百姓）实施暴力专政。因此，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和他一贯倡导、标榜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实质上都是**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的法西斯专政**。

毛泽东发出“**群众专政**”的指示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根据这两条指示行动起来。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等法西斯分子，大显身手，很快酿成了比北京“红八月”里**大兴、昌平**两县为代表的农村大屠杀范围更广泛、刑讯更野蛮、手段更残忍的大屠杀！

在全国各地“**群众专政**”中，湖南湘南和广西农村大屠杀，最具代表性。

一、“群众专政”在湘南道县

（本节根据以下十多篇资料撰写：《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老虎坪纪事》《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等）

1982 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回故乡探亲。当中共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中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会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地委书记很清楚，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群众专政**”中，被残忍杀死的。

1984 年 5 月，中共右派当权者，根据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在湖南省零陵地区成立了有 1,389 名干部参加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对以道县为中心的全地区屠杀情况，进行了清查、处理和遗留安置。据“工作组”清查后透露：

“道县大屠杀，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该县 10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都进行了屠杀。共屠杀 2,778 户，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打死、枪杀 4,193 人，被迫自杀 326 人。

“大屠杀向零陵地区其余 10 个县市扩散，全地区各县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屠杀。据清查统计：全地区（含道县）屠杀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致伤致残 2,146 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为：四类分子 3,576 人，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贫下中农 1,049 人，其他成份 411 人。按年龄划分为：未成年 826 人；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大屠杀直接受牵连者，高达 14,000 多人。”

又据不完全统计，除道县外，零陵地区各县和相邻地区的县市屠杀情况如次：

宁远县：从 1967 年 8 月 18 日开始屠杀，共屠杀 1,092 人；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 1967 年 8 月 29 日起，历时 57 天，共屠杀 898 人；
双牌县：共屠杀 345 人，其中被迫自杀 48 人；

江永县：先后屠杀 325 人；

东安县：屠杀 11 人，但在杀人腥风停息了 8 个月之后，该县又屠杀 141 人，自杀 278 人，致伤致残 1,132 人；

祁阳县：33 个公社，共屠杀 218 人；

永州市：9 月间的几天内屠杀 158 人；

南山县：共屠杀 145 人；

常宁县：共屠杀 83 人;

邵阳县：杀死 295 人，自杀 277 人.

新田县 9 月 8 日开始屠杀，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 21 个公社就有 18 个公社先后在现场大会上杀人；冷水滩市也发生了全市性屠杀事件。此外，在湘南的郴州、桂阳、嘉禾等地，都传出了大批杀人的消息。但遗憾的是，新田、冷水滩、郴州、桂阳、嘉禾等地，都没有留下杀人记录。

湖南零陵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县市杀人手段，大致归纳为以下 10 种；

⑴、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⑵、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⑶、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⑷、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⑸、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棒打）；
⑹、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⑺、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⑻、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⑼、火烧（含熏死）；
⑽、摔死（主要对付未成年的孩子）。

在毛式有政府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专政**”下，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甘肃、江西、黑龙江等省的县城和农村，也都发生过与湖南类似的屠杀，其规模、时间和波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也许是巧合。正当湘南“**群众专政**”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1967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驻脚湖南长沙，进行视察。他在视察时的讲话内容，竟只字不提湘南屠杀，却对湖南省、地一级领导面对屠杀放弃管理的不作为行为，大加赞扬，对大屠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请听，当湖南省委领导们反映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时，毛泽东赞道：**“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当湖南省委领导们反映“公检法”不能发挥作用时，主张“**群众专政**”的毛泽东回答道：**“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在坐的省委大员们，听到毛支持大屠杀、鼓动政府放任不管的讲话，无不因震惊而颤栗。这是否可以证明有人说**“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是有根据的？

那么多共产党组织、党员，难道没有一个主持正义吗？下面一则报导，请读者剖析。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见“序幕”简评四清运动附注）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 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 77 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后来县“处遗办”查明：**“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投飘到湘南的传单；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七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是子虚乌有。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然而，一个握有“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事管制和军训大权的零陵军分区，不仅**“情况上报”**中有袒护屠杀之嫌，且明知**“不宜滥杀”**却又不采取强制措施去制止滥杀，如军事管制等。对这种熟视无睹的不作为行径，同毛说的**“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和专家说的**“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联系在一起，难道不能发人深思吗？

1、大屠杀“理由”种种

毛泽东每次发动镇压运动前，都要做妖魔化阶级敌人的舆论准备。道县毛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也学会了这一套，但他们妖魔化的水平，远比毛平庸、低劣。然而，平庸、低劣妖魔化的手段，在落后、愚昧的农村，还是起到了作用。他们屠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理由”是：

⑴、“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道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上说：**“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 这是一个最普遍、最统一的“理由”。

⑵、“四类分子要造反”。这又是一个最普遍、最统一的“理由”。中共零陵地委处理文化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组，对这段历史所作的总结中说：**“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 8 月 17 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他们说的四类分子，实际上是指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

“理由”是中共赤文化**“目的崇拜”**的一种：为了达到屠杀之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敌人。因而，“理由”等于谎言。

但也有不是谎言的“理由”——毛的党员、干部们，亦即毛的“**群众**”们，还从“官本位”出发，规定了多项维护官员尊严和官僚体制的屠杀条条：

⑶、不尊敬干部者，杀！第一个被“开刀祭屠”的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当过军统特务的光棍**朱勉**。此人读过很多书，曾因特务问题坐过 12 年大牢；出狱后，仍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他对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和大队治保主任**陈甫厉**的历次“管教训话”，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而是不以为然地随便站着，大有不**尊敬**之嫌。两陈早想整整他，杀杀他的傲气。机会来了，已升任寿雁公社“抓促小组”组长的陈智希，请示上级后，便以子虚乌有的“搞反革命组织”的罪名，下令陈甫厉把朱勉“搞掉”。8 月 13 日晚上，接受命令后，陈甫厉便以“不老实”、“不请假”的“罪名”，叫了几个民兵，把朱勉挟持到山上打死。

⑷、“表现不好”者，杀！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 22 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便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他这一回家，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的父亲叫**蒋勋**，194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 年后，曾在道县担任过教师和一中校长等职，因出身不好被开除回家。其时，蒋晓初竟天真地跑到大队部，向大队干部宣传“**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干部不要乱杀无辜。但这种宣传在毛的“**群众**”看来，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表现不好”之罪，对此，毛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们，岂能容忍？于是，他同他的父亲蒋勋、二弟**蒋晓中**和几十个地子女一起，被抓了起来，遂遭屠戮。

据零陵处遗工作组统计：零陵地区被“**群众**”屠杀的 9,093 人中，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四类分子”有 3,576 人，占 39.54％，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四类分子”子女有 4,057 人，占 44.61％，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其他成份者有 1,049 人，占 11.53％。

⑸、持不同政见者，杀！当了右派造反派“红联”司令的四马桥区杨家公社秘书**蒋文明**，成了地方当局的保护伞和打手。8 月 13 日，他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向公社各大队干部发出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蒋四条指示中的“革联”，是湖南省左派造反派“湘江风雷”在道县的下属组织。参加“革联”的大多数人，都是长期受压的弱势群体，而对立面“红联”，则是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下中农和基干民兵为骨干的右派造反派。两派政见不同，在“**全面内战**”的号召下，自然势不两立。在省城长沙，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下达后，“湘江风雷”红火一时，大有半壁河山之势；但在县城和农村，那里却是右派的天下。在那里，左派造反派“革联”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湘江风雷”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会上，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郑逢格**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于是，会议决定先把**钟佩英**“搞掉”。

8 月 15 日晚上，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和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和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向钟佩英喝斥：“**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话没说完，便被握着生杀大权的民兵捆了起来，拉到山上，用锄头和棍棒把她“搞掉”。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民兵们按分付，又将她的一个 20 岁、一个 18 岁的两个儿子，分别

拉到两个山头上，先后用锄头和扁担打死。这样，在道县的“**群众专政**”中，第一起灭门案便被毛的“群众”制造了出来。

⑹、生性耿直者，杀！清塘区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三四十人冲到右派分子**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他打死，然后抛尸于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何以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1957 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许多人说他“蹲点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为人生性耿直的唐玉，帮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特派员告了，害得蒋不仅受了批评，仕途也受到很大影响。自此，蒋白举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把他捏造的“**唐玉是‘人民党’成员、想当区长**”等“罪行”，“举报”给区领导**周仁**。

8 月 17 日，在部署杀人的干部会议上，清塘区武装部长兼“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说：“**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仁也附和说：“**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当说到蒋白举“举报”唐玉要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说：“**我们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拿到“令箭”后的当天，蒋白举便带领三四十人，用乱棒将唐玉打死在禾坪上。

⑺、未婚妻漂亮者，杀！7 月，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 xx。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秀丽，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妒忌生恨，他一口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把他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脱了臼。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

伤好后的贺远能，鬼使神差使他自投罗网，竟于 8 月 24 日回到了的家里。此时的蚣坝公社，杀人已杀红了眼，屠杀人数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公社。他见势不妙，便连夜逃跑，躲到洲背岭上草丛中。第二天，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贺主席，以放跑“奸细”罪，处决了他的父母和弟弟全家人，并下令追捕他。躲了一天的贺远能，因思念未婚妻而冒险下岭，终被民兵抓获。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后，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不停地喊着未婚妻何端珍的名字。对这个可怜的情种，贺主席下令用鸟铳处决。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在支撑，鸟铳三声响后，贺远能竟没有倒下，依在石头上痉挛。贺主席又下令，把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大块石头，推到潇水河里。有人说，贺主席由此赚得了“棒打鸳鸯作话传”的恶名。其实，在中共党员干部中，棒打鸳鸯寻常见，本书就记载了多例。

2、组织实施

道县“**群众专政**”，是由中共县委以下各级党政机关和武装部的领导人会同以干部、工人和农村基层民兵为骨干的右派造反派“红联”联合组织实施的。其实施模式是：**谎言——命令——虐杀！**

⑴、召开动员大会。8 月 8 日下午，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县各区紧急会议上，他用毛式谎言炮制法炮制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谎言。他说：**“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这是大屠杀的先声：舆论准备的动员大会。

⑵、层层动员，层层部署。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 天时间，毛的“**群众**”共杀人 1,054 人，全区 50 人中就杀了 1 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杀人冠军”。蚣坝区敢于大规模杀人，主要原因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动员，层层部署：区委先召开由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和会计参加的核心成员碰头会，进行动员和部署，接着，召开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部署，然后再由各个公社召开各个大队负责干部会议，贯彻执行。

⑶、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8 月 22 日，小甲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己已落后于形势，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计划杀 5 人。大队党支部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 5 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 5 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正当县里召开会议讨论停止杀人问题时，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闻风组织了一次大砍大杀。他率领 120 名民兵，三天突击杀了 569 人，成了道县快速杀人之最。

⑷、向下摊派杀人指标。在兴桥公社坐镇的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下令民兵杀“阶级敌人”**杨贵清**。8 月 22 日晚，将杨押送到上关河边时，被民兵杨飞吉从背后砍了一马刀，抛尸潇水河中。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求部长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第二天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会议，部署杀人。

⑸、现场大会制作杀人样板。8 月 22 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虎子坪生产队作杀“阶级敌人”的动员报告。参加大会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等一千多人。大会场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周永记依照部署作动员报告：**“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现在，毛主席把专政权力交给了我们贫下中农，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接着，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

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押来批斗批斗，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还没有还过神来，头颅被一刀砍掉，鲜血四溅，喷洒到碧绿的稻禾上。杀人样板就这样被毛的“**群众**”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出来。于是，各大队纷纷效法。

⑹、“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人。最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是，在 8 月 23 日的鞭炮声中，相当于省级“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宣布正式成立。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白底红字的“**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招牌，也堂堂正正地挂在公社大院的门口。“高级法院”成立后，迅即开庭审讯了 13 个人，判处 8 人死刑。然而，几天后，公社下属的各大队，都纷纷成立了相当于中央级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那些“最高法院”自动拥有杀人的最高权力，并接二连三地判处了数十人死刑，从而使这个代表公社的“高级法院”名字上成了下级。于是乎，这个牌子没挂几天的“高级法院”，不得不灰不溜丢地摘牌收场。

⑺、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的六条。人们不禁要问：道县县委领导**熊炳恩**明明说“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为什么公社一级政府杀人即不请示也不上报而肆意屠杀呢？这是中共长期形成的赤文化决定的。毛泽东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即能反左也能反右，关键是要下级领会其“**精神实质**”。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学会了这一套，他们也要求下级领会他们讲的“精神实质”。在反复说教中，公社领导干部终于也领会到熊书记讲活的“精神实质”：**发动“群众”，进行“群众专政**”。因此，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屠杀中，道县县委没有人出来制止屠杀，熊书记也许还在为有这么多下级能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暗自高兴呢。

相对“诚实”一点的是江华瑶族自治县政府，他们的《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文件最具代表性。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 1967 年 8 月 29 日起到 10 月 25 日 57 天里，共杀了 898 人。当时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为了“制止”滥杀，他们在 9 月下发过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文件中说：“**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当然文件中也有“制止”的规定。其中最明确的规定是：“**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他们在制止杀人还是鼓励杀人？文件说“**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这种反咬一口的伎俩，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1966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准备“横扫”知识分子为牛鬼蛇神时说：“**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知识分子）**先挑起斗争。**”

应当肯定的是，在“**专政是群众专政**”和“**革命是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下，江华瑶族自治县敢于以文件形式公开说毛的“**群众**”杀人的“**大方向是对的**”，远比装聋作哑、作壁上观和掩盖屠杀恶行的中共省、市、地级当权派和道县县委“诚实”得多。

3、大屠杀模式选择

在“**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最高指示”下，毛的“**群众**”——道县的基层党员干部，创造了许多集体大屠杀模式。以下四种具有代表性：

⑴、洞口屠杀“大老虎”

8 月 26 日早晨，21 名被五花大绑着被称为“大老虎”的青壮年汉子，汇集在通往山里的三叉道口，旁边站着数十名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蚣坝公社河滩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绑来的人清点了两遍，然后下令往山里押送。这是大队党支部**周书记**根据公社“**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的部署，所采取的一次革命行动。

投错娘胎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们，由于十八年来已过惯了没有做人权利的屈辱生活，对五花大绑也习已为常了。他们对管教他们的大队、公社乃至县里的干部，再熟悉不过了：这些毛的“群众”，许多人都是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其中，不少人是心狠手辣的地痞、无赖、混混甚至流氓，在土改和而后的合作化、大跃进、四清等运动中，这些人大都变成了大小干部，因而，在这些干部面前，他们只有点头哈腰，恭顺谨饬、唯命是从的权利。而今，他们不知道他们将被押送到那里，更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走着，走着，他们已预感到有些不妙，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落，依依不舍之情出现在他们的脸上。那里有他们年迈的父母，有他们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里有他们贫困中的温馨，有受屈辱时的安抚……总之，那里有他们理不清的思念，有他们割不掉的牵挂，但他们只能在这条任人宰割的路上走着，自由地想着。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投错了娘胎，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屠场设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他们被押到洞口，每个人都被两三个民兵挟住，动弹不得。他们知道大事不好。只见何兴盛对着他们大声宣布：“**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你们死刑，立即执行！**”他们在十多年的肆意蹂躏下，已经麻木了，在死刑判决面前，他们认命了。有人回忆道：“**面对死刑，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出人意料地平静**。”

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推到洞口边，或用马刀砍死，或用梭标刺死，或用棍棒打死，或用锄头锄死，然后被推入洞里。没有人哭，没有人叫，唯一一声惨叫，是一个被打昏的人堕入洞底时发出的。

工作认真负责的何主任，在细心观察洞底的情况时发现，有人没死，还在呻吟。他决定要民兵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后扔到洞底薰烧。由于他还不放心，便打发人回村里，拿来了一包炸药，点燃导火索后，抛入洞里。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往日的寂静。共产党员何兴盛，在胜利完成这一次“**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后，紧张的心情并没放松下来，因为还有三十多个“小老虎”等着处理。

⑵、船上沉溺“小老虎”

还是这个河滩大队，还是这些共产党员，当完成了“搞掉”“大老虎”后，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摆在他们的面前：其一是，“大老虎”除掉了，还留下三十多个老的老、小的

小的“小老虎”，谁来养活他们？这对于终日以“瓜菜代（粮）”为生的贫困的河滩大队来说，未始不是一个牵动利益的大问题；其二，“小老虎”长大要报仇怎么办？对此，一个毛的“群众”理直气壮地提出：“索性斩草除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主任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中共党员，他知道公社领导部署杀人时，没有说过要“一窝端”，尽管有“群众”要求这么干，他也赞成这么干。他本能地拿起电话，请示公社领导。区委秘书回答说：“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秘书的回答，使他不知如何是好。杀“小老虎”符不符合政策，他一时也吃不准。但他坚信，这几天他们的革命行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的阶级路线，符合毛主席“**对敌人要狠**”的“伟大教导”。回想起土改时的幼稚，他悔恨不已。那时，那些大打出手、大搞“村村见血”的同龄人，一个个都升迁到公社、到县里甚至到省里当干部去了，而他呢，因受孔老二的毒太深，下不了手，当时也不知道有“对敌人要狠”的“伟大教导”，犯了右倾错误，因而多年都在小队、大队干部中徘徊。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他提供了改正错误的机会。现在，毛主席把生杀的专政大权交给了贫下中农，我们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他决心要在这次处决“阶级敌人”的革命中，先拔头筹，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怀疑秘书的回答；他要直接请示公社领导。电话又接通了，那边传来了公社书记**叶成虎**洪亮而铿锵的回答：“**全部杀掉**！”

何兴盛兴奋得跳了起来。他很快同大队党支部**周书记**决定了“行动计划”，并及时向各生产队(小队)部署了晚上的革命行动。

太阳快要落山了，潇水在静静地流着，在夕阳的映射下，河水彤红如血。早上杀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死难者的亲人们在哭泣；看见村内村外立林的岗哨，老人们已经知道，中共已经对他们撒下了天罗地网，使他们有理无处诉，插翅难以飞，他们预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土改前，地主分子**张秀姣**同她那个不苟言笑平时不愿意说话的**丈夫**一样，以积德行善称道于乡里。土改时，分他们的房产土地，她不敢有任何怨言，因而，在“村村见血”的魔难中，她和丈夫躲过了一劫。土改后，她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勤快，不争不怨，把邻里、干部关系处理得很好，为人称道；丈夫虽然不爱说话，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谅解。当他俩听说到处都在杀四类分子和子弟时，她和丈夫已预感到在劫难逃了。

敲门声，打断了思虑，中止了哭泣，难属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上集中。一个形容枯槁的生病老人问道：“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带到那里去？”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一句话使晒谷坪骚动起来，小孩在哭，老人在呼叫……他们都已变成了死囚。双方力量太悬殊了，很快在虎视眈眈的民兵驱赶下，死囚们跌跌撞撞来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在那里，身强力壮的民兵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像老鹰叼小鸡那样，把死囚们捆得结结实实，外吊一块大石头，然后把他们架到船上。当船划到潇水中心时，张秀姣那个不苟言笑的丈夫，突然冲着何兴盛大喊道：“**我们犯了什么罪？**”

何兴盛面对这些老老少少的死囚，其中不少与他还沾点亲，带点故的，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但一想到革命，一想到“伟大领袖”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谆谆教导，革命便战胜了亲情。他干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说罢下令执行。

几分钟后，31 名死囚被推入河中溺毙！其中，老的 74 岁，小的只有 56 天！

潇水河水静静的流淌着，时而发出悼念逝者的呜咽哀鸣；清晨，公社的高音喇叭又尖叫起来，播放起激励人们去拼杀的战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⑶、土窖吞噬六十二

从 8 月 13 日杀朱勉开刀祭屠和 15 日杀钟佩英一家开禁灭门起，诛杀四类分子和子女风暴，迅猛地刮向道县各地。到 8 月 25 日，跃进大队却不见动静。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说他们右倾，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是一个争胜好强的干部，是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和“四清”运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干部，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经验告诉他，要当一个优秀的出人头地的支部书记，必须紧跟党、紧跟形势，而紧跟党和形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紧跟上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现在，上级党组织号召杀“阶级敌人”，他能不紧跟吗？看见其他大队都在大砍大杀，他的手早已痒痒了；怎奈，他在大队里遇到些麻烦。全大队四类分子和子女有 64 个，占全队人口近 10%，他们与大、小队的干部、党员、团员，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和朋友关系，而其中，还有他的远房亲戚。当屠杀风刮到跃进大队时，许多贫下中农来找他说情，有的人甚至公然批评说，杀四类分子和子女不符合党的政策。在杀不杀、紧跟不紧跟的问题上，他的确有些犹豫不决，被戴上“右倾”帽子，不算冤枉。但在李部长批评后，他幡然悔悟，决定用陈永贵“大批促大干”的办法来解决杀不杀的问题。

8 月 25 日晚上，即遭公社李部长严厉批评的当天晚上，在副支部书记**左隆交**的有力支持下，何书记在召开了支委会后，便连夜召开党支部紧急扩大会议，扩大所有党员、团员和各生产队干部参加。会上，何书记在念了几段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后，严厉地批评了要亲情不要党性的说情风，尖锐地判定“杀四类分子和子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批评是反革命言论，并以极其强硬的口吻宣布：**“你要是革命，就站到党支部这边，你要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站四类分子那边。”**“大批”这一招果然奏效，那些说情者和批评者，立刻蔫不溜湫地低下了头。与会者很快便“统一”了思想，并根据党支部制定的“解决方案”，接受了规定的任务。

一切都按“方案”顺利进行。26 日上午 9 点多，64 名五花大绑着的四类分子及子女，被以何方前为首中共干部、党团员和民兵们，用武力押赴到石头山水库尾端的坪上。半途，两个有病的老人走不动了，何书记下令就地处决。两声鸟铳响后，老人倒地，抛尸河中。坪上三口昨晚连夜挖成的地窖，一字儿排在那里。在窖口前，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何光美**、**左南方**等 6 2 人死刑，立即执行！在一片哭喊叫骂声中，62 人悉数被推入窖里，接着按“方案”点燃浇上煤油的稻草，投入窖里薰烧。少许，当听不到哭喊叫骂和咳喘声后，按“方案”把地窖填平封死，上面覆盖上一层地表土！

跃进大队在党支部的率领下，把大屠杀做得干净利索，不留一点痕迹。这个后来居上大队，来了一次大跃进，放了一颗大卫星，从没有名次的落后者，一下跃进成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当何方前用电话向公社请功时，传来了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的赞美声：**“哇！好家伙，这么多，你真了不起**！”遗憾的是，他无权向何方前颁发“杀人大跃进”勋章，也没法鼓励何方前再放了一颗“杀人大卫星”。

⑷、“土飞机”炸飞一十二

8 月 30 日，小甲公社全社 13 个大队已有 12 个大队杀了人，但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却迟迟不见行动。其原因人们都很清楚：这个大队里的几个四类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很听话，表现很好；“雷公不打笑脸人”呀，小甲大队的干部咋下得去手？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见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勃然变色。在严厉批评他们“右倾”、对敌人“温情”之后，气呼呼地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当小甲大队的 12 个四类分子和子女，正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领导人时，飞祸天降：基干民兵将他们五花大绑起来，并用一根绳索将他们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然后点燃导火索，把他们 12 个人炸得血肉横飞。一位老人回忆当年的惨状时，周身寒战。他说，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像雨点一样砸落了下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有几个炸掉了屁股，没有死的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拥而上，用锄头、马刀结束了他们的痛苦。对此，刽子手们谑而虐之说：**“请他们坐了‘土飞机’！”**

在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最高指示”下，道县基层党员干部所创造的这些集体屠杀模式，令人发指。但一位知名史学家却说：**“文革是全民犯罪！”**我们质问史家：被溺毙的 56 天婴儿犯的是什么罪？还有一位知名教授，他经过多年研究后，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和**“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显然，他在为毛泽东和中共辩护。试问教授：中国人被“解放”十八年了，唱《东方红》也唱了十八个年头了，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中央政府”怎么可能会“无力”？“国家权力”怎么还会“失灵”？你的“结论”能令人信服吗？

4、人兽之间：滥杀无辜

当毛泽东用**“群众专政”**打开“潘多拉魔盒”放出贪婪、野蛮和杀戮后，他的“群众”即痞子和流氓无产者，便被各级权力部门以不同方式“收买”或重用，变成了邪恶歹徒和凶残杀手！

杀人“英雄”。目不识丁的贫农**胡茂昌**，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干净，穷得叮叮当当，没人看得起，连老婆都讨不到。但在“群众专政”中，他一跃变成了“英雄”。当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 21 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刑、立即执行时，没被安排当刽子手的胡茂昌，手心发痒。当他见一些民兵有点畏缩下不得手时，他突然跳了出来，大声喊道：**“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手起刀落，先砍掉了一个人头，接着一口气又连砍掉六个人头。当砍第八个时，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一刀接一刀猛剁，硬是把那个脑袋剁掉了，弄得他浑身是血，连他的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在他的带动下，其余 13 个人头也被民兵砍掉。杀完人后，经大队党支部书记批准，他又杀回村里，杀了地主

子女的三个毒麻仔（小孩子）。

大队党支部规定：杀一个人奖 5 元。这一天，胡茂昌便得到 55 元奖金，比他去年一年收入还多好几块。高兴之余，他用奖金打了一斤酒，一伸脖子，灌了下去。醉意朦胧中，他想到了女人。然而，自痞子当了“英雄”之后，连丑陋的寡妇见他都躲得远远的：无形的道德审判，注定他光棍一辈子。

贪婪的公安。8 月 14 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督促杀人时，听说何国新家里存有许多光洋，身上还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立大功的机会来了。他决定先把何的母亲 75 岁的**秦秀容**和 5 岁**小儿**抓起来，逼他们交出光洋和存折，然后开刀示众。然而秦老太“顽固不化”，至死不承认有光洋和存折；他又拿手枪吓唬小孩。从未有见过光洋的孙子，哀求奶奶交出光洋。奶奶摇摇头说：**“那有什么光洋。他们要杀人，还要找点理由。好细崽，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特派员大怒，遂下令将祖孙二人一块打死。

刀刃孕妇。19 岁的**唐水兰**再过一周就要做母亲了。摇篮做好了，尿布叠好了，小衣小袜都准备好了，等待着幸福的降临。然而，8 月下旬，骤然而起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她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将被押解到娘家下柳大队受审。押解的民兵是送方的**张天沙**和接方的**唐 XX** 两人。时值夏末秋初，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着，走得很慢。当三个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剩下还有一大段路程。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送到娘家也是死，还不如就在茶林里搞掉她，省得麻烦。主意已定，张天沙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底。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抽出背上的马刀，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对准在跳动的胎儿，在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也随着血浆倒下去了。刽子手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报复杀人。梅花公社东风大队民兵营长中共党员**何子良**，在 1950 年因一棵樟树纠分同区代表**何定信**打起官司来。官司打到区政府后，何子良败诉。对此，何子良耿耿于怀，十七年来一直伺机报复，苦无良机。在大砍大杀“阶级敌人”中，给生杀大权在握的何营长提供了机会，但何定信是贫农，何营长十多天也没有找到可置何定信于死地的“理由”。冥思苦想几天后，“理由”最终找到了。他以同左派造反派“革联”搞串连的“罪名”，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报请公社处决。公社也竟同意了他杀何定信的意见。9 月 5 日，何子良营长率领 20 多个民兵，将何定信枪杀于狮子山槽古里。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当晚，他以押送何定信儿子**何若英**到公社受审为名，半途将其枪杀，终于完成他的报复心愿！

昧债杀人。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部书记**唐兴浩**，是个对党忠诚的老党员。8 月 26 日，他决定处决 14 个四类分子和子女，其中包括原小学教师夫妇：男的叫**蒋汉镇**，家庭成份不好，女的是 32 岁的**周军阳**，娘家贫农成份，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当年，唐兴浩生活困难时，曾向蒋氏夫妇借过 100 元。晚上，被捆得结结实实的 14 个四类分子及子女，集中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他们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说是往区里押送。突然间，唐兴浩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这样蒋氏夫妇和他们三个 4 到 8 岁的小孩，都在被“押送”之列。押送队伍来到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

接着民兵们将 17 个人用鸟铳、梭标打死后，推入十多米深的天坑中。也许有些民兵下不了狠手，最后被推下去的蒋氏一家，都摔到死人堆上，一阵大雨后，他们先后醒来。但最先醒来的周军阳，却眼睁睁地看她的丈夫和三个子女在而后的几天里先后死去。七天后，她被她的两个学生成功救出。周军阳说：**“到了 1985 年，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唐兴浩才托人将那 100 元还给我，但他永远还不了我的四个亲人！”**

手刃养母。当历史被权力诠释为阶级斗争史后，维系亲情和温馨的孝道被颠覆，家庭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战场。她，一个豆寇年华、朝气蓬勃、容颜娇美的大队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当养母。**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视为己出。在阶级斗争的腌渍中，成人后的她，成了一个**“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的狂热信徒。当她为生身父母是贫下中农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时候，却又为养母是个地主婆而感到无比羞耻和痛苦。大队砍杀四类分子那天，她的养母不在砍杀之列。党支部研究杀人名单时，也提到了她的婶娘。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于是，党支部决定“特殊对待”，放过她的婶娘。然而，她把党支部不杀她养母的决定，当成对她的莫大侮辱。她用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亲手把婶娘押到了刑场。当大队贫协主席兼“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提醒她要“特殊对待”时，姑娘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说罢，抄起刀来，对准了他的婶娘。婶娘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冰霜的侄女问道：**“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姑娘大喝一声：**“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砍了下来。

当然，她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受到了无形的道德审判。尽管她长得很漂亮，附近几十里的后生没有人敢娶她。容貌衰谢多年后，她才被外地一位因出身不好、三十多岁尚未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原作者说，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可怜她，可怜她这个可咒的乡下女孩！”**

奸杀无名女。一个资料，记录了东门乡政府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所讲的一段往事：

1967 年 9 月 2 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个过路的女青年。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奸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以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到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把她打到深水中淹死。

读到这里，笔者已泪流满面：她，一个可怜的姑娘，可能刚刚逃出狼穴，旋又堕入了虎口，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没有她立身之地？无法否认的是：那四个流氓无产者的狰狞嘴脸，使她倍感恐怖，因而，在石块的无情追打下，软弱无助的她，带着愤懑，带着屈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向深水区蹚去……

轮奸少妇。她，隐去她的名字，是朱家湾一个贫农的女儿。去年 10 月，才与田广洞大

队的一个为人厚道、能吃苦耐劳、模样不错的地主子弟**陈高肖**结了婚。8 月 26 日晚上，丈夫被人叫走。不一会儿，噩耗传来，丈夫被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等人用乱棍打死，又砍掉了头。突然飞来的横祸，吓得她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她乘机逃回了娘家。少妇的出逃，引发了民兵们的不满。他们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什么叫“开大锅饭”？就是轮奸。于是，经党支部批准，逃跑到娘家的少妇被抓回来。这个被抓回来的“地主婆”，呼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旋遭 12 个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奸后，少妇又被强行嫁给老光棍陈高月，遂又遭奸污。被野兽般蹂躏的少妇，神志稍稍清醒，便又乘机逃回娘家。轮奸少妇的贫下中农都是些什么人？后来“处遗办”查明，按施暴顺序排列，他们是：

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贫协主席；三号，**陈锡位**，有犯罪前科；四号，**陈高和**，涉嫌杀人犯；五号，**陈吉光**，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赌棍；七号，**郑 XX**，游手好闲；八号，**陈 XX**，赌徒；九号，**陈 XX**，有贪污前科；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有奸污妇女前科。——“伟大领袖”用“**群众专政**”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就放出了这些恶棍！

支部逼婚。也是 8 月 26 日，在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党支部**周书记**亲自领导并指挥了一场革命：继上午在葫芦岩洞口搞掉了 21 个“大老虎”后，晚上又在船上沉溺了 31 个“小老虎”，成功地取得了“对敌斗争”的完全胜利。在这场革命中，**何兴盛**是当之无愧的头号杀手。之所以说周书记指挥的革命“成功地”和“完全胜利”，是因为在全大队 53 个“阶级敌人”中，已“成功地”杀掉了 52 个，留下的一个“敌人”，也被“成功地”“改造”成贫农，从而达到了“完全胜利”的目的。那留下来的一个“敌人”叫**张秀华**，是地主的儿媳妇。在那可怕的一天里，她一下子就失掉 5 个亲人：丈夫已死于葫芦岩，婆母和三个孩子，也被淹死在潇水中。她之所以能被留下，完全是因为贫农**蒋癞子**看上了她。蒋癞子虽然癞，又好吃懒做，但他是三代单传贫农，至今已 37 岁，还是光棍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该为蒋癞子们“**谋幸福，呼儿咳哟**”。在蒋癞子的苦苦请求下，为了繁衍贫农后代的革命需要，党支部最终“呼儿咳哟”地留下张秀华。可怜张秀华为了活命，麻木了，被征服了。当她被蒋癞子搂到怀里时，还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个蒋癞子从她怀里夺走了才 56 天的孩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她完全麻木了，无可奈何地成了仇人任意发泄的工具，成了仇人蒋癞子繁衍贫农后代的一台肉欲机！

宁死不嫁。在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为了苟活，像张秀华一样在刀口下屈从嫁人。但在沉沉黑夜里，也有闪耀的星光，也有威武不屈的烈女。

在竹山园子刑场，小学老师右派分子**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处决了，留下了一个女儿**向丽丽**。她，向丽丽，一个刚刚十八岁、风华正茂、天生丽质的女孩，被一个 30 多岁的穷光棍看上了。贫农光棍像蒋癞子一样，向大队党支部苦苦请求。出于繁衍贫农后代的革命需要，支部书记亲点“留下”；但向丽丽死活不嫁。于是，大队党支部又决定，把她这个不识抬举的“狗崽子”押往竹山园子——杀！在押解路上，许多社员看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临刑前，刽子手们给了她一个最后机会：**“答应嫁，就放你**！”她仍坚定地喊道：**“我不嫁！我要父母！”** 一个刽子手气急败坏地举起锄头，对准她的头就是一锄，刹那间，脑浆四溅……

比起向丽丽，三个姐妹的命运要幸运得多。三姐妹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和**涂秋蕾**，她

们在同一个大队里，都只有17岁，三人的父母都被杀害了，都成了孤女。根据几家贫下中农的请求，党支部做出了令三孤女嫁人的决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分别嫁给本队的三个贫下中农，其中一个是傻子。这是大队党支部对她们三个人的“恩赐”。但三姐妹并不领情，没一个表态愿嫁。大队头头们火了，发出威胁说：**“不嫁就杀！”**三姐妹竟异口同声顶撞说：**“杀了也不嫁！”**大概是风向在变，头头们嘴硬手有些软了，三姐妹得以死里逃生，意外保全了自己。

多余的史话：像向丽丽这样宁死不屈的烈女，在封建时代是要给她立牌坊的；但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谁敢为她树碑立传？

贼瞟母亲下身。还是那个1967年8月26日。下午，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口——一个天然的坟墓走去。老妇人叫**唐长凤**，一个地主的寡妇。在十几年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她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含垢忍辱的耐力，拉扯大了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她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的清福了。然而，道县八月的腥风血雨，毁灭了这个传统老人的最大心愿。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一齐被拉出去杀掉，推到了这个天然坟墓的洞底。她想：儿孙们都死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了好，死了干净！在押向天然坟墓的黄泉路上，她走得安然，平静，无牵无挂。当她快走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脱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民兵和旁观者贼眼溜溜地嘻嘻唏唏。她本能地“啊”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同时乞求刽子手说：**“求求你们，松松绑，让我提起裤子！”**作为人，她知道羞怯，知道维护人的尊严。然而，民兵们却嬉皮笑脸地对她说：“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快走！”唐长凤哭了。她再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民兵们用《毛主席语录》“驳倒”了老人的尊严。而后，民兵们一边骂着、嬉笑着、贼眉溜眼地乜斜着，一边推着老人快走。就这样，唐长凤被迫光着下身，一步一步走到生命的终点！

三光政策。你可能听说过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因为“主旋律”经常在宣传；你可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光政策”闻所未闻，因为“主旋律”禁止人们回忆和书写。下面的现实给你提供了些什么，请你自断。

在道县黑八月的腥风血雨中，桥头大队的右派分子**周文棟**，当一家大小5口全部被杀光后，家中留下的一切，当晚便被村民吃光、分光。道县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说，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惨遭灭门的当晚，周文棟家灯火通明，桥头大队的党员、干部和民兵们，一窝蜂似的来到周家，跟着吃，帮着分，忙着拿。他们先把周家的鸡、鸭和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宰杀后，支起炉灶，进行煎炒烹饪，然后大吃大喝起来。酒足饭饱后，他们又将周家的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衣被、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除不动产房屋外，像土改运动中分胜利果实一样，把周家分得干干净净！

对右派周文棟一户这种杀光、吃光、分光的三光政策，在道县并非桥头大队一家。

在河滩大队，当“成功地”杀掉52个“大小老虎”和把一个四类分子儿媳“改造”成贫农老婆后，当晚就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灭门的几户财产，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分配。

第二天，他们用抄来的鸡、鸭和肥猪，在晒谷坪上摆开了庆功宴。大队党支部**周书记**同文革主任兼“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一起，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敬酒道：**“昨天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现在，请大家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干杯！”**周书记仰头干了第一杯。尔后，他每敬一次酒，都要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好事者也先后举杯回敬周书记、何主任。

毛泽东“**群众专政**”的暴虐，使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残忍，相形见绌。

33-题外话星空

作者 于松然

1、正义的闪光

当道县“黑八月”的恐怖正在向四周扩散的时候，当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市县到处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候，当五类分子和子女们被红色恐怖搞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桂阳二中教师**周家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了一个 13 人的“反屠杀代表团”，北上进京告御状。

在 13 个人中，有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是死里逃生的三个人证之一。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捆着，强迫跪在薯窖边等待处决。只听一个刽子手说，吃了晚饭再来杀，另一个则说，杀了再吃。只见一刀从背后砍来，在刀刃砍进皮肤的一刹那，他顺势倒进薯窖里，砸在几具死尸上。他发现，先被砍倒的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在受重伤的弟弟帮助下，他爬出薯窖。王永和爬到大队**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制止不住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永和忙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老支书背着他来到公路上，搭上过路车，把他送到桂阳县医院。

代表团还从双牌水库和潇水里提取的水样做标本，带到北京。后经化验，标本含血量达千分之三。

北上途中，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到达北京后，他们大声吁请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关注湘南大屠杀；他们还把“湖南屠杀”简报送入中南海。强大的声势和压力，终于震动了中南海，使他们不得不摇身变成菩萨。与中央文革同在一线指挥文化大革命的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下令四十七军进驻零陵，制止以道县为中心的大屠杀。湘南大屠杀在周恩来、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下，终于被制止了。侥幸存活下来的五类分子和他的子女们，都感动得

高呼起“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来！

2、迟到的通告

从1967年8月13日开始的大屠杀，在正义人士的状告下，终于“感动”了“上帝”！1967年9月27日，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紧急通告》20天后，即10月17日，大屠杀才被控制。

3、我不能超越时代

正当县里召开会议讨论停止杀人问题时，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这个从土改、镇反、大跃进等运动的大砍大杀中成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为了证明革命立场坚定，闻风又组织了一次突击杀人行动。他率领120名民兵，三天突击杀了569人。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被判十年徒刑。对此，这个血债累累罪有应得的流氓无产者，在服刑中无限委屈地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尽管袁礼甫罪有应得，甚至有人愤怒地骂他是罪大恶极的魔鬼，尽管他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说“**我不能超越时代**”却切中“伟大、光荣、正确”作祟的要害。因为，这个滥杀无辜的时代，是“伟大领袖”一手造成的！

4、历史的记录

1966 年，当“伟大领袖”号召破“**四旧**”、“**横扫**”和造反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以北京大兴县为代表的“**红八月**”农村大屠杀，仅大兴县一地，就有 325 个农民惨遭屠杀。那次大屠杀传出后，被“伟光正”制止了。1967 年，当“伟大领袖”又号召“**内战**”、“**群众专政**”时，全国各地又出现了以湘南道县为代表的“**黑八月**”农村大屠杀。仅湖南零陵地区，就有 9,093 个农民遇害。这次大屠杀传出后，又被“伟光正”制止了。

这两次农村大屠杀传出后，都被“伟光正”制止了，体现他们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他们既是代表革命撕毁法律的怂恿纵火者，又是代表”正义”制止乱法的“积极”灭火者。**

常言道：“只有再一再二，无有再三再四。”两次大屠杀被制止后，理应不会再有第三次大屠杀，然而，到了 1968 年，中华大地又迎来一轮新的、规模更大的大屠杀，这就是以广西为代表的“**韦六八**”大屠杀——1968 年广西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广西农村的大屠杀，仅广西一省就导致 4～6 万农民死亡，200～300 人被吃掉。

在中共领导下的**和平环境里**，这种“号召→屠杀→制止＝＞又号召→又屠杀→又制止＝＞再号召→再屠杀→再制止”的悲剧，年复一年地不断发生；而其组织屠杀的领导干部，1966 年是公社一级，1967 年提高到县一级，1968 年又蹿升到省一级，这种不断升级的“提高”和“蹿升”，难道不能令那些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深醒吗？

5、当“卖国贼”和“亡国奴”的经历

当笔者从一些资料里摘录、编辑、评述上述屠杀事件时，双手颤抖得几乎无法自制。人们不禁要问，在和平的年代里，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野蛮、残忍？是我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基因的遗传？还是马列毛先生的仇恨主义在作祟？这不由自主地使笔者想起了那遥远的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

那是在 1944 年的洛阳，笔者九岁。鉴于南京大屠杀的教训，在日军攻陷洛阳前，十万城中市民闻风逃离家园，国民党 15 军撤退后，留给鬼子的是一座空城。笔者随舅父母仓皇出逃乡下，在三个村子里展转流亡了三个多月。国民党撤走了，鬼子尚未进村，没听说过共产党，也没有见过以村民为肉盾、“打了就跑”的游击队，那里的农村出现了权力真空。然而，真空很快被中华文明自动填充。在乡间士绅的安排下，邻里间包括像我们这些逃难者，都能相互关照，和睦相处，村民生活、生产都能照常进行，连村里私塾都能照常上课。三个多月里，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一起仇杀、奸杀和抢劫事件。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唤醒，朦胧中见两个舅父非常紧张，正在召唤我的五个表姐表姨往一个矮洞里爬（她们都处在鲜花般的年令段），然后用柴禾堆把洞口堵住。原来鬼子要进村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坦克开到村寨的大门口，又退了回去。第二天，“空气”十分紧张，年轻的妇女都躲了起来，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点心糖果之类好吃的东西，有的上面还插着一面纸糊的像膏药一样的鬼子太阳旗。一夜没合眼的舅父，脸色苍白，借了一张桌子，也忙着往上摆放好吃的。不记得是谁塞给了我一个纸糊“膏药”旗，要我拿着。**显然，村里人都作好了“欢迎”鬼子进村的准备：**摆设糕点面食以迎日军，俨如当年毛泽东所赞“**箪食壶浆以迎红军**”那样。那一天，我随着长辈们当了一天小“卖国贼”，也没见鬼子进村。第三天，来了几个“皇协军”（伪军），和大人们嘀咕了一下，紧张“空气”才算缓和下来，表姐表姨们才敢爬出黑洞。三个月后，鬼子展开“和平”攻势，鼓吹“**中日亲善，打倒英美**”。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下，特别是在相对宽容的同化政策诱惑下，逃到乡下的城里人，都陆续应召返城。洛

阳街道又热闹起来。学校也纷纷开学，像当年满人用辫子来征服汉人一样，设日语为主课以同化中国人。在“中日亲善”的攻势中，每逢节假日，家家户户门口两边，都必须插上两面国旗：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面日本帝国的“膏药”旗。就这样，我又随着长辈们，当了一年多的小“亡国奴”。

在记忆中的童年时代，笔者虽曾目睹过中国人有奴性基因的表现，却未曾见过中国人有野蛮、残忍基因之乖张。——童年所见所闻，埋在心底数十年。今日借书外泄，静候“爱国者”的叱骂！

34-文革第四轮大屠杀——“群众专政”在广西

作者 于松然

（本节根据以下数十篇资料撰写：《广西“文革”时的吃人事件》、《红色纪念碑》、《韦国清南宁屠城四二二全军覆没》、《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官方文书：文革中的杀人记录(广西)》、《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广西文革杀人记录》、《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等）

1、 广西魔头韦国清

魔头**韦国清**，原名韦邦宽，壮族，1913 年生于广西东兰县，狎称“广西王”。文革前，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区政府主席，文革中，历任区“革筹组”组长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文革中，他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紧随周恩来的指挥棒转，在广西屠杀了约 18 万“阶级敌人”，是广西抗战八年中死亡 115,159 人的 1.56 倍，当上了全国省级第一杀人魔头。据《广西文革大事记》记载：1968 年 5 月，在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委会后的几天里，全区县以下农村，共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等各种“阶级敌人”18,000 多人。1968 年 7～8 月的一个多月中，又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屠杀“坏人”84,000 多人。由于革命立场坚定、“对敌人狠”，杀人不眨眼，很快荣升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1989 年 6 月 14 日，他恶贯满盈，病死于北京。

韦国清是个标准的、忠诚的共产党党员。

……

进入 1968 年，善于窥测上层权力斗争方向的韦国清，察觉风向在逐渐变化，毛泽东正

在不断地向党内右派当权派、向右派将领伸出橄榄枝；特别是当毛泽东 4 月 8 日发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后，他敏锐地察觉,“老朋友”斗争大方向已开始从党内“走资派”向传统阶级敌人身上转，左派造反派的使命行将结束，终将被抛弃。于是，他抛开“检讨”，支持各县武装部武装“联指”，支持“联指”冲击军械仓库，夺取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为了给剿灭“四二二”和实行“**群众专政**”制造借口，他一手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号召“**刮起十二级台风**”进行“**群众专政**”，指导“联指”全面清剿“广西分团”的“四二二”，毫不手软地镇压包括“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在内的一切“阶级敌人”。《七三布告》公布后，他乘风借势，派部队协同“联指”作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清剿和屠杀。

2．左派“四二二”的末日

1967 年 7 月到 8 月，毛泽东虽然知道“**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造反派，但他深信，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左派造反派的支持，可以迅速改变少数派的被动局面。因此，他信心十足地做出了“**武装左派**”组建第二武装和发动他的“群众”进行“**群众专政**”的两项重大决策。但当听到周恩来“清君侧”暗示后，权谋大师立即做出了“清江侧”的决定，抛出爱臣王、关、戚，做出了与右派将领妥协的姿态。显然，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故技重试，借以先稳住军队，再徐图良策。为了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1968 年春，权谋大师又做出了“清周侧”的决定，抛出了爱将杨、余、傅，强化了林彪等左派将领对军队的领导。从此，林彪也开始走上了不归途。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打得并不如意。他所期待的类于重庆左派完全胜利的“一二四”事件并没有在各地重演。各省党政军当权人都在玩弄权术，**或**打着“支左”的旗号“支右”，**或**借着武装左派的名义武装听话的右派，**或**将中央文革支持的左派一分为二，变成势不两立、相互争斗的两大派组织，**或**武装左派为我所有，变成打击政敌的工具，等等。到了 1968 年，全国已告别了冷兵器内战时代，进入了除飞机、导弹外的现代化热兵器内战时代。武斗双方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旁观者谁也分不清谁左、谁右。到此，天下一片混战，终于达到了毛泽东向往已久的“**天下大乱**”的境界。

但要实现毛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谈何容易？1967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本想乱中夺权，使党内左派主导国家一切的毛泽东，到此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内战已经失控，如不加以控制，一旦那些骄横狂躁的右派将领们和党内右派当权派联起手来，势必发动兵变。到那时，不仅文革毁于一旦，他缔造的“新中国”也将分崩离析。但权谋大师的天才在于：他清楚地知道，对于右派当权派和将领们来说，**权力高于一切，亦即权力高于主义，高于路线，高于法律，高于道德**，一句话，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建立在权力拜物教基础之上的。因此，只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转移到枪口一致对外上来，积极恢复秩序，满足他们权力上的追求，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于是，权谋大师在抛出爱臣王、关、戚之后，便发明了“继续革命”理论，开始了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的进程。为此，他频频向党内右派伸出橄榄枝：在最大限度孤立刘少奇党内右派集团和释放出区别对待邓小平和解信号的同时，适时地、逐步地“解放”了很多被打倒了的党内右派当权派，把他们“三结合”到各地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以分享权力来

共同控制局势。

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就要做出牺牲。于是，他又做出另一个重大决定：适时地抛弃左派造反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左派造反派被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对左派造反派，毛泽东早有定论**：左派造反派是股可利用不可重用的势力，他们只能充当向右派当权派即“走资派”夺权的主力，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诉求，注定与新生政权格格不入，终会被抛弃或镇压。1967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在这里，他点明“跳出来”不是指共产党官员、当权派，而是在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即左派造反派。**对右派造反派，毛泽东也早有定论**：只要他们能摆脱党内右派的控制，并反戈一击，紧紧跟着他，去夺取那些敢于与他分庭抗礼的“走资派”的权，他们同过去一样，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依靠的基础力量。

一年前还被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赞誉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四二二”左派造反派，其利用价值已消耗殆尽：在毛泽东新的**妥协、分享权力**的决策下，他们被扣上了**“牛鬼蛇神总司令部”**和**“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两顶大帽子，倏忽之间，他们便从一个“响当当”的革命派，变成了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组织”**。尽管“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事件到十五年后的 1983 年，被中共彻底平反。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准，发布了针对广西左派造反派**“四二二”**的《**七三布告**》。《布告》以严厉的措词命令“四二二”：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接着，1968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批准，针对陕西出现的左派专业武斗队，发布了《**七二四布告**》，进一步敲打“四二二”。《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紧接着，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北京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警告曾为他夺权而冲锋陷阵的左派领袖们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尽管五大领袖争辩说，把杀人放火都归到他们头上“不公平”，他还是毫不留情地警告这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此刻，毛泽东所借助红卫兵造反派的那口屠刀的使命已经完成，“狡兔死，走狗烹”，他的痞性使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 1966 年 8 月 22 日他批准公安部下达的《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平民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召见五大领袖的决定，使党内右派当权派扬眉吐气，他们同右派将领一起，开始了围剿左派造反派战争行动。广西韦国清是这种行动的典型代表。

3．《七三布告》前的“群众专政”

鼓吹**“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的确把全面内战鼓动了起来。但到 1967 年秋后，他发现内战中没有占多少便宜的左派，不听话的倾向有所发展。于是，他改弦更张，加快了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的进程，开始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的哲学观是**“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哲学，却又使他常常变成外因决定论者。当 1960 年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传入中南海时，毛泽东本能地一拍脑袋就知，这是“外因”“地富反坏右”搞破坏的结果，与他的“三面红旗”的“内因”政策无关。于是他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 1967 年的混战中，他本能再现，一拍脑袋便知，混战是“外因”**“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搞破坏的结果，与他的**“全面内战”**、武力**“夺权”**号召等“内因”无关。1967 年 12 月 18 日，他对来访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接着，他便做出结论：**“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显然，在这里，“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已把“外因”变成了“根据”。因此，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分享权力，他要卸磨杀驴，煎烹走狗。自此，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大方向”开始由向“走资派”武力夺权转到镇压传统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上来——左派造反派面临灭顶之灾。

听到这个“最高指示”后，党内左、中、右派大多数都能团结对敌，因为，镇压 18 年来被他们反复清算过多次的弱势群体，是他们共同的理念和本能。当然，也会有少数较有良心者，他们反对那些右派痞子、流氓无产者的胡作非为；但当听到毛泽东在 5 月 11 日发表的支持右派的讲话后，为了安全，他们只好变成了旁观者。因为，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警告他们：**“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

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他们十分清楚，此时毛所指的“群众”，就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右派痞子和流氓无产者。

在镇压左派“四二二”和弱势群体上，韦国清力拔头筹，成为利用毛的右派“**群众**”进行“**群众专政**”最为突出的佼佼者！据史料记载：

……

由此可见，在《七三布告》前，韦魔屠杀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应在 25,000 人以上。

4. 《七三布告》后的“群众专政”

1968 年 7 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已宣判了广西“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的死刑，而《七二四布告》的发布，则宣判了全国各地左派造反派的死刑。两个布告公布后，广西“联指”与“四二二”之间的派性武斗，随之转变为政府派军队、民兵与右派“联指”联合在一起对“四二二”左派造反派的武装镇压。此时的“联指”等右派，也随之名正言顺地转变成新的官僚特权阶级的打手和炮灰。

《七三布告》后，得到指令的韦国清，加快了镇压“四二二”左派的军事部署。

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为了一举剿灭对手“四二二”派，从 1968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3 日，在《广西日报》上连发九篇社论。社论祭起中共党的传家宝——**煽动仇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敌人，**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号召毫不手软地屠戮所谓牛鬼蛇神的“**二十一种人**”。九篇社论史称“杀人九论”。

《七三布告》发表后，“四二二”派的头头们，这些昔日的“**革命先锋**”们，当年以“**追随毛主席起来造反，为保卫毛主席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己任，大有唯我革命、唯我响当当的自豪感；然而，两年后的今天，他们却变成了“**革命对象**”，陷入了“狡兔未死烹走狗”的惨境。上当受骗的感觉，使他们无法接受失败这一严酷现实。于是，他们中间的死硬分子，便孤注一掷地“悲壮应战”，直到“悲壮牺牲”！

……

随着军事围剿的胜利，韦国清根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下令大“**刮十二级台风**”，乘胜镇压一切“阶级敌人”。据有关史料记载：1968 年 7 ～ 8 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和各地、市、县革委会以及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追剿“四二二”，镇压“**反共救国团**”和“**二十一种人**”等“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 84,000 多人**。其中，杀人较多的县市有：

……

5．人兽之间——兽行种种

以韦国清为代表组织实施的广西农村大屠杀，比 1966 年“红八月”里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屠杀和 1967 年“黑八月”里以湖南湘南为代表的大屠杀，无论在数量和残忍上，都更加肆无忌惮；北京、湘南的种种屠杀暴行，在广西都复制重演，其暴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层的政治构陷、活体人展和下层的霸女敛财、烹食人肉，构成了广西魔头韦国清实行“**群众专政**”的特异色相，其中，尤以吃人肉为甚！

兽行之一：政治构陷

中共不但善于构建一群异类，诸如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走（资派）等敌人，善于虚构一个 xx 反革命组织，套在 xx 异类族群头上，而且还善于妖魔化这些族群或组织，“揭露”他们已给国家造成了某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和耸人听闻的破坏。这是中共最拿手的统治策略——政治构陷，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构陷不断重复上演，做为“革命领导干部”的韦国清，自然轻车熟路，对其运用自如。

为了给政治对手致命一击，1968 年 5 月 17 日，韦国清得意之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正式出笼。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破获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 63 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 2 月 2 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等等。

这个子虚乌有的、1984 年终得平反的特大假案，在当时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是被毛泽东首肯的“铁案”。韦国清等广西官僚特权阶级的政治对手“四二二”左派造反派，在“铁案”笼罩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随着“四二二”派的覆没，其生存权也惨遭“**群众专政**”的肆意践踏！

在 1968 年，韦国清政权发动的围剿“四二二”的军事行动，都是打着清剿《反共救国团》的旗号进行的，而且取得了成功。

在反《反共救国团》中，无辜的群众和干部，遭到了“**群众专政**”的蹂躏。据《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 年》记载：南宁市部分单位不完全统计，被列“反共救国团”的有 3,547 人，其中，已被批斗的 1,722 人，关押 957 人，打死 37 人，自杀 34 人，致残 2 人，下落不明 4 人；柳州市十四个单位统计，受审查的 438 人，其中，被关押 45 人，致死 16 人；百色地区共追查“反共救国团”嫌疑案 104 起，批斗 9,274 人，其中，打死、逼死 1,073 人，伤残 2,135 人；那坡县追捕“反共救国团”551 人，其中，活活打死 8 人，打伤致残 43 人，47 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判刑，等等。

上行下效。玉林专区容县的“贫下中农”，一马当先，双手轻轻一抬，便抓出了一大批“反共救国团”组织。他们抓出的“反共救国团”组织有：容县“四二二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国军”、“杀人战斗队”

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在短短几天间，**一个小小**容县，遍地都是“反共救国团”，而坐在县委大堂上的中共权贵们，竟都能安然无恙！

直接死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的干部和群众有多少？1968 年 7 月至 8 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地方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各地“联指”指挥部，在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 84,000 多人，其中多数与“反共救国团”一案有关。据此，有学者认为，直接死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的干部和群众，应在 50,000 人以上，致伤、致残者难以计数。

在罗织罪名的赤文化熏陶下，1968 年 6 月 10 日，宁明、崇左、扶绥三县又先后“破获”了“**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和“**二〇三战略部**”等四个“反革命集团”。此案涉及南宁地区五个县，连越南的陆平县也牵涉了进去。涉案“罪犯”宁明县 619 人，崇左县 222 人，扶绥县 11 人。1970 年 4 月 9 日，四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黄志忠、卢秀业、黄敬贤、黄吉林、林春初、陈韬、王石养**等 7 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80 年 11 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所谓“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二〇三战略部”纯属冤假错案：一无反革命纲领，二无反革命组织，三无反革命行动计划。

南宁地区的扶绥县笃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县、区三级重点，是韦国清政权严抓“**群众专政**”的样板。1968 年 5 月中旬，扶绥县革委会在笃邦公社所在地，召开了一次有 1,064 人参加的现场会。会后，笃邦公社根据现场会对敌斗争的部署，经过对受审人踢、打、跪、吊、吃屎、喝尿，或将受审人衣服扒光滚 20 米高的陡坡，或将受审人塞进泄洪管用水将人从另一端冲出，或将受审人脱光衣服推进石灰池中翻滚，用等等系列酷刑，挖出了“**反共救国团**”、“**红青战斗团**”、“**中国救民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揪出“阶级敌人”1,500 多人。其中笃邦大队抓出“反革命分子”58 人，打死其中 6 人。

在韦国清的领导下，南宁地区革委会，把扶绥县笃邦公社用酷刑深挖的验方，总结上升为“笃邦经验”，向全自治区推广。

兽行之二：活体人笼展 （略）

兽行之三：杀男霸女掠财产（略）

兽行之四：人食人

白居易在《轻肥》诗中咏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读此句曾使我惊颤！岳飞在《满江红》中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读此句几乎使我发抖了！笔者思忖：连我们所崇拜的英雄都是餐胡虏肉、饮匈奴血，难道我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真有嗜人血、啖人肉**悖逆天道的邪恶**吗？

翻开历史一看，笔者大吃一惊地发现：果真如此！

《吕氏春秋》记载：卫懿公被翟人所杀，“尽食其肉，独舍其肝。”《资治通鉴》记载：王莽被悬首示众后，“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晋书》云：“士众从之，啖死人肉。”《旧唐书》说：“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儿蒸而啖之。”《太平广记》中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伏诛后，“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新五代史》说赵思绾：“城中食尽，杀人而食。”元《南村辍耕录》曰：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明史》写道：“把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云：“盖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彭遵泗《蜀碧》卷四云：明末“蜀大饥，人相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云：“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又据史载：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清同治三、四年间，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

尽管如此，这种悖逆天道的兽行，在华夏文明的洪流里，不过一股邪恶逆流而已！

到了中华民国，人食人的邪恶兽行似无改变。陈沅森在《佛怀煽仇录》中写道：“**农运大王彭湃**(笔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 20 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笔者少年时期，也曾听老人们说过灾荒年人相食的故事，只因年代久远，细节忘却，无法书录于此。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了，“当家作主”了，人食人的邪恶兽行理应终结；遗憾的是，在马列毛仇恨主义的教唆下，在和平环境里，人食人的邪恶兽行非但没有终结，反而有所发展。在 1960 年前后的三年里，当“三面红旗”在大陆上空猎猎飘扬、数千万农民在饥饿中纷纷倒下之时，为防止四方异见的传播，毛泽东用“舆论一律”撒下天罗地网，给人的嘴头、笔头贴上能过滤负面信息的封条；但封条密而有漏，人吃人的丑闻，还是被人从毛的监控疏漏中偷越，悄悄从安徽、河南、甘肃等地传出。到了文革高潮的 1968 年，在毛泽东阶级仇恨主义和“**群众专政**”的鼓噪下，人食人的邪恶兽行又发起飙来。在广西疯狂屠杀弱势群体时，有数百人被毛的“**群众**”即痞子、流氓无产者吃掉。如果不是邓小平急于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曾一度允许官方和民间调查、报导、著书，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还会被“舆论一律”封锁在官方的档案中，或者被“主旋律”闷死在人们的“腹中”。

在继承人食人悖逆天道的兽行上，广西武宣县当属首恶之县。

1968 年 5 月 13 日，韦国清的“御林军”右派“联指”总部，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 900 多人，攻打“造反大军”盘据在武宣县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打死 97 人，毁掉房屋 67 间，价值 37,900 元；抄家 37 户，被抄去财物价值 26,600 多元。自此而始，“联指”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兽性逐渐发飙，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吃起“造反大军”人的肉来。6 月 14 日，武宣县革委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军分区“刮台风会议”精神。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部长**文龙俊**在会上号召：**“对敌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

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把政策交给群众。搞阶级斗争不能手软……”于是，武宣县处处变成杀人场，队队大摆人肉筵。中共广西整党办的内部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披露了1968年鲜为人知的机密（文字稍做修订）：

6月15日，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多人，将仇敌“造反大军”的**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游斗到车缝社门口时，便将四人活活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去死者的肝，割掉他们的肉，拿着回大队部会餐。到8月底，该县与“联指’观点相左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吃掉。吃人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和中共党员，他们都是毛的“根红苗正”、先进阶级出身的“**群众**”。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桀**，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18大队大队长，“解放”后，曾任仓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桀被打成“叛徒’；又因他同情左派造反派“造反大军”，7月1日晚，在该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残忍打死。翌日晨，**黄佩农、张继锋**等人，遵照毛“**对敌人要狠**”的教导，挖出他的肝，剥下他的肉，剩下一副骨胳。接着，凶手领着一群人，在学校宿舍巨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和肝吃。一时间，学校里火烟缭绕，腥风飘荡，其阴森可怖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时，**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当场把他们杀死，然后把尸体拉到平昭码头，割下他们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下酒。有二三十个“根红苗正”的“**群众**”，参加了人肉酒筵。

又据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记载：6月18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当药用。

当宣武县吃人猖獗时特别是学生也吃起老师、校长的肉时，县文化馆工作的“摘帽右派”**王祖鉴**，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向中央控诉。他避开邮局的严密监控，通过友人将控告信送进了中南海。两个月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少将率兵一个连，直趋武宣，才制止了近三个月的人食人红色暴行。吃人肉被制止了，举报人王祖鉴却遭到了残酷批斗。

武宣县官方“处遗办”，根据各公社1983年7月4日的统计，列出了个《**武宣县被吃人肉者名单**》：

黄茆公社九人：1 **新贵：黄礼康、覃伟成、黄德安、黄德惠、覃乃光、黄荣昌**；2 **大浪：覃世情**；3 **上兀：覃会文**；4 **马天：覃守珍**。

二塘公社二人：5 **四通：覃国良**；6 **朗村：方宏南**。

武宣公社九人：7 **官禄：韦尚明、谭正清、黄振基、谭启荣**；8 **雅村：覃荣生、卢汉才**；9 **大禄：陈魁达**；10 **草厂：黄志华、郭冀基**。

武宣镇六人：11 **武北：覃乃武**；12 **北街：周石安、周伟安**；13 **河边：杨贵才**(？)；14 **西街：汤展辉、梁文振**。

三里公社十人：15 **上江：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廖天龙**；16 **台村：陈承云、陈汉宁、陈徐建**；17 **五星：李占茏、李锦良**；18 **五福：陈大长**。

东乡公社八人：19 **三多：雷炳绪、吴华堂**；20 **金岗：刁其棠、刘达瑞、刘茂槐**；21 **长龙：张福展**；22 **李运：李瑞仔**；23 **麻村：刘业龙**。

禄新公社二人：24 **古碌：林信忠**；25 **上堂：梁道邦**。

桐岭公社三人：26 **统安：韦国菜**；27 **大同：廖耐南**；28 **新龙：谭世 X**。

通挽公社十一人：29 **花马：陈国萝**；30 **大昌：张文美、张永亨**；31 **大团：甘加杞、甘大作**；32 **尚满：陈光厚、张孟团**；33 **江龙：陈炳现**；34 **古佑：覃和家、覃允琢**；35 **安村：陈天然**。

国家干部四人：36 **桐岭中学：黄家柒**；37 **武宣中学：吴树芳**；38 **黄茆小学：张伯勋**；39 **组思灵卫生所：韦金光**。

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 1 人，挖心肝的 56 人，割生殖器的 13 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 18 人；活割生剖的 7 人。

根据中共制定的处遗“宜粗不宜细”方针，官方没有做深入调查；上面 64 人名单，显然是个各公社大大缩了水的上报名单。又据《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武宣县在‘文革’期间，有七十五名死者被挖肝吃肉。”**

武宣县毛的**“群众”**究竟吃了多少人？官方与民间说法很不一致。民间人士认为，吃了一百几十人；据吃人肉举报者王祖鉴说，武宣一个县，他个人即可列出 100 个以上名单。对此，官方不予承认！

为了平息民愤，根据中共**“先杀后抚”**的惯例，武宣县当局对吃人肉者也做了处理。县“处遗办”有一份因吃人肉而受党纪政纪处分者的名单：

1、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的共二十七人,他们是；**韦善端**……(其他名字从略，下同)

2、非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干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共十八人,他们是：**甘兰光**……

3、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的共五人，他们是：**龙集**……

4、非党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的二十一人，他们是：**谭振芳**……

5、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的共五十九人，他们是：**何久海**……

此外，“处遗办”还记录了两个干部的恶行。他们是：

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王文留**(女)，群众揭发她专吃男性生殖器，但调查时她死活不承认；“处遗办”根据“宜粗不宜细”方针，对她只做了开除党籍、降为工人处理。策划杀人并参与吃肝的县委干部**谢锦文**，“处遗办”仅给了他开除党籍处分。

广西其他各县，也先后发生过吃人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在隆安、大新、上林、武鸣、浦北、灵山、贵县等县，都有雷同于武宣县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记录。

1968 年 3 月 23 日晚上 9 时，在**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的策划下，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然后剖腹、取肝、胆，煮食。

4 月 25 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 24 人，被剖腹、取肝、煮食、下酒。全公社被杀害 180 人。**刘维秀、刘家锦**等人，先把**刘振坚**打死，再将其 **16 岁的女儿**轮奸、打死，然后剖腹、取肝、切乳、割阴，煮食下酒。

5 月 28 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连长**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 20 多人，持械抢杀**何以路**等 3 人。杀后割腹取肝，准备食用，余下陈尸野外。

在**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阶级敌人”，先后被挖肝、割肉，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直到 1983 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被迫交出来。

在**上林县**，据说当地人认为吃人肝大补、壮胆。8 月 7 日，在乔贤区乔贤大队“四二二”分子**蒙光忠**被打死后，凶手剖其腹取其肝，煮吃。

据**钟山县**公安局预审档案“**易晚生杀人案**”中记录：在四哨村，一个叫**易晚生**的贫下中农，亲手杀死了地主子弟**邓记芳**后，举刀剖其腹，掏其心、肝、胆、肾，并将其切成手指头粗细，分给其他人吃，他自己拿了三个指头宽、两寸长的肝回家吃。

但据广西“处遗办”调查统计，该自治区从 1968 年 3 月下旬至 5 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事件 11 起，共 21 人。显然，这是个大大缩水的政治统计。

人吃人，并非广西一家。

在四川省**资阳县**，一个当年亲历现场年仅十三岁的马由子写道：

“我对共产党并无私仇。文革时也才十几岁。没有挨过批斗。但却看够了杀人、死人的场面。我亲眼看到割人肉，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第一个被割的是一个红卫兵武斗头目，叫**孟长江**。那大约是在一九七零年。孟住我老家四川省资阳县正东街。他当时是‘文攻武卫第二指挥部’总指挥。全家根红苗正，母亲人称‘双枪老太婆’，是街道革委会主任，阶级觉悟高，爱憎分明。武斗中都是英雄，为捍卫无产阶级思想冲锋在前。”

马由子说，在一次“孟又主动‘义务’到街上‘值勤’”时，开枪打死了一个农民，被判处死刑。在孟被枪决后，发生了一件让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他写道：

“谁知突然一个农民掏出一把菜刀，喊着：‘我要挖他的心，剥他的皮！’几刀之下，热气滚滚的肠子便流了出来。我好像闻着腥味，赶快就躲了出来。蒙住眼却又从指缝里看。只见几个人拿着肠子翻，把肝、肾、心都摘下，分成几块。又有几个扒掉孟的衣服，割臂上的肉，舌头也割下来了。有人在一边鼓劲：‘**干得好！老天为我们伸冤报仇啊**！’突然还有人喊了一句‘**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没有人跟着喊，大家多在看热闹，笑的哭的各半。有几个拿着要件的还显示了一番战利品，说是回家下酒去，先走了。

“一会，又来了几个农村女人，大声哭着，一个说是要找药引子，苦胆。可下不了手，求人帮忙。正好苦胆还在残肝上，于是有‘好心人’去摘下，河水里洗了洗。她接过去，千恩万谢走了。

“更晚回来的人告诉我，孟的头被砍下来，挖了眼睛，耳朵也被人割走‘下酒’去了，肚腔塞满了石头，下身也给砍走。晚上，孟的母亲和兄弟去拖走了尸体埋在了无人知晓之处，

以免再被鞭尸。”

这个右派造反派“文攻武卫”总指挥的下场，着实让人可怜！

笔者恸而评曰：当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被毛泽东的中共当成罪恶的渊薮加以批判并颠而族之之后，人食人的邪恶兽行，就被毛的“群众”——包括痞子、流氓无产者在内暴民们继承了下来，并把他们自己与禽兽等同起来！

《吕氏春秋．顺民篇》曰：“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

在赤文化的词典里，中共拥有撒谎、批判、杀戮的特权，没有商汤“**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的胸臆，因而也不存在效法商汤致歉或下《罪己诏》的义务。在他们的教化下，一代“**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禽兽本性。作家郑义在钟山县采访了那个叫**易晚生**的凶手，并为其留了一张魔影。面对采访，这个穷困潦倒、干瘪憔悴、奄奄待毙而又飘飘然的八十六岁老头儿，还以“革命者”自居，举着他那指如猴爪的左手，“大义凛然”地说：“**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 他挑战采访者说：“**是我杀的，谁来问也是这个话。**”活脱脱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泼皮！——这就是毛共实行“**群众专政**”时所依靠的“**群众**”！这与毛说红军时要“**靠那些流氓分子**”打仗，何其相似乃尔！

历史再次证明：不论什么时代，不论那个民族，不论谁人当权，只要当权者肆意毁弃法律，恣意泯没道德，不惜用铁血取代文明，人的兽性就被解放，便会张牙舞爪、荼毒生灵。历史不会宽恕那些禽兽式的痞子、流氓、刽子手，更不会宽恕那些打着解放旗号去解放禽兽的领导者和纵容者——利用痞子、流氓无产者即暴民进行血腥“**群众专政**”的中国魔王毛泽东和广西魔头韦国清，势必被铁钉在人食人的历史耻辱柱上。

35-点评：毛泽东的“群众专政”

作者 于松然

八十年代，笔者曾想赴道县调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中国儒家崇“仁”尚“义”，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朴归真的目的，即“道法自然”。——这就是使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的儒释道文化。如果没有权力阻挠，这种文化可以自然而然地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文明价值融合在一起。

中共引入的西方马列理论是一种什么文化？它是权力拜物教文化或曰乌托邦共产主义。这种丛林乌托邦文化，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的“科学”包装下，两个主要特征强烈地表现出来：**“暴力崇拜”**和**“目的崇拜”**。笔者写道：

“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恩格斯说：**‘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列宁说：**‘暴力比 100 次辩论更有效。’**因而，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继而，邓小平说（网传待考）：**‘杀 200 人，保 20 年稳定。’‘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等等，就是‘暴力崇拜’的宣泄。‘成王败寇’是‘目的崇拜’，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罪恶导师’马基雅维里说：**‘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普列汉诺夫谴责他的学生列宁，为了胜利**‘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胜利者不会受责备。’”**

因此，胜利者的任何谎言、任何“妖魔化敌人”的卑劣手段，都是革命者的最佳选择，都应加以美化包装，任何“责备”都是对革命的“反动”。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造成亿万人死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丛林乌托邦文化，或曰赤色恐怖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真、善、美的蹂躏，是对自由、民主和人权普世文明价值的颠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邪恶向文明挑战的赤色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即**“打天下，坐天下”**、**“朕即国家”**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文化糟粕支撑下，以马列主义与中国专制文化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主宰了中国，打开了人类兽性的“潘多拉魔盒”，解放了一大批屠戮杀人狂、挟嫌报复狂、见利忘义狂、借刀杀人狂和落井下石狂，还造就一大批崇毛媚共的犬儒，使华夏文明的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付出了 200～300 万人惨遭屠杀的巨大代价！

对此，天才的毛泽东早有预期。1967 年 5 月 16 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总之，在毛泽东看来，他解放出来的**“群众”**，乱批、乱斗、乱打、乱砸、乱烧、乱抄、乱游斗、乱驱赶和乱杀戮，都是天经地义的，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仅**“天掉不下来”**，而且**“女人照样生孩子”**！

显然，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表面上看是无政府主义的，实则为有政府、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在湘南和广西的大屠杀，以及他说**“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引发的**“红八月”**大屠杀，正是这种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作祟的结果。湘南和广西的大屠杀，仅仅是赤色革命下中国老百姓苦难中的冰山一角。有些专家、教授把**“群众专政”**的大屠杀归结为**“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和**“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甚至说**“文革是全民犯罪”**等等，看看毛泽东说的、做的，看看他领导和放纵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你们的结论是无知呢？还是无耻？

36-文革第五轮大屠杀——清理阶级队伍

作者 于松然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文化大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面最宽的一次运动。1967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但史学家丁抒在研究了许多档案资料之后，他结论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死亡！”**

“清队”中的“毛氏规律”

1967 年 6 月，毛泽东派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统帅的“御林军”——中央警卫部队即 8341 部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化工三厂，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对“六厂二校”实行军事管制。为了能获得第一手资料，毛泽东还先后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军宣队”中工作。据披露，毛身边的“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都参加了“军宣队”；那些能经常同毛在一起的人民大会堂 118 厅的女服务员，也参加了。**“这些女孩子们，穿上军服，风风光光地去了工厂”**。

这是权谋大师毛泽东要亲自指导汪东兴在“六厂二校”制造出个典型来。制造这个典型的目的是在密室中确定好了的：不仅要证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雜性**，还要证明阶级斗争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更要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群众运动”**，都要刻意树立一些“阶级敌人”加以打倒，借以昭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心领神会的“总管”汪东兴，不负重托，很快总结出多个挖出“阶级敌人”的“先进经验”，用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军宣队”进驻后，随即在“六厂二校”开展“对敌斗争”。其中，新华印刷厂“军宣队”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 10 个“反革命分子”。由于其中多个是国民党时期进厂的老工人，因此，“总管”轻而易举地给他们扣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的罪名，并由此总结出了一个**“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对二七机车车辆厂实行“军管”后，“军宣队”挖出了历史反革命 215 人，现行反革命 31 人，国民党等反动组织成员 373 名；全厂 155 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49 人，占 31.6%；这些人“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理论，找到了新的“证据”。他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到了 1968 年 3～4 月间，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控制武斗加剧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把文革“斗争大方向”，从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权力斗争上，向党外的传统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身上转移，并给发布镇压左派造反派的《七三布告》以理论和政策上的支持。于是，他本人导演的新华

印刷厂“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典型经验”，便派上了用场。

1968 年 5 月，姚文元根据毛的新部署，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整理修改后，呈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5 月 15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内部指示，率先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 号文件转发了《**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严令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由是，在全国多地武斗犹酣之时，清理阶级队伍（下称“清队”）运动即在全国展开。对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暗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为了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亲临一线，以“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为蓝本，亲自为“清队”大造舆论。

1967 年 12 月 18 日，他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显然，毛泽东是个形而上学的外因论者。当年，他把他**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政策所造成数千万饿殍的“三年人祸灾难”，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因而一意孤行地掀起**“民主补课运动**”，使数万基层干部和数十万“地富反坏右”弱势群体，蒙受不白之冤，成百上千人自杀或被杀。如今，他在煽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又鼓动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斗“走资派”，为了向刘、邓夺权，他又号召造反派“全面内战”、“武装左派”等等。他一系列破坏法制的倒行逆施，使红卫兵成了打、砸、抢、烧、杀的歹徒，造反派成了“全面内战”中的炮灰。但在“舆论一律”的独裁条件下，他却颠倒黑白，竟把他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说成是“地富反坏右”、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阶级敌人**“幕后指挥**”的结果。

然而，历史记录的是：他毛泽东的这些敌人，包括这些敌人子女、亲属，几乎无权参加任何组织；人们也不会忘记，他的这些敌人，在土改、镇反、反右、合作化、民主补课和“四清”等运动中，已遭受过反复清算和镇压；人们更不会忘记，在文革中，他的这些敌人，先后又在以北京大兴和湘南道县为代表的全国各地，遭到了灭绝人伦的大屠杀！显然，他的这些敌人，早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毫无反抗能力，已变成了二十世纪最为穷困的弱势群体。然而，在失控的“大规模武斗”中，这些“最为穷困的**弱势群体**”，在他的眼里，亦即在毛泽东思想里，却变成了武斗的**“幕后指挥**”者，变成了能左右武斗的**强势群体**。

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找出一条党内右派可以接受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1968 年 4 月 10 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用黑体字传达出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

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此刻，毛泽东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已变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血统论”者。他念念不忘那些在 18 年前已经被他打倒了的阶级敌人，而这些敌人又在而后的历次运动中又被他整得死去活来早已退变成弱势群体，但他们有影响，有后代，人还在，心不死，一定会把“反革命”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因此，他不仅要对阶级敌人**“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与他们的子子孙孙做长期不懈的斗争。

1968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同尼雷尔总统谈话时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1968 年 7 月 12 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1968 年 11 月 4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善于制造舆论的权谋大师毛泽东，通过亲临一线的说教，终将文革“斗争大方向”从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权力斗争上，拉回到清理“解放”后被他清理过多次的早已被清理成弱势群体的“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上来。

然而，历史给毛泽东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共执政六十年后的今天，埋葬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独裁社会主义并用“改革开放”理论和“特色”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人，既不是他“念念不忘”的“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也不是他深恶痛绝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后代，即以红二代、官二代为代表的红色地主和资本家。

任何天才都有局限性，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把文革“斗争大方向”拉回到清理“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方向的决策，应当说是高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决策，使中共党内左、中、右派，迅速形成共识；党内右派们像左派一样，纷纷向毛效忠；作为“受害者”的党内右派们，刚刚摆脱掉套在身上的“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枷锁，便投入到镇压弱势群体的“斗争大方向”上来。——清理阶级队伍的决策，使走向分裂边缘的中共，复又团结了起来。

同其他**政治运动**一样，清理阶级队伍也是通过**“群众运动”**组织实施的。在蔑视人权的赤文化腌缸里，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发动的每次政治运动之前，都已熟知毛氏“群众运动”的无政府性和法西斯性：大“敌”当前，为了发动**“群众”**，不要怕犯“宁左勿右”的错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而**“对敌斗争要狠”**，不可姑息，不得怜悯，不能宽容——这是毛泽东考察干部对他、对党是否忠诚、立场是否坚定的党传准则。

在腌缸里，各级领导干部也摸透了毛泽东领导“**群众运动**”的心态：犯“宁左勿右”的错误，属左倾，是方法问题，可以谅解；犯姑息、怜悯、宽容的错误，属右倾，是立场问题，不可宽恕。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们，谁也不敢忘记这个教训：在土改运动中，广东省委书记方方，因对地主仁慈手软，搞“和平土改”，违抗了他“村村见血”的教导，犯了右倾错误，被撤职查办，险些坐牢！

为了利用那些敢打、敢骂、敢冲、敢杀和敢于构陷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包括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父母官”，如广西魔头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南宁军分区司令员**熊光武**，6949 部队副师长兼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湖南道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等等，借以达到“**群众运动**”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对他的这些“**群众**”，关怀备之，呵护有加。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还把专政的权力交给了他的“**群众**”。他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为了保护他的“**群众**”，他曾严辞警告过各级领导干部们：“**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显然，毛泽东要支持、要保护的所谓“**群众**”，就是那些痞子、二愣子、勇敢分子和流氓无产者等法西斯分子，以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领导干部。

前面已说过，毛泽东是炮制“**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的老手；在他的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成了按“**毛氏规律**”操作“群众运动”的行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中，“**毛氏规律**”成了“**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死亡**”的魔爪。由于造成大量伤亡，这个魔爪，理应在这里再晒它一晒，尽管在“序幕”中已曝过：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采编人员，组写文章，放送广播，以制造舆论；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作报告，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 3 或 5 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以排查、筛查的方式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 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训练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杀等刑讯逼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新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重点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横扫”、破“四旧”、夺权武斗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随着轰轰烈烈“清队”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各级政府设立的“专案组”，成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触目惊心的敌情**”，也被他们先后制造了出来。

在《七三布告》发布后《七二四布告》发布前的 1968 年 7 月 21 日，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在上报的《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

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报告》几乎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主意写的，因此，毛泽东迅即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宣扬仇恨主义、传播**“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也培养了一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些“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干部领导下，“清队”中的**“专案组”，**都成了逼供信的刑堂，其成员都成了职业杀手。吉林省某设计院“清队”领导小组，在向上级报告的“群众办案”体会中写道：**“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只有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才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我们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揭发批判、核实对质相结合的办法。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性质的批判会（主要是肃清流毒、批深批透）、斗争会（主要是斗态度，斗倒斗臭）、审讯会（主要是揭发、核实、审讯其罪恶）等多种形式。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忆敌情、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一点，采取‘一点两面’（即突破一点，两面以上围攻）、‘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审审、批批、斗斗，追罪恶、挖根源、上挂下连，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搞臭敌人，歼灭敌人……”**——这是“群众运动”中**“毛氏规律”**的真实写照之一。

任何一个暴君，之所以能成其为“君”，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能天才地运用恩威兼施两手，亦即“宽猛相济”的君王统治权术。毛泽东在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立威的同时，决不会忘记张扬“天使”的一招，借以树立他赐恩泽于民的“伟大”胸怀，从而达到控制“群众运动”的目的。

1968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

1968 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在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时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1968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同时，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表

示认同和支持，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的**“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意欲引起各级干部重视。

在“清队”高潮的10月，他又发出“最高指示”说：**“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此时，他明确提出在“清队”中**“要注意政策”**，对敌斗争中**“要稳、准、狠”**。

一贯坚持封建人治传统的毛泽东，他的上述说教，并非都是对“清队”讲的。但他的这些讲话，远比他在发动“清队”时说的那些杀气腾腾的“最高指示”，显然“宽容”、“理性”得多。但他的“宽容”是蔑视人权条件下的“宽容”，“理性”是毁弃法制基础上的“理性”：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亦即通过利用流氓无产者的暴戾恣睢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宽容”和“理性”，注定是个美丽的骗局和动听的谎言！请看：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却使武斗愈演愈烈，导致五六十万人丧生；

毛泽东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要注意政策”**，不**“搞逼供信”**，却使逼供信泛滥成灾，导致三千多万人被斗，五十多万人死亡；

毛泽东多次强调**“重证据”**、**“要稳、准、狠”**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却使全国各地，捕杀成风。最高法院供认，文革中政府错判十七万多人，错杀数万人，**“狠”**得发狂；而在“横扫”、破“四旧”、**“群众专政”**中，又杀掉了数十万人，造成的冤假错案高达三百多万件！

在文革中，不论毛泽东发布的什么“立威”或“赐恩”的“最高指示”，都是以**毁弃法制、践踏人权**为前提，都是以肆意侵犯人权的**“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方式付诸实施的。

这就是毛泽东有党、有政府、有领导的**“群众运动”**！这是蔑视法制、践踏人权的中共赤文化。

毛泽东不愧是个天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他的理论家天才在于：他能把唯物辩证法哲学，归结为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理论，使人们无法指责他出尔反尔、信口雌黄的那种霸王兼恶棍的痞气。他的政治家天才在于：他策划的每项政治任务，都能借“群众运动”中的**“群众”**之手，进行批、斗、抄、打、杀，借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使人们无法指责他是残暴的打手和鲜血淋淋的刽子手。他的理论家兼政治家天才还在于：他能在把权力拜物教的无产阶级专政列为他的核心价值的同时，掩盖住他那嗜权入魔的权力情结；还能在拒绝自我反省的基础上，用“外因论”创造出一套**“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论”**，把政策失败的主要责任，“论证”成阶级敌人破坏或下面“歪嘴和尚唸错经”的结果，妄拒自我反省，借以掩盖他领导下的中共的祸国殃民的罪行。

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看一看毛式有党、有政府、有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操作过程，这句“最高指示”难道不是无耻的谎言吗？

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都曾按“**毛氏规律**”成功地领导过多次“群众运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都是侵犯人权的帮凶。

诚然，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中也不乏有良心者，例如原广东省委书记**方方**等。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当看见“**群众**”中出现侮辱、吊打、逼供信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西斯暴行时，并不认可，甚至反感，但却不敢制止，不敢“**泼冷水**”降温，害怕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犯下同方方一样不被毛泽东宽恕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心态，已深根于中共赤文化的基底中，使中共和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次“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犯下**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对这种屡试不爽又司空见惯的法西斯暴行，中共利用“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专权，把它淡化为“**过左**”、“**过火**”，或诡称为“**扩大化**”。这是中共拒绝认错、认罪、不思悔改的表现！

因此，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再次根据“**毛氏规律**”去复制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在所难免！

37-要案剖析 1、镇压蒙族“新内人党”血案

作者 于松然

各地诸侯和“父母官”们，遵照毛泽东“**群众运动**”的“**毛氏规律**”，在发动和领导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中，充分运用“**群众专政**”武器，轰轰烈烈地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灭绝人性的大血案！

1．镇压蒙族“新内人党”血案

1968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根据中央决定，指示在内蒙古抓“**新内人党**”。在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的领导下，在包括内蒙古军区内的整个内蒙古地区，开展了一场“深挖新内人党”运动。运动株连上百万人，其中，70～80 万人遭逮捕和关押，近十万人被迫害、折磨致死，受害者 70%以上是基层蒙古族干部和群众，堪称文化大革命中天下第一大血案。但官方承认的数字却少得多。官方承认：有 346,000 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在刑讯逼供中，打死、自杀的有 16,222 人，致残 120,000 多人，致伤者不计其数。

这就是因**怀**疑蒙古人有二心，毛泽东特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赴内蒙古，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事件。

主仆权斗，毛乌角力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规定。他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显然，他要共产主义丛林文化取代民族自治文化，推翻了他亲手制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的条款。如：《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历史已经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独裁下，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中共的其它当权派，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立场都是一致的：强调自治，就是分裂；由党全面控制，就是“自治”。他们对汉族占绝大多数的香港人尚存疑虑，不放心，拒绝兑现“港人治港”的自治承诺，何况其它少数民族？他们不放心那些在自治区里担任一把手的本族干部，不论他们是否是忠实的中共党员。因此，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国五大自治区的一把手，都是由清一色的汉族担当。《宪法》上规定的自治，完全是一派谎言！

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使蒙族吃尽了苦头，政治、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外蒙古；文革中，又使他们雪上加霜，陷入贫困加迫害中。

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的**乌兰夫**，对空头“自治”很不高兴。良心再现使他利用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权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的民族、民主措施，与毛泽东的僵死教条相周旋。

乌兰夫称赞中共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族政策，他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较为宽容。1962 年 4 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民族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1965 年 12 月，他在一次会上说：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他主张与牧主和宗教上层和谐相处。

乌兰夫的这些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中共 1961 年起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群众的物资和文化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受到了内蒙古大多数人的拥护。但这一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却受到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的指控。他们指责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指控乌安插亲信、打击汉族领导干部，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5 月 21 日，中共华北局按毛的指示，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批判乌兰夫工作会议，史称前门饭店会议。内蒙古党委常委、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等计 146 人，参加了会议。8 月 16 日，中共中央根据“前门饭店会议”精神，下令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并将其监护在北京。于是，一场以批判和打倒乌兰夫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自治区轰轰

烈烈地开展起来。

构陷升级，肃乌流毒

乌兰夫是个对中共忠诚的大员，历史清楚，没有叛徒、特务的嫌疑，也没有投靠苏修、外蒙修的把柄，因此，仅以“走资派”的理由去打倒他，很难服人。于是，紧跟圣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政治局委员**江青**等人，便将主持内蒙古政权的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等人召到北京，面授机宜。1967 年 10 月，康生对滕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面对由毛泽东挑起的内战因而使内蒙古政局动荡、武斗频繁的局面，康生栽赃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此前的 4 月 27 日，周恩来曾当众高呼：**“彻底批判内蒙古的反动路线的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垮！”**领到“圣旨”的滕海清，回到内蒙古，便打起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时称“**挖肃**”的“人民战争”来。

祸起萧墙，作家虚构

在“挖肃”中，作协内蒙古分会主席、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作者**乌兰巴干**，以小说家的敏锐观察和巧妙构思，罗织一篇《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这篇构陷“新内人党”的报告，秘密送进了“滕办”，飞入了中央文革和中南海。所谓“新内人党”，它的前身是成立于 1924 年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年，这个党是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6 年它接受中共指示，已停止活动。权力在手的小说家，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一个女演员同刚从外蒙古归来的蒙大一位男教师的暧昧关系上，切入制假，把已停止活动二十多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演义成重新恢复活动的地下“新内人党”。严刑之下，竟从女演员嘴里挖出了个“新内人党”人单。“新内人党”案由此浮出水面。

康江面示，海青出手

清理阶级队运动伍前夕，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召见了滕海清一行。康生、江青向滕海清等人施压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还严厉批评道：**“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还向他们面授机宜：**“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及其打手们，秉承北京旨意，在内蒙古继续“挖肃”的同时，又发起了深挖“新内人党”运动。滕海清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六个“需要”把深挖小说家乌兰巴干虚构的“新内人党”案，摆到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案首：一场人为的新的兵燹之灾，又烧到了内蒙古人民的头上。1969 年 2 月 26 日，以滕海清为首的区革委会，做出了关于清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规定**》说：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1946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规定》发誓说：

总之，“新内人党”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规定》还做了具体规定：

1、坚决打击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上层领导机构成员）和支部书记以上有重大罪恶的分子。对这些分子也要区别对待，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对坦白交待好的，有主动表现的应从宽处理，贯彻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2、一般党徒要通过办学习班，讲清问题。只要他们彻底交待就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虽系一般党徒，但有重大罪恶，民愤很大的而态度恶劣的分子则应严惩。

3、对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农村、牧区的大、小队干部、青年学生、干部家属和职工家属中受蒙蔽参加了“新内人党”的人，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对“新内人党”反党叛国罪恶的革命大批判，启发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只要他们从组织上、思想上与“新内人党”划清界限，就不再追究。

4、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如发现有混进来的“新内人党”分子，应上报材料经领

导机关批准，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5、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子女应坚决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1968 年 12 月 26 日的通知的精神执行。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家属也不应歧视。

6、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主要在公社以上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农村牧区也要把“新内人党”挖出来，但主要应采取正面教育，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

7、凡是由“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操纵的，它的纲领与“新内人党”基本一致的组织，如“统一党”、“兴蒙党”等均为“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一律按“新内人党”对待。

随着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入发展和层层加压，内蒙古“挖肃”和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在自治区全面展开。

层层加压，直捣“羊群”

滕海清在中共中央首长们压力和直接督导下，亲自深入到挖“内人党”的第一线指挥作战。1969 年 1 月 8 日，他说：**“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来了。”**

1969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首长们又给滕海清加压。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说：**“军队里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又说：**“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黄永胜**杀气腾腾地说：**“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遗憾的是，没见有跟康、江同在一线指挥“清队”的**周恩来**的谕示，显现“主旋律”褒贬人物潜规则的狡黠，也再次显现草根难觅秘密档案的无奈。

中共中央首长们的压力，使滕海清及其打手们更加有恃无恐。他们陆续派出了大批工宣队、军宣队去领导深挖“内人党”运动。由于人手不够，他们把北京和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唆使他们为工宣队、军宣队打头阵。其中，有北京的知青典型，成了深挖“新内人党”的杀手。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都接到了各个上级的层层压力，与各级**“群众专政指挥部”**结合在一起，私设牢房，大搞逼供信，实施**“群众专政”**。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队员和知识青年，绝大多是汉人，其中，许多人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整肃起蒙古人来毫不手软。就这样，一场在中共中央不断压力下、由汉族刽子手滕海清督战的、祸害百万人致死近十万人的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到 1968 年 12 月，已进入了高潮。

在上层，在内蒙古党、政、军、群机关里，运动整死了许多“新内人党成员”，其中包括：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吉雅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哈丰阿，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原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将**达理扎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和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人。在下层，运动直挖到蒙古包的“羊群里”，致使数万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都死于非命。例如：昭乌达盟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 450 多个，其中，集团性质的 146 个，全盟 27,000 多人受害，非正常死亡 2,000 多人；汉蒙杂居的一百二十多户人家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打斗“新内人党”毫不手软，14 人被打死，16

人被打成终身残废；武川县由汉人领着深挖“新内人党分子”，致全县 80 人死于非命，伤残不计其数。

恣意妄为，酷刑种种

汉族刽子手**滕海清**及其打手们，“群众专政”手段之残忍，达到恣意妄为、令人发指的境地！

据披露：刽子手们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已是“家常便饭”。此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法西斯刑法：一个男青年拒绝招供，被割下生殖器；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男青年，被架在火上烤死，名曰“烤活人”；一个女青年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在哲里盟，有一个妇女被逼与公牛交配；还是这个哲里盟，一个牧民被挖掉两眼，名曰“取走两只灯泡”；在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者，有被割去耳朵者，有被砍断胳膊者，有被砍断大腿者，其惨状目睹者不堪回首。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到了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 1,600 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剖胸自杀，露出来的心脏还在微微搏动……

受害者在酷刑折磨下，屈打成招。根据专案组人员的诱导，受害者编造出了令刽子手们满意的假笔记、假文件、假党旗、假印章，等等。如：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的白音公社，一位教师被指是“内人党”人，为了换取“从宽处理”，他不得不按专案组的要求，伪造了一份“党纲十二条”上交；在内蒙古军区，一位军官被指是“内人党”人，在严刑之下，他不得不让妻子用孩子的红领巾，伪造了一面画有锄头和套马杆的“内人党”党旗，上交专案组；伊克昭盟的一个受害者，严刑之下，他不得不伪造了一枚“内人党”印章，而这枚印章所刻蒙文，竟不能成字。经过一场行之有效的“**群众专政**”后，“新内人党”陷入了内蒙古“**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先后从中挖出了一百多个“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等等“内人党”的变种组织，连草原上的一个民兵连，也被打成“内人党”的武装组织。

在“清队”深挖中，7 月 20 日，滕海清及其打手们，又抛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打破了既往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决定在自治区牧民和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树立牧主、富牧为“敌人”，然后再加以打倒，借以“教育”蒙古人。

在“清队”深挖“内人党”运动中，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它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

天怒人怨，恩威兼施

从“挖肃”运动到挖“内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旷日持久，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刑讯逼供花样不断翻新，死亡和残伤人数不断增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偏远的山区和草原，许多人连“内人党”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了“内人党”党徒；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打成“内人党”，许多忠于中共的党员，都稀里糊涂地成了“内人党”党徒！

这是汉人政权对蒙古人民犯的一大法西斯暴行。面对如此残暴的政权，蒙族人被激怒了，

汉族人被激怒了，其它民族人被激怒了，许多干部、军人、党员也被激怒了——天怒人怨之火以燎远之势，烧向内蒙古各地。成千上万蒙古人先后涌向呼和浩特：**“五十孤儿上访团”**，在首府街头哭声震天；**“一百寡妇上访团”**，在刽子手衙前顿足呼号；**“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到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大放悲声。数以千计的蒙古人突破封锁，涌向北京：**难属们**在天安门前跪地嚎啕；**“八百铁汉”**，裸露着上身，将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肌上，鲜血淋漓，在中南海新华门门前要求接见……

“上帝”被触动了。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毛泽东，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采取了宽猛相济、恩威交加的两手对付蒙古人。**一手施之以恩**：1969 年 5 月 22 日，他批示称**“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下达了“纠偏”命令；谕示周恩来纠正“扩大化”，停止挖“内人党”，落实政策，安抚受害人，平息内蒙古人的怨恨；以强手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取代滕海清。**另一手立之以威**：先将内蒙古自治区一分为六，即将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使自治区缩小了三分之二，借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再对内蒙古实行军管，命郑维山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进驻内蒙古，借以威慑敢于轻举妄动的蒙古人。

毛泽东的恩威两手，使善良的蒙古人失望了。他的**“扩大化”**批示，明确训示蒙古人：**“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而在“清队”和深挖“内人党”中，那些肆意破坏《宪法》、恣意侵犯人权、随意砸毁寺庙、任意虐杀生灵等种种反人类的法西斯暴行，在他看来，不是罪，而是错，而且仅仅错在“扩大化”上。这样，毛泽东便给法西斯暴行披上了一件“扩大化”的外衣。这种反文明、反法治、反传统和反人类的批示，充分暴露了毛泽东思想的虚伪、流痞和强盗本性。

毛泽东的“扩大化”批示，**袒护**了不断向内蒙古刽子手们施压的一线指挥官周、康、江等大员们“宁左勿右”的冷酷无情，让他们继续在一线指挥“清队”；**赦免**了刽子手滕海清忠心耿耿的残忍本性，把他调往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处理**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喽罗”，让他们当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借以抚慰民心。毛泽东玩弄的软硬兼施或**“先杀后抚”**的封建统治权术，也收到了效果，反抗行动被压下去了，尽管反抗的声音还在无声处传播！

毛泽东死后，他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推翻了他的导师“扩大化”的结论，

1978 年 4 月 20 日，内蒙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对此，中共中央批示道：**“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

到此，由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造成十万人死亡、伤残无数的“新内人党”一案，从**“罪恶累累”**到**“扩大化”**，再到**“应该完全予以否定”**，经历了十年猖獗、变色之后，才被画

上了个句号。

2、广西“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血案（略）
3．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叛徒血案（略）
4．冀东大血案（略）

38-要案剖析 5、二七机车车辆厂血案

作者 于松然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之一，同新华印刷厂一样，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工程。“清队”中，这个样板工程，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取得对敌斗争的丰硕成果：挖出历史反革命 215 人，现行反革命 31 人；全厂 155 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49 人，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 24 人，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挖出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成员 373 名；对该厂“解放”前的 1,400 多名老工人，审查了其中的 900 余人，14 名老工人自杀身亡。在 196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依据二七机车车辆厂挖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的“经验”，得出结论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但到 1978 年 9 月 1 日，新华社高级记者**夏俊生**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题为《二七厂清队的经验是假的》的报导，揭露毛泽东亲自抓的这个典型，几乎全是冤假错案！三十年后，人们从 2008 年第 8 期《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了他公开发表的《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文章，了解到了毛泽东炮制的“清队”典型的概貌。

现将夏文《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摘录如下**：

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六厂二校”之一。由于“六厂二校”的军宣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 部队）派出的，这些单位被称为毛主席的试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一些老帅、副总理和省部级的老干部都在这六个工厂里参加过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毛泽东主席当年曾批转的“六厂二校”的“经验”，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纠左的，但现在看来，只是左了 100 步往回纠正几步而已。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前身是长辛店机车厂，是 1897 年在建设京汉铁路时建立的。工厂里解放前也有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其它政治组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深挖阶级敌人”，不少老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

1969 年 5 月 27 日，北京市革委会向全市转发了由二七厂革委会、8341 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总社记者联合署名的《北京二七厂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 196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大量引用了《报告》中“经

验”材料。当他引用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一段话之后说：**“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8,000 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 9 个区分部，三青团有 3 个机构，另有 8 个什么特务机构。”**

1978 年 7 月，铁道部派出工作组，与北京市工交办的领导一起，帮助二七厂落实政策。经调查核实，1969 年影响全国并被毛主席引用的这个《报告》里的许多材料，**竟然是假的。**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报告》说：**解放前，这个厂残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有国民党区分部 9 个；三青团分队 4 个；有“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 8 个，包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此外，还有叛变了的地下党员，有日本特务、几十种会道门的大小道首，以及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这些反动组织交织在一起，遍布全厂各个车间、科室。**

事实是：解放前，二七厂内确有 9 个国民党区分部。但 4 个三青团分队是长辛店地区的，并不都在厂内。所谓的 8 个特务组织，有的根本不是特务组织，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搞出来的大冤案。涉及全厂 278 人（连同厂外计 500 多人）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么“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二七厂解放前的地下党支部不能定为“叛变了的地下党支部”，地下党员没有一个能定为叛徒。至于所谓的里通外国分子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天主教骨干分子，都是没有的。

在解放后进行的镇反和肃反中，二七厂的反革命组织都早已基本查清，一些骨干分子也都已逮捕法办。“清队”的结果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清队”中新挖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只有 8 个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1 个伪保长和 2 个特务分子。绝大多数为了保饭碗而参加国民党等反动组织的老工人，在解放后都主动作了交代，许多人还参加了共产党，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报告》却说，“解放后，在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二七厂代理人的庇护下，这些阶级敌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出来，有些竟窃据了厂和车间的领导岗位。”

《报告》说：**在全厂 155 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49 人，占 31.6%，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 24 人，占 15.5%，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叛徒当上了干部部长，一贯道坛主当上了组织部长，保卫科 3 个科长有 2 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全厂 27 个车间中 20 个车间的领导权和 17 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这些人手中。**

事实是：二七厂在“清队”中因历史问题被审查的中层以上干部有 97 人，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 42 人。经过 1975 年落实政策的复查，只有 1 名副厂长能不能定为叛徒还有待进一步复查（他的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按一般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其余 41 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报告》中所点的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副总工程师、干部部长、组织部长、2 个保卫科长，除了上面说的那位副厂长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复查外，没有一个人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所谓全厂 27 个车间中 20 个车间的领导权和 17 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反革命分子手中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报告》说：**全厂已清查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 215 人，清查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和其它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 373 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厂敌特组织的系统和关系，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并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等若干重大**

线索。

事实是：“清队”中定的215名反革命分子，1975年复查时，只有12人仍定为敌我矛盾，其余203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之于373名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多数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大多数早已主动作过交代。所谓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的重大线索，纯属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案；所谓“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没有一个能落实；所谓“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错案。如，工人**许彬**被揭发为一起火灾的纵火犯，可是他当时参加抗美援朝根本不在厂内。《报告》说的制材车间两起大纵火案，其实当时只烧了点刨花就被扑灭了。在“清队”中，工人党员**王玉**被逼供认是这两次火灾的纵火犯后上吊自杀，现在也无法证明是他放的火。所说煤水车间的投毒案，是工人杜某怀疑他的老婆与人有不正当关系，杜某在这个人喝的酸梅汤中放了巴豆霜。所说的破坏生产案，多是生产事故，不是故意破坏。

二七厂“清队”扩大化，完全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产物。为了“挖得深，战果大”，肆意扩大敌情，制造冤案，把二七厂说得似乎到处都是阶级敌人，领导权根本不在共产党手里，老工人和绝大多数从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受到严重摧残。在“清队”中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几乎都是解放前入厂的老工人和从这些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其中一半是共产党员，中层以上干部有60%受到审查。这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后，党员都被开除出党，干部全部监督劳动，其亲属和子女也受到株连。

从几例冤案看二七厂“清队”的真相

《报告》说：**二七厂在“清队”中“强调突出一个‘准’字，防止扩大化，对他们（指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对他们检举的问题不轻易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定案。”**事实却完全相反。请看下面几例冤案：

铸工车间1944年入厂的老工人**康长**，出身贫农，解放后一直表现很好，1960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康长曾替国民党员、情报组长刘某通知人开会，但本人并未参加过刘召集的会议。这个问题入党时已向组织作过交代，此外历史上再没有任何问题。“清队”中，据此怀疑康长也参加了反动组织，给他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在压力下，康长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情报组，但又否认，先后反反复复了多次。同时，在逼供和指供下，刘某等12人证明康长参加了国民党、情报组。1969年10月，康长因“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指清队中“态度恶劣”，先后“翻案”100多次，“不交代问题”等），被开除党籍、厂籍，全家遣送原籍。1970年5月，康长在几次来找军宣队负责人申诉都被拒之不见的情况下很生气，打破了门上的玻璃。军代表找人把康长扭送到保卫科，康进行反抗，双方动起拳脚。康长被殴打一顿后被捆在暖气管上。他趁看管人员吃饭时，挣脱绳索，拿起屋内一枝气枪准备自卫。军代表和保卫人员发现后，夺过气枪，将康长五花大绑送到公安分局。当年6月，康长以**“打骂军代表、革命群众，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等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直到1978年7月，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作了批示，康长才被无罪释放，恢复厂籍、党籍，全家返回北京。

原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从一个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一个姓孔的日本特务的口供说：“我们村的王敬贤是日本特务。”本来，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可判明这是同名不同村也不同县的两个人。但当时却张冠李戴，认为厂内的王敬贤就是易县岭西村的日本特务王敬贤，马上给王敬贤办了隔离“学习班”，并派人到家里交底，让家属帮助“政策攻心”。结果，王敬贤被逼自杀。人死后，车间还开批判大会，说他“畏罪自杀”。王敬贤被逼死后，其夫人脑溢血加重，1975年去世，剩下的3个孩子都因受到刺激精神不正常。历史清白的王敬贤，就这样被搞得家破人亡。这样明显的冤案，二七厂1973年复查时却对王敬贤作了个**“因对清队不理解自杀，按非因工死亡处理”**的结论，

不给彻底平反。

工人党员**马永**是个转业军人。一次在“学习班”上同军代表争论问题，说除了毛主席，没有一贯正确的。军代表说，那江青呢？对江青“文攻武卫”那一套早有不满的马永说，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也值得怀疑。就这一句话，马永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实现**群众专政**一年多，整党中被开除党籍，并不准重新入党。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完全是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大冤案。1948 年 5 月，蒋介石政权于覆灭前夕曾在全国逐级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北平的委员会只存在一个多月就因无经费停止了活动。当时，二七厂有的工人参加了铁路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进行反动宣传的训练班。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材料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不是特务组织，在二七厂也没有其下属组织。但在清队中，二七厂却捕风捉影地搞出了个“戡乱救国潜伏小组”，说这是个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潜伏特务组织”，而且内部纪律森严，订有“攻守同盟”，其成员还有不少兼有中统、军统等多种特务身份。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作为突破口。其实，厂里并没有掌握和林有历史问题的任何材料，只是认为他形迹可疑：一是每逢政治运动他就歇病假；二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当时工会负责人的女婿。据此，就怀疑他是特务，给他办了隔离“学习班”。和林不承认，就采取车轮战“政策攻心”，每天只让他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日子一长，和林受不了，只好交代。交代特务身份以后，又追问他的同案人、组织活动和潜伏活动。在办案人员的指供、诱供、逼供之下，和林只好胡编了一通“内幕和罪行”，并检举了 103 个“特务分子”。《报告》中所讲的铸工车间副主任**康治**，也是在这种逼供、诱供之下，被迫承认是“戡乱救国潜伏小组”的特务分子，1962 年开过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还往香港送过情报，并检举了不少同案人。就这样你揭发我，我揭发他，“特务”越来越多，“特务组织”的活动越来越玄。

二七厂在“清队”时规定，不管本人承认不承认，只要有三个人揭发就可以强行定案。所谓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其实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假口供。

以“政策攻心”为名大搞逼供信

二七厂“清队”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这两个为主，实际上就是不要证据和调查研究，靠捕风捉影和逼供信搞假口供。工人们说，二七厂的“清队”不是突出一个“准”字，而是突出一个“狠”字，不是政策攻心发挥了威力，而是逼供信发挥了威力。

所谓**“以群众办案为主”**，就是把群众中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怀疑、猜测，作为“活档案”提供的线索，又不认真分析核实，就作为办案定罪的依据。《报告》说，有一个解放前参加四个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分子，调查组调查了 20 多次，问题也没有弄清，后来群众中有人认为他四个孩子的名字连起来是反动口号“建立中华民国”，就抓住这个问题对他展开“政策攻心战”，终于使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反革命身份和罪行”。这个人指的是劳资科的**张洪儒**。其实，他的四个孩子的名字按顺序是建华、建国、建中、建民，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口号。他本人也没有加入过四个反动组织。所谓“坦白交代”完全是逼供下的“顺杆爬”。

所谓**“以政策攻心为主”**，就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先定性，后逼供。“政策攻心”时，常常是三班轮流“熬鹰”，不交代问题就不让睡觉，不让回家，或者白天劳动，夜里被“攻心”，甚至搞变相体罚。这样搞上几个月，身体再好也顶不住，只好“坦白交代”。还有被隔离审查的老工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事无人管，为了能够回家料理家务，只好“缴械投降”，争取“从宽处理”。

二七厂的“政策攻心”还有树立“宽严样板”和“发动家属参战”两种做法。

所谓宽严大会实际上是引供、诱供大会。被从宽处理的人在大会上发言说，“参加特务组织的还有同我在一起的张某某、王某某，你们赶快交代吧！”会后，被点名的人只好赶快去“坦白”。

所谓“发动家属参战”，就是把要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告诉其家属，要家属做审查对象的工作。家属怕审查对象被从严处理后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造成生活困难，又影响子女分配工作，只好苦苦劝说审查对象去“坦白”，有的甚至下跪哀求，搞得全家不得安宁。有的车间让家属办家庭“学习班”，帮促审查对象交代问题，什么时候“帮出来”什么时候结束，家属不能上班就减少了工资收入。还发生过审查对象“交代问题”后车间敲锣打鼓向家属“报喜”的笑话。审查对象受到家庭和工厂内外夹攻，精神压力很大。二七厂在“清队”中有20人自杀，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些人死前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有问题，完全是在死后才想法“取证”的。

8341部队进厂前，二七厂曾搞过一段“清队”工作。那时，对审查对象严刑拷打，有的被活活打死。8341部队进厂后，武斗逼供的现象确实大大减少了，但这种“政策攻心”对审查对象的精神折磨和政治压力更大了，乱供乱咬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一人就“交代”了几百人的中统和军统特务名单。不少人被揭发参加了中统、军统等七八种反动组织，当时只有14岁的小徒工也被揭发为“中统特务”。有的人被迫咬了别人之后，就找到这个人打招呼：“对不起，我投了你一票。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办法。如果找到你，你就说吧。”全厂职工中1949年前入厂的老工人占58%。当时，二七厂各个车间把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集中在一起办大“学习班”，让每个人都交代历史，搞得老工人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底架车间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54人，53人被整了材料，36人受到审查。

据调查，这个厂当时的一些外调人员采取武斗逼供、诱供、指供的做法，从反革命分子那里搞来许多假证明材料。外调人员对刑满就业人员、原二七厂锻工车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某**拍桌子，搞体罚，让张在解放前二七厂锻工车间的人员名单上标出哪个人参加了哪些反动组织（比如，参加中统的打叉，参加国民党的划勾），张某一下子就证明解放前锻工车间的100人中，有80人参加了反动组织，其中32人参加了5种以上的反动组织。找原二七厂机械车间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押犯**齐某的**外调人员，拿着解放前二七厂机械车间的一张图（每台机床设备的位置及操作人员名单），强迫齐交代特务组织情况，齐就照着名单乱咬，出证164人参加了中统等反动组织，全部是假的。

1975年，二七厂对“清队”中处理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复查，“清队”中定为敌我性质的246人（历史反革命215人，现行反革命31人）中，仍定为敌我性质的有24人（历史反革命12人，现行反革命12人）。被搞错的222人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40多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被强行戴上特务帽子。二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军宣队有意见，或存在一般的思想政治错误，被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如《报告》中说的**徐振海**，是在大家猜谜语“东门外失火，内里烧死二人，一男一女，酉时三更”时，随手把谜底繁体字的“烂肉好酒”四个字记在一本刊有周恩来总理和江青讲话的小册子封面上，便被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四是把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当成故意破坏。五是本人早已交代并做过结论的一般历史问题，翻出来炒回锅肉，或无限上纲，或妄加莫须有的新罪名，打成反革命。这一类人有100多人，占绝大多数。

我在1978年8月到二七厂采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分社领导的支持下，写了题为《二七厂清队的经验是假的》的内部情况反映，1978年9月1日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

通过采访者夏俊生的报导，人们对毛泽东“**要注意政策**”和“**要稳、准、狠**”的说教，应该有一个清醒的理解：所谓“**要注意政策**”，是蔑视法制不要政策的政策，也是有领导的

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同义语；所谓“**要稳、准、狠**”，是践踏人权鼓吹人治的逼、供、信，亦是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毛氏规律**”的集中反映。

39-要案剖析 6、新金“活学活用”血案

作者 于松然

（血案初见于郑义所著《红色纪念碑》。由于该书是网络版，编辑上存有诸多纰缪，不便直接引用。笔者依据该书内容和参照相关回忆录，编缀撰述成篇。）

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中，根据林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号召，“群众”创造出现身说法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新形式，涌现出了一大批“讲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其中，许多人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辽宁省旅大市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就是个以“讲用”毛泽东思想闻名遐迩的佼佼者。

1968 年的中国，是“伟大领袖”号召“**群众专政**”全面开“花”的一年——一个多灾多难之秋！

5 月，毛泽东下令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一切阶级敌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分子王立龙，闻风而动，而紧跟，他要在 7 月间的一次大型“讲用会”上，更上一层楼，力争他的“讲用”有新发展，新创造，从而能在他这个“老典型”的花冠上，再罩上一个霞光四射的新光环。于是，他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目光，搜寻、审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终于他从听来的一件民事纠葛传闻中，嗅到新“敌情”，而这个新“敌情”的发现，的确使他的“讲用”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赢得了阵阵掌声。

然而，王立龙政委“讲用”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和博得的掌声，却使一个农民家庭付出了惨痛代价：**一家七口人含愤集体自杀！**

王立龙洞察到新“敌情”的传闻，是个什么样的传闻？

原来，夹河庙公社栾家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李本柱，**殴打了妹夫，他的妹夫为了报复他，便在村中散布谣言说他同他没过门的弟媳**许连荣**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由于许连荣是“反革命”家庭出身，谣言株连了许家，好事者讹传许家有攀高枝、找大人物做保护伞的谋图。谣言传播中，又被好事者不断放大，许连荣被放大成了一个曾扔掉过私生子的荡妇。这个传闻不过一桩民间纠分而已。但这个传闻，却使王立龙发现了新“敌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立竿见影”地推断到：敌人用“美人计”腐蚀党的干部，“走资派”在“美人计”前屈膝投降——这是一个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王立龙带着助手现役军官**王成海**、公社革委会常委**张玉德**，火速赶到栾家大队。在大队民兵连长**徐作善**主持下，开始了为他的“讲用”攻略“美人计”的进程。

在撤职、关押、批斗下，李本柱不承认中了“美人计”。王便亲自出马，先对李来了一个下马威，呵斥道：**“告诉你，李本柱，你今天不是犯错误，你是犯罪。今晚上如不交代，就要加重处分**。”接着又施出软的一招诱供道：**“只要你老实说出来，不戴帽，不逮捕，也保证不给其它处分**。”

略知宦海风云的李本柱，对软硬兼施那一套并不陌生；但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避免挨打，他承认了那种关系。他低声向王政委供认：**“既然首长这么讲，我就没什么顾虑了……”**

“走资派”被攻破。首战告捷，王立龙便命移师审讯“反革命”许家。

许连荣的父亲**许长家**，是个忠厚、老实、本份的贫农。在株连成风的年代里，因他的儿子(据说是四子许连祺)上中学时，曾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被判处管制三年，从此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许长家这个有七口人的家，因一人获“罪”而全家遭殃：原来的红色贫农家庭，旋即改变了颜色，变成了白色的“反革命”家庭，连成家后分出去的儿女们，也受到了株连。

长得俊俏的许连荣，与李本柱的弟弟订了婚，本是件很普通的民事；但在王立龙等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这件很普通的民事变成了“美人计”，变成了“走资派”与阶级敌人相互勾结的罪证。

“反革命”家长许父许长家，被抓到大队部实行**“群众专政”**；但批斗和毒打并没有使这位农民屈服。他和他的家人，满怀着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人民政府主持公道的强烈渴望，走上了去沈阳、去北京告状之路。然而，他们失望了，他们得到的答复竟是那样千篇一律：**“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懊丧而归的他们，又陷入“群众专政”的魔窟中。

7 月 10 日，在连续酷刑之后，许长家受刑不过，只好按“美人计”招供。但根据“讲用”者构思讲稿的“标准”，许还必须交出“美人计”的“黑心”，即主观故意。因此，审讯者喝令许在第二天交“黑心”。

招供已使许长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父亲，怎么能往自己女儿身上泼脏水！

7 月 11 日晨，许长家又被提审。在“群众专政”面前，许长家已无法用言语来证明自己了，他决定以自伤来表达清白。趁着上厕所的机会，他用玻璃在胸部划开了十公分长的口子，用衣襟捂住，然后颤巍巍地挪蹭到审讯室。当审讯者要他交“黑心”时，他痛苦地说：**“我昨天交代的都是假的，这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没有黑心，我要向毛主席交红心……”**说着撩开两襟，露出鲜血淋漓的前胸。

自伤报到了王成海处。王冷酷地说：“不要怕，老耗子给咱施加压力了，他这是威胁我们嘛。你们问问他，这是不是威胁！”得到军方支持的张玉德，便叫人把许长家又绑在大树上，边打边问：“你是不是要威胁我们？”

许长家汗泪俱下，与胸部鲜血混在一起，淋漓黑土地。他又被打昏了过去。

张玉德看着昏死的许长家恶狠狠地说：**“赶紧整理材料，判了算了。只要宣判了，死**

就死吧！”

于是，根据全国各地正在推行“**群众专政**”的“**三群**”新经验，即“**群众破案、群众审讯、群众判决**”的“新”政，栾家大队在 7 月 12 日，召开宣判大会，宣读了由栾家大队农代会署名的判决书：

“**根据许犯的罪恶事实确凿，供认不讳，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许长家有期徒刑十年，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生产**（劳动）。”同时，23 岁的许连荣因“腐蚀”干部罪，也被“群判”有期徒刑十年。

事情并没完。因为没有“美人”的口供，首长的讲用稿子就不够完美。为了完成首长交给的“革命”任务，王成海、张玉德等人决定：撬开许连荣的嘴巴！

7 月 15 日，栾家大队开始对许连荣进行“群众审讯”。以沉默不语相对抗的许连荣，在反复咒骂、侮辱和毒打下，嘴终于被撬开了：不仅“供认”了通奸的“罪行”，还“供认”了她曾在皮口医院做过“人工流产”并“把私生子扔到南山沟”的淫荡“事实”。

据传：“奸妇”的口供，当晚迅速上报给了王立龙。第二天，破获“美人计”的材料，使王立龙的“讲用”光芒四射，赢得了阵阵掌声。当他走下讲坛时，有人向他耳语了一番；一阵短暂惊诧之后，他双肩微微耸动了一下，便若无其事地走开。

当是时，遍体鳞伤的许连荣，被搀扶回家后，全家人精神崩溃了：一人获罪全家反革命，在“英明”的“给出路”政策制导下，没有出路的许家，做出了用全家集体自杀来抗议迫害的选择。

1968 年 7 月 16 日上午，正当**王立龙**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讲用”得光芒四射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民兵发现许家动静异常，撬开屋门后发现：许长家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子女全部自杀。

“**老许一家人全都自杀了**！”像一颗巨型炸弹突然爆炸，震撼了栾家大队的老老少少！惊骇了远乡近里的男男女女！

勘查现场的官员们来了。很快有了勘查结果：

——房梁上并排悬挂着四具尸体，分别是许父**许长家**（57 岁）、五子**许连福**（26 岁）、四子**许连祺**（28 岁）、四女**许连荣**（23 岁），五女**许连玲**（20 岁）自缢绳断，卧尸于地，许母**王朝臣**（57 岁）和小女儿**许连清**（18 岁）自缢后，两具尸体端端正正躺在炕上。

——死者颈上均有索沟痕迹。除许长家外，其余的都洗过脸，梳过头，穿上了新衣服，有的脸上还留有泪痕！

——在屋内墙上的醒目位置，用粗犷的笔锋写了两个大字：“屈死！”柜子上整齐地摆着一套用红纸盖好的“红宝书”，两扇门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逝者许连荣身上发现了他们留下的四封遗书，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分一封，九点零五分一封，午夜十二点两封。他们在遗书中悲愤地高呼：“**我们全家的死是走投无路啊！**”“**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屈啊，屈！屈！冤枉！冤枉！**”遗书上留下了七个人的签

字笔迹和血红手印。

——许连荣在遗书中写道：**“今天把我叫去大队毒打，打得我皮肉分家，没有的事叫我承认，不承认就打，我不懂的事，你们处处往上领，我要求把我的尸体送到医院检查，还我一个清白。”**

在死难现场，许母和小女儿的遗体停放在炕上，身下铺着褥子，枕着枕头，娘儿俩手拉着手。显然，她俩是先走了的。

试问后走的五位亲人：

“你们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上吊？
“你们在眼睁睁地看着或帮着自己亲人上吊时，手发抖了吗？气发喘了吗？
“你们看着或帮着自己亲人上吊时，是否曾低泣、哽咽？是否曾大放悲声？
“你们把先走的亲人卸下来抬到炕上，让她俩手拉在一起，想向后人说些什么？
“你们在走前洗脸、梳头和更换新衣时，都互相说了些什么？
“你们脸上的泪痕，是低泣哽咽的遗痕？还是声泪俱下的残迹？
“你们是如何强压悲伤？又如何从容不迫？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一齐上吊或先后自缢的？”

地也，谁能知道？！**天也**，谁能回答！？

然而，从他们走前留在门上、墙上、遗书上的字迹和四封遗书写的时间可以判定，他们的精神在遭到残酷折磨后很快镇静了下来：他们走得那么坚定，走得那么从容，走得那么坦然，走得那么理智，因而，他们走得凄婉，走得壮烈，走得惨不忍睹，走得催人泪下！

啊，风萧萧兮遼水寒，全家自杀兮为哪般！

医院很快做出了鉴定：**许连荣是处女！**

天呐，人性何在？人权何在？公理何在？

在 700 多年前黑暗腐朽的元代，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呼喊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700 多年后的今天，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里，有谁敢写《许连荣冤》？谁敢高呼“地也”、“天也”、毛也、党也？也许人民只配有权像许家临死前书写的那样——只配有权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清队”的高潮中，在“群众专政”的高压下，善良正直的人们，对许家的惨死敢怒而不敢言；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了，人们的怒吼才迸发了出来。由是，许长家一家的奇冤才得到了伸雪；由是，冤案执行者亦即那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才得到惩处。其中，策划者**王成海**（军官，已转业）判刑十五年，主持批斗者**张玉德**判刑十二年，主持刑讯逼供者民兵连长**徐作善**判刑十年，打手**朱广殿**、**李永贤**判刑八年，其余主要参与者也都受到了不同处置。

然而，**首恶流氓无产者王立龙**却能消遥法外！何也？据传：有的说他恶贯满盈已死或病

入膏肓奄奄待毙，有的则说他能紧跟“**群众专政**”的发明人，是个老革命、老先进、老雷锋，故而对他网开一面：“将功补过”。孰真孰假？留给后人去查证吧。

40-第三波自杀风潮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引发了文革第三次自杀风潮。粗略估计，“清队”中全国死亡的 50 万人中，自杀人数应在 20～30 万之间，其中，农村约占一半。笔者当年身处黑龙江省密山县三梭通公社，“清队”中全县死亡 110 多人，多为自戕，其中，三梭通公社打死 1 人，自杀 1 人。如按此 50％推算，“清队”中全国农民自杀者，应在 10 万人以上。

笔者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等有关纪录和本人见闻，编录出了第三波自杀名单：1968 年自杀身亡者名单(1)和 1969 年自杀身亡者名单(2)，供参阅。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

下面几位知名人士，都是“清队”运动中的受难者，各有学者著文为其立传。

忆容国团（作者：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作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研究员肖光琰全家自杀(作者：王友琴)

肖光琰，男，1920 年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经留学美国，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 年 10 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和毒打，12 月 11 日死亡。他被宣布是服用安眠药自杀的。时年 48 岁。两天以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 15 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一起自杀。

笔者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网页上检索出肖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 1946 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新楼里面。这是一篇关于叶绿素和光合作用的论文。科学也许日新月异，

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中的一部分。

但是，在文革时代，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因此，不要说论文，肖光琰一家人都被害死。

肖光琰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0 年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是二级研究员。他长期从事催化剂研究。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长大，其父曾任孙中山的卫士，随肖光琰到大连在海运学院教授英文。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萧络连。

肖光琰在 1952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1958 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被当作“白旗”批判。

在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肖光琰被关押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监狱，也就是所谓“牛棚”之中。两个月后，他死在被关押地，并被宣布是服用大量安眠药“畏罪自杀”。

1968 年 8 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全国所有的学校、科研单位和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为“特务”。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在这过程中，有七个人死亡。

这七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他们的家属都认为他们是被打死的。比如说，对所谓“跳楼自杀”的人，家属认为是被打死以后扔下楼去的。

肖光琰的一家最为悲惨。在肖光琰死亡两天之后，邻居见他们的家里没有动静，打开门看到，他的妻子甄素辉和 15 岁的女儿萧络连已经一起死在床上。他们服安眠药自杀。一个三口之家就此彻底被毁灭。

张存浩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到美国留学。1968 年，他 38 岁。他被从家里押上汽车带走的时候，他的妻子正锁骨骨折不能行动，家里有四个孩子。他被抓走后，工资一分不发，全家和他的一个老姐姐全靠他妻子的 60 元工资过活。

他的家被抄了 7 次。地板都撬开，柜子里的东西都被翻出来。他的工资比较高，每月有 200 多元。但因为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

他的 12 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他被抓进去以后，人们看到在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从来都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是也有些可笑：

被抓进“牛棚”以后，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单子，里面全是人的名字。“专案组”叫他承认那些人是他们组织的“特务”。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

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己12岁的儿子会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说他“态度不老实”。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

文革以后，政策改变，张存浩担任过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但是，1968年和他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七个人，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也不能说出他们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

张东荪及其子孙的恐怖遭遇（作者：王友琴）（略）

史家翦伯赞夫妇之死（作者：于松然）

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巫中**，身着军装，腰挎手枪，带着几名副手，直奔燕南园。他要**翦伯赞**交待1935年国共在南京谈判时刘少奇的叛卖活动；但翦伯赞否认那次谈判中刘少奇有叛卖活动。双方话不投机，无奈之下，临走他撂下一句话：“**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他警告翦说：过几天他还要来。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问翦伯赞。由于翦拒绝做伪证，巫中勃然大怒，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骂道：“**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翦伯赞闭口不语。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下面，大吼：“**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但巫中并没有达到目的，而是空手悻悻而归。巫中的逼供，再次使翦伯赞的尊严受辱，斯文扫地，遂产生了轻生念头，做出了立即自杀的决定。

就在翦伯赞自杀前的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对已被打倒、斗臭了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施恩”，借以证明他的“宽容”。他发布的“最高指示”说，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要“**给出路**”，他还特别关照北大的翦伯赞和冯友兰，指示北京当局和北大校方“**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有了这一“最高指示”，备受折磨的翦伯赞夫妇看到了希望，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被安排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64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30元增至120元，还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他老两口的生活(实则为监视)。翦伯赞对毛泽东的关照感激涕零。他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毛泽东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高枕无忧的翦伯赞夫妇，胸戴毛主席纪念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参加了落实政策大会。会上，他再三感谢“伟大领袖”对他的特别恩典。然而，**巫中**的出现，使他突然有所参悟。他悟出善搞“阳谋”的毛泽东，痞气再次大发作：原来对他发出的“最高指示”是虚晃一枪，毛泽东要置他于死地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俩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平卧在床上。人们还发现，在翦伯赞穿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不忘为监视他的杜师傅开脱责任。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是封建连坐时代自杀者的共有心态：恳求统治者对他的子女们**高抬贵手**！

这次翦伯赞**判断错了**：毛泽东虽没有完全放过他，却也无置他于死地的打算；置他于死

地的是毛泽东营造的血腥氛围，**巫中**不过是在这种邪恶氛围里的一个卒子——一名上窜下跳的痞子、流氓无产者而已。

翦伯赞（1898 年 4 月 14 日～1968 年 12 月 18 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在周恩来领导下搞过统战工作的政治家。

1916 年他进北京法政学校学习，不久又转入国立武昌商业学校学习，1919 年毕业。1924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历史学和哲学。193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撰写文章批判中国国民党的亲日独裁政策，与反蒋的民盟章伯钧等政要交往甚厚，与反蒋的社会贤达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等交往频繁，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要职。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等著作。

他是个马列主义信徒，在中国史学领域，他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先河：用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梳理历史。他积极配合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当获悉毛泽东要批判教授**张东荪**时，他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批判的重任。1952 年 1 月，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东荪，已经是“改造知识分子”运动中的众矢之的。

翦伯赞在批判他曾统战过的张东荪时，言辞锋利，杀机昭然，指出张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在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批判中，他列举了张的许多“罪行”，如张东荪曾在几本书里曾写过：**“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历史业已证明，张东荪的这些思想是至高无上的。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批判结果，张东荪被打成“特务”。据报导，张东荪“国民党特务”身份的唯一“知情人”是毛泽东，因为，“伟大领袖”的感觉就是“铁证”。从此，被统战回国的张东荪和他的子孙，接二连三地遭遇横祸：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自杀身亡，两个孙子被重刑入狱，82 岁高龄的张东荪本人，也没有逃脱监牢之苦，五年后的 1973 年，死在狱中。

翦伯赞是一个史学家，一个有见地的学者；也曾是善搞统战权术的政治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在学术领域，有任意驰骋的辽阔空间，使他自由地选择了马列主义；在那里，他还是个政治家，但他能找到政治和学术的平衡点，像平衡木上的体操少女一样，能自由地、主动地调整自己的“体态”。“解放”后，政治与学者的平衡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向政治上倾斜。初期，他似乎认为，用“改造”去确立马列主义是合理的，批判张东荪就是这种“合理”的体现。也许是史家的学术良心再现，他越来越感受到政治对学术的压力，毛泽东的“改造”政策，正在变成学术发展的桎梏。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他开始反对“以论带史”和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权力史观，偏离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到六十年代，他逐渐完成了从**“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历史学家”**到**“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才是共产党员”**的过渡。此时的他，已强烈地意识政治对学术的压抑。他说，当史学拜倒于权力的脚下时，**“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他的历史主义观点受到了批判，但他却坚持己见。当看了姚文元批判《海

瑞罢官》的文章后，不知就里的翦伯赞，竟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他甚至还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公然反对对吴晗的批判。于是，毛泽东被激怒了。1966 年 3 月 17 日至 20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出打倒翦伯赞的“最高指示”。他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翦伯赞应声变成了“反动权威”、“反共老手”、“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遂被“革命师生”揪出批斗，备受肉体摧残和人格凌辱。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前一个“最高指示”说“打倒”就打倒了，而后一个“最高指示”说“给出路”却找不到出路了呢？**伟大的学者张东荪**在五十年代就预言：**“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预言是最好的答案！

1978 年 8 月，中共新领导人邓小平对翦伯赞的自杀亲自批示说：**“我认为应予昭雪**。”1979 年北大为翦伯赞举办了的追悼会，追认他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翦伯赞的学生中，有一佼佼者，师生关系甚佳。然而，文革一到，他便贴出大字报，大骂《**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还配有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的漫画，对老师加以人格上的侮辱。但当官方正式为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摇身一变，撰文《**我的恩师翦伯赞**》，以为纪念。这种司空见惯的无耻表演，是中国特色的赤文化之一。

附 1、1968 年自杀身亡者名单

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纪录统计。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名单中有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 151 位，大部分死于“清队”。

附 2、1969 年自杀身亡者名录

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纪录统计。令人遗憾的是农村自杀纪录甚少。名录中有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专家张宗燧等 25 位，大部分死于“清队”。

41-权力更迭

作者 于松然

从 1966 年 12 月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起，到 1968 年 9 月，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简称“革委会”），毛泽东达到了夺权的目的，实现了

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一．解放右派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打倒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教训紧跟刘少奇而不听他的话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让听他话的左派上台执政。为了这个目的，他把妖魔化阶级敌人的惯用伎俩，搬到了中共党内。他把长期追随他的刘少奇比成“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是“牛鬼蛇神”。当刘的死讯传给他时，他咬牙切齿地批道：**“自作孽，不得活！”**他把追随刘少奇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斥责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走资派”**。他还把稍显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入“地富反坏右”的传统敌人行列，统统打成“牛鬼蛇神”。

但他也不是事事都能从心所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他发现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同情和支持刘、邓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甚至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时，他便煽动和“接见”年幼无知的红卫兵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借以向党内右派施压。当他发现各地右派当权派镇压红卫兵时，特别是贵族红卫兵摇身变成了“保爹保娘”派时，他便发动党内外左派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批判“资反路线”受到党内右派顽强抵抗时，引发了他的“无产阶级震怒”：号召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他还下令军队“支左”，即支持左派夺权。当他发现他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导致造反派分裂、75％军队“支右”不“支左”时，1967 年 8 月 4 日，他竟孤注一掷地抛出了**“武装左派”**、建立第二武装的决定。

显然，毛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中共推到了分裂的边缘。当是时，忠于中共的周恩来，心急如焚，生怕中共被毛之不争而毁于一旦。他借机向毛传出**“清君侧”**的暗示。接到暗示的毛泽东，大吃一惊，发热的大脑才开始渐渐冷却。8 月 26 日，“武装左派”的决定刚过 21 天，他便来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做出了打击左派、令党内外左派瞠目结舌的决定：**抛出王、关、戚**。这个“清江侧”的决定，向党内、军内右派伸出了橄榄枝，释放出了妥协、和解的信息。

曾几何时，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咬牙切齿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接见”红卫兵时，他又通过林彪的嘴喊道：**“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他还通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恶狠狠地号召红卫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还要**“彻底打倒”**党内右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为了释放和解信息，此时的毛泽东，摇身一变，竟成了广大“走资派”和执行“资反路线”当权派的保护神！

9 月 16 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上海，到各地视察，向党内、军内右派伸出了橄榄枝，同各地要员大谈起正确对待干部等问题来。

9 月 16 日，在浙江，他告诫浙江左派军干——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南萍**、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励耘**说：**“龙潜**（前省军管会主任）、**阮贤榜**（前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

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9 月 17 日，在江西，他警告江西左派军干——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9 月 19 日，他在武汉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据跟随视察的代总长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9 月 20 日，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人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但贺龙没有邓小平那么幸运：1968 年 10 月 13 日，他宣布“**不保**”贺龙后，贺的“罪行”旋即升级，审讯恶化，第二年的 6 月 9 日死于非命。

中共中央刊印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文件中记载，视察中，他还反复训导各地“诸侯”：**“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显然，毛泽东是要重新起用党内右派干部，只要他们能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反戈一击，能听他的话，紧跟着他走。

重新起用党内右派干部，并非毛泽东心血来潮，是他在周的暗示后深思熟虑的选择。

尽管他的文革初衷是要左派掌权；但他很快发现，左派“曲高和寡”，没有他的支持，他们很难成气候，因此，将权力交给他们他并不完全放心。对于右派当权派，毛泽东很清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跟着他拼杀出来的左派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特别是在镇反、土改、肃反、反右甚至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中，他们大都立场坚定，能武善文，是对敌“从不手软”的“好干部”；而这些在他一手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好干部”，构成了**中国官僚特权阶级**，是他“打天下，坐天下”的依靠力量。然而，当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后，他们变了，变得对他敬而远之了，不听他的话了，纷纷站到相对务实的刘、邓一边，形成了党内右派。这种党内势力重新洗牌的结果，使他变成了少数派，深深陷入大权旁落的痛苦之中，憋了一肚子恶气，迫使他“别无选择”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发动文革，仅仅是想教训教训除刘少奇以外的右派干部：叫红卫兵、造反派打打他们的威风，斗斗他们的官气，冲冲他们的不听话，出出憋在他心头的恶气，并不想全部打倒他们。文革伊始，他在大叫“打倒”“斗臭”的同时，不断地高喊要**“正确对待干部”**，反复地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等等，意在警告党内右派的同时，

敦促他们“改邪归正”：只要能听他的话，紧跟着他走，就是左派，他还会把权力交给他们。但当文化大革命遭倒党内右派的激烈反抗时，引发了他的“无产阶级震怒”，诱发了想彻底打倒党内右派的一闪念：下令批斗刘、邓、陶，做出了“**支左**”和“**武装左派**”的决定。

但毛泽东毕竟是个天才的毛泽东：当接到周恩来“清君侧”的暗示后，很快能自我反省，重新评估他的“无产阶级震怒”，决定向党内右派、军内右派伸出橄榄枝，释放出妥协、让步信息，以重新驾驭全党、全国。

毛泽东的急转弯，使许多党内外左派跟不上队，先后渐次倒台、挨整或被杀。

二、整肃左派当权派　（略）

42-取缔左派红卫兵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为了重新驾驭全党、全国，在整肃左派当权派之前，要先解决支持左派当权派的红卫兵。那些紧跟他的战略部署的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在“横扫”、破“四旧”、造反、揪斗“走资派”、批“资反路线”、夺权和武装镇压贵族红卫兵、右派红卫兵的战斗中，为保卫他的革命路线，付出过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要团结党内右派，他必须抛弃他们，因为他们同左派当权派一样，只能是他可利用的炮灰，而不是依靠对象。这不叫“卸磨杀驴”，叫“规律”：老祖宗留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

1、“工宣队”开进清华园，赶走红卫兵

1968 年 7 月，随着以广西、陕西为代表的镇压左派造反派军事围剿行动的进展，毛泽东决定把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红卫兵赶下历史舞台。

1968 年 7 月 27 日，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组成 1,500 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当年，1966 年 8 月，毛泽东宣布，刘、邓派“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是镇压“革命师生”，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两年后，他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北大，镇压的对象，恰恰是当年被刘、邓镇压过的“革命师生”，却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不同的是打手不同：前者叫“工作组”，由干部组成；后者叫“工宣队”或“军宣队”，由工人和现役军人构成。在这里，毛泽东把出尔反尔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演译得有声有色。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一直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的井冈山派司令蒯大富，由于没有人同他打过招呼，便敏感而迅速地作出判断：“工宣队”同两年前的“工作组”是一丘之貉，是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蒯大富，他那里知道，一贯支持他的中央文革，在王、关、戚事件后，锐气大减，正处于逐步丧失权势的过程之中，也无暇关照他了；他那里知道，晁错伏诛，七国平定，左右妥协后，兔未死而烹走狗，他所崇拜的“红司令”毛泽东，要收拾他们了。

作出错误判断的蒯大富，“义正辞严”地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

圣旨在手的“工宣队”，则针锋相对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面对“毛主席派来”一说，蒯大富根本不相信。他相信中央文革：过去毛泽东许多最新最高指示，都是通过中央文革传给他的。因此，没有中央文革的指令，就是右派反扑。于是，他当即立断，迅速召集几千名红卫兵，将“工宣队”团团围住，进行说“理”斗争。在文革中，“理”与“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阵雨点般的拳头和脚踢之后，“工宣队”员被打得晕头转向，仓皇逃出清华园。

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第一次交锋，大获全胜。他们欢呼，他们雀跃，他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然而，欢庆不过是回光返照，红卫兵墓穴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

五个小时后，近三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士兵，潮水般地涌进了清华园。他们兵分七路，在校内实施分割包围，使红卫兵所构筑的条条封锁线，顷之化为乌有。紧接着，他们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两派放下武器，走两派大联合之路。

得到党内右派支持和特别关照的“四一四”右派红卫兵，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了武器。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98名“四一四”派红卫兵，在“工宣队”的保护下，抬着两具棺材，低着头走出了科学馆大楼，到达了安全区域。

以蒯大富为首的左派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没有中央文革的指令，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顽抗。黄昏时分，在绝对优势兵力面前，他们见势不妙，28日凌晨2时多，从大礼堂后门突围逃出了清华园。当逃经西单电报大楼时，蒯大富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发了一则紧急呼救的电报：有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背后有“黑手”指挥，形势万分危急，请中央紧急救援。发完电报，他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工宣队”终以五名工人死亡和几百名工人受伤为代价，把蒯大富赶出清华园，为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战”，划了个句号。

2、红卫兵全军覆没于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28日凌晨2点多，当蒯大富驱车奔向昌平之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紧急

会议，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院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北地院的**王大宾**。五大领袖的“爵号”，据说是毛泽东钦封的。毛泽东的“召见”，是给红卫兵下达的最后通谍。但下达最后通谍的方式别出心裁，令人回味无穷！

据韩爱晶回忆，当他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跟着谢富治来到湖南厅门口时：

“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为了防止各取所需，召见时毛泽东打破常规，授意中央办公厅对谈话的全过程进行了录音。毛说：**“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放，许多人都被动。”**

官方的录音是否整理成文，档案尘封，人们不得而知。目前流传的“召见”版本主要有：《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革中文字》、《红卫兵档案》、《余汝信:七二八召见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和《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等。从流传的多个版本来看，似乎有人看到过录音文本。也许是受“主旋律”的制约，这些版本在讲话顺序、内容详实和删节上不尽一致，但倾向性明显一致。

尽管流传的版本颇多，但一些内容的可信度还是较高的。笔者根据流传版本的基本内容，编撰、点评如下：

⑴、抓“黑手”

当谈及蒯大富为什么没有来时，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显然，这是毛泽东针对蒯大富向他发出“紧急呼救”的电报说的。

⑵、大联合

毛泽东说：**“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林彪也说：“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对此，

毛泽东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显然，“军管”和“斗、批、走”是事前定好的基调。

⑶、“七三布告”

重申 1968 年 7 月 3 日和 24 日发布的两个布告。这是毛泽东下令歼灭各地左派造反派的布告。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接着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说：**“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接着说：“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又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又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周恩来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显然，这是把左派红卫兵与左派造反派等同起来，实行歼灭！

⑷、“关怀”五大领袖

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 又说：**“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王大宾反映说“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时，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王大宾反驳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

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对此毛泽东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王大宾坐到了毛的身边。

当林彪说：“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毛泽东表示同意林的意见。他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

谈到聂元梓，毛泽东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当陈伯达等人批评韩爱晶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又夸奖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江青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陈伯达批评说：“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毛泽东反批陈伯达说：**“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当陈伯达批评蒯大富时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显然，毛泽东处理五大领袖与处理打手王、关、戚手段不同，亦与围剿广西“四二四”、取缔陕西“工联”、“工总司”等组织手段各异，体现了**“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的关怀，由此，人们可窥见到权谋大师城府之深邃。

⑸、蒯大富的号啕

蒯大富到昌平县不久，便接到了毛泽东通知。他带着几分惶恐，捎着几分安慰，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到来之前，谢富治在向蒯头上泼污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他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但毛泽东认为：**“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

见到毛泽东的蒯大富，真如见到了大救星。他泪流满面地告状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蒯大富的号啕，给召见蒙上了一层悲壮的阴影，江青哭了，毛泽东也落下了眼泪。但悲壮气氛很快被打破。

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等大员纷纷指责蒯大富。周恩来要求蒯“现在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它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对抗道：“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又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

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

毛泽东把话接过来：**“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杀。”**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道：**“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会场气氛旋即紧张起来。

吴德趁人之危奏道：“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善做方向性引导的权谋大师，对吴德的奏本不予理睬。他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一句恨铁不成钢的话，冲化了紧张气氛。

批评蒯大富多少有些尴尬的江青，灵机一动，顺着毛的思路说：“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顺着他确定的思路问道：**“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泽东毫不犹予地许以官衔：**“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槼当副校长。”**

上午八点召见结束时，毛泽东反复嘱咐大员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尽管就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园一事吴德向蒯大富打过招呼，尽管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但在整整一天里，他们都隐瞒了派“工宣队”是毛的决定的重要信息**。在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蒯司令，骄横狂暴，一意孤行，以“一贯正确”自居，怎会把吴德、迟群等辈看在眼里？面对“工宣队”的步步进逼，他下命开枪，打死了五个工人，终于使他跌入毛泽东设的圈套中：隐瞒毛决定的信息，是诱导他反抗；他的反抗，能使“工宣队”名正言顺地取其而代之，并使他陷入四面楚歌中；进而借“群众”之名，名正言顺地将五大领袖和他们所代表的红卫兵清除掉！

五条人命使毛泽东的计谋成功了。八月八日，他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此时，“理无常是”的毛泽东，已经“忘记”了一年前他曾说过的那句名言：**“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也“忘记”了1966年8～11月在“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时他那灿烂的笑容（下图）；“忘记”了“接见”中林彪代表他发表的对红卫兵充满信赖的超高赞语：“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姜还是老的辣。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扶植和豢养的五大领袖，在毛泽东等人的“柔性”围剿下，很快都举手投降、束手待笞了。第二天，五大领袖在谢富治的监控下，写了一纸《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向全国公布。《要点》实际上宣布：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在召见中，五大领袖都受到“关怀”；但过后不久，他们同王、关、戚一样，先后失去了自由。十月宫廷政变后，他们又先后“领”到了他们各自罪有应得的不同期龄的徒刑，结束了他们即轰轰烈烈又可耻、可悲、可怜的走狗生涯！



图 17-1：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灿烂的笑

在湖南厅里，那没有硝烟的围剿，是“清江侧”和“清周侧”的续篇，而这种对红卫兵的围剿，则是党内左、中、右派妥协和共同发力的结果！

43-“九大”大会盛况和选举秘笈

作者 于松然

在中、苏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有人建议推迟召开“九大”，但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则认为，召开“九大”是当务之急：其一是一个胜利的团结的大会可以凝聚党心、民心，是最好的备战；其次是苏修还没做好准备。为了防止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3 月下旬，他要外交部通告苏联，准备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为缓兵之计。

1969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在北京召开。1,512 多个代表，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北京。据报导，代表们到京以后，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已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到丝毫痕迹。几天后，代表们才从通知中得知，4 月 1 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安排：先乘车在市内兜圈子，然后分时、分批、分门隐蔽进入。滴水不漏的保密工作，令境外媒体有些惊讶。

1 日下午，“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会议议程包括宣读、审议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以及备战等。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由于他的致词不断被“暴风雨般”掌声、欢呼声、万岁声打断，短短 649 字三五分钟就可念完的开幕词，他竟讲了二十多分钟。——在领袖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度里，这种赤文化的顽强表现，十分正常！

接着，副统帅林彪代表八届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据说，林彪对这个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过多次的政治报告，不很满意，但他必须照本宣科。

政治报告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报告把毛为保卫个人权力向刘、邓夺权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贴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标签，概括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政治报告还把毛泽东权力情结的阶级斗争思想，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把大会开成“胜利的大会”，政治报告严辞规定大会的方向：**“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为了把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政治报告在强调正确执行知识分子、干部、“可教子女”等政策的同时，鼓吹“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权力拜物教理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4 月 14 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

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引人注目的一条规定是：**“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胆之举？当鲜花盛开的时候，已经开始凋谢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是左派胜利的标志，但也是走向分裂、走向陨灭的开始。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是江青提出来的，而且“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并说“张春桥第一个赞成。”据此，精英们著文说：“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是“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精英们的批判，刻意回避了周恩来的支持和毛泽东不容争议的决定权——这是真假搀和、文过饰非、阿谀谄媚赤文化的顽固表现。

“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的选举，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亦即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全会提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是经过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反复“民主协商”产生的，体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279 人，都是经过代表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来的，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种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就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据报导，参加全会的代表除 2 人因病缺席外，都参加了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投了自己一票，得了满票 1,510 张；周恩来没敢投自己一票，得票 1,509 张，仅次于毛；林彪不敢与毛平起平坐，他同妻子叶群都没投他的票，故得票 1,508 张，位居第三；第一夫人江青得票 1,502 张，除一张“谦虚”票外，尚有 7 人敢不选她，也算发扬民主了。

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制导下，出现两个意义不同的选举结果：前者是有意设计，后者是无知自封。

一个是如何对待党内右派领军人物，如五老：陈云、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张鼎丞，五帅：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犯过不同程度的这

样或那样错误，但他们在党内、军内威望较高，很可能高票当选；为了约束他们并以示惩戒，主持者提出了他们的得票率不得超过 2 / 3 的设计。按此设计，各代表团把选与不选他们的人数，通过“民主协商”，落实到每位代表的人头上。“民主选举”结果证明，这个设计取得了成功：得票最低的是徐向前，获 808 张，得票最高的是张鼎丞，获 1,099 张，其它人得票都在 809～922 张之间。

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工人**王白旦**的当选。王 1935 年出生在河北景郅太行山区，初中文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他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这位王白旦有点“二愣子”品性,名字因与“王八蛋”谐音,工友们便以此戏称之，他也不介意。1969 年“九大”召开前，因他是贫农出身，根红苗正，被推选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当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时，他“阴差阳错”地被指定为九大的代表。令人惊奇的是，他不但当了代表，还“阴差阳错”地当选为中央委员。也许“时势造英雄”，当是时，“工宣队”把红卫兵撵下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已家喻户晓。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他，在选举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往他的名字上划钩。怎奈他不知就里，也给自己名字上划了个钩。他的这一钩不打紧，把自己钩成了一个唯一与“伟大领袖”同得全票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这个敢于同“伟大领袖”平起平坐的行为，就构成了一个“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重大政治事件。时代宽恕了他的“二愣子”品性，成就了他的官运。

对“九大”选举中出现的这两种不同的选举结果，文革后被精英们抨击为“**很不正常**”。

精英们对五老五帅不能高票当选忿忿不平，说这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糟踏”。精英们错了：民主集中制不仅不会去干涉这类“糟踏”，而且还会力促这类“糟踏”。精英们嘲笑“王八蛋”的当选是“阴差阳错”，甚至说他“二愣子”品性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精英们又错了：王白旦当选甚至高票当选是否是“阴差阳错”？他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承认不承认他的代表权？民主集中制不仅蔑视“阴差阳错”问题，而且对王“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质疑，也不屑一顾。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腌渍中的精英们，已无法摆脱那种根深蒂固的顽钝和偏见，他们不会承认，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毛主席正确领导下”的民主制，或曰刀架在脖颈上的民主制，正如林彪在日记中表白的那样：“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他们更不会承认，所谓民主集中制，是中共专制体制下滋生出来的一种变态民主的赤文化。

精英们的抨击，并不证明他们有了什么新思惟，他们的思维仍然是**仰头思**维，即看当权者的颜色行事的思维模式。当今主子要否定文革，他们便找理由抨击“九大”选举“很不正常”，闭眼不看过去主子和当今主子的做法并无不同。毛泽东用不太听招呼的右手,夹住铅笔，在纸片上颤抖抖地划了“**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请看，一代“英明领袖”华国锋便呱呱落地；邓小平说了句“**江、李体制好**”，这不，江泽民、李鹏便在第一、二把交椅上正襟危坐了 13 个年头；邓小平生前交待江泽民说，两届后把权力交给小胡，江乖乖照办；于是乎，13 年的媳妇熬成婆，胡锦涛羽扇纶巾，粉墨登场。这就是“协商民主”的典范。在典范的示导下，中共各级党代、人代、政协的选举和干部选拔，都纷纷效法。由此可见，无论是毛泽东的“九大”选举设计，或着是邓小平的指定接班人的设计，都是“服从——纪律”即民主集中制的一脉相承，如果有所差别，不过同工异曲而已。精英们对“九大”选举的抨击，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仰头**秀。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权贵和精英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对“九大”“民主协商”和“民主选

举”的批判，再次检起“协商”和“选举”相结合的牌子。2010 年 9 月 16 日，他们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划清中国特色民主同西方民主界限》文章中宣称：“**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他们还号召要“**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限，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昨天，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曾使“九大”成了毛泽东的独裁天下，而今，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使中国官场买官卖官泛滥成灾。

44-核战危机——两党玩火，美帝灭火

作者 于松然

正当中共“九大”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之际，1969 年 3 月 2 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展开激战，造成数百人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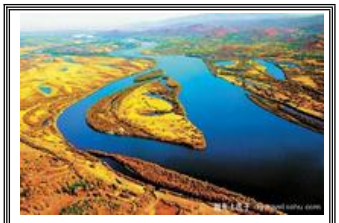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吗？非也！

自苏共党魁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热变冷，又从论战向武装冲突发展。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在当时两国 7,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摩擦事件接连不断。据统计，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2 月，中苏边境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就高达 4,180 余起之多。尽管冲突事件频发，双方都没有做打仗的准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狂躁起来的中国人，那些曾在砸印度使馆、砸印度尼西亚使馆、砸缅甸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大显身手的造反派们，那些曾在莫斯科红场上造反、扬言要对“苏修”实行“群众专政”因而导致同苏联军警浴血肉搏的大学红卫兵们，那些曾在派性厮杀中百炼成钢的“英雄”们，以及那些热衷内战、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横行霸道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权贵们，对摩擦事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频频发出“教训”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下称“苏修”)的呼声。

红卫兵高呼：“油炸勃烈日涅夫！”(苏共总书记)造反派高呼：“绞死柯西金！”(苏联政府总理)据说，江青曾扬言，给她十万红卫兵，便可踏平莫斯科！这个“据说”似有丑化之嫌，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特有的骄狂和浮躁！

中苏对立中，客观形势是敌强我弱，至今未变。在敌强我弱又无外援的情况下，索要被侵略者侵占的领土，外交谈判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例如，日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承认俄占其北方四岛的合法性，即坚持**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的立场，为后代子孙有力量在向俄国讨还失地时，创造了占据国际法理高地的有利条件，不给侵略者留下任何赖帐文字或口头把柄。但在毛、林、周、江等人的鼓动或默许下，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被“**人民战争所向无敌**”的愚昧所湮没，冒险主义占了上风，解决边界冲突的**外交谈判**被边缘化。

在 7,000 多公里的边界上，除根据中俄不平等条约被苏俄侵吞的约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外，还有许多被苏占领的有“争议”国土，其中有：0.74 平方公里的**珍宝岛**，350 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4,815 平方公里的**江东 64 屯**，约 103,000 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30,000 多平方公里**帕米尔的部分地区**，等等。此外，尚有许多被苏俄蚕食但多数中国人不知情的地区。如笔者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三梭通公社发现：大顶山大队边境线以南，有一块约 10 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五十年代被苏军蚕食掉(1)。


航拍珍宝岛

珍宝岛北距饶河县城 45 公里，是个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西靠中国一侧的一个小岛，长约 1,700 米，宽约 500 米，面积 0.74 平方公里。枯水期，小岛几乎与西岸连成一片，**是一块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右图）。就国际法而论，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是霸道。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以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西侧为由，把该岛划归苏联所有，称其为达曼斯基岛，从此形成争议，摩擦不断。

边界冲突不断激化。**据中方统计**：从 1967 年 1 月到 1969 年 2 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苏边境上的我方边防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与苏军发生肢体冲突达 10 多次。其中，在 1968 年 12 月 27 日冲突中，我边防军人被打伤 8 人；1969 年 1 月 6 日，苏军抓走两名捕鱼的我国农民；1 月 23 日，苏军打伤 20 多名我边防军人，其中重伤 9 人；2 月 6 日至 25 日，苏军又连续多次围攻、毒打我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据苏方当年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康斯坦丁诺夫上校回忆**：1968 年，仅在伊曼边防段，双方就发生过 40 次打斗；1969 年 1～2 月，在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使用棍棒，而是使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 15 支枪，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枪膛里都有子弹；于是，我们把边防哨所值勤人员加强到了 50 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下令，只要中国人一出现，边防人员可以向他们射击，将他们赶走；但我们并不知道，2 月底，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已经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并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为了给“九大”壮势，造神运动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已将苏联晋封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因而对帝国主义针锋相对地斗争，就有了“理论”根据。于是，他回应“**群众**”要求，决定用武力“教训”一下没有赫鲁晓夫的“苏修”。于是，沈阳军区组成以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为首的前线指挥部，集中黑龙江省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和陆军第 23 军 1 个步兵团、2 个侦察连、2 个加农炮营和 1 个高炮营的数千兵力，准备“教训”。这是以全世界人民领袖和导师自居的毛泽东，继 1968 年 4 月 16 日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之后，再次以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身份所做出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决定！

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毛泽东撇开**外交谈判**，选择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进行武装“教训”，是基于“苏修”不会为这个小岛大动干戈的**冒险主义**判断，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外患，强化专政，为召开“九大”凝聚党心！

经充分准备后，1969 年 3 月 2 日，沈阳军区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潜入珍宝岛，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 32 名苏联军人。苏联人恼羞成怒，立即调来坦克、直升机、重炮和当

时被称为“冰雹”的“秘密武器”BM－21 火箭，于 15 日和 17 日两天，在珍宝岛南北数公里的正面上，实施报复性袭击：重炮、火箭射入我国领土纵深达 6～8 公里，造成大量军民伤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沿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

苏联人显然是认真了；其反击手段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由于担心苏联入侵，毛泽东下令“**不要打了**”。之后，苏军对珍宝岛和附近沿岸进行了狂轰滥炸，使珍宝岛旋又落入苏军控制中。对此，我边防军听之任之，没再认真反击，间或放一、二冷枪以示主权。但在“舆论一律”的强权下，蒙在鼓里的中国人，还以为我军已夺回并扼守住了珍宝岛。

是役，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 17 辆，死 58 人，伤 94 人。苏方认为，他们“吃了亏”。但据报导：我边防军伤亡 100 多人，而民兵和平民的伤亡约 600 余（另说 800 多）。

毛泽东的冒险主义在国外败北，在国内却取得了成功：全国各地都在欢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取得了胜利。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戴着战斗英雄的光环，在“九大”上，出尽了风头。由于是“自卫反击战”，负责指挥作战的沈阳军区副司令**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以及那些参战的团长营长们，都无法公开亮相，因而无法享用孙玉国的荣光。

尽管毛泽东宣布“取得了胜利”，也达到了为“九大”壮势的目的，但判断上的失误，非但没有夺回一寸领土，反而引发了中苏热核战争危机。

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共产主义者嗜血的本能，使苏共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在以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鹰派人物主导下，苏共决定“**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计划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的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时，调动百万大军，陈兵中苏边境，随时入侵中国。于是，在新沙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冒险主义占了上风，开始了与中国打大仗、打热核仗的准备。

准备就绪的北极熊，为了给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刺激中国反击，1969 年 8 月 13 日，苏军 300 多人在 6 辆坦克和两架直升机的支援下，突然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举围歼了一支我国边防巡逻队，致连长以下 38 名官兵无一生还(另一说为 79 人)。

令苏联意外的是，已获悉“苏修”核战谋图的毛泽东，此刻冷静得多：他开始正视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没敢下令反击，因而无法宣布“胜利”。对于这个国耻事件，他不愿让老百姓知道,便下令不准报导。文革后，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军方在当年巡逻队罹难处，修建了 79 个墓碑。

毛泽东多次“论证”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右图）。但他对自己的“理论”并不当真，那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一旦“纸老虎”真地扑来，天才的他，决不会愚蠢地率领红卫兵，**举着火把**去迎击。



在珍宝岛缴获的“纸老虎”苏军军帽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在苏共准备打大仗、打热核战争的压力下，毛泽东撤掉了“纸老虎”学说的伪装，在全国掀起迎击真老虎的备战活动。

1969 年？月，他提出大搬迁的**“地、后、山、分、小”**的五字方针，开始把主要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按地下、后防、山区、分散和小型化配制方案进行拆迁、转移和分割，并使许多企业转为军工生产。8 月，获悉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后，他下令全国各地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开展了挖防空洞活动。这种活动到 1972 年，演变成他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9 月起，他开始大规模疏散大、中城市人口和物资，其中，在京的中央党政机关、各主要单位、学校及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都按备战要求集中装箱运往“三线”或山区保存。在边境地区，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按备战要求向内地迁移。备战中，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到农村，等等。10 月，笔者在密山县县政府大楼里看到，空空如也的档案柜、文件箱上，都贴上了“苏修，小心炸弹！”之类的封条……据报导，全国共拆迁、分割了数百家大型工厂企业，疏散了 94 万多人，还疏散了 4,100 架飞机，600 多艘舰艇。大疏散，大搬迁的备战活动，使数百亿元付诸东流。**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火，一寸领土也没有夺回，却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69 年 9 月，全国已进入临战态势——北极熊这只真老虎，果真要来了！

1969 年 8 月 20 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征求美方的意见，并要求美国保持中立。基于**“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对苏共本质的判断，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大规模核战争的后果极其严重，直接危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一方面通知苏方，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设法告知中国。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又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巧妙地把“绝密情报”透露给一个不起眼的小报，借以让中共深信不疑。

狡谲的美国人，充分利用中苏交恶之机，徐图渔翁之利。

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失信气得发疯。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话虽轻松，但他对真虎北极熊的威胁，没敢掉以轻心。他明确地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好家伙，要准备死 4 个亿！这与 1957 年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漠视生命的狂言，同曲同工，一脉相承。那时他说：“（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什么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

苏联鸽派出于全球主要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和遭中国核报复等多方面考虑，9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力图缓和紧张关系，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逝世后归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由于**周恩来坚持过去中国与苏俄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会谈没有达到缓和两国关系的目的。但毛、周这个正确的民族主义立场（2）和错误的冒险主义立场，到九十年代，成了卖国贼江泽民、李鹏等留苏派卖国的借口。

柯西金回国述职后，鹰派勃列日涅夫主义卷土重来，冒险主义又占了上风。

9 月 16 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刘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美国很快判明，维克多是苏联克格勃新闻代言人，他的文章是对中苏热核冲突中美国态度的一个试探。同时，美国侦察卫星显示，数千帐蓬一夜之间在中苏边境竖起，苏军已进入攻击阵地！

在中苏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召开了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安全助理基辛格等人参加的紧急国安会议。会议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为此，美国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三大措施：1、向苏联重申美国反对核战的立场，表明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2、利用各种渠道向中国示好，释放善意，通报情势；3、为了防止苏联一意孤行，巧妙运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准备的总统指令。”**

苏联克格勃把“破译”到的美国“总统指令”，迅速上报给苏共总书记。一直在利用中美矛盾、认为**中美仇恨不可调和**的勃列日涅夫，忘记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名言，看完报告后，愤怒地大叫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建议，下令恢复边界谈判。

一场可以由外交途径来解决的珍宝岛争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在两个共产党“教训”和“消除中国威胁”的强权运作下，演变成两国之间的热核战争危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可能导致亿万人死亡的危机，却在“美帝国主义”尼克松政府的干涉下，烟消云散，转危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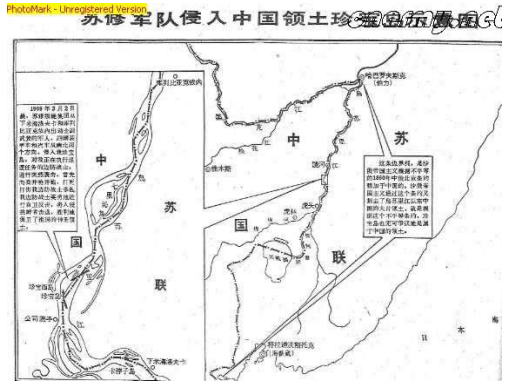
对此，中国上层精英们自有“特色”高见。他们著文对中国老百姓说：**“由于中国装有核弹头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目标，才使他们没敢轻举妄动！”**还有人这么对中国老百姓说：**“第二炮兵很快进入临战状态，展示了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使苏联领导人最终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

由此，珍宝岛这个巴掌大的荒岛，力排其他比它大几十倍乃止几万倍的被占领土，一跃成为名扬天下的耀眼红星，成为中共“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寸土必争”的象征！这种力排外交谈判而用**“检芝麻，丢西瓜”**结果连**“芝麻”**也没守住式的武装“教训”，尽管没有收复一寸国土，尽管备战又使中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却使毛泽东和中共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不仅达到了为“九大”壮势的目的，而且达到了利用外患强化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从而使血腥镇压异己者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找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口！

核战危机雨过天晴后，一直被中共骂为“反共狂徒”、“战争贩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被中共重新包装：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赞扬尼克松道：“**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登陆中国，开始了中、美修好因而惊诧世界的“破冰之旅”！

行文到此，不得不说几句看似离题的话：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四十多年间，中共几代领导人，在解决被苏侵占的领土上，其立场几经变化：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是亲苏的**放任主义**；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冷淡时，变成了**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的**民族主义**；到了中苏关系恶化时的六十年代末，走上了**冒险主义**；九十年代，为了抵御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对一党专政的威胁，又认敌为友，求助于中俄合作，最终走上**卖国主义**。为此，他们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以“既成事实”为由，抛弃民族主义，采取了与解决南沙群岛、钓鱼岛争端迥然不同的立场，偷偷干起了卖国勾当，与北极熊签订了领土条约，使俄国侵占我国的 16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合法化，没有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丁点讨债的余地。他们做贼心虚，不敢让全国人民知道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只在《人民日报》不起眼的地方，发布一条简短“新闻”，力图让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忘记。他们的偷偷摸摸丑行，与俄方大张旗鼓地公布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这么说，他们连日本国历代政治家们的徒子徒孙都不配当，他们只配当遗臭万年的中华民族天字第一号大卖国贼！然而，正是这些卖国贼，当了婊子还要给自己树牌坊。他们继承了毛“太祖”愚弄中国人的衣钵：在中俄领土谈判中，用出卖大量土地其中包括 350 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几乎一半的土地，换回了大名鼎鼎的仅有 0.74 平方公里大的**珍宝岛**（右图），然后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功德牌坊”——纪念馆，对中国人进行“寸土必争”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



左图为珍宝岛位置，右图上角为黑瞎子半岛位置

附 1、被苏军蚕食掉的国土

在黑龙江密山市的地图上，兴凯湖上有一条直线分界线，东南起于龙王庙，东北止于当壁镇。在六十年代以前的地图上，这条直线边界线一直延伸到二人班乡。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为了“**便于管理**”，农村大搞合村并屯，“大搞集中居住”，住在直线边界线一侧的零星居民，被迫北移，为苏联蚕食中国领土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这条实地边界线，从当壁镇起便向北弯曲。这一弯曲，使我国丧失约十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比珍宝岛大十多倍。事实也确如此。1966 年 5 月，笔者在大顶山大队以南的边界我方巡逻线上，即地图上兴凯湖西侧向北弯曲线的顶端处，发现了一块石碑。记得石碑露出地面高约 60 厘米，宽约 35 厘米，厚约 6～7 厘米，正面刻着“**拉字牌**”三个大字(不知其意)，落款是“大清国光绪三十二年立”。我问大顶山大队的大队长：“这是界碑吗？”大队长说是界碑。他指着南面苏联管控的一条山岭说：“十多年前，界碑还在山梁南面坡底，不知什么时候被搬到这里。”他还告诉我：“（他们）大队里有几户祖坟都在南山坡上。五八年前，老毛子还叫过

去上坟，后来他们修了路，设了铁丝网，盖了瞭望塔，就不让去了。”我问他：“向上级反映了没？”他说：“反映了多次，说外交部知道。以后没有了下文。”我目测了一下：“拉字牌”距南岭岭脊约 4 华里，约为地图上“向北弯曲”距离的 1/2（按兴凯湖湖面直线分界线长约 70 公里的比例计算）；岭南坡长不得而知。

附 2、民族主义立场

解决中俄边界的原则应是**不承认、不冲突、维持现状**。其一是要俄国人承认过去的九项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其二是维持现状，不挑衅，等待时机。毛泽东、周恩来在与俄国谈判边界时，曾经坚持过这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就是当时机成熟中国有条件收复失地时，无论在外交上、军事上，都会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占据国际法理高地的有理、有利空间；但当江泽民的中共，偷偷与北极熊签订条约使其侵占中国领土全部合法化后，收复失地的路子就被卖国贼彻底堵死了。

45-五七干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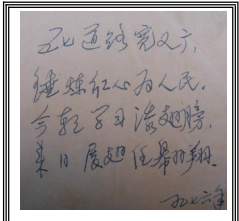
作者 于松然

在权力再分配中，许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被迫“靠边站”，失去了工作和权力，发配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笔者用曾写过仅在博客上发表过的一篇短文《点评两首诗》，重现当年毛泽东五七干校的原形。

点评两首诗

第一首：《五七道路》 作者 牛玉儒（2004 年 8 月 14 日，病逝于内蒙古自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任上）1976 年（下图）

五七道路宽又广，
锤炼红心为人民，
今朝学习添翅膀，
来日展翅任翱翔。


《五七道路》

第二首：《江城子 五七干校》 作者 高国彬 1969 年 （下图）

枯树寒鸦啼声咽，
金风烈，
日西斜。
残秋将尽，
观衰草遍野。
暮霭沉沉黄昏后，
号声起，
归队列。


学员“劳动课”间休息

夜阑更深人不寐，
倚窗望，
宁静夜。
骨肉分离，
伫立对残月。
来时有日无回期，
何时归？
音信绝。

*　　*　　*　　*　　*　　*　　*　　*　　*　　*

点评前，先说啥叫五七干校。

啥叫五七干校？年轻人可能不太懂。简单地说，就是按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起来的干部学校。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要求：**“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之后，人们常说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思想，也是现代版的**陶渊明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经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夺权、“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和武斗等，一场接一场的厮杀，该杀的杀了，该判的都关起来了，剩下了大批“问题干部”，仅中央机关就占干部总数的 82%。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高学历、高素质，他们过去在组织上或思想上，大都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与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的嫌疑，因而有应得之“错”或“罪”；但毛又无可奈何地说**“查无实据”**。怎么安置？还有学校里的那些**“王八蛋”**，诸如那些教授、学者、专家等；毛泽东曾愤怒地厉声责骂大、中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怎么安置？留在城市里，他们会做小动作，无事生非，甚至兴风作浪。中国无法继承清代充军发配那套，因为，他们是封建专制，我们是“人民民主”，过不了这个“理”；也无法借鉴苏俄流放政策，因为，没有可供使用的西伯利亚，那里遥远而辽阔，且常被冰雪

覆盖，是个放逐的好地方：苏共列宁、斯大林时代，曾使数百万个“政治犯”“思想犯”在那里自生自灭。正当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人为处置上述干部犯愁时，1968 年 5 月，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庆安县，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据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说：“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这位负责人还说：“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到底是“**安置**”还是“**培养**”？这位负责人大概不想也不敢说得太明白。

毛泽东发现柳河五七干校的材料后，大赞“培养”说，欣然命笔，在材料上批道：“**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批语传阅后，中共中央于 1968 年 9 月 30 日，通令全国照办。于是，五七干校遍地开花，全国一片“红”。

“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怎样改造和培养呢？**学工**，就是盖房、挖渠、砸油、磨粉之类。**学政治**，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林彪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林彪跨台以后，便学毛主席的其他著作。**学文**呢？对于那些高知学员们，诸如那些专家教授们，他们虽然懂得什么运筹、模糊等高等数学，或会做诗写文章，但由于“伟大领袖”说“**书读得越多越蠢**”，急需由工农兵给他们补一补文化课。**学军**呢，有吹哨起床，排队下地干活的操练。只有**学农**范围较广，春种、夏锄、秋收、冬备，样样得按时，样样不能少。这就是五七干校。从当年干校学员们写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反修、防修”和“培养”这种堂而皇之又荒谬绝伦的口号压抑下，他们对被遣送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的失落、无奈和愤懑。

1979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数十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先后从劳改生涯中解脱了出来。自此，历时十年辉煌的五七干校寿终正寝，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给历史留下了一页令人难忘的篇章。

看看五七干校的历史，再看看当年干校学员们所写的回忆录，你就会对上面那两首不同心声的诗作出自己的评断。

不管人们怎样评断这两首诗，作为一个过来人，笔者对这两首诗的点评是：

第一首《五七道路》是“真实的谎言”

为了摆脱困境，当时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向上表忠心。这是一首典型的阿谀表忠诗。作者绝不会相信，学会种地就会给他“添翅膀”，学会锄草，学会“**你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朝阳沟》学锄草唱词)，就能使他“**来日展翅任翱翔**”。但要表示忠心，就必须有这样美丽动听的谎言，而这种谎言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不过，不容否认的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毛泽东，用真假搀和的谎言，夺得了天下；作者用“真实的谎言”，“翱翔”在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任上。

第二首《江城子 五七干校》是“深藏的真情”

那个时代是残酷批斗和争相表忠的时代，许多人的真实情感往往被那美丽动听的、感人落泪的、甚至神圣得不容置疑的谎言所掩盖。**“骨肉分离，伫立对残月**。”分明是真情的宣泄。这是一首典型的泄愤诗。这种另类忿恚权势诗，当时必须深藏不露，否则，作者早已是高墙囚徒，甚至还有暴毙荒野、永别妻儿的可能。

46-文革第六轮大屠杀——“一打三反”

作者 于松然

一、镇压借口

1969 年 11 月 12 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囚室中被折磨死去，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但彻底消除中华传统文明和现代普世价值的文化大革命任务，还远没有完成。1970 年 1 月 30 日，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大管家”周恩来，将亲自拟定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指示》中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周大管家在报送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在 1 月 31 日批道：**“照办”**。

在毛泽东和中共的词典里，“反革命”与“人民的敌人”是两个互为注释的同义词，有明确的定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规定：**“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因此，一切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反革命。

《指示》做出的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

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推翻了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承诺，成了镇压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老百姓的刽子手。

1968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196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同谢富治等的谈话时强调：“**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它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又说：“**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1969 年 4 月 14 日，“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规定：“**在对敌斗争中……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1969 年 5 月 14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说：“**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

眨眼一看，毛和周的讲话不无理性，也似有人性，但其鲜明的“恩施”色彩，使人们想到，他们的这些讲话，即没有法制观念，也没有人权意识，只有赤裸裸的封建帝王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这种统治权术的恣肆无忌，连他们自己剪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因此，《指示》下达后，上面“恩施”的一切都不算数了：毛泽东要“立威”了，他批准了刽子手周恩来的“推翻”，打开了大规模杀人的“魔盒”！

2 月 5 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两个文件，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通知》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

上述 3 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周大管家直接领导下，中央成立“二五”运动办公室，领导各地的“一打三反”运动。

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理由是“充分”的，因而执行起来理直气壮，不容争议。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除了把法西斯暴行说成是“扩大化”外，不少精英还在为“一打三反”罪恶行径扬幡招魂。例如，为了替“一打三反”找到一个合理的支点，作者**阎志峰**在《党史纵横》上发表一篇题为“‘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文章，在批评所谓“扩大化”的同时，为这个法西斯运动搜寻了许多“合理”的支点。他写道：

“1964 年 5 月之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告，从 1963 年 11 月至 1965 年 1 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 16 股美蒋武装特务。1967 年 6 月 13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印度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鲁冠南，宣判将其驱逐出境。1967 年至 1969 年，解放军在华东、华南连续击落美蒋飞机 18 架。

“1969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这年 3 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大兵压境’的架势。8 月 13 日,又发生了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气氛。8 月底，我情报机关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

“1969 年国庆节过后，形势更加紧张。有关部门认定，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 10 月 20 日，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 月 19 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为此，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10 月 18 日下午，林彪口授发布了四条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一打三反’的文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道：‘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则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

显然，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翻版。

近人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看法各异：一部分人认为正确，不先安内，焉能攘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完全错，安内的目的是强化独裁。笔者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安内”？正如“攘外”至少有战争和外交妥协两种以上选择一样，“安内”也至少有两种以上的选择，如镇压和民主整合。当年蒋介石提出的“安内”是镇压、围剿，1970 年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一打”的“安内”术，是镇压、围攻；当年蒋迫于内外压力，接受了民主整合的建议，与中共合作抗日，而七十年代毛、周没有压力，只有随心所欲地镇压！

作者阎志峰发表于 2006 年的这篇文章，坚持毛泽东镇压异己以安内的观点，替反人类的无产阶级专政**树德**，代表了中共大员和上层精英们的正统观念，具有很大的蛊惑性。也许是“主旋律”的作用，上层精英们在普世价值的潮流面前，都能自觉同官方保持一致，以中国“特色”之名，宣扬镇压有理，拒绝民主整合。当弹丸小国**以色列**在周围虎视眈眈的军事压力下，为了生存，他们的“安内”政策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即**民主选举、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对此，上层精英们视而不见。当**印、巴**两国剑拔弩张怒目相拼时，他们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对此，上层精英们不置一词。当**台湾**在大陆导弹、军演的威慑下，为了生存，他们的“安内”政策没有选择镇压异己，而是选择民主整合，对此，上层精英们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把当今台湾政局描绘或影射成“漆黑一团”，借以为**镇压异己**张目。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安内”的民主整合政体，上

层精英们自有说辞：过去斥之曰“为资产阶级服务”；当中共新资产阶级崛起后，他们则应“主旋律”之命，巧言为“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政权，毛、周他们像“解放”初期发动的“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毫无顾忌地开展起“一打三反”的法西斯运动，而且他们还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毫无阻挡地把法西斯运动进行到他们想要停止的时候。

二、红祸中华

1、简述“一打三反”与周恩来

毛泽东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这些较有人性的“恩”字号话，都被他“**一三一**”的“照办”两个“威”字号批示，批得一干二净，成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经典力作之一！

据知情的史学家们披露：1970 年 2 月至 11 月的 10 个月中，受到非法批斗、审讯者不少于 200 万人；从中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高达 148 万人之多；其中，逮捕了 28.48 万多人，枪杀了 9,000 多人(另说 3 万人以上)；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包括自杀、虐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十万人以上。

这是继一年前清理阶级队伍大屠杀后的新一轮大屠杀，亦即**文革第六轮大屠杀**！

“一打三反”是在周大管家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不同政见者心狠手辣的周恩来，充分利用各地“支左”部队首长、军管会负责人和以军人为核心的革委会，主持“一打三反”运动，以残酷批斗、杀一儆百之红色恐怖，震慑广大异己分子。

为了防止杀人“扩大化”，中央下达了杀人**控制指标**。指标指令各地诸侯，不杀人不足以威慑，但“杀人不可过多”。“控制指标”体现了周大管家恩威相济的人治权术。

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一位知情者看到当年**安徽**当权派是如何考虑杀人指标、如何决定谁该枪毙的。他写道：**“他懒洋洋地随手翻着公安部门每月上报的可杀的‘反革命’花名册，不时打着官腔说：‘这个还留着吗？杀了算了。’又翻一页：‘这个呢，也杀了吧。’他问身边人：这个月江苏杀多少？浙江杀多少？身边人回答后，他说：‘我们杀个中等数吧。’人的生命便结束在这样的官腔下。”**

为了鼓励屠杀政治犯、思想犯，中共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迅速在南京组织了几次大屠杀：继 3 月 6 处决了 11 名政治犯后，4 月 28 日又处决了 12 名，7 月 24 日又处决了 24 名，12 月 10 日又处决了 10 名。江苏各市县也相继学着省府杀人，据说杀人上千，成了全国之最！在**湖南**，省府长沙在三月间，开了两次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思想犯。由于各地杀人过多，引起上层议论纷纷，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施之以“恩”，收回了死刑审批权。这样，数千政治犯躲过了杀戮。例如，长沙将召开宣判大会，要处决 60 多名政治犯、思想犯，因死刑审批权被中央收回，不得不将死刑改判为徒刑。其中，**杨小凯**死里逃生，被改判为 10 年徒刑，

意外获得了生存权，才使得他后来能成了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

在档案尘封的条件下，有良心的史学家们如**丁抒**等，利用他们的名气，从几处地方志上查获了一些“一打三反”的历史纪录。例如：

《西平县志》记载：**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沂水县志》记载：**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 173 人，处分 84 人，3 人自缢身亡。《泰兴县志》记载：**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多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户县志》记载：**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662 起，“定案”处理 483 人。《安阳市郊区志》记载：**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 2,392 人。《邢台县志》记载：**河北邢台县**“挖出”122 名“反革命分子”。《松江县志》记载：**上海松江县**定性处理 2,975 人，其中被判徒刑 56 人，管制 10 人，“在政治性案件处理中，又产生了一批冤假错案，非正常死亡 53 名。”

据《**宁波大事记**》记载：2 月 17 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浙江镇海县** 2 月 28 日至 3 月 24 日，发生自杀事件 20 起，其中死 16 人。

《历史的审判》一书记载：**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于是，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打张”的学生。炮打张春桥一案，株连近千人，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 120 多人被逮捕、监禁，自杀 5 人，逼疯 3 人。

据报导，1970 年 2 月初，**广西北海市**革委会成立了“二五”运动办公室，领导全市的“一打三反”运动。3 月 12 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批示“二五”文件精神全面围歼反革命》的动员报告，提出要在 10 天内，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主要目标是：侦破反革命标语案(包括过去发现的)，侦破收听反动电台案，侦破偷越或准备偷越国境案，查办严重破坏生产案件，查办历史上的杀人放火案件，查办历史上可疑的人或事，查办散布帝、修、反反革命言论的案件，查办清理阶级队伍中揭出的问题未做清理的案件，等八大案件。3 月 9 日至 10 日，全市 3 万工、干、群斗争了 8 名现行反革命分子；4 月 8 日，市工交战线 4,800 多人批斗了 17 名“帝修反别动队分子”；4 月 11 日，市革委会组织 3.2 万人批斗了 16 人，当场逮捕 4 人(后复查均属错捕）。5 月 4 日至 5 日，市革委会又召开全市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主会场参加人员 6.6 万人，市内设 404 个收听点，1.6 万人收听了主会场实况转播。会上 8 名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了徒刑，4 名能坦白交代、积极退赔、检举揭发他人的人员免予刑事处分。会议期间，全市划分 13 个“战区”，设大小战场 560 个，坦白检举登记站 404 个，共批斗干部群众 500 多名，582 人被逼迫交待问题。会上披露，该市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自杀事件 39 起，死亡 24 人，其中，5 月 4 日至 9 日，共发生自杀事件 8 起。

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记载：1970 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〇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陕西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是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的留用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 254 人，枪决 17 人，判刑 12 人，戴“反革命”帽子 25 人，20 人自杀身亡。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着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分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据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记载：“据统计,1970 年 2 月到 11 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 万多名，捕了 28.48 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某自治区从 1970 年 2 月开展‘一打三反’，到十月，搞出所谓‘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2,768 名，其中由公安机关逮捕 4,395 人，拘留审查 4,059 人，在整个‘清队’、‘一打三反’中，具不完全统计，生产建设兵团共揪出所谓各种‘坏人’70,000 多名，各地区揪斗了 159,900 人。在运动中，兵团系统刑讯逼供，**打死、逼死 2,769 人，各地区自杀的有 2,700 多人，被打死的有 640 多人……**”

由于档案死不解密，又不许体制外调查，人们很难知道全部实情。据一些研究者估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包括自杀、打死、折磨死和“依法”处决的人数，**应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下层的弱势群体。但也有文革学者著文认为：“**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然而，1970 年 12 月，刚刚进行了十个多月的“一打三反”运动，嘎然而止，各地计划进行的杀人“公判”，也突然不搞了。原来，毛泽东在 12 月全国公安会议前，发出了新的“最高指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对主持“一打三反”大砍大杀的周恩来，当头一棒！据笔者估计：毛对周的当头一棒，至少使上千名等待处决的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绝地逢生！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当头棒喝，是毛、周较量的一部分：毛在把自己打扮成菩萨的同时，却把鲜血淋淋的人权暴行，都推到了周恩来的头上。

尽管“一打三反”嘎然而止，但它的“辉煌战果”，再次显现了周恩来的“丰功伟绩”。由于保护中共特权阶级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有功，被中共戴上了“人民好总理”的桂冠。但不论“主旋律”对周如何粉饰，人们还是能从那顶光彩夺目的桂冠上看到：

宝石顶戴，血光闪烁，三眼花翎，鲜血欲滴！

2、四十种酷刑（略）

3、消声处决法

在井冈山，中共和毛泽东在打“AB”团等肃反中，就打破了死刑犯临刑时有说话、喊冤和呼口号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禁锢，行刑时，为使死刑犯无法喊“冤”、呼“反动口号”，处决消声法便被毛泽东的“**群众**”和“**法官**”们研发了出来。全国“解放”后，这种“消声”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并在全国大行其道，尤以“镇反”、“土改”和“一打三反”为烈。这种无视文明、人权的野蛮“消声处决法”， 迄今风行不殆，中国人也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嘴塞压舌器外加口罩法

据报导：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压舌器”压住舌头，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时，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消异议。

“一打三反”中，笔者在河南许昌市目睹了多起枪杀案。其中，一起是枪毙临颍县人大代表、县一高权威教师**王炳灿**。他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滔天罪行”，是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字，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在数万人参加的市体育场宣判大会上，他扬着头，挺着胸，嘴上勒着口罩；据说嘴里有个“压舌器”。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西北角。

缝合线缝嘴法

毛泽东死后，压舌法在“一打三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1976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在处决为刘少奇鸣不平的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史云峰**时，为防止他喊冤，刑前在他颌下注射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缝合线将嘴紧紧缝住。

竹筒塞嘴、竹签穿舌法

据报导：1970 年 10 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

这种消声法到了 1977 年，已进化到竹签穿舌。江西官员们在处决思想犯**李九莲**时，便使用他们创新的竹签穿舌法。

端下颌车法

陆兰秀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一个忠实的女共产党员，因写了二十多篇批判毛泽

东和文革、呼唤“自由”的文章，1970 年 7 月 4 日，被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批准枪决。就刑前被端下颌车，枪杀于苏州市横山脚下。

割断喉管法

割喉管消声法最具代表性，最为“时尚”。许多人都记得，1975 年 4 月 4 日那一天，共产党员**张志新**在就死前，被残忍地割断了喉管；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张不是第一个被割断喉管者。据披露，仅辽宁省一地，行刑前被割喉管的死囚就达 30 多人。行刑前割喉管是文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中已被广泛采用。例如：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麻绳勒脖法

这是最常见的消声法。《炎黄子孙》披露：江苏省常州市处决的某局长**蔡铁根**，转业前，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大校军衔，红军干部。他“贼”胆包天，竟敢在日记中“为彭德怀鸣不平”，“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他的罪证在抄家时被悉数缴获，旋即被揪斗，被关压，“一打三反”中又被判处死刑。1970 年 3 月 11 日，他被非法关压了三年多后，狱方突然用麻绳将他捆牢、脖颈上套上麻绳，然后向他宣读正式“逮捕令”，随之又对他宣读“死刑，不准上诉”判决书。他刚要申辩，行刑者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很快，枪响，他应声倒在血泊中。

作者铁流在他的《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一文中，记载了四川大学生物理系女学生**冯元春**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杀的故事。冯因批评毛泽东被打成右派，判 15 年徒刑；又因狱中坚持批毛，被加刑五年；加刑后仍不低头“认罪”，1970 年 7 月 1 日，被四川南充市当局处决。行刑时，人们看见：她“**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她喊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同时枪毙的还有另外两个男子，脖子上勒着细麻绳。

“一打三反”中，笔者在河南许昌市目睹的另一起枪杀案，是枪毙奎楼街回民**王华民**。此人爱习武弄拳，经常同几个拳友聚集在一起，拳来脚往，间或酒令助兴。由于酒后真言，他们对文革不满的话随酒吐出，惹了大祸，遂被打成“反革命纠合集团”。王是首犯，判死刑，立即执行，其它拳友被判死缓、徒刑不等。他们“罪大恶极”的证据是，在一次酒会中，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毛主席语录》垫桌腿！王华民就刑时，脖颈上勒了一根细麻绳。也许是他拳脚了得，有反抗嫌疑，细麻绳勒得过紧，在刑车上已窒息而死。被拉下刑车时，他耷拉着脑袋、两脚背拉在地上。刑警们将他连架带拖，抛尸于西汉晁错墓前，然后在他的头上补了两枪！

据观察，过去的细麻绳勒脖消声法，发展到现在，已进化到用**尼龙丝勒脖**。由于细尼龙丝不易被人看见，已被官方广泛采用；自此，爱对中国人权指手划脚的外国人，也无可奈何了。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细麻绳勒脖容易看见，是文革时代野蛮落后的象征，而细尼龙丝勒脖不易察觉，也算是现代中国“文明进步”的体现！

吃请灌醉法

不过，在毛泽东时代，也不乏“**文明**”处决法。据《党史纵横》2008 年第 10 期刊登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秘密处决真相》一文记载：1969 年 11 月，上海公安局根据康生下达的处决令，处决“**一位 79 岁高龄、被关押近 30 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此人曾是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 年 12 月被捕叛变，成了叛徒。由于他知道康生叛变和出卖的太多“机密”，便被康下令秘密处决。处决时，“**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执行枪决**。”

到了二十一世纪，除尼龙丝勒脖消声法外，其它消声刑法包括最“文明”的吃请灌醉法，都悄然遁行于无形无稽之中。保留尼龙丝勒脖消声法是中共的“文明进步”？还是继续用野蛮来对抗文明、用冷酷来践踏人权？

4、相对文明的处决法

在被中共贬为“**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尽管不乏野蛮者，但多数政府都是文明规则的遵循者。

儿时的笔者，在国民党抗日中的“旧社会”里，曾在洛阳县城的西大街上，目睹了枪毙汉奸行刑队行进中的一幕：

前面两个号手吹着号，中间一个人力车上，坐着一个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亡命牌行将枪决的汉奸，两边是二三十名荷枪实弹押送死囚的武装军警，最后面的人力车上，坐着一个“监斩”官员。当拉汉奸的车子来到一家酒馆门口时，车夫突然停了下来，号声也嘎然而息，整个行刑队伍也随之停了下来。原来，汉奸大声嚷着要喝酒。店家闻声，不敢怠慢，急忙端上一碗白酒，送到死囚嘴边，喂他“咕咚、咕咚”喝完。死囚微笑，向店家点头致意。号声复又响起，囚车拉起，继续行进。行刑队刚刚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店家把黑瓷酒碗摔得粉碎！

在“旧”中国，1898 年 9 月 28 日，维新变法思想家**谭嗣同**临刑时，在法场上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对刽子手道：“动手吧！”遂就义于北京菜市口。1927 年 4 月 28 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走上奉系军阀最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台时，三呼“**共产党万岁**”后，英勇就义。1935 年 6 月 18 日，卸任的中共中央一号领袖**瞿秋白**，走向刑场时，“他背手挺立，面带微笑，先照了张相，再自斟自饮，放歌长吟。然后在敌人的刀枪环护下，手夹香烟，顾盼自如，缓步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到刑场后盘膝而坐，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 最令人感动的是发生在二十年代末那出“美丽的悲剧”。共产党人**陈铁军**和**周文涌**，因为在广州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以暴力罪判他俩死刑。在执行死刑前，当局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他们说，本来他俩已经相爱，因为革命工作太忙，未及结婚，因此希望在执行前让他俩举行一个婚礼。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反动”当局满足。在执行前，他们在佛山城中举行了婚礼。他俩当众宣布：“**让反动派的枪声做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枪声响，他俩凛然就义！——看来，无论是腐败的满清政府，还是万恶的国民党政府，都能尊重死刑犯的人格和权利，未曾见过“处决消声”记录。

在国外，19 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哲罗姆**，被绑到火刑架上时，一个老太太冲上前去，捡了一根柴火，说：“烧死他！”哲罗姆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是低声感叹道：“**多么虔诚的愚昧啊**!”1943 年 2 月 22 日下午 4 点，希特勒德国在慕尼黑处决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的**汉斯·舒和**兄妹。当兄妹俩踏上断头台时，汉斯振臂高呼：“**自由万岁**!” 1946 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电刑处决罪犯**威利．弗朗西斯**时，执行死刑的电椅发生故障，电流加大到极量，也没有击毙他。电椅上的弗朗西斯突然大叫道：“快关上电源，让我喘口气！”1953 年 6 月 19 日，美国将出卖原子弹机密给苏联的**罗森堡夫妇**执行电刑处决时，罗森堡夫妇临刑前不屈服，不畏惧，从容坐上电椅，竟使行刑人员对他们产生敬意。在绞决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时，伊拉克新政府规定：允许萨达姆写遗嘱、呼口号、发表演说，行刑人员不得侮辱他的人格。2006 年 12 月 30 日，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在绳子套上他的脖子之前，他大呼：“**真主伟大！**”“**这个国家将赢得胜利！**”“**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看来，在资本主义世界，无论在近代和现代，都能尊重死刑犯的人格和权利，没有“处决消声”的约定。

由此可见，野蛮的“处决消声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产和专利。这是人权的倒退！这是对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亵渎！这是对普世文明的摧残！对此熟视无睹的中国人，不应好好反省吗？

47-“一打三反”血案种种

作者 于松然

1、偷越国境血案

1970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拟定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下达后，北京市紧紧跟上。2 月 21 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各单位下发了一个《通知》，公布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并于 2 月下旬大开杀戒，为全国树立了杀人的榜样。这批 55 名“罪犯”中，除少数例外，都先后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之下。

“民愤极大”的首犯**顾文选**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顾文选是怎样“恶毒攻击”又是怎样“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其详情老百姓无权知道。但从顾文选的简历中，便知他“恶毒攻击”的“严重”程度和手中掌握“我国重要情报”的“机密”高度。

顾文选，男，1934 年生。1949 年，他 15 岁时“参加了革命”，在杭州公安局工作，并且是一名共青团员。1954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5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一场践踏人权的“肃反”运动，迅即在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事业（包括公私合营）的各个角落里展开。在北大“肃反”中，顾文选自以为出身好，历史清白，亲友中没有地、富、反分子，没有海外关系，“肃反”怎么也肃不到他的头上。然而，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写了一篇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抛弃原配的小说，触犯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即“为工农兵服务”的大忌：丑化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就是丑化工农兵，就是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是“人民”的大敌。于是，转瞬间，他变成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成了“肃反”重点对象。运动中，他挨了批斗，遭到了毒打；自以为清白无辜的他，遭毒打时还了手，反被捆绑起来，住了四个月的监狱，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害。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肃反”运动，有 400 多万人被整肃批斗，错整错斗率高达 93％。面对这种无视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法西斯暴政，顾文选异常愤怒。到了 1957 年，他没有认清无产阶级专政蹂躏人权的“合法”性，又堕入毛泽东的“阳谋”圈套中：他向强权挑战，直言控诉“肃反”运动对他的迫害，质问“**公理何在？法制何在？人权何在？**”遂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比顾文选小一岁的笔者，也有一段与顾兄既类似又相异的经历。笔者七岁丧母，父出走后，在安南中国远征军中服役，迄今不知所终，凭亲友接济熬过童年，十二岁便辍学流落街头。14 岁半当兵参加了解放军，历史清白。按理，“肃反”不会肃到我的头上。但因笔者喜书好文，爱发表不同见解，曾被领导批评为“爱耍小聪明”；又因笔者曾不经意说了一句胡风集团成员**路翎**的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被人告发，而从日记中抄出的两首情绪低沉的小诗，也成了罪证。于是，转瞬间，“爱耍小聪明”的笔者，变成了“暗藏的反革命胡风分子”，遂成“肃反”重点，旋遭残酷批斗达半个月之久。又因在批斗中不服，“犟嘴”，曾遭两次毒打，险些被打成胡风分子。20 岁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笔者，被逼着去想“**这是‘新中国’的民主、自由吗**？”。两年后，在 1957 年的“阳谋”中，同顾兄一样，没有认清无产阶级专政蹂躏人权的“合法”性，直言农业合作化走得过快、“肃反”有些过火等，又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分子。独立意识再次被激活，逼着你自问：“**这是为什么？**”除了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者外，中共对任何稍有自由意识者的思想和言行，都是要记录在案的。因此，笔者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旋被清出部队。而档案中那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像被带上了沉重的镣铐一样，压着我跌跌撞撞去了北大荒，踉踉跄跄度过了中年，当我悠悠忽忽熬到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时，刚伸了一下腰，才舒缓了一口气，便步入暮年，走进秋风叶落黄昏雨之中！

不幸的是，顾文选被打成右派后，无处伸冤，便思念起日夜牵挂着他的妈妈。他偷偷地跑回杭州家里，找母亲哭诉。结果呢？不知触犯了毛官家那条刑律，他被抓回北京，以“非法”偷跑罪，判了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不知触犯了毛官家那条刑律，被限制在清河劳改农场“留场就业”，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妈妈身边，人身自由再次受到严重侵犯。所幸的是，笔者被发落到北大荒，一去十二年，当是活罪自受，没人怜悯，无人牵挂，自然也无思母恋情，因而也没有五年牢狱之苦。**更为不幸的是**，被逼得走头无路的顾兄，**一时糊涂**，竟愚蠢地选择北投苏联，想到那里去寻找自由。哪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苏联共产党也不把他当人看，像对待畜生一样，把他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讯。由于榨不出情报来，便把他甩渡给中国。所幸的是，笔者当年常在中苏边境线上走动，抬腿跳过铁丝网便是苏联，但从没有越境念头。尽管有人告密，说我企图越境，曾使官方一度监视过我的行动。因为，当年笔者心底清楚：**同是共产主义，那边的空气不会比这边新鲜**。一念之差，使笔者避开了杀身之祸，而顾兄

则惨遭灭顶之灾！1970 年 3 月 5 日，顾文选同十多名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枪杀，其中，包括人权先驱**遇罗克**。留给人们思索的是：顾文选一介文弱书生，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投毒，更不具有盗窃国家机密的条件，唯一的“错”是被逼“非法越境”，究竟有多“反动”？有多“恶毒”？究竟有多少“罪行”以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民愤”又何在？从而后顾兄被平反来看，这一切都是周大管家麾下编织的不容置辩的强盗谎言！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沈元异常聪明，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他的才华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所赏识，将他调到该所当实习研究员。文革中，黎澍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沈元也成了“历史学界十大学术权威”之一的“罪名”，遭到残酷批斗。由于他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一时糊涂，便买了盒黑色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躲进马里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惧于中共的肆无忌惮，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因而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到枪毙前的一刹那，他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他二十多人都倒在血泊中了，他被押了回去。但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在“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是个幸运儿。他被《通知》指控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反革命分子，自然难免枪毙。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与总理周恩来、公安部部长李震熟识，其母陈布文曾当过周的秘书，而张郎郎又是在延安出生的红色后代。紧张的幕后操作之后，军管会遂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赦了张郎郎一命，“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的“罪行”，也被一笔勾销。正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恩威相易自有其理！

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自然对周恩来感恩戴德。出狱后，他在《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谈到了“关于周恩来的角色”问题。他为周开脱罪责，在文中写道：“**‘一打三反’整个要做这件事，是周恩来写的汇报，建议要搞‘一打三反’。这是个角色的问题，他不写，也有人要写……**”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镇压合理”的谬论之一。他还回避了“一打三反”的法西斯运动，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遗憾的是，到九十年代，竟有人质疑平反：“非法越境”罪不应免除。笔者试问：**合法出境自由在哪里**？中国《宪法》中虽有“迁徙自由”的条文，但平民百姓却无“迁徙自由”的自由！曾记否？在“到处莺歌燕舞”的三年灾难中，数千万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被民兵围堵在家中饿死，连“旧社会”允许他们外出逃荒的自由都被无情地剥夺了，那里还敢奢望合法出境谋生！在毛泽东时代，合法出境是官僚特权阶级的专权，平民百姓岂可与共？“非法越境”是被无产阶级专政逼出来的。请看今日世界：除北朝鲜、古巴等共党极权国家外，有几个国家还在坚持实行“非法出境，以罪重处”的野蛮法规？

2、“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血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自由结社就是反革命。

1966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这篇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然而，就在这个月——1966 年 10 月下旬，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贫农**谢洪水、谢永祺**等数十个农民，成立了拥护刘少奇、打倒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来对抗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福建省龙岩地区，是全国著名的闽西中共老革命根据地之一。据报导：闽西地区有革命基点村 610 个，中共烈士 2.36 万人，占全省烈士数的一半多；1955～1965 年间，授衔的闽西籍将军 68 名，占福建省籍将军总数的 82%，其中，上将 2 名，中将 7 名，少将 59 名。对中共来说，闽西是人杰地灵、一片红彤彤的大地！

但闽西农民并不因“红彤彤”而独享幸福，他同全国各地农民一样，都深受中共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策的祸害。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在中共夺得政权的 1949 年，才十二岁，贫农成份，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可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们，权力情结恶性膨胀，借口走“共同富裕”道路，开始“折腾”起农民来：在合作化中，他们把农民自有的和刚刚分得的土地、生产工具，统统收归集体；到了 1958 年，他们又搞人民公社化，把刚刚收归集体的个人财产全部公有化，变成了中共各级党政部门的财产。农村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体化、公有化，使毛泽东和中共成了亿万农民的唯一雇主。在雇主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雇主的代理人——**官僚特权阶级**，为任意挥霍、平调、瞎指挥和镇压异己敞开了大门，终于酿成了饿死数千万农民的大饥荒。在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高压下，农民们敢怒不敢言，却在背地里骂“娘”：公社化不如合作化，合作化不如土改前。到了 1960 年，当饿殍遍及全国时，适中公社也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为了生计，谢洪水被迫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做苦工；但在毛式户口管控下，他又被当作“盲流”扣押、遣返回乡。回到家里，孩子饿死，妻子出走他乡，已家破人亡。在饿殍遍野面前，中共党内分化，处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右派领导人，良心闪现，开始对“三面红旗”政策进行反思，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人性化的“修正”。他们迫使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退回到以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上来，并将“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等初级市场模式，引入到集体经济中去，从而使被毛泽东“三面红旗”破坏了的农业，有了一线生机，包括谢洪水在内的龙岩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经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政策痛苦折磨的龙岩农民们，对中共“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深恶痛绝，认定他们都是这种罪恶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但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时，他们才有所发现：原来让他们饿死的是毛泽东，给他们一线生机的是刘少奇！爱与恨的本能，使他们对毛泽东产生恶感，反而对刘少奇充满着同情。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以谢洪水为首的青年农民，经过秘密串连，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扛起了反人民公社、反合作化的旗帜，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与魔头毛泽东相抗衡！

读过中学的青年农民谢永祺，1960 年几乎饿死，对成立“幸福会”积极响应，协助谢

洪水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在拟定的名单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丞等，是清一色的右派；没有左派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等等。

1967 年 5 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

起来争自由、争幸福！
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
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刘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和)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立案并“成立侦破工作队”之始，“幸福会”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时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仙游等县，有农民也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在狱中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审讯人问谢永祺，为什么“顽固不化”？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幸福会”不过是中国善良农民们原始而蒙昧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萌动，他们悲剧性的命运，难以避免。

1970 年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以韩先楚上将为首的福建新生革委会，剥夺了《宪法》赋予农民们自由结社的权利，先后判处**谢洪水、谢永祺**等 19 人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徒刑的**谢百添、谢寻兴，**由于在劳改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刑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此外，地区和县级革委会判处 40 人，拘留审查 12 人；公社关押 30 人，宣布戴帽 94 人；生产队以捆绑、吊打、抄家实行**“群众专政”**的 126 人，其中，被逼死 12 人，打伤致死者 8 人，致残者 28 人，有的一家 4 兄弟两死两残；有些当事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相继自杀身亡。

贫下中农为生存而组织起来的“幸福会”，终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星火燎原之势不可阻挡：毛泽东死后不久，全国农民起来把人民公社、合作化扫进了垃圾堆，谢洪水、谢永祺等人权先烈**“取消阶级，取消集体”**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根据“**先杀后抚**”的惯例，文革后的1981年，该血案被中共平反；但冤案的制造者韩先楚，并没有因而问责，1983年反高升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血案（略）

4、“中国共产主义联盟”血案（略）

5、言论自由罪种种

⑴、批评“伟大领袖毛主席”罪

在四川芦山县劳改中的反革命分子**胡风**，1970年1月，因在报纸上印有毛主席画像的空白处写诗，被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判处他无期徒刑。

陕西康县农民**易道均**，因在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说了句“**哪里能活一万岁**”的话，被县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70年6月，执行枪决。

湖南土家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卖猪换“红宝书”、“请毛主席像”，说这是“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后，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被判死刑，1970年5月8日执行枪决。

同案犯青年女社员**李启顺**，是丁祖晓的好友。她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声援丁，被判死刑，也遭枪杀。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不妥当、不全面**”。1970年3月22日，以“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罪，枪杀于兰州。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32108钻井队的青年工人**刘延德**，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打问号，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五年徒刑。

1970年8月，被枪杀在宁夏银川的青年学生**吴述樟**，“罪大恶极”的罪行是：他竟敢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文字旁边，批写上“**放屁**”两个字。

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197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当年被处决。

1970年8月，河南许昌市枪杀了临颍县人大代表、县一高权威教师**王炳灿**。他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滔天罪行”是，他竟敢在日记里写下了许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字。但“恶毒”文字，当局至今不露。在数万人参加的市体育场宣判大会上，他带

着“口罩”，扬着头，挺着胸，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西北角。

此外，本书还记载了多位因批评毛泽东而被枪杀的烈士，他们是：

书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的**刘文辉**，**批判**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的**林昭**，**反对**毛泽东血统论的**遇罗克**，**厉声**“要毛泽东放下屠刀”的**陆兰秀**，大**呼**“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的**张志新**，**斥责**毛泽东是“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的**王申酉**，**希望**“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当皇帝”的**史云峰**，**不屈**于强权、为民主权利而死的**李九莲**，**抗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意见的**陆洪恩**。

⑵、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罪

在**“群众专政”**的红色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据报导，因替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枪决的人，在两万八千以上。笔者搜集了一些为刘少奇殉葬者。

在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他坚持**“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的观点，于 1970 年 2 月 25 日，死在枪口之下。

在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 1970 年 2 月 21 日被处死。

在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说**“刘少奇打不倒”**。他被勒令检查，但他却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为此，他付出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代价。

在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他拒不改变观点，甚至说**“砍头也只矮五寸**。”结果，他被判死刑，枪杀于 1970 年 4 月 23 日。

在湖南，《新湖南报》原编辑锺叔河回忆：“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

6、“一打三反”典型：邵阳县纪实

根据**陆芒**编著的《老虎坪纪事》一书记载的史实，笔者选、删、改写如下：

湖南邵阳县在 1967 年的**“群众专政”**中，曾在杀人上大显过身手的毛的“群众”，杀人的手又发痒了。1970 年农历正月初八，他们在县里召开的三千干部誓师大会上，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汪某**杀气腾腾地说：**“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

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该抓则抓，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杀！杀！杀！……”，他一口气喊了七个杀字后，高呼道：**“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县革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所谓“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严重的地区”，去领导、督促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县直属机关，集中各系统 2,000 多名干群，分三期在县一中举办所谓“学习班”，开展“一打三反”。县革委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领导“学习班”；选拔 177 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习班”。某部政委在“学习班”培训会上说：**“现在是二百米拼刺刀的时候了，不要心慈手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号召：**“领导者要威风凛凛，指挥者要杀气腾腾，执行者要步步扣紧，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经过毛式**“群众运动”**规则的运筹，果然“战果累累”。据邵阳县公安局粗略统计：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织 98 起,成员 744 人。（最后落实，除一起涉嫌立案外，其余全是假的。）全县农村展开的“一打三反”运动，刚刚一年，也取得了“辉煌战果”。据 1974 年地县联合调查团摸底统计：共打击了 19,721 人，其中，贫下中农等劳动人民 17,016 人，占被审人数的 86.3%；有 15,340 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定性金额 123 万多元；有 6,417 人被关押，抄家 1.6 万户，抄走各项财产无数；有 300 多人被迫害致死，91 人被打成残废，数十个家庭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

该书还记录了几多个人和家庭的悲惨遭遇：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怀疑他是只“大老虎”。毛的“群众”用“车轮战术”轮番“轰炸”,在用各种刑罚狠狠整了他两天两夜之后，他躲在厕所里用剃须刀片，刎颈自杀。死后,被宣布为**“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下花桥医院革委会副主任**李根银**，因看不惯刑讯逼供的做法，对人说：“听说中央来政策了,松了。”一句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批斗三次后，刎颈自杀。

下花桥区发现了一条**“打倒毛泽东”**的“反标”，疑地主出身的完小校长、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酷刑之下，邹说：“口说不信,我自剖心肝,让你们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当众菜刀剖腹,肠胃全部流了出来,急救无效身亡。后经省公安厅鉴定，反标非邹所为。

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运动中疑他有经济问题,关在大队部的“学习班”里。适逢他爱人生女,向治保主任请假去塘渡口购买坐月子食品。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后,疑其借买东西为名去县城里告状，便派人追打成重伤，第二天不治身亡。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有五个月的身孕，“一打三反”中，遭人诬陷,被人强迫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脚盆里,名曰“坐水牢”,活活折磨而死。

河伯公社上阳大队十九生产队贫农**陈勋尧**,曾贩卖过几匹土布,“一打三反”中，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背脊骨被打断,睾丸被捅烂,疼痛难忍,遂上吊自尽。

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贫农**谢习之**，篾匠（用竹子薄片编制用品的手艺人）。1962 年起外出搞副业三年,年年按规定交纳费用,未欠集体分文，却被县革委会工作组打成“资本主义典型”。他们给他算了三笔“剥削”帐：1、三年中先后带徒弟六人,按每年剥削每个学徒 180 元计,共剥削 3240 元,再按 60%退赔，计 1944 元；2、在外给人打晒簟（凉晒农产品的竹席）936 床,每床获暴利 0.5 元,计 468 元；3、在新宁县花 500 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修屋,剩余部分木料,做了四副棺材,出卖两副,得 230 元,重罚 500 元。三项合计 2,916 元,命谢立即

退赔。谢见了罚单后，旋即悬梁自尽。

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刘再兴**，回乡知青，贫农。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一打三反”时被诬为反革命，关入烤烟房折磨 46 天，打得遍身是伤，后吊死在大队部。

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贫农回乡知青**谢龙**，因参加过“横空出世”的造反组织，运动中把他关押到大队，逼他承认该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严刑逼供下，谢不堪忍受，碰壁而死。其**老父**见儿子被整死，悲愤交加，一命呜呼。

县肉食品公司职工**何文亮**，下中农出身，以诊猪诊牛为业。“一打三反”时，被抓到邵阳饭店毒打致死。临死时，他高喊：**“我相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有一天会胜利!”**

红石公社石湾大队贫农社员**邓星飞**，因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中被诬为反革命，先后在公社、大队关了十一天，受尽种种酷刑；后被人用铁棍活活打死，反说他畏罪自杀。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中农**邓星杞**，1958 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先后在本县二中、四中、五中任语文教师，1970 年调县教师训班教语文。因学员们要求去韶山参观的请求没被教育组批准，他们选出九个代表，带着报告去县革委会请示，犯了**“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罪。邓星杞被打成“幕后操纵指挥者”，批斗七天后，悬梁自缢。由于宣布他“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其妻**随之自杀身亡，未满周岁的**小儿**断奶饿死，**祖父母**被活活气死：一家三代冤气冲霄！

长乐公社民办教师**田南堂**，为人心直口快，敢讲真话。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书记弄虚作假，害得群众冒饭呷。”公社书记批评他以下犯上。他说公社书记的屁股没有坐正，还说大队书记为了向上爬，给县委 X 政委送茶油、送鸡婆、送猪肚子、猪腰子、猪舌子等等。公社书记说他恶毒攻击县、社、队三级领导，反动之极，宣布逮捕法办。田在县监狱绝食五天后暴毙。但暴死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据《邵阳县志》记载：在“清队”高潮的 1968 年 7、8、9 三个月中，全县共杀死 295 人，自杀 277 人，毒打致残 204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 4 岁。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又“有 300 多人被迫害致死，91 人被打成残废”。显然，“一打三反”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和发展。邵阳县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因而是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苦难的冰山一角。

48-从“造反有理”到“造反有罪”

作者 于松然

清查“五一六”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的威势，毛泽东和中共为整肃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展开了新的部署：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在防止“扩大化”的幌子下，对三年多紧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夺权等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左派红卫兵、造反派，进行“秋后清算”，大多数组织，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其成员

和支持者，大多数被打成反革命“五一六”分子。——这与反右“阳谋”，异曲同工。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它的前身是1967年5月底成立的“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奇**。6月2日，在中央文革大员**戚本禹**、**林杰**的支持下，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恩来总理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恩来。大字报贴在很多地方。耐人寻味的是，张建奇并非平民出身，而是一个高干子弟：其父是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也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也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他把矛头对准处于一线指挥红卫兵打、砸、抢、烧、杀等造反行动的周恩来，而不像“联动”高干子弟们那样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6月14日，张建奇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等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是时，全国正处于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中。为了配合中央文革反击行动，7月1日，他们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做出了声讨周恩来的决议。决议称：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坚信：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也坚信，反革命两面派必败！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一具僵尸。”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炮打周恩来的决议，正中江青的下怀。在江青看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她发现周有保护“走资派”之嫌，在“四帅五老”大闹怀仁堂时，她见周是个圆滑的两面派。于是，她借毛泽东利用“吴豪事件”整治周恩来的用心，面谕王、关、戚等打手，支持“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其中，打手戚本禹最为卖力。

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在反击“二月逆流”里，“五一六兵团”可以说是乘风破浪，春风得意。8月9日前后，他们将一张张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和西四丁字街等处。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等。他们的“革命行动”，曾一度使“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来，处境困难。

然而，由于上层政治斗争的诡谲与险恶，张建奇、刘令楷等学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当“伟大领袖”突然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改变利用“五一六兵团”敲打周恩来的初衷、因而抛出王、关、戚、发出支持周恩来的信号的时候，他们任人宰割的命运就被安排好了。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之际，在文中加进了一段话，发出了取缔“五一六兵团”的指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

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曾支持这个集团和思潮的中央文革大员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不得不紧紧跟上，纷纷表态揭批“五一六”。“五一六兵团”旋即被取缔，张建奇等头头悉数就捕、获刑。过后不久，**张建奇被判死刑、枪决——**这是批周恩来被杀的第一人。到此，北京市**第一轮**清查“五一六”运动告结，炮打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灰飞烟灭，销声匿迹！

然而，到了1968年，尸体已经腐烂了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突然蹿了出来，大有借尸还魂之势。实则非也。原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里，有个漂亮的被誉为“末代名媛”的**章含之**，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她秉承毛旨向毛写信，状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不抓“五一六”。善于演戏的毛泽东，出于稳定局面、取缔左派造反派的政治需要，接信后，借机把已“打死”了一年多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拉出来鞭尸示众，在“蜜友章”的信上做了批示。据报导，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恩来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并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批示之后，他又多次发出“最高指示”说：“**革命学生要团结，要联合，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又说：“**‘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1969年10月，他警告各地、各单位大员：“**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共总书记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朝共主席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8月，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5月16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4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这个“下次我给你讲”的人是谁？有人判断，此人是即将失宠的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什么是“五一六”呢？善搞模糊哲学的毛泽东提出了两条标准：**“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到此，“五一六”这个炮打周恩来的专用代词，已演变成“破坏和分裂”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普适代词。但不管这个“五一六”定义如何变化，它同“牛鬼蛇神”、“反动路线”等概念一样，都没有法理依据：它是独裁者“一拍脑袋，计上心来”的结果。

毛泽东对“蜜友章”的批示和后来的系列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震动。中共中央也迅速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即将失宠的陈伯达出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第二书记吴德等大员，见批示后大吃一惊，马上调整力量，强化对左派造反派的围歼。于是，由“蜜友章”引发的全国新一轮北京市**第三轮**清查“五一六”运动，迅速而轰轰烈烈地由北京推向全国，变成了打击和终结左派红卫兵、造反派运动。

1970年2月，当陈伯达失宠之时，周恩来的亲信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异军突起，被任命为新的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组长（吴德自称：抓“五一六”办公小组组长），继续领导全国清查“五一六”打击左派造反派运动。二十年后，这位大员在回忆中竟这么说：

“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

在周恩来手下直接领导运动的吴德，用**“恐怕”**、**“好像”**、**“所谓”**、**“玄而又玄”**一类语汇堆砌起来的一段回忆，意在淡化清查中的法西斯暴行，粉饰做为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组长的罪责，掩盖毛、林、周“卸磨杀驴”清算左派造反派的丑行！

在吴德的轻描淡写的回忆中，一场长达数年的充满血腥的“理直气壮”的清查“五一六”运动，**1,000 多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数十万人被打死、自杀、致伤、致残、逼疯，**其中，绝大多数是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军人、干部、工人和普通百姓。

到了 1973 年中共“十大”前后，毛、周角力日益突出，周恩来受到了毛泽东**“搞修正”**、**“不议政”**的严厉批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正在暗地里积极策划中，清理“五一六”运动也因而到了该煞车的时候。于是，在全国大抓“五一六”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摇身一变，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在一封匿名信中批示道：**“‘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毛泽东的“批评”，使周恩来、吴德等大员又大吃一惊，立即指派“消防队”给清查“五一六”运动降温、灭火。吴德回忆道：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

至此，善施“阳谋”的毛泽东，在周恩来全力配合和直接统领下，从 1968 年为支持周恩来而在“蜜友章”信上批示起，到 1973 年计划批判周恩来而在匿名信上批示止，数年间，终于完成了从“造反有理”到“造反有罪”、亦即从**利用**左派造反派到**消灭**左派造反派的过渡，演完了一出远比反右**“阳谋”**剧时间更长、波及面更广、更加血腥的清查“五一六”**“阳谋”**连续剧。对此，吴德回忆道：

“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吃它的苦果”是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主要是左派红卫兵、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平头百姓：那数十万人被打死、自杀、致伤、致残、逼疯的“五一六”分子，除摘掉了“五一六分子”帽子外，迄今没有得到应得的抚恤！

周恩来统领清查“五一六”

不论是清查“五一六”，还是“清队”和“一打三反”，统帅是毛泽东，领军人物不是林彪，也不是江青、陈伯达、康生，而是毛的大管家周恩来。

当“伍豪事件”挂起来后，周恩来遭到了毛、江集团支持的“五一六兵团”等造反派的肆意攻击，迫使他萌生退意。但历史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毛泽东做出了与右派妥协的决定：逮捕江青的得力助手王、关、戚。9 月 7 日，毛泽东又明确发出了取缔“五一六兵团”的指示，并谕示江青及中央文革，全力支持周恩来。

倍受鼓舞的周恩来，打消了退隐的念头，昂首挺胸，统领党、政、军三路人马，开始反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及其思潮的挑战。

1967 年 8 月 31 日，他在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说：**“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你们**（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

1967 年 9 月 18 日，他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讲话时说：**“‘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

尽管他知道“五一六”思潮的推动者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尽管他知道毛泽东替他清除的王、关、戚，不过是“五一六”真实后台江青的替罪羊——几个“变色龙”、几条“小爬虫”而已，但他必须坚定不移地与中央文革的主人江青站在一起。他说：**“‘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在周恩来的直接统领和江青等人的违心支持下，才蹦跳了几个月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全军覆没，被彻底摧毁！

到此，“五一六”问题已经解决。然而，到了 1968 年，“五一六”阴魂突现；但不是“五一六”借尸还魂，而是毛泽东根据他授意的“蜜友章”告密信，要借尸整肃左派造反派。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领导和推动全国清查“五一六”工作。对此，**金春明**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说：“当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显然，这是“主旋律”声音。当时陈伯达是中共五大领袖之一，爵位如日中天，何须自荐？

金春明教授是中共上层精英，他同其他许多御用精英一样，在文革中，竭力为“舆论一律”服务，文革后，又竭力为“主旋律”服务，因而，他们创造了许多可笑的荒诞的历史，清查“五一六”运动焉能例外？

例如，他说陈伯达把持专案组大权后，“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

交代’，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又说：“因为曾经有过‘五一六兵团’，因此，认为‘五一六’是一个广大的组织。(笔者：谁“认为”呢？他们回避的领军人物的大名。)追查登记表、追查组织网首先提上了清查‘五一六’的日程。然而，追呀追呀，越追组织问题越模糊。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于是提出，组织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罪行，要从清罪行入手。(笔者：谁“提出”？他们又回避了领军人物的大名。周恩来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然而，清呀清呀，越清越清不出头绪，于是又重提清组织问题。就这样，清查‘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1970 年 1 月 24 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林彪、江青，亦步亦趋。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由于能独占档案资料，他便轻而易举地把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责任推到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身上。

金春明等一类上层精英们，还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领。当王、关、戚倒台后，他们说王、关、戚是“五一六”的后台；当杨、余、傅被撤后，他们便把“五一六”操纵者的帽子扣在三人头上；陈伯达被批后，他们没有放过他；林彪摔死后，他们又把“五一六”后台或操纵者的帽子扣在林和他的“五虎上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头上；只有到毛泽东死后，他们才敢把“五一六”后台的帽子扣到江青的头上。为了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在邓小平“**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的命令下，他们不仅放过开始支持“五一六”后来又打倒“五一六”的统帅毛泽东，更刻意放过秉承整肃造反派的旨令在清查“五一六”中造成大规模人权灾难的领军人物周恩来总理，也放过了直接在周领导下的专案联合小组组长吴德。

因此，那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在金春明等一类御用精英们的著书立说中，几乎看不到它的踪影！

1969 年 9 月 20 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布署清查“五一六”时说：

“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1970 年 1 月 24 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

“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

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

在他直接统领下，文化教育系统清查“五一六”运动全面展开，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五六十个“五一六”分子。

1970 年 11 月，实际上已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向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发出指示说：

“中央 3 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

在他直接统领下，清查“五一六”运动全面铺开。在北京，吴德回忆说：“（北京市）**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在湖北，1971 年清查高潮中，仅仅一个武汉钢铁公司，把历史有些小污点的造反派，例如,曾在三年灾害时期做过小生意犯过所谓“投机倒把”等“罪”的，一次就枪毙了 13 人；另外还有 18 个待处决的“坏头头”，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在江苏，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李香芝**，因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精神失常”后，“疯话”毛泽东曾污辱过她，被判死刑，1971 年 9 月 2 日执行枪决。

外交部的清查工作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在全部 4,000（另说 3,000？）多工作人员中，仅“五一六”分子就抓出 1,700 多名，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个别司甚至更多。何方是早早被批斗“靠边站”的外交部官员。他回忆说，周恩来在外交部打击“五一六”分子有报复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疯、打伤的不计其数，造反派就这样全被打下去了。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做出了保卫中共官僚特权体制、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定。1972 年 10 月，《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发表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进一步强化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诚然，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也说了许多注意政策即“施恩”的话，诸如“**不要逼供信**”，“**千万不要扩大化**”，“**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群众是受蒙蔽的**”，等等。但由于运动本身是反人权、反文明、反法治的法西斯暴行，而“扩大化”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因此，“注意政策”的说教，不过是控制运动平衡的一块砝码而已。

权力可以打扮历史，但只能打扮于一时；金春明等一类御用精英们，遵照“主旋律”的规定，力图用真假搀和的办法去篡改历史，漂白周恩来等人，历史能答应吗？

与封建帝王将相一样，周恩来也善于玩弄“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人治权术，但玩得不如毛泽东泼赖。杨小凯教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中说：“不幸的是，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周恩来受毛泽东之命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结果又造成了严重的人权问题。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竟然再一次打人权牌——用平反的手法，将周恩来置于极为危险和被动的地位。”尽管这段文字有为周恩来抱不平之嫌，却反映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主人与打手之间合乎政体的默契：打手应具有善当、甘当主人替罪羊的“革命情操”！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清查“五一六”，作为毛泽东助手的周恩来，其凶悍的强人形象已裸露无余：在“横扫”和破“四旧”中，他煽风点火，亲临一线，对“反动权威”、“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实行红色恐怖，指挥红卫兵打、砸、抢、烧、杀，**演足了对独裁者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在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他明喊打倒，暗中保护官僚特权阶级，**做尽了令党政军要员们感恩戴德的人情，**也埋下了被谪为“投降派”的祸根；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他毫不犹豫地捍卫中共官僚特权体制，用血腥手段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反抗，**曝透了屠戮异己者的凶残兽性**。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和人权灾难中，都记录着周恩来的殊功；历史也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周恩来是弱势群体屠杀者、中下层人权灾难的主要制造者和中上层官僚特权阶级的主要保护者。例如，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曾不无担忧地说：“总理可不能倒！他一倒，我们都成没娘的孩子了！”因此，他被弱势群体、中下层贫困百姓骂为“**人类的恶魔**”，被中上层权贵、精英和既得利益者戴上“**人民的好总理**”的桂冠，都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许世友清查“五一六”

据报导：江苏省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以“反许乱军”等罪名抓出的“五一六”分子多达 30 万人，被打死、自杀、致残、致伤者无数。（由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又多相重叠，因此，各个运动的伤亡人数也难以一刀切清。）从某些渠道披露出来的有：

南京大学是清查“五一六”突破口，由许世友的副手省革委会副主任、原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大校亲抓，以图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吴不负许望，很快清查出

“五一六”分子 1,560 人，其中有 21 人自杀身亡，成了全省效法的经典。

在省“五七”干校，仇视“五一六”、批臭“五一六”、深挖“五一六”、全歼“五一六”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一片红色恐怖气氛。干校 3,000 多人中，抓出“五一六”分子 1,600 多人。

省革委会 45 常委中，有 25 人打成“五一六”分子；省农业局 64 名“留守人员”，有 39 人打成“五一六”；省科技局被视为“五一六”的黑据点，1,000 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有“五一六”嫌疑分子 400 多人，其中打成“五一六”分子并关押起来 100 多人，自杀 5 人。

南京市 2 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自杀 300 多人；其中，南京市公安局、市中级法院 600 多干警，159 人打成“五一六”，自杀 4 人；女演员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李香芝**，因反对挑选女演员为中央首长陪舞，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整得“精神失常”后，她写了些暗示**毛泽东曾污辱过她“疯话”**，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南京军区内有 298 名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军级以上干部 84 名。

盐城地区公检法机关的 500 余干警中，有 327 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无锡市抓“五一六”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超过五万人，死于“抓‘五一六’学习班”中的 81 人。

毛泽东死后，江苏省被称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之一。

对于这场强加于江苏人民头上的灾难，“主旋律”的学者、作家们同中共保持一致，他们说，这是“**‘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造成的。然而，历史打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造成这场灾难的“‘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激烈反对“四人帮”的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

许世友，1905 年 2 月 28 日出生于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26 年 8 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1927 年 11 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中共红军里的漫长的军事生涯。

许世友凡事敢做而敢当，粗野而狡黠，鲁莽而机敏，武断而恤下，是一位聪明大老粗式的农民英雄。他的一生中，曾两次向毛泽东下跪；而这两次下跪，给他的一生涂上一层浓重的传奇色彩。

第一次向毛泽东下跪在 1937 年的延安。

许世友是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旗下的一名师长，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是张国焘倚重的一员爱将。在延安红军大学里清算张的“分裂罪行”时，红四方面军里许多人，纷纷倒戈，落井下石，许世友却替张国焘辩护。一天，他突然冲到主席台上，大声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打不过敌人，换一个地方再打嘛，怎么能叫逃跑主义呢**？”许的辩护，换来了一片叫骂声：“打倒张国焘的徒子徒孙许世友”、“许世友是大别山的土匪”等等。接着，他陷入了残酷批斗和严刑拷打中；当延安县妇女部长的妻子雷明珍，也被迫与他划清界线，离了婚。许世友气得破口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这句话被定性为“阴谋组织暴动，要抢去张国焘，枪杀毛泽东，还要炸平延安”的罪状。

许世友狂怒到了极顶，他把一腔怒火指向毛泽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天才的毛泽东，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为了说服许世友，毛泽东当面示好：**“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来向你道歉！”**。毫不领情的许世友，怒火胸中烧，跳起来对准毛泽东就是一拳。早有所料的罗瑞卿一声令下，把许世友捆得结结实实。被捆住的许世友对着毛泽东大骂：**“别来那一套。要打要杀老子都不怕，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毛泽东，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要是有枪，非毙了你不可！”**毛泽东本想宽待许世友，想不到却挨了他一拳，气得他悻悻而去。

为了稳住红四军的军心，毛泽东决定重演历史上**刘邦赦蒯通、太宗厚魏征**的故事。当许世友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之际，毛泽东传令召见许世友。许世友以为毛又在耍花招，大喊道：“见他可以；给我一支枪！”许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罗瑞卿把一支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交给了他。（如果你以为压入枪膛的子弹都是未经处理的真子弹，你也忒小觑未来的公安部罗部长了。）许世友握着手枪，大步向毛泽东的办公室走去。但走着走着，则越走越慢。当他走进办公室看见到毛泽东时，突然把手枪扔到地上，“扑通”跪了下去，痛哭流涕道：**“主席，俺错了！”**从此，许世友成了毛泽东的忠臣良将。

三十年后，许世友给毛泽东第二次下跪，那是在 1967 年的上海。

1964 年，毛泽东考验许世友的忠诚，问他：**“如果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许世友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干他个驴操的！不论他是谁！”毛泽东听了大为满意，当面表扬许世友**党性强**；文革前夕，毛泽东对部分党内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抢着表态说：“我就带兵进京‘勤王’。”毛泽东高兴地对亲信们说：**“许世友的屁股始终是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对毛泽东的忠诚经受了严峻考验。从“横扫”到破“四旧”，又到批“资反路线”，他越来越看不惯。他在家里骂道：“什么革命小将，一窝土匪！”进入 1967 年，“伟大领袖”号召“夺权”和“全面内战”，他奉命“支左”，曾得意于一时。但很快在“支左不支派”的明明白白的模糊中，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泥沼中。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成了受压一派的炮轰目标：**“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的呼声越来越高，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密副手南京军区副司令、军区海军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被造反派打死在小水井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另一亲密副手南京军区副司令、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被造反派打掉八颗门牙，在死亡的路上，被他武装抢救了回来；他还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被造反派抄了个底朝天。

他恨透了造反派，但对支持造反派的“红司令”毛泽东，仍然忠心不贰。他知道，“红司令”曾多次发出“保许世友”、“不准揪许世友”的“最高指示”；但粗中有细的许世友，看出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玄机：“红司令”说要保萧华，萧华被打倒了，家也被抄了；“红司令”请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到北京谈话，结果被双双关起来了；“红司令”说支持北京军区，结果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和军区司令员杨勇先后失去自由……他得出结论：他保不如自保；绝不能落入造反派之手，否则，死不了也要脱层皮。于是，他称病躲进了大别山军事重地医院。

南京的左派造反派(主要是“好派”)，很快从中央文革那里得到了情报，组织数百人，奔赴大别山捉拿许世友。许世友早有准备：他对军区工程兵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他派人到来大别山必经之路的六安市，向那里的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警告造反派，不要冲击军事重地工区和医院，否则，**“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中央文革电话命他参加“群众”大会，许世友大叫道：**“我不去！要命有一条，污辱不答应！”**扬言：**“谁敢污辱我，我就开枪打死他！”**

许世友是个聪明的大老粗——鲁莽中见细巧。他能充分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人们对他生性粗野的看法，**把鲁莽运用得恰到好处**：他的武力不仅吓走了造反派，还使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对他束手无策。在八大军区中，他是唯一敢于以武力对抗造反派、对抗中央文革的司令员。按当时的“批资”大方向，把一顶“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是没有任何冤情可谅的；但毛泽东却对他网开一面。

1967 年 8 月 17 日，毛泽东派张春桥把他从大别山请到上海。第二天上午，他见到毛泽东后，便倒头下跪，磕了个大响头，“痛心”承认他**“犯了错误”**。

许世友一个响头把自己磕上了天安门。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他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毛有意向南京军区和江苏省造反派传达一个信息：许世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不准揪斗，更不准打倒！——南京造反派特别是受中央文革支持的坚决打倒许世友的“好派”，终于发现：他们被出卖了！

1968 年 3 月 23 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被毛泽东任命为革委会主任。上任前的 21 日，他表态道：“中央的批示，中央一系列指示，我们只有坚决照办，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我们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做毛主席的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有人想搞什么鬼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叫他人头落地，就和他干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当许世友集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时，下令：**“今后谁敢造反，格杀勿论！”**显然，鲁莽而机敏的他，从王、关、戚和杨、余、傅事件中已经洞悉：政治气候要大变。到了 1970 年，机会终于等到了：在“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中，他对左派造反派大开杀戒，欣赏到了久违的杀人快感。

“一打三反”伊始，他分批处决了“现行反革命”57 人，其中不乏“好派”造反派。此外，他还处决了组织“马列小组”质疑时政的学生**查金华**，处决了书写“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标语口号的知青**陈卓然**，处决了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的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李香芝**，在常州市，还处决了在日记中“为彭德怀鸣不平”的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大校，等等。特别残忍的是：在“一二一〇”处决中，“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与他年届六旬的母亲**林舜英**，被并排捆绑在同一辆刑车上示众；在刑场，娘儿俩并肩跪在一起被枪杀！1980 年复查时。上述案件全部被确定为冤杀，无一例外，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认定：“**‘五一六’组织遍布全江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和欺骗性，十分危险**。”因此，他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号召全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地打一场全歼“五一六”分子的人民战争。

在清查“五一六”高潮中，许世友带着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的由左、右两派造反派代表参加的市革委会议上，许世友登上主席台，恶狠狠地说：“**深挖‘五一六’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当初去抄我的家，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抄许世友家的是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报复心态，宣泄无余！“反许乱军”的“好派”成了清查重点。在他的得力副手吴大胜亲自督战下，“好派”第一把手、江苏省革委会常委**文风来**，被清查成疯子！

1973 年波谲云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开始把周恩来当成心腹大患。他批评周恩来“**不议政**”、“**不议军**”，批评抓“五一六”扩大化，还严厉批评了“**右倾回潮**”，他重新起用被打倒了的邓小平，欲其取周而代之。到了 1974 年，批林批孔暗批周恩来的运动正式拉开帷幕。11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在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丁盛、彭冲、吴大胜、杨广立、许家屯等人的谈话时，叶剑英对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出现的所谓“扩大化”即法西斯化，提出了批评。他说：

江苏深挖“五一六”的严重错误，说罪行也不为过，许世友当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一把手。像收拾江渭清、陈光、包厚昌、杜方平这样的高级干部，没有他的点头，吴大胜、蒋科等人没有这个胆量。但主持江苏省委日常工作的吴大胜和蒋科等人也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他们是实际操作者，是打手，是他们在仗势欺人，指鹿为马，是他们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在无中生有，加油添醋，所以中央对吴大胜的批评特别严厉。

叶剑英在批评中，有意淡化许世友的法西斯罪责。

有人说，许世友是领导全国抓“五一六”运动总指挥周恩来的替罪羊，笔者不敢苟同；但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49-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

作者 于松然

当发自中南海的狂飙席卷全国时，中华大地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那些曾不可一世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大员们，顷刻间,都失去了革命的活力，乖乖地低下高贵的头颅，接受毛泽东的任意宰割。没有人敢公开质疑，甚至反对，至多在背地里骂骂“娘”，或像叶剑英元帅那样拍拍桌子，抑或如“三老四帅”那样闹闹怀仁堂，而受“迫害”最“严重”的刘少奇，也只不过说了句“**好**

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废话。如果一部文革史只依他们的荣辱为纲，整个文革史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杂烩。

然而，在人类的浩劫前面，敢于揭穿独裁者的谎言、野蛮和邪恶的人，不是身居庙堂高高在上的大官们，而是身居蓬荜身份卑微的小人物。这些可敬、可爱的小人物，因敢于直捣皇帝新衣而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当年，他们对文革清醒的理论思辩和高超的洞察力，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无畏的道德勇气，也是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能说得上完整，才能让人们看得见普世价值的光辉，才能使人们触及到真、善、美闪闪发光的华夏文明！

他们是**民主先躯**，他们是**自由战士。**历史应该铭记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刘文辉、陆洪恩、林昭、遇罗克、陆兰秀、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马思聪、王容芬……**

刘文辉：被枪杀的《十六条》批评者

——文革中敢于同毛泽东和中共对着干的第一人



刘文辉遗像

刘文辉，男，1937 年生，上海人（1）。1957 年反右运动中，在上海沪东造船厂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1962 年，他曾想偷渡国外，发现后，被指控为“蓄谋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罪行”，遂被押回上海“监督改造”。

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在发出了反人类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9 月 28 日深夜，基于对毛泽东和中共祸国殃民罪行的强烈义愤，在弟弟刘文忠门外放哨守护下，刘文辉伏案奋笔疾书四个小时，一气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万言书，严词批驳了《十六条》的反动性。第二天，他同其弟一起将“万言书”复写了 14 份，分别投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 14 所全国最著名的大学。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 1966 年 11 月 26 日被逮捕，1967 年 3 月 23 日，被判处死刑，就义于上海，时年 30 岁。

刘文辉是当代的谭嗣同！他是时代的楷模，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英魂！

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有意为谭嗣同提供保护；但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旋被捕，于 1898 年 9 月 28 日，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刘文辉对其弟刘文忠说：“**全**

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又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气概，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遂就义于上海！

由于档案尘封，笔者无法看到《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万言书和他的一些著作；但人们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罗列出的“罪行”中，可以感触到他那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判决书》中给他罗织的“罪名”有：

1957 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 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

毛泽东的中共，预设的这种反人类的法西斯式“罪名”，早已被历史所唾弃，但在当年的中国大陆，却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人们还可以从他的遗书和胞弟刘文忠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书中，看到刘文辉热爱生活、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反抗暴政的宁死不屈的英雄侠气。

在清理英雄的遗物中,亲人们发现了他藏着的《刘文辉遗书》。他在《遗书》中写道（**全文**）：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从诬’反、右、坏、修、资’，非资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 55 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 1211，在沪监牢号 167（761 号）。我的手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

“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有朝一日将它发表。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说’专栏，其内容针对毛反动方面公布天下，切希望有人接任。

“今天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老实，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

“但我确信我的上诉只能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我将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的战争政策，毛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 **辉** 写于 1967 年 3 月 20 日”（以上系网络版，笔者未做校勘）

从《遗书》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文辉曾逐条对《十六条》进行了批驳。例如，《十六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遗书》对之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十六条》规定“‘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遗书》则提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十六条》规定“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遗书》则宣称“**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十六条》规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遗书》则要求“**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十六条》规定全国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遗书》则号召“**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等等。显然，刘文辉是文革中敢于同毛泽东同中共对着干的第一人。可叹的是，在全民昏蒙中，他被迫孤军奋战，终致“**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

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是其三哥的同案犯。1966 年 10 月，他利用国庆节休假期间，去杭州替三哥文辉向北大、清华、复旦等 14 所高等院校投递批驳《十六条》的匿名万言书。案发后，被逮捕入狱。1979 年 3 月，这个自小患小儿麻痹症致左脚伤残的残疾人，前后遭监禁、劳改、管制近十五年之后，被上海高院宣布无罪平反。2004 年，他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人生路》，在澳门出版。人们可以从刘文忠的笔下，看到刘文辉短暂一生的坎坷和伟大。现将该书中描述刘文辉部分，摘抄于后，以飨读者。

『记得是一个多月前，9 月 28 日深夜，辉哥把他深思熟虑后书写的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抄写成十四份，装成十四只信封，交给我。这是向全国最著名的十四所大学发出的匿名呼吁书。他要我到杭州去悄悄投寄。辉哥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狂澜奔腾，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十六条是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和控制，是残害知识分子和国家忠良，我一定要大声疾呼地揭露它！遏止它！”辉哥又说：“这件事一旦暴露，是要‘杀头’的，我不怕，你怕不怕？”我恳求辉哥不要干，他风华正茂，才气横溢，何必去撞死在最高当局的枪口上呢？！但是辉哥却两眼炯炯，视死如归，他指着早在桌上放着的两条亲书毛笔题词说：“范仲淹说得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亨利·柏德列也说：‘**不自由，毋宁死**’。”我沉默了，答应他去投寄。因为我自小对聪明睿智的辉哥佩服万分，始终认为他所作所为总是对的。10 月 1 日，国庆 17 周年，我独自一早乘火车到了杭州，下车后即找邮筒投寄匿名信。接着乘公共汽车到秀丽的西子湖边，沿着湖滨大道，一路寻邮筒投寄。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投完匿名信，登上南高峰的灵隐寺，但见寺庙荒废，游客寂无，正在叹伤文革“破四旧”带来灾难时，一摸背包中还剩下一封匿名信未投寄。情急之中，向坐在寺门口的一位戴纠察袖章的女同志打听哪里有邮筒，她扬手指点说，转弯靠办公室墙上挂着就是。我毫不考虑地跛着左脚去投掷了。这时，我松了口气，辉哥交办的任务完成了，赶忙返回车站，搭乘夜车回上海。过了一个月，我借了同学的红卫兵证件，又穿上二哥留在家中的旧军装，离开上海，出外大串联去了。怎能料到，串联个把月回到上海家中，当天夜里就被公安逮住，是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暴露了问题，引起东窗事发呢？老审讯员说得对，我还年轻，今年才刚 20 虚龄。古人说：“二十而冠”，二十岁要戴上成年人的帽子，可是我二十岁，却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投入监牢。』

『辉哥回到家中，我们才知道他又出事的经过情况。由于嵊泗位于舟山群岛之中，特殊

的沿海地理位置，使辉哥能长年收听到海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当时大陆全封闭，最高当局推行愚民、压制、混淆视听的阶级斗争政策，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情况。而辉哥了解和看清世界与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差距情况。他长时期博览群书很有抱负。他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独裁、暴虐”；他尊重科学、教育、艺术，厌恶对人民推行愚民封锁政策。他勇于奋斗，要改变强加给他的右派困境，所以一直想出国去看看，寻找新的生活和世界。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一直在攻读英语，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书籍，他在崤泗常独自一人出海游泳，以增强体魄，几年锻炼下来他能在海上游出万米以外。船厂许多人佩服他的才学和人品。他结识了少数几位志同道合的船厂工人、船员、船老大和来实习的大学生。他们曾合谋偷偷潜上渔船或客轮驰出公海寻求政治避难。后来此计划在 64 年“四清”运动中被胆怯者出卖而落空。出事后辉哥一人把主要责任承担下来。』

『八年多的“右派”灾难与“现反”帽子，不仅没有压垮辉哥，反而使他磨练得一副铮铮铁骨，在人间炼狱中炼出来一双火眼金睛。他系统大量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特别熟谙毛泽东选集，他又广涉力能所获的有关西方大哲学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经典名著，他从黑格尔、费尔巴哈、杜威、安吉尔、厄德诺、艺达基、马德瑞、华盛顿、林肯等人的著作、传记中追索、比较研究、深思熟虑。他深入地阅读、研究了胡适的不少著作，通读了鲁迅全集，以及胡风和他弟子们的许多作品。他还将中国古代孔孟先贤思想同西方先哲睿智言行作比较研究。为了更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制度，便于作东西方比较，他刻苦自学大学英语，与一些在交大、外语学院当老师的中学老同学交流、探索、辩论，朋友们都敬佩他超人的敏锐洞察力，那种摆脱禁锢的犀利智慧。自从戴上“现反”帽子被遣返上海老家后，除了白天受监督劳动，几乎天天夜晚读书思考不断。“文革”全面开始后，尽管屡遭非人的批斗、抄家、残酷惨虐，他思想车轮却依然在奔驰不息。』

『白天，辉哥照样在里弄与老父亲一起扫垃圾、掏阴沟，即使一连几个通宵，他忙于去大学院校串联，没有合过眼，双眼熬得通红，但还是卖力地接受监督劳动，甚至时时叫老父亲少做点，让他全力来负担，专政队看到他滚得一身肮脏、卖力干活的样子，以为他真的在认罪改造了，其实谁都不知道，辉哥他恰恰在对着“文革”的腥风血雨冲锋陷阵，他早已把个人的安危、自身的劳累、命运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说，也想写一篇巨型的大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他还说，现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鲁米修斯那样，在这“文革”黑暗年代里点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华大地，使人民觉醒，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让亿万民众团结起来挽倒狂澜，遏制倒行逆施的毛泽东祸国害民路线。辉哥告诉我，他已经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他心中还在策划，想着手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驳”专栏，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抄写贴到大学校园中去……。』

『敢作敢为、不屈不挠、誓死抗争的性格，使辉哥心里燃起更猛烈的斗争怒火。到了 9 月 28 日深夜，也许他已深思熟虑了，犹如黄继光孤身扑上敌人的机枪碉堡洞口那般，断然地摊开了中共中央“十六条”公报，叫我去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窃偷看，突然撞进家来坏了大事。他伏案奋笔疾书了 4 个小时，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第二天夜里，辉哥要我与他一起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我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向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着祸

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辉哥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辉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辉哥计划决定，要我趁国庆节休假，赶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 14 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 14 封匿名信。』

『我有点犹豫为难，对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忍受"，辉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而担忧地说，"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我："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母亲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说毕，辉哥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光，凛凛无畏、誓言无声，好似听到他的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声。在他铜像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我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临危授命，欣然答应去杭州投寄。』

『我还记得辉哥在《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触目惊心的话语："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之过，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辉哥用鲜血惨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醒世愤言，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如在黑夜中升跃起一颗亮耀的晨星。辉哥拼死独挽"文革"狂澜，毫不自顾命运走向何方。』（以上系网络版，笔者未做校勘）

反独裁先烈刘文辉，永垂千古！

本文附 1：

刘文辉的家庭原本是革命世家：两个舅父，一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一个牺牲于"一二八"上海吴淞闸北保卫战。父亲刘宗汉早年同情、参与和资助过同盟会活动。抗战时，刘宗汉为救济难民，主动向美国救济总会申请大米，办了南市粥厂，坚持半年之久，救活了无数流入上海的难民。他坚守民族气节，拒絕为汪伪政权服务。抗战胜利后，他受邀参加联合国善后总署工作，为了给中共"解放区"运送物资，经董必武提议，刘宗汉获以总署专员身份，三次押送物资到秦皇岛，交中共方面的伍修权接收。1949 年，他坚拒赴台，也不同意谢绝别人让大儿子去台的提议，并支持二儿子刘文兵参加共军。

1949 年后，由于刘文兵的参军、入党、入朝作战受伤、立功受奖，刘家也成了"光荣之家"。可是风光不过二三年，过河拆桥的共产党，通过镇反、三反、肃反来反复清算刘宗汉，把他内定为"历史反革命"，迫其辞职。1958 年又公开宣布其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就地监督劳动改造。从此，刘宗汉成了人人可以骂、可以打、可以践踏的罪人。不惟如此，

他的“罪行”还株连了他儿女。长子刘文德被批斗，开除公职，遣送农村改造，三子刘文辉被杀，小儿子刘文忠被关、管。由是，刘家从革命家庭跌进了反革命世家的深渊！

50-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自由圣女林昭殉国

作者 于松然



林昭遗像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林昭

一、罪恶的三枪

1968 年 4 月 29 下午三时许，两辆军用吉普车奔驰到上海郊区龙华飞机场第三跑道上，嘎然停下。车上迅速跳下几个持枪的彪悍军人，然后从车里拖下一女子。那女子瘦弱娇小，双手反缚，长发凌乱，两眼圆睁，口塞异物，血迹斑斑。女子站立不稳，军人将她拖到道中，脚踹腿窝，迫使女子跪倒地上，然后一枪将女子撂倒；见女子在挣扎，军人又补了两枪。毙毕，军人将女尸抬入车内，飞驰而去。

处决的是在**为自由**不断抗争中被中共不断加刑最后判处死刑的北京大学才女**林昭**！

这是一次秘密处决。也许苍天有眼，这一非法处决，却意外地被林昭母亲好友的儿子祥祥看到了。那天，在机场里勤工俭学打杂工的中学生祥祥，目睹了大姐姐林昭被枪杀的全过

程。

第二天，在林昭家发生了一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共“特色”的一幕：

1968 年 4 月 30 日下午(另一说是 5 月 1 日)，上海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二楼上的林昭家门前，有人大声呼叫林昭母亲的名字：“许宪民！”林昭胞妹彭令范闻声开门，只见是一个穿警服的警员说：“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 4 月 29 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当听到胞姐被杀时，彭令范如雷贯顶，但她不得不强忍悲痛按要求拿了五分硬币打发了那个警员。当追问“尸体何处”时，警员闭口不答，转身扬长而去。林母许宪民听说女儿被处决后，晕厥在地板上。

中共向被枪杀者的亲属追索子弹费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震慑老百姓的赤文化，也是“史无前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创造发明：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其家属应该交纳五分钱的“**人民的子弹费**”。清廷为什么会被推翻？盖因在砍谭嗣同头颅后，不懂得向谭的亲属追索“**朝廷的磨刀费**”。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盖因在处决原中共党魁瞿秋白后，不懂得向瞿的遗孀杨子华追索“**政府的子弹费**”。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统治者低能得可怜：他们竟然不知道向“火刑”处决犯的家属征收“**教廷的柴火费**”。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统治者也是低能儿：他们竟然不知道向“电椅”处决犯的家属征收“**纳税人的电费**”！

据报导：林昭在处决前，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召开的犯人大会上，当众犯公审。

1968 年 4 月上旬，监狱医疗室的“病房”墙上，毛泽东画像的两只眼，突然变成猩红色，鲜血欲滴，非常可怕。这在当时是个特大的政治事件，狱方迅即成立专案小组进行审查。不等调查，林昭以女丈夫的气魄，明确告知狱方：毛泽东是个杀人魔王，两眼滴血是她**着意之作**。于是，不到二十天，中共专政机器便完成了立案重审、加刑改判死刑并经“最高”核准的所有程序。

林昭完全知道这么做的严重后果！在改造与反改造、管教与反管教、制服与反制服中，被判二十年徒刑的她，在狱中被狱警百般折磨，特别那个作恶多端的女狱警，像个凶神恶煞似的，对她极尽蹂躏之能事。在恶毒狱卒的折磨下，意志顽强而体质弱不禁风的林昭，体重下降到不足 70 磅，三十多岁头发已斑白，而肺病又使她不断咯血，精力已濒临枯竭边缘，使她深感生不如死了。她渴望个人和民族的自由，渴望结束个人的不幸和民族的苦难，渴望远离这个黑暗而恐怖的魔窟——上海提篮桥监狱；但她已清醒地看到，在这座黑暗的红色监狱里，人们做人的渴望，人们对现代文明的追求，都被大独裁者毛泽东无情地扼杀了。她躺在“病床”上，每当看到毛泽东画像时，她的愤怒难以抑制：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狰狞魔鬼，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个毫无诚信功于撒谎的痞棍，怎么能会那样庄重、慈祥？这是对中国人的欺蒙和奸污！一位同情她的狱医看见骨瘦如柴的她还在血书抗争时，曾劝她道：“又何苦呢？”她坚定地回答：“宁为玉碎！”不久，被折磨得精神近于失控的她，作出了常人无法理解也不敢为之的决定：血涂魔王双眼，还他狰狞原貌。

躺在“病床”上的林昭，接到判决书后，强打精神，挣扎着坐了起来，从容地用发卡刺破手臂，蘸血在预料之中的判决书上批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68 年 4 月 29 日上午，三四个军人直冲进“病房”，大声嚷道：“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说着便将极度虚弱的林昭拖下床来。当林昭要说什么时，一个橡皮塞子被强行塞入她的嘴中，一根细麻绳勒住了她的喉颈，封锁了她的声音，然后，把她架上公审台，拉向刑场……据《小奢摩馆脞录》记载：辛亥革命诗人秋瑾临刑前，**“乃与县官约三事：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得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官许以后二事，秋氏谢之。”** 在清朝末年的残酷的环境里，封建官僚山阴县县令**李钟岳**，虽不敢保全诗人的性命，也不敢允许她与外界通信，但却敢于应允其他两条人性要求。两代官僚——1907 年清朝的封建王朝官员和 1968 年中共的社会主义官员，前者笃仁重义，后者嗜血好虐，两者人类品格的鲜明对照，是中华文明大倒退的见证！

1980 年 8 月 22 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 435 号判决书”宣布三枪为罪恶：**“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亲朋好友闻之为之动容，哀叹不绝！北京大学为林昭召开追悼会，其条幅**上联曰：？**（一个问号） **下联曰：！**（一个惊叹号）此处无声胜有声，与会者悲愤极矣！

二、“洗脑”中的崇拜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 年 12 月 16 日生，籍苏州。林父彭国彦，1922 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后留学英国。1928 年 9 月，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镪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1955 年肃反时，被订为“历史反革命”。林母许宪民，是一位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社会名媛。在内战年月里，她曾冒风险拿出 200 元美金给中共购买电台，打通了中共地下党和苏北的联系；她还以“国大”代表身份，搜集了许多情报给中共，为中共战胜国民党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她被委以苏州市政协委员。林舅许 xx 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之一，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死于“四一二事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生而自由的林昭，在这个家庭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从小爱读《红楼梦》、《水浒》和《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稍长，博览李白、杜甫、鲁迅、巴金、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罗曼罗兰等中外名人的著作；她还爱听《二泉映月》等民乐，喜赏贝多芬等人的西洋乐章。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优秀文学、音乐作品的陶冶，**自由之神——自由主义**促使她形成刚毅、果敢、善良、独立思考和不屈于恶势力的优良品格，但也注定了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悲惨命运。

1949 年 10 月，中共夺取政权后的中国，曾呈现过一派新气象。经过三年恢复性的建设，遭抗日、内战近二十年破坏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国民党溃败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人民生活趋于安定，质量有所提高；取缔娼、赌、毒等陋习，使人拍手称快；治理官场腐败，使人举手叫好；提倡婚姻自由，受到青年人的欢迎，等等，许多百姓曾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里的清新空气。但不久，随着“镇反”和“土改”的腥风血雨，随着“思想改造”、“批胡风”、“肃反”等强权谎言说教，随着思想、文字狱的兴起，清新的空气越来越混浊。毛泽东和中共的官员们，正在强硬地、蛮横地、有计划地用“舆论一律”即用一种声音反复贯耳、一种图像反复养眼的洗脑术，对中国人们进行政治洗脑：**以专权洗掉自由和民主，以仇恨荡除仁爱和宽容，以谎言、虐政涤去真、善、美，以阶级斗争淘尽传统精髓和普世价值，用暴力强化洗脑效果**。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特别缺乏历史知识和经验的青年一代，包括林昭和笔者在内，在“舆论一律”的充满谎言的宣传、教育中，

许多人都被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蜕变成毛泽东和中共的真诚拥护者。那一代青年人，包括林昭和笔者在内，对腥风血雨熟视无睹，甚至认为理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一代青年人，许多人都曾经是毛泽东和中共专制、独裁政体的建设者，许多人都曾经是传统和普世价值的破坏者，**笔者是其中之一**。

在部队里的“忆苦思甜”教育中，缺乏独立自由意识的笔者，曾痛诉过“旧社会”的苦难，赞颂过“新社会”的甜蜜。在一次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上，笔者也曾跟着起哄，高呼“杀”，而不论判处死刑的合法性。1953 年 3 月 5 日下午 3 时，在追悼约•维•斯大林的大会上，未满十八岁的笔者，曾为大独裁、大暴君、大刽子手，流下了串串真实的泪珠……与笔者同属一代的林姐，尽管她具有高智商、高学历、诗人的气质和情感，尽管她有很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也难以得挡住“舆论一律”的诱惑而免遭洗脑。

在国民党的溃败中寻求未来的林昭，倔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使她很快接受了中共的“洗脑”教育，成了一个响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她曾称为官清廉耿直、洁身自好的父亲为“反动官僚”，并以此为耻；她曾拒绝父母让她到资本主义英国留学的建议，执意考取了被誉为中共“革命摇篮”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她还曾无情地揭发过母亲的“反动”；她笃信基督，但又曾赞同过政府限制基督徒的自由。1951 年，她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敢说，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做不到，让我们在见面时总结总结，检查检查，争取在一九五一年入党。好同志，请你伸出应战的手来！”“你对我的评语我诚恳接受。事实上，上次和你挑战的那些话，确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毛病说的。……我为什么要如此发愁、情绪不定呢？这样岂不是让我离开党更远一些吗？决不，我只有更积极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努力，党不会看不见的，你同意我这样说不？”“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它却在北京和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他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我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我的誓言。”**她在给胞妹彭令范的信中说：**“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1952 年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她曾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左倾思想使她对中共土改的血腥视而不见。工作团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灭掉地主的威风。她曾写信给同学说：**“土改，谁都知道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她甚至准备写一本《中国土改史》，欲替中共张目。1954 年，她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北大，她的才智曾在那里自由挥洒。她先任校刊的副刊《未名湖》、《北大诗刊》的编辑，后任《红楼》的编委，并在那里发表了许多歌颂中共和社会主义的诗篇。

她的顽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不仅使她坚定不移地与父母亲划清界线，她还敢于同党的化身——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抗横。例如，在土改队，她反对土改队队长的歪风邪气。她说：**“就看不惯你们苏北的干部到了苏南来，就把过去的老婆丢掉了，作陈世美。”**说话锋利不饶人的她，很快遭到了打击报复，受到了批判，本想在土改中争取入党的愿望，也泡了汤。但挫折并没有改变她对“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毛泽东的崇敬。

三、自由与专制的碰撞

1957 年的春天。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中共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

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开门整风”，像一阵暖意融融的春风，吹向全国，吹进了知识界，也吹进了北京大学。

对此，身临其境的林昭，在 5 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顽强的自由主义意识使她选择了社会主义。她当时也许不知道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自由主义说到底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自由，但更尊重他人自由；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它强调官员的领导作用，推行限制他人自由的服从机制，说到底是独裁主义。**如今，中共要“开门整风”了，她又下意识地选择了自由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人们也可能知道，中共和毛泽东也讲民主和自由，但未必知道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他们把民主和自由关在铁笼中：民主可以在笼中纵情驰骋，自由可以在笼中任意翱翔；但如果你不小心撞及笼子铁壁，就要付出头破血流乃至粉身碎骨的代价！**

在北大，5 月 19 日，是个不寻常令人难忘的日子。那天中午，北大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在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质问校团委会关于我校出席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下午，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搞一个“民主墙”；晚上，一首“撞及笼子铁壁”的长诗《**是时候了**》贴到了墙上。

长诗的作者说：**“今天，我们要鸣起心里的歌，化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诗中写道：

是时候了，
年轻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急雨般地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害怕太阳的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大字报诗引起了轰动，赞成者和反对者鲜明对峙。这张大字报是林昭的同学、《红楼》编委中的同事**张元勋**和**沈泽宜**所写。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里，一首诗怎么能引起赞成与反对者旗帜鲜明的对峙呢？原来，5 月 15 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在这篇文章中，毛说：**“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

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毛泽东将此计管叫做**“引蛇出洞”**。校内的中共党员们，很快接到了“引蛇出洞”的指示，用大字报围攻起《**是时候了**》来。

此时，已获“引蛇出洞”之计的林昭，并没有发表什么“恶攻”言论，但已有了“我有受骗的感觉”，发表了“良心与组织性”的演讲，开始了**自由与专制的碰撞**。

6 月 8 日，毛泽东替《人民日报》写出了《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向全党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号令。在北大，《是时候了》的作者遭到了日以继夜的围攻和冰雹般的狂轰。

在猛烈的围剿下，沈泽宜举手投降了，写了《我向人民请罪》的认罪书，而张元勋还在“负隅顽抗”。

一个夏日晚上，当张元勋正遭到围剿时，与张元勋关系并不密切、当时又无什么“右派”言论的林昭，在良心的驱使下，毫不危惧地向专制撞击。她突然跳到桌子上，质问围攻者：

“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谁？斗争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的党员！”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黑暗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威慑性的吼叫。

“你是谁？”林昭反问道，**“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比肩不弯腰之林；昭，刀在口上气不喘之日之昭！”**

“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黑暗中有人大声嚷道。显然，此君已学会了“引蛇出洞”之术。

“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林昭回答得尖刻、锋利，毫不宽恕那些用“阳谋”来威吓她的打手们。由是，她被打成了右派。

一位北大“右派”**陈爱文**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

林昭一位同班“左派”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说：“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软骨病和媚骨病，是存在于中国人群中的两大传染性很强的瘟疫，尤以知识分子为烈。“新中国”成立后，这两大瘟症，被中共冠以“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党”、“紧跟”等权力制造的词汇加以美化，成了“革命”、“进步”的标准，至今已发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令独立者不齿、令奴才们雀跃的痼疾！而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则在官方高压下，被御用精英、打手以及软骨病、媚骨病的患者，

围剿得几无立身之地！

林昭精神的价值在于，在威武面前，不仅敢讲常识，不承认所谓“错”、“罪”，还敢抱打不平——不有软骨和媚骨，唯见不屈的硬骨头！她被打成了右派后，由于“态度恶劣”，被判三年劳动教养。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那里的官员：

“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这是弱智吗？不！这是无度吗？不！这是敢于在万马齐喑里、敢于在痞子、流氓高压下独擎一帜的硬骨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新中国”缺少的不是智慧，缺少的是人的尊严、良心和道义，缺少的是谭嗣同的民族脊梁、**林昭的中华国魂！**

从此，面对毛泽东和中共血淋淋的文字狱，这种孤傲不群殊死奋战的硬骨头精神，使林昭走上了魔难无穷的不归之途！

四、自由在飞翔

反右中，林昭眼看着那些忠心耿耿、敢说敢为的同学，一个个被批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疯子”，是“魔鬼”和“人民的敌人”，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於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然而，残酷的铁的事实就在眼前，就在最亲近的同学、朋友们身上不断发生：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已成敌人；没过几天，她自己也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并判三年劳动教养。她在写给妹妹彭令范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反右把她逼向牛虻：像牛虻不相信他曾爱过的蒙泰里尼主教那样，不再相信她曾深爱过的那个**“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她又像牛虻不相信他曾笃信过的基督那样，不再相信那个她曾为之讴歌过的共产党；她要像牛虻那样，**“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反右逼迫她从长期的洗脑中挣脱出来，使自由之神开始清除因洗脑郁结在她胸中的无知、困惑和迷惘。

中共干部并非都是冷血动物，亦非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良心者、开明者也大有人在。例如，北大新闻系副主任**罗列**先生，由于担心右派才女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游说，成功地将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北大新闻资料室合并到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后，林昭来到了人大，在那里又受到资料室负责人王前的“多方关照”。**王前**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前妻也。文革中，红卫兵揭发说：“刘贼见王光美姿色后，便借故抛弃了被他玩弄过的妻子王前。”与王前惜别时，她赋诗一首：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在“监督改造”的1958到1960年的三年里，从“除四害”的荒唐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群魔乱舞中，又使林昭从“牛虻”演进成海鸥和普罗米修斯：在“监督改造”中，她完成了《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日》两首长诗的创作。遗憾的是，由于档案尘封，信息围堵，笔者至今没读到这两首诗的片断文字。但显而易见的是：她要像海鸥那样，在乌云和大海之间，迎着惊涛骇浪高傲地、自由地飞翔；她还要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取”太阳神阿波罗的“天火”，把长夜难明的“新中国”照亮。

在“监督改造”中，她曾与右派同学**甘粹**产生了爱情。当他们申请结婚时，党总支书记冷冷地说：“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一棒将他俩打开：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数千里外的新疆农二师劳改营，在那里度过了地狱般的22年。林昭一生唯一的一次婚恋，以流氓无产者的否决而失败、告终。

1960年春，咯血加重的林昭，被人大校长吴玉章恩准回家疗养。在上海养病期，普罗米修斯精神使她又闯了大祸。她接待了因读了“海鸥之歌”而慕名从天水农村而来的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三人一拍即合。张、顾回兰州后，在他们筹办的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上，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并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了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1960年10月，第一期杂志还没送出，参与《星火》杂志出版的30多人，遭到捕杀。其中，顾雁在上海被捕，判刑17年，张春元逃脱，几年后被捕，1964年春遭枪决，其未婚妻**谭蝉雪**（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判刑十四年。是时，林昭也在苏州被捕，囚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当警察逮捕她并抄家时，为政清廉、不擅逢迎的父亲**彭国彦**，在喃喃地说了句**“我们家完了”**之后，便自杀身亡。

五、血书录自由

为了诱捕张春元，1962年春，林昭被以“保外就医”之名，释放回家。期间，她先后书写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章，曾请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文章带到海外发表。未果。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收监。在狱中改造反改造、管教反管教和制服反制服中，不知屈服的她，受到狱卒们的残酷虐待，使她数次以绝食、自杀来诉诸抗议。为了直言不讳地表达政治见解和反映案情，她先后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和《人民日报》写信，慷慨陈词，但都无回音。在狱中，她还书写了《**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告人类**》等数十万言。由于无视管教，抵制改造，反抗暴力，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5年6月1日，接到判决书后，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在判决书上写下《判决后的申明》：

“昨天，你们，所谓的伪法院，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接着，她蘸血书诗一首：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

上海提篮桥监狱狱方，为林昭加判死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关押期间（林昭）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其恶毒的污蔑。”**

善于对华夏、普世文明说“不”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监狱中的文明也说“不”：囚犯除书写认罪书外，其他一律不准，违者以抗拒改造论处。林昭无视管教，抗拒改造，剥夺她的写作权，禁止她使用笔、墨、纸的写作工具，便是“顺理成章”的狱规。在中共说“不”的情况下，**不屈的林昭，被迫用发卡刺破皮肤，用鲜血在白色的被单上、衣衫上写下了二十余万言的血书，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人权记录**。

忆当年：1936 年 11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移送苏州吴县前横街看守所内关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其中邹韬奋，是原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骅的老父。在苏州关押的 243 天中，邹韬奋以“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中共对邹的赞语)，充分利用现代文明赋于他的权利，充分利用笔、墨、纸、砚，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针砭时弊指斥国民党专权腐败的《经历》、《展望》、《萍踪亿语》、《读书偶译》等四部书，达百万余言。迫于正义呼声，国民党政府于次年七月，释放了“七君子”：邹韬奋挟着狱中著作，昂首阔步，走出监狱。正是：

国共主义不苟同，奈何文明两重天！

六、自由血书在呐喊

1、 是非篇

林昭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

被剥夺了使用笔墨权利的林昭，在狱中蘸血写道：“每当想起那惨烈的 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当“正气……几乎被摧残殆尽”后，接踵而来是万马齐喑，促成了“三面红旗”的横行霸道。如果说中共把文革界定为“浩劫”，那么，反右后“三面红旗”的肆虐，就是万恶不赦的“洗劫”！毛泽东和中共首领们，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将农民个人和集体财产洗劫一空**，在使他们变成任意支配、挥霍人民财富的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的同时，也使 3,000～4,500 万个农奴饿毙在乡里、家中！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直接恶果，是中共无法抹掉的滔天大罪！

林昭在狱中蘸血写道：“我们不过是好心提意见罢了，不过想帮助执政党改掉缺点，促进社会更快的进步。其实，按社会分工，那主要不该是我们学生的事，学生没有直接的、功利的目的，只是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那就是民主与科学。”

——国共两党的争斗，实质上是“马列先生”与“德赛先生”的争斗。结果“马列先生”击败了“德赛先生”，使领袖崇拜、个人独裁主宰了中国，从而使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民主与科学，林昭等先知们“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的理想，也随之化为泡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狱中，林昭把 1957 年称为“**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一眼洞穿了那个“**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毛泽东的暴虐。在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中，她这样写道：“**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林昭比笔者至少早觉悟八年！当笔者也“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时，已在文革中；而当“暴政奴才”的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为了苟且偷生，养育家小，笔者不得不对**无知**言听计从，对**权力**躬身哈腰，苟延残喘到老，实一软骨重症患者耳！来日丧亡九泉，也无颜面对林姐！

林昭蘸血写道：“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由于忽视历史教育，曾发过的历史事件却在顽强地重演！九年后的文革中，年轻的大、中学生们，他们的无知被毛泽东利用，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为毛泽东的夺权冲锋陷阵。但愚蠢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无法看到：兔死狗烹的命运，正在前面等待他们。

文革后，基于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压力，中共对反右运动做出了“善意”回应。当年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不愿全盘否定反右运动，别出心裁地搞了个所谓“改正”。除罗隆基、林希玲等少数几个高级右派分子外，他们把其余 55 万多个右派分子，一笔“改正”成“人民内部矛盾”，即不赔偿，也不道歉，家破人亡者活该！邓小平的伪善表露无余。

2、抗争篇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林昭说：“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两幅标语都清晰地挂在每个人的眼里：一幅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幅是**“顽固不化，死路一条！”**这是中共数十年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赤文化之精髓。过来人都翻熟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赤文化词典，熟知这些词组的真正涵义。所谓“坦白”者，认“错”、认“罪”、检举、出卖他人者也；所谓“抗拒”、“顽固”者，不认“错”、不认“罪”、不检举、又敢于自我辩护者也；所谓“死路一条”者，要对其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者也。监狱是毛泽东和中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那些狱警狱卒们，其中不少人都是低能的打手，是暴虐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他们都肩负者中共管教、改造囚犯的重任。

先后坐狱七年的林昭，既不认罪，又不低头。他蘸血写道：“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

不认罪、不低头意味着什么？一个臃肿恰似母猪的女狱警这样对她说：“一个黄毛丫头，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你！”她一语道破了赤文化的秘诀：“管教改造”就是“制服”。根据“抗拒从严”的赤文化，女狱警便对林昭施之以反铐，不服，施之以双反铐！

面对残酷的肉刑，被剥夺了使用笔墨权利的林昭，蘸血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

面对残酷的肉刑，体弱多病的弱女子林昭，不仅不低头、不屈服，反而更加顽强。她蘸血写道：

“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会是一颗反抗的种子！”

在毛泽东的监狱里，充满了腥风血雨。1966 年 5 月 6 日，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偕同林母**许觉民**，到狱中探望她。在陪同十多名男女狱警虎视眈眈地监视下，他们完成了诀别式的探望。据当事人张元勋回忆：

“……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狱警）**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

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笔者**：中共的这种“赤色文化传统”，一直被继承到二十一世纪。君不见：2003 年 3 月 17 日晚，刚被广州达奇服装公司录用的大学生**孙志刚**，一人在广州街头散步时，忘记了随身携带“暂住证”，被公安民警“抓获”，第二天被“犯人”打死在收容站里！)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狱警）**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狱警：‘**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

探视后，新一轮蹂躏又落在不屈的林昭头上。她蘸血写道：“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醒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的林昭，毅然蘸血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自由圣女林昭，以其“**宁为玉碎**”的硬骨头精神，在地狱里搏斗到最后三枪！

3、人性篇

林昭说：“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林昭在黑暗中奋力挣扎，挣脱了马列先生缔造的社会主义枷锁，在基督上帝那里找到了归宿。

她蘸血在狱中墙壁上写道："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的，在生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加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了！上帝呀，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也不愿意疯呀！"

她没有疯。她的理智使她从上帝那里找到权利之源。她蘸血写道："那么天赋人权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谁也不比谁多！"

独立自由的人格，使她不屈于做统治者手中的一只棋子。她蘸血写道："(我)做一个人，不做一张牌！"她警告自己："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作为基督徒，上帝仆人，她把对人的爱施于自己，也施于他人，甚至施于折磨过她的人。她蘸血写道：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呐！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在这里，林昭把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和基督精神融合在一起，深深根植于心底！

4、闪光篇

林昭说："要有普罗米修斯窃火的勇气和献身的决心。"

在狱中，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痛斥中共用偶像崇拜压制自由。她写道：**"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认为毛泽东反右是时代悲剧；砸碎偶像崇拜的镣铐，就要借助普罗米修斯精神。她蘸血写道："我绝不悔恨被打成右派，时代的悲剧，只能证明我们的使命之所在：新的青春代的事业将比五四时代更加伟大；我们的道路也将比五四前贤的更加艰辛。千百年来人类的理想，百十年来先烈们的梦，要在中国的泥土上化为现实，**就要有普罗米修斯窃火的勇气和**

献身的决心……”

也许有人认为，她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是常识；但在患软骨、媚骨重症的中国，这种“常识”就是伟大的“常识”，正如今日中国，为重建道德，就要恢复“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的传统价值和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这些都是无须论证的伟大“常识”！

林昭说：高尚的目的，要用高尚的手段去实现！

她对毛泽东的“阳谋”深恶痛绝。她蘸血宣言道：“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显然，她的宣言是力图把完全脱离了伦理道德来独立研究权术的政治，重新拖回到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

她的宣言是真诚的。但一切专制和独裁者都是这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目的，强奸道德！**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写道：“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君主论》虽被哲学家**罗素**斥之为“**恶棍的手册**”，它的作者马基雅维里，虽被西方称为“**魔鬼的搭档**”“**罪恶的导师**”，但却成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大恶人的必读之书，成了杀人君王斯大林、毛泽东的枕上秘籍。经过反右的血腥“洗礼”，她已看穿了毛泽东“**政治无道德**”的野兽规则。

她的宣言是高尚的。但高尚的政治只能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政治家去成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成就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成就了毛泽东和中共的绝对权威，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谎言、阴谋、狡诈、贪欲、屠戮等集腐败之大成，便成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因此，在那里，很难产生真正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和领袖。相反，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任何政治家都在众目睽睽监督之下，产生相对清廉、道德相对高尚的政治家，就有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尽管还不能完全杜绝腐败。

由此可见，林昭对政治目的和手段的宣言，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净化，归根结底，是对自由渴求和民主的企盼！

林昭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狱中，她对自由的理解，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她蘸血论道：“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这也同样不得自由。”

历史已经证明，林昭的自由观是正确的。当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阶级敌人打倒并加以奴役之后，毛泽东便达到了惩一儆百的目的：除

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外，全国人民都处于自我保全的不自由状态：不敢多说一句毛不愿听的话，不敢多做一件党不乐意的事。作为奴役者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有自由吗？看看刘少奇、林彪的下场，便知他们的“自由”既可怜又可悲。毛泽东自由了吗？远的不说，仅在“解放”后，差不多每年他都要发动一次大规模清除异己者的政治运动。显然，位居九五之尊的他，始终处于“高处不胜寒”之中，常常被暗算、被推翻的惊恐所困扰！

林昭说：不能用暴力去建设自由

她蘸血写道：“……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自由之神在她的思想库里，已升华于更高的层次中。

在多年的洗脑中，“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帝王——毛泽东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了中国人的顽疾。但她则蘸血写道：“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 她又蘸血写道：“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她所说的“如此悲惨的教训”是指什么？人们不会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共产党是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腐败之名取得胜利的，但它建立起的“新社会”，却比国民党的“旧社会”更专制、更独裁、更腐败、更血腥！而这种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使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变成了新的奴隶主**！

这是历史教训！对此，他蘸血写道：“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反对以暴易暴，反对以暴力建立新的奴隶制度，形如反对中共以暴力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体制。但在这里，她已超越了“以暴易暴”市侩的低级层次，跨进了民主建国的崇高理想。

民主建国在文明世界已不乏先例，但在中国大陆，仍属可望不可及的理想。领导人民抗击殖民者的总司令华盛顿，胜利后谢绝了当国王的动议，主动交出了军权，过上平民生活，没有“**打天下，坐天下**”；以选票当上两届总统后，他又毫不恋栈地交出权力，为美利坚民主建国树立了榜样。为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美国总统林肯受到了南方奴隶主的严重挑战，不得已发动了旨在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林肯及其追随者，在四年内战胜利后，没有像中共那样以解放者自居，也没有像中共那样发动诸如暴力“镇反”、暴力“土改”、暴力“民主改革”等大规模运动，镇压异己，清算叛徒，而是把权力交还给了选民，由他们以和平方式去进行解放黑奴的未竟事业。美国的民主建国宗旨同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和“**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观念形如冰炭，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林昭的不能用暴力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是“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张扬。而今中国，当“德赛先生”还在重压下呻吟的时候，**林昭的这种思想，就是一株普罗米修斯盗取来的必将照亮中国的圣火！**

王民怒在《林昭：被扼杀的思想先驱》一文中写道：

“林昭，一个民族难得的思想先驱，不但对迷茫的社会现实具有超常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更具有不畏权势，不怕牢狱监禁、甚至对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普罗米修斯情怀。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真理，她永不低下高贵的头颅，绝不向权势者屈服。她宣称‘**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在与审讯者的对决中，她更是气宇轩昂的藐视那些思想侏儒：‘**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在那样黑白颠到，是非不分，人人自危的年代，没有对自身理念高度信奉，没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没有对一切伪装圣人的蔑视和气概，一个弱女子是断然难以做到这些的。面对这样一个思想和行动都顶天立地的真理捍卫者，我们有多少七尺男儿当自愧弗如？我们有多少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改革家，革命家不汗颜？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怎么就没有西方那么多的思想巨人？那么多的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清醒者？林昭不就是一个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代表吗？可惜，在中国这样一片古老而又血腥的土地上，这样的代表人物除了被残酷的扼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剩下的只能是不得已苟活的芸芸众生。**回首数千年，我们尚且还有那么几个屈指可数的民族脊梁，思想前驱，比如屈原，比如龚自珍，比如鲁迅，柏杨等，但是 1949 年以后，这样的血脉被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革命利剑腰斩，再也看不到曾经的一脉相承的思想火种能够绵绵不断的延续到今天，除了万马齐喑，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暴政虽可以枪杀林昭的肉体，但**他们无法消灭林昭的思想和精神！**

林昭，伟大的圣女！永远的圣女！

51-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反血统论的殉道者遇罗克

作者 于松然



人权先驱：遇罗克遗像

一、血溅京都

1970 年 3 月 5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拥挤了 10 万人。在万众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海洋里，在一片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中，随着“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词的结束，一位年方 27 岁的青年被拉下刑车，推向刑场。他昂首阔步，仰视苍天，默默地向祖国、向同胞、向亲人告别。罪恶的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他曾深深热爱着的土地。他，就是讨伐“血统论”的檄文《出身论》的作者——人权先驱**遇罗克**！

想当年，在 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的“**红八月**”里，毛泽东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等一系列“最高指示”后，林彪、周恩来、谢富治等人紧紧跟上，到处煽风点火。林彪对贵族红卫兵的批、斗、打、抄、杀的“五敢”精神，大加赞扬，煽动他们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不甘落后，他煽动红卫兵说：“**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紧跟毛、林、周、江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秉承旨意，向公安系统发表了著名的“**杀人无罪**”讲话。他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谢的讲话，把毛泽东“群众专政”的“天机”，表述得鲜血淋漓！

在毛、林、周、江、谢等中共左派大员们的公开煽动和刘、邓等右派大员们的暗中支持下，以高干子弟为首的贵族红卫兵们，痞性、流氓性和法西斯性大发作，他们高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呼唤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和“**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的“血统论”的口号，向“反动学术权威”、向“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向党内“走资派”、向一切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等所谓的“牛鬼蛇神”造反，制造了文化大革命第一轮大屠杀：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底的 40 天里，他们在北京打死所谓的“牛鬼蛇神”5,000 多人；上海、天津、广州、成都、西安等地的红卫兵，相继效法北京杀人，少则杀数十，多则屠上千；在他们的策动下，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大兴县的基层干部党员们，在 13 个公社 48 个大队里，先后劈杀了“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杀绝了 22 户。总之，在毛泽东发出“**要动动**”的“红八月”里，全国至少有十万人惨遭屠戮！

在“红八月”大屠杀前夕的 8 月 12 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弟**刘京**(后在九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长)、**谭立夫**(后在九十年代曾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已更名**谭斌**)合写了《从对联谈起》的文章。8 月 20 日，谭力夫又发表了措词蛮横的《谭力夫讲话》。他俩叫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对联：“**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他俩在文章里叫骂道：“**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谭又在数万人的大会上，破口大骂：“**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在中共各级党政军权力的支持下，他们的文章、讲话，被印刷成数百万份传单、册子，传遍全国各个角落，为大屠杀推波助澜，成了大屠杀的帮凶，而贵族红卫兵谭力夫，也成了全国闻名的被高干子弟们引以为荣的捍卫“血统论”的骁将！

当“血统论”甚嚣尘上、大屠杀的腥风血雨电闪雷鸣之时，时年 22 岁的学徒工、人权卫士遇罗克，拍案而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奋笔疾书，终成**《出身论》**，对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血统论”，大加鞭挞。

《出身论》定稿于 1966 年 9 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那是每月仅 18 元薪水的学徒工遇罗克，省吃俭用，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钢板、蜡纸刻印而成的。在其弟遇罗文和朋友的帮忙下，把传单张贴到北京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上。

1966 年年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今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了署名为‘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读过之后，产生共鸣，遂与遇罗克兄弟相识、结盟。三人商量后，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主动向四中借了 500 元钱，并联系到解放军 1201 印刷厂印刷。1967 年 1 月 18 日，三万多字的《出身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全文刊出。《出身论》刊出后，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血统论”的心窝，使众多受害于“血统论”的弱势者，拍手称快。第一期《中学文革报》三万份，竟在几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出身论》专刊六万份，也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当是时，一纸风行，京城纸贵，群众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城镇街巷广为散发。

很快，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街头，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为了迎接“血统论”的挑战，《中学文革报》连续出了六期，连续发表了学徒工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谈鸿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等六篇文章，驳斥了“血统论”的反人性、反人权的封建本质。

《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近万封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群众来信。来信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出身论》，反对封建“血统论”。《中学文革报》及其《出身论》，反中共“血统论”和争取人性、人权的立场，遭到了中央文革的敌视、戕杀。4 月 14 日，中央文革要员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由是，出版不到三个月的《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1968 年 1 月 1 日，遇罗克被捕，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被中共“依法”枪杀。

二、不屈胆识

遇罗克生于 1942 年，北京“解放”时他才六岁，是北京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从小喜欢读书，爱思考问题。小学四年级时，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学究”。1954 年，十二岁的遇罗克，考入了北京市二十五中学。一踏入中学的大门，他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在“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他信心十足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然而，火热而幸福的金色少年年代，很快就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冷漠、歧视和不公！

1957 年反右运动中，他的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的父亲**遇崇基**，在水电部任工程师时，因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对社会不满的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

的曾留学于日本的母亲**王秋琳**，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仅仅因对大右派粮食部部长**章乃器**表示过同情，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后，遇家磨难自此开始，而这个家庭问题，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年轻的长子遇罗克的身上。

1960 年高中毕业的遇罗克，信心十足地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考试成绩优异的他，收到的却是一张未被录取的通知书。他没有气馁，决心再考一次。为了迎接第二次高考，他几乎用全部业余时间，全副精力复习功课，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大学一、二，三年级的有关课程全部学完。但命运再次愚弄他：高考各门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的他，再次落榜了。他不服，询问于北京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家庭出身”**这个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面对不平等，他愤怒极了。无情的现实终使他明白，在毛的“血统论”中国，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得不到公平待遇的。尽管他被挡在大学门外，却挡不住他求知、进取的欲望：他决心踏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为了减轻父母经济负担，1961 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落户当农民；1964 年，他回到城里，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利用工余时间，狠下苦功读书。他很快自修完了大学全部课程，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他还如饥似渴地选读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选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选读了柏拉图、黑格尔、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哲学、美学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等。大量文学、哲学、人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的滋润，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的独立意识和进取精神。

在农场劳动期间，他利用每天的劳动之余，一边读书，一边搞文艺创作。1962 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 1963 年《大众电影》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1964 年他写了《焦裕禄演戏》的梅花大鼓词，由北京曲艺团演出。当时，《北京文艺》有一个编辑从来稿中发现了他的才华，想培养他当“业余作者”，后因发现他的“出身不好”，不仅取消了“培养”的打算，他的作品，也“一篇接一篇被退了回来”。

新的不平等刺激了他的反抗精神。1964 年到 1966 年的中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许多文学、哲学、美学和史学等著作，都受到了批判；许多文学作品，都由“优秀”而“错误”、而“严重错误”、而“毒草”，一路飙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其作者也从“功臣”到“错”、到“罪”，一气贬斥为“阶级敌人”。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他曾对朋友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但他毫不犹豫地迎着风暴、冲着“祭品”而上，本能地卷入到政治动乱的漩涡之中。

1965 年 11 月 10 日，毛泽东利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的“地下”活动，写成一篇题为《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发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信号。遇罗克看了姚文后，对乱扣帽子的霸道文风非常反感。他忿然提笔，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稿子，寄到《红旗》杂志社，批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错误观点。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唯物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寄给《文汇报》，直接挑战姚文元。

寄给《红旗》的稿件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上嘲笑左派文霸时写道：**“报纸上的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1966 年 2 月 13 日，寄给《文汇报》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但

编者别有用心的编排被他看了出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版面安排对我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对此，他毫不畏惧，他为自己“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的精神而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1966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拿北京市委开刀：满城的报纸都用工农兵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声讨北京市委里的“三家村”黑店。遇罗克一眼便看出，这是权力斗争的阴谋。他在 6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一说姚文元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用在姚文元身上了。”**遇罗克对盗用工农兵名义讨伐北京市委，很不以为然，尽管北京市委是他父母的直接迫害者，也是对他不公平的制造者。

上层权力斗争愈演愈烈。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布，特别是《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发表，贵族青年学生行动了起来，年轻无知的学生被煽动了起来。他们打着毛的破“四旧”和“横扫”旗号，在校园内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法西斯红色恐怖事件，残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很快，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贵族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旗帜，要把毛的“血统论”定为国策，为他们的法西斯暴行制造“法律”依据。在他们鼓噪下，无数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遭到批斗、毒打、残害，在农村，无数个“地富反坏右”子女，遭到“连根拔”式的屠杀，其中，遇罗克曾劳动过的大兴县农村，大屠杀尤为残忍。

遇罗克按耐不住了，他拍案而起，毫不犹豫地向毛的“血统论”投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出身论**》！

三、追求平等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和中共，在夺取政权后的二十七年中，在高调批判资产阶级不平等法权时，却构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不平等法权，制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贱民，其中，以“血统论”制造的贱民为最。因此，在 1966 年之夏，出现以“鬼见愁”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思潮是不可避免的。趾高气扬的贵族们，人为地把青年分成“红五类”（革干、军干、工、农、兵）出身的和“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牛）出身的，借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地统治一切！这不能不逼着以遇罗克为代表的最低层“黑七类”贱民们的抗争。

遇罗克的《出身论》代表“黑七类”青年，向毛泽东和中共，提出了与“红五类”青年政治平等的诉求。

遇罗克呼唤正义

“鬼见愁”对联出笼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贵族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显然，他们明确宣布出身于“黑七类”家庭的青年都是阶级敌人。

贵族红卫兵的嚣张，使遇罗克感到了反“血统论”的迫切性。他在《出身论》写道：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面对农村已经开始了的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大屠杀，如大兴、昌平等县的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他愤怒地写道，**“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

在“血统论”有恃无恐的横行霸道下，在全国各地农村，继以北京市大兴县为代表的第一轮大屠杀后，接着在1967年发生了以湖南道县为代表的第三轮大屠杀和1968年以广西省为代表的第四轮大屠杀。三次大屠杀使中国农村数以十万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及其亲属子女，惨遭灭绝人性的屠戮。例如，在道县屠杀中，天生丽质的18岁右派分子女儿**向丽丽**，被党支部书记逼嫁给一个30多岁贫农穷光棍，撂明：**嫁，活；不嫁，杀！**向丽丽选择了不嫁，被锄头劈杀于竹山园子里。

遇罗克驳斥专横

在“血统论”肆虐中，未来的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和自诩“一身正气”的未来的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谭力夫**，在联手推销**“鬼见愁”**对联时写道：**“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

对此，遇罗克反对刘、谭两位未来中共高官的专横。在谈到家庭、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时，《出身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在经过论证并肯定了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后，遇罗克又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论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写道：**“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接着，遇罗克反诘刘京、谭力夫之流写道：**“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毛泽东的哲学经典。但当列宁给辩证唯物主义打上“无产阶级哲学”标签后，毛泽东遂宣布哲学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而，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便成了毛泽东随心所欲的政治工具。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内因”和“外因”的位置可因政治需要而互相转换**。例如，为了说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不可避免时，“外因”变成了“根据”：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合同造成的；当判定刘少奇是“走资派”不足以服人时，“叛徒、内奸、工贼”的本质即“内因”的“根据”，便被制造了出来。年轻的遇罗克，懂得毛泽东理论上的说教，却不懂得毛泽东政治上翻云覆雨的“一分为二”运作，因而不懂“因”论中的“根据”和“条件”，会随政治的变幻而相对位移。因此，《出身论》被中共判为“大毒草”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遇罗克论说“表现”

制造“血统论”的毛泽东和中共，多次公开宣布说，他们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因此，《出身论》以较大篇幅论述**“重在表现”**。

在提出了**“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的论点后，遇罗克论证说：**“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还以马列毛主义的按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的“理论”来反驳“血统论”。他说：**“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进而他认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

应当说，“重在表现”对任一阶级、任一阶层都是公平的，因而是平等的；但出于分而治之的政治需要，毛泽东的中共，特意为“黑七类”的子女们打造了一个**“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歧视政策，蓄意用这种不平等政策来制造贱民，挑动对立。由此可见，用“血统论”来制造“黑七类”的政治贱民，让他在社会最低层里挣扎，就是中共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遇罗克虽然看出了中共把“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以便分而治之”的玄机，但可能因策略上的原因，他没有直接抨击产生这种不平等的根源——蓄意制造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只好用中共的“重在表现”政策来论证平等，致使批判显得软弱无力。

《出身论》说：**“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罗克的反问和否定，是对毛泽东和中共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否定。人们都知道，实现剥削的手段是占有生产资料和雇工，这是常识。

但出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从列宁**“每日每时都生长着资本主义”**的“论述”，到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这种常识性概念，已经从经济学领域混入到政治学、思想学范畴之中；什么**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叛**(徒)、**内**(奸)、**工**(贼)等等，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刑事犯，统统都变成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雇工的剥削阶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剥削阶级”概念的否定。在制造了这些“剥削阶级”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便有了现实根据——这是毛泽东的**谎言构造术**。在这种政治谎言的氛围中，出身于“地、富、资”家庭的子弟，由于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自然难逃“狗崽子”的命运；而“反、坏、右、走、牛、反、叛、内、工”家庭的子弟，因其父辈已变成了不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阶级”，他们同样难逃“狗崽子”的命运。这是中共赤文化——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荒诞文化。

遇罗克剖析“保险”

《出身论》在抨击“黑五类”子女**“不保险”**时写道：**“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他在

列举了一些红卫兵头头的腐败行为后写道：**“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

历史证明了遇罗克的预见。毛泽东担心的“修正主义”和“复辟”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于被他反复迫害了二三十年的**“不保险”**的“黑七类”和他们子弟，恰恰相反，搞“修正”、搞“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于他长期依靠的、文革初期被他打倒后又被他平反了的**“保险”**的**官僚特权阶级**和他们的“红五类”子女。请看历史这样写着：

1976 年 4 月 5 日到天安门前反毛泽东的人，绝大多是中共的基础力量“红五类”子弟；

1978 年“揭书”而起反叛人民公社、合作化复辟分田到户的，是凤阳县小岗村的 18 户农民，他们都是毛泽东依靠的贫下中农，无一例外；

1978 年的“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是受到大多数官僚特权阶级拥戴的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八十年代起步、九十年发迹、二十一世纪初已“修正”和“复辟”成亿万富翁的红色资本家，绝大多数都是“红五类”干部和他们的子女！

……

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毛泽东时代的“保险论”。但作为“血统论”变种的“保险论”，到了邓小平时代，其内容也随中共权力斗争的变化而变化。文革后，中共元老**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保险”）。”**王震**也说，权交给别人他**“不放心”**（不保险）；他们放心的是他们的“红五类”子弟。由是，当年鼓吹“血统论”的骁将刘京、谭力夫之流，便平步青云，弹冠相庆。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保险”是要提防“修正”、“复辟”，那么，邓小平时代的“保险”，则是要保住中共一党专政的权力，尽管邓氏的“修正”和“复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显然，历史这种荒谬式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变化，远比遇罗克的预言深刻、复杂得多。

遇罗克指控迫害

当《北京日报》为“血统论”推波助澜大量刊登“红五类”子弟遭受刘、邓反动路线迫害的文章时，遇罗克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受迫害的是“黑七类”出身的子弟**。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即当时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笔法**，指控了毛泽东和中共十七年来迫害“黑七类”子弟的种种事实。他写道：

“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

“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

“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

“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

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激烈地抨击了文革初期刘、邓右派集团派出的工作队。他写道：**“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在这里，他所说的“修正主义集团”，当指刘、邓右派集团。**“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遇罗克还写道：**“‘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备受压抑的遇罗克，发出了反抗“血统论”的呼喊！

遇罗克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无情地批判了“血统论”。在他看来，十七年来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他认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他在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后指出，“血统论”完全是毛泽东和中共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历史实证了遇罗克的指控：这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使**“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形成了“新中国”雇主奴役下的第一批没有自由和人权的无产阶级贱奴。

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构建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其受害者不仅仅是“黑五类”及其子女！

毛泽东和中共不仅是制造“黑五类”或“黑七类”无产阶级贱奴的行家，而且还是在各阶层中制造无产阶级贱民的里手。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解放”了一大批资本主义贱民，即他们所谓的“工农兵群众”；但他们的一系列巩固一党专政权力的政策，却又在被“解放”了的“工农兵群众”中，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贱民。例如：

他们的户口政策，把城乡分割开来，使出身于农村的农民，变成了等同于贱民的**二等公民**；

政治和福利待遇比城市差得很远的农民，至今还不得不以农民工的身分，在城市里从事繁重的低劣的体力劳动，成了城市里的新兴**贱民**；

他们把工人分裂成国营工、集体工和临时工，甚至把集体工划分成大集体工和小集体工，使大批生产条件恶劣、收入微薄的小集体工和临时工，变成了工人中的贱民；

他们确立了官本体制，把官位分成二十八级，企、事业单位也按行政官阶套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

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把广大“工农兵群众”即老百姓，当成可以任意驱使和镇压的**雇佣**和**奴仆**（以大跃进时代为最），至今官民对立或曰官奴对立，反对官府的群体事件大量发生，就是这种官本体制祸根的裸露；

在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大量贱民中，“黑五类”或“黑七类”及其子女，处于贱民社会

的最低层，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贱奴**。

对此，遇罗克为捍卫“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精神，在《出身论》中呼吁：**“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

也许有人会说，《出身论》是以毛泽东语录立论的，文中还赞扬过专制政体，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等等。这都是事实。但我们应当看到，《出身论》整篇都是用毛泽东**说的**来批判毛泽东**做的**；还应看到，遇罗克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批判，是借批“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之名进行的。这是回避直言的策略。不要忘记，在那个群魔乱舞、万马齐喑的时代，任何直言，都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四、平反

迫于正义的呼声，中共不得不重审遇罗克血案，并做出了平反决定。再审判决书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 1310 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 30 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余音

在“血统论”横行霸道的黑暗中，倍受歧视的遇罗克，勇敢地抨击了由毛泽东和中共制定和推行的“血统论”，成了生活在社会最低层“黑七类”出身青年的代言人。

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出身论》无愧为黑暗王国中一颗耀眼的人权宣言书！

在万马齐喑、群魔乱舞的年代里，遇罗克不愧为捍卫“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先驱！

文革后，中共被迫淡化了“成份”和“出身”，回归了部分人性，遇罗克争人权的《出身论》功不可没！

比遇罗克年长 7 岁的笔者，却无罗克的胆识，真乃愧有余而悔无益也。谨选遇罗克狱中所书诗三首，遥祭人权先驱遇罗克：

其一：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正长。

其二：《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生壮鬼，
乾坤持重我头轻。

其三：

神州火似荼，
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
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
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
时发一短呼。

人权先驱遇罗克血溅《出身论》，**凛然正气，永垂千古！**

52-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王申酉殉道马列主义

作者 于松然



王申酉遗像

一、蛮横的处决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捕，“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粉墨登场。他上台伊始，便学着毛泽东“立威”的行之有效方法，大开杀戒。1977 年 2 月 22 日，他在签发的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中，借转发《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之际，发出了新一轮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一轮大屠杀的号令：**“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在文革最后一轮大屠杀中，有成百上千的持不同政见者，倒在他的枪口之下，其中包括上海的**王申酉**和江西的李九莲。

在上海，逮捕“四人帮”后走马上任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苏振华、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倪志福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彭冲等人，在文革中都是备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倒台后，他们肩负着清除“四人帮”余党的重任，总揽了上海市党、政、军、财全部权力。到 1977 年初，他们根据华国锋主席的命令，大开杀戒。**他们的屠刀首先对准的不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而是对准同他们一样饱受蹂躏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平头百姓**。4 月 7 日，在丁香礼堂的会议室里，苏、倪、彭等人为首的上海市委，讨论了市高级法院上报的 68 个罪犯案件。其中反对文革、批判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王申酉一案，仅讨论了 6 分钟，便批准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由此可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或称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对老百姓从不手软，不论哪个共产党员上台执政、当权。

1977 年 4 月 27 日下午，阴云密布，大雨瓢泼，有一万六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公判大会”，如期在普陀区体育场举行。

王申酉身穿褪色蓝布学生装，浑身湿透，反铐双手，被押进会场。他面目清秀、端庄，目光深沉，神态安详，坦然环视会场，期待着对他的公正的宣判——逮捕“四人帮”，使他看到了出狱的希望。他自信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同情刘少奇等被打倒、被迫害的老干部，他赞扬周恩来、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他自信他对毛泽东的批判，是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会得到新上任的苏、倪、彭等老干部的体谅。由于事前没有接到过任何判决通知，他以为是公审陪绑。但当听到宣布他“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时，全身强烈颤抖起来，炯炯双目喷射出愤怒的光焰。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曾同情过的老干部们，一朝权在手，便不能容忍在文革中同他们一样遭受过迫害的囚犯，**并为处决他创造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比毛泽东的镇反、土改和“一打三反”更为独绝的蛮横——从宣布判决到执行枪决，只“给”他二十几分钟对判决的思辩和对人生的怀念：细麻绳狠狠勒住他的喉颈，不准上诉；囚车径直把他拉到刑场，不许申辩！**随着罪恶的枪声，他卒然倒地，结束了他 31 年短暂而悲壮的一生！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是王申酉冤案调查者。她在《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一文中写道：**“可笑的是，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书面批文，在王申酉被枪决后的第二天才送到普陀区法院，而区法院却在没有见到批复件之前就宣布判决了。”**

二、入团不成反为异己分子

1945 年，王申酉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九口之家，全靠父母每月 90 多元的工资维持生计，过得十分清贫。

1962 年秋天，17 岁的王申酉，以 480 分的高分，考进了重点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跨入华东师范大学，那优美的环境、设备完善的教学楼、实验室和藏书几十万册的图书馆，使稚气未脱的王申酉难掩心中的狂喜：一个贫困工人子弟的他，未来将在这所环境优美的重点大学里度过有意义的五年大学生活。他崇拜爱因斯坦、牛顿、居里夫人、哥白尼等科学家，他在日记中写道：**“像科学家一样用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成果（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的有限的一部份）”**。他立志将来要**“以科学家的身份，将我毕生的精力与才智贡献于全人类，以取得社会对我的信任和报酬。”**

正当王申酉怀着激情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北京先后传来了毛泽东**“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命令。上海华东师大同全国大学一样，奉旨搞起了这样的“革命”：专业课砍掉一半，取消外语考试，大幅度地增加了政治学习和劳动时间。

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其实质是要革掉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这是继 1963 年 5 月开始批判“有鬼无害论”借以棒打没有完全驯服的文艺界人士后，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设计的另一个战略部署。面对这样的“改革”，具有独立意识的王申酉，自然想不通，尽管他还没看出毛“教育革命”的根本目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做对系统的不容间断的科学知识的掌握有什么好处？”“不要读书，不要科学，还搞什么建设？中国如此会被引向繁荣富强吗？”“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学搞得乌烟瘴气，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他还感慨地说：**“这种改革总算来晚了两年，要不然（我）五年的大学等于白念了。”**他沉痛地写道：**“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担心，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民族的衰灭……”**

随着知识累积和观察能力的提高，他日益觉察到高调的政治说教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强烈反差。

当官方传媒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却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当各级领导人都在倡导“三老四严”作风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和谎言妄语；当最高领袖高唱“团结——批评——团结”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持续不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特别是当他知道摧残精英的反右运动和饿殍遍野的大跃进运动那段悲惨的历史后，他的困惑和不满便与日俱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捍格，促使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性，由怀疑而否定。

1957 年反右后，中国进入了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毛泽东把阶级斗争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民的头顶上，谁也不敢对毛泽东随心所欲的这种“改革”、那种“革命”，公开表达不满。善于独立思考的王申酉，不愿意浪费自己思想。于是，他在日记里找到了可以任意挥洒的辽阔大地，无保留地记录下自己对时政的看法。然而，**日记——这个任他思想自由驰骋的狭小空间，却为他埋下了苦难、灭顶的种子，最终成了揣在怀里却被政府遥控着的定时炸弹**！

1965 年秋天，王申酉随学校到崇明岛参加工厂“四清”。当时许多同学都借此机会要求入团，而入团就要经常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表现。**对这种报告个人隐私和特务式的告密做法，他十分厌恶**。政治指导员几次要他向组织交出“真实思想”，都被他拒绝了。由是，他与党组织之间产生了隔阂。不久，党组织知道他喜欢写日记，叫他把日记交出来，让党组织来考察他的思想，又被他拒绝了。结果，团员没当上，却引发了他与党组织之间的信任危机——开始他的人生悲剧。

在“伟大领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的推动下，许多党员干部都能用阶级斗争的目光去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人和事。不久，校党委派人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和中学同学的档案，调查他的“反革命小集团”活动。单纯的王申酉哪里知道，他的日记已被指导员委派的学习班长偷看过了，并把他对“教改”“时政”怀疑和不满的话，都偷偷摘抄了下来；偷看者还在日记中发现了他的“机密”，一些缩写的英文字母，似有“反革命小集团”代号之嫌。这一切材料都被呈送到了校党委书记的案头。于是，开始了对他的专案调查。尽管调查结果证明是子虚乌有，查明缩写英文字母系诸亲友的代号，但信任危机已经加深。党组织发现：王申酉是个对党不满同党离心离德的**异己分子**。

三、独立思考使他滑向“反动”

“人生而自由。”考察一下王申酉的思想发展轨迹，人们会发现，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他，多年的学校政治“洗脑”特别是“教改”中的“洗脑”，并没有洗掉具有先天自由主义本性的独立思考。

在日记的这个隐密而狭小的“广阔天地”里，他展开自由的翅膀：1963 年，他批评“**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1964 年，他批评中共“**思想独裁**”；1965 年，他批评“**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1966 年，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到了文革中的 1967 年，他还批评“**毛在十年前划了三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感到一场暴风骤雨从天而降。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将席卷文教界，也许将涉及更多方面。”**当报纸上大张旗鼓地批判彭真、吴晗、邓拓时，他写道：**“难道彭真、吴晗、邓拓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啊。”“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界不同的道路！”“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啊！”**他预言：**“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

1966 年 6 月 23 日，入团不成反成类反革命异己分子的王申酉，从崇明岛回到华东师大。学校已经停课，师大已经处于一片混乱和狂热中。

他对任意批斗老教授很反感。他写道：**“骂这些老‘不死’的老教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大草包、骗子是没有关系的，甚至骂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杀人魔王、牛鬼蛇神也绝不会有人批评你，相反说明你革命性强。这幕剧难道不可笑又可悲么？”**8 月 4 日，华东师大一百多位教授在校园里被批斗，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吃泥土和毛毛虫。不久，物理系教授**姚启钧**跳楼自杀。面对暴行，王申酉十分苦恼。

8 月 19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总之，这场‘革命’一结束，中国将出现最黑暗的时代。”“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国际国内的人们越来越对他失去信任，少数只看鸡毛蒜皮的鼠目寸光的人也许一时被迷住了心窍，但广大的知识分子的耳目别想遮尽！这场‘革命’被埋葬的时候不远了，现在已在奏出序曲了！”**

1967 年是毛泽东向刘、邓党内右派全面夺权的一年，也是党内右派反夺权最激烈的一年，王申酉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毛泽东的权臣张春桥的行动。他的批左行动，并没有改善他的政治待遇：无论是中共党内左派或右派，都把他列为“反动学生”，尽管他还在替党内右派鸣不平。

随着夺权反夺权的白热化，全国各地的武斗不断升级，形势愈来愈乱。对此，身处逆境的王申酉感到万分的孤独和无聊。他在日记中感叹：**“这样无聊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早些回到科学研究的希望落空了，整整两年大好光阴沦到汤里去了！”“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几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上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一致的。”“这一次，历史开了玩笑，几十万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帮无赖、流氓、小人反而上了台！”**

此时，年仅 21 岁的王申酉，他的自由主义独立思想意识，他对未来的叹息和忧虑，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都已经触及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在中共党人的眼里，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类反革命异己分子，因而，对他采取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就“顺理成章”了。

四、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三不准

人类的思维是自由的、活跃的，任何天才的精于“洗脑”的独裁者，都无法将天下所有人的大脑“格式化”，然后输入他一个人的思想。但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无法“格式化”王申酉的自由思想，但却可以用专政手段，切断他的自由源泉，使他无法继续“放毒”。于是，他们向王申酉下达了“三不准”的命令：

1、不准看外文和科技书

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华东师大几百个学生被点名批斗，成百学生被“隔离审查”，三十多个学生被迫跳楼自杀。王申酉是被“隔离审查”者其中之一。他多年节衣缩食买的几百本书、一些无线电零件和从14岁开始写的日记，当作“反革命罪证”，全被抄走了。“隔离审查”中，他被皮鞭打得满地翻滚，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他在白纸上写了几百个“天地难容”的大字，又成了他反对文革的“罪证”。

1968年初，王申酉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牢房。在一年多的关押中，他以顽强的毅力掌握了俄语、英语，又学会了德语和日语。

1970年，华东师大同全国一样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名女生**吴美娣**看到报纸上“大力提拔革命干部”的社论，情不自禁地在报纸上批上：**“鱼恋鱼，虾恋虾，乌龟恋的是大王八！”**遂被揪出当作“反动学生”进行批判。已经释放回校的王申酉，对吴美娣表示同情，暗中写了个字条支持她：**“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幸被发现。他埋头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的勤奋，被市革委“工宣队”的痞子们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学习外语又被流氓无产者们推定为企图**“里通外国”**；他所有的自然科学和外文书籍被悉数没收，还被勒令：不准再看业务和外语书籍，只准**“学习‘毛选’，好好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王申酉气愤极了。他以马、恩、列、毛和鲁迅的名言立论，写了《**我的自由**》、《**大学八年思想小结**》和《**我头脑里真实想的东西**》三篇自我辩护的文章，交给工宣队。但三篇文章却成了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的“罪”证。由是，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将他的“错误”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同班同学都毕业分配了工作，只有他被赶出“人民”范围，成了唯一留校监督改造的“阶级敌人”。

1970年11月9日，王申酉又被发配到苏北大丰干校劳动。

嗜书好文的王申酉，反对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教。他在日记中写道：**“做学生追求点知识；当工人追求点技术；当教师多追求点传授知识；当学者多追求点学术研究，为什么是罪恶？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当被剥夺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的权利后，他便利用干校图书馆里的马列毛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进行研读，从中探索**“这个社会的本质”**。

2、不准读《资本论》

一个初春的夜晚，同宿舍的人都已入睡。躲在蚊帐中王申酉，正在手电筒微弱的灯光下摘抄《参考消息》上一些国外经济资料时，“监管小组”人员，突然扑到他床头，大声喝问：

“王申酉，你在干什么勾当？”

“把东西交出来！”

王申酉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参考消息》这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被夺走了，枕头内和书架上的书籍、笔记本都被抄走了，连塞在枕头芯中的一叠“摘录”也被抄走。第二天，“罪证”在手的“群众”们，把王申酉被拉到干校的操场上批斗。现场笔录如下：

“你老实交代，偷看《参考消息》和抄录其中材料，有什么反动目的？”

“我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收集些材料，没有反动目的。”王申酉平静地回答。

“毛主席著作和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你为什么不看，要去看《资本论》？”

“规定的我都看完了。”

“你为什么偷偷地学德文？”

“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我学德文是为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著作。”

“那就是说，你对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列著作不相信。你这不是怀疑马列主义在中国遭到了篡改吗？你是妄图否定马列主义！”

“怀疑”就是“否定”，这是痞子、流氓无产者的强盗逻辑，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由于王申酉的“顽固态度”，当天下午，一张揭露他学习马列是个“阴谋”的大字报贴了出来：

“王申酉学习马列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规律和理论。”

显然，审讯者并非工农兵一般等闲之辈，他们根据无产阶级专政逻辑，便可对王西酉做出判决。但他们判决错了。王申酉学马列的目的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正名。因为，他怀疑，毛泽东领导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不是真的社会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社会主义制度是香的’我还没有体会到，难道千千万万人妻离子散，千千万万人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人必须过三十岁的黄金时代再结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份吗？”**因此，他要研读马列原著来探索**“这个社会的本质”**。

被禁止读自然科学和外文书籍的王申酉，来到苏北大丰干校，见干校图书室中有许多马列著作，便一头扎在学马列著作上。

干校的体力劳动是繁重的，生活是单调的。每天早晨，他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在田头背诵德文单词；中午，别人都午睡去了，他不休息，到阅览室看书；晚上，别人去打扑克，玩“工兵掘地雷”，他夹着书和笔记本，钻进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在那里读书、做笔记，与霉烂的土豆与时而跑来跑去的老鼠相伴。他阅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剩余价值学说史》，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列宁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研读了两遍。他攻读的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大约有几千万字，写了 100 多万字笔记，还抄了 27 万字的《世界通史》和厚厚一本《马克思传》。他写钝了十几个钢笔尖，用去十几瓶墨水。他埋头读书忘记

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和寒冷。他回宿舍睡觉时，常常是半夜时分了。

博览群书特别是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界。不幸的是，他正在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来探索“**这个社会的本质**”时，又遇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准读《资本论》**！ 正是：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3、不准恋爱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而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人类的基因通过性爱代代相传。但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横行时代，在批判“血统论”先驱遇罗克被“依法”枪杀的毛泽东时代，为了防止反革命基因遗传到下一代，不准王申酉恋爱、结婚，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之一。

1974 年的王申酉，已经 29 岁了，他迫切希望结婚。在学校劳动改造中，他认识了女工李善美。李同情他，待之如弟，并给他介绍了崇明农场知青谢芳做朋友，两人感情渐深。趾高气扬的学校保卫组，闻讯后，便举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牙棒，对谢芳的父母说，王是监督劳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谢芳的父母十分害怕，强迫女儿与王断绝了关系。此后，王申酉又先后与另外两女恋爱，也被专政狼牙棒打散。

1976 年 2 月，中学时代的女同学为他介绍了一位身材颀长优美、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女工**吴顺娣**。对吴十分满意的王申酉，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恋爱旅程。吴顺娣也有独立见解，两人有共同语言，一拍即合。吴为王的才华所倾倒，王为吴的理解而感动，两人的感情逐步加深，渐入佳境。为了防止再次被棒打鸳鸯，王申酉决定主动去找保卫组一位工人师傅当面谈，反复恳求保卫组和他不要干涉、破坏他们的恋爱和婚姻。谁知此人阶级觉悟特高，他恶狠狠地举起专政狼牙棒，硬要棒打鸳鸯两分离：当天他赶到吴顺娣家和工作单位施加压力，并对王申酉进行人格污辱，从而使吴顺娣在家里和工厂里几无存身之地。王申酉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很严重。他约吴谈了一次话，他希望她不要匆匆作出最后决定；为了稳定姑娘的心，挽救濒于危险边缘的爱情，他向吴表示，将在数日内写一封长信给她，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他们爱情关系的想法。谈话后，王申酉立即赶回学校，集中全部心思写这封长信。9 月 12 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四天，是个星期日，王申酉起了个大早，赶到学校人防休息室，埋头写尚未写完的情书。他以为星期天不会有什么人来。谁知道当他正埋头写的时候，一个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大吼一声说：“**写什么？缴出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情书，一部分塞进口中，一部分送到水槽里，工人便扑上去夺，没有吃掉的，没被水冲走的纸片都被抢夺了去。这工人大喊：“**抓反革命**！”保卫组的人来到，立即把王申酉抓了关起来。他们将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作为“反革命黑文”。当天下午，王申酉被押解到区公安分局关押。

古人作词诵道：“**他一双儿女两情坚，休得棒打鸳鸯作话传。**”中国共产党人“家规”严：棒打鸳鸯寻常见，管他什么“作话传”！

在普陀区拘留所，当晚开始审讯王申酉。审讯中，审讯者对**情书**中的一些不同政见进行了追查。其中有这样一段纪录：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高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在 1976 年？”

答：**“我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中国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1976 年批判邓小平以后，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这在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讲了……”**

他给吴顺娣的情书和给弟弟的信都给公安局当作“罪证”收缴了。在内蒙古做工的弟弟，也被关了起来。

王申酉人生最后一次爱情，终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狼牙棒打散。正是：

仁者以慈悲为怀，邪道以摧残为能。

五、“爱情自供状”

在拘留所，预审员反复要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但王申酉坚持说他只讲真理，讲人所共识的客观事实。“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审讯者是官，不是兵。过来人都知道，那时搞专案的大小官员们，许多人都是“有罪推定论”的痞棍，搞出的“反革命”越多，“罪行”越重，他们的成绩就越大，越能证明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更坚定，对党更忠诚，因而更有机会升迁。于是，逼供信、罗织罪名便畅通无阻。有时为了紧跟全国“形势”，他们甚至可以“先判决，后整理材料”去“及时完成任务”，尽管他们嘴巴上经常挂着“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不搞逼供信”等时髦词汇。一个多月里，他们提审王申酉 20 多次，终于把他的“罪行”逐步升级，推到了死刑边缘！

王申酉的“罪行”材料很快呈报到法院。

为了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批示精神，从 3 月 8 日到 16 日下午，普陀区法院和上海市高级法院的官员们，痞性大发作，加班加点，废寝忘食，联合提审王申酉五次，终于整理出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九项“恶毒攻击罪”。据此，3 月 25 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做出了判处王申酉“死刑，缓期执行”的决定。但为了紧跟形势，在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审批时，他们害怕犯右倾错误，便迅速将“缓期执行”更改为“立即执行”。王申酉的生命，就这样被毫无人性的官员们任意玩弄！

笔者认为，所谓九项“罪名”，其实只有一项，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因为，王申酉“恶毒攻击”其他的“罪名”，所指的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都先后被中共中央否定了的。可见，毛泽东的法官们，同搞专案的官员一样，多

数都是执法犯法的痞棍和流氓无产者！

法院官员们给王申酉制造的九项“恶攻罪”的“罪证”，主要取证于他的为挽救爱情的情书；而作为“罪证”的情书，是在原情书大部被毁的情况下，由王申酉亲笔重写的“爱情自供状”！

对此，1978 年到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的施平，在其《王申酉昭雪记》一文中写道：

“一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王申酉的这封长信是他长期学习马列理论和思索社会问题的思想结晶，所以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给他，他却凭着记忆，仅用 5 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 6 万字。扩充后的信，经与原信核对没有意思的差错，他直接征引大量马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在“爱情自供状”里，王申酉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都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评价和批评。这些“评价和批评”，在毛泽东和当年的官员们看来，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王申酉伟大之处在于**，他敢“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批评毛泽东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的战略思想。他赞扬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为抗战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民族功勋。”他对毛泽东批判百团大战“消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的力量”不以为然。他批评道：“他(毛)没有看到彭德怀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增强实际战斗能力，从长远看并没有、反而会增强党的武装力量。”

他崇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写道：“他青年时发表的不少文章曾激动过我和许多青年的心情。我和不少青年学生积极卷入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在不小程度上是出于对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对掌权后的毛泽东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只是我们曾好久弄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

他指责毛泽东“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他批评人民公社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他说，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看到“130 年后的中国现时状态”，“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

他批评毛泽东的“**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什么都好办了**”的讲话，“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他批评毛泽东制定的《鞍钢宪法》说：“要谈论生产，就要抓住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他为因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政策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他写道：“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

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考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中央政治局，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接着他说庐山会议后，“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经济灾难像一匹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 1962 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缰绳勒住了。”因此，他写道：“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他批评毛泽东不懂经济。他写道：“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像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图及实施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

他赞扬刘少奇说：“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三年经济困难作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概括了客观事实，反映了全国人民呼声。”显然他在批评毛泽东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论。

他批评毛泽东不按价值规律办事。他说：“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因而他赞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制定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工作十几条”使价值规律起作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

他支持毛泽东退居二线后的党中央。他说：“邓小平公开说过，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搞错了。”他赞扬“党中央还在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 1957 年带上的右派帽子。”

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不认为是争权夺利：“这场斗争的性质归根结蒂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观和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

他批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空想社会主义，他批毛“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理想世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他曾指责毛的“五七”蓝图“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

他批评鼓吹“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的林彪是“政治骗子**”**；他说江青是“30 年代上海滩上末等黄色电影演员”。

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写道：“邓小平学识渊博，人们称他为‘百科全书’。个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工作有魄力。总理每次出国访问，全由邓小平任代总理，代管国事，事实上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是党的总书记，统管着全国党的组织、人事，组织能力极强。当老干部们在全国各地代替林彪势力执政后，邓小平来京是有稳固基础的。”

他对周恩来充满了同情：“周总理其人，无论从才能、智慧、人品，还从毅力、精力来说都是举世敬仰的。”

他看出了党内权力斗争的激烈。他批评毛泽东借“评《水浒》”来整周恩来。他写道：“（毛泽东）看出了由于江青事件，形势极为不利，邓小平批判江青，而且把钻进国务院搞破坏活动的张春桥丢在一旁，王洪文、姚文元溜回上海，中央到各地的老干部们逐步围绕团结在总理正确路线的周围，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而自己身边则十分冷落。左思右想，想出用《水浒》作题目，在八、九月间发出了开展评《水浒》的运动。”

对于发生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的清明节天安门流血事件，他评论道：“中国目前是处在解放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历史看来在倒退，但总会前进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流血，那么就做一个历史见证人、旁观者，待有机会时，把我们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记述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使我们的后代在回忆我们的生活时，珍惜他们的生活，并启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吧！”

六、民主社会主义者

八十年代初，王申酉被中共追封为“杰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王申酉走了，走得令人遗憾。他的悲剧再于，他没有死在毛泽东或林彪、“四人帮”的枪口下，却倒毙在他曾赞誉过并对其有所期待的“老干部”们制造的血泊中。有人说，如果他有幸活到 1978 年 12 月 22 日，亦即活到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他的《日记》《爱情自供状》等，很可能使他成为“拨乱反正”的先行者。对此，笔者不能认同。

王申酉生前曾对朋友说过：**“如果允许的话，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日记中还曾宣布过：**“我是自由主义者。我讨厌任何组织的约束**。”可见，他是一个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种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左、中、右派的正统思想亦即“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王申酉和他的《日记》《爱情自供状》，可以做为否定文革的一枚棋子，但不可能成为“拨乱反正”的先行者。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纯正”。

那么，什么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呢？

据笔者观察和考证，这“纯正”压根儿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是任人宰割的各取所需的本本；据说，连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承认他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在现实中，这种“纯正”确实存在——那是御用“经典作家们”制造出来的谎言，是共产党专制主义者真假搀和的产物，是独裁者在马克思著作上插上的一把鲜血淋淋的匕首！

在没有形成独裁之前，马克思主义是丰富多彩，派别林立，众说纷纭，在俄国，就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分野。当政治寡头即独裁者一旦形成，独裁者和御用的“经典作家们”，便以其雄辩的才能进行造神：从本本中各取所需地宰割出许多“理论根据”，在“枪杆子”的掩护下，制造出一个“纯正”亦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光环，给独裁者戴上；异己

派别，则被斥之为机会主义。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就用“枪杆子”镇压异己派别。于是乎，左倾教条主义、右倾修正主义、折中主义等等机会主义，便被炮制了出来；在中国，毛泽东还发明了怪诞不经的“形左实右”主义。但当政治寡头一旦被废黜或驾崩，他的“纯正”光环便随其“盖棺”而退色、而消失；与此同时，其他“机会主义者”乘机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的寡头造神，新的“纯正”光环，又在“枪杆子”运作下应劫而生。因此，各种“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便在共产党国家里反复涌现：列宁主义之后出现了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赫鲁晓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在朝鲜，在金日成的“主题思想”主义之后，便出现了金正日的“先军”主义；在中国，毛泽东主义之后，便“合乎逻辑”地产生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主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主义，等等。这是共产主义世界独特的历史现象。显然，这都是独裁者和御用的“经典作家们”，把一把血淋淋的匕首插在马克思著作上的结果。

王申酉虽被追封为“杰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他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匕首，因而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纯正”。笔者认为，王申酉是个使用大量马克思主义词汇进行论述的自由主义者，或曰**民主社会主义者**。

53-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要毛泽东放下屠刀的陆兰秀殉党

作者 于松然



陆兰秀遗像

陆兰秀（1917～1970），女，江苏吴县人。1937 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40 年加入中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下关惨案”中，她同国民党特务斗争而被毒打致伤；1948 年她同丈夫朱傅钧给第二野战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作出贡献。1949 年后，在燃

料工业部和全国科协任职，后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她因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法西斯暴政，多次著文、上书中共中央，说**“刘少奇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请毛主席党中央放下屠刀，向真理投降”**，遭到了以 27 军 79 师师长**向孝書**为首的苏州市“革委会”的残酷迫害。1970 年 7 月 4 日，被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委会”批准，枪杀于苏州横山脚下。1978 年平反昭雪，1982 年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刽子手**许世友、向孝書**等当权派，依然是革命领导干部。

1966 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年近半百有学者风度的陆兰秀，刚从首都调回苏州，就迎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这场革命开始本不会触及她的皮肉；但她的思想与刘、邓右派主张息息相通，反对“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打倒一切”的暴行。她的倔犟性格使她偏离了刘少奇“驯服工具”的说教，认为对错误的东西不应该拥护，而应该抵制。因此，每逢参加会议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时，她都拒不响应。于是，她很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被打成“铁杆保皇派”。1968 年 3 月 23 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一成立，5 月 3 日，她便被以“叛徒”罪名收押审查。

在审查中，陆兰秀拒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拒不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夺权”是革命行动。于是，她成了苏州市文化界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经过多次的批斗，没有能使陆兰秀屈服：她只跟着举手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拒不举手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在一次批斗会上，市革委属下专案组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们，想出了一个整治她的“锦囊妙计”：把“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合并在一起喊。陆兰秀中计了，她低着头不呼喊也不举手。于是，当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批斗。目睹者现场笔录如下：

批斗者问：“大家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时，你为什么不举手，”
陆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批斗者问：“你说刘少奇是什么人？”
陆答：“你们说他是敌人，我认为刘少奇是革命领导干部。”
批斗者问：“彭罗陆杨是什么人?”
陆答：“也是好人。”
批斗者问：“是好人为什么要打倒?”
陆答：“这是‘文革’的需要，‘反面教育’的需要。”
有人掏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责问：“党中央早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你看到没有?”
陆答：“我不相信!”
批斗者问：“你有什么根据?”
陆答：“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提议的。我不相信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就变成坏人。苏州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被打倒的并不是坏人。”
会上有带头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陆兰秀”、“陆兰秀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和“陆兰秀罪该万死”的口号，与会者“群情激昂”，也随着高呼。
陆兰秀昂起头高声对抗道：“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刘少奇也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
批斗者一拥而上，揪头发的揪头发，动拳头的动拳头，按“最高指示”，把他**“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此后，拒喊“毛主席万岁”的陆兰秀，正式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由于陆兰秀态度强硬，拒不认错，“罪行”不断升级，从 1968 年 5 月 3 日被收审起，到 1968 年 9 月 23 日，被关进了设在忠王府的**“文化系统斗批改学习班”**，而到 1969 年 3 月九大召开前夕，她又被关进专为“铁证如山”的阶级敌人举办的**“对敌斗争学习班”**。毛泽东的**“学习班”，是个集改造、批斗、审讯、囚禁和劳教于一体的专政组织，是中共借“学习”和“群众”之名进行迫害不同政见者的场所。**在这些名目不同的“学习班”中，她受到残酷批斗和暴虐。“官逼民反”规律开始发作，逼着她向造反方向转化。

在“文化系统斗批改学习班”里，她还天真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了我们国家不会变修，对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反面教育大演练。她说：**“是反面教育，看来是有意识的一次反面教育……”**。当她的身体升级到“对敌斗争学习班”里后,她的思想也有所升级，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都是要独立思考的**。”她作出了属于自己判断：文革是毛主席本人的指导思想出了严重错误。对于毛的严重错误，她寄希望于毛泽东的自省。她上书毛泽东，力谏立即结束文革。她在信中写道：

“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

然而，她得到的回答是更加残酷批斗和暴虐。在“学习班”里的惨烈“学习”中，她被逼上了毛泽东不能批判的禁区，走上了“造反有理”的不归之途。她当着多人，突然站在床上，起下图钉，取下床头墙上的毛泽东像，表示要批判毛的决心。她的“反革命”行为，招来了一场接一场的毒打。1969 年 11 月 4 日，在“学习班”中，被多次打得伤痕累累的陆兰秀，开始绝食抗议。在绝食其间，她写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共计两万多字的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等九篇文章。

1969 年 11 月 22 日，她写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公开挑战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她写道：**“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她认为，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她呼吁**“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大家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使毛泽东**“接受大家意见”**。

1969 年 11 月 26 日，她将批判升级，写了《**告全国人民书**》的声讨毛泽东的檄文。她在檄文里写道：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统治者总是要塑造一些神像，利用宗教的天堂来麻痹人民，让人民每天祈祷上帝赐给自己每日的面包，以证明人民的面包不是人民自己劳动所得。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给人塑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神像，让人们每天祈祷神像给人们以理

想的幸福世界，而这世界在反面教育的现实中并不存在。……请问世界上曾见过哪一个历史阶段有过这种事实，人民挣得的自由和幸福，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神赐给的呢？”

在檄文中，她对毛泽东愚弄中国人的伎俩进行了抨击。她写道：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利用生产关系中的各种集团阶梯和各种社会问题，在人民中挑拨离间，分化瓦解，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成人民中的长期分裂和莫须有的仇恨，甚至造成经久不息的械斗，传之后代，难解难分。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干部群众互相斗争，利用社会历史所遗留和造成的各种问题，在人们中散布互相仇恨、互相敌视的种子，甚至破坏本来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友谊和和睦的家庭关系，并利用种种马列主义词句以证明这种现象是应该的、正确的。”“从来的统治者总是采用各种愚民政策，歪曲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利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一套套美丽的谎言，把人民变成自己的俘虏和驯服工具，驱使他们去残害自己的同胞，或干尽损害无辜人民利益的坏事。”

对于中苏边境流血冲突，她看出了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她在檄文中写道：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要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用以缓和国内的矛盾，以利镇压人民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利用边境问题，制造战争紧张空气，天天开动宣传机器，要人们准备打仗。”

对此，她警告中国人说：

“人们如果不觉悟，不奋起抵制，不采取积极行动，这种历史的倒退……如果人们永远束缚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或‘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的思想枷锁下，人们将永远得不到解放。”

三天之后，陆兰秀又写了《**再告全国人民书**》，进一步呼吁大家从神化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她写道：**“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统治者的奴隶。”**因此，**“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分析其内容，然后决定应否接受和应否抵制**。”

由此可见，她是当年中国一个少有的先知先觉又敢言者，她的文字，证明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女丈夫。她的檄文，使七尺男儿的笔者，自愧弗如！

1970 年 1 月 26 日到 30 日，她连续写出了《**居中**》、《**战争论**》、《**人之初**》三篇政论，多角度批判毛泽东。

在《**居中**》中，她针对反毛就是反革命之类的口号批判道**“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在《**战争论**》中，她批判了空喊备战**“对人民封锁事实真相”**的愚民政策说：**“只管骂人家**（笔者：指骂“帝修反”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子不会长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在《**人之初**》一文中，她反对随意把人称为“坏人”而加以专政的恶劣作法。认为人之初原本一尘不染，没有什么先天带来的善恶和好坏。她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应以新

的统治者的面貌出现，不应把责任完全归之于个人，单纯地将他们判罪关押、斗争打倒，单纯采用专政手段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而要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最后消灭三大差别。

为了抗议迫害，1970 年 3 月 3 日，陆兰秀写下了《**请总部负责人电转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3 月 5 日，她开始第二次绝食。在绝食中，她又写下了《**再电毛主席**》、《**亲痛仇快**》、《**人民的要求**》等文章。

在《**请总部负责人电转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中，她以严厉的词句指出，文革已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祖国已濒于民穷财尽、国破家亡的边缘，时间已不允许再多拖延。**”她敦促毛泽东和中共：“**请毛主席党中央放下屠刀，向真理投降！**”

在《**再电毛主席**》的电文中，她着重分析了发生文革这场历史大倒退的原因：“**由于毛主席对掌握全国政权后的新历史阶段的规律没有全面掌握，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有错误，没有完全摆脱旧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看不见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对中国前途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排斥不同意见，坚持似是而非的一种修正主义理论，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强制推行，流毒深远，清除已感困难。**”

绝食的第四天，在苏州市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提审时，因她拒读“坦白从宽，抗拒从言”的语录，被痞子、流氓无产者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囚室，忍着疼痛，写下一篇规劝“学习班”里的打手们，弃恶从善的杂文《**亲痛仇快**》。

在《人民的要求》一文中，她寄希望于有“橡皮图章”之称谓的人代会。她提出：“**当务之急，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提出新宪法草案，开始新的历史篇章。**”

随着她对毛泽东批判的广泛和深入，她的“罪行”也在不断罗织中升级：1970 年 3 月 25 日，陆兰秀被正式逮捕。

在逮捕前后，她写出《**陆兰秀代遗书**》、《**致毛主席的忠告信**》和《**自由**》。

在《**代遗书**》中她写道：“**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其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血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在《**致毛主席的忠告信**》中，她仍寄希望于毛泽东。她写道：“**你应完全了解文化大革命至此不应再发展下去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千头万绪，任重而道远，拖延时间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请即作出决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通过文章《**自由**》发出了呼唤自由的声音：“**千百年来，人们前赴后继，付出高昂代价争取自由，但是，由于有些争取自由的人掌握政权以后随着地位的改变而引起的思想的改变，人民的自由仍然没有来到。人们不过是从一种不自由改变到另**

一种不自由。在新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许多自由权利，人们却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自由。对上级的逢迎吹捧，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的排挤打击，这些形成了风尚，日益严重地剥夺人们的自由，从思想的不自由，转化为人身的不自由。意识形态里的不自由，并不比旧社会好多少。在新社会奴役着人们的不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还有被教条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被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剥夺了人们的最高权力——自由。”

在狱中，她对狱友张惠英说：**“毛主席也说过，对不正确的领导，可以抵制。现在大家就要团结起来，抵制这种不正确的领导。……现在害怕的是他们，不是我。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不着急。这一代人不替我平反，下一代人看了我的材料，一定会替我平反的。过去有个屈原，他对皇帝很忠，结果皇帝把他放逐了，他一气之下投了江。现在端午节吃粽子就是纪念屈原。我就等于当年的屈原。”**

陆兰秀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一个 1966 年前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维护者，一个坚信“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实经历使她的思想深处，发生了自由思想的萌动，从而使她逐渐偏离了毛泽东**“统一思想”**和刘少奇**“驯服工具”**的教导，开始了“独立思考”的实践。然而，她的悲剧在于，这种反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主义的萌动，使她走上了充满魔难的不归之途。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她的思想有所升华，开始呼唤**“人们的最高权力——自由”**，但留给她的时间太短了，三十多年的革命奴化熏陶太深了，她没有能够挣脱忠于党忠于君的羁绊：她要做现代屈原。可悲的是，两千多年前被楚顷襄王放逐的屈原，不愿以“皓皓之白”去蒙受世间的垢尘而投江自杀，她却没有那样幸运，赤胆忠心给她带来的是：就刑前被端下颌车，接着便倒毙在她所忠于的党和领袖的枪口之下！

54-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侥幸生还的王容芬

作者 于松然

1966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来京的约 100 万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庆祝大会——文革史称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这次“接见”中，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 19 岁的**王容芬**也参加了。她是学德文、研究德国文化的，比较熟悉德国历史。“接见”的狂躁，给她的第一个感觉是德国纳粹运动。后来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彪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

“豁出去了”，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几乎会要她命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 年 9 月 24 日

她终于说出了她想要说出的心里话，但她十分清楚，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说出这种话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当她寄给“伟大领袖”的这封信发出后，她便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但当她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公安医院里。

离开医院后的 9 月末，王容芬便被投入监狱。9 年后的 1976 年 1 月，以“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等反革命罪，正式“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在毛泽东死后的 1979 年，她被无罪释放，冤狱 13 年。她虽是个幸运儿，但为中国已献出了她的美好青春：进去时，是一个 19 岁的花季少女，出来时，她已 33 岁；牢狱中的折磨，使她变成了半老徐娘，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监狱的折磨虽能改变她的容颜，却无法改变她的信仰。1979 年 3 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和她的母亲，来到榆次监狱，向她宣读释放她的“改正”判词。当听到判词中说她“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的谎言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没有反‘四人帮’。”**可悲的是，在“主旋律”的洗脑下，许多中国人对这种谎言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1981 年，王容芬进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成了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专家，翻译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1989 年 6 月，王容芬前往德国定居。

信仰没有改变的王容芬，2008 年，给中共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说：

“到今年 6 月，文革就 42 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文革’，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王容芬是个幸运儿。比起那些因揭穿“皇帝新衣”而残遭枪杀的**遇罗克、林昭**等先烈们，

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人造浩劫的衰微。

55-愚弄的见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作者 于松然

1968 年 12 月 22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听取“毛主席的声音”。文革中，这种声音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据调查：会宁县是个小县城，是个市民与农民混居的城镇。住在那里又常回乡住的 50 岁农民**王秀兰**，要回乡住一事被记者发现，采访时，王秀兰脱口说了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话，被当做典型登在《甘肃日报》上。《人民日报》转载时，毛泽东提笔在“城里”中间加了一个“市”字。《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加了编者按。编者按公布了毛泽东 12 月 22 日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二二”指示。“1222”指示使《人民日报》的报导与编者按牛头不对马嘴：前者是城镇居民“自愿”到农村就业问题，后者是要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问题。尽管《人民日报》语焉不经，但传达毛泽东的“1222”指示的声音却无比强大。自此，一场改变一代城市青年和千百万个城市家庭命运的运动，便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原来，经过两年多的“横扫”、夺权和武斗，工业总产值连年下降，其中,1967 年下降 13.8%，1968 年又下降 5%，粮食比上年也减产 175 亿斤，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企业人浮于事，已不可能再增加新的职工。与此同时，累积在一起的 66、67、68 年的“老三届”初、高中学生，已达 1,100 万人，而 66、67 年的小学生要升入初中，“催着”“老三届”让位。严竣的就业形势，要求中共尽快作出选择。天才的毛泽东迅速做出决定：把城里的“老三届”学生撵到乡下去，那里土地辽阔，人烟稀少，便于接纳。于是，他大笔一挥，便把驱赶学生下乡务农提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政治高度，料想无人敢于抗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则是**“自私的、落后的、保守的”**，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已。那么，为什么不让学生到工厂、矿山去直接接受先进的工人阶级再教育呢？由此可见，毛泽东践踏人权的“1222”指示，堪称当时最荒谬、最可恶又最美丽的谎言！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广播的当晚到次日，在各级新生革委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各地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有人把毛的谎言变成了诗歌，在广播中反复播出：**“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当毛泽东大喊大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还是这个毛泽东，他曾多次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因为“**农民阶级是自私的、保守的、落后的阶级**。”因此，他把农民列为教育和改造的对象。他“教育”农民的办法主要是，组织由干部为主、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为辅的工作队、组，到农村中去，对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教育”。例如：为了敦促农民造反，他便组织干部和知识分子，利用“农民讲习所”等形式，**煽动**农民起来闹革命；在土改运动中，他派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工作组到农村去，**诱迫**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又组织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工作组，深入到农村家家户户，**威逼**农民们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在“四清”运动中，他把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大规模的工作队，派到农村，**鼓动**农民起来清算农村中的官僚特权阶级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吊诡的是，“四清”尚未结束，农民们意外受到毛泽东青睐和重用，瞬间变成了教育者，而知识青年和紧随其后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例如那些曾经教育过农民的工作队、组成员，那些始终处于领导和教育农民地位的各级干部，瞬间都变成了农民的“学生”，都要到农村去接受农民们的“再教育”。荒谬的和随心所欲的“再教育”理论，是毛泽东最高、最荒谬、最无耻的谎言之一！

毛泽东的最高谎言，就是政策；而在 1963 年 10 月，周恩来亲自部署、起草、制定的 15 年不变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这个违工业化规律、逆城市化潮流而动的决定，就是法令。在“舆论一律”强权和谎言运作下，全国开始了现代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著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 1968 年到 1978 年的 10 年间，运动以其强大的威力，冲击了全国各地城市里的家家户户和农村中的村村寨寨，各地城市中的约 1,700～2,000 万个青年学生，包括尚未成年的十四五岁初中女生，在中共软硬兼施的“动员”下，先后“**自愿**”地、“**高高兴兴**”地远离父母，到穷乡僻壤里落户为农。

文革中，这场延续 10 年的曾使近两千万知识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价的上山下乡运动，始发于五十年代。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在一个材料上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政府，先后组织了 800～1,000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大多数是政府不予补贴的回乡知识青年。1963 年 10 月，周恩来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并说“**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1964 年 1 月 17 日，周恩来又将 15 年不变的《决定》，下发到全国，要各地遵照执行。

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教导，是句美丽的谎言。中国农村的确是个“广阔天地”，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集体主义被美化、神化、从而官僚权力化，人皆有之的人类天性——自由、私有和个人主义被妖魔化，农民们由此被奴役，他们的智慧必然被约束在雇主和农村官僚特权阶级许可的范围内，不可能自由发挥。因此，无论是被驱赶到农村的城市知青或是回乡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而周恩来“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谎言，更是城市化潮流的历史反动。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到 1966 年 7 月，全国先后又有 129.28 万城市知青，被各地政府“动员”——驱赶到农村。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马列社会里畸形经济、畸形教育条件下的特有的践踏人权的畸形运动。这个运动，从五十年代开始，1968 年 11 月又大规模重新启动，最终在 1978 年哀鸿遍

野的嗷嗷声中，悄悄而缓缓地落下帷幕，给历史留下了一页至今无法忘怀的篇章。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发动和周恩来领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他们发动和领导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手工业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等大规模运动使老百姓付出了沉重代价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那样，在制造了无数苦难、侵权、暴虐使知青们付出了重大代价后，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1978 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懊丧地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据专家们估计，包括知青家庭花销在内，全民至少花了三百个亿，而“国家花了七十亿”，是中共无法再缩小的数字。正是：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毛泽东和周恩来制造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何在？中共的初衷是什么？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30 多年后的今天，在档案死不解密的情况下，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主旋律”的统治下，广而言之，不外是最高谎言的重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消灭三大差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各种严重践踏人权的政治、经济运动，无不打上“革命”、“解放”、“无产阶级”等美轮美奂的政治标签，上山下乡运动焉能例外？但当考察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后，人们会发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说到底不过是个在畸形经济、畸形教育条件下以安排劳动就业为目的的借以疏散城市中潜在的动乱势力、减轻城市负担从而确保城市稳定的专政措施而已**。其他说法不是托辞，便是谎言。

56-马列毛社会里的畸形经济

作者 于松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与美、英、法、苏等同盟国一起，战胜了德、意、日等法西斯协约国，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自此，中国一洗百年屈辱，以五大强国之一的身份屹立世界之林，理所当然地成了据有否决权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二战中，除美国外，无论是战胜国或战败国，国家都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重建国家，各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经济建设。

不幸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的政治、军事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崇尚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崇尚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阵营。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内战，击败了国民党，主宰了中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仅次于苏联的强国。从此，中国进入了一党专权的毛泽东时代。1971 年 10 月 25 日，在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家的支持下，共产党中国继承了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成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主宰了中国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替社会弱势群体鸣不平的理论，但它又是一个违反自然法则的理论。马克思无视当年集19世纪上半叶经济学之大成的均衡价值说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资本论》中，以抽象劳动价值论推导出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使马克思的追随者得以从理论走向流血革命，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政治上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经济上消灭一切私有制，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建立以中央计划为中心的公有制经济体制。马克思在论及未来社会中劳动时间的作用时说：**“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据此，列宁明确提出和使用了“计划经济”这一概念。1922年他说：**“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将实行计划经济**。”又说：**“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于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便把工人阶级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成了工人阶级的**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接着，他们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自居，遵照马列教导，以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身份，开始构建起所谓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间天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构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有庞大官僚机构来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的、有强大武装力量来镇压一切反抗言行的政府。由于这样的政治体制与人类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然属性相冲突，当权者必然强制人们进行思想改造，要求人民做**“党妈妈”**的儿子，做党的**“驯服工具”**——奴隶，并把**“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是权力拜物教权力情结之必然。

从1953年下半年起，权力情结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遵照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导，在中国开始了“人间天堂”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化三改造”中，在“以钢为纲”的工业化过程中，他们依靠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的“枪杆子”，在农村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在城市强制实行小手工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家化。到1958年，他们把全国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土地、矿山、工业、交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和文教卫事业全部收为国有，**使中共党和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从而取代地主、资本家和自由职业者，成了全国**唯一雇主**。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相呼应，他们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满足其需要的体制和制度，如一党专权的中央集权体制，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宏观管理体制和统购统销制度，以及反对“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思想的教育体制，等等，自然而然地把国民经济畸形化：在打造“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国民经济**二元体制**的同时，用限制农民进城的户口管理制度，使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固结**化，阻断了城市化的进程。

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马列说教。

1776年首次出版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他在早于《资本论》91年的书中论述市场经济时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机制是“人性”——自我改善欲望的驱使和理智的引导。正如一位希腊哲学家说的那样：**“对自己奉献最多的人，**

就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

1944 年，**弗·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写道：**“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而这种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使相当多的产品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这种体制中，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其消费品价格也会被严重扭曲。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和信息问题。哈耶克的“个人主义”是指在生产和消费上，社会应尊重个人独立作出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位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被西方公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绝无仅有的政治经济学家。

1954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导致贫困的二元经济结构后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向城镇转移**，不仅能推动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和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还能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从而能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惜，这些有悖于马列主义的有价值的理论，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被中共认识和接受。二十一世纪之初，当官方承认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使约两亿“农民工”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已对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机会已错过了至少**三十**年。对此，一位经济学家感叹道：“从各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转移，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会，都是在外延型增长阶段实现的，而我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错失了这个机会。”

基于偏见、无知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雇主专政权力的需要，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远见卓识，被毛泽东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斥之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他们逆潮流而动，拒绝市场机制和城市化方针，并以“消灭三大差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培养接班人”等谎言，粉饰侵犯人权的行径，**驱赶数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进行所谓“大有作为”的艰苦劳动，**全力打造城乡隔绝、对立的使国民经济畸形化的二元体制。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其本质是全能的国家雇佣主义，即雇主将城市孤立、封闭管理起来，并使农村作为国家工业化的牺牲品。

在城市，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显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毛和中共把城市封闭管理起来，建成“大锅饭”式的计划体制。1951 年，政务院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使城市有相对于农村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行政、事业单位和一般企业中就业的干部和职工，还可享受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医疗服务。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还可享受定量的、平价的粮、油、肉、蛋供应，而这种计划供应，在灾难的三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此外，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和某些紧缺工业品的供应上，城镇中的非农业人口都有一定的计划保障。在“大锅饭”的城市中，大型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干部职工，相对生活条件最为优越：由于企业能从政府计划的“剪刀差”中获得较高的利润，使企业有钱为他们举办学校、医院、提供住房等福利事业，有钱给他们发放奖

金、补贴，从而使他们能享受到比其他市民高得多的薪酬和好得多的福利。总之，在中共计划下，城市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雇主和各级官僚的部分恩赐，得到“党妈妈”的一些关照，因而，生活远比农民好过得多，尽管“恩赐”“关照”有森严的等级壁垒。

农村呢？在毛泽东的设计中，农村人民公社也是“大锅饭”式的，但它是一个政社合一、自给自足的无需政府计划供应的实体。他说：**“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到 1966 年 5 月 7 日，他又把人民公社定义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毛泽东规定，人民公社不仅要大办农业，大办农副业，还要大办工业、商业、学校、医疗、卫生和军事，甚至大办即全部由农民自筹的社会保障。1959 年他还曾提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打造的农村公社体制，以其成分单一的一元化结构形式，试图在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中，以平均主义和不等价交换等行政手段，取消社会分化与分层，切断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流动之源。他们还以 15.5%的农业税和相当于农业税 60～80%的杂项赋税的沉重负担，掠夺农民，使农业背上了沉重包袱。他们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特别是针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取了巨额积累。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 1953 年开始到 1983 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强使农民对工业化“贡献”了 6,000 多亿元。中国广大农民，在没有社会保障、发展乏力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里，在城乡不平等的计划、分配、赋税和户口管理下，在被贬为低于市民的二等公民的同时，在城乡间、工农间的流动管道被堵塞的封闭环境里，被迫长期在人均不足 2.7 亩的土地上挣扎，过着吃不饱、穿不暖和无钱上学、就医的贫困生活，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善。因此，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有经济学家还在大声疾呼：**“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然而，**雇主毛泽东却赋予农民们以极高荣誉——“再教育者”**：城市中以数千万计的干部、学者、教授、教师和知识青年，都曾被驱赶到贫困的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者”——贫苦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和中共打造的使国民经济畸形化的**二元体制**，截断了城乡沟通渠道，阻遏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滞迟了城市化的进程，扩大了城乡差别，使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数千万计青、少年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迫失学、辍学而上山下乡。

在枪杀、自杀和饿死数千万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国民经济发展全面滞后：一边是纵向比较，国民经济每年有 12.5%（？）的骄人增长；一边是横向比较，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惊人下滑。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 麦迪森所著《世界经济 200 年回顾》一书中披露，在 1952～1976 年的 24 年间，中国大陆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62%，人均 GDP 增长 62.2%。而同期，日本增长了 549.2% 和 396.7%，韩国增长了 604.1%和 306.4%，台湾地区增长了 684.9%和 310.7%，巴西增长了 402.9%和 402.9%，墨西哥增长了 332.3%和 332.3%，埃及增长了 265.5%和 111.7%。同时，中国 GDP 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5.7%，下降到 1976 年的 1%。但据中国社科院统计则**乐观得多**：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1952 年是 5.2%，1978 年是 5.0%，26 年下滑了 0.2 个百分点；中国人均 GDP 占世界平均水平，1952 年是 23.7%，1978 年是 22.3%，26 年下滑了 1.4 个百分点。这种“统计”虽很乐观，但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统治的 27 年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毛泽东和中共用无产阶级专政打造的二元体制，滞塞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拿不出钱来增加教育投入，也无力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来吸纳失学、辍学的青、少年，于是，在他们计划管理的城市中，驱赶失学、辍学的青、少年上山下乡，便成了社会主义计划者的必然选择。

曾是俄共领导人的**托洛斯基**，在 1937 年说过：“**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马列主义用暴力方式打破了旧的地主、资本家与奴隶的不平等关系，却用“枪杆子”构建起了新的雇主、官僚特权阶级与奴隶的不平等关系，或曰“公仆”（官员）与“主人”（老百姓）的不平等关系。**中共驱赶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中去接受劳动改造，就是这种不平等关系在就学、就业等问题上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关系直到九十年代，已演变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和冲突。与此相呼应，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悄悄把马列主义淡化为马克思主义，又迫不及待地把它定义为荒诞不经的“发展科学”，借以成为继续愚弄百姓、巩固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

1、二元体制使农民变成农奴

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后，私有制开始出现，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出现分离，便产生了奴隶主、奴隶和自由民共存的奴隶社会。为了管理奴隶或曰人民，商代大奴隶主商王，将全国分封给侯、甸、男、卫、邦伯等诸侯，使其成为各地奴隶主；诸侯又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任命邻长、里胥、赞师、鄙正、县长、遂大夫等官员去管理奴隶。奴隶时代的特征是：大小奴隶主拥有绝对权力，剥夺奴隶的人身自由权，只给他们维持生命的经济权利。在“新中国”，掌握了全国所有资源的雇主，为了管理人民，将经营管理权力分交给各省省长，各省省长，又将经营管理权力分交给各个地区专员、县长、公社社长、大队长、生产队长等官员。这些“长”形式上正职，但实际上是副职，一把手都是上级任命的各级党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他们是各地的实际雇主代理和奴隶管理者。在一党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雇主和奴隶管理者拥有绝对权力，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农村，毛泽东在赋予农民为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者”的同时，却授于各级官僚特权阶级即所谓的“公仆”为“再教育者”的教育者、组织者和监管者。在这种荒诞的环境里，作为人民公社“主人”的农民，他们的人权、自由权和经济权亦即他们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再教育者”遭鞭挞

戴着“再教育者”桂冠的农民，从来都是受管教者。因为，毛泽东多次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为了使农民惟命是从，毛和中共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反宰杀牲畜、拔白旗、反右倾、反后进、民主革命补课以及持续十多年的学大寨等政治运动，在用**宣传、批斗、管、关和枪杀**来“教育”农民的同时，强化了各级党的书记的绝对权力，使他们成了党的化身，成了说一不二的“邻长“赞师”和“遂大夫”。“**听话要听党的话**”、无私奉献和集体主义，成了他们教育农民的主题，也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挡箭牌。“公仆”们“教育”农民手段之无情、残酷，使“旧社会”里的地主豪绅和奴隶主们，都望而生畏。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通过历次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一批官僚特权阶级逐渐形成，他们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不得不承认，这批人是与贫下中农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对奴隶主绝对服从；在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里，也出现了类同法则：“不服从者不得食”，或少得食。毛泽东在 1965 年春节谈话中，曾对文艺工作者发出过严厉的命令：“**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这话虽不是对农民说的，但对农民的威慑不亚于文艺工作者。为了平息农民的对抗，毛和中共便施之以“恩”，在公社里开展起“四清”运动，清理整治基层干部中贪污、多吃多占、多

计工分、欺压和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等腐败分子。然而，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分歧严重，上层权力斗争加剧，“四清”半途而废，最终演变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比较有良心、比较开明的务实派，他们像彭德怀那样同情农民的疾苦，主张“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给农民一些自由，放农民一条生路。但他们遭到了毛左派的清算，代之而起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据笔者观察，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极左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他们捧着马列主义本本，口中念念有词，唯权是瞻，唯毛是理，学着毛泽东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对付农民，把农民当成现代式的农奴，任意驱使。在北大荒，笔者就听到过贫苦农民们的忧世怨声：**“宁愿当亡国奴，不当国家主人**。”怀念伪满拓荒年代。

在这些极左的痞子、流氓无产者中，**陈永贵**是他们的代表。这位当年扛过长工、当过日伪情报员被百姓骂为“陈二鬼子”的陈永贵，在毛泽东时代，平步青云，一路飚升为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时称“文盲宰相”。毛泽东的口号是**“革命加拼命”**，陈永贵就喊**“大批促大干”**。在“革命加拼命”和“大批促大干”中，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能高达百万件，死亡人数至少有十万人之多。据昔阳县志记载，在陈永贵统辖昔阳县当雇主代理的 13 年间，昔阳在农田水利建设施工中，**“拼命”**加**“大干”**致农民伤亡 1,040 人，其中**死亡 310 人**；又据《人民日报》1979 年 8 月 13 日报导：在昔阳县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有 2,061 人，**“革命”**促**“大批”**造成冤假错案 3,028 件，导致**非正常死亡 141 人**。毛泽东谋划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二十世纪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蛮的运动之一。同毛、周一样，陈永贵罪责难逃！

“再教育者”被奴役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不仅占有土地、牲畜、工具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奴隶及其全部劳动成果。这就决定了奴隶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服从、人身依附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公社里，土地、牲畜、工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农民的所有劳动及其全部劳动成果，均归人民公社所有，农民变成了无产者，这就决定了人民公社社会的道德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因此，各级官僚在教育**“再**教育者”的农民时，总是喋喋不休地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国家服从谁呢？他们没有说。但明白人都清楚他们的潜台词：国家服从共产党，共产党服从毛泽东。这种个人→集体→国家→集体(党) →个人(领袖)即从个人到个人的循环往复，就是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由于雇主拥有绝对权力，而各级党的书记又是这种权力的代表，因而各级党的书记就是这种集体的化身，他们也自动代表了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根本利益”。在集体主义道德指导下，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绝对服从这个集体的所有者及其代表，而 1958 年 1 月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又强迫农民依附于这个集体的化身及其主人。因此，毛和中共所谓**集体主义**，可以说是古代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服从、人身依附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和中共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反人格、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铁笼子主义**，与建立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团队精神，格格不入。在集体主义横行的人民公社里，官员要农民们无私奉献，“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连“大公有私”也不行。因为，最高的谎言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是一致的：为集体、为国家就是为自己。一位中国学者说得好：**“大公无私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要求**。”在“革命加拼命”和“大批促大干”中，**“他们每日劳动平均达 14 小时以上。由于‘不劳动不得食’，**

人们只得披星戴月地干，干得正吃着饭就呼呼睡着了；可是饭罢，哨子一响，人们又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工。”农民们抱怨说：**“早上三点半，中午嘴嚼饭，晚上看不见。**”又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人，不仅有青壮年，还有老人、小孩、孕妇和抱着小孩子的母亲，甚至还有**“提着药罐子的病人”**！在“斗私批修”中，农民们只好在近乎无偿的条件下为集体劳动，他们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得出奇，连最起码的温饱都难以维持。由此可见，在公社这个集体中，农民都是真正的奴隶，各级官员则是各地真正的奴隶主代理或管家。

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1977 年 6 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农村还这么穷！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 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 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 60 元，40 元以下的约占 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大跃进时豪情万丈，肚皮空空的现代农奴。

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1965 年曾在贵州农村搞“四清”，亲历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在公社里，农民是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谁想务工经商，谁就会被批成不务正业，谁想方设法搞点家庭副业，谁就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不行；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有很细的规定，种的不对，拔掉。田纪云无限感慨地说：**“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右图）

对中共革命贡献很大的湖北省红安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了 223 个将军，输送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产党执了政，人民生活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比以前更穷。据报导，1975 年的几个月之中，便发生了 52 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的事件。例如，一位烈属姑娘，全家辛苦一年，到年底分红，才得到六元钱，不够买一件衬衫。绝望的她，穿着破烂衣裳，与另外 4 位姑娘一起跳到水库里。5 人中唯一获救的姑娘告诉记者：**“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红安县委父母官不仅不自责，反说自杀者“怕苦怕累，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她们“生的糊涂，死的反动”。

毛泽东号称“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况并不比汉族好。宁夏同心县 80%为回族，1973 年的人均收入仅 7.8 元。四川彝族作家吴承柏曾经这样描写本族普通农民生活：**“老年人饿得脖子伸多长，孩子饿得瘦精精。**”一位妇女**“梳了几个月的头，攒下的头发卖得二角钱，准备拿去买盐巴过年用……”**

在集体主义奴役下，农民们不敢硬抗，却找到了软抗的办法——**磨洋工**。**“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磨洋工和怠工，使公社里出现大量半值和零值劳动，隐蔽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据蔡昉主编的《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一书估计，整个二十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农村新蓄积了约 2 亿多的剩余劳动力。

在1958年，当毛泽东发出“大炼钢铁”号召后，全国上下齐动员，齐批私，九千万人齐出动，人民公社男女老少齐上阵，小炼铁炉像树林一样，遍地开花。然而，小高炉竟敢无视毛泽东的“伟大”号召，炼出来的都是些无用铁渣！大炼钢铁的失败，却得到了毛的首肯。他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笔者：实际200亿以上)，**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这样，全国九千万人数月的繁重劳动，成了无效劳动；而这种造成伤亡无数的无效劳动，在“伟大领袖”那里，“理直气壮”地变成了学费。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映！（右图）



1958年大炼钢铁中“**付了学费**”的甘肃武威县的儿童

有报导称：**“据1976～1977年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个县的生产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数还低于建国初期。另据1980年上半年全国五百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的统计，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几乎接近1/3。截至1977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仍然低于1955年。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约占2/3，具体地说，公社化二十年中使2/3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1/3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1亿1千2百万人口每天只能挣到1角1分钱，有1亿9千万人每天挣到1角3分，有2亿7千多万人每天可以挣到1角4分。”**

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1958年中期到1961年中期的三年里，全国农民饿死了3,000～4,500万，其他年份饿死人也寻常见。有学者论证说，其他24年中，平均每年饿死300～400万农民。此据笔者观察，平均每年饿死300～400万人有些夸大，但每年饿死数万人到一二十万的可能性最大，饿死率约在万分之二左右，应属毛泽东时代的正常值。由于“饿死”的标准难以界定，缺乏共识，笔者**“有些夸大”**的评点，也难免有武断之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公社的农民们，在近乎无偿条件下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或曰利润，即15.5%的农业税、相当于农业税60～80%的杂项赋税、以及统购统销中以低价统购农产品造成每年200多亿元“剪刀差”，都无条件地奉献给雇主的“国家”了。正如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否定一个对无产者不合理的社会时，却把一个更不合理的社会扔给了无产者。**”在《凤凰周刊》的《半夜鸡不叫？》一文中记载：曾在地主“周扒皮”家扛过长工的**孔兆明**，在“忆苦思甜”会上说走了嘴：**“我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话还没说完，便被干部拉下了台。

为中共夺天下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在集体主义奴役下，完全麻木了。对此，当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曾高兴地说：**“中国人民实在好啊，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再教育者”被半囚禁于乡里

1957年，中共开始实行控制户口迁移的“新”政策。1958年1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上，代表们按中共中央决定，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

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条例》推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截然分开，人为地打造了一堵有中国特色的“柏林墙”。这堵“墙”，剥夺了农民们从“旧社会”带过来的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自由权利，成为人身依附于人民公社的没有自由的奴隶，世世代代“脊背朝天”地给人民公社做贡献。这个违宪《条例》，像个无形枷锁，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农民身上套着。

在人民公社狭小的天地里，农民们不仅被剥夺了居住、迁徙自由，同时也被剝夺了选择工作的自由。在“旧社会”里，农民给地主扛活，如果不顺心，可以另选他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在人民公社里，你就没有了这种自由：住在队里，干在队里，**“党叫干啥你干啥”**，没有选择的余地。由此可见，人民公社是名符其实的铁笼子！

人民公社的干部特别是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大都是惟命是听的管理者。农村里不乏知识人才和能工巧匠，但在他们的治下，许多人的知识和才能受到了压抑，不能自由发挥。笔者在黑龙江密山县三梭通公社里，曾遇到过几位能工巧匠。一位颇有文化的种植能手，姓王，他种的国光苹果响誉附近乡里。合作化后“以粮为纲”，他失业了。1964 年我无意在他的庭院里，发现了十几棵修剪整齐的苹果树，可是，第二年“四清”中，统统砍光，割了他的“资本主义尾巴”。一位木匠，他的一些简单工具没有被集体化，但工具已经锈蚀斑斑，因为，队长不用他。一位自学成材的劁猪能手（给猪做绝育术），手术刀被没收，因为，他没经畜牧站批准，属非法行劁。一位中学数学老师，教学二十多年后扛起了锄板，因为，他出身地主，被解雇了。

在“旧社会”里，农民有逃荒的自由。那时的官员，不怕给国民党政府脸上抹黑，饥民们可以携家带口成群结队地逃离农村，逃到都市或其他地方行乞要饭。在人民公社里，他们的这种权利，都被残酷地剝夺了。你是否还记得，在“信阳事件”中，官员们派出民兵，撒下天罗地网，把饥民们团团围困在家里、村里饿死，生怕他们跑到城里要饭，去“污蔑”社会主义，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沙俄伊凡三世，曾于 1497 年颁布法典，规定农奴在每年指定的日期，即在秋后尤里耶夫节（俄历 11 月 26 日）前后的一个星期中，可以自由地转换农奴主。人民公社没有这个规定，农民没有转换到其他公社或城里去的自由。

当然，人民公社也有比沙皇农奴制“先进”的地方。当子女们争气考上大学时，当子女们身体强健能参军当上解放军军官时，当“走后门”成功搞了个招工指标时，他们的子女立刻会脱离父业，脱离公社，实现“农转非”，变成个自由人（与父辈比较）。显然，这比沙俄农奴制要“进步”得多，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

人民公社的户口管理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控制人口按计划流动，将绝大多数农民束缚于农村，借以减轻城市负担，对巩固雇主的一党专政十分有利。尽管这个制度被农民们骂成“罪该万死”！

人民公社比沙皇农奴制最为“先进”的地方，莫过于农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了。可惜，这种权利太民主、太现代化了，农民们“愚昧”得竟然享受不了，急需“加强党的领导”。

因此，农民们选来选去，选出的队长仍然是党支部“内定”了的，为他们“当家做主”的人，依然是不要他们选举的党支部书记。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湖南一位县委书记，在讨论中大胆地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这位县委书记的描述，活画出了人民公社里现代农奴的真实生活。

2、二元体制使城市化停滞不前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城乡“剪刀差”逐渐缩小的过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载体。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和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历史已经证明，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城市化水平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然而，毛泽东的农耕思想阻滞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说：**“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又说：**“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根据毛泽东的说教，1955年9月，国家建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设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利益出发，把生产与民生（消费）对立起来、把城市化与工业化对立起来，用计划来制止自然聚集效应——这是毛泽东农耕思想的初始表演。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在中国建设农耕社会主义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设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自此，中国城市化停滞并呈现倒退，毛泽东通过抑制城市化来推动工业化的方式也达到了极限，走到了尽头。

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城市化，在毛泽东农耕思想的二元体制下受到重挫。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小城市由115个减少到105个，小城镇由5,400个减少到2,900个。城市化水平在五十年代初增加较快，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4%，提高到了1957年的15.39%,七年增加了4.75个百分点。但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中国城市化开倒车。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 年的城市化率是 19.7%，1976 年是 17.4%，十六年间降低了 2.3 个百分点。隔海相望，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韩国，其时，城市化率稳步提高，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从 1962 年的 57%，下降到 2000 年末的 9%，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城市化开倒车，使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付出了代价：被迫辍学，被迫落户到农村、农场，在贫瘠土地上进行没有希望的劳动。一位叫**定宜庄**的作家说得好：**“政治上的动荡，经济决策上的失误，每次都以大量青年的不能升学和被送往农村为代价**。”

在二元体制下，农村公社里隐蔽了大约两亿剩余劳动力；在二元户口政策的固结下，这些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为城市化做贡献。这种积累和贡献，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在中国出现——约两亿农民工在大、中城市务工，但机会至少错失了四十年。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化的停滞和倒退，与国民经济畸形化相辅相成，四个现代化成了摆在餐桌上的图脯和画饼；到 1976 年，国民经济已沦落到了崩溃的边缘。

3、二元体制使粮食危机加深

1953 年，毛泽东把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钢为纲”，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农业、手工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这个“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马列本本中规定了的，是以牺牲民生为前提的，是苏联共产党已走过的路。毛泽东和中共认为，有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和帮助，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天堂指日可待。在毛泽东的规划下，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 15 年的时间里逐步实现。

但中国不同于苏联。正当他们以“解放者”姿态满怀信心地建设“天堂”时，他们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不是来自于“人民的敌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而是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因而被“解放”了的农民。

“一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农业，国外贷款仅占总收入的 2.7%。在二元结构下，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

据报导，1953 年，粮食生产的增长和收购量的增长，赶不上粮食销售量增长的速度。由于农民对收购粮油的反抗，使政府收购计划不能按期完成；而销售却远远超出计划，1953 年出现了 87 亿斤的粮食差额。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出现面粉供应紧张的情况。据说，其时的北京市，库存粮食**只够七天用**。对此，中共对粮、油、棉实行了强硬的统购统销政策，决心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支持工业化建设。这一招果然有效：1954 年粮食产量虽比上年只增长 1.8%，但国家收购粮食却增加了 80%，库存也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50%，城市、工矿区粮食供应也趋稳定。

牺牲农民利益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对抗。1954 年 3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联合发出的紧急指示中说：**“根据各地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并且出现了**“家家谈粮食，户户谈供销”**的情况。

统购统销不仅侵犯了个体农民的家庭消费和产品自销权，引起农民不满和对抗，而 1.1 亿的分散农户，的确也给统购统销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说：**“困难不单来自我们对于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两年后，他又对他的讲话作了发挥。他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

统购统销中遇到农民的反抗，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已刻不容缓。

1954 年 6 月，毛泽东在他批准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情况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至此，谎言已上升到理论高度，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为了加快农业合作化进度，使统购统销畅通无阻，毛泽东改变十五年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规划。两年后的 1957 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用谎言制造舆论，毛是行家里手。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上层，他狠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有严重右倾思想，撤了邓的职；在下面，他派出农村工作队，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强制推行合作化，以**“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的强硬手段，打击反对合作化的所谓的“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使 10～20 万农民因不愿将自己的农具牲畜入社而被打死，或跳河、上吊自杀。在毛和中共的软硬兼施下，仅用了三年，便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等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接着，到 1957 年，全国初级农业社先后跨进高级社，1958 年，农村全部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由此可见，**统购统销使农业合作化提前了十二年**，而当年铺天盖地宣讲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自由发展势必会导致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等等说教，显然都是谎言。

毛泽东牺牲农民利益加速农业合作化以支援工业化的政策，就短期效应来说，确也取得了成功：1952～1957 年的“一五”期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 1,500 多亿元的积累，使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 18%，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 8.9%，投资率在 17.8%和 22.6%之间。

掠夺农民的胜利冲昏了毛泽东的头脑，1958 年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掠夺：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使**农民丧失了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大兵团作战”，使农村变成了毛

泽东可以**任意驱使的大兵营**；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工程、大建梯田等劳民伤财的瞎指挥，使农民变成了**廉价的农奴**；“拔白旗”、“反后进”、“民主革命补课”和镇压“地富反坏右”，使农民成了**雇主任意宰割的羔羊**。这种残酷的掠夺和镇压，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使 1959～1960 年的粮食产量骤降 15%～25%，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捱到 1961 年年底，以饿死了 3,000～4,500 万个农民后，这种掠夺才告一段落。

三年人为灾难后，中共党内右派有所反思，开始执行“**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家很快走出了大饥荒的困境。尽管人民公社元气大伤，已有气无力，但在毛共“枪杆子”弹压下，还能继续肆虐农民；粮食危机也没因八字方针而趋缓。

为了安抚民心，巩固人民公社和“大锅饭”城市的二元体制，粮食危机使毛泽东和中共不得不采取了些不能公开向国人交待的措施——大规模进口粮食。

人们可以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中看到以下进出口粮食数据：

1950～1959 年，年均**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下同）214.46 万吨，其中 1959 年出口 415.75 万吨；
1960～1969 年，年均**净进口**（进口减出口——下同）276.91 万吨。其中 1961 年进口 580.97 万吨，1964 年进口 657.01 万吨；
1970～1979 年，年均**净进口** 394.67 万吨，其中 1979 年进口 1,235.53 万吨。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前以分散私有化的小农经济，使中国成为粮食出口国，而集体化大生产的人民公社，却使偌大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长期大量进口粮食，戳穿了 1958～1961 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

八十年代初，全国农民推翻了人民公社和农业社体制（被迫保留了土地国有化），在人口大幅增加、土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依托家庭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制度，使 1978～1984 年中国粮食超常规增长，1984 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4 亿吨大关，并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卖粮难”现象，从而使粮食国际贸易在 1985 年和 1986 年出现逆转，分别净出口 271 万吨和 181 万吨。尽管以后若干年里有所起伏，但到 1997 年后，家庭小农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的粮食净出口国。《年鉴》数据明示：1997-2002 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年均净出口** 842 万吨，其中 2001 年出口 1,876 万吨，创历史新高，与 1979 年进口 1,235.53 万吨，形成鲜明对照。（大农业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保卫社会主义根底的势力顽固不化，到二十一世纪初，畸形的二元体制没有质的变化。）

历史已宣判了毛泽东和中共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策的死刑，但迄今还有那么一些史学家为它扬幡招魂。他们著书立说大论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冒似公正地大谈其利弊、得失以及左的错误等等，令人作呕。但最令人作呕的则是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那块“共产主义天堂”标本。当年南街村人被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公社搞得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但改革开放后，当权人却用十数亿人民币把这个小小村庄，滋生成共产主义畸形怪胎，使他们成了为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公社树碑立传的活标本。

57-“教育革命”下的畸形教育

作者 于松然

2003 年 9 月，《**马燕日记**》的中文版在北京首发：这是个力图改变被动局面的首发。**马燕**是宁夏同心县预旺乡张家树村里的一个十三岁女初中生，四年级开始写日记。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2001 年 5 月，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彼埃尔·阿斯基**（中名韩石），在张家树村采访时，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和三本小册子。信是马燕写给她妈妈的，标题是**“我想读书”**；三本小册子是马燕在 2001 年前写的私人日记。2002 年 10 月，《**马燕日记——一个中国学生的正常生活**》一书在法国出版，被法国《解放报》连载，感动了法国，撼动了欧洲，许多人纷纷写信慰问，纷纷解囊相助。由于得到了外国人的资助，马燕和当地 60 多个辍学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了。

也许是历史巧安排，三十年前，曾发生过一起“马振抚事件”。1973 年 7 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跳水库自杀了，死时十五岁。自杀的原因是她的英语只考了 6 分，还在考卷背面写了几句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 ABCDE，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接好革命班，还能埋葬帝修反。”班主任和校长认为她顶撞老师，批评了她，还让她写检查。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第二年的 1974 年 1 月，中共中央下达“五号文件”，把这件事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指责马振扶公社中学搞**“法西斯专政”**、**“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等。校长和班主任也因而以“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的罪名被捕，分别被判两年徒刑。

三十年前后发生的“二马”事件，是两个不相干的事件；但仔细推敲，人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构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一元化政权，其表现为一个党一个领袖高度集权的绝对领导。为了超越资本主义以显示政绩，毛泽东的中共，摈弃教育为国本的思想，竭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体制，借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保证二元经济体制生存和发展，他们利用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一切反抗言行。在镇压一切反抗言行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

知识是多元的，其发展是自由的。由于多元和自由，代表知识的知识界，必然是学派林立，而其成员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自由主义者。在民主社会里，通过“和而不同”的民主整合，使多元和自由精神变为国家的财富和发展动力；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相反。一元化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人（自称“公仆”）们，与多元和自由精神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必然要敌视、改造乃至镇压异己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改造产生这种多元和自由精神的载体——**学校**。这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共同选择。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不能改造，就应打倒。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极端的反革命派”**，统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泽东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却一刀砍了知识分子代表**王实味**的头，并把延安80%的知识分子“抢救”成敌人——特务。五十年代，毛泽东狠批提倡以教育为国本的《武训传》，接着又把异己文艺思想者胡风打入监牢。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玩了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一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为了抑制多元，镇压自由，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了**“教育要革命”**的命令。在“教育革命”思想指导下，到1966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已达疯狂地步：在“横扫”中，他把数十万个知识分子打成“牛鬼蛇神”，逼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于此时，他又取消了初考、中考和高考，迫使全国中学停课多年，高等院校关闭长达7年之久，使数百万计的青、少年学生辍学，游离于街头和乡里。

中国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在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才。然而，在和平环境里，毛泽东却使数千万青、少年失学多年，他还将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驱赶到农村去劳动。由此可见，在国民文化教育层面上，毛泽东时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

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抑制多元，镇压自由**，其实质是要革掉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为此，他为他的“教育革命”确定了以下任务：

“教育革命”任务之一是工农兵领导学校

“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毛泽东时代广为流传贬低知识的一句话。这句话出自何人？目前尚有争议。但与毛泽东有关却无异议。毛泽东曾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人说，在流传中，人们把这句话的前提忽略了，於是以讹传讹，“知识越多越反动”就变成毛泽东的原话。但仔细推敲一下，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话算到毛泽东头上也不为过。因为，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说一不二的：路线对错与否，全由他一人拍板，因而谁的知识越多越进步、谁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全靠他一人敲定。

为了证明“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把持有不同文艺思想的文学家**胡风**及其支持者，打成**“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把思想家**胡适**批成**“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在文革中，他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因此，知识分子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绝大多数都被他打成了牛鬼蛇神，进行了残酷批斗。他对已死的鲁迅相对比较客气些。他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他要工农兵领导学校的目的，是以**“知识无用论”**让教育为他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此，他压制知识分子对学校的垄断，怒骂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鼓动学生罢课。他对他的表侄孙女王海容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学校应**

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他到处鼓吹**“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等等，鼓动学生造学校的反，造老师的反，使学校师生矛盾激化。**“马振抚事件”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反映**。

为了夺取学校的领导权，他发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最高指示”，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贫农代表，进驻城乡大、中、小学校，实现了工农兵对学校的领导。七十年代，他派“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一名副科长**迟群**，担任北京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一把手，他让他漂亮的女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零距离译电员“秘书”**谢静宜**，当两所大学的二把手。迟、谢统领两所顶级大学风光数年，直到毛死，成了这两个最高学府的校耻，更是中华民族的国耻！

“教育革命”任务之二是亦工亦农改造学校

“书读得越多越蠢”——这是六十年代毛泽东的一句口头禅。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在“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1958 年 5 月 18 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这些材料**(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为了证明“书读得越多越蠢”是至理，他又煞费苦心地从历史纸堆里找出了许多“证据”。其中，他举宋徽宗当例子说：“（他）**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指出这是**“他们都是‘只专不红’**，（才）**亡了国**”的。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他在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对于哲学，他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又说：**“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呢？

1、红专大学。毛泽东说：**“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红专大学在农村公社、城市工矿企业里，雨后春笋般地创办了出来。此外，工大、农大、夜大、红专班等高等院校，也与红专大学争红斗艳，使毛泽东教育思想大放光采！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由 1957 年的 227 所，到 1960 年猛增至 1,289 所，猛增 5.6 倍。据报导，大学里的教师一半以上，都是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和工人。例如，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红专综合大学”**是当年的典型。全校共 10 个系，在校大学生 529 人。该校校舍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份好、觉悟高的男女青年；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识字不多，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由原来的小学教师担任；毕业生一般能开拖垃机、写快板书、“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据笔者所知，许昌一个著名大企业的厂长，就是当年工厂红专大学的毕业生。由于这种大学太荒唐、太离谱，遭到了普遍抵制，随着三年人祸的终结，也很快夭折了。

2、半工半读学校。1961 年 7 月 30 日，毛泽东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题词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

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题词中还要求“**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半工半读）**学校**。”在(65)国农办字 425 号文件中，国务院指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重点试办社来社去的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同时应当大力推广业余教育，满足下乡、在乡青年的学习要求。**”这是“红专大学”的继承和发展。据说，全国在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高达一百多万，但多数是虎头蛇尾而夭折。

3、“五七”干校。红专大学和劳动大学的夭折，并没有使毛泽东死心。1966 年 5 月 7 日，他给林彪发出一封信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信中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之后，人们常说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是这个意思。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农耕教育**。

农耕教育的典型很快被制造了出来。1968 年 5 月，黑龙江省的柳河“五七”干校，正式诞生了。毛泽东欣然命笔批曰：“（干校）**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于是，数百所“五七”干部学校，在各地拔地而起，全国一片“红”。

立足于农村的“五七”干校，体现了毛泽东“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农耕教育思想。**学工**，就是盖房、挖渠、砸油、磨粉之类；**学政治**，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林彪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学军**呢，有吹哨起床，排队下地干活的操练；只有**学农**范围较广，春种、夏锄、秋收、冬备，样样得按时，样样不能少。**学文**呢？据传，对于那些高知学员们，诸如那些专家教授们，尽管他们懂得什么运筹、模糊等高等数学，或会做诗写文章，但由于“**书读得越多越蠢**”，急需由工农兵给他们做“启蒙”教育。其中，补一补四则、分数，讲一讲《雷锋日记》，在有些干校也曾出现过。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要搞四个现代化，“修正”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下令停办“五七”干校。由是，长命十年的“五七”干校寿终正寝，数十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才从劳改生涯中解脱了出来。

4、取消文科大学。在毛泽东看来，学校是“滋生”多元和自由的“温床”，尤以文科大学为甚。因此，他发出“最高指示”说：“**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很明显，他要把文科大学生统统撵出大学。在无声的抗议中，在办不办大学问题上，他的立场有所松动。但却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坚持不办文科大学。

5、降低大学门槛。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

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主管教育部门在恢复大学教育时，以选拔、推荐制取代升学考试制，选拔和推荐工农兵中的高、初中生入校，兼顾少数小学毕业生。以选拔、推荐制取代升学考试制后，迅速引发了以权、钱、性贿赂的“走后门”风潮。据报导，浙江大学因招收了一对父女而名扬天下，一时间，“父女同上一所大学”传为“佳话”。

6、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与“五七”干校同样，阶级斗争和参加劳动已成了全国大、中、小学的两门主课。有篇报导说：**“1971年春，四川成都、重庆两市先后动员初中毕业生41,068人到云南边疆‘插场’，年龄最大十八岁，最小十四岁。”“这些知青是该省在‘文革’中培养的首批初中生。他们大多于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从而实现了由学生到知识分子的‘飞跃’，达到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标准。**”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文化课被边缘化。**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的自杀，也是文化课被边缘化的结果**。

显而易见，毛泽东心目中的学校，是既要少花钱、又要少读书、还要多务农、那种“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的农耕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农耕思想指导下的“教育革命”，在抑制提高教育的同时，使普及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据统计：全国普通中学的数量，从1956年的6,715所，到1958年已达28,931所，猛增4.3倍；中学生数从1956年的516万，增至1958年的852万，猛增65%。据笔者观察，全国2.6万多个人民公社，几乎每社都建有一所初级中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简陋小学，每个农场的生产队，都有一个不分班级由一个教师授课的小学。小学老师多数是亦工亦农的代课老师（后称民办教师），其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显然，这种普及是以抑制提高即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的，符合**“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说教；这种低质量的普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但这种高普及率却是毛泽东引以自豪的。

“教育革命”任务之三是压缩教育经费、抑制学校的发展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抑制多元、镇压自由的“教育革命”，其必然选择是压缩教育经费、遏制高等学校的发展。

“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五十年代，他们通过宣传机器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大办教育”**的道理。1954年，《中国青年》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一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官员的声音：**“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自此，压缩教育经费、抑制学校的发展有了“理论”根据。

据《经济问题》1983年报导：我国目前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9美元，而八年前的1975

年，美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已达 471.42 美元，日本也已达 247.74 美元。又据《当代财经》1986 年报导：日本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年中，教育经费增加了十倍；1971 年，日本的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开支的 20.4%，而那一年，我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家总预算开支的 4.5%。又据《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报导：1975 年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 6.2%，法国为 5.6%，日本为 5.5%，中国仅为 1.8%。又据《新京报》2007 年报导：1950 年～1980 年，日本教育经费占 GDP5%以上，中国的台湾占 4%以上，大陆到 1999 年，才占 2.79%。尽管我国教育经费少得可怜，但在 1962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必须坚决”“缩小文教规模”**的决定。《决定》要求**“文教队伍的精减，主要地应当放在今年暑假期内进行，今年寒假或者明年暑假扫尾。”**《决定》还规定，**“国家办的中、小学可以转一批为社办公助或者民办公助”**，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

总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 1.5%～3.0%之间徘徊，始终处于世界下游，教育水平处于“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低层次上，高等学校受到重创，许多地方的小学教育处于扫盲水平上。这种符合**“书读得越多越蠢”**理论的教育现状，与“六亿人民尽舜尧”的泱泱大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教育思想有了积极的变化。整顿了学校秩序，重视高等教育，恢复了高考，特别是 1986 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使没有保障的“基础教育”，转变为有法律保障的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制，确立了分级办学体制，基本上采用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生源、教育资金来源都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但由于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书读得越多越蠢”等反智主义没有得到清算，“新”的教育思想没能摆脱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束缚，仍然坚持在低投入条件下实施教育。

据报导：1994 年，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在世界 155 个国家中，名列第 149 位，位居非洲穷国乌干达之后。又据报导，2003 年 9 月 9 日至 21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考察结束，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2%，而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 53%，剩下的 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据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5 年的统计资料：1992 年，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为 109.76 亿美元，同期，美国投入 3145.76 亿美元，日本投入 1649.54 亿美元，德国投入 925.11 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投入的绝对值，只占美国的 3.5%，占日本的 6.7%，占德国的 11.9%，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按人均计算，则差距更大。2005 年 1 月，《中国经济时报》透露：**“城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承担，而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承担。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 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 9%，省地负担约 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 2%。”**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普及是在压抑提高条件下的普及，那么，邓小平时代的提高则是在降低普及率条件下的提高。因为，在教育经费低投入的条件下，提高与普及不可能兼得。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主人们，在改变毛泽东压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却使普及教育付出了代价。

一位经济学硕士、曾当过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因他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上书朱榕基总理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名，成为“中

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2005 年 5 月 24 日，凤凰网发表了他的“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一文。文中说：**“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 20 多块钱，35 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 100 多，中学 1000 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 100 元、几百元不等。……我计算了一下，从 85 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 7 倍。以稻谷为例，85 年的价格 0.095 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 0.6-0.7 元，以前是 0.4-0.5 元。算涨了 7 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 7 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又据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 2010 年 9 月 4 日报导，孟津县一些农村中学缺少桌凳，麻屯二中学生自带桌凳上学，有的学校则要学生拿 70 元购买桌凳。教育经费的低投入使教育普及付出了代价，农民是其代价的主要承担者，而**宁夏同心县无钱上学的马燕，就是这种代价的受害者**。

中共新主人们在教育上的提高，是在降低普及率条件下的提高，又是在抑制多元、镇压自由的“教育革命”思想基础上的提高。他们做到的仅仅是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名为“教育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但人们都很清楚，无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都是为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服务：他们任命的学校书记和校长，很少有真正的教育家，大多都是为这种统治权力服务的政治工作者。

二元化的畸形经济和低投入的畸形教育，相辅相成，催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促成了其运动的畸形化。

附 1、四项基本原则：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四项基本原则是：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3、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8-上山下乡：中国特有的畸形运动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和中共打造的二元畸形经济和畸形教育，其目的是巩固一党独裁的专政权力。全面供给的“福利型”城市与自给自足的贫困型农村相对立，滞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一步步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过程中，畸形经济不可能为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在低投入条件下的畸形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批接一批失学、辍学的失业大军。

在农村，1957～1977 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 11%，人口却增加了 47%。1978 年，中国大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0.013 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 0.7 公顷，印度是 1 公顷，美国是 48 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

动力，根本不需要增加劳动力，特别是增加外来劳动力。但在毛泽东和中共眼里，农村能大能小，伸缩自如，失学、辍学的农村青年可以自动消化在人民公社里，做到自食其力。因为，一个公社多个千儿八百人，即使农民生活受些影响也无关大局，用不着国家操心。为了安抚回乡知识青年，使他们安心农业劳动，善于构造美丽谎言的毛泽东，大笔一挥，便赋予贫困农村一个“光荣”使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城市则大不一样。在那里，所有资源（包括理发、修鞋）都控制在政府手里，市民的衣、食、住、行、医疗、上学和劳动就业，都在政府计划管理之列。因此，城市里失学、辍学即失业的知识青年，无法做到自食其力：除了依靠政府外，别无选择。

但在畸形经济体制下，特别是三年人为灾难后，政府既拿不出钱多办学校来扩招，也没有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据统计，政府无力安排的失业青少年，每年大约有 150～300 万左右。毛泽东和中共清楚地意识到，留在城市里的失业青年，不仅增加政府负担，特别是粮油供应，更是股潜在的动乱势力。因此，为了确保城市稳定，减轻城市负担，有计划地把城市中潜在的动乱势力，驱赶到能大能小、伸缩自如的人民公社里，也就是把政府无法安排的城市失业学生的就业压力，转嫁给农民，变相地向农民征收“知青税”，就成了中共的最佳选择。于是，1963 年 10 月，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把安置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为十五年不变的长期政策。从此，强权干预城市知识青年迁徙和就业自由的上山下乡政策，便成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既定国策。

为了使下乡知青及其家长对他们的侵权政策“口服心服”，“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把驱赶城市青年学生下乡提高到**“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政治高度。天才的毛泽东尽情发挥他的“理无常是”哲学，改变了他**“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思想，迅速向全国发出了城市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毛的“最高指示”，使“自私的、保守的、落后的”被教育者农民，瞬间变成了高明而先进的教育者。

但毛的**“再教育”**的“最高”谎言和周的**“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次高”骗语，都被副统帅林彪的亲信们在暗中揭穿。他们在秘密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一针见血地写道：**“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1、上山下乡运动简史

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上山下乡运动，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略)

2、“旧社会”阳光就业模式

失业问题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都存在。解决失业者的劳动就业问题，无论是在厂矿务工就业，还是下乡务农就业，都是任何政府不容忽视的重要民生问题。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就业模式。

在满清时期，清廷为了改善贫苦汉民的生计，曾下令**“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田，永准为业**。”并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加以实施。他们发给流民口粮、种子、农具等，“所招民，每名给月粮一斗，每地一垧（笔者：在东北合十五市亩）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 对领头人，按招来流民的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在**利益驱动**下，“燕鲁

穷氓闻风踵至”。光绪年间，清廷还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方式，奖励内地流民移垦东北。所谓流民，指来自关内的汉族贫苦农民和失业市民，人口学上称之为“自愿移民”。

辛亥革命后，东北平原正式放荒，国民政府鼓励关内贫苦农民和失业市民到那里垦荒谋生。由于政策优厚，农垦公司也发展起来，到民国二十年（1931 年），各类垦牧公司已达 24 家。他们也在华北各省招募大量流民垦荒。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民国时期的三十八年中，仅“闯关东”的山东人，平均每年达 48 万人之多，总数超过 1,830 万，是有史以来山东人“闯关东”的最高峰。对此，有人著文说，文革 10 年中，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累计达 1,700 万人。1,700 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笔者认为，这话不假。相比之下，一个山东省，便迁移 1,800 多万，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不同的是，前者是政府驱赶，后者是利益驱动，因而，两者后果大不相同。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民国新贵，看到吉林乾安县水草丰茂，土地肥沃，人烟稀少，是放牧、垦荒的理想地方，所以也来此开荒占草。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以及他手下军政要员、名绅显贵，都闻风而至，各显神通：“跑巴占地”，“招工开垦”。据记载，流民在迁移过程中，大多是以小家庭方式进行的。笔者初配到北大荒，落脚于宝清县东约百余里的东岗村。那是个有 30 多户人家的小村，祖辈多是山东移民，仅有一户来自于安徽。他们把山东移民领头人“老把头”视为神仙，每次入山前辄祭之。谣曰：**“山东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三天吃了个喇喇蛄，你说焦心不焦心。要是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据他们说，早先在民国、伪满和“解放”初期，他们都很富裕：冬天，他们赶着爬犁(雪橇)到宝清县城，花上几百块，把一年的油、盐、醋、酒、布匹、煤油、火柴等生活日用品和犁、锄、镰、锹等生产工具，一次全买回家来。土改、合作化以后，再也没有那么风光了。

在伪满时期，在利益驱动下，日本满铁旗下的满洲拓荒团，招募日本贫苦农民来东北拓荒，由于拓荒人员在中国水土不服，在东北生活异常艰苦。日本移民的困境被媒体曝光后，导致**陆相、关东军司令和满铁总裁被撤**。（使日本鬼子望尘莫及的是：毛的上山下乡运动，虽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毛和中共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新任总裁改变策略，直接到山东招募移民。据《闯关东》一书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大肆征集山东劳力输入东北，供其所用。……于是在抗战爆发后的两三年间，又出现了山东民国年间的第二次移民高潮**。”笔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见过一个 1940 年从山东“流”到伪满日统区吉林辽源、又在利益驱动下“流”到宁安的家庭。这个家庭相对殷实，五十多岁的主人，曾是种植水稻的能手。

在新疆、广西等省，也有类似于东北的垦荒行动。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国家领导人都面临增加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办法是采取有效措施，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尽管他们刺激经济的政策各有不同，但不论是发达国家，或着是发展中国家，均未见有强制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务农的记录。

由此可见，“旧社会”流民下乡垦荒是建立在“利益驱动”即建立在官民互动、劳资两利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官民互动”，是官方通过安置流民来增加财政收入，流民则通过官方的垦荒政策来脱贫致富；所谓“劳资两利”，是资方依靠官方垦殖政策，通过投资、招募和管理，使劳方的劳有所值，生计有所保障，从而确保利润达到最大限度。因此，那时的就业基本上是自愿的，是贫苦农民、市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失业者对就

业的选择基本上也是自由，尽管他们的选择有时是无奈的。“旧社会”这种功利性的“利益驱动”或“自由选择”，都是建立在为“**自己的利益**”基础之上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对自己奉献最多的人，就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因此，这种建立在“利益驱动”“自由选择”基础上的移民就业，是不可能发生“大返城”的。

“解放”初期，在农业尚没有合作化时，中共用“利益驱动”动员上山下乡的方式来安排就业，是无可厚非的。但当农业实行合作化后，集体主义或曰官僚特权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亦即“无私奉献”取代了“利益驱动”，以安排劳动就业为目的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变成了用行政命令来强行驱赶，因而，使运动呈现畸形发展态势。

3、动员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模式

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是依靠强大的政治宣传机器，运用党、政、军、民、学的全部专政权力，以谎言加压力的手段，迫使家长就范，不得不让他们的子女——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学生，远离家乡，到边远农村去当农民。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说：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措施**”，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而且可以“**保证国家永不变修，党不变色**”。在这些高级谎言之后，便是威胁：下不下乡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是“**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当上山下乡运动被拔到“**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高度时，在剑拔弩张面前，谁也不敢“不革命”，更不敢“反革命”，知青和家长，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多年以后，当人们回忆起当年的宣传动员情景时，有人还心有余悸地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民战争”。（右图）



再见吧天津！再见吧妈妈！

《安大史学》第二辑，发表了安徽大学历史系**贾艳敏**的文章《**“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动员**》。文章以动员“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为例，记述了中共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笔者摘抄如下：**

“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社会动员，全国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设置组织机构，提高政治认识。上山下乡工作是全社会的事情，就动员工作来说，几乎涉及到各个单位。革委会进行全面领导，革委会之下，各地设立了名称不同、权力范围不一的机构具体负责。如 1968 年 4 月，北京市革委会把政治组、计划组、文教组、军政训练指挥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毕业生分配小组。之后，革委会又在市、区两级机构中设立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上山下乡工作。其他省、市也陆续恢复、建立了组织机构主抓上山下乡工作。

（2）宣传发动。组织机构建立后，新闻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充满政治色彩的宣传，在当时的各类报刊上随处可见：**“毕业分配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毕业分配工作，首先是严肃的政治思想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是检验知识青年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作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不单纯是为了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而是贯彻不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用什么思想办校，举什么**

旗，走什么路，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大问题”；“毕业生分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千百万青年前途的大事，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事，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大事”，等等。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到了如此的政治高度，做动员工作时便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给不予配合的人被扣上吓人的政治帽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68 年 4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批转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在分配工作中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原则。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而且有中、小学。”**这就是说，“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也适用于中、小学毕业生。（笔者：连小学毕业生——童工也不放过！）“四个面向”的原则公布以后，各地加强了宣传力度。

1968 年 12 月 22 日，在知青运动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和各省、市、自治区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著名的指示**。顿时全国雷动，各大城市、中小城镇的知识青年掀起了向农村去的新高潮。许多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学习讨论，制订落实措施。不少革委会当晚发出通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有些地区召开了几万、几十万人的动员大会，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新高潮。各地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连夜召开大会，向师生宣传指示。各部队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城乡，把“指示”宣传到家家户户。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南京等省市的许多工厂、学校、机关的宣传队，连续宣传达十小时之久，他们逢门必进，每户必到，一夜之间就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3）组织“大批判”。所谓“大批判”，一是指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是指批斗本地所谓破坏上山下乡工作的“反动”分子。在批判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公私溶化论”、“下乡镀金论”、“吃小亏，占大便宜”时，上牵下连的方式，即所谓的对准“活靶子”，挂上“黑主子”。上海市多家中学揪斗了一个散布“到农村吃大亏，没有前途”的“反动谬论”的资本家。并且在全校掀起了一个大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南京市四中有一个右派教师，阻止女儿到农村去，四中的师生组织了现场批斗会。南京市东方红区（今下关区）针对两个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举办了 26 场批斗会，参加批斗会的有 20,000 多人。各单位都组织了“大批判”，用“大批判”贯穿动员工作的始终。据当时称，通过“大批判”，打击了“敌人”，提高了“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展开。

（4）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8 年 2 月初，毛泽东发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上得到解决”**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开始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上山下乡问题。学习班的主要形式有：1、学校办毕业生的学习班；2、工矿、企事业单位及街道办家长的学习班；3、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三结合或四结合的学习班。南京市举办的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市，据不完全统计，仅栖霞区就办了 6,000 多个学习班，150,000 多人次参加。有的还办起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海市虹口区体育学校 66 届毕业生**唐燕华**，家人对上山下乡有抵触，通过多次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打通”了家人的思想。北京三十四中的**田淑华**本不愿意下乡，但身为北京市二十四商店革委会委员的父亲和街道居委会主任的母亲，为她举办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使她走上下乡之路。总之，哪里有阻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办到哪里。

（5）知青典型谈体会，现身说法。“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公布以后，为了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文革”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再一次现身说法，充当动员老三届知青下乡动员的**工具**。

邢燕子，全国最著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之一。1968 年 5 月 14 日，《文汇报》刊登了邢燕子的题为《一辈子做贫下中农的“老黄牛”》的文章（**这时邢燕子已经是河北省革委会委员了**），文中谈了自己下乡后的体会、收获、得到的荣誉以及坚定在农村的决心。7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在头版发表了邢燕子的《农村十年》的文章。文章不仅写了在农村劳动的情况，还以单独的标题写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以及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批判，再次表明在农村扎根的决心。**侯隽**，“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另一个典型。1968 年 5 月 14 日，《文汇报》发表了**已经是河北省革委会常委的侯隽**的《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文章，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坚定在农村的决心。1968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侯隽的《在广阔天地里，前进》的文章，谈及了自己在农村磨炼成一个“铁姑娘”的过程和农村阶级斗争。文章最后发出了号召：“几年的农村战斗生活锻炼了我，我深深感到：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光明大道，这是我们知识青年革命化、劳动化的必由之路。”**蔡立坚**，“文革”期间树立的知青典型。1968 年 7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报道。报道介绍了蔡立坚到农村的经过。在她的带动下，蔡立坚的母校——长辛店铁路中学的许多同学纷纷要求上山下乡；在她下乡的地方——榆次一中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也纷纷来到杜家山落户。

在那个缺乏理智的狂热年代里，先进典型人物具有不可估量的号召力。先进典型自己的现身说法和报刊的报道宣传，对处于“文革”疯狂时期的“老三届”毕业生的下乡动员，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6）学生骨干带头，干部家长领先。“老三届”毕业生经过了两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出现了许多红卫兵积极分子，这次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仍然走在了前列。北京市首批下乡的**曲折**等人即属“文革”中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据《文汇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报道，甘肃兰州市最近到农村落户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青年中，“**许多学校担任革委会和红卫兵组织负责工作的毕业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头到农村安家落户**。”这些红卫兵积极分子率先下乡，带动了一批毕业生。

周恩来和董必武送子女下乡的故事，在当时广为传诵。不仅仅是高层领导干部带头，各单位各部门的干部家长也率先送子女下乡。各单位都树立了一些家长典型，他们带动了大批处于观望中的家长。

由此可见，中共动员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模式，就是**谎言加压力**。高层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下乡的故事”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子女都是下乡镀金者，也是他们借以抛出的诱饵。一旦领导干部子女镀金完毕，飞回城市，被诱下乡的其他出身的知青，特别是弱势群体家庭出身的知青，只能听天由命了。

在动员中，知青典型人物的“**现身说法**”，属托儿，最具蛊惑性！

59-典型：无悔者、红托儿、忏悔者

作者 于松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列宁的名言。但笔者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马列主义者认为：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同榜样一样，典型是旗帜，是力量，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代表性对普遍性的反映。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这种理论可以有它的一席之地。但当主观能动性被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们任意剖解后，自然规律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发生了诡变：他们把他们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论证”成自然规律的反映，如共产乌托邦、“五七指示”等；他们还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在他们发动旨在实现其某种政治目的的历次群众运动中，都把能代表他们意志的方向、凝聚某些力量的典型，乔装模型化、“驯服工具”化和**红色托儿化**。

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家们，大多都是主观能动主义者，也都是搞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制造真假搀和的政治典型上，游刃有余。他们明白，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社会里，用活的政治典型说教来发动群众，远比抽象的理论说教更生动、更实际，因而也更管用。他们知道，尽管这些“先进”典型不是自然形成的，但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用精神的和物资的双重激励，来对典型加以栽培。对于这种公开的非法的造假行动，量也没人敢说“不”。他们清楚，一个普通人一旦成了典型后，就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和要求发展、成型，还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和要求甘当红托儿——对老百姓进行言传身教：向我学习吧，你也会得到我所得到的一切。例如，首都钢铁公司热处理工程师**谭向前**，是当年插场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高中六六级知青。文革后，他有所忏悔，说1971 年，他受党组织指派，在成都、重庆等地先后现身讲用半年时间，作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省的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家们坚信，在“舆论一律”的环境里，当典型在芸芸众生的身边时，必将发生连锁反应：一而十、点而面，相互感染、竞相仿效，使典型普及化，从而达到他们预定的政治目的。因此，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经济运动中，他们在用真假搀和的政治典型来发动群众上，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而且屡试不爽。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和中共打造了**王国藩、徐建春**等一系列政治典型，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把六亿农民拖进了共同贫穷而无法自给的深渊。典型人物当红托儿的**丑陋**不可忽视。直到 1978 年凤阳 18 户农民揭“书”而起，带头埋葬了人民公社和合作化，才终止了典型人物的红托儿功能。但这丝毫无损于典型人物的既得利益。例如：合作化和回乡知青双料典型小学毕业生徐建春，当典型后，不仅前后上了七年大学，还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其中担任山东省人大副主任一职，长达近 20 年，直到在省府济南市退休。七十年代后期，她曾对人说：**“我这一生，10 年在基层，10 年干共青团工作，还有 10 年干人大工作。”**据统计，她从 15 岁回乡务农到 63 岁退休的 40 多年中，在农村务农时间不足 1/5。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毛泽东和中共如法炮制，树立了一批真假搀和的政治典型，如**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赵耘、曲折、柴春泽，**等等，让他们去说服广大城市知识青年走他们下乡务农之路，结果把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拖进苦难中。典型人物当红托儿的**丑行**不可忘却。笔者考察了这些典型人物的发展和归宿：他们下乡务农的动机虽各不相同，但下乡镀金却是不谋而合；通过曲线发展，有的曾当过中共中央委员，任过国务院高官，有的当过天津市委书记或各级官僚；他们中没有一个兑现过他们下乡时曾高呼过的“扎根农村”、“一辈子做贫下中农的‘老黄牛’”的誓言；他们的后代也没有一个下乡当农民；他们的归宿令人羡慕，许多是带着县处级以上待遇，退休于都市里，成了名符其实的知青贵族。由于这些典

型人物都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既得利益者，因而都是无悔者。

在无悔者中，也存在着一批非托儿无悔者。他们在逆境中奋斗，通过自我努力，打造出一番天地，成为作家、学者、企业家等等。他们是值得尊重的无悔者。

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的三十年间，一批以典型人物为主的无悔者活跃于政坛，他们先后云集于南京、厦门等地，继续为上山下乡呐喊鼓噪，扬言上山下乡**“方向正确”**，誓言**“青春无悔”**，高喊**“岁月蹉跎，英年献身黄土地。悔不悔？不悔！”**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又在天津市策划创建“中国知青村”，要正式为上山下乡运动树碑立传。据报导，这批知名的知青活动家都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大多是既得利益的知青贵族。**他们是：**

1、听党话的邢燕子

在天津市一个居民小区的 90 平米单元房内，住着一对退休的老年夫妇。每天，老夫妇领着“没她不行”的小孙子，悠然自得地徜徉于居民小区的四周。老夫妇男的叫**王学芝**，是个退休工人，女的是退休于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的大名鼎鼎的全国知识青年的偶像、全国人民的楷模——**邢燕子**。这位全国人民的楷模，曾两度登上《人民画报》封面，毛泽东五次、周恩来十三次接见过她，她曾当选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党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同时还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此外，她还在贫协、知青办、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兼职。由于同时身获十六个官衔，被当地群众赠以雅号**“邢十六”**。

邢燕子生于 1941 年 1 月 15 日，天津市宝坻县人。1958 年，17 岁的她初中毕业时，适逢我国正在疯狂大跃进中。她自愿留在农村老家司家庄，没到天津同父母住在一起。2009 年 8 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她时，她说：**“当时全家 20 几口人都在天津，只有爷爷一个人留在老家，最初的想法是回家陪爷爷。”“我没想那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就给闹大了。”**怎么“就给闹大了”呢？

1958 年到 1961 年间，为逃避饥荒，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成为“盲流”，造成严重社会问题。1960 年初，笔者路经沈阳车站时，曾做短暂停留。在那里，几天前，车站数百“盲流”暴动，砸碎了车站所有食品商店的橱窗，洗劫了全部食品。防暴部队的防暴方式，令人刮目相看：在逮捕了所有肇事者之后，让他们饱餐了一顿，然后分别遣送他们回乡。为了战胜困难，鼓舞士气，中共急需树立一个**“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来激励全国人民，制止“盲流”。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1960 年 6 月，邢燕子被挖掘了出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导了邢燕子回乡务农、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很快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8 月 15 日，《河北日报》以《邢燕子大办农业范例》套红标题，报导了她的事迹；8 月 17 日，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妇联发出《在全省青年、妇女中展开学习邢燕子运动》的通知；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发出“学习邢燕子、赶上邢燕子、热爱农业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掀起了学习热潮；9 月 20 日，《人民日报》也介绍了她的事迹。其后，《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纸和电台、杂志，纷纷报导，在全国掀起一个空前的宣传声势，一下子把她推到了峰巅，使她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9 月 18 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推波助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诗《邢燕子歌》：**“邢燕子，好榜样！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园中育幼幼成行，冰上治鱼鱼满网，天寒地冻，抢种垦荒，要使石头长出粮。**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切工作服从党。北大洼变成金银窝，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邢燕子，榜样好！青春献农村，青春永不老。一马能当先，万马齐赛跑。立下雄心天样高，鼓足干劲风力饱。克勤克俭，有说有笑，能把劳动当成宝。为国为社多打粮，国好社好大家好。司家庄变成鱼米乡，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长江！”著名作曲家刘炽为其谱曲，不久就唱响了全国。

为了把邢燕子塑造成“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典型，在“中央首长”们的关怀下，中共各级党政机关和媒体，全力以赴地组织“秀才”们进行编导。编导把“回家陪爷爷”的最初想法，拔高改成“**青年都应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听党的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要看实际行动，农业这么重要，农村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在改天换地上，编导说，为了度过灾荒，她组织16个女团员，成立了“姑娘队”。姑娘队在她的带领下，“**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打苇帘子，3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900多元钱**。”“**当时最为艰苦的农活就是堆‘土牛’，因司家庄地势低洼，必须到百米开外的地方取土堆成土方运到河堤备汛期之用，对男劳力都是重体力活，可是她带领姑娘队顶着阴雨每天完成70立方米土方**（笔者：每人每天4.375立方米），**比规定多完成20立方米，人们都对姑娘队刮目相看**。”“**为了向荒洼要粮……1960年冬，她们又开垦了560亩荒地**（笔者：每个姑娘开荒35亩。按冬季农闲60～70天计，平均每天开荒0.54亩。），**费尽了千辛万苦几经周折，秋后多收了8万斤小麦，既支援了国家，也为乡亲度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笔者无权到司家庄进行实地调查，因而无权对编导事迹说三道四。但笔者在农村十二年，也多次干过开荒、挖土方、用冰镩凿窟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比燕子大六岁的笔者，当年已是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要完成邢燕子“姑娘队”的土方定额，不下十二分力气，就很难完成。假如，当年她们那里特别富裕，有机械手、胶轮车帮助，就权当别论了。之于每日开荒0.54亩，笔者虽是一个壮小伙子，也望荒兴叹，只好承认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者也！但据笔者所知，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干部是不会轻易让年轻姑娘们干的，尽管有毛泽东“**革命加拼命**”的指示。编导们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是党的喉舌、宣传员，也是党的政策推销员，由于撒谎不红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红托儿。据2010年元月《北京青年报》刊登的《**邢燕子讲述：我这一生跟说笑话似的**》文中透露，退休后的邢燕子这么说：“一直都写我们姑娘队‘冰上治鱼’的故事，在数九寒冬破冰捕鱼，其实，老王那时候就是生产队长,就是他领着我们去干活。镩冰窟窿是又得有技术又得有力气的活计，都是他们男同志干，**女同志弄不动**。”

邢燕子说：“**听党的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要看实际行动**。”这是真话。邢燕子成名后，写给她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多得装了几麻袋，其中不乏表达仰慕、爱慕之情的求爱信。在农村，女孩儿过了二十岁，再不谈婚论嫁，背后就会有闲言碎语。但对于一个刚刚树立起来的“**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典型来讲，邢燕子嫁给什么样的人，是关乎这个典型是否能够“站得住”的问题。党组织对此十分重视：为了使典型真正扎根农村，她必须嫁给本队的贫下中农。为此，党组织为她选择了配偶：要她嫁给生产队长王学芝。王队长虽比她年长七岁，且家里特穷，只有一间房子，他同父母和三个弟弟住在一起，如果结婚，父母和三个兄弟就得到外面借宿；但此人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又是共产党员，是党组织信得过的人。嫁不嫁？最初不太同意嫁给他的她，架不住“说服教育”，最终顶着父亲“不同意”的压力，与王学芝成亲。婚后生子，感情日笃，一直白头到老，成了“先结婚，后恋爱”的一代佳话。

在三年人为灾难中，邢燕子的典型事迹起到了稳定局势作用。中共党组织对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人，总是关爱有加的。于是，十六种官衔源源不断向她飞来，曾使她招架不住。退

休后她说：**“那时我还在宝坻，任职多，公社、地区、省，妇联、共青团、贫协、知青领导小组，不管什么都得兼一个职，最多的时候有十六个职务，开不完的会，参加不完的活动，感觉到非常紧张。那时候新华社写了个内参，周总理看了，当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只保留‘上一职和下一职’就是上职是天津市委书记，下职是司家庄党支部副书记。……我为啥只当副书记不当书记呢？我感觉，你天天出去开会，让人家在家里干吗呢？怎么来当这个家？所以我拼着命也没有当。”**

邢燕子对司家庄究竟有多大贡献，笔者了解得很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970 年，周恩来亲自批准，给司家庄 5 万元农用物资改造大洼地，这应记在大队支部副书记邢燕子的功劳簿里。5 万元对当年一个劳动工日只值一毛钱的司家庄人来说，可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足足等于一千五百多个壮汉子干一年的收入！1980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所加的“批语”中承认，对大寨这个“先进典型”，有些领导和部门**“……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周恩来是否属于“滥用职权”“欺骗舆论”的领导？

邢燕子是知恩报恩的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她的照片，被她放得大大的，端端正正地镶嵌在镜框里，隆隆重重地悬挂在她书房里。党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务农，她积极行动起来，以身示教，说服知青下乡。1968 年 5 月 14 日，《文汇报》刊登了她的题为《一辈子做贫下中农的“老黄牛”》的文章，谈了自己下乡后的体会、收获、得到的荣誉以及坚定在农村的决心。7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在头版发表了她的《农村十年》的文章，介绍了她在农村劳动的情况和农村的阶级斗争现状，再次表达了她在农村扎根的决心。在这里，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共推销员或曰红托儿的脚色。她的文章和她的言传身教，使她成了偶像，许多知青以她为榜样而下乡务农，据说到司家庄落户的知青就有二十多个。当听说知青大刮返城风时，她极力反对，向中央建议**“打退病退困退走后门不正之风”**。1979 年 8 月，她在国务院召开的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上，表示在农村**“要和千千万万只燕子继续展翅高飞”**。但她很快“飞”出了农村，“飞”进了天津，“飞”上了领导岗位。至此，她鲜有对“扎根农村”誓言之忏悔，却对自己扎根天津，颇有功成名就因而心安理得之欣然！

邢燕子也有失手的时候。毛泽东死时，她给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成了追查的对象，1981 年 40 岁时，被贬到生活条件比司家庄差得多的永新知青农场任党支部副书记。但胡耀邦的一句话解放了她：**“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她不是四人帮培养的。”**由是，爱唠叨**“那什么”**的她，应声升任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了知青贵族，直到退休。

退休后的邢燕子不甘寂寞，曾数次参加知青聚会；据说又出了一本新书，誓言**“青春无悔”**！

2、“不想醒”的侯隽

侯隽，女，1943 年生，原籍北京。1955 年夏天,12 岁的侯隽,在北京市的石驸马二小刚刚读完四年级,随母亲搬迁到京郊的良乡。在良乡，她就读于北京基建局子弟小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良乡中学。1962 年，她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务农，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良乡是北京市房山区的一个乡镇。因为地处北京远郊,居民中农民多于计划供应的市民。良乡中学是个面向农村的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劳动课也以农业为主。学校的实验园，不仅养鸡、鸭、猪,而且自己烧砖建校。良乡中学不放暑假,而是按农时放麦假和秋假，学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也特别多。据报导，在六年的中学校园里，侯隽这个城市里的姑娘，**“不仅与农民子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农业生产也比较熟悉。”**

1961 年末，鉴于饿殍遍野的教训，中共号召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被迫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允许农民拥有三分自留地，允许城市里的机关、企业、学校组织劳动力，到农村去开荒、种地、办农场，补充粮油计划供应之不足。中共的“修正主义”新政，很快见效，农民开始走出饥饿，农村也有了生机。在城镇里，除机关、企业、学校组织劳动力到农村去开荒、种地、办农场外，家庭人口多或子女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为了吃饱吃好，也纷纷下乡务农。在一个时期里，为了生存，到农村落户、寻找口粮或高价购买粮油，成了许多城市居民的重要选择。这是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现象。例如，北京知青**任友善**，自愿下乡到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他说：“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吃饱饭。”当年城市里每人一天 9 两粮食，他说：**“吃不饱啊，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来这儿当农民好歹是个工作，总比饿着强，就这么来了。”**

1962 年，良乡中学在毕业前的动员会上,校长号召同学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是准备升学,继续深造；一是向邢燕子学习,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良乡，那里城乡差别不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许多人为了吃饱吃好，纷纷下乡务农，因而，校长的号召没有遇到阻力。侯隽的父亲虽是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母亲是夜大老师，但家里有六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在国家号召和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事迹的感召下，她和她的同学**司福珍**，一拍即合，决定改变考大学的计划，自食其力,一块到司福珍土改时的家宝坻县窦家桥落户务农。下乡一个多月后，司福珍在蓟县与农村青年订婚，并在那里当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司福珍离去后，19 岁的侯隽备感孤单，曾想去条件较好的农场落户，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只好独自留在窦家桥。同时下乡的司、侯两位年轻姑娘，对自己未来所做出的不同选择，体现了人的自由本能。

一篇报告文学，改变了侯隽的命运。

1963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黄宗英**写了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侯隽**》，引起了轰动。由于背景了得，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河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报纸，纷纷应声发表多篇访问记和报导。天津地委紧紧跟上，很快做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侯隽这个上山下乡的典型，也很快被树立了起来，她的的名字迅速传入千家万户，成为当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精神符号。

一篇报告文学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原来文章的背景非同一般。1963 年 5 月，黄宗英在宝砥县采访时偶然发现了侯隽；正需树立知青下乡典型的周恩来总理，听了黄的汇报后，立即指示把文章写出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总理指示就是命令，于是，学习侯隽热潮由此掀了起来。

在作家的笔下，侯隽**“这姑娘，看上去，性格温和稳重。她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顶旧草帽，身个不高不矮，虽然不壮，倒也结结实实，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

的上衣，下边裤子膝盖上补着补钉，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我特别注意到她的脚胫乌黑光亮，肩上扛着锄头，左手还攥着一本《人民文学》和一张报纸……”作家借着姑娘的口吻说：“**打我一来，公社、队里干部和乡亲们都这么关心我，待我好，帮助我进步。可是我自己还一阵阵的安不下心，想去农场，总还是为自己想的多。我现在高低不走了，我舍不得离开窦桥。再说越是条件差，越能锻炼人，这儿也需要我**。”为了突出侯隽听党的话扎根窦家桥的决心，在作家的笔下，自由选择到蓟县农村落户的司福珍被讥为“小机灵”。作家借着一个农妇的嘴批评司福珍道：“**侯隽就是嘴太笨，翻过来倒过去只两句话：‘……你当初来的时候怎么说的，你当初怎么向老师和同学保证的’**。”在作家看来，侯隽坚持在窦家桥插队是听党的话，而司福珍到蓟县农村落户就是逃兵。这是当年遵命文学的逻辑。

在这里，作家可能忽略或有意隐瞒了一个严酷事实。曾在窦家桥插队的知青**王南海**，写了一篇《**与侯隽在一起插队的日子**》的回忆文章。文中披露：“清晨她和社员一起顶着星星出工，傍晚她又披着月光回家。开始时，自己做饭因不会烧柴锅，经常熏的两眼流泪，可火还是不着。水没烧开她就把贴饼子贴上，结果玉米面饼子变成了玉米粥（贴饼子应该等水烧开锅热后再贴）；粥开了，扑了出来，她用双手将锅盖死死按住，结果把手给烫了。当时村里还没通电，没有月光的晚上，伴随着她的只有黑暗和寂寞。当时任大队长和大队书记的张家两兄弟在村里横行霸道，吃喝拿占集体的财产，经常欺男霸女，如果有谁不从，那么在分口粮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扬场机扬出的两头粮食撮给你（在扬出的粮食中，离扬场机最近的粮食全是一些瘪子，离扬场机最远的粮食则搀杂了大量的沙子和石头，只有中间的粮食才是颗粒饱满的粮食），就这样还缺斤少两，广大社员敢怒不敢言。张家两兄弟当然不会放过侯隽，先是略施小恩，将侯隽每月 30 斤的口粮全部给成饱满的小麦（按说粗细粮应各占一半），还送上棉籽油，可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们发现侯隽并不同于他们搞到手的那些女人。于是，30 斤小麦的口粮变成了高粮、玉米，数量也减少到二十几斤，最后居然变成了十几斤发霉的白薯干。就这样张家二兄弟还不死心，晚上他们唆使村里的地赖子站在侯隽小土屋的门口，说下流话、脱了裤子向屋里撒尿。吓的侯隽用扁担顶住大门，用床单挡住窗户。”为了保护侯隽，司福珍派弟弟**司福玉**插队窦家桥，与侯隽相伴。为了使典型扎根农村，上级党组织曾有让侯隽嫁给农民的构想，但这个在中学“**与农民子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的侯隽，并不愿嫁给农民；不久，她选择了比她小两岁的保护者司福玉，几年后两人结为夫妇。笔者认为，一个年轻的姑娘，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站得住脚，也的确不容易。

当了典型后的侯隽，身价激增。在个人努力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64 年侯隽当选为河北省劳动模范，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从此，各种官衔源源不断地向她飞来。她先后曾任窦家桥村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宝坻县委副书记、天津团地委副书记、团市委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要职，还当选党的十大代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等，拥有大小十三种官衔，成了知青贵族。她同邢燕子“邢十六”一样，被当地群众赠以雅号“**侯十三**”。

1970 年，侯隽和司福玉先后取代张家兄弟，当上了窦家桥的正、副党支部书记，成了“再教育”者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开始了改变窦家桥落后面貌的生产建设。王南海在《**与侯隽在一起插队的日子**》中继续写道：“侯隽刚到窦家桥时，这里是当地有名的穷村，全劳力干一天活只挣 6 分钱，全村百十户人家，守着亩产不超百斤的一千多亩地，每到年底分红时各家分不到几个钱。如果赶上年成不好，就只能等着国家救济了。……倔犟的侯隽顶着压力，与村里的青年办起了夜校，把北京农大的优良种子播到窦家桥的田里，村西口也种下了两行

杨树，窦家桥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以后，渐渐地有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先是上面拨 10 万元,给窦家桥通了电。（笔者：对当年一个劳动日才值六分钱的窦家桥人来说，10 万元是个什么概念？那是相当于他们全村 15～20 年的全部收入！）当邻近村每亩只能施十来斤‘气肥’时，窦家桥的田里却可以施上足量的尿素。上级的特别关怀加上侯隽等人的艰苦奋斗，窦家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下来时，这里的亩产已超千斤，全劳力干一天活可以拿到 0.8 元。全村分成农业队、机务队、科技队、饲养队和副业队。窦家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侯隽也成为全国的知青模范。”

同邢燕子一样，侯隽也是个知恩报恩的人。在她的动员和说服下，前后有 17 名北京、天津的高中毕业生来到窦家桥插队。在知青绿叶的映衬下，侯隽这朵红花更加鲜艳夺目，引得上层大人物纷纷前来视察，如副总理纪登奎、陈永贵等。上行下效，中、下层官员也纷纷前去取经送宝。取什么经？送什么宝？在“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监控下，人们很难知其详情。但从毛、周氏人造典型的经验上得知，除周总理犒赏的 10 万元巨款外，官员们带着一些廉价的或免费试用的农机产品，来到窦家桥“取经送宝”的可能性也很大。不然，人们无法理解，当周围村屯亩产小麦才一二百斤的时候，窦家桥村却能独领风骚，亩产小麦千斤以上！发生巨大变化后开始富起来的窦家桥农民，毫无疑问会庆幸他们有了新的当家人——党支部书记侯隽；他们还会发自内心感激国家总理周恩来对典型的关怀，感激各级政要对典型的关照！

1976 年，侯隽的窦家桥进入了鼎盛时期，她也荣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进入省、部级干部序列，享受副军级待遇。但两声巨响，给这个典型划上了一个大问号。

北京知青**王志宽**与另一北京女知青谈恋爱，女方怀孕了。这在当年全国闻名的典型中，无疑是一个给先进抹黑的“丑闻”。在受到“不公开”的严厉批评后，两人想不开，当晚各怀揣一枚手榴弹拉响自杀：男死女重伤。为此，王南海写道：**“王志宽不是简单地殉情。我很难想象他死前的复杂心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典型集体的一名成员，他不能承受来自那个时代的压力**。”“那个时代的压力”是什么？当想到陈永贵领导昔阳创建大寨县时，曾使 139 人上吊、投水或跳崖自杀的不争事实，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毛、周人造典型的压力是多么巨大，又是多么可怕。

给侯隽和窦家桥这个典型划上句号的不是小人物王志宽的死，而是毛泽东死后，全国风起云涌的知青“大返城”。到 1984 年，肆虐几代知识青年、改变了一两千万个家庭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大返城”告终，而在运动中被权力制造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大都完成了中共和毛、周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结束了红托儿生涯！

但在“主旋律”制导下，当年，“返城风暴”没被彻底反思，今儿，红托儿卷土重来。侯隽不想结束她的历史使命。她是个无悔者，是一个在天津市宝坻区政协主席官位上退休的无悔者，更是一个“不想醒”的无悔者。2008 年 11 月，记者采访她时，她说：**“上山下乡代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又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下乡对于我们这些人，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我认为是值得的，我始终感到农村需要知识，需要人才。我就是为人民做了这么一点事。人家说我这梦还没醒呢。我说醒不过来，问题就是不想醒**（笑）。”

为了继续她的历史使命，2003 年初，“不想醒”的侯隽，同邢燕子、董加耕等几位老知青，在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窦家桥村开始筹建“中国知青村”，为上山下乡运动树碑立

传。在《关于中国知青村筹建工作的报告》中，侯隽说：**“邢燕子、董加耕等我们几个老知青，历来珍重知青特有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我们一向以为：知青情结就是一种平民情结，知青文化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完全可能而且应该与农业文化融为一体，为促进‘三农’发展服务。所以，我们决心以一生的积累为代价，筹建一个‘记录一代人情结、凝聚一代人精神、展示一代人风采、鼓舞一代人前进’的‘中国知青村’，并把它建成一个报国村、兴农村、文化村和生态村。”**在知青大请愿、大罢工、大卧轨、大绝食和1,500多知青向国务院农垦总局局长**赵凡**集体下跪的大跪求中，云南数万知青痛苦地发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呼唤，当年全国在乡务农的八百多万知青，纷纷起来响应，引发了全国性的返城风暴，这是什么**文化**？这是什么**精神**？“不想醒”的侯隽既不想看，也不愿听。对此，在讨论侯氏“中国知青村”时，一位老知青以**“路见不平”**的网名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要办‘知青村’、尤其是什么‘中国知青村’却不同了。过去你们代表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你们也没有办法；现在仍然要想着代表我们，还弄来这样精神，那样精神强加于人，就不对了。那就是你们太没有良知、责任和道德了。不要求你们忏悔，也不要求你们闭门思过，你们像那张铁生一样，踏踏实实做生意有什么不好，非要打那知青牌，还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又有一位老知青以“瞎溜达”的网名在“如歌的行板缺月”上写道：**“我相信将来会有中国知青村，但绝不会是侯隽们策划的这个。要是侯隽们良心发现，觉得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不少对不起知青也对不起百姓的事，打算用后半生的小尾巴赎赎罪，那就老老实实地去建设窦家桥吧。”**

上山下乡运动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是中国二元畸形经济的一个怪胎。从知青“大返城”中，人们清楚地看到，知青情结不是什么平民情结，而是**官员、既得利益者和知青贵族情结**，知青文化也决不是什么大众文化，而是**官府的谎言、愚弄和侵权文化**；如果像侯氏所说**“农村需要知识，需要人才”**的话，恰恰证明：政府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大力推进农村教育，而不是什么上山下乡。

遥想当年，被人民公社搞得穷途潦倒吃不上白馍馍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人，在反邓派的大人物支持下，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大反改革开放，轻而易举地从银行里搞到了数亿乃至十数亿“贷款”，把不足千人的小小南街村，打扮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天堂；他们在为已被八亿农民唾弃了的人民公社扬幡招魂的同时，为大独裁者和他的乌托邦树碑立传，从而使南街村成了当今中国举国无双的畸形怪物。而今，侯隽想借南街村套路建什么“中国知青村”，他们能找到类同于南街村人的靠山吗？虽然他们得到了宝坻县政府的支持，但要像南街村那样轻而易举地搞到十几亿“贷款”，可能会因时过境迁而生明日黄花之叹；如果他们希求像四十年前当典型时那样，不用侯隽写《报告》，便能从国务院金库里拿走10万元巨款，恐怕那种特惠式的赏赐也会因星移斗转而远窦桥村。

3、曲线发展的曲折(略)

4、出卖父亲和他人的柴春泽(略)

5、红托儿群体——北大中文系七二级学生(略)

6、忏悔者

当众多无悔者在中共支持下招摇过市的时候，人们从新闻检查的疏露中，听到了一些忏

悔者的声音。

⑴、忏悔当过红托儿的谭向前。——他是首都钢铁公司热处理工程师。他忏悔说：

“我是高六六级北京知青，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当农工，后来调到水稻连当排长。一九七一年建设兵团大扩充，需要几名老知青用现身说法动员内地学生支边。我们团选中我。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用领导的话说，是一次考验，考验我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也就是是否让领导绝对放心。我是工人子弟，家里没有背景，我当然明白这次重任对我个人的前途意味着什么，我甚至已经意识到这个转折将对我一生的命运起作用……

“在四川，我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轮流到每一所中学给毕业生作报告，随心所欲地讲用，发挥想象力，用‘现身说法’打消同学顾虑，激发他们对边疆的好奇心和向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我是知青，并且来自伟大首都北京，所以那些成都学生对我的话几乎深信不疑。**我不敢说我的话每一句都是实话，但是我百分之百贯彻了领导意图**，我相信这样做是革命需要，是上山下乡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当然，我更清楚这是我改变自己命运前途的需要……

“我在成都、重庆先后讲用约半年时间，作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我承认自己的确隐瞒了一些阴暗面，一些不利于大好形势和上山下乡的东西，我的讲用报告客观上对同学起到蒙蔽作用，但是这并不是我的错。因为如果不是我也会有另外一个李向前或者王向前来讲用，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剧……”

谭向前因此荣立三等功一次，很快入了党，并提拔做了副连长。一九七三年推荐上大学，占领上层建筑。毕业后衣锦还乡，在首钢工作至今。

⑵、忏悔出卖过父母的郎晓菲——这位当今重庆市某机关干部、当年是北碚中学学生的郎晓菲沉痛地说：

“我有一个很光荣的家庭，父母都是革命干部。父亲参加八路军只有十六岁，就扛枪打日本，还负过三次伤，所以父亲一直是我心目中效仿的榜样。我从小的志向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做一个董存瑞黄继光或者刘胡兰那样的英雄。初中毕业，建设兵团来招兵，那年我正好十六岁，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参军无望，就决定到边疆去干一番事业。不料母亲赶来阻拦，父亲也不同意我离开重庆，理由是我是大姐，下面两个弟妹年龄尚小，需要我负起责任。当时我情绪很对立，认为父母自私，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我想你们当年不是背叛家庭出来干革命吗？为什么轮到你们自己做父母就那么保守，把女儿看做你们的私有财产？冲动之下，我毅然决然向校工宣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决心与家庭决裂，同父母的错误立场划清界限，到边疆去干一辈子革命。没想到这封公开信竟然被市革委当做典型材料印成铅字，后来又刊登在省报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一夜间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中学生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先进人物，反潮流的英雄。我由此很快入了团，到兵团又入了党，提了干……

“直到过了好几年，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

“父母因此受到批判，两个弟妹无人照料，只好由母亲带到干校生活。艰苦的生活损坏了小妹的健康，简陋的卫生条件又未能及时挽救她幼小的生命，她于次年春天患肺炎死在干校的土坯房里。两年后父亲也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病逝。临终前他一个劲儿念叨我的名字淌眼泪……

“我的家庭为我的冲动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将永远无法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郎晓菲直接参与一九七八年底橄榄坝农场那场有名的请愿风波，因而曾以“煽动闹事”受到过追究。

⑶、王冬梅忏悔当典型。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写道：

“1974 年，因率领 119 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文革’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曾多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对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在《被埋葬的青春梦》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会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 17 岁，1976 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 20 岁，1979 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 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60-无奈者和受难者

作者 于松然

这个始发于五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和“**一化三改造**”二元畸形经济的产物。在二元畸型经济体制

下，教育发展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因而不愿为发展教育增加投入。据教育部统计，仅 1955 年一年，全国就有 57 万中学毕业生和 236 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又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计有 1,200 万个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初中，200 多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在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里，辍学人数均在千万上下。在这种形势下，**“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参加生产”、“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做第一代新型农民”**和 1963 年制定的**“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长期战略，就成了中共和毛泽东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最佳”选择下，从 1968 年末到 1978 年的十年间，被“动员”出城镇的知青，就多达 1,700 万人。

在动员的**“做第一代新型农民”**中，到人民公社基层生产队里插队当农民的，约占下乡知青总数的 75～77%，到国营农场（兵团）基层生产队里插场当农工的，约占 23～25%。无论是插队当农民或者插场当农工，都是参加农业劳动，其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但在 1968 年到 1974 年 5 月的五六年间，因中共曾决定将农场改制成生产建设兵团（后又撤销兵团番号回归农场），插场知青因有过“兵团战士”的“荣誉称号”，曾使他们亢奋过一段时日。

1、“动员”下的无奈

⑴、回乡知青怨生不逢时（略）

⑵、下乡知青低层怨声

1963 年，由**杨兰春**编剧、**曾未之**执导的豫剧《**朝阳沟**》被搬上了影幕。1964 年元旦，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此剧并接见全体演员。这表明中央最高领导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全力支持，《朝阳沟》也因而风靡全国。该剧描述的是城市下乡知青**银环**扎根农村的故事。城镇高中毕业生银环，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与同学**拴保**一道回到拴保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劳动生产中，两人的爱情经受了考验：银环曾一度想回城、考大学，但在回乡知青拴保为代表的农民教育下，最终与栓保成婚，扎根农村。在编导者的笔下，以银环为代表的城市知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愚笨而可笑，因而必须下乡接受农民的教育。**请听拴保如何教银环学锄草：**

拴保：（唱）你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见银环又锄掉了根禾苗）又叫你把它判了死刑。

银环：（道白）这个锄不好使。

拴保：（道白）这不是锄的问题。

银环：（唱）看起来庄稼活非常简单，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难。两只手就不听自己使唤，挪一步一身汗东倒西偏。心有余力不足眼迟手慢……

拴保：（唱）勤劳动才能够突破这一关。

银环：（唱）唉！难呀，难呀难！

这段唱词体现了**“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思想。不仅如此，市民银环娘也要接受农民的教育。当她拉银环“马上离开这老山窝，快给我进城考大学”时，拴保唱道：

朝阳沟一年四季都开课，课堂大来老师多，你是学**造林**，你是学**治坡**，你是学**移山**，你是学**改河**？学斗争辨敌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天功课都不耽搁。

银环娘受教育后，翻然悔悟，也落户朝阳沟。在这里，编导们把堂堂皇皇的大学，变成了造林、治坡、移山和改河的农业劳动，从而把毛泽东农耕主义的“教育革命”思想，演绎到了令人咋舌的峰巅。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许多河南人——我可爱的家乡啊——还在津津有味地传唱《朝阳沟》！

对于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大多数知青来说，他们并不认同《朝阳沟》式的农民教育。到农村后，他们最为困惑、最难接受是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

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中学老师的信中说：“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

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1964 年 12 月 24 日，《新华日报》在一篇《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文章中透露，有个下乡知青说：“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

据报道：插队到内蒙草原上的知青，为了接受牧民的“再教育”，与牧民“相结合”，就要“插包”住进蒙古包里去。牧民本能地按照他们长期形成的习俗和观念来“教育”知青：男知青整天外出放牧，女知青如牧民妇女一般，成天待在蒙古包里烧茶、做饭、拉水、捡粪(牧区以干牛粪为燃料)、挤奶、缝缝补补。刚“插包”时十分热情的知青，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伟大领袖”要他们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示与现实不符，而与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的辉煌相比，天壤之别又使他们难以接受，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于是热情急剧下降，对“插包”兴趣索然，纷纷要求离开蒙古包。

笔者在农村生活十二年，对农村并不陌生。在中国，在各国，农村在经济、文化、政治建设上，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城市领导农村是自然法则的反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的“再教育”理论，是自然法则的忤逆，是历史趋势的反动，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教导，是句美丽的谎言。中国农村的确是个“广阔天地”，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集体主义被美化、神化、从而官僚权力化**，人皆有之的人类天性——自由、私有和个人主义被妖魔化，农民们由此被奴役，他们的智慧必然被约束在雇主和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官员许可的范围内，不可能自由发挥。因此，城市知青被驱赶到那里，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的作者**邓贤**，曾在云南边疆当插场知青七年。九十年代，他重返云南边疆，行程数千公里，采访收集了大量历史和个人资料。在“走向混沌”一章里，他记录了一些知青对政府驱赶他们下乡的**怨声**：

北京二龙路中学初六八级女生**铁卫红**说：

“‘一二二二’指示发表当晚，学校工宣队就连夜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工宣队长宣布：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年，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过元旦。我父母都是工人，文化不高，但是对执行最高指示可不含糊。学校一来人，父亲就当场表态：统统下乡，一个不留！这样，大姐去北大荒，二姐去内蒙古，我去云南。没想到后来大姐在北大荒受伤成了残废，二姐嫁了当地贫下中牧，只有我回了北京……十年，好长好长呵！”

参加橄榄坝农场抬尸游行的北京河北中学知青**瞿燕清**说：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右派，毛主席指示一下达，父亲根本不用学校来动员，主动替子女报名下乡。还打听哪里艰苦就报名去哪里，比工农家庭还积极。回到家里，父亲一下子搂着我们姐弟三人老泪纵横。父亲说：**‘不是我不想留住你们，是不敢哇！爹对不住你们**……’

“那一晚，**一家人哭成一团**，父亲一夜间白了许多头发。黑五类家庭本无出头之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咬咬牙，去了最偏远的云南边疆，姐姐去了山西，小弟去陕北插队。后来小弟永远没能回来，他死于一次意外车祸……

“我始终忘不了父亲那双被痛苦折磨的眼睛：惊惧，内疚，悔恨，悲哀……子女下乡不仅不能使他灵魂获得赎罪，反而增添沉重负担。他于一九七一年冬天死于肺病。”

“瞿玲仙事件”（1）目击者之一，上海知青**陈饶萍**说：

“阿拉（我）莫啥好讲，下乡那年**才十五岁**，一点点大。谁愿意下乡？莫办法哇。侬要不去，居委会婶婶大娘就天天来做动员，学毛主席语录，工宣队师傅把被盖搬到侬家里办学习班。阿拉父亲是干部，科长，单位就把他关起来住学习班，啥时辰子女下乡啥时辰放回家。侬想想，鸡犬不宁，一家人过啥光景生活？眼看躲不过去，姆妈哭着恳求阿拉：**囡囡就去锻炼两年吧，侬爹爹心脏有病，再办学习班就回不来啦**。阿拉咬咬牙，就去了云南。那些工宣队光骗人，说锻炼两年，阿拉一去就是整整十年……十年哪，比抗日战争还长两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上海崇明农场中学知青**从正平**说：

“阿拉这块是郊区，本身就是农场。一九六七年上山下乡，统统要去外地插队，阿拉有个姐姐，比阿拉大两岁，爹妈不放心，就跟学校工宣队商量，让阿拉顶替姐姐到边疆。男孩子，终归好办些。这样，姐姐照顾到本地农村插队，阿拉到云南支边。侬问阿拉有多大？告诉侬，那年阿拉小学才毕业，**整整十五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童工保护条例》……”

昆明五华中学知青**陈明忠**说：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开火车，牵引一列长龙般的车厢，在铁路上风驰电掣。想想看，那该多神气！文革时正好赶上初中毕业，砸碎旧的教育制度，大造反，大串联，炮轰火烧，想干什么干什么，别提有多痛快。可是一九六八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全傻了眼，原来造反造来造去，反而连农民都不如。没办法，铁路中专是考不成了，只好乖乖打被盖去边疆。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临下乡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学同学，外号叫耳朵。耳朵小时候跟人

打架，把耳朵拉掉一只，所以总爱戴顶护耳帽遮丑。耳朵没考上初中，在街道办事处当了几年社会青年，就分配到铁路上跑车。虽然不是开火车，可是穿上那身铁路制服，居然也神气十足。耳朵老远跟我打招呼：咱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往后蹭火车不用打票，包在哥们身上！把我给气得扭头就走。那小子还追着嚷嚷：别走啊哥们，啥时空了来铁路上聊聊……

“咱们有什么过错？不就白念了三年初中么？不读书的成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读书的反而要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这是哪门子王法？x 他妈，真叫人想不通！

“想不通也得下乡，只好怨自己生不逢时，怨知识分子晦气。没想到一去就是十年！x 他妈，青春也就耽误了，腰也坏了。回到城里，人家却拿咱们当废物，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术……

“你问我现在干什么？奶管站刷牛奶瓶。工作不累，一月工资带奖金能拿一百五。”

比起自杀和犯罪，陈明忠等人当属“幸运者”。据报导：1979 年 1～5 月，北京下乡知青待业者自杀 80 人，占全市自杀总数的 18%；齐齐哈尔市犯罪分子中，下乡知青待业者占三分之二。

在“主旋律”制导下的“青春无悔”的高歌声中，能听到这些低层的怨气和呻吟，应归公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翻墙软件的发展。

2、苦难重重（略）

3、女知青的可悲处境

在绝对权力下，脱离父母保护的女知青，成了农村权力腐败的牺牲品。

⑴、女知青遭奸污、猥亵的案件居高不下

毛泽东发动和周恩来领导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众多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知青和少量的十四岁的女知青，脱离了家长的保护，到穷乡僻壤的农村里去接受“再教育”。在“舆论一律”的时代里，她们受到的教育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她们看到的报纸、电影和听到的广播，共产党员个个都是慈祥的父亲和可敬的兄长。她们的知识和经验使她们不可能知道，在一党专政缺乏有效监督的社会里，离开家长的她们，身心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她们也不可能知道，在远离家乡的农村，特别是交通不便和人迹罕至的兵团山区，那里山高皇帝远，党的一、二把手就是个说一不二的小皇帝，她们最容易遭到性侵犯；她们更不可能知道，在“**慈祥的父亲和可敬的兄长**”中，竟隐藏着那么多对她们进行性骚扰、性侵犯的色狼。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截至 1973 年 5 月，在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发生的 2.3 万起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 70%。1967～1972 年，吉林省查出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 2,080 起，枪毙 22 人，判刑 508 人，多数是强奸女知青的罪犯。

在档案尘封、调查严控的情况下，笔者根据《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梦》等多部书所载的数据进行测算：**从 1968 年到 1973 年的五年间，全国各地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多达两万宗以上**，受害女知青可能高达三万人之多；而 1968 年以前和 1973 年以后，书中提供的资料多是零星的，残缺的，不具统计意义。由此，笔者粗略估计：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

末的十八九年间，各地奸污女知青案件可能不少于三万宗，受害女知青可能在五万人以上。例如：1968 年至 1973 年五年间，辽宁省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 2,200 多起，四川省发生 2,100 多起；在 1973～1976 年间，辽宁省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 1,130 起。又据报导：女知青遭奸污、猥亵的案件逐年递增。例如：在内蒙，1969 年发生 11 起，1970 年发生 54 起，1972 年增至 69 起；在广西，1969～1973 年初共发生 507 起，其中 1972 年就发生了 301 起。

1974 年的一天，云南建设兵团第十六团在河口县驻地召开公审大会。一大早，数千建设兵团战士（知青）在紧张气氛中集合起来，从各个连队出发，来到山坡下的公审大会会场。坡上十几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枪口都对准坡下会场。十几名现役军官被押到审判台上，个个低垂着头。几个武装战士们冲到台上，撕下了被审者头上的帽徽和军服上的领章。在简易主席台上，几位云南省军区的领导和军事法庭的负责人，脸色铁青地端坐在上面。在肃穆而紧张的气氛中，一位领导大声宣布了对十几个现役军官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罪行的判决。其中：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副参谋长奸污女知青八人，被判徒刑十六年；第四师第十六团保卫科长奸污女知青六人，被判徒刑六年；其他十几个奸污女知青的连长、政治指导员等军官，也获刑期不等的徒刑。最令在场人员哗然的是，一名现役连长，不但奸污了四名上海女知青，还与一条小母牛发生过性行为！

在兵团内，“再教育者”现役军人犯罪居多。据报导：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内蒙古建设兵团四师 34 团党委 6 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 4 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合伙奸污、猥亵数十名女知青；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先后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致残数人，奸污女知青达二十余人，猥亵侮辱者多达上百人；第一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等三名罪犯，奸污女知青数十人。张国良在任连长的三年里，**“几乎不动声色地奸污了几十名女知青”**。面对色狼，女知青们只有忍气吞声，不敢抗拒或揭发，因为“勾引、腐蚀现役军人”的罪名吓住了她们。因此，当听到有人喊**“连长来了”**时，她们就会被**“吓得簌簌发抖”**！袁、黄、李、蒋、张等七名现役军人，以奸污女知青罪，先后在各地被处决。

此外，在吉林省判处的 22 名死刑犯中，多数都是奸污女知青的罪犯；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祝江**就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还奸污其他妇女八人，甚至病妇一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现有资料上判断，领导干部以暴力强奸女知青的案例比较少见，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以权谋色**，即在上学、招工、返城、提干、入党入团、工种调换、病退困退、甚至请假、探亲等女知青关切的问题上，利用权力胁迫她们就范，或利用权力引诱她们进行性交换，从而达到占有她们的目的。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丰满诱人，她拒绝了连长的调戏，便被发配到二十里外的水渠口去开关闸门，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来回一次，半个月后她屈服了，给了连长一个暗示。连长陪她看了一天水闸，第二天她就被调回连队驻地的食堂工作。又如，1972 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时，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多女知青成了其中的幸运儿。但在上学前体检时，妇科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十多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处女膜处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显然，她们中，至少有人在关键时刻，请愿或不清愿地把贞操献给了权力。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一党专政下，领导干部以权谋色层出不穷，尤

以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为甚。

据云南省知青办第 14 期《情况反映》称：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 1969 年组建以来的五年中，发生奸污案 207 起，有 116 个现役军人以权谋色，其中，师级干部 4 人，团级 9 人，营级 31 人，连级 105 人，参谋干事 10 人，其他 7 人。其他兵团部分类同，部分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大量犯罪，民愤很大，且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迫使中共当局在 1975 年到 1976 年，先后撤消兵团建制，撤出全部现役军人，还原农场建制。

但也有不以为然者，贵州省毕节县大石碾村党支部书记**黄万全**是其中代表之一。作为曾经是兵团的“再教育”者之一，九十年代，有人采访过他，**《中国知青梦》的作者记录了他的几段发人深省的表白：**

“我是一九七四年提前复员的，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我今年五十三岁，十七岁参军，十九岁入党，二十一岁提干。祖辈三代贫农，档案清清白白，就是兵团那阵……犯了错误。现在想来叫人不甘心，干吗非犯那种错误？不然现在也许还留在部队，也许转业到城里工作。”

“一到兵团，我们这些戴领章帽徽的立刻身价百倍。在部队干部战士清一色，都是和尚。但是兵团不同。兵团是老百姓，城里来的知青男女都有，干部除了管生产，管生活，当然还要管知青‘再教育’。

“什么‘再教育’？说穿了，就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连队，干部大权在握，知青的命运捏在连长、指导员手里。有的连队只有一个现役干部，那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成全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打发另一个人下地狱，总之全凭你的个人好恶和意愿来定。

“兵团干部犯错误，多数栽在男女问题上。这种事，不大说得清究竟是谁的错，比如我，同一个女知青……发生关系，那是她主动。当然喽，她也得到好处。

“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她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可是等到事情暴露，就变成奸污……可是说到底，谁叫咱们那时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

“再教育”者黄万全们不会承认，正是毛的“再教育”和周的“移风易俗”谎言，为他们提供了以权谋色的平台；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真理，因而他们也不会怀疑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腐败本质。

⑵、诱婚、逼婚是对女知青进行性侵犯、性迫害的另一种形式

自从知青典型邢燕子一切听从党安排违心嫁给生产队长后，十多年来，中共利用全国传媒，坚持不渝地宣传教育女知青嫁给农民，并把这种缺乏感情的婚姻拔高到**“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和**“落实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高度，使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政治化，营造出了一种为革命献身的政治婚姻氛围。据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报告中披露，内蒙古哲盟(文革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他们大队插队时，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便高呼起“毛主席万岁”来。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 9 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利用职权进行“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

有 8 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一名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一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利用职权进行“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再教育”，诱迫了 3 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嫁给自己的儿子。上海知青来到新疆建设兵团后，女知青成了权力猎逐的目标。有干部公然提出**“兵团姑娘对内不对外”**的口号，限制女知青的婚姻自由。……

为了抵制诱婚、逼婚，又怕结了婚失去返城机会，许多知青们自动选择了同居。据云南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 年 10 月关于农场知青恋爱婚姻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橄榄坝农场（原四团）某分场，未婚同居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东风农场（原二团）某分场达百分之七十，其中，第八连未婚同居率为全农场之首，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勐养农场（原三团）某分场八连，上海知青六十人，全部未婚同居；某分场一连，六十一名知青，未婚生育九人，还有三十八名知青临时配对生活。

但插队知青没有插场知青那么幸运。据来自各地的报告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插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从而使诱婚、逼婚的侵犯人权行为恶性发展起来。由于这种变相性侵犯的丑恶行径，受到了女知青及其家长们的普遍反对和抵制，总理周恩来不得不以中共中央名义，在 1970 年 5 月 12 日下发 26 号文件，规定**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以示党对女知青的“无限关怀”。但到 1973 年，中共又签发中发 30 号文件，再次强调**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两次“严禁”的政治表演表明，在缺乏监督的一党专政体制下，诱婚、逼婚的性迫害行为，已经屡禁不止而积重难返了。之于总理的“无限关怀”，不过逢场作戏而已，女知青们别无选择，只能听天由命。据知情人披露，有数万计的女知青陷入“诱婚门”中而不能自拔。

⑶、女知青在灾难面前也是软弱无力的受害者

有资料显示，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971 年 3 月 24 日凌晨，驻保山地区的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房屋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过后，人们发现，来自四川成都市 39 中的十个女知青，是平均不到十七岁的初中生，在火灾中，她们**“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铸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为什么不往外跑呢？原来，她们来到这里，听说这里的女知青经常受到性骚扰；有时夜半，有些色狼竟敢潜入女知青集体宿舍里猎艳。为了防止色狼入侵，她们每天晚上，都要用八号铅丝把房门牢牢拧死。不幸的是，当大火来临时，慌乱中，她们没有找到钳子，无法打开房门；惊恐失措中的她们，紧紧搂抱在一起，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以痛苦的死亡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生涯！历史已记住了她们的姓名。她们是：**周金秀、李晓妮、晏啟芬、阮国清、范金凤、傅蓉碧、傅国秀、万禄秀、李观玉、施桂芬**。

1970 年 9 月 18 日，四师十八团第二十七连在开荒大战中，被一群毒蜂螫刺，300 多人受伤，患有妇科病身体虚弱的上海知青**翁佩华**，当场被螫死，十六岁的生命，终结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

一个来自四川的女知青**王友珍**，年方十七，身高 1.52 米，体重不及七十斤，弱不禁风，身体“瘦弱单薄，胸脯平板”，又不胜衣着，被男知青戏称为没有曲线的“三角板”。这样一个体质虚弱的姑娘，也竟有人忍心把她发配到边疆的深山老林中去接受“再教育”！一个

知青这样记录了她的不幸。一天，她照常肩扛着重约五十斤、长约六、七米的龙竹，走在石崖上的小路上。**“悠长的龙竹忽闪忽闪，富有弹性竹梢在石头上刮出一串悦耳的音波。”**不幸的是，**“在一个急弯下坡处，龙竹的一端重重戳在一块巨石上，巨大的反冲力把女知青瘦小的身躯弹起来，弹出小路。”**当人们听见他凄惨的叫声时，只见**“那个不幸的女知青，好像一只中弹的小鸟，翻滚着跌下几十米深的山涧去。”**当晚，人们打着火把在乱石堆里找到她时，王友珍**“已经变成一堆散了架的零件。”**她解脱了，香消玉碎使她匆匆走完了毛泽东的“再教育”和周恩来的“移风易俗”的全部路程。

据不完全统计，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各师团，每年无缘无故失踪的知青人数高达数十人，其中多数是女知青。例如：1971 年 9 月 22 日，成都十七岁的女知青**傅阳珍**，因发烧去团卫生队看病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1974 年 4 月，**上海十六岁的女知青**，雨夜上厕所时失踪，迄今找不到尸骨……

据悉，四川成都建川博物馆，已将远在他乡的火灾受难者——十名女知青墓碑及其档案运回成都，使受难者魂归故里。2009 年，由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设计的“粉焚”纪念碑，亮相博物馆。笔者热切盼望，各地出现更多的樊建川，让葬身他乡的知青，都能魂归故里！

4、六千知青胜利大逃亡

1967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发出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高指示”后，以道县为代表的湘南各县农村痞子、流氓无产者，迅速行动了起来。从 8 月 13 日起，他们对准“五类分子”、“可教子女”以及与他们有冤有仇者，大开杀戒，纷纷在一些大队里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使杀人“合法”化、速决化。在而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仅零陵地区就“依法”处决了 7,696 人，逼迫自杀 1,397 人。

枪杀。在屠杀风暴中，8 月 17 日，村子里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把屠刀对准了下乡知青。

在江永县城关简陋的饭店里，长沙知青**郅极**在与好友**柏明**约谈。刚从长沙回来的郅极，便听说道县杀人：不仅杀出身不好的人，还杀与干部有仇隙的；只要“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用土红笔往名字上一勾，就判“斩立决”，“犯人”家属就得到潇水河边收尸。在江永，他已嗅到了“杀气”，于是，他约柏明一块回长沙；但柏明却没有回去的意思。在长沙知青的眼里，二十二岁的柏明，素有诗人气质，长得有几分像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鬈发，连鬓角的头发都带卷，眼睛明亮，鼻梁直挺，嘴唇红润；尽管他从城市到农村已经三年了，仍然透出三分没有成熟的稚气。他慢条斯理地对郅极说：**“回长沙来去路费二十多元，你出一年工都赚不回来。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抓革命，促生产’蛮好……”**话音儿未落，只见四条农民汉子，身背大刀，手端鸟铳，**将他俩围起来**。

“谁叫柏明？”

“我。”柏明站起身来答道：“找我有什么事？”

“地主狗崽子柏明：**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你死刑！”只见一个鸟铳对准柏明的头，扣动板机，红光一闪，铁砂霰弹全部打进了那颗年轻的头颅；还没有还过神来的柏明，倒头栽在血泊中。

惊呆了的郅极和食客们，眼睁睁地看见四个刽子手，大摇大摆地离开饭店，扬长而去。

柏明被枪杀的消息迅速传遍江永县和道县，传到了数千名长沙知识青年心头。据统计，在六千多名长沙知青中，出身不好的占 84%。在红色恐怖的头几天里，已有几千知青逃离江永，他们通过道县——零陵——冷水滩这条线路，先坐汽车，再坐火车，辗转逃回长沙。大约还有两三千名知青，因种种原因而行动迟缓。如果说在谎言加红色恐怖的世界上还有一些知青抱有希望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零陵前进人民公社，一车知青惨遭农民袭击，**何晓明**等九个知青当场死亡。

何晓明等知青的死亡，使行动迟缓的知青，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

卧轨。在道县，有 97 名长沙知青落户在牛路口团结大队。是时，道县红色恐怖的黑风已经刮到了牛路口。8 月 18 日，牛路口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处决了六女一男．其中包括一名回家探亲的县中女学生。团结大队的知青见状，纷纷逃离，他们像江永县知青逃亡路线一样，先坐汽车，再坐火车，辗转逃回长沙。一天之中，就有 60 名逃亡。但很快，这条逃亡路线被民兵封锁了。动作迟缓的 37 名知青，得知逃亡路线被掐断后，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19 日夜，二十一岁的知青**杨大彬**，见两条黑影闪进了他的宿舍，悄悄对他说：**“嘘……我们是江永的长沙知青，冒死来通知你们，江永已经开始杀知青，17 号杀了柏明，刚才差点被农民抓住。你们赶快逃吧**。”说罢闪出宿舍，消失在黑暗中。杨大彬立即同其他知青商量逃亡事宜。举目无亲的知青们，只好求助于公社武装部。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不乏有良心者。21 日，公社武装部赵部长不仅给他们开出了加盖公章的路条，还派族弟连夜通知他们“赶快走”。当夜 10 点，皓月当空，包括 21 名女知青在内的 37 人队伍，偷偷离开团结大队，向西南方向逃亡。他们晓宿夜行，西越永安关入广西，路经纹市，然后北上直插全州。一路上，他们多次遭到地方武装集团拦截、搜查；但凭公社武装部一纸路条，使他们侥幸过关。

广西全州，武斗犹酣。车站月台上人满为患，连水都没有。数百里逃来的 37 名男女知青，已是蓬头垢面，筋疲力尽，带的粮钱也用完，他们必须赶快登车回长沙。因没钱买车票，登车被拒；几经请求，也没结果，眼巴巴看着一列列火车从月台边驶过。情急之下，他们以死相搏,集体卧轨。杨大彬高呼：**“我们是走投无路!蓝天白云啊，请为我们做证！”**旅客被感动了，站长被感动了，他们终于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在省府长沙，《道县告急!知青告急!》的大字报，出现在闹市街头，道县大屠杀的消息，快速向省内各个城市传播。

快走。在柏明被枪杀的当天，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本队的五名“要犯”做出了死刑“判决”。在该农场插场的长沙知青共 542 人，其中的 444 人，已在红色恐怖中先后逃亡；逃亡动作迟缓的 98 人，被通知到队部禾堂（堆放稻谷的场地）来看公判大会，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砰!”“砰!”“砰!”“砰!”接连四声枪响，五花大绑的两个老“地主”和两个“地主崽子”，依次应声倒下。第五个是女人，依然跪在那里，只是头深深地低着，一头乌发拖到了地上，遮住了她的膝盖。大家都知道他叫**秀姑**，出身贫农，平时心直口快，爱提意见，这次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由于她是贫农，出于阶级情谊，给她一个完尸。她被

拖到一棵樟树下，早已挂好了的一根绳索，一端结成绳套，套在她的脖颈上，一个农民手把绳索的另一端，用力一拉，把她吊了起来：只见她的双脚在空中弹腾了几下后，她的灵魂便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绞刑中，随“群众专政”的腥风飘散而去。

在这个红色恐怖的教育中，无论是“红五类”出身或“黑七类”出身的知青，都被吓傻了；特别是那个主持判决的“法官”，向他们乜斜几眼，把他们乜斜得从头顶凉到脚底。

当晚，98 名知青被召集到队部仓库里。乱世出英雄，知青**沈翔农**在关键时候站了出来，当了召集人。商量后，他们一致结论：走！快走！今夜就走！爬也要爬回长沙！

深夜三点钟，饱餐一顿后，98 名知青和其中一个女知青背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个接一个轻手轻脚，离开了队部仓库，消失在暗夜之中。在夜幕下，他们翻山越岭，向南急行，直取广西麦岭。第二天上午，他们已离开了湖南江永。在岭上眺望，麦岭隐约可见。休息中，沈翔农盘算：到麦岭后，不论西走桂林、全州乘火车，或着东走坪石、郴州方向乘火车，都有数百里的路要走，拖儿带女能受得了么？正当他无计可施时，突然，他听到一阵军号声，看到了一支军人队伍，正向坡下的麦田里开进。他眼前一亮，计上心头，急忙转身与几个知青商量一下。一声呼唤，众知青便加入了部队麦收的队伍。在相互了解之后，他们得知，这支部队是江永知青熟知的 6951 部队；部队也知道他们是逃亡的江永知青。部队不仅接受了他们参加麦收，还供给他们饭吃。两天之后，部队派军车把他们送到白石渡，搭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们是一批幸运儿。

夜聚。铜山岭农场仿部队编制，以连、排为单位，逃亡时显得井然有序，而滞留江永的大多数知青，是分散安插在各个生产队农户，逃亡时难免慌乱无序。

8 月 19 日深夜．井边公社东田大队知青**江同厚**，在睡梦中被人捅醒，他摸出高度近视镜带上，才看清捅醒他的是农民朋友**三苟**。三苟慌不择言，用江永土话结结巴巴讲：“沙皮梦，刚快刷来祝锡，刚社买冰社露谷，吞干祝莫贺嗒!”熟悉江永土话的江同厚，知道三苟要他起来赶快走，明天民兵设下关卡，他就走不了啦。听罢，他没加思索，操起床头一口皮箱，往肩头一甩，闷头就往大山方向跑。大山就是都庞岭，在东田大队西北。翻过山岭，就是广西，自古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条湖南通广西商道。这条路线在知青中已酝酿多天了。岭间山路崎岖，羊肠小道近百里，但为了逃命，这些都顾不得了。

在黑暗中，他跌跌撞撞死命狂奔。当跑近山口杉木冲时，他才发现，坪上站满了知青，黑压压一片。回头望去，各个方向的田间小道上，隐约可见有三五个人影向这里移动。很快，坪上集聚了 300 多知青，多来自附近的红旗、井边、厂子铺等公社。茫茫黑夜中，只听一人高呼：“连夜翻山进广西!”300 多个知青像训练有素的部队那样，自觉地排成单行，跟着前面的火把，沿着羊肠小道，向山岭深处走去。

经过通晚的艰难跋涉，第二天队伍走进到广西灌阳县境。第四天，他们强行军到达全州车站，搭上了回长沙的列车。

诈关。当铜山岭农场知青被部队用汽车送走后，一支来自于马河、白水、桥头的约 200 名知青，沿着同一条路向广西麦岭逃亡。在接近麦岭的县界时，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条线路已被封锁，他们遭到民兵拦截。几经交涉，也不放行。情急之下，一位叫**文丁**的知青，挺身

而出。他头戴军帽，身着军服，走到民兵面前，突然敞开上衣，露出腰间捆扎的一排手榴弹，作引爆状，大声喝道：**“若不放行，就同归于尽！”**民兵吓懵了，缩到一边。众知青见状，快速跑过关卡。

当最后一名知青跑过关卡看不见时，文丁撒腿就跑。当民兵还过神来时，文丁已不见踪影。赶上队伍的文丁，抹着额上的汗，笑着对众知青说：“手榴弹是训练弹！”引来一阵哄山大笑。

抗暴。知青逃离江永的另一条主要路线是：过广西龙虎关到恭城县，然后乘车，直奔全州或桂林。

这样，如惊弓之鸟江永知青，从三个方向逃亡，几天后，聚集于郴州、全州、桂林火车站，其中在广西全州，继牛路口的 37 名知青和井边等公社的 300 名知青登车北上之后，几天之内，又啸聚了近千名知青。

逃出虎口的知青，心情轻松得多；但多日的奔波，又使他们疲惫不堪。在月台上，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尽情释放胜利逃亡带给他们的快慰。但新的问题不断向他们袭来：粮钱即将告罄，必须尽快离开全州回长沙。然而，广西武斗呈加剧之势，列车不仅经常晚点，有时还被迫停驶，滞留的旅客也越来越多。

他们在月台上等着，盼着，望着，两天竟不见一列火车通过。肚里咕噜噜的响声，使他们难以忍受，八月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他们烦燥不安：他们发急了。果然，狂躁战胜了理智，他们占领了月台：一条由行李包组成的“警戒线”，出现在月台上，醒目的标牌靠在行李包边：**“是知青的站进来，不是知青的站出去!”**

第三天．256 次列车进站。呼啦啦站起来的知青们，很快泄了劲：每节车厢都塞满人，车门窗紧闭，也不见乘务员下车。三分钟后，列车启动开走了。

知青们疯狂起来。当 56 次列车靠站后，一场车上车下攻防战迅即拉开。男女知青拿着扁担、柞木杆砸向列车，车门撬开了，车窗玻璃被砸碎了，知青们像发怒的雄狮，拥上车厢，孱弱的女知青，个个都成了无畏战士。车厢内一场混战，阻拦上车的乘客，遭到了知青们的攻击。一帮帮男知青，巡查各车厢，寻找仇恨宣泄的目标，把郁结于胸腔的怒火，发泄在敢于阻挠他们的旅客身上：他们劫持了列车。

56 次快车，在知青的劫持下开出全州，向湖南衡阳驶去。

56 次列车遭“暴徒”袭击的电讯，飞向中央。第二天清晨，当 56 次列车缓慢爬近衡阳站时，在一块开阔地上停下来。惊魂未定的知青们，看见数百名民兵包围了列车。全副武装的民兵，个个工装藤帽，荷枪实弹，排排刺刀，闪着寒光。一阵清晰的高音喇叭声，传进了各个车厢：

“56 次快车在全州遭暴徒袭击，我衡阳抗暴指挥部，奉上级命令，将对暴徒采取革命行动。凡曾参与殴打、洗劫乘客的歹徒，投案自首……勿言之不预……”

没人指挥，没有言语，女知青或守住行李，或探身窗外，男知青一个接一个从各人车厢走出去，面对刺刀。“抗暴”散兵线开始向男知青逼近，把他们压缩到一个小土丘附近。

突然，一个叫**周长生**的知青，跳上土丘，扯开血迹斑斑的右臂，高高举起。那是登车时被碎玻璃挂伤的，伤口没有处理好，还在流血。他举着血淋淋的右臂，对全副武装的“抗暴”民兵喊道：**“我们都是长沙知青，一切只为回长沙与父母相聚！谁不相信?请看：你们见过伤口滴血还互相照应的暴徒吗?你们见过拖儿带女的强盗吗?”**他指着刚刚被翻检的行李说：**“你们见过如此贫穷的强盗吗？”**只见一个探身出窗的女知青哭喊道：**“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下放到江永县的长沙知青。那里的人要杀我们，已杀了十几个，我们是逃出来的。我们要回长沙！要见我们的父母！”……**

全副武装的“抗暴”民兵和干部们，从风言风语中已得知，湘南各县正在进行大屠杀。面对哭诉，油然而生的同情心，使他们首先从精神上解除了武装！也许是惺惺相惜，“抗暴”指挥部的官员们,在从知青中了解到大逃亡的原委和艰苦的历程后,迅速作出了明智的抉择：

“全部上车，放行!”

呜地一声长笛，列车在知青的胜利欢歌中启动……

胜利。经过十多天的逃亡，除十名葬身于湘南的知青外，其余约六千名长沙知青，全部安全地、胜利地逃回长沙，与父母、亲属团圆。此刻，街道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悠扬的革命歌声：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5、李庆霖“告御状”（略）

6、“五一三”暴行录

1973 年 6 月初，新华社记者在奉命采访云南边防部队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在金平县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团部驻地附近，意外发现了一个劳改队。记者看到，犯人们在武装民兵押解下，抬石修路。这些犯人看上去都很年轻，个个蓬头垢面，有的单薄得像未发育成熟的孩子；又见一队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从眼前走过，她们都是女劳改犯，正被民兵武装押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荷枪实弹的民兵，威风凛凛，走来走去地驱赶着，吆喝着；一名穿军装的干部，坐在树荫下，悠闲地喝茶，时而扫视一下修路的劳改犯们。那天，烈日当空，年轻的劳改犯人，吃力地抬石修路，豆大的汗珠顺着他们肮脏的脸颊、脖子往下流。忽然发生一阵骚动，一个稚气未消的犯人讨水喝时，被几个民兵用枪托围殴，将他打翻在地。一阵凄厉的叫声，在干热的空气里回荡：**“解放军叔叔，饶命呀！饶命……”**

在中国，这样的劳改场面已司空见惯，记者焉能化外？但那一张张稚气未退的面孔，令记者困惑不安！一条听来的信息使记者震撼了：有人悄悄告诉他，这些犯人都是建设兵团的知青，团里各单位都有劳改队，其中许多人是**“五一三反革命暴动事件”**的罪犯。震撼使记者的良心再现：难道家长们拥护上山下乡，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就是为了

接受这样的“再教育”吗？记者的职业本能又驱使他深入调查。很快他发现：在十八团，一位团领导公然对知青说，你们来边疆干什么？就是来接受改造，就是“**二劳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团 31 个单位，有 23 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其手段有二十五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跪砖碴，老牛扳桩，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在十八团，**许多知青向记者揭露和哭诉了“五一三反革命暴动事件”的真相：**

1971 年 5 月 11 日深夜，劳累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十八团一营十八连驻地一片宁静。突然，一声惊恐的尖叫声，打破深夜的宁静，人们很快听到了从女知青茅舍那边传来一阵挣扎、厮打和急促的呼救声。连队被惊醒了。男知青纷纷冲出屋来，只见一条黑影从女寝室窜了出来，当场被他们擒获。就擒者名叫**陆发云**，是十九连退伍兵。他本来是站岗值班，但当他发现十八连女知青茅舍门关闭不严时，慾火难耐，趁着夜深人静，悄悄摸进女舍，企图施暴。不料受侵犯的女知青拼死反抗，未能得逞，反被擒获。愤怒的男知青将流氓痛打一顿，并把他扭送到营部。

第三天，即 1971 年 5 月 13 日下午三时许，一大群头戴战斗帽，佩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十八连驻地，扬言要“踏平十八连”。他们抡起皮带来呼呼乱响，见男知青便拳打脚踢皮带抽，见女知青便动手动脚。这群打手其实都不是现役军人，而是十八团第五、六、十八、十九连的退伍兵，是陆发云找来进行报复的打手。

显然，这些退伍士兵，自恃出身贫下中农，又有当过解放军的光荣历史，有时并不把国法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是受城里人歧视的二等公民，因而对城里人特别是大城市里的人，由妒嫉而生怨恨；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认为，是毛主席把他们“二等公民”变成了“再教育者”，而把城里人的子女贬成了“二劳改”；更可怕的是，像陆发云这样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甚至认为，欺辱甚至占有知青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是时代赋于他的特权。在“舆论一律”的愚弄下，这些退伍士兵哪里知道，“二等公民”不是城里人强加给他们的，而是中共二元体制即“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结果。在二元体制下，城乡隔膜已经形成，产生像陆发云这样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在所难免。正当陆发云等退伍士兵扬言要“踏平十八连”的时候：

一个名叫**黄勇**的小个子男知青，突然提着棍子从厨房里窜出来，勇猛地向退伍兵们抡去，只听见扑通扑通几声闷响，已抡翻四、五个“战斗帽”。见状，躲在屋子里的知青们信心陡增，一声纳喊，数十名知青挥舞铁铲、锄头、扁担冲了出来，展开了一场恶斗。退伍兵们没有料到，这些十六七岁的城里学生竟如此英勇，又不怕死；由于寡不敌众，乱了阵脚，被知青们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知青大获全胜，还打翻十多个退伍兵，捆起来，当俘虏。

第十九连指导员**吕仕贵**闻讯后，立即率领一个武装班跑步赶赴斗殴现场。他的责任应该是制止械斗，处理、惩办肇事者。然而，他激化了冲突。他拔出手枪对空鸣枪后，命令将所有打架闹事的知青抓起来。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指导员的权威，知青一下子被镇住了，胆小的悄悄往后退。退伍兵有了后台，有恃无恐地冲上前去抓人。面对这个如此不公平结局，小个子黄勇气得脸色煞白，继而铁青，他劈面夺过一个武装战士手中的冲锋枪，哗啦顶上子弹，大声喝道：“**谁要敢上前一步，老子开枪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几个胆大的知青从室里拖出了几支站岗用的老式步枪，子弹上膛，与黄勇站在一起，与吕指导员形成对峙。火并之势，一触即发！

现役军官**吕仕贵**为什么会拉偏架呢？原来，吕仕贵也曾是“二等公民”，对生于农村的

不幸耿耿于怀，同陆发云等一样，没有把不幸归咎于“一国两策”的户口政策，而迁怒于城里人的优越感。他坚决拥护上山下乡运动，颂扬毛主席的决策伟大，赞扬周总理的领导正确，因而，他认为：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当“二劳改”，活该！像他这样的军官最终转业到城市里去享福，应该！在他的脑海世界里，似乎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合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三大差别”，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心理达到平衡。因此，当他看到他们连的骨干被知青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时，不由得怒火从心头烧起，鸣枪镇压知青，酿成火并之势。一触即发的火并之势，迅速报到团部：

接到紧急报告后，十八团立即派一名副团长率领团部警卫连，火速赶到十八连驻地，包围并缴了知青们的枪，当场抓获了参与械斗的五十名知青，弹压了一触即发的火并。

六天以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将十八连抢枪事件定性为“五一三反革命暴动案”。首犯黄勇，予以正式逮捕，从犯十余人在各团营单位巡回批斗，然后管制两年，监督劳动。陆发云等退伍兵也受到了批评教育，但未给任何处分。

记者**黎明**把调查到的“五一三反革命暴动案”和其他摧残知青的严重违法事件，以“情况反映”形式，向新华通讯社写了报告，被刊登在《国内动态》1973 年 7 月 4 日（第 241 号）上。报告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不仅证明黎明的“情况反映”属实，而且还发现：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打人的有 48 人，被打知青 110 人；被打知青遭受三十几种刑法，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遂，等等。当年八月，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外公布调查结果。

为了体现党对知青的关怀和丑恶务除的决心，在调查结果材料上，**高调公布了中央领导人的批示**：

总理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李先念副总理批示：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叶剑英批示：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

中央领导周、李、叶的批示，注定了**陆发云**、**吕仕贵**等涉案痞子、流氓无产者们的下场。

十八团发生的“五一三反革命暴动事件”及其摧残知青事件，是 1970 年至 1973 年间兵团记录在案的数以百计的知青案件中极为普通的一个案例。这是绝对权力——一党专政制造的悲剧。周恩来等中共政要，不会承认悲剧是他们的政策造成的，也不会因绝对权力制造了数不清的苦难和腐败而放弃党的一元化领导，高调公布他们的批示就是证明。

7、《南京知青之歌》的劫难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是《南京知青之歌》的歌词。这支歌创作于1969年5月下旬，原名《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没有当年“东风吹，战鼓擂，人民、美帝谁怕谁”的革命豪情，也没有当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巍巍壮志，它以思乡的缠绵情怀，揭示了知识青年们青春失学的无奈、背井离乡的忧伤和前途未卜的迷茫，引起了广大知青的共鸣，旋即在大江南北的知青中传唱。

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是南京市**五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68年12月，他同其他“老三届”同学一样，因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不得不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打起行装，泪别妈妈，告别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当农民。

在接受“再教育”中，任毅学着农民那样，身上痒了，脱下衣服抓虱子，活干完累了，倒在地头睡大觉；当镰刀划破了手时，他也会像农民那样，用水冲洗一下，再紧紧捺住伤口……但“再教育”并没有使他变成地道农民。每当晚上，自小喜爱音乐的他，便怀抱吉他，用旋律排遣心中的郁闷、无奈和失落。五月的一天，忽有所感，**“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一首词曲便跃然于他的弦上，冲出了他的口腔。他的琴弦拨得女知青们纷纷落泪，他的歌声被人仿效，传向四方！

1969年9月，阴云密布，中苏两党两国，怒目仇视，剑拔弩张，热核大战，一触即发。当是时，任毅突然接到留城同学**郑剑峰**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他惊呆了：他的《我的家乡》已被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以男生小合唱的形式，在仇敌苏修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里，反复播唱。他颤栗了：仿佛镣铐已锁住了他的双手，铐住了他的双脚，甚至亡命牌已插倒他的背上……惊恐之余，在反复思量后，他自首了。

但任毅并没有因自首逃脱厄运。1970年2月19日，南京革委会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他逮捕。

羁押期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审讯人员，对任毅的歌词一一定性，使他无言以对；正义遇痞子，对也没有用。审讯者判定：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念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教育路线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脚印″**，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是使用革命的词藻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审讯者定性的革命判词，在毛泽东时代司空见惯：既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荣、正确”，也体现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灼见高妙，真理永恒”！

1970 年 5 月 20 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原市五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下乡知青，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毛书）**、宝像**(毛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广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 月 6 日，南京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请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危在旦夕。

在江苏省委批复前，在南京“一打三反”的三、四、七月的三次屠杀中，任毅都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为死刑犯“陪绑”。

在文化革命中，不知从那一年开始，执行了一项不成文的约定：在杀人前，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把犯人的主要罪行公布于众，诸如什么“恶毒攻击”、“幻想变天”、“反动透顶”、“罪恶昭彰”、“罪恶累累”、“气焰嚣张”，等等，听取与会群众的意见，美其名曰“走群众路线”。尽管与会者不知道“恶毒攻击”的内容，也不知道“罪恶昭彰”的根据，更不明白“罪恶累累”具体都指什么，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大声回应：“杀！”最为可怕的是，已被内定徒刑的犯人，他们也高喊：“杀！”对此，有人说，这是“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的恶果；也有人说，“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等等。笔者则认为，**归根结底，是在一党专政的“舆论一律”条件下，在马列阶级仇恨主义酱缸里的长期淹渍中，使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退化、普世价值丑化的结果，从而使仇杀取代了和谐、报复取代了宽容、专政取代了民主、践踏取代了人权**。在仇恨主义泛滥的氛围里，仅仅写了一首思乡曲的任毅，也难逃被群众喊“杀”的厄运！

所幸的是，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 8 月 3 日在公判大会上宣布。

对此有人写道：**“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将军怒斥“岂有此理”是有据可查的：在“打倒许世友”的乌云翻滚中，南京市五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勇敢地贴出多达两万张“许世友、杜平老子保定了”的标语口号，力拨乌云，使将军看到了阳光。对五中的亲切感，使将军看见“五中”两字时，激动万分，便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据说，九十年代，任毅曾专程到河南新县许家洼将军墓前拜祭，报答将军不杀之恩德！

“有恩必报”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任毅对许世友将军的拜祭，体现了普通百姓的报恩美德。但许世友主政江苏期间，是说一不二的，仅在“一打三反”中，就屠杀了上千人。其中 1970 年，在南京市屠杀的 57 人中，全为错杀，错杀率达百分之百。文革后被平反的南京马列小组知青**查金华**和为查金华鸣不平、高呼查金华为烈士的知青**陈卓然**，都在“一打三反”中先后被枪杀于南京。许将军没有为他俩高抬贵手，因而他俩没有任毅那么幸运。历史将如何评价许将军呢？笔者认为，“一俊遮百丑”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都是不足取的。

但也会有人对许将军做出“不得已而为之”的推断：他不杀人，别人也会杀；他可能会因而下台，甚至被关、被杀。因此，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滥杀，亦即所谓“违心”之错，是可以愿谅的。“违心”之错，是横行于中国数十年的赤文化之一，已经成为各级政要不反

思、不认错的“公理”。他们认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滥杀无辜，亦即所谓“违心”之错，应该由历史去负责。对此，历史无法辩白，因为，她早已成了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

1979 年 2 月，任毅被平反出狱。他那首 171 个字的《南京知青之歌》，使他坐了九年大牢；而平均每 19 个字获刑一年的判决，也为现代中国文字狱的历史，增添了一项新纪录！

附 1、瞿玲仙事件：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在分场卫生所分娩时大出血，卫生所接生医生烂醉如泥，耽误了抢救时间，致使产妇母子双亡。瞿玲仙之死，触发了万人抬尸大游行，继而引发了数万知青罢工和返城风暴。

61-高压下的回家风暴

作者 于松然

1978 年，面对风起云涌的知青返城回家风暴，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沮丧地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这就是当年风传的“四个不满意”。但这个不承认失败而认可失败的“四个不满意”，即没有公开报导，也没有向下逐级传达，而面对“风传”，即没有官员出来肯定，也没有官员加以否定——这是赤文化之一的模糊权术。中共是个一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党，它的领袖都是“伟光正”的化身，因此，他们没有认错、道歉、下“罪己昭”的义务和习惯。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因此，他们不会认错。如果发生了某种无法回避的错误，本能使他们不是将错误归咎于天灾，便是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假如他们找不到天灾或人祸的替罪羊，他们便动用模糊权术，使他们的错误在悄悄中淡化，悄悄中改变，从而让老百姓在悄悄中遗忘。毛泽东和周恩来制造的**践踏人权**的上山下乡运动，同他们制造的横暴中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一样，在席卷全国的知青回家风暴中落幕时，就经历了**“三个悄悄”**的模糊化过程。总之，他们不会对他们侵犯人权的作为做彻底反思，更不愿公开承认上山下乡运动的荒谬，犹如他们至今不愿公开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使数千万中国人丧生一样。

历史业已证明，任何不反思、不认错、不忏悔、不道歉的政府，都是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的寡头专制政府。

中共要让老百姓在“三个悄悄”中遗忘，老百姓却不愿忘记。八十年代，以小说《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异军突起，冲破歌颂和“舆论一律”的藩障，对上山下乡运动和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控诉和反思。接着，《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白桦林作证》等“悲壮文学”系列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在这些小说和电影里，尽管作家们都在“主旋律”底线之上涂饰，自觉地突出“壮”，淡化“悲”，渲染“浪漫”，却无法回避苦难。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小说，是以虚构的知青伤痕和悲壮，构建起了知青文学的史诗长廊，那么，九十年代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则以知青真实生活为基础，全景式地记述了当年

云南知青大返城回家的悲壮历程，展现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血泪画卷。

令人遗憾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在“主旋律”制约下，许多人不敢谴责上山下乡运动，不少人力图把强加于知青的苦难描述成人生的骄傲，绘制成英雄主义的源泉，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营造“喜剧”氛围，硬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这种对知青苦难的美化，是变节美化：它冲淹了对上山下乡运动侵权的谴责，消融了对由侵权所造成苦难的反思。知青苦难虽可以造就英雄，但苦难一定涂炭民生、污损世道，正如不义战争可以造就英雄，但战争一定毁坏人寰、屠戮生灵那样。因此，任何美化知青苦难，都是为知青苦难的制造者开脱罪责。这种怀有崇拜苦难、美化苦难的变态心理，使这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青春无悔”的大合唱中。例如，当年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之一而名噪一时、后又因写知青题材小说而成名的作家张承志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他与九十年代初的**“魂系黑土地的知青回顾热”**，都是这种苦难崇拜变态心理的丑陋表演。2008 年，还有作者以“无悔者”自居，侈论什么**“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就是这种粉饰知青苦难制造者的丑陋媚态。

八十年代，失去了六、七十年代趾高气扬的知青典型——红托儿——贵族们，到了九十年代，发现气候适宜，特别是“三个代表”颁布后，他们便在“主旋律”的支持下，以“青春无悔”者的姿态，卷土重来，开始说当局在模糊中不好说的话，做当局在模糊中不便做的事，继续充当红托儿丑陋角色。以**侯隽**为代表的知青贵族们，利用各种媒体大喊**“青春无悔”**，高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正确方向”**，侈论上山下乡是知识青年的**“自觉、自愿、自主的行动”**，等等。他们还在河南郏县和天津宝坻县等地的政府支持下，筹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和“中国知青村”，为失败了的上山下乡运动**树碑**，他们还著书立说，签字发售《**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等书，为荒谬的上山下乡运动**立传**。

但老百姓不愿忘记：发生在 1978 年到 1979 年的那场惊天动地的返城风暴。那场席卷全国的回家风暴，使滞留在农村的八百多万知青，除少数知青（约占 2～3%）外，绝大多数都摆脱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困扰，结束了强加给他们的苦难，胜利返回城市家中，与父母团聚。

1、失败的尝试

早在文革之初，下乡知识青年们曾做过了一次大返城的尝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当年，“自愿”下乡知青们，凭借红卫兵造反之势，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纷纷“杀”回城里家中。据统计，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从各地返回城市家中的知青多达 120 万人。其中，广州有 3 万多，约占广州知青总数的 2 / 3；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场的九万多知青，有五万多人返回上海家中。

回到城里家中的知青，揭发、控诉了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批判上山下乡运动是**“黑暗运动”**。他们揭露**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冲击了文革前树立的绝大部分知青典型，使其中有些典型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1966 年 8～9 月间，从广西等地“杀”向北京的 70 多名知青，占领了中央城市知青安置办。他们砸开了档案柜，向社会公布了许多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迫使其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办公。成都市有 90%的知青返城回家。

1967 年 5 月，广州知青和家长 3,000 多人，举行集会，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迫害，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和静坐活动。广州的绝食和静坐，累及广东和南方一些省城，促使那里的知青又掀起了一轮回家高潮。

在江苏，回城的知青们，由于在农村吃了许多苦，有的还受当地干部的迫害、奸污，便把怒气撒到直接动员、驱赶他们下乡的基层干部头上。在南京市，约有 70%的老知青返城后，冲击了基层单位。据报导：**“95%以上的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被冲垮，有些干部被打伤住院；有的躲在家里；有的外出避风。全市军管会都遭到连续的冲击。”**返城知青冲击政府基层单位的目的有三：**迁回户口，供应粮油、安排工作**。例如，南京市红卫区（今建邺区）1964 年下放到六合县的知青，在农村，他们袭击粮管所，强盖公章，抢走户口迁移证、粮油供应迁移证及空白证明、介绍信等；回到南京后，由于三个目的没有达到，一怒之下，他们砸了区军管会办公室，冲击了省军管会办公大楼，下乡上山办公室的负责人也遭到他们的拖打。

返城知青迁怒于政府基层是有道理的。这些安置办和街道的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党委交给的“死”任务，在动员、驱赶知青下乡时，他们都曾欺骗过知青。如说什么**“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说什么**“那里很富裕**（下乡的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有鱼，有肉，有电灯，住瓦房。”**等等。如果谎言这一“软”招不能奏效，他们便用“学习班”的“学习”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去恐吓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下乡后，知青们发现上当了，于是回城后，便先拿这些干部出气。谎言加恐吓是赤文化之一，整个运动都充满了谎言加恐吓。如果这些干部不会欺骗加恐吓，就会被淘汰出局。在谎言酱缸的长期腌渍中，除少数觉悟者外，多数知青很难分清真与假。因此，他们未必明白，他们揪斗的人，不过是毛、周谎言加驱赶政策的替罪羊抑或罪有应得的替罪羊而已！

1967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回城知青立即返乡。很快，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挥舞下，在各地基层干部监督、驱赶下，他们都不得不沮丧地返回到插队、插场的农村。

2、风起云涌——回家之路多坎坷

对于下乡知青来说，1978 年是他们充满希望的一年。

那一年，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已掌管了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开始清算党内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9 月 19 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到 11 月，全国各地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全部完成。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评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宣布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浩劫”。全会决定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邓小平的一系列新政，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在这个

短暂的春天里，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的知青们，在走头无路中，看到了回家的希望。他们高呼：**“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

李先念的“四个不满意”表明，上山下乡运动已失去了民心、军心、国心，也受到了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黑龙江省知青办第 3 期《情况反映》中记载，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有人论证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第一，农民不欢迎，和农民争口粮，争土地，是变相缴纳“知青税”；第二，单位背包袱，负担重，既拿钱又拿物；第三，青年下乡后家长不放心，有的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第四，青年不安心，贻误了青年的前程**。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一位教师，在辅导干部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上，当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方向，从现实来说，农村人口要减少，城市人口要增加，邓副主席也讲了这个问题”**时，引起全场热烈鼓掌，突现人心之向背。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同情、默许、支持知青返城回家的政策相继推出，加上许多地方出现了驱赶知青回城的情势，动摇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基础。但以党内右派**王震**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在“拨乱反正”中，坚持认为上山下乡方向正确。1977 年，又有 171.6 万知青被“动员”出城市，去农村插队、插场。

显然，中共党内在知青政策上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尽管他们在口头上都说“方向正确”。毛泽东死后，以中、高级干部子女为主的有权力背景的下乡知青，通过参军、招工、提干、上大学等各种渠道，返回了城市。到 1977 年底，滞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 863.8 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这种不平等的去留政策，不仅戳穿了毛泽东“再教育”的谎言，也使不满呼声日益高涨。

为了平息不满情绪，有些地方根据中央容忍的范围内，推出了一些有利于知青返城回家的“病退、困退”新政。例如，天津市发出通知：天津市公安局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返城手续。通知下达后，立即在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 年 5 月，在哈尔滨市郊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 3,300 人，几乎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体检了 182 人，除 4 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 178 人，均拟“病返”回津。天津市的新政，很快引起连锁反应，其他省、市纷纷效法。插队爱辉县的上海知青 1,800 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 500 多人办理了“病返”手续。在内蒙古，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

在黑龙江，各国营农场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病退、困退”为干部和医生们制造了一个以权谋财、以权谋色的腐败平台。为了能借“病退、困退”顺利返城，有些女知青不得不把贞操献给权力。此外，为“病退”离婚、为“病退”自残也屡见不鲜。

知青为“病退、困退”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钱和性。据北京知青**明州**在《**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一文中披露：“有一位知青已婚，见到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军川农场。”“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 X 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 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 X 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

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除“病退、困退”外，已婚知青返城请愿成风。据《中国知青史》一书记载，1978 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 85 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最早的集体请愿活动，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这年 4 月，一批批已婚知青，轮番到市委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不久，市委作出决定，凡下乡结婚的、受迫害而离婚的、婚后一方死亡或判刑的，均可办理回城。该决定使抚顺市已婚知青皆大欢喜，但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已婚知青提供了攀比的口实。沈阳、鞍山等市已婚知青的上访人数，因此突增。他们大批进入省委大院，静坐请愿，要求在招工时与未婚青年一视同仁；一些知青打出“**结婚无罪，抽调有理**”，“**我们要工作**”的标语牌，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7 月 2 日，旅大市近千名已婚知青和家长，集体到市信访处上访，要求安排工作。在文革中，辽宁是党内左派苦心经营的省份，上山下乡工作也最有成绩。在 29 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的下乡知青人数高居榜首，达 201 万人。在“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口号的诱惑下，10 万名以上的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样一来，就为日后知青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很大麻烦。1979 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家庭破碎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有些地方还发生多起自杀、凶杀案件。

到 1978 年秋，农村干部安置知青思想开始异化，认为，安置下乡知青是强加给他们的负担，是变相缴纳“知青税”。于是，一些地方干部开始抵制知青工作，许多社队开始排挤甚至驱赶知青。据国务院知青办、黑龙江知青办的《情况反映》中记载，不少地方的农村干部，公开拒绝接收下乡知青。农村干部们明确表示：“**现在贯彻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而知识青年来了，使我们耕地减少了，奖售粮少卖了，收入降低了，负担加重了，我们再不能接青年了**。”许多地方的社队，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尽快卸掉包袱。社队干部说：**过去当政治任务不接不行，现在得算算经济账了**。由于农村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各地实行包工到组、五定一奖，农民在划分作业组时，都不愿意要知青。1978 年秋，辽宁省农村一些社队，开始以种种理由，不给知青分配农活，用放长假办法将他们撵走，使全省 30 多万名插队知青(约占当时全省在乡知青的 1/3)倒流进城市，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势头。到 1979 年，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吉林等省，排挤知青现象进一步发展，有些地方公开驱赶知青回城。例如，陕西省一些社队，“动员”知青回城自找门路，规定领取口粮时要向生产队交钱，直到离开为止。广东省从化县吕中大队，有 31 名知青被赶回广州，靠做临时工、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山西省太原市郊西温庄大队，曾由各生产队划出 400 亩地创办的知青队，被各队以“行使生产队自主权”为由，赶走知青，收回土地，知青们盖的房屋也被占用，并要求知青赔偿占地几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的农村干部，放弃了对知青的管理工作，听任农民盗、抢知青点的财物。有知青返回农村后，见房子被占，窗玻璃被盗，劳动工具、粮食、蔬菜被分，已无立锥之地，只好两手空空返回城市。

由于遭到驱赶，各地知青纷纷涌回城市家中，长期不归。1979 年 4 月 12 日，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反映》中记载：1979 年春节过后，农业生产进入大忙季节，但多数下乡知青却滞留城市长期不归；如陕西省占到 2/3 以上，山西省归队的多些，仍有近一半的人待在城里；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绝大部分在沪滞留不归；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西、广东等地，有些知青点空无一人。对此，国务院知青办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

鉴于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人民日报》被迫在 1979 年 4 月 24 日发表了《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呼吁立即制止这种现象，要求各地农村、农场应该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欢迎他们回来，保护他们的财产，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关怀他们，使他们感到同家里一样温暖，等等。这种有气无力的呼吁，与当年“人民战争”的暴力驱赶，形成鲜明对照，恰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光返照。

十年前，农民本不愿接受知青，那是雇主强加给他们的政治任务，他们不敢不接，城市知识青年本不愿下乡务农，那是毛的中共驱赶他们的结果，他们不敢不下；十年后，邓的中共“拨乱反正”了，许多农村开始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了，在这种大气候里，两种情势便拧在一起，形成一股知青愿走、农民愿放的返城潮流。但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思想指导下，**党内右派顽固势力**用种种借口反对和阻绕知青返城回家，因而使矛盾激化，引发了知青返城回家风暴。

3、“我们要回家”——云南知青首义返城风暴

罢工。全国知青返城回家风暴是从云南插场知青那里**首先**刮起来的。

毛泽东死了两年后的 1978 年 9 月，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云南广大农场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然而，寄出的联名信如石沉海底。10 月 31 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农场知青们对会议有很高的期待，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会议形成的文件表明，插队知青“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插场的要按国营正式职工对待，“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一决定，在农场知青中，引起了激烈反应。他们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怠工、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农场兴起。11 月 16 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由于联名信再次杳无回音，12 月 7 日，他们在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发出第三封请愿信的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团。12 月 9 日，知青北上请愿团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包括先已罢工的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内，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大罢工，支持北上请愿团。罢工浪潮，迅速席卷云南全省，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云南省农场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左右，不足十万，但他们首发罢工、请愿的义举，引发了全国性的返城回家风暴，成了全国人民的注目中心。

云南农场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是突出的。1973 年 7 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农场的前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 1,034 起，受害知青达 1,894 人，其中 2 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 286 人，受害女知青多达 430 余人。知青在农场奋斗多年，面貌无啥改变：他们最早到农场的已达 10 年之久，但仍有 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许多草房不能避雨；他们的饮食没有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一年六两肉，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贫苦生活；他们住在深山老林中，交通不便，文化生活枯燥单调，有些连队为了看一场电影，要跑几十里的山路；他们每两年享受一次探亲假，往返于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就要花近半个月的时间；据记载：**从 1969 年至 1979 年十年间，死于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近 1,500 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由于深感在农场没有前途，知青们利用“病退”政

策通过各种关系回城。据统计，农垦十年，病退回城的知青总数已达两万，其中有 2/3 是“人造疾病”，有以权谋病、以贿谋病或以色谋病之嫌。

最使知青感到上当受骗的是，绝大多数干部子女，都能通过权力早早返城回家。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云南农垦兵团十万知青中，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子女，约有一万人，约占农垦知青的 10%，其中地、师级或行政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子女，约为一千三百多人，约占农垦知青的 1.3%。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后，大批右派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知青中干部子女数急剧减少：1974 年，滞留在农垦兵团的干部子女已不足千人，约占农垦知青的 1%；到了 1978 年，又下降到不足百人，约占当年滞留在滇五六万知青的 0.18%。

在云南插场知青的眼中，**“北京五十五”下乡和返城表演，最具刺激性**。这个以高干子女为主的五十五个北京知青，1967 年 11 月底，直接上书周恩来说：**“我们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他们的要求受到了周的表彰。第二年 3 月，他们来到了地处边境的西双版纳大勐龙农垦兵团安家落户，并很快成了知青瞩目的典型。然而，一九七〇年春节前夕，第一批四名男女知青不辞而别，到 1975 年兵团恢复农场建制时，除两名因病遗骨边疆外，其余四十九名都先后返回北京，“光荣”地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历史使命。

1978 年，五六万多没有权力背景的知青，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知青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历史使命，兴高采烈地返回城市，而他们则被迫留在农场继续接受“再教育”。但他们也没完全丧失信心：他们在翘首等待着政策的变化，期盼终有一天，他们也有机会享受一下平等权利，返城回家。然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不办理病退、困退”**的新政，使他们失望了。在失望中，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不平等权利的“再教育”下，他们由失望而绝望，并在绝望中觉悟了——平等权利不能靠别人恩施，要靠自己去争取。于是，他们发出了罢工、请愿的呐喊！时势造英雄，在罢工、请愿的呐喊中，丁惠民、**叶枫、周兴儒**等知青领袖人物，脱颖而出。

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在分场卫生所分娩时大出血，卫生所接生医生烂醉如泥，耽误了抢救时间，致使产妇母子双亡。瞿玲仙之死，触发了橄榄坝农场万人抬尸大游行，要求惩办肇事医生、改善医疗卫生条件。1978 年 11 月 21 日，西双版纳州委公开表态，强硬命令抬尸游行的橄榄坝知青撤回农场。政府的强硬政策，使形势急转直下，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丁惠民一声号令下，全线停工停产，揭开了云南知青百日大罢工的序幕。他们的《罢工宣言》已不是什么“惩办肇事医生、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而是**“行动起来，大罢工，大返城！”**景洪农场十分场知青提出的**“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得了农场一万多各知青的响应，纷纷在《罢工宣言》上签名。知青罢工的消息，在云南边疆垦区引起连锁反应：到 12 月上旬，全省五十多个国营农场，纷纷成立罢工委员会或者指挥部，全面停工停产，罢工人数达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知青返城回家的要求，显然不是云南省、州政府所能答复的。在中共**“团结群众，分化瓦解，政策攻心，找出**（坏）**头头”**的“既定方针”下，政府与知青的谈判破裂，知青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也遭到州政府的拒绝。12 月 8 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请愿筹备组。9 日，“联席会议”发布《北上宣言》，决定 15 日那天派代表进京请愿。

期间，有两个云南知青熟知的教训，使“联席会议”和他的总指挥丁惠民明智起来。

一个是“八二八知青大逃亡”失败的教训。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 9,000 多名上海、四川等地的知青，常年生活劳动在瑞丽县绵延百里人烟稀少的边防线上。1974 年 8 月，农垦兵团要改制为国营农场，现役军人将全部撤回部队，农场干部由省农垦局负责调整。消息传出，知青哗然。他们是以兵团战士的身份来边疆的，转瞬间，他们变成了农场工人，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使他们深感上当受骗了。于是，他们提出了返城回家的要求：现役军人可以回部队和转业，我们为什么不能返城回家？当要求遭到政府拒绝后，他们于 8 月 28 日自发地开始大逃亡。数千知青冲破瑞丽江桥防线，走上了滇缅公路，向昆明进发。沿途畹丁、遮放、芒市、保山各师、团知青相继加入，逃亡知青人数已达两万余人。从瑞丽到昆明千余里，山路崎岖，坐班车尚须四五天，他们步行时间可想而知。于是，他们手持芟刀，拦截过往的所有车辆。他们的逃亡惊动了党中央。云南省领导动员沿滇缅公路的公社农民进行拦截，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命令“**不许放过一个人**”。于是，逃亡的知青便陷入了“人民战争”式的汪洋大海中。数十万农民男女老少齐上阵，他们手持铜枪、猎枪、锄头、扁担，撒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不到一周，两万多逃亡知青，全部被擒拿归案，押解回农场。

另一个是解放军武力镇压回民、夷平沙甸村的教训。沙甸是云南蒙自县的一个较大回族聚居村寨，有 1,500 多户、7,200 多人，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较小的回族聚居村。1967 年，“夺权风暴”也刮到了这里，很快形成了“八派”、“炮派”两大武斗组织。到了 1974 年，派性武斗已经演变成民族武装冲突。1975 年 7 月 29 日凌晨三点，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驻云南部队以三个团兵力，打着镇压“叛乱”的旗号，对以沙甸村为中心的回民进行武装清剿。经过八天战斗，打死回民 1,600 多人，打伤 5,000 多人，将 4,400 多间房屋的沙甸村夷为平地。

两桩知青熟知事件给丁惠民们的教训是：**中共镇压老百姓从不手软**。因此，罢工、情愿不仅需要自觉，更需要组织、纪律和策略。

请愿。为了达到上北京请愿的目的，他们采取了明修栈道和化整为零的策略，与地方政府周旋。

12 月 14 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15 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片区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17 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 143 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徒步强行北上；18 日，第二批知青代表 160 人离开思茅，徒步强行北上。很快他们都被大批军警、干部拦截在公路上。接着在 19、20 两日，各农场又先后派出十一批知青代表，计两千多人，相继从各个农场出发，强行北上，沿途又受到了各州、县、区、社机关干部、军警和农民的拦截，被强行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这一切都在罢工总指挥部的预料之中。12 月 21 日，一批知青请愿团一行 14 人，乔装打扮，分乘汽车、火车，大摇大摆地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数十名请愿团成员，也陆续抵达昆明。25 日，他们合零为整，集聚到一起的一百多名请愿团成员，公开身份，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与此同时，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先后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法律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支持知青返城回家的要求，力图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共鸣，借以达到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此时，受阻于景洪、思茅、元

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知青，佯动的目的已达到，纷纷撤回各农场，继续以罢工支持请愿。

12 月 26 日，云南省委负责人会见了请愿代表团。但由于省委不准许请愿代表团上北京，并命令他们停止罢工，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代表团集体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正当请愿团在做登车北上准备时，代表们发现，一万多元经费和上北京的火车票，不翼而飞。当他们看到招待所内的便衣警察在窥视他们时，他们查觉，失窃不是刑事事件，而是政治事件；他们还发现，车站内警察增多，是针对他们的。他们得出结论：无论他们有没有车票，当局都不会让他们登上北去的列车。他们面临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的选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商讨，总指挥丁惠民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卧轨！1978 年 12 月 28 日，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集体卧轨，切断了昆明与京沪、京广、陇海等铁路干线连接的大动脉，数十对客、货运列车受阻。三天三夜的大卧轨，震动了全国，也惊动了“上帝”。中共中央通知云南省委，同意请愿团来京，人员 30 名。1979 年元旦后，请愿团胜利到达北京。

然而，他们失败了。（右图）元月 4 日，**顽固强硬派**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在接见中，王震虽然说什么“你们也是受害者”，**答应**“有些问题要改”，**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等等，但却严厉批评了他们的罢工和请愿活动，**坚持**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警告**他们“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要求**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并要他们**“回去要作自我批评”，等等。在王震的软硬兼施下，请愿团屈服了，不仅以公开信的形式做了检讨，闷闷不乐地返回农场后，还被迫下令结束罢工。对此，各大报纸发表了《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的报导，实际上替丁惠民宣布了“我们要回家”的大罢工和大请愿的失败！



然而，他们失败了

绝食。正当请愿受挫时，滇西临沧地区勐定农场（七团）知青，异军突起，四营近千名知青在新领袖**叶枫**的率领下，于元月 5 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打着“我们要回家”的旗帜，进驻场部，宣布总罢工，策应北京请愿团。

在傣语里，“勐定”的意思是“会弹弦的坝子”，国营勐定农场就设置在这里。这是一个以橡胶种植及粗加工为主的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农场由五个分场、一个医院、一个电站，还有几个直属连组成，共有 7,000 多知青，其中成都知青 5,000 多名。由于地方政府拒绝罢工的要求，赴京请愿受挫，为了争取到知青的合法权益，知青罢工总委员会决定罢工升级，进行绝食，并把绝食的地点选择在场部招待所院内。总委员会还决定：叶枫带领身体好的 200 多名知青进行绝食，**周兴儒**等在外面组织知青策应，**李光明**为纠察队长，负责档案室、机要室、武器库以及家属区的安全保卫工作。据《云南农垦纪略》记载：“勐定农场 300 名知青于 1 月 5 日进驻场部；6 日，进驻人数增至 1,500 人，有 200 人宣布绝食。”

正当绝食刚刚开始进行，武器库被抢的风言四起。周兴儒等立刻警觉起来：这是武装镇

压的信号。果然，内部传来消息，上面已下达命令：**“如情况属实，就按既定方针办，就地解决。”**何谓“既定方针”，就是武力镇压，也或**“先杀后抚”**。为了挫败武力镇压的企图，**王道明**等 25 名知青共产党员，联名给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发了加急电报。他们以自己的党性向党中央保证，知青们在整个罢工、绝食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更没有打开武器库；明确表示，知青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回家。与此同时，知青纠察队对武器库的保护更加严密，不准任何无关人员接近。罢工总委会的警觉，挫败了顽固派武力镇压的阴谋。

在中共改革派与顽固派的较量中，由于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开战在即（1979 年 2 月 17 日开战），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是时的中共，对处于前线的云南边疆的社会稳定特别关注。他们不仅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向回族人释放出了要平反“沙甸事件”的善意，对知青的罢工、绝食未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们否决了顽固派镇压的指令，立即派出以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的调查组，飞赴边疆，安抚知青。

1979 年元月 8 日下午 4 点左右，绝食三天的知青们，当得知以赵凡为首的国务院调查组即将来勐定解决知青问题的消息后，罢工总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绝食，许多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抢救。

元月 10 日下午四点左右，赵凡一行来到了勐定农场场部的知青绝食地点，那里已经聚集了 1,500 多知青。赵凡在台上正准备讲话，现场所有知青突然向他下跪。一个跪在台上的女知青，抱住赵凡的腿哭道：**“伯伯，救救我们吧，放我们回家吧！”**台下下跪的知青哭声一片！（右图）


知青向高官下跪：“放我们回家吧！”

改革派赵凡，立即将他在边疆看到的知青们极为艰苦的生存状况和他目睹的知青大跪求，写成报告，电话传向北京。他的报告很快得了改革派的支持。在与顽固派较量后，元月 15 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讲话》，明确表示：“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于是 3～5 月的两个月间，五万多云南知青，像旋风一样，通过步行、汽车、火车，又返回了城市。据统计，有 3,000 多名知青留了下来，约占知青总数的 2.3%，他们中许多是“知青贵族”，即当了领导干部的知青。

三十年后的 2009 年 2 月，被誉为知青之父 92 岁的赵凡，在接受采访时说：**“是政治局先讨论**（笔者：1978 年 3 月），**这次知青下乡根本就是错误的，买了个四不满意。你说花这么多钱，总理都快累死了，没有钱也得给，人下去了也得拨款，也得拨建设资料；家长不满意，他的孩子还没有到了就业年龄，你们把我的小孩弄走，你叫我们怎么过。大家思想都一致，应该解决这个“四不满意”，一个一个不满意来解决嘛，把这个工作做通了，就水到渠成。”**

4、连锁反应

云南知青的回家风暴，很快刮向全国，引发了全国数百万知青大返城风暴。

在黑龙江，原有知青 47 万人，1978 年底，利用各种渠道回家的已达 20 多万人。在返城风暴中，留在农场的 20 多万知青，把返城申请表纷纷送到领导机关，其中，仅哈尔滨市知青办，到 1979 年 3 月，已收到返城申请表五麻袋零一箱。

1978 年末，在军川农场，团委书记已走了 33%，团员走了 28%，党员走了 30%。1979 年初，全农场系统，连职以上干部走了 5,000 多人，技术骨干走了 8,000 多人。一些单位出现机器无人开，生病无人看，学生无人教，账目无人算的瘫痪局面。1979 年 3 月 1 日，黑龙江省委鉴于返城风势头过猛，严重影响生产，宣布自即日起，暂停办理农场知青困退、病退手续。于是，该市知青 3,000 多人到市革委会门前示威，要求返城，高呼“**要民主、要自由、要工作**”口号。此后，3 月 2～3 日，有数百至数千下乡知青，在哈尔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就业问题。在建三江管理局，知青已占全局职工的 80%以上。到 1979 年 3 月，其中有 77%知青已返城，劳动力奇缺，春种无法进行。该局化肥厂一些知青，围攻领导，组织静坐，威胁要把尿素装置炸掉；领导无奈，只得宣布停产，放他们回家。在浩良河化肥厂，1978 年底，一次返城回家 560 人，使很多岗位无人操作，被迫停产。在香坊农场的一个奶牛场，因知青大批返城，牛奶没人挤，产奶量大幅度下降。据《饶河农场志》记载：“1979 年知青大返城时，有 3,000 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

一些农场领导认为，知青是“飞鸽牌”的，早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有的农场为保险起见，干脆把一些原在技术岗位上的知青撤下来，换上本地青年，让知青去当农田工。香坊农场成立了一个“返城排”，把要求返城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干较累的活。一些知青说：“我们不走，在这也没好了，这是逼我们走啊!”

在返城回家风暴中，知青典型和知青贵族，也先后随大流返城。例如，知青贵族**金士英**，时任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在返城回家风暴中，她毅然放弃了副厅级待遇，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工人。又如，知青典型**高崇辉**，他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唯一的国家级标兵，也是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典型，八十年代初，他借风离开了农场，扎根到都市。此外，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扎根典型”和知青骨干，早在他们之前，也背弃了“扎根”誓言，在风暴中，借势返城回家。

据报导：最终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两万多人，约占全部插场知青的 4.2%。

又据报导，在 1979 年，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过知青请愿、卧轨、绝食等事件。例如：

在江苏省南京市，元月 25 日上午，200 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会，要求回城工作。

在浙江省杭州市，一些知青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回家。有些知青在请愿时“大吵大闹”，有的举着横幅堵住大门，有的不听劝阻擅自敲钟，有的强行闯进办公室，有的则撞破市委印刷厂的玻璃……2 月 5 日起，有些知青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集会，拦阻车辆，堵塞交通，以致市公交车停开数日。9 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这些知青多数是文革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达 14 年。他们返城无门，加上有关部门在返城政策上出尔反尔，引起这次历时近 1 个月的请愿。其间，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游行。

其中，有 34 名知青绝食、绝水 4 天后，生命垂危，被送入医院。

在江西省南昌市，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在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们“**一度围攻铁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四川省重庆市，一些知青上访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 月 17 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民主为借口，互相串联，采取“四人帮”过去那一套做法，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任意围攻和挟持领导干部，致使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文章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在天津市，2 月 7 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其中许多是回城知青。他们尖叫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桶；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中断，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

在上海市，滞留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的知青，2 月 5 日下午 5 时开始卧轨请愿，到翌日凌晨 4 时 30 分终止，使铁路中止运行 12 个小时。由是，上海站共有 29 趟列车不能出站，31 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八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打乱了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2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

经过请愿、卧轨、绝食等争取“**我要回家**”的权利，其中，绝大多数知青都如愿以偿地返城回家，尽管他们行动都曾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和抨击。

5、大返城回家中的失败者

在回家风暴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三万多上海知青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在上访、请愿两年多后，遭到了严厉的镇压，最终被迫永远留在了新疆。

他们是文革前来新疆的 10 万上海知青中的一部分。从 1962 年到 1979 年的十七年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通过权力、后门、病退、困退等方式回到上海，剩下来的三万多人，其父母多为上海弱势群体，离权力太远，丧失了返城回家的权利。为了争取平等权利，他们也像云南知青那样，成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组织，开始领导罢工、请愿，其中，在阿克苏垦区的两万九千多名上海知青，成为闹返城回家风的主力。

1979 年春到年底，“上青联”先后组织过多次静坐、示威、罢工，四次上访，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回家浪潮，对他们心理上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最凶，走得最多，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知青闹得最凶，问题解决得最好。因此，尽管多次受挫，他们的返城回家劲头丝毫不减。12 月 19 日，十团 500 多人集会，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

“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为了坚守上山下乡的正确性和有始有终的坚定性，在顽固派的支持下，中共决定拿阿克苏的上海知青问罪，以儆效尤者。1980 年 1 月 2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说：**“从 1979 年 2 月以来，阿克苏垦区一些农场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在个别人的策划和唆使下，组织‘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以胁迫和欺骗等手段，煽动停工停产，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抢劫公章，伪造证件，搞‘打砸抢’，殴打、侮辱和围攻干部，限制人身自由，诬陷，诽谤领导同志，等等，搞了一系列违法活动。**”在“舆论一律”的强权下，**罗织“罪行”和制造谎言是中共的特权**，不许答辩，更不许局外人辩护或调查。中共的这种特权，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通告》进而结论说：**“近一年来，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农垦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制造动乱，进一步扩大事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使阿克苏垦区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通告》对知青和平请愿强加的“罪行”和制造的谎言，是为武力镇压制造舆论，替中共和毛、周破坏宪法、驱赶知青到边疆、干涉知青“迁徙自由”和制定不平等返城政策开脱罪责。而此时，知青红托儿们正在北京作“最后表演”，以配合镇压。

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部署到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 5 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 1 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 4 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 1 市 5 县的社会秩序。**”1980 年 12 月 26 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 9 人，收审骨干分子 43 人。至此，**权力扼杀了权利，谎言战胜了真理**，持续两年之久的上海知青返城回家风，终被镇压了下去。

最终，在“最后表演”的配合下，留疆的三万多上海知青和组织他们请愿的领导骨干，都成了毛泽东发动、周恩来领导的上山下乡运动祭坛上的牺牲！

6、红托儿们的最后表演

正当返城回家风暴席卷全国其飙势不可阻挡之时，1979 年 8 月 17～30 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显然是要抑制返城回家狂飙的同时，为失败了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名。为此，他们又把各地知青典型——**红托儿们**召到北京，进一步发挥他们的**托儿**作用，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坚定知青“扎根农村不动摇”的信念，把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向一个新高潮。

有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 34 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应召来京参加座谈会，其中自然少不了**邢燕子**、**侯隽**、**蔡立坚**、**薛喜梅**等老牌知青典型。26 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 34 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华国锋讲话中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李先念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效果是好的。当然，缺点也不少，特别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各方面管理得不好，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能因为

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显然，此时的他，有意“忘记”他在去年针对上山下乡运动所提出**“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的评语。胡耀邦则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中国青年找到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他批评了知青的返城回家风，说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光荣历史丢了。”华、李、胡充满谎言的讲话，显然是座谈会的基调。

据报导，“与会代表在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后，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表示了坚持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心。”**邢燕子**为自己当年带头走这条路，深为自豪。她表示在农村**“要和千千万万只燕子继续展翅高飞”**。**侯隽**为了撇请与“四人帮”的亲密关系，把上山下乡的她比喻为**“一个好孩子”**。她说，一个很好的孩子，不能因为他沾了一点灰尘就把他丢掉；洗掉了身上的灰尘，他照样是个好孩子。河南的知青典型**薛喜梅**表态说，尽管不少人劝她离开农村，但她**“决心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北京的全国楷模**蔡立坚**，发言依旧那样掷地有声：要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走到底，**“八条黄牛也拉不回头”**。遗憾的是，座谈会没有召唤“决心”在农村**“走到底，永不回头”**的知青典型**曲折**，也没有召唤发誓**“扎根农村奋斗六十年”**的知青典型**柴春泽**，如果召唤了他们，他们也一定会有上乘表演。总之，参加座谈会的一些典型们，特别是作上述表态女托儿们，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害关系太深了：她们的青春和理想，她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她们那段光荣而丑陋的历史，以及她们在政治上的沉浮和官位的升迁，都与上山下乡运动息息相关。因此，她们利用这次宝贵机会作如上表态，继续充当红托儿的脚色，是预料中的事。

8 月 31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信中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使上山下乡这项大有前途的革命事业继续巩固和发展。显然，新疆阿克苏垦区三万多上海知青的和平情愿，就是座谈会要排除的干扰。

对于知青典型们在座谈会上的表演，有些在乡知青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次会不过是三十多个知青尖子的事，人家早已是干部，与俺处境不同，解决不了俺的具体问题，与俺无关。”**更有知青直言不讳地说：**“知青工作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对口单位不满意，名声很坏，像一只泄了气的破皮球，现在拼命打气，也蹦不了多高。”**《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调查时发现，总共 176 名知青，没有一个愿意在农场继续干下去。

知青红托儿们在座谈会上的表演，也收到丰厚的回报，个个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知青贵族。正如**邢燕子**说的“展翅高飞”，她们先后都“飞”出了农村，“飞”进了大城市，“飞”上了领导岗位：1980 年，**侯隽**出任天津市宝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任宝坻区政协主席；1980 年，**薛喜梅**“飞”回到了下乡出发地郑州，上了两年大学后，荣任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信息研究所所长；**蔡立坚**没有“飞”回北京，但她在 1980 年荣任山西晋中地区团委书记，后调任太原市省委党校工作。只有邢燕子在农村多“扎根”了几年，但最后也“飞”出了农村，1984 年被任命为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副主任。与知青典型们“展翅高飞”的同时，全国包括新疆阿克苏垦区三万多上海知青在内的二三十万知青，不请愿地替红托儿们兑现了**“决心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誓言；其中，“上青联”的“总部为首分子”，还要为红托儿们“永远扎根农村”的“崇高理想”，在高墙里度过漫漫刑期！

知青贵族们的表演，不是最后的“最后表演”：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红托儿们

又“飞”了起来，他们要为失败了的上山下乡运动树碑立传！

62-“九一三事件”：同室相煎 时不我待

作者 于松然

副统帅**林彪**出逃事件，是文革中最为震撼、最为蹊跷的事件。生于 1907 年 12 月 7 日的林彪，**在**内战中是为中共坐鼎江山立下汗马大功的领兵元帅，**在**五十年代是被毛提升为中共排位第六的党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是被毛“钦定”为党和国家二把手的党中央唯一副主席，**在**造神运动中还是人们高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毛的“亲密战友”，最后，又**在**中共九大的党章上明确规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他，却在而后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出人意外地变成了“叛党”、“叛国”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并在 1971 年 9 月 12 日深夜，乘三叉戟飞机出逃，于次日凌晨 2 时 27 分，同妻子、儿子一起，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而汗大荒漠上，酿就了一起震撼世界的大丑闻——**“九一三事件”**，终年六十三岁。

这是被毛泽东整死的第二个接班人。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1969 年 11 月 12 日，被拖死在开封囚所，是年七十一岁！

“九一三事件”的丑闻，向全世界公布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荒谬，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伟大、光荣、正确”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神话，唤起了亿万浑浑噩噩中国人的觉醒，宣告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产！

华飞先生说得好：**“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在惊世丑闻发生后的 1972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时，竟厚颜无耻地说：**“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我跟他斗争了几十年，后头变成了‘亲密战友’、‘副统帅’。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一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对林彪充满谎言的丑化，毋宁说他在丑化他自己，在丑化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他的谎言也留下了太多的蹊跷，给事件蒙上了一层迷雾，使人们在迷雾中不断拓展想象空间。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领袖和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丑闻？毛、林的交恶究竟起于何时？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林彪是叛逃还是被劫持逃亡？林彪果真有军事政变、谋杀毛和另立中央的计划吗？林彪有几个“政变手令”？林彪

集团中活着的人谁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即武装起义计划？林彪的座机是被击落还是坠落？**飞机上的“黑匣子”究竟在哪里**？等等。作家舒云在《林彪案件完整调查》中，提出了三十二个疑点。太多的疑问使人无法相信中共对林彪集团的判决；而档案死不解密又使“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迄今众说纷纭，虽盖棺却难以定论。

值得肯定的是：毛、林的上层权斗，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毛泽东制造的较少祸及老百姓的灾难！

笔者将在档案死不解密的严紧控制下，在官方“主旋律”的独断专行中，同读者一起，在迷雾中去探索“九一三事件”的真相，评说真相背后的原委与谎言！

一、林彪欲清君侧

1、觊觎权力的接班人

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指定领袖和接班人的理论，却有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推举领导人的“巴黎公社”原则。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当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之后，没有一个共党国家实行过“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这些国家的最高领袖，都是由利益集团中少数几个人指定的，而接班人的选拔，则是由领袖自己或领袖周围少数几个人来做决定——这是马列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掩盖共党政权的独裁性，共产党人也会设立诸如“中委”、“人大”等议政、立法和选举机构，来体现他们的“民主”。众说周知，这种“民主”，不过是橡皮图章式地走走过场而已。这种指定领袖和接班人的体制，发展到今天，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北朝鲜的金家**父子承袭制**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依存制**，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毛泽东、邓小平和少数几个人秘密指定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党魁指定制**。无论是父子承袭制、兄弟相依制和党魁暗箱**指定**制，都与封建君主专权世袭制没有质的区别。所以，当毛泽东打倒了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之后，便又合乎逻辑地亲自挑选听话的林彪，当他的新接班人。

与所有嗜权如命的独裁者一样，毛泽东位极人臣，处于高处不胜寒之中：为了防遭暗算，猜忌、偏执、贪欲、好斗、狂妄、暴虐和狡诈，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痞习，大权旁落是他难以容忍的恐怖。从赶走王明以削弱周恩来的权势，孤立朱德以结束朱毛体制，到选林彪为接班人而拖死刘少奇的权斗中，他的信任都是建立在权术基础之上。当然，也有“信任”人的时候，但那种“信任”是“利用”的同义语。例如，**他联合周恩来，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他扶植林彪，是为了抑制周恩来**。因此，他所“信任”的林彪，不过是他巩固权力布局中的一枚棋子而已。当“九大”上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后，猜忌心结使他发现，**林的权力迅速膨胀起来，大有刘少奇第二之势，甚至有林、周结盟的可能，这对他的绝对权威已构成了潜在威胁。**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大权旁落的威胁，使他必须采取措施，节制副帅的权力。其中，他坚持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就是节制副帅权力的权谋之一。

贵为接班人的林彪，是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副帅。国民经济各部门由周恩来掌管，他不好过问也不愿插手；他虽主管军委，但大权还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昔日，他统帅百万大军时，那种纵横驰骋、叱咤风云之势，何等辉煌，何等威烈！但作为副手，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例如：部队调动都要经毛泽东首肯，尤其在北京，他无权调动一个排；军队高级将领的任命，都必须经毛泽东批准。很少当过副职的林彪，当了副帅很不自在。尽管通过多年的经营，善于拉帮结派的林彪，在重要军事部门也安插了一些亲信。但这些亲信，既效忠于他，

也效忠于毛泽东。

有人著文说，林彪没有权力欲，这种说法缺乏根据。恰恰相反，林彪不仅是一个有强烈权力欲的元帅，而且是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独断独行者。

战争年代，他的权力欲和自尊心表现在他**不当副职**。1926 年 10 月，19 岁的林彪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次年六月，升任七连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 年 3 月，他以一个连队的兵力与敌一个团周旋，并将来阳县城里的敌人悉数赶跑。不久，他被朱德、陈毅提升为一营营长，同年 8 月，又被任命为二十八团团长。1930 年 6 月，整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委，下辖红四军和红六军，他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1930 年 10 月，在反国民政府第一次围剿中，他率领红四军，全歼赣军十八师，活捉前敌总指挥、师长**张辉瓒**。1932 年 3 月，未满 26 岁的林彪，升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次年 2 月 27 日拂晓前，他率领一军团埋伏于黄陂两侧，不到 3 个小时，干净全部地歼灭了国民政府第五十二师。

他的权力欲和自尊心还表现在他敢于**坚持己见**，敢向毛泽东叫板。“长征”中，他率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等等，战绩卓著；尽管他支持毛泽东，但对毛朝令夕改的指挥作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军团政委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期间，他打电话对彭德怀说：**“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由于彭德怀拒绝了林彪的要求，他便写信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要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

林的顶撞，也受到了毛泽东一个小小的惩戒，被免去第一军团团长的职务，调任为红军大学（后为抗大）校长，剥夺了他的军权。但他毕竟是一员难得的虎将，毛再恼火也得用他。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又被委任为一一五师师长，成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抗日中，林敢于违背毛泽东为中共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和**“要避开与日军正面冲突”**亦即**“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总方针，主动在平型关伏击了一支日军补给部队，消灭了数百名日军，缴获了 100 多辆卡车的军用物资，700 多匹骡马。八路军由此威风大振，使毛不得不发电表示祝贺。不幸的是，他穿上了缴来的日军将军服，纵马驰骋，不幸被友军疑为日军，开枪击伤，差点送命。

内战中，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启用从苏联疗伤归来的林彪，任命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毛、林在东北的总体战略构想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关键问题处置上，却大相径庭。如毛要林在锦州与国军决战，林却反其道行之，不仅避免决战，还把沈阳等大中城市“让”给了国军。再如，毛严令林死守四平，但林却发出了**“撤退、撤退、撤退”**的命令，一直撤退到哈尔滨，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为一年后全歼东北 47 万国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后来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1947 年 5 月，在给高岗写了一封信中，把林彪主动避免锦州决战和从四平街撤退的两件事，作为进入东北后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决定性的大事加以肯定。信中写道：**“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他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在编纂《毛泽东选集》时，辽沈战役的胜利，都揽在毛一人名下。

林彪被誉为“常胜将军”，笔者不敢苟同；但被誉为中共的“韩信”，却货真价实：在歼灭国军主力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林统率指挥的第四野战军，先后发动并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消灭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一百多万，然后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发动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又渡海直取海南岛，歼灭蒋的国民政府军数十万，使中南地区成了中共天下。因此，他是名符其实的中共战胜国民党、夺得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然而，中共建国即所谓“解放”后，他“病”了，而且“病”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不仅怕风、怕光、怕水、怕声、怕惊，而且到了“见风就感冒，见水就拉稀”的地步；他所住的屋子，窗户都要用三层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这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元勋，虽然“病”了，但功高盖世，还是被毛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但这位当惯了正职的林彪，对这些副职不感兴趣，至多把它当成一种荣誉。因此，无论军务、政务、党务，能推则推，重要会议，能躲则躲。

他“病”得蹊跷！“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派人到他家里查抄时，在查获他的《日记》的同时，还抄获了他手书的座佑铭：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张良范蠡，激流勇退！

座右铭反映了他的强烈**权力欲**和**自尊心**。

这位叱咤疆场的英雄，年轻时就有鸿鹄之志；“解放”时，年四十有二，风华正茂，且功高盖世，岂能安之于副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抱负。“玉在匣中求善价，钗在奁内待时飞”，他是在借养“病”之名，等待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太了解毛泽东了，他熟悉毛的嗜权、好斗、偏执、猜忌、暴虐和奸诈的品性。潜意识使他认识到，伴君如伴虎，在毛身边，深有“**是福还是祸**”之不祥预感。他太了解马列党建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了。潜意识使他认识到，“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些在现代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在现代封建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发生。于是，他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同时，作好了效法“张良范蠡”的准备，随时借“病”“激流勇退”。

据林彪的医生说，他确实有点病，但不大。“病”是他对付毛泽东的权术，是等待机会要付出的代价。在马列主义旗帜下，权力情结使共产党人之间，充斥着权力斗争。这种斗争，有时表现为温情脉脉的革命友谊，有时则是你死我活的惨烈内讧。共产党人大都懂得这种权斗哲学。在养“病”中，当机会来到他的身边时，陪伴机会而来的是权力斗争。对此，他已习以为常了。

第一次来到他身边的机会是朝鲜战争。但他看穿了斯大林“一箭双雕”之计，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他反对出兵朝鲜，不愿为苏联和金日成卖命。他说：“**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因此，当毛泽东要他挂帅出征时，他以“病”婉绝了，气得毛扬言要“**给他发转业证**”。他给毛碰了个软钉子后，并没有受到“兔死狗烹”的威胁。这是因为，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他的价值并没有因而贬值，毛可能还要用他。于是，他便继续以养“病”静而待之。

果然不出他所料，机会接连不断地来到他的身边：毛不仅没叫他转业，还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授衔时，他成了十大元帅之一，年纪最轻，而名列三甲，仅排在朱德、彭德怀之后；后不久，又被“补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成了中共七大领袖之一，位在彭德怀之上。自幼胸怀鸿鹄之志的他，自然对毛的关照感恩戴德。同时，他也看出，毛与彭德怀之间的裂隙正在扩展，由他取代彭是早晚的事。对此，他继续以养“病”静而观之。果又不出他所料，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毛罢黜。他坚决站在毛的一边，大骂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扬言**“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报答了毛知遇之恩，从而名正言顺地成了主管中央军委的国防部部长。但他没有忘记“兔死狗烹”的教训，他提议任命毛的亲信罗瑞卿为总参谋长，主管军委日常工作，得到了毛的批准；为了消除毛的猜忌，避开“兔死狗烹”，他又在军中大搞神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把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紧紧连结在一起。

当他发现大权在握的**罗瑞卿**与**贺龙**元帅结盟有架空他的时候，特别是发现毛泽东怀疑罗有投靠刘少奇的嫌疑时，强烈的权力欲使他与毛联手，清除了贺、罗在军中的势力，并乘机把他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将领，分别提拔为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政委和总后勤部部长，成了他的“四大金刚”，强化了他对军队的控制。

林彪对毛泽东吹捧和神化的动力，来源于“天马行空”的强烈权欲。强烈的权欲导致他失去理智，在与毛支持的**江**、**张**争权夺利中，忘记了“激流勇退”的座右铭，从而使他最终走上了毁灭——折戟沉沙于外蒙温都尔汉！

2、林彪眼中的毛泽东

有人著文说：“林彪是中国最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比任何人都清楚。”又说：“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若指掌。”但笔者认为：这话颇有武断之嫌。现有资料可以证明，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内幕和谋略的人，至少还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不同的是，林彪留下了《日记》（或称《工作扎记》），而城府较深的周、康、陈等人，为了防止查抄，他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字记录。

当谈到林彪眼中的毛泽东时，人们很快会把他对毛的一系列颂词联系起来，什么**“大英雄”**、**“最高最活”**、**“一句顶一万句”**等等，还会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拿出来，从而证明林是个早有预谋的反革命。

林彪是否是个早有预谋的反革命？看看他在《日记》中记述的对毛所作所为的看法（黑字体），便洞察出林的“反革命”真情：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就要来临！

——林知道毛要整人了，而且把他看成知己；他也知道毛的“三面红旗”政策饿死了数千万人的心结：怕在百年之后，有人搞赫鲁晓夫式的清算（2）。此刻，林尚不知道毛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在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李富春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会人朝着主席台感到惊讶！这个提法，政治局会上都没提出过，会上突然发炮，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两个独立王国的国王不是刘、周。**

——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不经政治局讨论便公开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林认为毛“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但据报导，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是经苏共政治局讨论同意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的贵客，还有婆娘（按：林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林应邀参加毛的寿宴，受宠若惊。他知道毛要造反了，而且不惜屠戮生灵，“**造个天翻地乱**”。历史果真如林预言：毛从文化部试刀，批《有鬼无害论》、鬼戏《李慧娘》，然后利刃砍向北京市委、国务院、中央政治局，最后砍向普通老百姓，造成 200 多万人死亡，上千万人伤残。正是：**天子震怒，血流成河！**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林明白，为了整刘少奇，毛不惜天下大乱而发动文化革命，还要借助他主管的军队，达到“大治”，因此拉拢他，给林夫人叶群加薪。显然，这与毛号召的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婆娘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林十分清楚，中共中央签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来龙去脉，也突现他对毛搞阴谋的警觉。文革中，萧华上将为此付出了被打倒的代价。但江青要打倒萧华，很可能与萧常选女文工团员向毛“进贡”有关。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按：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老毛施阳谋外出”和“这是毛的阴谋”，突显林对毛个人品质的认知：“阳谋”是“阴谋”的变形，两者内涵相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姻（？）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毛在会上指（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林熟悉毛当面握手，背后踢脚的痞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B52”（按：林私下对毛的称呼。）**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按：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一、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发端。）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在毛泽东的策划下，张春桥在上海打响了夺权、武斗流血的第一棒，全国大规模夺权、武斗由此开始。林与毛、江、张意见相左，态度也较鲜明，但他同周恩来一样，都是毛武力夺权的积极执行者。

“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的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备任务。

——“三支两军”由此开始。就《日记》而论，除支左、军管外，林对毛的决策，似持异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按：谢富治）**、张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B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会逼来。

——林说江、谢、张“不遗余力”，其实他也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如实地记录了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的过程。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B52”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留给“B52”纠正的。“B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

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B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说着仰天大笑。

——毛对周的看法，是七年后批周恩来为投降派的伏笔。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按：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

——林反对毛乱军，反对江青插手军队。毛要打倒右派将领，“帽子”也是“走资派”。可见，林在军内打倒了贺龙、罗瑞卿、许光达、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高级将领，毛、江压力是关键，但“九一三事件”后，这些都推到林彪一人头上，使林成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得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毛要选拔工农上大学，派工宣队进驻科研、教育系统，林不仅看出未来的人才断裂层，也看到乱没有“尽头”。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它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叫你不服。

——毛江定刘少奇五大罪状，王光美是美国特务，判死刑，林等跟着毛画圈。试探了众臣是否忠诚的态度后，毛摇身变成了怜香惜玉的天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它同志的意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林被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毛亲自提议**”这个关键问题。这是否能证明：“九一三事件”后，中共公布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写的不信任林的那封信，完全是伪造的？请读者自断！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

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借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按：三个老帅指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改变立场的是叶剑英，四个未举手的是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十月十七日晚，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动。）

——林根据毛的决定，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惹了大祸。林彪和陈伯达要为“不举手”付出代价。

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林彪在《日记》中反对毛整人的政治阴谋，反对江、张、谢等人为毛作伥，甚至反对毛的“层层剥笋”的文革战略部署；但在现实中，他却坚定不移地站在毛的一边，在军队里掀起了活学活用毛著作的高潮，鼓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带动全国，把毛的个人崇拜运动推到了峰巅，强而有力地震慑了党内右派，保障了毛的层层剥笋、步步进逼战略部署的实现，最终把刘少奇拖死到囚所，取得了挫败党内右派反抗的胜利；与此同时，他又与毛、江联手，先后翦除了军内的对手罗瑞卿、贺龙等高级将领，强化了他对军队的控制权，等等。这是为什么？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

“主倡臣和。”

“勿讲真理而重迎合。”

“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

“党性，遵命性也。”

“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

“大事不干擾，小事不麻煩。”

“毛主席划圈我划圈。”

显然，为了权力，林彪把双重人格表演得令人作呕，而记录双重人格的《日记》，也成了反毛、反党和“**早有预谋的反革命**”的铁证。

双重人格人皆有之，普通人呈相生相克的自然态：但在独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许多官员的双重人格呈病态状的两极化——人格分裂。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人格分裂：一方面以权谋为中心，推重谎言，崇信“**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目的，强奸道德**”亦即“政治无道德”的哲学，甚至是“可以和魔鬼结盟”的魑魅，另一方面不忘往脸上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楷模和耿耿为革命的“公仆”，一个人间无法类比的天使。这些在前面第 13 章里有所评说。人格分裂是诸多共产党人的特色，高级干部尤其如此。就人格类型而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智能型或事业型的，又都是人格分裂的表率，比之林彪，他们更聪明、更城府、更诡谲，没有留下授人以柄的《日记》。盖而言

之，林的《日记》谈不上是历史的进步，但它记录了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其厌恶毛的反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林令人作呕的表演，还是获得了毛的赞赏，使他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端，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堂而皇之地写在九大的党章里。

然而，乐极生悲，正当他一步步爬上权力顶端的同时，却在一步步滑向深渊。由于时过境迁，崇信“理无常是”哲学的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正在向江青和张春桥转移**，而他已经变成了毛夺取和巩固权力布局中的一枚棋子。当九大党章中把他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后，自以为地位稳固了的他，“兔死狗烹”的教训逐渐淡化，而强烈的权力欲和自尊心，又使他企图在毛的阴影下改头换面，树立一个**非毛类周**的新形象，为未来全面掌权做准备。但他的新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便走向毁灭。

★题外的话：

近传：林彪《日记》是伪造。对此，笔者既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因为，档案死不解密。假如“伪造”是真的，但在档案解密之前，笔者也不愿修改“林彪眼中的毛泽东”。因为，“伪造”的林彪《日记》，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很可能比“真实的日记”要真实得多！

3、林彪讲话——明颂天才暗批张

1970 年 8 月 23 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三项议题后，林彪按事前与毛泽东约定的内容开始讲话。他俩约定了什么内容呢？据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高的说法，在许多要员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实际上，在九大前，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已经明朗化。林彪觉得跟着毛泽东得罪了太多的大人物，没有像周恩来那样，在跟着毛泽东打倒一批大干部的同时，又能借机保护一批要员。因此，在九大上，他要利用“接班人”做政治报告的有利条件，树立一个敦厚宽容且务实的新形象，以期改变他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助纣为虐的负面印象，为未来全面接管权力做好准备。这个新形象的思路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文革应该体面收场；今后要讲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安抚干部和群众。这个非毛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受到了周的支持。这种“宽猛相济”“恩威兼施”的统治权术，林彪非常熟悉，否则，他统帅百万大军就无法解释。因此，根据他的授意和授权，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然而，他的计划出了纰漏，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宽”“恩”只能有毛做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天才的毛泽东看穿了他施“恩”的计谋，决定收回毛自己曾放出的“三年结束文革”的试探性风言，要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搞下去。因而，他授意陈伯达起草的“**恩**”字号政治报告大纲被毛否决，并由江青集团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取而代之。对于江青集团的张、姚，他曾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但对毛的决定，他也无可奈何。他对亲信发牢骚说：“**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果然，当张、姚起草的以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为中心的“**威**”字号政治报告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便在九大上照本宣科。早在六十年代初，把江青鄙称为“婆娘”、文革中又把张春桥视为“眼睛蛇”的林彪，当九大上树立新形象计划受挫时，便把江、张等视为“接班人”地位的主要威胁。这样，毛左派分裂，形成林、江两个左派集团，开始了争夺接班权的角逐。

在二中全会上，为了巩固已得到的地位和树立新形象，林彪决心利用党内反江、张势力“清君侧”。由于投鼠忌器，无法对第一夫人下手，便先拿江青的高参张春桥开刀。在得到毛泽东首肯后，便重弹“天才”老调，把冷箭射向“眼睛蛇”。此刻，权力欲使他忘记了高岗抨击刘少奇的教训（1）。他说：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批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的观点，指出“**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在谈及宪法草案时，他说“**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并说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他还说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对于“天才”，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上述观点，直讲了一个半小时，赢得了阵阵掌声。这个颂辞连篇的讲话，按约定，没有点任何人的名，但暗藏的杀机，使知情者敏锐地察觉到，副统帅下达了批斗江青集团高参**张春桥**的动员令。

果然，全会在讨论林彪讲话时，批判的矛头迅速明朗化。

4、批张波涛汹涌

张春桥是左派江青集团中摇鹅毛扇的。他在 1970 年 8 月 13 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与左派林彪集团的干将吴法宪发生了争吵。根据毛的面谕，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话，他还以毛曾说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赫鲁晓夫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话，力促在宪法和决议中删除颂扬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句子中的那三个副词，等等。素与张春桥不睦又不知就里的吴法宪，认为张反“天才”的言论就是反毛、反林，警告张“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两人话不投机，又互不相让，于是便争吵起来：一方理直气壮，一方有恃无恐！

山东巨野人张春桥，早年躬笔于上海文坛。1936 年 3 月 15 日，他十九岁时，以“狄克”笔名，发表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短文，挑战鲁迅，初试锋芒。1958 年 9 月 15 日，他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而崭露头角。1963 年，他投到第一夫人江青帐下，自此官运亨通。到了文革，他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江青一起，成了毛泽东的得力打手。在打倒毛的政敌“走资派”的夺权中，他冲锋陷阵，

得罪了太多的党内右派高官；在执行毛的“革命路线”中，他争宠邀功，与林彪集团明争暗斗，又与文革组长陈伯达分道扬镳；在清算毛在部队内的政敌时，他支持江青揪“军内一小撮”，又得罪了太多的党的高级将领。例如，在他和江青的直接支持下：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造反派，险些把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打死；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造反派“炮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逼得许躲到大别山里，不敢出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曾多次遭到造反派的批判和围攻，等等。因而：在毛泽东的眼里，他是响当当的左派，可靠的接班人之一；在林彪集团的眼里，他是一个可憎的争宠对手；在党内右派高官和将领的眼里，他是眼中钉、肉中刺，一个十恶不赦的妖孽。

但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右派高官和将领们，对张春桥的嚣张敢怒不敢言。然而，当他们从林彪暗藏杀机的讲话中嗅出**批张以清君侧**的信息后，特别是当张春桥的反“天才”言论被林彪集团揭出来后，便以为抓住了张“反毛”的“小辫子”。于是，他们便与有宿怨旧恨的党内左派林彪集团，站在一起，在九届二中全会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讨张统一战线。因此，在全会讨论林彪讲话时，群情激昂，打声一片，纷纷发誓，要揪出那个“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坏蛋”——没公开点张春桥的大名。

在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时，华北组发言踊跃，言辞激烈，引起全会注目。例如：

提起江青、张春桥气不打一处来的**陈毅**元帅，不会放过搬倒江青高参的机会：他第一个表态支持林的讲话。但他的表态却遭到了一些中央委员的攻击。他们冲着陈毅吼叫：“你骨子里就一贯反毛主席，老右……”，陈毅被迫不再说话。

当年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也曾不可一世过；但他的权力很快被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副组长张春桥联合架空，生了许多窝囊气。林彪的讲话，给他提供了出气的机会。他针对“否认天才”的政敌张春桥振振有辞地**发泄道**：

“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

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为了说“天才”的理论根据，他连夜摘编了七条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在讨论会上传阅。

素与江青集团不睦的**汪东兴**，不忘给她的高参张春桥当头一棒。他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 30 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汪东兴所说的“野心家”、“坏蛋”是谁呢？有太监总管“美誉”之称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每天呆在毛泽东身边，最了解毛的真实想法，因此，他的发言自然会被人们看成是来自“最高”的声音。由于与会者都想知道这个“坏蛋”是谁，于是，在会议休息期间，一些老干部、老将军，便**“凑过去向汪东兴打听消息”**。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郑维山将军》一文记载：

萧劲光（海军大将）问汪东兴：“汪主任，会前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现在又主张设，是不是风向真的变了？”

汪东兴说：“萧老，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不能糊涂啊！”

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走近汪东兴，问：“汪主任，事情有变啦？”

汪东兴指着郑维山，严肃地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同志，你要知

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追问：“那主席知道这件事？”

汪东兴：“知道，就是不让点名。”

由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最高，火药味十足，又由于他的身份非同一般，在他的鼓动下，华北组与会者都踊跃发言，高调支持林的讲话，形成了不指名批张高潮。

与此同时，在其它组里，林彪集团骨干都纷纷上阵，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据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材料之三记载，“**叶群**称：‘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称：‘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李作鹏**称：‘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称：‘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此外，吴法宪还向与会者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据他事后回忆说那个重要信息是：

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曾身为重臣的吴法宪，当局心迷，忘记了毛的“理无常是”哲学：**今日“出尔”，源于政治谋划，他日“反尔”，本于权力考量**。

5、《第六号简报》剑指张春桥

由于群情激奋，华北组组长李雪锋很快签发该组《第二号简报》，大会旋以《**第六号简报**》向全会转发了该简报。现将六号简报摘要如下：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

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了，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由于大多数与会者都已知道，林讲话的矛头指向张春桥，这篇火药味十足的《第六号简报》，立刻引起了共鸣，纷纷加入不点名批张的洪流中。为了配合批张的“反天才”论，陈伯达连夜选编了三组七条恩、列、毛称天才的语录，在全会上传阅。现将陈选编的语录转抄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21 页（余下各条出处均省略）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

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那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陈伯达选编的语录，都是共产主义导师们相互吹捧的记录，有据可查。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特别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后，“天才”同“伟大、光荣、正确”一样，都成了领袖头上的皇冠冕旒，其它人等没有资格享用——这是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者的惯例；领袖被颂扬为伟大的天才，也无人敢说不——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大特色。陈伯达选编的语录，没有什么新奇，不过是既往颂辞的重复和强调而已。例如，1953 年 3 月 9 日，前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刚刚死了三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称颂斯大林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他**“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1966 年 8 月 12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里，学着毛泽东颂扬斯大林的口吻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同年 12 月 16 日，这段对毛的颂辞又堂而皇之地写入向全世界发行了 50 多亿册被誉为“东方圣经”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陈伯达煞费苦心选编的这套语录，满以为可置政敌张春桥于死地，没成想，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自己“砸”进了秦城监狱。

为了支持江青和张春桥左派集团，毛泽东看见这些早已习以为常而频频笑纳的语录，突然变脸，提笔写了篇批判“天才”的《我的一点意见》，把吹捧他三十多年的政治秘书又当了几年党国第四把手的陈伯达，打入了秦城监狱！“伴君如伴虎”这条远古封建时代的戒律，竟然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发酵！

附 1：高岗抨击刘少奇的教训

据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与中央组织部部长、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结盟，反对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犯有“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行。“高饶反党联盟”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投入监狱后监毙。1955 年 3 月，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独裁体制下权力再分配的血腥事件。林彪事件与之何其相似乃尔！

63-毛泽东反清君侧

作者 于松然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被誉脑子聪明的“常胜将军”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忘记了毛泽东是个出尔反尔的痞棍，是个不择手段的“阳谋”大家；当他再次起用麻肉的“天才论”来拍毛时，冷不防，被毛狠狠地踢了一脚。人们很清楚，在九大上，文化大革命已达到了峰巅，党内右派受到了沉重打击：八大时的 30 个政治局委员中，有 27 个被打倒，占 90%，九大 27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八大中委只有 53 个当选，占 19%。与此同时，九大基本上成了以党内左派为主导的天下：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势力（其中不乏中、右派将领），急剧增强，在九大 279 名中委中，占了 49%；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占了 20～30%；在 25 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林彪势力占 7 人，江青文革派占 5 人，毛的亲信汪东兴 1 人；在政治局常委的 5 个席位中，除中间派周恩来外，其它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 4 人所居有，均系毛左派。因此，毛踢林的一脚，把党内左派踢向分裂，把中间派踢向了右派。“聪明反被聪明误”，同聪明的林彪一样，毛的一脚，也把自己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踢向末路。自此，走上峰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衰落，曾经不可一世的党内左派，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派别；备受打击的党内右派，利用左派分裂，悄悄与党内中间派联手，伺机东山再起。

1、抛出陈伯达当替罪羊

《第六号简报》出来后，惊慌失色的江青，拿着简报，领着如惊弓之鸟的张春桥，来到毛泽东御前告状。毛泽东看过简报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收回《第六号简报》，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没给副统帅留一点面子。毛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之举。在他看来，林彪对他并非绝对忠诚，选其当接班人是一种权力交换。九大后，当林、江两派争斗愈演愈烈时，他心目中的信任天平，正向江派一边倾斜。二中全会前，他发现林在军队里的势力快速膨胀，而林的“第一号手令”的下达，公然挑战他的权威，有篡夺军权之嫌，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令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林在全会上批张时那一呼百应之势、以及《第六号简报》那股浓烈的火药味，都公然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尽管善玩“阳谋”的他，曾私下准许林不指名的批张，但出乎意料的是，批张来势迅猛，已经威胁到他的台前代理江青，使他大吃一惊！猜忌心结促他立即做出判断：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批张行为，是林彪搞的阴谋。嗜权如命的他，忽然发觉大权旁落的危险已经再次出现，刘少奇第二就在眼前。对此，他不能听之任之。他迅速做出决定：**遏制**林彪集团，**保护**江青集团。为了分而化之，各个制伏，他先稳住林彪，抛出常委陈伯达当其替罪羊，针对陈选的几段语录，写了一篇《**我的一点意见**》，借以警告林。他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

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的一点意见》通篇充斥着专横、武断、谎言，又是不值一驳的文章。在民主社会里，这种专横文章是没人敢写的。因为，在中央全会上，自由表达意见是党章上规定的民主权利；但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一篇不值一驳的侵犯民主权利的谎言，便能震慑住二百多名中央委员，没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敢反驳。陈伯达是从文革发迹的领袖级人物，是党和国家的第四把手。然而，仅仅一篇支持林彪的“天才”论，使他从权力的峰巅，堕入万丈深渊。陈的倒台再次警告人们：一手遮天的毛泽东，打倒二号领袖刘少奇历时三年，而打倒四号领袖陶铸和新四号领袖陈伯达，只用一句话——这就是马列主义者倡导的民主集中制。

据笔者考察，**陈伯达是个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忠于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工作。后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1930 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并在福建军阀张贞部当少校秘书。1935 年参加编辑《华北烽火》。1937 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在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1956 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 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69 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解放”前，在毛泽东同肩负莫斯科使命的王明、周恩来权斗中，他协助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战胜王、周联盟、巩固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积极**配合**毛泽东，起草了《七大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对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贡献。其中《论联合政府》载入《毛泽东选集》，著作权归毛。当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他写了批蒋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受到毛高度赞扬，被上层精英们誉为“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是一本“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书，

等等。**“解放”后**，他**紧跟**毛泽东，起草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在“三大改造”和大跃进中，他紧跟毛泽东进行过疯狂，使数千万农民饿毙。他积极参与毛推动的中苏论战，起草《二十五条》，参与“九评”文章的编写。当获知毛要整刘、邓时，他起草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十三条》。他点睛式地修改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使《纪要》一下子蹿升到马列主义理论高度，等等。**文革中**，1966 年，他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了文革中的权力中心。他秉承毛旨，起草了《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文革纲领性文件，为毛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手持毛的“尚方宝剑”，一夜之间，夺了《人民日报》的权力，自任总编辑，秉旨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等系列社论，鼓动造反，引发和推动了“红八月”大屠杀，导致全国十万人丧生，其中北京有五千多人死于非命。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代表毛泽东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接着在 1967 年元旦，他的《人民日报》又秉旨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掀起了向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全面夺权斗争，得罪了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为文革后科以重刑埋下了祸根；11 月 6 日，他的《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颂扬其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等等。

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最主要**任务**是，要善于赞颂最高领袖，因此，要求理论家们要擅长揣摩最高领袖的**思想**，并将其思想转化成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而**布教全国**；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最重要**使命**是，要善于紧跟最高领袖，因此，要求政治家们要敏捷领悟最高领袖的**意图**，并将其意图转化成宽猛相济的**指导方针**而**付诸实施**。做为中共理论家兼政治家的陈伯达，公正地说，这些任务和使命，他都做到了。到了九大，陈伯达事业已达峰巅，当选为政治局五大常委之一，大名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康生之前，成了炙手可热的党国第四把手。因而，他获得了极高的赞誉：**“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显而易见，陈伯达的一生是**配合、紧跟**毛泽东的一生，是**秉承**毛泽东旨意进行革命的一生。文革之初，他原本是江派的领军人物，但在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几年中，备受江、张的掣肘和排挤，权力逐渐为江、张所取代，成了半傀儡。由于争宠夺幸，他逐渐与林派靠拢，谋求林的支持与江、张抗横。然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揣测领袖意图”出了偏差，导致马失前蹄，酿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尽管他还不是林派人马，但在毛泽东看来，他在全会上的发言和选编的语录，是投靠林彪的铁证。他已触犯了毛的禁忌，很快变成了毛必欲铲除的对象，向他发出了声讨檄文《我的一点意见》。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根据毛的讨陈檄文和面谕，中共中央发出“批陈整风”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一个政治局常委，企图揪斗一个政治局委员（这个委员在毛死后被判死缓，真的倒了），成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反党分子，而一个党主席轻而易举地又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却变成了反对分裂的革命者。这就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

全会后不久，陈伯达的“罪证”又迅速升级：他不仅是个阴谋家、托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而且还是个罪行累累的叛徒、特务和国民党反共分子。因为，毛泽东曾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话，对长期追随他并担任他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大加鞭挞：**“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不罪则已，罪必罪死的毛泽东的权力情结。周恩来不敢怠慢，紧紧跟上，他说**陈**是**“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把他投入秦城监狱。文革后，党内右派复辟，他的罪行也随之翻新变性，上述罪行包括钦点的罪行，都不翼而飞，旋以**“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罪，堂而皇之地写入判决书中，科以18年重刑。1988年10月刑满释放。

为了遏制林彪集团，毛泽东为什么先拿他的忠臣陈伯达开刀呢？在档案死不解密和拒绝独立调查的情况下，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例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对陈伯达的疑虑，也不是没有来由。那就是陈伯达的三次华北之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党政军特别是军界积聚了不少人气，许多人倚仗他来解决问题。在毛看来，形成了一个以陈伯达为首，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文武大将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语，当然来自毛的判断），**加上又出现陈伯达有靠拢接班人林彪的动向，这种种迹象不能不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历史无数事实已经证明，除毛泽东外的四大常委中，在党政军中“人气”最旺、“山头”最高的不是林彪，更不是陈伯达，而是周恩来。与周恩来相比，陈伯达那点“人气”、“山头”，如果不是借口打人，简直不值一提。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当时真正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周恩来，其次才是林彪。当年他提拔林为副帅，是对付劲敌的权谋：打倒刘、邓，抑制周恩来。然而，星移斗转，刘、邓已倒，左派分裂，林彪势力要打倒他的前台代表江青和张春桥了。嗜权的本能，使他敏锐地查觉：林的抑周作用不再有效，而且还有被周所利用的危险；如果周、林联手，则权力危矣。因此，他当机立断：联合尚不敢轻举妄动的周恩来和右派势力，将羽毛尚未丰满的林彪拉下马来，保住江、张。《第六号简报》发出后那迅猛的批张形势，又使他清醒地看到，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党心、民心。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夺权、武斗、“清队”、“群众专政”和“一打三反”等各个阶段的“战略部署”中，陈伯达同江青、张春桥一样，都是他的忠实执行者和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在反击林派和党内右派掀起的批张风潮中，都应站在一起，团结对敌；然而，陈却站在林彪一边，反戈一击了。盛怒之下，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为了倒林，他再次起用同倒刘、邓一模一样的层层剥笋战术：既然你陈伯达主动跳出来为林彪充当倒张的马前卒，那就先拿马前卒开刀，在以儆效尤的同时，顺便安抚一下对文革抱有怨气的党心。毛这一招果然高明，在中央委员会里，陈的积怨并不亚于江、张，因此，当毛利用权力把怨张的怒气引向陈伯达时，不论中委中的中间派和右派多么厌恶江青、张春桥，但要打倒陈伯达，他们都能借机吐一吐心中的恶气。由是，中共政治局第四号常委陈伯达，就变成了副帅林彪的替罪羊。

从陈伯达紧跟毛泽东舞笔弄权、浩劫中华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但从他配合、紧跟毛泽东和**秉**承毛泽东旨意进行革命来说，判他 18 年徒刑，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如果说可以给刽子手周恩来戴上个“人民的好总理”的桂冠，并推举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给文痞陈伯达冠上个“人民的理论家”的称号，并还原其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不足为奇。

陈伯达出狱后，对采访他的作家叶永烈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人们还不太清楚他的“愚蠢”、“负罪”和“发疯”具体指什么，但他**能忏悔**，仅此一点，这个罪犯远比中共几代领导人诚实、文明因而人性得多！

2、逼向“九一三”

王年一、何蜀、陈昭在《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 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 1966 年 9 月 14 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 月 25 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1970 年 11 月 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他向林彪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信息：我倚重的不是你，而是你反对的江青、张春桥。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的康生，九届二中全会后，便称病不起，实际大权落入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九大”后，中央组织宣传组，取代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权力更大的一级官衙。毛泽东便可随心所欲地以其夫人江青为代言人，并通过她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号施令。

批陈逐步升级到批林彪的亲信。197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认的**“天才论”**。当人们

已厌倦文革的形势下，毛要批陈的前三论，恰恰是人们所响往的，因此，批陈阻力很大。为了仵逆人心而动，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警告各级政要：“**‘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但收效甚微。恼羞成怒的毛泽东，把北京市第一书记李雪峰和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大员打成反革命，同时，用他惯用的置敌于死地的罗织和构陷伎俩，把陈伯达的“罪行”升级。他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道：**“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为了打倒陈伯达，连他自己长期重用“特务”“叛徒”做政治秘书的“脸”都不要了。

毛泽东舞剑，意在林彪。很快，批陈“四论”的矛头指向林彪的亲信“五虎上将”——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主要负责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军委办公厅主任**叶群**、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部长**邱会作**，合称“黄吴叶李邱”。

据当事人回忆，1970年8月31日下午3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吴、李、邱和中央为公厅主任汪东兴开会。会上林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然而，除毛的亲信汪东兴外，包括军委办公厅主任在内的“黄吴叶李邱”等人，用检讨来与陈伯达“划清界限”时，却越检讨越划不清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会上，批陈之剑直指“黄吴叶李邱”，批判他们犯了**“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尽管“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做过多次书面检讨，但他们的检讨不仅过不了关，而且越陷越深。毛泽东在他们的检讨书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他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批道：**“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他在林彪夫人叶群的检讨书上批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并批示前面加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显然，“各同志一阅”意在敲山震虎，威逼林彪认罪。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太监总管“美誉”之称的**汪东兴**，是毛的亲信，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最高，火药味最足，“黄吴叶李邱”甚至陈伯达，都无法与之相比；然而，毛却“赦免”了他。李肃在《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决裂的》一文中，引用《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的话说：**“当时九届二中的时候，实际上出面批判张春桥的可不是林彪，而是包括毛自己的一些所谓亲信，像汪东兴。后来汪东兴事后痛哭流涕，跪在毛面前求饶，就是因为他误会了毛泽东。他原来以为说，批张就是紧跟毛泽东，就能得到毛的欣赏。但没想到毛对张春桥只是想鸡毛掸子轻轻拍一拍。拍重了，毛就觉得伤到他自己了，他就反过手来打击**。”由于毛仍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釜底抽薪。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他曾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

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是心术不正的流言痞语。这样的流言痞语在毛的辞令中并不少见。例如：

“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
“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屁股**……”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
“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一定要嗅一嗅。”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
“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泽东这些流痞语言是阴暗心理的反映，几乎都能与**“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权谋联系在一起。为了打倒林彪集团，他专横霸道地甩出《我的一点意见》和一些批语，当作石头，砸向林彪；猜忌使他对他任命的忠于他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产生怀疑，以“不透气”之名进行改组，调入李先念、纪登奎等左派亲信，痞其名曰“掺砂子”；由于错把陈伯达特别是汪东兴批张的发言，当成传达他的声音，形成了火药味十足的《第六号简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大员，这些本不属林彪集团成员而对他效忠者，“聪明反被聪明误”，效忠失检，反而被他打成反革命，当作林的“墙角”挖掉，“挖”进了秦城监狱。1971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为防止林彪政变，决定重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此外，毛还争取与林彪有宿怨或抵梧的军中老帅**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的支持，谕示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

拒绝与林彪见面。为了缓和矛盾，林曾多次求见毛泽东，都被拒之门外。据“林办”秘书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要让林彪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林虽没见到毛，却留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由江青拍摄的林彪读毛著的照片。另据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多年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又据《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说：“据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由于见不到毛泽东，林彪当然心知肚明。他太了解毛泽东了：毛在打人时拒绝与被打者

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只准被打者“低头认罪”——这是毛泽东打人时的一贯手段。此后，个性倔强的林彪，便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他还曾对紧跟他的大将黄、吴、李、邱等人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大不了做彭德怀第二。”**他做好了被毛打倒的思想准备。

3、南巡“打招呼”——狼要吃羊

王年一等人在《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 1971 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前后共 28 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 13 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狼要吃羊时会制造出许多吃羊的“理由”，它还可在“舆论一律”的强权下，下令所有媒体把“吃”的“理由”说得“义正词严”，“光明磊落”，甚至还能把“吃”的“理由”提升到马列主义理论高度；尽管羊有许多理由能将狼驳倒，但在“舆论一律”的强权下，喉管或被麻绳勒紧，或被割断，无法反驳。道理很简单，因为，封建社会主义社会的赤文化之刑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换句话说，就是：**无理横行天下，有理寸步难行**。

王年一等人在《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一文中继续写道：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 3 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

然的吗？”

中共的伦理共识（4）赋于毛泽东一个这样的特权：他背着中央暗中搞的一切，包括南巡“打招呼”中的煽风点火，统统叫做**“团结、光明正大和马克思主义”**，而林彪在中央全会的讲话，陈伯达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这些《党章》上规定的民主权利，因为**“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就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罪恶，统统叫做**“分裂、阴谋诡计和修正主义”**。”这种“三要三不要”精神，还表现在他善玩“引蛇出洞”的“阳谋”上。

南巡中，他三令五申，他的讲话不准外传，更不准上传北京和北戴河（林彪住处）。但他真实的目的同反右一样：“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1971 年 8 月 28 日晚上 9 时，毛泽东在长沙召见了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政委刘兴元。广州军区被毛认为是林彪的嫡系，丁、刘都是林麾下的猛将，因此，他不去广州南巡，而在长沙召见他们。为了重点“关照”广州军区的将士，他设计了一套一箭三雕的“阳谋”：在给丁、刘讲了林彪**“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等“定性定罪”的南巡讲话后，他要他们回去向两千多师以上干部传达他的讲话，其目的一是给林彪透个信，二是拘拿胆敢给林通风的“死党”，三是震慑广州军区广大干部，要他们好自为之，别跟着林彪跑。广州军区的师以上干部哪有两千多？显然，他暗示可以扩大范围，以提高通风报信的机率。丁、刘诚惶诚恐，誓言效忠。9 月 5 日，丁、刘从长沙回到广州，便立即根据毛的要求，召开广州军区 2,000 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政委刘兴元传达毛泽东“吹风”的主要内容。会上又按毛的规定约法三章：不准记录，不准向下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中共许多见不得阳光的实事真史，都在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中消失了。

对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目的，当时许多人看得很清。有人这样写道：

“他（毛泽东）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狗急跳墙’。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果然，有人上钩。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了毛南巡讲话传达后，立即将毛南巡讲话内容密报给周宇驰和于新野。9 月 6 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 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 15 页的顾与于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面交林彪、林立果。9 月 13 日，周、于自杀身亡，9 月 17 日，顾被捕，以“通敌罪”判了十一年徒刑。

同“贼喊捉贼”一样，善玩阴谋的人却在大讲“三要三不要”，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但要肯定的是，在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中，有一条倒是事实，即“要搞马克思主义”。纵观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无一不是靠**谎言、阴谋、镇压和暗箱操作**来维持统治的，鲜有

例外者。

4、林彪抗命殉党——不认罪、认命

在步步紧逼、拒绝见面和罗织、构陷、强词夺理的批判面前，准备**“大不了做彭德怀第二”**的林彪，已没有招架之功。个性倔强不愿低头认“错”的他，放弃了构通和弥合的希望，做好从容就义和长期监禁的准备，听凭命运的任意宰割。他离开了令他烦恼的北京，到苏州、北戴河去静心“养病”。

在“养病”中，他可能想了很多很多。人们虽然不知道他是否有所忏悔，但从他在九大上不愿“继续革命”而想树立新形象的欲望上，可以窥见到，他对过去吹捧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已有所反思。人们还可以从林立果等人起草的被称为讨毛檄文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看到他反思的端倪。例如：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活水平下降；农民缺吃少穿；上山下乡，变相劳改；红卫兵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又当替罪羊，等等。

有人论证说，没有证据表明《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彪所为。这个论证恰恰证明，林彪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起草者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一个是林的儿子，其他是儿子的好友，既使没有证据证明《纪要》系林彪口授，其思想的影响也无法排除：《日记》与《纪要》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在耳濡目染下，林立果不学也自会三分。这足以说明，此时的林彪已有所醒悟，尽管他同林立果的醒悟程度有很大的差距。

鉴于高岗自杀和囚毙彭德怀、拖死刘少奇的教训，在无可奈何的认命中，强烈地自尊心使他对毛的进逼以死相抗。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一个足智多谋领兵元帅，为什么不以武力抗争？怎么会毫无抵抗就接受失败？笔者认为：在中共建国后二十二年的内讧中，由于中国人的忠君和愚昧，毛泽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和上风地位；正因为林能审时度势，清醒地看到力量上的悬殊，任何武力对抗都将是以卵击石，毫无意义，何如**不低头，不认罪，宁死不屈**，落得个名垂千秋？

1971 年 4 月 15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会议拿林的亲信黄、吴、叶、李、邱等五人开刀，逼他们作违心的检讨。他们的检讨受到了与会者的无情批判，“理所当然”地过不了关。根据毛的安排，周恩来总结说，**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其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等等。显然，这是杀鸡儆猴，是威逼林彪认罪的重要部署。19 日，林彪回京，周恩来立即给他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林当即表示：“坚决不讲”，并拒绝出席会议**。

林彪与毛的对抗，集中表现在 1971 年 5 月 1 日晚上。那天晚上，党和国家的大员们，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怀得强烈抗拒心理的副统帅林彪，姗姗来迟。后来，目击者做了这样**描述**：

“1971 年的五一节。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 6 个年头。用当时的话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这天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了天安门的休息室里，他穿上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

由于不是经常穿，衣服显得不是那么贴身。平时不修边幅的毛泽东，帽子也没有戴好……

“按照预定的时间，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还是不见林彪的身影。

“周恩来有点着急，他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消息。

“工作人员进来，请他们到城楼参加晚会。毛泽东站起身，对旁边的西哈努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自己往外走去。这时林彪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这天的桌子是这样摆的——毛泽东的身边是西哈努克亲王，再旁边是董必武同志，他是国家代主席，他在这个位置是当时的一般排法。

“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

“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披一件军大衣，本来就没有什么肉的脸上，几乎是没有任何表情。他很清楚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便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

“按照正常情况，他应该和毛泽东打招呼，也应该和外宾打招呼，但今天他没有，他落座后一声没吭，这是够反常的。

“更叫人惊奇的是，林彪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周恩来以为他是上卫生间了。好半天不见他回来，周恩来起身让有关的人去问，才知道‘林副主席’已经走了。

“这太反常了！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中国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1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要当国家主席，被毛泽东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翻了车’。他已经开始秘密活动，准备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这是“主旋律”的声音。在这种声音里，目击者在描述真实过程中，按照“真话、假话搀和着说”的赤文化传统，习以为常地搀进了一些谎言。例如“**他要当国家主席**”，“**他已经开始秘密活动**”；也不敢忘记赞颂独裁者，例如“**毛泽东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而对林的有意迟到、“一声没吭”和不告而辞的不低头、不认罪的不屈的精神，则被鞭挞成“**他已经开始秘密活动，准备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中共伦理共识的赤文化，已确定了党国的君臣关系：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臣若疑毛，便是不忠；臣若威武不屈，便是叛逆——这种赤文化铸成了毛泽东的专横跋扈和臣下的卑躬屈膝，也铸成了“主旋律”的强暴和知识精英们的**犬忠**。

在毛泽东的步步紧逼下，林彪本应低头认罪，但强烈自尊心使他威武不能屈，变成了赤文化所不容的异类。因此，这次毛、林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会面，成了两位共事四十多年的战友的诀别式会面。从此，他们俩再也没有机会见面；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谁也没有机会再次登上天安门来宣示他的辉煌和权力了。

诀别前是亲密战友，诀别后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这在现代自由世界极为罕见，但在共产党世界却累见不鲜。**不是朋友，便是敌人**，这种陈腐的封建专制观念，迄今仍是中共上层权贵们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王年一等人在《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一文中又写道：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 1959 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 1966 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

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倔犟的林彪不低头“认罪”，但在伦理共识的赤文化里，他不得不认命了，犹如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那样。1971 年 9 月 13 日零时 20 分左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步步紧逼下，他被不认命、要造反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挟持”下，登上了逃亡的飞机，2 时 27 分，同妻子、儿子一起，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而汗大荒漠上，酿就了一起震撼世界的大丑闻——**“九一三事件”**。

64-林立果抗命殉国——不认罪、造反

作者 于松然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可不认命，他要反抗。他的反抗，不是林彪那种不“认罪”只“认命”式的反抗，而是暗杀和武装政变，用武力推翻毛氏**反动王朝**。

1、推翻反动统治有理

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但这句“经典”，却没敢选在他的四卷“选集”和而后的《毛主席语录》中。因为他是当权者，不许别人造反。文革之初，他身为中共党主席，原本也不准造反，但“三年人祸”后，权力逐渐被刘、邓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所占有，他被驾空了，边缘化了。嗜权如命的他，大权旁落是无法忍受的，他要发动无知的青年学生为他夺权。于是，便向红卫兵发表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煽动青年学生大造他心目中的反动派的反。此时，他心目中的反动派是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异己者和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党外持不同政见者。

但**“反动派”**不是一个可以被毛泽东任意支配的毛氏专利词儿！

“反动派”是个贬义词，不是专为某人某个集团设置的，因此，这个词不可能为毛泽东所独霸。“反动”在不同的学科里有不同的释义。在物理学中，指反向运动；在历史学中，指历史的倒退行为，或指逆历史潮流的行为；在政治领域，从不同的利益、主张出发，人们对“反动”两字也会有相对不同的释义。“派”指人物、事物的系统、流派，政治上特指不同主张、不同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分支、门派和集团。

毛泽东是个自命不凡的妄自尊大者。从维护他的权力出发，便自封为“革命”、“人民”和“无产阶级”的代表；把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做调查，勿需选票，便宣布自己代表了 95%以上的人民群众，一如世界各国共产党领袖所做所为那样。因而，任何反对他个人主张和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人，诸如他所制造的地、富、反、坏、右、叛徒、内奸、黑帮、走资派、牛鬼蛇神、修正主义以及学术权威，等等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被他视为“反革命”、“反人民”、“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统

统叫做“反动派”。这种以“我”划线的毛式“反动”说，是相对的，因为，对方也可用“反动”来回敬他。

从历史角度来看，任何逆正常历史进程、反历史潮流的行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动派，不管他们打的革命旗号是什么。

七十年代末，在讨论中共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时，原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评价毛泽东时说：**“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笔者认为，除“建党他有份”外，其余他都有罪。因为，他用“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是个反普世文明的封建专制政权，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华夏文明的大颠覆，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动派。例如：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掀起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运动，是历史大倒退行为，它使中国饿死了 3,000～4,500 万人；其后，在党内外**亚民主**力量的压力下，不得不被刘少奇的“七分人祸论”的新思维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新政所取代。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执行的曾使数十万人丧生的“三大改造”政策，即农业、手工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也是历史大倒退行为，它使中国陷入长期贫困中，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后，在党内外**亚民生**力量的压力下，又不得不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新思维和“市场经济”的新政所推倒。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使 200～300 万人死亡，伤残无数，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人权等各个领域内的任何意义上考量，都是历史大倒退行为；毛死后，在党内外**亚人权**力量的压力下，中共不得不将其界定为“浩劫”，遂又被“拨乱反正”的新思维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新政所否定。由此可见，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夺得政权后的二十七年间，利用“枪杆子”扼杀民主和自由，先后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暴力杀掠式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高饶”、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黄张周”、学大寨、“四清”、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颠覆了华夏文明和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使中华大地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假、恶、丑横行天下，批、斗、杀甚嚣尘上，**从而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空前惨烈的红色恐怖中，先后导致五千多万人丧生——这是历史大倒退的法西斯暴行。这种历史倒退暴行，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历史至少倒退了三十年。正是：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

显然，毛泽东统治的 27 年，是倒行逆施的 27 年，是建国、治国和文革有罪的 27 年，是祸国殃民的 27 年，因而，他的统治是历史的反动，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历史归类于**反动派**之中。因此，推翻毛泽东的反动统治，当属正义、爱国之举。

毛泽东死后，中共虽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检讨了毛所制定的各项祸国殃民政策，但**既不忏悔，也不道歉**，仅仅在悄悄中有所收敛，有所改变。其中：仅在 1978～1981 年的三年间，便悄悄平反了 300 多万件冤假错案；到八十年代初，全国亿万农民行动起来，把反动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悄悄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开始进入能吃饱饭的时代。

今天，在“主旋律”的统帅下，当人们在讴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时，要扪心自问：毛泽东和中共的革命胜利，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些什么？——带来的是贫困、

迫害和屠杀！带来的是历史反动！也许有人指责笔者极端，但这个“极端”却是无人能推翻的历史事实。

当前，评述、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著作汗牛充栋，但由于他们没有把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界定为**反动派**，在“主旋律”的限制和“**成王败寇**”封建流毒的影响下，都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因此，他们的论述出现许多这样逆正常历史进程、那样反历史潮流的结论，都在所难免。

2、林立果——革命浊流中的叛逆者

从历史的角度考量，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因此，任何批判、改变、驱除甚至推翻他们反动统治的行动，当属正义之举，尽管笔者赞同“茉莉花”渐进政改，反对流血革命。**林立果**不愿学他父亲那样消极认命，在毛泽东“批陈整风”和“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步步紧逼下，他要反抗，他要造反，他要用武装政变来推翻毛氏反动王朝。这里借用毛泽东“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话判定：**林立果的行动，不论成功与否，都应视为正气凛然的英雄行为**。

由于在“九一三事件”中，林立果被放在次要位置上，相关他的资料少之又少，人们无法看到他的全貌。为了正视历史，笔者只好从一些知情人记述的褒贬中，捕捉到他的一些生活片段，借而传之，以告慰英烈。

林立果，1945 年生，1966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一年，天下大乱，毛泽东下令学校从 6 月 13 日起停课闹革命。林立果也同其他学生一样，参加了红卫兵，进行大批判、大揪斗、大串连，闹起革命来。据林彪《日记》记载，到了 1966 年年底，“**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第二年年初，“**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而此时，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援引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3 月 19 日，中共又将军队“支左”任务发展成“三支两军”，即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 月 25 日下午，一百多名“联动”的贵族红卫兵骨干，因挑战毛泽东而被捕，被监禁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审时度势的林彪，同夫人叶群商量后，便利用权力将林立果送入部队，一如当年毛泽东送长子毛岸英入志愿军司令部当彭德怀俄文秘书那样。入伍几天后的 1967 年 3 月，林立果便走马上任，当上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开始了他短暂的军事生涯。

林立果是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他像世上大多数独生男孩一样，从小就备受林彪和叶群的宠爱，他和他的姐姐林立衡，被林彪称为自己的“一对眼珠子”；他长得很像林彪：细高的个儿，白净的皮肤、单眼皮；他的小名“老虎”的“虎”字，也只是比林彪的“彪”字少三撇。据熟悉他的人讲，在青少年时期，他很文静，喜欢读书，特别爱鼓捣无线电，他性格很腼腆，有时和生人交往都会脸红。在他的卧室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电子器件。（右图）



林立果（右）与林彪

正因为他出身名门，历史从他降生之日起就给了他许多出人头地的机遇，享受到常人子弟难以想象的殊荣。当他走马上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时，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四个月后，经空军司令**吴法宪**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介绍，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使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在吴司令、周主任等人的关照下，他快速成长起来。1969 年 10 月，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他的火箭式发迹之路，被人讽为“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对此，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发迹之路”实属平常。君不见：刚毕业不久的**肖力**，才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就当上了《解放军报》总编（时称总编辑小组组长），因为她是毛泽东爱女**李讷**；一个娇小妩媚的基层译电员**谢静宜**，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没有经过逐级上爬、举荐，一跃而任北大、清华两所顶级大学的第二把手，因为她曾是毛泽东宠幸的“秘书”；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兵团级以上）**毛远新**，也是火箭式的干部，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侄儿。因此，林立果荣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是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组织路线”的体现，是顺“理”成章的“正常”推举范例。

不过，吴法宪并不认为，他提拔林立果仅仅因为林是贵族出身，他认为林也确实干过一番事业。他回忆说：

“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专门从事科研活动，林立果非常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如远程雷达等。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

对于远程雷达，当年空军有一份报告对林立果的调研小组加以肯定：

“如何先发现敌人向我发射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这是当前战备工作中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空军组织一批力量进行了研究和试验，并且初步取得了成功。这项研究，就是在原有用于侦察敌机的地对空雷达设备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技术革新，使它能够改用侦察来自敌方的导弹。这样，如果改装几台这样的设备，把它布置在北京四周的适当位置上，就可以在敌人已向京发射导弹之后，使北京能够得到五至五十分钟的预警时间。这项革新对于首都的安全是一个贡献。”

对此，因在“调研小组”当翻译被判五年徒刑的**陈伦和**，也持吴法宪的看法。他在 25

年坚持上访的“申诉书”中写道：

“1970 年 4 月，我从陕西的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司科研部资料翻译处任翻译，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军军事技术资料，供空军首长参考。曾记得是 5 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会议室，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部里的大会，印象尤为深刻。并且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在空军任作战部副部长。……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笔者**：空军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笔者**：空军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到过广州、汕头、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沪期间未随他去过苏州和杭州。”

但也有人并不完全认同吴司令和陈伦和的说法，林立果的顶头上司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是其中之一。鲁珉者，空军一级战斗英雄也。1980 年大审判时，被定为林彪死党，判 10 年徒刑，后又被悄悄释放在家。他对来访的作家张聂尔说：

“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个时候全国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处看外国书籍、录像、电影。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怎么拍怎么拍，还能鼓捣一通。他也异想天开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不过在我面前还不敢装腔作势。有一次，他要搞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说那个美国早就有。他又想搞垂直起降，问我行不行，我说美国都没搞成，英国搞了个‘猎兔狗’，也不怎么行。可他非要搞，把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都请到北京空军招待所，叶正大（叶挺之子，飞机设计专家）也参加了，叫我也去，把曹里怀（原空军副司令）也叫去了。叶正大很聪明，说，关键要把发动机搞出来。其实是托辞嘛。”

鲁珉回避了远程雷达问题。人们对人对事的评价不可能绝对一致，这是社会意识的自然形态；而“舆论一律”或“主旋律”强制统一，则是对社会意识自然形态的恶性扭曲。吴法宪、陈伦和对林立果的“褒”与鲁珉的“贬”，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多样性，尽管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从一褒一贬中，人们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笔者认为，林立果是个有很强事业心的青年，他的“异想天开”恰恰是开创性事业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林立果又是个雄心勃勃的叛逆者。张聂尔在《**鲁珉谈林立果**》一文中写道：

“林立果没有社会经验，却过多过早地接触了社会最高层的政治内幕，中国当时处在与世界隔绝之中，林立果却大量地看阅了国外画报、资料、电影、录像……他的纯情和理想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一下子击碎了，思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显然，这是“主旋律”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客观上反映出林立果叛逆精神的**形成过程**。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证明，共产党政权无一不是靠谎言和镇压来维系的。在毛泽东统治下，政权的最高层，充满了阴谋和尔虞我诈，内讧不断发生。这些高层的政治内幕，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许老百姓知道，否则，肮脏的内幕会助长叛逆，引起社会动荡。当年笔者身

居蒿蓬间，在“舆论一律”中，听到的尽是“伟大、光荣、正确”之声，而目睹地方官僚的胡作非为，却还以为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唸错经”了呢！但林立果却没我等之愚昧。身为副统帅的公子，虽没有证据证明他看过林彪《日记》，但在耳濡目染下，他一定会知道许多高层的肮脏内幕。事实上，当他踏入社会后，这些肮脏内幕，便从他平时的言谈话语中表现了出来。

据鲁珉回忆说：“**据说林立果人挺聪明，有些特点真像林彪，有时看问题说话还真尖锐。有一个人正在为文化大革命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断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对他说：这样斗来斗去就像绞肉机。这人一听，茅塞顿开，顿时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又据林立果的女友**张宁**回忆，当她向他提出清查“五一六”运动扩大化时，林立果不假思索地说：“**我不相信有‘五一六’。江苏搞出那么多，上海就没一个？都是张春桥和许世友在争夺势力范围。那个张春桥就怕掌握不了军权**。”当她提到林彪也说打倒“五一六”时，林立果不屑一笑地说：“**你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名言吗？他说政治斗争是最肮脏的，无实话可言。**”还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教育正规、条件优越、潜力很大，但没有出息。文化大革命都起来造反，革命者都成了反革命者，‘五一六’就是最好的例子**。”显然，林立果的言论，对于当年包括张宁在内的年轻人来说，不但不敢说，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因此，当年的张宁把林立果的言论视为“邪端异说”。

了解高层肮脏内幕的林立果，大胆地发表些“异端邪说”，是坦率和嫌恶的表现。他的坦率远比那些谎言连篇的“伟光正”者、远比那些溜须拍马的精英们要诚实得多，尽管并不证明他叛逆。但他的嫌恶却有反毛、反高层肮脏的征兆。这些在鲁珉回答张聂尔时已经表现了出来。鲁珉抨击林立果道：“**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那时候提起刘亚楼，我们都讲刘司令，很尊重的。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哎，我想，刘亚楼跟你父亲同辈的，小毛孩子还挺狂。对吴法宪就更不用说，就叫吴胖子**。”鲁的抨击，与其说林立果不尊重长辈，倒不如说他是父辈们的逆子！

为了使谎言大行其是，不被揭穿，“舆论一律”的宣教管制，便被毛泽东炮制了出来。这是依靠谎言进行统治的专政者的共识。

“舆论一律”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洗脑术，即对大陆中国人，用一种声音反复灌耳，用一种文字、图像和影视反复养眼，同时，屏蔽一切外来不同声音和影视的“干扰”。换句话说，就是毛泽东力图将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全部“格式化”，然后“输入”他一个人的思想，并使全国人民的思想与他同步，跟着他的思想而思想，同时，用“防火墙”阻断一切外来信息的入侵！

为了“将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全部‘格式化’，然后‘输入’他一个人的思想”，“舆论一律”的两个重要特征，便被毛泽东制造了出来。其一对自己要“**一俊遮百丑**”。毛泽东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因此，他要求对中共做的“一件”好事，要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而达到一俊遮九丑的目的。其二对敌人要“**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对于阶级敌人，假如他们办十件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就要抓住那“一件”坏事，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而达到丑化、妖磨化阶级敌人的目的。

在“舆论一律”的强权统治下，一切敢于阅读国外读物、观看国外影视作品或收听国外广播人，都会被以偷看反动报刊和影视、偷听敌台的罪名科以重刑。这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態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显然，这种思想是马列主义、封建专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意识自然形态的反动。因此，对这种反动思想的反叛和忤逆，便成了一切有识之士的必然选择。

在“舆论一律”下昏昏欲梦的中国人中，林立果是清醒的叛逆者之一，是当时中国难得的**佼佼逆子**。

出身于副帅家庭的林立果，得天独厚，不仅知道很多高层肮脏内幕，在封闭的环境里，还能接触到外部世界。他在空军成立的调研小组，在从事科研活动的同时，看到了许多外国书刊、录像、电影，吸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新鲜的自由空气。新鲜空气与肮脏内幕的反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禁锢、开放与封闭的碰撞，特别是美好的理想与恶劣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促使他思想发生了剧变，双重人格病态状即人格分裂日趋明朗化：一方面他是受到毛泽东表彰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表现了他对毛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效忠性，另一方面他对现实日益不满，准备随时取父辈而代之，显现了他对毛对党对父辈的叛逆性。这种双重人格病态状还表现在个人发展上：当发展顺利时，效忠性覆盖叛逆性，反之，**叛逆性将主导一切**。

与林立果相比，今日握有重权的红色贵族子弟们，他们的双重人格病态状也十分清晰：一方面他们从自由世界学成回国，挤身“海归”，但却摈弃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鼓吹“特色社会主义”，借以维护既得利益，表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效忠性；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特色”久长，便存钱国外，给后代办理“绿卡”，等等，做好了应变和随时“走”的准备，显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叛逆性。近据有关媒体报导，“美国政府统计，大陆的部级以上的官（包含已退休）的儿辈，74.5%拥有美国的绿卡或公民的身份，孙辈有美国的公民身份者达到91%以上。”笔者大胆预测：未来中国有变，他们将是一群第一批携巨款离境的叛逃者。

当年的林立果与今日的红色贵族子弟，在双重人格的病态上，没有显著差别。在毛泽东“批陈整风”和“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步步紧逼下，特别是1971年1月底重组北京军区、撤了毛的忠臣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后，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林立果，被逼上梁山，叛逆性主导了他的一切，甩掉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决心以武力与毛抗争。

3、讨毛檄文——《五七一工程纪要》

1971年3月22日，**林立果**和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年轻人，对毛的独裁作风和祸国殃民的暴政，深恶痛绝，他们走在一起，**群英聚义**，在上海草拟了个造反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策划武装起义，决心用武装政变来推翻毛泽东的反动统治。

他们在《纪要》中详述了政变计划（1）。现摘要如次：

《纪要》对国内形势的估判：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纪要》对毛泽东个人品性德行的认知：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纪要》拟定的政变策略和手段：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笔者：B-52 是林立果等人对毛泽东的称谓）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骨干力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笔者：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纪要》的政变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纪要》对政变困难的估计：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 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这个被中共界定为“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与其说是个政变计划，不如说它是个讨毛檄文。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蒙蒙沉睡、一部分人还在毛的煽动下蠢蠢疯狂之中，《纪要》第一个揭露了毛泽东的反动本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提出了拯救中国的政治诉求，实乃天下第一篇声讨毛泽东罪恶的檄文。可悲的是，中国人不仅没有给英雄们创造一个实施《纪要》的机会，而且有意或无意地充当了独裁者的帮手，使英雄们的《纪要》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直到英烈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林立国携父母逃亡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汉，一直被迫秘密保存在带拉链的笔记本中。

尽管数十年来，官方和精英们一再诋毁《五七一工程纪要》，说什么它是“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是“企图谋害毛泽东主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铁证”，有的则不屑地说：“‘五七一’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的‘狂人日记’”，不过“小孩玩家家”，等等。但《纪要》的启蒙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五七一工程纪要》做为林彪集团的“罪行”资料，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于 1971 年 11 月下发全国，供人批判。令毛没有想到的是，《纪要》成了愚昧而疯狂人们的启蒙教材。连九十年代中共自己编写的权威历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不得不承认，林彪一案中的《纪要》，**“促使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历史已经证明，在《纪要》启蒙中觉悟了的干部和群众，在而后毛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批邓中，都不约而同地站在周恩来、邓小平一边，引发了反毛的“四五”运动和逮捕毛的亲信“四人帮”事件。有人进一步写道：**“中共日后走的改革开放道路，不过就是实践了《纪要》中的思想而已**。”——《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大功不可磨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英烈林立果的**为国除恶**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荆轲，其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远远超越荆轲！

4. 林立果携父母逃亡

1971 年 9 月 13 日零时 32 分，在山海关机场，256 号三叉戟机飞机加大油门，冲上天空，向西南方向飞去，4 分钟后，又转向北方。当飞机接近蒙苏边境时，又突然掉头南飞。2 点 27 分，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汉附近，中弹起火，迫降时机毁人亡。现场查明，机上遇难者是：

林立果——林彪儿子、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林　彪——林立果之父、中共唯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党章规定毛的唯一接班人
叶　群——林立果之母、林彪夫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潘景寅——林彪专机飞行员、空军航空兵 34 师副政委
李　平——机械师、机务分队中队长
张延奎——机械师、机务分队机械师
郎起良——特设师、特设分队副中队长
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
杨振刚——林彪的轿车司机

这是一起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大丑闻——**九一三事件！历史记录了事件的始末。**

⑴、事件回放

1971 年 9 月 12 日**下午 4 时 5 分，**毛泽东乘南巡专列回到了北京。

原定于九月底前后返京的南巡专列，为什么突然提前返京了呢？因为，在杭州，毛泽东接到密报，有人要对他的专列下手。于是，他多次改变行程和路线，像与人捉密藏似的遁回北京。在丰台，他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速调 38 军一个全副武装师进驻南口，威慑京师，以防不测。

几分钟后，林立果接到密报：毛泽东已回北京，顿时紧张起来。对空长叹一声：“**天不助我！**”原来，他的抗命计划是：上策——在杭州、上海和硕放桥等地暗杀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中策——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抗衡，如有不测，可出逃香港；下策——北上苏联，利用外援，待机破敌。当他听说毛已回京，暗杀毛的计划已全部落空，剩下的只有出走：“南下”和“北上”。

在北京空军学院将军楼里，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再次聚义，决定启动“南下”计划。“南下”是兵分两路：林立果立即飞北戴河，第二天早上 7 时，携林彪、叶群、林立衡等家人南飞广州；周宇驰留在北京总负责，由**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组织空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分发武器，第二天早上分乘四架飞机从西郊机场飞往广州，同时“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走，或绑架他们，如果他们不愿走的话。

林立果的“南下”计划进行得很紧张，却也顺利。周宇驰在京组织“南下”人员和装备的同时，**19 时 40 分**，林立果已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腾空而起，飞向山海关。**20 时 15 分**，256 号三叉戟落地山海关机场。下机前，林立果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每个人握手说：“**明天首长**（指林彪）**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说罢，他下了飞机，跳上吉普车，向北戴河疾驰。

20 时 50 分左右，林立果到了北戴河林彪住处，与父母商议后，决定明晨“南下”。

然而，令林立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胞姐**林立衡**不仅出卖了他，而且还出卖了他们的生母叶群，从而出卖了他们的生父林彪。**21 时 50 分许**，林立衡向中央警卫团密报了林立果、叶群要“挟持”林彪出逃广州和香港的计划，并说今天晚上要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等等，要求将她的口头报告直报党中央。同时，她还积极活动，说服 8341 部队副团长**张宏**、二大队长**姜作寿**和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林立果和叶群“挟持”林彪逃亡广州和香港。

林立衡的出卖，使林立果的中策“南下”计划，瞬间化为泡影！

22 时 30 分，林立衡的报告被中央警卫团即 8341 部队报到周恩来那里。几天前，周已接到毛南巡讲话的纪录，知道了毛要清除林彪的意图。当接到林立衡的报告后，周便以领导党政军和指挥陆海空军的毛的大管家身份，决心辅佐毛打倒压在他头上的林彪，如同他曾辅佐毛打倒压在他头上的刘少奇那样。与此同时，林立衡的报告也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按兵不动，遥领周恩来的处置，静观其变。

正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召开政治局例会会议的周恩来，分别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和主管山海关机场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在了解了256号三叉戟的情况之后，预感事态严重，便命令办公厅的领导，向所有与会者宣布几条纪律：**“不要走，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借此限制林彪亲信黄永胜的自由。接着，他在打电话给叶群探听虚实后，迅速采取两条措施：一、下令封闭西郊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飞；二、下令吴法宪通知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立即飞回北京。但由于电传256号三叉戟正在“维修”，无法执行命令。**23时35分**，李作鹏根据周的指示，再次下令山海关机场：**“这架三叉戟的行动，要听从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的指示**。”

深夜**22时半～23时多**，林立果发现8341部队动静异常；周宇驰来电话报告说，西郊机场“封”飞机了；叶群在同周恩来通话后，便挂通军委一号台，想找黄永胜探听虚实，但没有找到，疑其已被捕。等等异常迹象，使林立果、叶群母子突然意识到，家贼难防，他们被林立衡出卖，“南下”计划已暴露。于是，他们当即立断，决定迅速登机“北上”逃亡。**23时50分**，由于时间急促，来不及整理装束，叶群唤醒服安眠药已经入睡的林彪，并把他拽下床来。刚刚醒过来还有些眩晕的林彪，由其贴身警卫处长李文普、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和林立果等人簇拥着，在叶群**“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的喊声中，被架上了防弹的“大红旗”轿车。听见汽车发动机声，路旁出现了一些持枪的武装人员。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对着武装人员喊道：“快堵住!”在大门口，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扬手要“大红旗”停车，但“大红旗”快速冲过去，只见姜作寿敏捷地一闪身，让“大红旗”擦身而过。驶上公路的“大红旗”突然停下，李文普从车上跳了出来。此时，赶上前来的中队长**萧奇明**，对准右侧车门连打三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三个白色弹印。在慌乱中，李乘机向自己手臂开了一枪，以表示清白。“大红旗”连中三枪后，加速疾驰山海关。**13日零时18分**，林彪专车快速闯进山海关机场，急刹车于256号三叉戟旁。

此时的山海关机场，由于北京政令不清，处于指挥混乱之中。**23时54分左右**，潘景寅和李海彬在空军调度室里，接到了北京保密机打来的加油电话。**23时55分**，潘要李海彬打电话给海军的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要两个加油车给三叉戟加油。当加油车调来后，潘出门安排机械师登机加油。此时的潘景寅还以为飞机明晨起飞，因此，没有招唤其他入睡的机组人员。几分钟后，当听到一阵尖锐的汽车急刹车声，他跑出调度室，只见林彪专车停在飞机旁边，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已下了车。做为林彪专机飞行员的他，本能使他快步跑向飞机。此时，13日**零时21分**，山海关场站接到了海军政委李作鹏下达的不让飞机起飞的命令。但当场站参谋长**佟玉春**跑步寻找潘传达北京命令时，潘已登上了256号三叉戟。（近几年有人“证明”，潘景寅执行的是毛、周的秘密使命：佯飞广州，实飞蒙古。在飞机失事前，潘喊道：“林副主席，我对不起你！”——有朝一日，当档案解密，飞机“黑匣子”也被官方“突然找到”时，也许，笔者这篇“回放”，全是废话。）

当受命“阻止”256号三叉戟起飞的8341部队武装人员，来到机场后，无动于衷地目睹了林彪登机和乘机腾空的全过程：

林彪专车刚刚停稳，第一个跳下车的叶群，高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跳下车的林立果，挥舞着手枪，指挥人快上飞机。只见刘沛丰第一个顺着工作便梯，爬上飞机，接着叶群、林彪、司机杨振刚，最后是林立果。进到机舱的叶群，向下大喊：“油车快让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主席！**”像接到命令一样，加油车让开了滑行道。**零时23分**，“轰”的一声巨响，256号三叉戟发动了。**零时32分**，三叉戟冲上西南方向的天空。没有来得急登机的

其他五名机组成员，其中，两名副驾驶看着腾空的三叉戟，目瞪口呆！

强行起飞的三叉戟，先以 240 度向西南方向飞，四分钟后，转头以 345 度向北方飞去。当飞机快到中蒙边界时，吴法宪建议拦截，但本想把林家一网打尽的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大发慈悲。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忠于林彪的潘景寅，驾驶飞机飞入蒙古，向北直飞苏联。但不知何故，当接近蒙苏边界时，又调头南飞。不幸，在蒙古国温都尔汉地区，中弹起火，迫降时，机毁人亡，是时，**9 月 13 日 2 时 27 分**。（右图）


林彪元帅　　副统帅林彪拜死在温都尔汗

1971 年 9 月 13 日 2 时 27 分机毁人亡

在乘车飞驰山海关机场前的 **23 时 40 分，**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要他们利用伪造的“林副主席手令”，巧夺飞机“北上”。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三人，于 **13 日凌晨 3 时 15 分**，在沙河机场巧取一架直升机飞向北方。途中，不幸被忠于毛泽东的飞行员陈修文识破，在空中兜了一大圈后，回飞到怀柔迫降。搏斗中陈修文被击毙，周、于同时举枪自杀。李伟信虚假自杀后被捕，成了林立果等义士的叛徒。

几天后，当听到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后，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最好的结局！”**与**“由他去吧”**的宽厚，形成鲜明对照。当看到林彪机毁人亡的照片后，周恩来对政治局委员们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当官员们离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后，周面壁片刻，突然失控，两肩颤抖，**嚎啕大哭起来**——这是兔死狐悲的哭声？抑或鳄鱼眼泪的表演？

⑵、为叛国、叛党正名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官方，把林立果、林彪反抗毛泽东的**正义行动**，定性为“阴谋家”和“野心家”，其携家出逃定性为“叛党”、“叛国”；1980 年“审判”时，又将其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于官方这种定性，一些学者和普通老百姓并不认同。林立果、林彪是否是“叛党”、“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呢？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全文三十条 2,818 个字。文中关键词数是：**“自由”**31 个，**“人人”**30 个，**“权利”**29 个，**“平等”**11 个，**“尊严”**5 个，而“专政”、“镇压”、“维稳”、“服从”等词，没用 1 个，更没有“叛党”、“叛国”和“反革命”的罪名。联合国《宣言》向全世界郑重宣布：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视为无罪。”

等等。

显然，联合国《宣言》向全世界宣示：**人权高于主权，自由超越国界！**

通读联合国《宣言》，会使人们更易理解先辈们的经典箴言。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美国大思想家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是我的祖国**。”中国大思想家胡适说：**“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做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政府理应是贯彻执行联合国《宣言》的表率，不应与之相背。因此，林立果、林彪的“叛党”、“叛国”和“反革命”罪，应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加以认定。

①、为叛国正名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一个在一块固定的**领土**上、由长期居住在这块领土上的全体**人民**、在统一**主权**下、用一种特定形式的**政体**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就是说，国家由领土、人民、主权和政体**四大要素**构成。领土、人民、主权是国家的本质属性；政体是从属的，是国家的体现。其中：**人民**是国家的中心，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主权**是国家固有的不可分割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据有相对的自主性和排他性；主权在民，**政体**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主权的政权形式（政府）。当执政者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组成合法政府时，它有权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当执政者失去人民支持、丧失其合法性或被推翻时，它无权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国家也不会因政权更替或暂时没有政府而消失。因此：凡叛卖国家领土、人民和主权的行为，或利用权力偷偷摸摸与他国签订协议，出卖领土、人民和主权，无论他是政府、执政者、团体或是一般公民，都应视为犯有叛国罪或颠覆罪；公民反对的只是国家的政权形式或其中的某些领导人，没有出卖国家的领土、人民和主权的行为，都不应视为叛国或颠覆。“解放”前，毛泽东曾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又说：**“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还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因此，在现代自由世界，公民利用罢工、游行、示威、结社、公投和选举等手段，去反对、弹劾某些领导人甚至推翻现政府，或因力量悬殊不得已而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都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符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精神，与叛国、破坏稳定、图谋颠覆几无关联！

马克思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把国家定义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显然，这个定义把国家与政权（机器）等同，犯了种属概念并列的逻辑错误。遗憾的是，当今许多学者引入“祖国”概念，把“国家”与“政府”捆绑在一起，使两者相互混淆，界限不清，为偷换概念创造了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国家是社会，不是机器；国家包括政府，不是政府。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偷换概念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马氏国家定义，成了世界各地共产党残酷掠夺、暴力镇压本国人民的理论根据。毛泽东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机器”说的经典注释。马氏定义和毛氏注释，强调“机器”的压迫性和镇压功能，与毛氏“解放”前的“爱国论”形如冰炭，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精神格格不入。因此，他们把反对政府（机器）、反对执政党或反对政府中的某些人的人，或逃亡国外寻求庇护者，升格为“危害国家安全”，并以叛国罪或颠覆罪重判之，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色。这种封建专制主义本色，是**“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皇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今，许多所谓的“爱国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党、领袖、政府与国家捆绑在一起，以混淆视听，把国内反党、反毛的异议人士诬指为“汉奸”、“卖国贼”，把国外反共的不同政见者诟詈为“反华势力”，就是封建专

制主义继续作祟的结果。例如，据《环球网》报导，2012 年 8 月 3 日，朝鲜共产党首领金正恩“教导”人民说：**“对首领的忠诚就是爱国的体现，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这就是共产党人**爱国观**的经典宣泄！

在封建专制主义作祟下，在九十年代，中共留苏派为主的江泽民政权，偷偷摸摸与俄国签订了领土条约，使俄国侵占我国的大片领土全部合法化。对于这个重大的领土问题，他们不敢叫中国老百姓知道，仅在《人民日报》不起眼的地方，发布一条简短“新闻”，借以敷衍塞责，愚弄人民。隐蔽在个中的重大卖国嫌疑，在他们的强权运作下，变成了“合法”的“爱国”的外交成就。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叛国”论的作祟，毛泽东和中共以及御用精英们（简称“毛共精”），在“叛国罪”的判定上，往往实行多重标准，变幻无常，逻辑混乱，都有历史记录在案。例如：

因受普鲁士（德国）政府的迫害，马克思曾一次次“流寓巴黎”、“亡命布鲁塞尔”、“流寓伦敦”等国外，甚至为了免遭本国政府紧追不舍的迫害，1845 年 12 月，他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除普鲁士专制政府外，包括“毛共精”在内，没有人说他“叛国”。

在 1848 年欧洲革命风暴中，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巴登起义。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说：**“恩格斯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就作为一个流亡者住在瑞士**。”当时流亡在国境之外的德国各派革命者有上千人之多。同对马克思一样，“毛共精”颂其为“革命”，与“叛国”或“颠覆”毫无共同之处。

1905 年革命失败后，被沙皇判为“叛国”的列宁，仓皇逃往奥匈帝国，然后又迁居瑞士。11 年后的 1917 年 4 月 10 日，列宁潜回彼得格勒，领导了 10 月 7 日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此，“毛共精”除了颂扬外，对列宁的 11 年的“逃亡”生涯，不置一个“叛”字。

康梁变法失败后，满清政府宣布康、梁、谭等人“叛国”，并发出了通缉令。康有为于 1898 年 9 月 20 日逃离北京，29 日逃到香港脱险；梁启超于 9 月 21 日，逃入日本领事馆，十一天后，被日本军舰护送赴日，拒绝逃跑的谭嗣同等人，血染北京菜市口。解读这段历史，“毛共精”认为，康梁谭反对的是腐败的满清政府，与叛国无关，而是政治“逃亡”。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曾两度逃亡日本。1895 年 10 月 26 日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廷以“叛国罪”下令悬赏捉拿孙中山，孙被迫第一次逃亡日本；孙中山第二次逃亡日本，发生在 1913 年 9 月 1 日起兵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解读这两段历史，“毛共精”高度赞扬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称颂孙为革命先驱、爱国者。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郭沫若受国民党通缉而逃往日本，一去十年，没人说他“叛国”。1937 年抗日战争暴发后，应国民党之邀，回国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厅厅长。

1960 年前后三年间，云南十三万多边境饥民逃亡国外，都被斥为“可耻的叛国分子”。1962 年 4 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多饥民逃往苏联，又被当时的“毛共精”定性为“民族分裂分子同苏联修正主义者共同策划的一次大叛逃。”

1967 年 1 月 16 日，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偕全家冒死逃亡香港，被“毛共精”判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分子。为了否定文革，1985 年 1 月 25 日，文化部根据公安部的决定，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摘掉了戴在他头上的“叛国投敌”的“反革命”帽子。

1979 年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记载，从 1954 年到 1978 年，

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 56 万多人次，逃出 14 万多人，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1962 年外逃 11.7 万人，逃出近 4 万人；1978 年外逃 7.9 万人，逃出 1.8 万人；1979 年前 5 个月外逃 11.9 万人，逃出 2.9 万人。1977 年 11 月，广东省委将“逃港”热潮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作了汇报。急于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听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后若干年中的外逃者，在反文革的背景下，“毛共精”豁免了他们的“叛逃”罪名。

1979 年越南反华运动中，因与越共总书记黎笋等人政见分歧，引发残酷内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被迫“逃亡”中国。不久，越南宣布开除他党籍，并缺席判处他死刑。但“毛共精”却称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给于高干待遇。黄客死北京后，中共以极高的礼遇，将其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5 年到 1961 年间，每年约有十数万德共统治下的东德公民，通过柏林逃往西德。为了阻扼逃亡，1961 年 8 月 12 日，东德首领德共总书记乌布利希，宣布建造柏林墙。很快，一条水泥砌筑的绵延 170 多公里的柏林墙，拔地而起，一刀将柏林市砍成两半。据报导，自柏林墙建成到 1989 年轰然崩塌的 28 年间，共有 5,043 人成功越墙逃入西柏林，239 人死亡，260 人受伤，约六万人被以“企图叛国投敌罪”，处以平均十六个月的监禁。但当逃亡者跨进西柏林的边界线后，迎接他们到来的第一句话是：**“你自由了，这里是西德！**”最令人感动的是，客车司机**布鲁希克**，拉着十多名逃亡者，高速撞向柏林墙，“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不幸的是，当客车越过边界线后，身中 19 弹的布鲁希克，睁着大眼，停止了呼吸。许多西德人饱含着热泪证明道：**“布鲁希克是一个成功者：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他看到了自由！**”共产党东德官方，则把这些逃亡者斥为**“叛国投敌”**，数千公里外的“毛共精”遥相呼应。但随着中共和德共关系日趋疏远、紧张，“叛国投敌”一词随之悄悄淡化，最终被**“逃亡”**一词取代。

由于“毛共精”反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精神，他们便把维护封建专制政体的一党专政和毛泽东独裁，确定为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对叛国罪的认定，是以他们的核心价值为基准的，从而形成了前后矛盾的多重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以“我”划界的“逻辑”又似不乱：**顺我着是，逆我着非**。因此，林立果因反对他们的独裁、逃避他们的迫害而携父母的正义逃亡，触犯了他们的核心价值，被他们判为“叛党”、“叛国”和“反革命”等罪，是预料中的事。

②、为叛党正名

党派是各政党或政党中各门派的统称。它是由持有特定指导思想、主张和目标的政治理念人士组成的社会团体。《韦氏大词典》认为，政党是**“一群人以指导政府政策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美国学者则认为：**“政党乃是一个由个人基于自愿所组成之政治团体，为政府提供一般措施、建议，或者制定政策，选举与支持领导人物为公职候选人，以作为实现其主义与政策最有效之方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政党，是自由组合的载体，体现了联合国《宣言》的“结社自由”精神：人人可以自由参加和退出某个政党，没有反党、叛党的恐吓，从而产生了两党和多党自由竞选的民主政治。

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这种马氏“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学说，就给他们的政党组织，打上封建专制主义的血色印记，构成了各个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和实行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毛泽东说**“枪杆里出政权”**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

说教，就是这种理论的极端张扬。

在这种建党理论指导下，党的领袖用铁血纪律来控制党员，使党的各级领导与普通党员，构成了不平等挟制与被挟制的邪教关系，从而使《党章》规定的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等等权利，统统变成了橱窗里的展品。在红色政党监控下，悬在顶上的“**反党有罪**”之剑，使党员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任何脱党或改变立场党员，都被定性为“叛徒”，并科以重刑。

在这种建党理论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关系也被颠倒：党大于国、高于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的“最高权力”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最大谎言。（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上，中共仍在“最大谎言”中做梦，无法自圆其说！）笔者认为：执政党是通过合法竞争上台的组建并领导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党派；执政党不是政府的上级，更不是国家的上级；国家及其政府有权规范并制约所有政党活动。因此，在内政上，与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相左的异议派别和人士，无论他们身在国内或国外，都属于全体人民的一部分，他们质疑或反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质疑或反对执政党所领导的政体——政府，理应视为民主诉求，与叛国、颠覆无关。在外交上，执政党的政府领导人代表国家，外国政府或人士，质疑或反对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理应视为质疑或反对这个国家的政府，不能与质疑或反对这个国家等同；同样，当这个国家的主权不在民时，亦即政府失去合法性时，质疑或反对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亦应视为质疑或反对这个国家的政府，也不能与质疑或反对这个国家等同。但毛和中共刻意把执政党、政府与国家捆在一起，使其关系模糊化，宣扬党国不分，声言反党就是颠覆，反共就是反华。显然，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宪法》中的“最大谎言”，攫取无上权力以统治中国人：任何反对毛和党领导的人，都被判为反革命，并科以重刑。毛泽东的红卫兵歌谣曰：“**谁要敢说党不好，立刻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在这种建党理论指导下，同以“我”划线的毛式“反动”说法一样，“革命”与“反革命”说法，也是以“毛共精”的“我”划线：顺我者革命，逆我者反革命。“革命”系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使“革命”两字变成了血淋淋的红色恐怖。二十七年的毛泽东时代证明，无论是他们在五十年代初搞的枪杀数百万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而后他们搞的枪杀、逼死数百万人、饿死数千万人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导致 200～300 万人丧命、1,000 多万人伤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历史大倒退行为。因此，反对毛泽东的这种革命的人，亦即“毛共精”所说的“反革命分子”，当属光明磊落的正义之士！

历史已经证明，**在这种建党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自由精神相悖、与现代社会的人权观念格格不入的封建专制主义政党，早已成为镇压人民的邪恶力量。因此：做为中共党员的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以及林彪、叶群等人，有权自由脱党，他们**脱党有理**；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有权自由背弃这个党，他们**叛党无罪**；林立果携父母逃亡，是忠于国家、义于民族、孝于父母的表率，他的这种“反革命”行为是**反得有理，反得正义**，与叛国毫无关联，尽管他最后不幸同父母一起葬身于异国他乡；之于中共高官林彪和叶群夫妇，他们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但能随子逃亡，说明他俩**已有所悔悟**！正是：

正义背水弃邪恶，折戟沉沙犹壮烈！

5、中国的施陶芬贝格

中国人不应忘记，毛泽东发动的曾使数千万农民饿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曾使数千万人挨整、200～300 万人丧生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有罪，而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因此，**林立果等人策划的反叛毛的武装政变和暗杀的造反行动，当属正义之举，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位失败了的英雄**，正如当今德国记住当年暗杀希特勒未遂而被处死的**施陶芬贝格**上校那样！

1944 年初夏，当美、英、法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攻入波兰逼近德国时，纳粹德国已陷入被东西两面夹击的狼狈困境。7 月 20 日，在德国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里，传出了一声巨响，一群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德国军官，不愿看到德国被大独裁者希特勒彻底毁灭，发动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他们行动失败了，不仅被枪决或被钢丝绞死，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且还背负着“叛国者”、“卖国贼”的罪名被同胞唾骂。但六十年后的 7 月 20 日，德国全国上下却举行隆重纪念仪式，追忆当年“七二〇”英雄们的壮举。在今日德国，有许多街道、学校、广场等公共场所都分享一个名字：**施陶芬贝格**。这些行动表明，德国人已经鼓足勇气，正视历史，同时也无情地嘲弄了中国“**成王败寇**”的封建思维。可悲的是，在“主旋律”的控制下，许多中国人迄今还在《东方红》的“唱红”声中酣睡，听凭权贵们为了权力任意玩弄历史，抵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启蒙作用，纵容御用精英们为了效忠党和领袖，任意篡改历史，没有些许德国人的理智和勇气！

由于许多中国人的愚昧、盲从、背叛和病入膏肓的媚骨、软骨，使林立果等义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到了 9 月 12 日，留给英雄们唯一出路就是逃亡——这是林立果等义士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中国大陆人什么时候才能觉醒，来纪念“九一三事件”中殉难的中国**施陶芬贝格——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义士呢？笔者虽然年迈，却毅然满怀信心地在等待！

6、千古罪人林立衡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条古训，在“九一三事件”中已得到验证。在林家高贵的家庭里，出现了一个**败类**——林彪夫妇的爱女、英烈林立果的胞姐**林立衡。**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中，造成机毁人亡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其他六个机组乘员葬身异国沙漠的主要推手，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还有林立衡。

林立衡生于 1944 年，乳名豆豆，与胞弟林立果一起，被林彪视为他的“**一对眼珠子**”。“九一三事件”后曾用名“路漫”、“车前”。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清华和北大两所高校，1966 年曾任《空军报》总编。“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其间，她的曾用名“路漫”，取自于屈原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她自强不息的抗争决心；“车前”有“车到山前自有路”之意，显示了她身处逆境的乐观。尽管她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对未来充满了期盼，但她出卖父母和胞弟的可耻行径，使她一头扎进了死

胡同，成了根本无法洗刷的**历史罪人**。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当获知毛泽东已回京的消息后，林立果急匆匆地飞到北戴河，与母商讨“**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抗衡**”的计划，并定于明晨七时飞往广州。正当他们积极准备秘密南下广州之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林立衡把他们出卖了。这位详知胞弟暗杀毛未遂后要“南下”的千金小姐，21 时半许，向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透露了“南下”计划，并要李文普马上转告党中央。由于见李有些犹豫，21 时 50 分许，她径直向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报告了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逃亡广州和香港的“阴谋”，要求立即阻止、逮捕。“事以密成”，本来还有几分成功希望的“南下”计划，由于林立衡的出卖，迅即化成泡影。深夜，林彪的行踪便被置于毛、周的监控之中。当发觉被监控后，林立果和叶群当即立断，乘机“北上”，他们唤醒服了安眠药入睡不久、神志尚不清醒的林彪，演出了被爱女出卖而“仓皇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国的悲壮一幕。

自以为出卖有功应授于英雄称号的林立衡，却被毛、周的中央先定性为“**起义**”，后又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

与揭竿而起的起义不同，中共对敌对势力中的起义者，鄙薄为枪口之下屈膝不战而降者。当年国民党**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起义，使林彪得以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大功的傅作义，荣任水利部长，可是他的属下和亲信呢？据传，50％成了阶下囚，其中约 10～30％被处决或自裁。面对起义的悲剧，傅作义无颜面对亲朋好友——**独面残垣泪自垂**！“起义”者林立衡呢？她的命运远不如傅作义。

“起义”后的林立衡，并没有因“功”而成英雄，反而成了专案对象。当年被中共指定“帮助”林立衡改正“错误”的负责人是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厚良**。高在他的《“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一文中写道：

“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在东交民巷空军报招待所新高干楼 8 号选了一处房，让林立衡从警卫一师搬进去住下（张清林到总后参加学习）。从各军区空军选调一些水平较高的女干部组成一个**帮助**小组陪同她一起**学习**，报社的金为华、谭先德、石玉增等同志也参加。组长是民航总局副政委、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诸惠芬**，**金为华**任副组长，组员有尖子女飞行员汪云、张玉梅，还有各军区空军选调的副指导员、排长、女军医，护士长周慧芳、郭玉莲、李建军、张香丽、马志敏等。警卫一师的两位女同志程言翠、侯颜娥也到空军招待所同学同住。”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那个时代“**学习**”和“**帮助**”的真实内涵，听一听林立衡的回忆，也许对你有所帮助。她说：“**诸慧芬后来职务挺高的，好像还当了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对我拍着桌子吼叫审讯，弄来一帮女连长、女指导员，围着我天天批斗。其实她啥也不知道。当时我跟他们顶得很厉害，她越凶我越不说……**”做为过来人的笔者，对毛式“学习”和“帮助”深有体会，那是批斗和审讯的同义词；林立衡是个幸运者，至少她在“**学习**”中，没有受过跪砖、吊打和“坐喷气式”等体罚式的“**帮助**”。

“她越凶我越不说”的林立衡，也架不住反复批斗，她的嘴终于被撬开了。她不仅揭发了林立果、叶群的反革命言论，还揭发了她父亲林彪说“伟大领袖”的“坏话”，其中包括说**毛好色**的坏话。专案组将她的揭发上报后，她的错误性质立刻由“起义”变成了“**林彪留**

下来的钉子”。因为，上面认为，她利用“揭发”攻击“伟大领袖”。由此，“学习”和“帮助”也迅即升级。对此，高厚良又写道：

“她开始受审查时拒绝交代任何问题，受到反复批判之后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大量‘交代’林彪说毛泽东的一些‘坏话’。这些东西送上去之后，专案组受到了批评，林立衡自然受到了激烈批判，说她这是有意‘放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起初专案组对她还比较客气，开的伙食也比较好。由于她在很长时间坚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并讲了‘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之后，处境开始恶化，身份由‘九一三’的‘功臣’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待遇大变。专案组对她的态度变凶，看管更严，伙食标准也由‘贵宾’而变‘小灶’，再转为‘中灶’而‘大灶’。她的居住条件，逐步也变得恶劣起来，身体受到很大损害。”

高厚良所说的“身体受到很大损害”是指什么呢？据报导，林立衡在当“林彪留下来的钉子”而受到关押审查的两年中，被“帮助”得**“体重只有 30 多公斤，头发大量脱落，还掉了 6 颗牙。”**由于经受不了毛式“学习”和“帮助”的折磨，林立衡选择了自杀。对此，高厚良继续写道：

“1974 年 2 月中，林立衡住在空军招待所高干楼，向组里同志提出，要去警卫一师原住房取东西。金为华等人研究，没有理由不让她去。便叫负责安全的谭先德带两名女同志（其中一名是医生）陪同她去警卫一师。林立衡一进房门就反手上了锁，过了 20 分钟，谭先德呼叫无人应，门锁了推不开，只好砸了窗户玻璃进房。”

由于发现及时，服了数十片安眠药的林立衡，终被抢救了过来。1974 年 8 月，被下放到河南开封农场劳动改造，其间与张清林结婚。为了便于监控，1987 年她被调回北京，安排到社科院工作，直到退休。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 1977 年，林立衡除坚持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绑架上飞机的立场外，还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说她母亲**“搞了几年选美是因为毛泽东好色，叶群为了讨好才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向毛泽东进贡”**，等等。毛泽东死后，他乱搞女人的性丑闻广为流传。因此，在那段历史背境里，林立衡的**“毛泽东好色”**、**“向毛泽东进贡”**等言论没有受到查处。如果在今天，你说毛乱搞试试看，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尽管“九一三事件”后，立了大功的林立衡受到了毛、周的不公正对待，历经了折磨和苦难，值得叫人同情；但她向强权告密，出卖父母、出卖正义、出卖良心的丑态和她那**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恶端，已被历史记录在案，是她无法否认了的。

首先说她不忠。汉语词典：忠为忠诚无私，尽心竭力。《左传》说“忠之属也”，是说尽力做好本分的事。宋司马光说“尽心于人曰忠”，《说文》敬也，《玉篇》直也，《增韵》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宋史》记载：何铸奉秦桧之命审岳飞时，见其“背有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后人改为“精忠报国”。由此可见，华夏文明把“忠”定义为**诚、敬、直、尽心、不欺、报国**。但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愚弄下，“忠”变成忠君，“精忠报国”变成了“精忠报君”。到了文革，封建忠君思想登峰造极，发展成“三忠于、四无限”， 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限热爱毛主席、**

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林立衡的忠不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忠，而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忠，忠于独裁者的忠，亦即支持暴君任意宰割“臣民”的忠。因此，她**助纣为虐**，是谓不忠。

其次说她不孝。孝是华夏文明的精髓。《说文》曰“孝, 善事父母者”；《墨子经》“孝利亲也”；《贾子道术》“子爱利亲谓之孝”；《周书》“慈惠爱亲为孝”。此外，《孝经》认为“**夫孝, 德之本也**”；《国语》“**孝, 文之本也**”；《左传》“**孝, 礼之始也**”。中华民族的孝文明是**爱亲，利亲，敬亲**，是德之本，文明之始。因此，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由是，**事亲、尊亲**成了中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之一。但马列毛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胡诌孝的阶级性，诽谤孝为“封建糟粕”，鼓吹“**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力图用对暴君、对苛政的忠心来取代孝德文明。林立衡在这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熏陶下，她抛弃了孝道，无情地揭发父母和胞弟的正义“罪行”，以换取暴君的恩典。因此，她是个**出卖父母**的不孝之丑女。

再次说她不仁。“仁”是中华文明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博爱。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因此，爱人、亲人、上下相亲、“恻隐之心”、“亲而不可不广者”、“温良恭谦让”、“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和“兼相爱，交相利”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但马列毛主义则完全相反：他们在把“仁”诋毁为“毒药”的同时，把人与人的关系，论证成阶级斗争关系，亦即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并以此理论赞扬暴力和镇压，宣扬“**与人斗，其乐无穷**”酷虐观。在这种主义蛊惑下，林立衡以其之冷酷无情，向暴君、强权告密，出卖了她的胞弟、母亲、父亲，出卖了弟弟的密友，从而株连了紧随其父南征北战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致使他们中许多人家破人亡，蒙冤终生。因此，她**为虎作伥**，实谓不仁！

最后说她不义。“义”同“仁”一样，也是中华文明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或曰公正的道理，正直的行为。中华民族先贤对“义”极为推崇。管仲对齐恒公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孟子说：“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代中国在道义论学理上，把“义”界定为轻后果与结论、重规范与动机的道德行为标准。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人必须为尽义务而尽义务，而不能考虑任何利益、快乐、成功等外在因素。**”同以“我”划线的“反动”、“革命”说词一样，马列毛主义者也把“义”据为己有。当他们夺得统治权力以后，便倚强势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他们的一切倒行逆施，都被他们贴上“为人民服务”的“正义”标签，打上“解放全人类”的“正义”印记，而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等弱势群体，则被他们以不“义”的“反革命”、“反动派”、“阶级敌人”等罪名，加以任意蹂躏和镇压。在这种“成王败寇”反正义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驯化下，林立衡成了**以强弱论成败**、**以成败论英雄**的权势主义者，她抛弃了忠、孝、仁的文明，把自己未来的成功寄托于暴君，向强权告密，出卖了处于弱势中的父母和胞弟。因此，她是个**倚强凌弱**的不义之劣妇！

忠、孝、仁、义是中华文明的最高道德境界，是国家的根本纲常，是净化社会风气、规范仁政、杜绝苛政的最高道德准则，是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的道德屏障，因而是中华民族自由主义的体现——它的价值是永恒的。马列毛主义用残酷的阶级斗争颠覆了华夏文明，使忠心变质，孝道不存，仁者受辱，义士蒙难，从而使独裁者逾越道德而肆无忌惮。由此可见，

林立衡向强权告密和出卖的行径，证明她是一个暴君的奴才，苛政的卫士，因而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千古罪人！

附 1：《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略）

65-事后构陷

作者 于松然

中共的赤文化之一是**构陷**。据说，毛泽东对专案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要求搞专案工作者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冤枉好人”，等等，对证据更有明确规定：**“推不倒，驳不翻，四脚落地，经得起历史考验！”**然而吊诡的是，在毛死后三年多中，被平凡的冤假错案，竟高达 300 多万件，蒙冤受屈者数百万，株连数千万人，此外还有 55 万右派分子被“改正”——这些冤案都发生在毛统治的 27 年里。显然，毛泽东长期鼓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意孤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如果说这几百万件冤案并非出自毛一人之手，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毛直接查办的几个大案，几乎与那 300 多万件冤假错案同出一辙。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对毛的“三面红旗”政策不满，给毛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毛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竟被毛以分裂党的“理由”，将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毛的原秘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持彭的相同观点，被毛打成了反党集团。毛死后，该案获得平反。由于彭被囚毙、周自杀，他们俩没能等到平反那一天。

“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案。为了打倒刘少奇，毛先拿刘的干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开刀，指责他包庇、重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参谋长**罗瑞卿**本来是毛的亲信，因有投靠刘的嫌疑，便以企图夺林彪权力的野心家的罪名将其逮捕。为了打倒刘少奇，毛要制造舆论，就要批判“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化、文教等知识界，而他们的顶头上司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首当其冲，罪责难逃。之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本是毛宠信的近臣，但在秘密录音中，录上了毛与幼儿教师在列车上寻欢作乐的性丑闻，使毛十分尴尬，杨因而获罪。“彭罗陆杨”四人之间，只有一般工作关系，并无深交，却被毛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毛死后，该案也得到了平反。庆幸的是，该案被平反时，涉案四人还能与家人坐在一起，欢宴重见天日。

最冤枉的要算**潘汉年投敌案**。当年中共与日伪汪精卫相互勾结分享情报的当事人潘汉年，是毛拍板由新四军派遣的。潘的情报，曾使中共在对蒋的军事行动中屡屡得手，取得了许多次重大胜利，从而把毛泽东推上了“用兵如神”的神坛。“解放”后，对中共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因嫌官小，潘上书中共，详细报告了他与日、汪分享情报的过程和贡献。位居神坛上的毛，为了掩盖其通日罪行，确保“用兵如神”不被质疑，看到报告后，勃然大怒，遂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 CC 派人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

最终杀人灭口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那些曾埋伏在敌伪机关中的革命功臣们，也被一网打尽。毛死后，潘被平反。而今，他与日伪勾结的业绩，在做了“美容”和“变形手术”后，搬上了影幕，肯定了他对中共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可见，毛泽东直接查办的几个大案，没有一个“**四脚落地，经得起历史考验**”！现在再来看毛如何给林彪罗织罪名。

1、抢班夺权（略）
2、军事政变（略）

3、**阴谋暗杀**（略）

4、另立中央

周恩来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另立中央”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之一。汪东兴在他的书中写道，林彪“**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在书的另一处，他说得更加明白：“**……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在 1981 年的审判闹剧中，“另立中央”仍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两谋”的罪行之一，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等中共开国元勋们，仍被科以 16～18 年的重刑。

据报导，1971 年 9 月 12 日晚，当获知毛泽东已回京的消息后，林立果等人策划的南下“另立中央”计划立刻启动：由林立果于 9 月 12 日晚，乘林彪专机 256 号三叉戟飞山海关机场，翌晨七时携全家飞往广州；在北京西郊机场，由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调用准备好的四架飞机，胁迫黄、吴、李、邱“四大金刚”登机，于 13 日七时飞往广州。但令林立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胞姐**林立衡**出卖了他，向中央警卫团告发了他和他的母亲**叶群**，要“挟持”林彪出逃广州和香港，并说今天晚上要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等等。林立衡的出卖，使他的“另立中央”计划全部泡汤；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携父母北上逃亡，最后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汉。

在林立果等人启动“另立中央”的计划时，林彪和他的“四大金刚”都在干什么？

先说接班人林彪。据林彪的准儿媳张宁回忆：

“那天（笔者：9 月 12 日），一家人正在看电影，林彪吃了安眠药，进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来，把叶群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密谈。随后，叶群向大家宣布，作好准备，明早 7 点乘飞机去广州。与叶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给警卫部队打电话，向中央告密。11 点，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叶群在电话里谈了 10 多分锺，显得很慌乱。放下电话后，她改变了决定，要求大家立即出发。林豆豆拒绝离开；林立果没有去叫已经蒙蒙入睡的我，而是带上几名亲信，和叶群一起把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架上汽车，驱车向山海关机场冲去。”

在叶群“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和“誓死捍卫林副主席”的呼喊声中，林彪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两个多小时后，摔死在温都尔汉。

再说总参谋长黄永胜。9 月 12 日，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 1971 年 5 月出生，已经 4 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 8 点的时候，他才坐车从西山出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八点半周总理在那里召集的会议。那个晚上他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关注着林彪的一举一动，却没有听到来自北戴河的一点信息。他知道他被软禁了。9 月 24 日，当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捕时，大喊**“我冤枉！”**，声音悲凉凄惨，很多人都听到了。

三说空军司令吴法宪。9 月 11 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 9 月 12 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后便倒头睡觉。下午，他要夫人陈绥圻同他一起，编写他的第三次检查材料。9 月 12 日晚 8 点，他先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继而与新来空军文工团的指导员谈话，以解决文工团内的派性问题。9 月 12 日晚上 11 点多，保密红机子响了，让他魂飞魄散的事件发生了：周恩来问他山海关机场停的那架 256 号三叉戟时，他竟不知道；周要他下令要那架三叉戟飞回北京时，得到的回答却是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他按周的指示下达了不准任何飞机起飞的禁空令，并下令飞行员潘景寅不准起飞时，但 256 号三叉戟机还是起飞了；当林彪专机飞近中蒙边界时，他建议“拦截”，却传来了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声音。很快，他失去了自由。

四说海军政委李作鹏。9 月 12 日，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李回到海军大院，处理海军军务，忙了整整一天。当晚他服了安眠药刚刚躺下，电话传来了周恩来声音，命令海军管理的山海关机场立刻关闭。李不敢怠慢，同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做了记录，然后用电话向周复诵了一遍：**“256 号三叉戟的行动，要听从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李作鹏的指示。”**当听到周的肯定答复后，**23 时 35 分**，他根据周的指示，即向山海关机场发出命令：**“这架三叉戟的行动，要听从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的指示**。”然后，他又服了几片安眠药入睡。然而，凌晨三、四点，他又被唤醒，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会上周恩来宣布：林彪已乘 256 号三叉戟“跑了”，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失去了自由，成了林彪“另立中央”主犯之一而被捕。

五说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9 月 12 日那天，邱会作的孙女出生 12 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生第 10 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很忙，就挪到了星期天。由于添了个孙女，邱高兴中多喝了几杯酒，有些飘飘然，晚上便很快进入睡乡。凌晨三点多，他突然被唤醒，要他立即到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开的紧急会议。在那个不平凡的夜晚里，在“四大金刚”中，只有他最为“干净”：对林彪出逃事件一无所知。他很自负，在参加会议之前，不论会议主持人是否事先告知会议内容，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这次他掉板了，竟猜不出紧急会议的内容。是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用不着三更半夜开会啊。是他的检讨书出了问题？不像，因周说他的检查写得比过去好。北戴河首长那里有什么情况？也不像。因为几个小时前，叶群与胡敏（邱夫人）在电话里还互相祝贺：叶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邱给孙女起的名字起得好；胡祝贺林的爱女豆豆与张清林订婚。如果“首长”那里出了麻烦，叶群怎么还有心情给女儿举办订婚仪式？放电影？但当李作鹏向他暗示，北戴河可能出事了，他的心立刻忐忑不安起来。当他听到周恩来大声宣布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后，他已感到大祸临头。果然，会后不久，他失去了自由，旋以“另立中央”的主犯之“罪名”，被捕入狱。

据史家考证，“另立中央”不仅林彪不知情，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更是闻所未闻。

六说其他。“另立中央”的地点在广州，广州的“封疆大吏”当年**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将军**，能逃脱干系吗？按照株连政治逻辑，曾杀害过女医生官朋华的刽子手丁盛，在林立果“另立中央”的失败中，成了胜利者的阶下囚。对此，文革专家丁凯文在《猛士悲歌唱大风－－读〈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一文中写道：

“1974 年是王洪文、张春桥在北京硬逼丁盛承认事先知道林彪南逃。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各种卑劣的手段都使将出来，如封官许愿、威逼利诱，目的就是要广州军区承认他们事先知道林彪要南逃。丁盛气愤地说：‘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笔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不知道，孔石泉（笔者：广东省委书记）、任思忠（笔者：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如果说，1974 年‘四人帮’横行于世，可以随意制造冤案，可是到了 1977 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何中共还要继续追查广州军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制造这样的冤案呢？显然，邓小平的中央继续在林彪南逃一事上作文章，目的就是要将林彪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将文革的罪责转嫁到林彪与江青身上，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

历史业已证明，丁盛将军是“落难英雄”；但历史也同样记录了他是个双手沾着人民鲜血的“落难英雄”！

5、题外话：巩固权力需要不断制造冤案

为了控制权力或曰“维稳”的政治需要，中共是不惜代价的，无论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是毛死后的邓小平，都会严历批判死人林彪、镇压活人“四大金刚”，借以警告那些跟着林彪南征北战的粗野彪悍的将军们和同情林彪的群众。因此，林立果、周宇驰等少数几个人的南下“另立中央”的计划，不仅成了林彪和“四大金钢”等高级将领们的“罪行”，而且也株连了一大批无辜者。

“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牵连之广、受迫害人之多，比刘少奇一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专家们统计，中共军内被立案审查的军以上干部就达千人之多，遭受批斗、审讯和各种形式迫害者多达三十万之众，其中许多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相比之下，被判重刑的“四大金刚”，还算幸运。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老百姓涉案率相对较低。

为了政治需要制造冤案，是中共的赤文化之一，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谁当党的领袖，概莫能外。据王年一教授说，千秋先生在网上发表了《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一文的末段写道：**“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中顾委常委向邓提出，趁他们这些老人还在，还历史一个真面目，为林平反。邓拒绝了，他说：这是要林还是要毛、要共产党的问题，没的谈。”**三十年过去了，许多专家、学者站出来，公开要求为林彪平反，但执政当局充耳不闻。何也？人们很快从邓小平的**“没的谈”**对话中发现：邓小平在平反了毛泽东制造的 300 多万件冤假错案布“恩”之后，又施“威”的一手，制造了一个新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冤案，其目的无非是要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一代、二代、三代以至万代地永远传下去。

邓氏“恩威”两手表明，冤案在中国必将不断发生，这是一党专政体制下之必然。请看：

在毛泽东制造了大量冤案之后，二代“设计师”不仅制造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接着又制造了数千伤亡的“六四动乱”惨案；三代“核心”紧紧跟上，一手炮制了取缔法轮功“邪教”案，严禁数百万人修炼身心，以酷刑酿成上千人死亡的悲剧；四代“胡温”也不甘落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镇压藏、维等少数民族的民主诉求，逮捕高智晟、刘晓波等异义人士的自由呼声，构陷了一系列“颠覆”案……显然，一党专政体制不结束，冤案必将被中共继续制造下去。

值得人们深思的另一话题是：冤案受难中，许多人都曾经是冤案的制造者。历史留下了这样记录：林彪和黄、吴、李、邱等高级将领，同刘少奇、陈伯达、丁盛一样，既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手制造的冤魂，又是大量冤案的炮制者和刽子手。例如：

林彪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制造了贺龙、罗瑞卿、许光达、“杨余傅”等冤案，使贺龙元帅、许光达大将含忿而死；

黄永胜主政的广东期间，制造了文年生等人的“反革命”和使 7,200 多人蒙冤的“广东地下党”等冤案，使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不治身亡；

1967 年 7 月 26 日下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在批判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反党”罪行时，**吴法宪**伙同武空政委刘丰等将领，冲上前去，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徽，进行拳打脚踢，并把陈打翻在地，遍体鳞伤；

在海军，独眼将军**李作鹏**，组织千人以上的批斗会 30 多次，中、小批斗会不计其数，海军 37 名党委委员中，16 人被立案查处，7 人遭残酷批斗，终致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死于非命；

邱会作曾被造反派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打断了右肋骨，曾多次昏厥，被林彪救出，但当了总后勤部部长后，仅制造的“特务叛国外逃集团”一案，就株连了总后原政委李聚奎等 26 名军职以上干部和 269 名师职以下人员，终使副部长汤平中将死不瞑目，此外，邱还采集了 23 种刑罚，用于专案刑讯。

为了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就要不断制造冤假错案，这是一党专政体制下之必然！

66-逃避罪责的权力表演

作者 于松然

1、权力告急、赚周

《五七一工程纪要》向全民公布后，质疑文化革命的声音暗潮涌动。刘少奇有什么罪？彭德怀、陶铸有什么罪？一个个都被整死了，而现在，连“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也被逼死了，这又是为什么？一个共产党的主席，却煽动红卫兵造共产党的反，率领造反派夺老干部的权,而在造成两百多万人死亡的造反、夺权后，又把权力交给了共产党,还给了老干部，这又是为了什么？在经济建设上，自人民公社化后，偌大个农业国已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

每年进口四五百万吨粮食，农民依旧吃不饱，农村照例有饿殍，为什么还要狠批“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为什么还要坚持人民公社？在文化上，八亿人民能看到的仅仅是八个样板戏和新闻简报式的电影，能听到的仅仅是“大救星”之类的颂歌和“钢琴伴唱红灯记”式的音乐，能读到的仅仅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之类的“导师”著作——全国全面文化大“饥荒”，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毛泽东不是二百五，他会听到潜流在人们心头的呼声，会看到挂在人们笑脸背后的怨容和怒目。他是个权谋天才，尽管他已认识到林彪摔死是他的重大挫折，也觉察到，他多年精心构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九一三事件”已严重受损，但积怨太大，太广，太深，而他那七十八岁高龄和疲惫的身心，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平复潜藏在人们心中特别是老干部心中的怨气和愤懑。

“伟光正”告急，毛的权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潜在的挑战。他病了：在庐山得的肺炎有加重的趋势；面对潜在的挑战，权力情结又使他狂躁起来。

据毛的贴身“秘书”被人称为“通房大丫头”的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复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复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他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在充满谎言的社会里，口是心非、尔虞我诈十分正常。毛用谎言领导革命和建设，并用谎言取得了胜利，然而，到头来，他却被谎言包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71 年 11 月，当毛的专职医生李志绥应召从黑龙江返回中南海时，但见**“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胸部听上去，满是杂音。**”李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检，被毛拒绝了。李又提注射青霉素，也被毛拒绝了，只答应每天只口服几片抗生素片；但服了五天也停服了。由于拒绝治疗，毛的**“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动。”**

1972 年 1 月 6 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前，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做出了要“解放”老干部的姿态，以换取开国元老们的支持。然而，在会上他着了风寒，肺炎加重。周恩来决定成立以李志绥为组长的医疗组，为毛诊治。对此，李回忆道：**“病的诊断是很清楚的，是因为肺部的感染，引起心脏受到损害，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并且已经有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肺性脑病。脑部没有足够的氧气，所以迷迷糊糊，时睡时醒。心电图显示有阵发性心动过速。”**但毛仍不配合，除同意注射青霉素消炎外，拒用包括治疗心脏的药物。他还当众大发脾气：**“所有的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说药的事，就给我滚！”**

有人说，毛泽东善于演戏，如果当演员，也是一流演员。但要拿自己生命去演戏，天才的毛泽东不会那么愚蠢，尽管狂躁症曾使他一度拒绝治疗。根据“真真假假”的逻辑，毛会在“拒绝治疗”中恢复治疗，而且还会利用“拒绝治疗”的狂躁来演戏。果然，他借机演起戏来。他当着江青和众人的面，对来探视他病情的周恩来说：

“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并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现场目击者之一的李志绥写道：**“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凝固起来”的周恩来上钩了。也许是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他竟没有立刻诚惶诚恐地表示“实难从命”之类的谦辞。读者有所不知，毛视周为对手，从来都没把周当接班人。“七大”后，他把刘少奇扶成二号人物，“八大”后，他意属邓小平和林彪，“九大”上，他把林彪扶正为接班人——总在他与周恩来之间，安插一个二号强人压周，使周不敢轻举妄动。对此，周十分清楚。由于历史的积怨，周视毛为阻挡他问鼎的唯一障碍，时刻都保持着对暗算的警惕性。多年来他都用“认错”、“认罪”甚至“下跪”等太极软功，与毛周旋，多次都能从毛设下的陷阱中爬出，转危为安。然而这一次，权力又使他掉进毛的陷阱之中。

当试探出周的野心后，毛泽东病情也加重了。李志绥写道：**“毛现在已不能躺下，只能坐在沙发上睡。呼吸声就像抽风箱一样。醒是醒了，可是坐在那里，有时候又睡着了。”**但毛的头脑还是清醒的：现实的威胁就在眼前——如果他有三长两短，周就是他“伟光正”的终结者。对此，他暗谕江青出击。深谙毛意图的江青,便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周大加鞭挞，历声斥周：**“你为什么要逼他**（毛）**交权！”**周自知理屈，力图爬出陷阱，赶忙进行修补。他**“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2 月 12 日凌晨，因一口痰被卡，毛泽东一度陷入昏迷。周终于找到了洗刷自己爬出陷阱的机会，闻讯便赶去探视。对此，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文中这样写道：

“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此后，毛笑逐颜开，积极配合治疗，病情日渐好转，到 2 月 21 日，他已经能挺起胸膛，接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了。

张显扬在《**毛发动文革，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一文中写道：“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权力拜物教使毛泽东**因权而病，执权而愈**，到了晚年，依然嗜权如命。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权瘾比赌瘾、毒瘾还要强烈，还要难解。染上了权瘾的人，如果中途不出意外，到头来都是独裁者**。”毛泽东就是在充满权瘾的中南海里难脱权瘾浊流的独裁者。

2、 共同造假

据说毛泽东从故纸堆里，找出了几首脍炙人口的诗词。例如：**“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又如：**“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等等。显然，他想借古人之口，来为他错识林彪找个下台的阶梯；但这些诗句并不能修补摇摇欲坠的“伟光正”形象。于是，在他的默许或参与下，与造假高手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起，共同制造了一篇《**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向全党、全国公布，以此证明：毛早在一九六六年，已有了识破林彪“野心家”、“阴谋家”的“先见之明”。**《信》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

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笔者：1966 年）

应该承认，这篇伪造的家书水平较高，从政治思想和文字格调上，都基本上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文笔。毛死后人们得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看一看当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们的资历、才华，便知他们与毛文的关联是多么深奥：

胡乔木，曾当过中宣部部长，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

陈伯达，曾任政治局常委，被誉为“人民的理论家”，1971 年被捕，后判 18 年徒刑；

周小舟，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 年在彭德怀事件中，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1966 年 12 月 26 日，自杀于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那天；

田家英，14 岁被誉为“过目不忘”的川中神童，后又被赞为“京兆一书生”，当了 18 年毛的秘书后，于 1966 年 5 月被迫“自杀”于中南海办公室；

李锐，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与彭德怀“勾结”，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67 年 11 月起，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 8 年，文革后主要著作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等等。

对党务、政务、军务繁忙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大腕秘书们不是橱窗里的摆设。看看当今各级政要下设的那些秘书局、处、科、室，里面都云集者众多高学历、高素质的秘书，他们大都能替首长飞笔走墨、敲键谋篇。这些司空见惯的代笔者，都肩负着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光荣”使命：为党、为首长贡献自己的才华。据报导，毛的许多文章都是秘书们代笔，或者是两人以上的集体写作。就著作权而论，参与写作的人都有署名的权利，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代笔和集体写作的著作权，非毛莫属。上行下效，各级党政军首长，不管他们能不能写作，都有大量著作出版。例如某李总理，就为某基金会“捐出稿费 300 万元”。又据报导，胡乔木临终前，曾要求党中央将他为毛泽东起草的文章“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据说，还包括他为毛写的或修改的诗篇，如《沁园春·雪》和《沁园春·长沙》等。然而，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些报导被官方“证明”为谎言，但却没有人能证明官方的“证明”不是谎言。由此可见，这篇家书由江青主持、张春桥起草、康生修改最后由毛亲自订正的可能性很大。又据官方说，《信》经周恩来、王任重等人过目后，**“江青已将原件烧掉”**。因此，再正确的推理，也在或然性之中。

就在《信》将成千古之谜时，毛的后院起火。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在回忆毛的“实事求是”精神时，在把造假责任推给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同时，却不自觉的道出了《信》的隐情。她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和我。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又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张玉凤说过这些话吗？她说的都是真话吗？在充满谎言的党里、社会里，在档案既不解密又不许体制外调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你已经相信“**江青已将原件烧掉**”，那么，张“秘书”的假言里有真，抑或真语里藏假，还有什么值得你去深究呢？

毛泽东想依靠“几年前”的一封《信》来修补“伟光正”形象，已诚属可怜巴巴了；倘若连这样的《信》都没有，你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导师，还能称得上“洞察一切”吗？据说，在“批陈”中，有人曾引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的话以批孟子，触及了毛和毛左派的神经。在受到启示后，一封“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的《信》，便被炮制了出来。文章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尽管文字水平较高，但它不会成为文学佳作，只能是千古赝品！

3、系列平反

《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并没有给“伟光正”形象加分，相反，在左派眼里，《信》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愚昧，在右派眼里，《信》是“欲盖弥彰”式的蠢行。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一世的毛泽东，到头来在人们眼中，却成了聪明谎言的制造者。

但毛泽东毕竟是天才，打倒了那么多的干部，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会不考虑他的未来和死后？几年来的打打杀杀证明，红卫兵靠不住，造反派也靠不住，靠得住的还是跟着他南征北战的老干部。尽管这些干部都是高高在上的不太听话的官老爷，但经过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批斗，威风不再，老实得多了，听话得多了；如果再对他们施之以恩，诸如“平反”、“解放”，他们会感恩戴德，会更听话，会自觉地给“伟光正”加分，远比虚拟的《信》更实际，更有效。于是，他开始实施抑威扬恩的谋略：“平反”那些被打倒了的功臣，“解放”那些受过委屈的元老，并把打倒他们责任都推到林彪身上。

1971 年 1 月 6 日，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参加陈毅元帅的葬礼，并在接见陈的亲属时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一句话，使“靠边站”多年的陈毅，在死后获得了“解放”。陈的亲属和参加葬礼的官员，听了“最高指示”后，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在 1967 年，在毛、周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以姚登山为代表的外交部造反派，夺了陈毅的权，使陈毅靠了边。此时此刻，这些旧怨成了过眼云烟，没人再敢去深究了。

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即大闹怀仁堂平反。他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们(笔者：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刻，他已“**忘记**”了，当年当接到大闹怀仁堂的报告后，他勃然大怒，放出狠话：“**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此刻，他也“**忘记**”了，他在 1964 年 12 月 20 日的中央会议上，指责邓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伊始，他又把邓定为**二号最大走资派**，列入坚决打倒之列，全国上下一致高呼：“打倒邓小平！”然而，时过境迁，1974 年 10 月，邓小平被他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 年 1 月 5 日，又任命邓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3 年 5 月 20 日至 31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 13 位老干部。此刻，毛也“**忘记**”了，这些老干部都是在他的眼皮下，被打成判徒、“走资派”的。

1973 年 12 月 21 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1974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为被整死了的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平反，恢复名誉。

1975 年 7 月 2 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后，治病或分配工作。

毛泽东“伟大”之处在于，在“平反”、“解放”干部中，他把揪斗、打倒老干部的责任,统统推到林彪身上。由于周恩来借机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或被监禁的老干部和知识精英，毛的推脱罪责的理由，除能蒙蔽亿万芸芸众生外，大多数高级干部和知识精英，并没有因此而给“伟光正”加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借林彪的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老干部们和知识精英间的紧张关系。

67-信仰危机

作者 于松然

林彪摔死后，特别是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向全民公布后，**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声

音暗潮涌动，“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告危，毛泽东的权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潜在的挑战。人们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和将领们，不仅**质疑**他对刘少奇、陶铸等人死的责任；**质疑**他鼓动红卫兵、造反派造反、揪斗“走资派”和夺权的独断；**质疑**他的“武装左派”、“群众专政”和“全国全面内战”的政策；**质疑**他坚持人民公社和狠批“三自一包”的专横；在“批陈整风”中，又**质疑**他狠批“华北山头主义”、改组北京军区、撤换政委李雪峯和司令郑维山的决定，是打击他的忠臣良将，令人心寒，等等。一言蔽之：**质疑**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

如果说质疑只是停留在敢怒不敢言的层面上，毛大可不必担心；但当质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挑战。果然，当他准备杀一儆百、“诏批”要杀掉林彪的“四大金刚”——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部长邱会作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五十多名高级将领，联名上书，提出“四大金刚”虽“有罪”但“罪不至死”的诉愿，公然挑战他的权威，迫使他最终放弃了“开刀问斩”的霸心。

毛泽东曾多次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攫取权力的资本。如今，推翻国民党的资本逐渐贬值，而文化大革命的资本，也在潜在的质疑声中，面临崩盘的危险。

毛泽东不愧为天才的革命家，在潜在的质疑和公然的挑战中，他没有卒然反击，而是“有理、有利、有节”地面对之。此刻，凭着灵感，他觉察到一场个人崇拜危机就在眼前：他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高大形象，正在经受严竣的考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个性坚强，在文化大革命和个人崇拜的危机中不退缩，不认输，他要运用批斗、镇压等专政手段，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人们对他的崇拜，从而挽救由个人崇拜危机导致的对中共崇拜和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

毛泽东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忆当年，“解放”之初，他从国民党惨败中获得一个重要启示：蒋介石兵败于军心不整和民心涣散，而军心不整和民心涣散，皆源于信仰缺失。在他看来，**民主**使三民主义信仰缺乏生气，**自由**使宗教信仰教派林立，**人权**使蒋介石的权力无法施威。天才的毛泽东从蒋介石的失败中懂得：要坐稳江山，就要征服民心；要征服民心，就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构建起一个统一的信仰和崇拜，取代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为此，在短短的几年里，他便为中国人设计并构建了一个主义信仰和两个图腾崇拜——信仰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图腾崇拜是对人民公社和“伟光正”两个图腾柱的崇拜。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是原始人迷信的产物，崇拜的对象。图腾柱是最典型的图腾标志和崇拜对象，现今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多立有图腾柱者。

构建共产主义信仰

为了树立共产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他又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要中国人民信仰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要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三位一体

的崇拜。

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毛泽东和他的导师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所谓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无数次向中国人民兜售，这个“**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各取所需”就是“需要什么拿什么”——多么美丽的想像啊！后来，“经典作家”们认为，“各取所需”这个词组自由主义太浓了，与马列主义教义有冲突，便大笔一挥，把它改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经典作家”们的这一改动不打紧，“天堂”里便出现了主管分配的管理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业已证明，在所谓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后又改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旗帜下，主管分配的管理层人员，纷纷取代地主、资本家，变成了鱼肉和镇压老百姓的官僚特权阶级，按毛泽东的说法，都“蜕变”成了“**官老爷**”、“**官僚资产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管理层可以“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谁能保证共产主义社会里的管理层不发生“蜕变”呢？

对此，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们，用“理论”解决了人们的疑虑。他们“论证”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资财富已“**极大丰富**”，甚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完全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人们的思想水平已“**极大提高**”，人人都是大公无私者，不会胡要乱拿；主管分配人员，个个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会“蜕变”。显然，这是他们用“**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史观“论证”的结果——在以全民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产生私有观念的“温床”已不复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圣贤！尽管这种马列主义式的“论证”，同行善以修来世福禄的佛教和赎罪以求死后上天堂的基督教，在宗教式的虚无缥缈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舆论一律”的强权洗脑下，包括笔者在内的芸芸众生，都曾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憧憬过共产主义的美好，相信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

这样，毛泽东用异想天开的“理论”构建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为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构建人民公社图腾柱

马列主义者自称是无神论者，“经典作家”们抨击宗教是迷信，是“鸦片”，申明共产主义不是宗教，是“科学”。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典作家”们还信誓旦旦地说，共产主义不是虚无飘渺的上帝和来世，也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可望又可即的现实。1936 年，苏共党魁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1952 年，他在死前一本书里，大讲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三大条件，其中之一是集体农庄国有化。斯大林的继任人赫鲁晓夫上台后，同他的前任一样，也热衷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7 年 11 月，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提出苏联在今后 15 年内要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在苏共党内确定，从 1959 年算起，在 12 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两个月后的苏共二十一大上，他公开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他除重弹列宁“**苏维埃加全国电器化**”的共产主义口号外，又加上他提出的“土豆烧牛肉”的新条件，就是共产主义天堂！尽管工农业严重失调，物资短缺，特别是食品和生活用品奇缺，使苏联人民生活过得相当艰辛；但在一党专政下，苏联人民又不得不在“**勒紧裤带住高楼，骑着摩托啃土豆**”的窘境中，翘首期待

“天堂”的降临！

以“老大哥”为榜样，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权力情结使他在刚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的1958年，便急不可待地要让中国人民看到“大救星”为他们构建的“人间天堂”：8月初，他在他树立起的一个图腾柱上，刻上了五个大字：“**人民公社好**”。接着，他以枪杆子为后盾，统帅官员和御用精英们，利用金字塔式的各级政府组织和全国所有广播、报刊，向中国人民“传销”他发明的“最进步、最合理”的“产品”——人民公社。在“舆论一律”强权下，他的“传销”计划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到10月底，全国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2.6万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把苏联“老大哥”远远抛在后边。对此，御用精英们连篇累牍地高呼：“**这是人民的选择！**”

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另一次中央会议上，他自豪地说：“**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他还得意忘形地嘲笑“老大哥”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断言：“**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到1973年，中国将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对此，御用精英们又放声高歌：“**这是历史的选择**！”

为了十五年“**跑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的统帅下，1958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苏联“老大哥”还在“发慌”中，毛泽东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向中国六亿人民吹响了大跃进的进军号：九千万人齐上阵，小高炉遍地开花，年底中共宣布，钢产量比去年的524万吨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070万吨。那一年，农业高产“卫星”纷纷上天，其中，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中稻的“超级卫星”，最为光彩夺目。年底中共中央宣布，粮食和棉花年产量，分别达到了7,500亿斤和6,700万担，均比去年翻了一番多。其中，每个中国人拥有粮食1,250斤，已经多得吃不完了。那一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巡游中华大地。在河南封丘，他对农民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由于担心粮油棉多得吃不完，用不尽，没有足够的仓库贮存，他告诫河北省徐水县干部说：“**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同时，他决定到国外寻找买家，大规模出口粮食。据统计：次年1959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8年的266万吨，猛增56%。那一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亿万诗人，纷纷登台亮相，高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赞歌，来颂扬共产主义天堂。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影片中，御用精英们把二十年后即1978年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和美满，活脱脱地摆弄在中国人的眼前：三大差别已被消灭，十三陵库区已变成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的“十三陵共产主义公社”；诗人郭沫若等人，在公社一棵巨大的长有多种水果的树冠下，“**各取所需**”地采摘、品尝各种瓜果；老红军陈培元，已经“飞跃”成航天科学家，他的文件包里夹着飞向火星的计划，带着年轻美丽的妻子，坐着沙发式的飞碟，直上蓝天，飞向远方——这些都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丰硕成果。那一年，中共党员和干部们，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御用精英们，大都在高唱共产主义颂歌，向人民承诺，共产主义的美满幸福就在眼前，连年逾古稀的朱老总，都说他一定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鲜有不

谐声音者。那一年，笔者在北大荒当农工期间，曾有幸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吃的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总之，那一年，“大救星”异想天开的权力情结，压制了所有务实主义者的理性思考。

然而，饱尝了共产主义社会幸福美满眼福、耳福的中国人，在无限美好的憧憬中不到一年，便陷入大饥荒中；在而后的 1959～1961 年的“**三年人祸**”中，有 3,000～4,500 万人饿毙在“天堂”里。1960 年，笔者常以水煮未脱皮的玉米粒填肚，还曾用玉米苞叶做的淀粉充饥。信仰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毛泽东为中国人营造的人民公社图腾柱，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失去了昔日的光芒，上当受骗的感觉席卷民心。更有甚者，在黑龙江农村的贫苦农民中，笔者曾多次听到过“宁愿作亡国奴，不愿当国家主人”的牢骚，怀念伪满拓荒时代。

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引发了中共高层的分裂。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逐渐得势，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不甘心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在暗箱里策划向刘、邓兴师问罪的文化大革命。

构建“伟光正”图腾柱

“解放”之初，毛泽东就为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上了一个鲜红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标志，即树了一个“伟光正”图腾柱，要中国人民去顶礼膜拜。自从他在审批“五一节”口号时添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的新口号后，“伟光正”的光环，也自然而然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三年人祸”后，他的权威遭到了党内右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挑战，“伟光正”光环也黯然失色。但他不愧是个革命家，在“三年人祸”后人民刚刚能填饱肚子的 1962 年 8 月，他重返一线，便向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叫喊，并开始为打倒刘、邓为代表的右派势力的文化大革命做舆论准备。

舆论准备的重点是：重塑已黯然失色的“伟光正”图腾柱。

毛泽东是个“个人崇拜主义者”，他认为没有崇拜就不可能有领袖权威。因此，他反对苏共党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主张“**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于是，1963 年 3 月 5 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

毛泽东为什么要中国人民学习雷锋呢？笔者曾第六章“学雷锋”一节中做过介绍。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主要看上了雷锋在日记里写的那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显然，他号召学雷锋的动机，其表是叫人做好事，其里则是要全国人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学生，从而以达到重塑“伟光正”图腾柱的目的。

心领神会的林彪，立刻在全军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接着，他又下令《解放军报》编纂《毛主席语录》，使全军四百多万指战员人手一册，从而成功地使学习雷锋运动演变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运动。

乘着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东风”，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领袖和政要的共同策动下，《毛主席语录》成了东方“圣经”，几

年间出版了五十多亿册，并向150多个国家输出了数千万册。与此同时：他们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终困死于北京囚禁中；他们把在数千万饿殍的“三面红旗”面前说了句“**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真话的刘少奇，宣判为“叛徒、内奸、工贼”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拖死于开封密室；而造成数千万饿殍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则被他们包装成“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万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的理论又被他们媚美为马列主义“顶峯”，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并献谄于毛“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无上称号，要全国人民顶礼膜拜他。

大规模造神的个人崇拜运动的成就，使毛泽东终于又看到了“伟光正”图腾柱上的闪闪红光。文化大革命几年间，在“伟光正”图腾柱的血光照射下，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横扫”、破“四旧”、“批资”、夺权、全面内战、“群众专政”、“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系列批、斗、打、抄、杀的红色恐怖中，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使包括**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在内的200多万“阶级敌人”亦即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老百姓，都先后死于非命，一千多万人致伤、致残。

保卫信仰、图腾柱

然而，“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向全国公布后，沉睡中的中国人民，开始有所觉醒。

共产主义理想早已日薄西山。尽管毛泽东在1966年用“五七指示”去修补共产主义信仰，但用“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农耕思想亦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陶渊明主义，去取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实在是中国人民难以吞咽的苦瓜。

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人民公社呢？它已威信扫地。尽管毛泽东对它动了大手术，全民所有制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一草一木归集体**”的社会主义，也大踏步地后撤，退到允许社员拥有三分自留地的资本主义。但毛式农业合作化的毒瘤没有摘除，土地仍然把持在雇主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手里，亿万饥饿农民，不得不继续在人民公社图腾柱的阴影下，辛勤耕作，不得不继续在“瓜菜代”的充饥中，艰难度日。当年河南农民谣曰：“**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得活！**”城市呢？国民经济被毛整到了“崩溃的边缘”，亿万城镇居民，也不得不在低标准供应下，天天为吃饱饭而奔波。当年城市小学生顺口溜道：“**小朋友，快点长，长大当个事务长**（注：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管理员）。**偷点米，偷点面，小两口吃得真舒坦！**”

人民公社的失败是理想主义的失败？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御用精英们既不敢说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反动，也不敢触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奴役本质，却自作聪明地“证明”说，这是“好心办了坏事”。对此，毛泽东并不买帐。他认为，这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也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例如，在总结饿死数千万人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带头给林的讲话鼓掌，并称赞其讲得“很好”。显然，人民公社的失败，并没有使毛泽东幡然悔悟，改弦更张；相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镇压下，人们不得不在失去光彩的图腾柱前，勒紧裤带高呼“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忍着饥饿年复一年地唱着那支“公社是个红太阳”的歌，直唱到毛死。由于中共拒绝清算毛的滔天大罪，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个以“三面红旗”命名的曾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人民公社图腾柱，依旧耸立在南京长江大桥的两端。

之于“伟光正”图腾柱，已被《“五七一工程”纪要》推到了崩塌的边缘。林立果一针见血地写道：“（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一句话，催醒了沉沉睡梦中的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他们抛弃了理想，选择了现实；在现实选择中，他们突现自我价值，唾弃了毛的个人迷信；在突现自我价值中，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中，很快消磨掉了革命的激情，开始为小家庭的温饱奔波。到此，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设计、构建的信仰和崇拜，逐渐被人们自发的“金钱崇拜”所取代，或皈依其它宗教，寻觅精神归宿。

权力拜物教信徒毛泽东看到，个人权力的危机就在眼前。这个危机虽表现为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但其实质是他个人权力的危机。在毛的哲学世界里，目的和手段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为了权力，在他的导演下，美丽的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夺取和巩固权力的手段。因此，为了确保他绝对权威的不可动摇性，就要保卫他的文革路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他看来，这条路线和理论，是他构建信仰和崇拜从而确保他绝对权威的思想基础。在“舆论一律”的强制下，这条路线和理论，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传销”空间。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所有独裁者都善于用美丽的辞藻去掩盖他卑劣的目的；又如《君主论》所言：一个天才的君王，为了权力，总是能在芸芸众生里找到许多“**上当受骗的货色**。”

的确，芸芸众生上当了：在御用学者、专家、教授的包装下，毛泽东成了理想主义的化身。但他们无法遮盖住高级干部、将领和众多知识分子的耳目。

权力拜物教信徒毛泽东不愧是个天才的革命家。他发现，那些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主要来自于党内，特别是来自于高级干部、将领和知识分子。于是，他再次动用无产阶级专政武器，进行批判和镇压。他在伪造的给江青的一封信里，重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警告党内右派，警告那些异己的高级干部、将领和知识分子，“**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又来一次”横扫、夺权和内战，因为“**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告诫中国老百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要一直革到共产主义社会。

“非跳出来不可”的“理论”是有据可查的。自毛泽东夺得政权以来，党内“非跳出来不可”的高级牛鬼蛇神计有：

第一个是 1954 年的**高岗**，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罪名是攻击毛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第二个是 1959 年的**彭德怀**，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因攻击毛发动的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三面红旗”运动，被判组织“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罪。

第三个是 1966 年的**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因向全党说，饿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正确不正确“很难说”，被判定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叛徒、内奸、工贼”，是“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是“鞭（毛）尸”的主要嫌犯。

第四个是 1971 年的**林彪**，时任副统帅，罪名是“发动突然袭击”，攻击毛的得意门生毛、江集团的高参张春桥，企图“抢班夺权”，接着“叛党”、“叛国”而去。

高、彭、刘、林四人已先后被毛“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都先后死于非命。其中，刘少奇、林彪两人都是毛亲自挑选的接班人。

那么，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亦即第五个“非跳出来不可”的高级牛鬼蛇神是谁呢？毛泽东锁定总理周恩来。

68-毛泽东与周恩来角力

作者 于松然

周恩来反极左

林彪摔死后，周恩来自然而然地当上了党国第二把手，离取毛而代之，只有一步之遥。他深知，这是机遇，更是生死挑战，因毛从来就不愿把权力交与他，而且还有驱逐甚至剪除之意。但为了匡正毛的错误，拯救他心目中的党，他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他曾对亲信们说：**“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就是当年被时人称道的“不要倒、不要走、不要死”的“**三不要主义**”。于是，他升级太极软功，以绵里藏针、柔弱克刚之势，更以左其表、右其里之策，与毛周旋，小心翼翼地去修正毛的文革路线，扭转文革给中共和国家带来的困难，力图争取以中、高级干部和将领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使己立于不败之地，伺机取而代之。这表明，“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开始走匡正毛弊拯救中共的务实路线。

对周恩来来说，在“九一三事件”后的几年，是他威望节节攀升的几年，但又是他遭毛泽东连连重创后致死的几年。

当接到林彪摔死的正式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张春桥等人以胜利者姿态喊道：“拿茅台来！”叶剑英闻声不屑地说：“一个副统帅死了，难道还要庆贺吗？”在周恩来那里，当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了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后，当着部分官员，面壁片刻，突然失控，两肩颤抖，**嚎啕大哭**起来。对于这种哭声，虽有不同的解读，但与毛、

张辈等人的幸灾乐祸，大相径庭。周的兔死狐悲的哭声传出后，赢得了党内右派特别是中、高级官员的理解和同情。当毛听到周的嚎啕后，有什么想法？人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是，毛、张们的“幸灾乐祸”，不可能赢得党内右派的理解和同情。

面对党内外压力，以出席陈毅追悼会为契机，毛泽东开始了逐步解放、平反老干部的部署。周接过毛部署，利用职权，力排以江青为代表的毛左派集团的干扰，果断地**解放了大批干部和将领**，并根据不同情况，安排了适当工作。例如，他并非军委负责人，但他有意识地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同军委负责人叶剑英元帅一起，一举“解放”了 157 个将军，并同他们一一谈话，解决他们的问题，给他们安排了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其后，在贺龙元帅平反后的追悼会上，周拖着病体，被人搀扶着，连连喊着贺的遗孀名字：**“薛明，薛明，我没有保护好贺龙，我对不起你啊！”**声音凄凉。尽管有人认为，他有虚伪和作秀的成分，但总比毛、江、张、姚等党内左派冷若冰霜脸，要人性得多。无形中，周又得到党内右派高干们的谅解、同情和支持，尽管他在文革头几年，说了许多使党内右派干部伤心的话，做了许多令党内右派干部怀恨的事。而此时，毛对周借他的名义做收买人心的过头之事，又警觉起来。

在**清查“五一六”**中，周恩来将许多造反派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加以惩处。对此，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党内右派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和将领，乐见其成；但支持造反派的毛左集团的江、张等人，却耿耿于怀，声称要反击“右倾回潮”。显然，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周虽获得了党内右派集团的大力支持，却得罪了江、张等极左派大员。极左头目毛泽东会袖手旁观吗？

最使中共引为自豪的是，**外交上的重大成就**：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并继承了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登门求见”，来访中国，并在上海发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缓和了两国长达 20 多年的对抗；同年 9 月 25 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9 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一系列的外交成就，没有使主人毛泽东威名大振，却使助手周恩来在国内外英名远扬。有些西方媒体说**“中国外交最杰出的领袖就是周恩来”**，**“中美关系的教父是周恩来”**，等等，周这种功高盖主之势，使毛看在眼里，忌在心中。

1972 年 8、9 月间，周恩来曾发表过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根据周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 3 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周批极左思潮的目的是想结束文革，并以大搞经济建设来拯救中国共产党。在“九一三事件”前，周的这个想法曾与林彪不谋而合。但他是处事谨慎的人，不会轻易干毛不高兴的事；而同时，他又是个善于利用毛的言行大做过头文章的人，借以实现他的“拯救”目的。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经将林彪定为极左派。1972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人民日报》14 日的三篇批左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之剑，直指毛泽东的文革底线，博得了党内右派的喝彩，却引起了毛、江左派集团的不满。因为，批判极左思潮，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

至此，毛、周角力已明朗化起来。在毛看来，周是一个早晚要“**跳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党内右派领袖。

行文到此，须要说一说方位词左、右变成形容词后的政治定义。在毛泽东的词典里，左派是真正的革命派，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而加了引号的“左”派，在他看来，是打着革命和马列毛主义旗号的假左派、真右派、真反革命，即所谓“形左实右”者。这样，在毛的词典里，左、右被打上政治标签，并使其政治化。于是，左被封为革命者，右被挞为反革命，如右派分子，这就是许多中国人有“**宁左勿右**”心态的原因之一。但毛并不像有些中国人那样愚蠢，他经常根据需要修改定义。例如，在一次会议上，他用“粗话”来定义左、右。他说：“**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这样，毛泽东又使左、右分不清谁革命谁反革命了。其实，左、右原本无革命与反革命之分，那是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强加上去的。在中国，由于左、右被毛完全政治化，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对各种不同立场的人物赋以左、右定位。在文革中，对左、右政治定位，可从不同层面上去区分：第一层次是自由主义与马列毛主义，一般认为，前者为右，后者为左；第二层次是中共党内思潮，一般认为，保守为右，激进为左；第三层次是左派内部，可有中左和极左之分。“九一三事件”后，周弃极左而趋中左。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极左分子，亦称**极左毛分子**，都是权力拜物教的极权主义者，他们崇拜、追逐和使用权力，几乎达到疯狂地步：**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极左毛鼓吹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和“枪杆子主义”，传布“血统论”、“官本论”、“大汉民族论”和“一元化领导论”，否定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颠覆真、善、美的华夏文明，推崇个人崇拜，宣扬对领袖的忠诚和服从，力主少数人的“集体”专政和个人独裁，用暴力镇压异议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实行红色恐怖统治——这些都是极左毛的鲜明特征，与法西斯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极左毛亦即极权主义者，成了**谎言、野蛮、邪恶**的代称。

毛泽东批右

同任何一个独裁者一样，毛泽东追逐、捍卫权力的疯狂性，与他的“大救星”、“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情结密不可分——这是权力拜物教权力情结之使然。“解放”前的毛泽东，他追逐权力的疯狂性建立在审时度势的务实和权谋基础之上，因而使他取得了胜利，达到了夺取权力和改朝换代的目的；“解放”后的毛泽东，地位大变，成了独裁者，在马列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美丽词藻包装下，妄自尊大的权力情结恶性发展起来，异想天开的狂想“理论”，也被他制造了出来，诸如什么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化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等。对此，御用学者们把毛的动物性的权力情结，谄之为革命家的“**理想主义**”，更有专家把毛的狂想，媚之为诗人的“**浪漫情怀**”，等等。但在“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下，毛泽东酿造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权灾难，先后造成五千多万人死亡，伤残无法统计。这些灾难包括：枪杀 150～300 万人的“镇反”运动，打死、枪杀 100～150 万人的“土改”运动，逼死、打死数十万人的“一化三改造”运动，饿死 3,000～4,500 万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导致 200～300 万人毙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毛泽东权力情结引发的狂想所酿成的灾难，不啻是对那些谄媚学者、专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权力情结使他的狂想进一步发展，他要“**过七八年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一直革到共产主义。因此，正如“序幕”中所说，对毛泽东的一生，只能用八个字加以概括：**权谋盖世，罪恶滔天！**

“解放”后，紧跟毛泽东狂想“理论”疯狂了 20 余年的周恩来，“九一三事件”后，

有所觉悟，他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于是，他用务实的现实主义与毛泽东的狂想相周旋，力图匡正毛的错误，拯救他心目中的党；但毛不许他“立地成佛”。毛、周的关系史，原本就是一部即联合又争斗的历史，“九一三事件”后，毛、周又在狂想与务实间展开角力。

在周恩来威望节节攀升、功高盖主的形势下，特别佯做交权的试探后，毛泽东已得出了结论：埋葬文革者周恩来也！如果他死在周的前面，潜在的鞭尸者亦周恩来也！因此，年长周恩来五岁的他，必须活过周，堵死周自然接班之路。

毛泽东批周恩来反极左

由周恩来授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组反左文章，引起了毛、江左派集团的不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更借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的枕头风，吹进毛泽东的耳里。

毛发现周又借他的话大做过头文章，备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反制。1972 年 12 月 17 日，他召见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在开门见山地诏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之后，他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接过“圣旨”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于 12 月 19 日，一起召集《人民日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在传达会上，江、张、姚等人，对周叫人写的那几篇批左文章，大加挞伐。在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周节节败退。尽管他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但他不得不承认，他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周毕竟不是动辄便熊人的江青，他是个善于争取别人同情、理解和支持的人，于是主动承担责任说：**“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

1973 年 1 月 1 日，凭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权威，张春桥、姚文元挥笔发表了《新年献词》。《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全党全国在批林整风中，重点批判林彪反动路线的**“极右实质”**，**“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从而中止了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毛、周第一回合的角力，以周恩来承认错误而告终。但周虽败犹荣，他已赢得了许多党内右派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毛泽东批周恩来投降美国

1972 年 5 月，在一次尿常规检查时发现，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个消息对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非常担心他死后周能自然接班的毛泽东来说，未始不是一个好消息。他决定用权力干预医疗。据高文谦在《晚年的周恩来》一书中记载：“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

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到九个月后的1973年2月，周大量尿血。高文谦继续写道，“即便如此”，周“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周恩来膀胱癌的最佳手术机会，就这样匆匆而过。

对此，文革专家辛子陵写道：**“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为了对付周氏紧握权力的“三不要主义”，正如辛文所说，在干预周恩来治疗的同时，毛泽东加大了对周的精神压力。197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同时批判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立场。为了羞辱病中的周恩来，毛泽东决定要周主持批判他自己的政治局会议。善行太极软功的周恩来，立马采取主动，一面在会前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会议上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试图化解批判会议的批判势头。然而，做为毛的前台代表江青，不依不挠，激烈批判周恩来。她指责周左倾，**“是霍查”**(1)，**“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认真执行**“联美整苏”**的方针,又批周**“瞒着主席”**同美国人密约，要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等等。久经沙场的周，当然知道这是毛事先定下的调子。因此，面对江青咄咄逼人的批判，抑情敛容，沉默不语。见周有抵触情绪，有“圣旨”在胸的江青，便大发起雌威来。在狠批周恩来中，她把**“丧权辱国”**、**“蒙骗主席”**几顶大帽子戴在周的头上，并用人格污辱的语言骂周**“给美国人下跪”**，硬逼周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等等。沉默不语的周恩来，终于被激怒了。他猛拍桌子，对着江青吼道：**“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贯以“顺守”太极功的周恩来，为什么感情突然爆发，敢向第一夫人拍桌子呢？对此人们虽有不同的解读，但江青欺人太甚，恐怕是主因。换位相对：如果我是周恩来，很可能抓起口杯，砸向江青！

那么，江青为什么敢于辱骂周恩来？话得从毛不断批周说起。

林彪摔死后，毛泽东从那阵兔死狐悲的嚎啕恸哭中，已洞察到周恩来心底的秘密：胸怀二心。据他观察，一年多来，在批林、批左、解放干部和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工作上，周都在利用他的话做过头文章，私下诋诟他的前台代表江、张、姚等，以寻求党内右派更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最使他无法容忍的是，外交上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亲自做出的，但成果却都被记在周恩来的名下，中国的外交，也竟被中外人士称赞为**“周恩来外交”**！显然，这种图谋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不仅暴露了周反文革之异志，也再次暴露了周必取他而代之或等他死后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他决定双管齐下，在干预周医疗的同时，从周主管的外交部入手，整肃周恩来，以堵死周的野心。

常言道：“磨道上找蹄印”，哪有找不到之理？周恩来的“辫子”很快被抓到了。

对于周恩来直接掌管下的外交部来说，1973年是个多事之秋。那一年，外交部不断出

“错”，不断受到毛泽东严历批评；在毛的批评下，周恩来不断做口头或书面检讨。例如，2月15日至1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周谈判时，要求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答复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我们愿意和平解决，但不能对任何人做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对于这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外交辞令，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极为不满。他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又如，外交部曾计划邀请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访问中国，被毛批犯了**“检芝麻，丢西瓜”**的错误；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布当选为巴国总理，外交部的计划没错。再如，周恩来为了实现毛泽东制定的**“联美整苏”**的对美外交政策，打算应美方的邀请访美，毛泽东一句耐人寻味的批评，打消了周回访美国的计划。毛说：**“台湾那个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谈？我们不搞一边倒，也不能挟外以自重**。”等等。

据说，这些都是“小”事；但对这些“小”事，毛泽东却大加鞭挞。他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他还批评外交部说：**“你们送的报告我是基本不看的，因为是不胜其看，随便一个什么屁司也能代表党中央说话吗？”**显然，此时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同一年多以前林彪直接领导的军委办事组一样，面临被整肃的命运。外交部人心惶惶。不久，外交部的“大”事也被毛抓住。

1973年6月，外交部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在内部刊物《新情况》发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大骂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怒气未消的毛泽东，又借故严历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一篇文章何以使毛泽东大动肝火呢？对此，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毛心目中的接班人是江青和张春桥；为了防止周自然接班，毛有意在寻衅找茬。笔者认为，根据毛的德性，说他“寻衅找茬”没有错，因为这是他置敌于死地的惯用手段。但毛这次“找茬”是歪打正着，实实在在找到了他与周的根本分歧上——**毛的狂想与周的务实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

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要当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狂想由来已久**。历史纪录了他狂想的骸影轨迹：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间，中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9篇编辑部文章，综称《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苏共中央否定斯大林、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议会道路”等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激烈批判。《九评》昭示：苏共已经变修（正主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与此相称，毛泽东已取代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成为斯大林的“合法”继承人，因而，登上了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宝座。

“三年人祸”后，中共党内务实主义者纷纷起来对抗毛的狂想“理论”：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上，他们提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新政；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他们提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的新思惟。以刘、周、邓为代表的务实主义新政、新思惟，受到了毛的批判。1964年2月9日和29日，毛泽东在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尖锐批评了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不要社会主义”**，说**“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三和**

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他下令外交部和中联部，对外要“**三斗一多**”即对帝、修、反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据报导，毛在位的六、七十年代，每年外援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保持在5～7%之间。其中，仅援越就达200亿美元。又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笔者计算，当年阿国有200万人口，等于我国给他们每人平均发了4,500元的红包；而这每人每年643元的红包，是我国当时人均年收入150元的4.3倍。为了肩负起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重任，毛泽东要中国老百姓为他所谓的世界革命，勒紧裤带，做出贡献。

1961年4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发表了一篇《新基本粒子观对话》的论文，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据传，美国一名科学家，由于赞扬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主张把新发现的粒子命名为“毛子”。本来对自然科学陌生又缺乏热情的毛泽东，因坂田昌一文章和“毛子”的启迪，突发异想，在亿万农民还在“瓜菜代”贫困中挣扎的时候，决定拨重金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使他的“**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响誉世界，从而充分享受世界级大思想家的殊荣。1964年8月21日至31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名科学家，云集中国首都，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尽管会议的主持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中国科学家们的推动下，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还是引起了各国科学家们的注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是绝无仅有大思想家和全世界人民导师的**狂想**。

1967年11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在一篇编辑部社论中写道：“**现在，世界已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19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移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为了使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发扬光大，被誉为“东方圣经”的《毛主席语录》，几年间，印数高达五十余忆册，其中向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出口数千万册；几年间，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种类约4万余种、总数达22亿枚以上，向国际友人赠送不计其数。许多国际“友人”，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纷纷来北京取“经”，讨要革命经费。对此，中国政府根据毛的“**三斗一多**”方针，慷慨解囊支援，据说，几年间，援助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有报导称：一个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在北京一次领取了50万美元革命经费，回国后，便从地球上蒸发，消失得无踪无影。

矜而自恃的毛泽东，俨然以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左右开弓，前后打人：他不仅要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倒以印度为首各国反动派，更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于是，他于1968年4月16日，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两年后的1970年5月20日，他又发表了著名的《**五二〇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中，毛以导师的口吻断言：“**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1974年2月22日，毛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使他“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第三世界领袖，当上了全世界人民的导师。

1969年，中苏热核大战危机在美国干涉下，转危为安，但乌云并没有完全散去。中苏热核冲突的教训使毛泽东有所省悟，特别是当他获知美国在制止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决定性作用后，开始意识到他左打苏修、右打美帝政策的不明智：他要利用美苏矛盾“**联美整**

苏”，用一个拳头狠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在反美的《**五二〇声明**》发表后不到一年，即 1971 年 4 月，他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对美国展开笑脸外交，以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机巧，向美伸出了橄榄枝。基于国家利益，美国尼克松政府，接过橄榄枝，便报之以桃李：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登陆中国，开始了中、美修好因而惊诧世界的“破冰之旅”！

毛泽东决定“联美整苏”的新政时，并没有忘记他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在他的新政中，“整苏”是实，“联美”是虚。在他看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纸老虎，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张牌而已，他完全可以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他的“联美”的“联”字，只能是“利用”一词的同义语。换句话说，他想利用美国对苏联的敌视情绪，使美为我所用，以达到整治苏联的目的。他的这种想法，在接待尼克松的设计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用他的副手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对谈，他只在书房里象征性地接见一下尼克松。对于西方政客来说，接受这种接待设计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注重的是结果，而非接待形式；但这种接待形式对中共来说，却是个原则问题。中共是阿 Q 主义者，满足精神上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尼克松“登门求见”，中国二把手与美国一把手不对等级别的谈判，以及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来“朝圣”的美国总统，等等设计，不仅捍卫了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地位，也极大地满足了许多中国人“天朝”无上的狂想，**正可谓不战而屈美之兵**！

但周恩来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中国都没有实力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抗衡，因而只能推行和平与发展战略（后被邓小平发展成“**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暂时无力主宰世界。外交部在周的务实主义思想影响下，便出现了“**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结论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否定了毛做出的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定位，也嘲弄了毛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狂想。因此，毛泽东读后大发雷霆，大骂文章是“**放屁一通**”。

为了抵消周的外交形象，毛泽东刻意扮演了主管外交的脚色。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197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显然，毛直接向基辛格表明，“中美关系的教父”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

也许是务实主义“作祟”或“三不要主义”的顽固性，周氏并没有吸取教训，又一个“大”事很快又被毛抓获。1973 年 11 月 13 日晚，当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提出军事合作的临时动议后，病人周恩来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谈，商定今后双方各派一人继续约谈。这种并无结论性的约谈是无可厚非的外交辞令，却触怒了毛泽东。毛怎么能不生气呢？六年前，他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已经对他的思想和中国的作用，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位：**“现在，世界已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被誉为“东方圣经”的《毛主席语录》，已发行到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就是证明。但这个重大原则，却被周大管家忘得一干二净！做为全世界革命中心，做为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竟要美帝国主义来保护，**“岂非咄咄怪事？”**（毛语） 11 月 17 日，他亲自出马，

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抨击周的“约谈”是投降主义。他还对着王海容、唐闻生两小姐和年轻漂亮的英文教师章含之的脸，放出狠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11 月 18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便应声召开，江青也应声对周大发雌威，周恩来也对江青拍了桌子。

当听了周恩来对江青拍桌子的汇报后，毛泽东勃然大怒。他下令批周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由周本人改换为接班人王洪文。做为党的主席，他照“例”不参加会议。他还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刚刚复出的中央委员邓小平外，还有中共党史上三个著名的女人。那三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年轻貌美的女人，却成了会议的主角。其中，唐闻生小姐，竟能代表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八个小时的会议主题报告。据说，唐小姐与毛有较亲的社会关系。其次是王海容小姐，她在会上指手划脚，代表毛对周横加指责，严然一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面孔，因为她是毛的表侄孙女。之于那位漂亮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虽没有唐、王两位小姐的亲缘关系，但据说她同“秘书”张玉凤，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一样，与毛有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关系，因此，她也成了会议的主角，也拥有代表毛对周大加挞伐的权力。11 月 25 日到 12 月 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迅速升级，按“圣谕”对病人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对此，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文中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毛泽东住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已经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但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由于有知情人的回忆，人们才能看到政治局扩大会议里的一些凤毛麟角。

批周会议的开法很不寻常。首先由列席会议的唐闻生小姐作了八个钟头的报告。报告详述了毛泽东一年多以来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

不进，水泼不进”，说毛主席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她还批判周恩来没有执行“伟大领袖”**“山雨欲来风满楼”**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的批判使与会人员陷入五里云雾中。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唐朝许浑《咸阳城东楼》的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是宋代晏殊《浣溪沙》的词章，但许多中国人未必知道，唐闻生小姐是如何把这两句诗词化做毛泽东的外交方针进行传达的，人们在唐小姐的著书立说的文字中，也难以找到这两句诗词的踪影。当然，人们可以推出毛的狂妄想法：“山雨欲来风满楼”指的是世界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无可奈何花落去”说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内外交困，已无力支配世界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肩负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任，外交工作要紧跟这种形势。但这仅仅是推断；况且“诗无达诂”，词无定解，人们从不同角度和感受出发，会对诗词有不同的领悟，其释义也不会完全相同。谁能知道“伟大领袖”内心的准确想法呢？谁能预测到信奉“理无常是”哲学的“伟大领袖”，还会对诗词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全新解释呢？这可难坏了周恩来，连四十多年后的笔者，也无法猜测。

周恩来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政治家，面对欲置其于死地的欲加之罪，仍以紧握权力不放的“三不要主义”与毛周旋。他可能不会认真思考那两句诗词所规定的外交方针具体是什么，但他会以不变应万变：**你说错，就算错，不错也认错**。据说：会中他曾请求与毛见一次面，当面认罪，被毛拒绝；江青责令他自己动手写检查，不准由秘书代笔，他执笔照办；由于年老、眼花、手发抖，有时记不清别人批他的发言内容，他曾请求他曾关照过的王、闻、章诸部下帮助，遭到她们严辞训斥，指责他企图摸毛主席的底……一个政府总理竟被整得如此狼狈，令人难以接受；但他却能逆来顺受，唯唯认错，决不反抗，与怒拍桌子判若两人，竟使毛抓不到打倒他的把柄。

经过十天的批斗，病情不断恶化的周恩来，已深感力不从心了。他决定交出部分权力，以为缓兵，力争有效治疗以恢复体力。12 月 4 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报告，末尾表示自己只能做助手，放弃主持政治局工作的权力，提议由别人来主持。

十天的批斗传出后，周恩来却受到党内高层的广泛同情，毛、江左派反而受到无声的谴责。面对同情、谴责的地下冷风，一心想整倒周恩来又苦于找不到把柄的毛泽东，正当无计可施时，周的检讨报告，给了他一个停止批周的台阶。据报导，毛泽东在决定停止批周的同时，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亦即要紧跟他的革命路线，不要听周的。聪明一世、自以为又胜一筹的毛泽东，殊不知这是他继批周反极左后，又是一次名胜而实败的角力：周虽名败，却赢得了更多的党心。自做聪明的毛泽东，灵机一动，把批周的责任推给了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12 月 9 日，毛泽东在会见尼伯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指着王、唐两位小姐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说：**“他做脸，叫我们当屁股**。”而与会者章含之呢？没见有牢骚，却见有忏悔。她后来承认，在周恩来最无助之时，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这场批斗会后，周恩来的癌症病情有所恶化。力图拖垮周恩来身体的毛泽东，最终不得不批准周住院手术。

毛泽东聪明过人，权谋盖世，把不愿“**走**”的周恩来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寻衅滋事，“磨道上找蹄印”，力图一举拿下周恩来；但当找不到拿下的借口时，便来个 180 度大转弯，在即将举行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他任命已病入膏肓的周为国务院总理并负责组阁，力图累垮周恩来。毛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据报导，做过几次手术后的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体力已经透支，他在唸了《政府工作报告》开始一段文字后，便支撑不住，歪倒在坐位上，其他部分只好由别人代读。

69-批林批孔批周公

作者 于松然

1966 年 12 月，毛泽东对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代表团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听到“最高指示”后，上层精英们紧紧跟上。在而后的几年间，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孔孟之道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旧中国传统的私有制观念最集中的表现**”，是“**集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之大成的反动思想体系**”，因而是“**复辟之道**”、“**倒退之道**”、“**卖国之道**”， 孔子本人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切剝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等等。这样，他们就为毛泽东清除对手、培植他的个人崇拜，做了大量舆论准备。1974 年，毛泽东根据权力斗争亦即树立绝对权威和铲除对手的政治需要，在舆论准备的基础上，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暗批周公运动。(右图)



在山东孔庙前召开批林批孔大会

1、剑指华夏文明的根：儒释道文化

在 1973 年的多事之秋里，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也被拉了出来。5 月，毛写了几句顺口溜在左派中传颂；“**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刚骂过外交部“**放屁一通**”和严历批判周恩来“**势必搞修正**”后的 8 月，毛正式发表了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的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1)

这是一篇蹩脚的“七律”。该诗不仅平仄失检，对仗欠工，而且引典出错，但由于是“伟大领袖”所作，便成了被时人称颂的反孔名篇！

熟悉毛泽东权斗史的人士都清楚，郭沫若一介无权无势的文人，毛怎会为他大动干戈？尽管郭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明白，“醉翁”之意不在他。果其不错。谙达文武之道的毛泽东，刚刚在比兰德拉国王面前安抚了一下被他整苦了的周，旋又借批孔在暗中对周拉张了硬弓。1974 年初，当过一次“屁股”的王海容，又接到了毛的密旨：**“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于是，1974 年 1 月 18 日，江青主持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一文，在明批林彪中隐射周恩来，并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全国。24 日和 25 日，北京连续召开了在京军事单位、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自此，一场“批林批孔”又流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其实，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要当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狂想的继续：**打倒孔圣人，树立现代秦始皇！**因此，“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批林批周而批孔，而是为了**批孔颂秦警告周**——是个一箭三雕的权术。其中“颂秦”，就是要中国人颂扬**马列加秦始皇主义**！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反孔由来以久，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先辈知识分子们引进了代表西方文明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同时也引来了苏俄专制的“马列先生”。不幸的是，在运动后的六十年里，“马列先生”击败了“德赛先生”，使领袖崇拜主宰了中国，从而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愚昧和疯狂中。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主旋律”监控下，领袖崇拜、帝王崇拜和暴力崇拜的**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还在继续污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是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恶果之一。

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在赞扬引进西方文明的五四运动时，却忘记了对运动中引入“马列先生”和“打倒孔家店”两股逆流的反思！

“打倒孔家店”和引入“马列先生”，是五四运动中互为因果的两股逆流。“孔家店”因“马列先生”的引入而备遭诋诟：“打倒孔家店”的先辈们，不去追讨封建帝王即古代君主集权主义者的专横、独裁、腐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贫困、落后和挨打等灾难的罪行，却把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统统扣到华夏文明的头上；说什么“仁义道德”是“吃人”，是“男盗女娼”，甚至是“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等等。以革命自居的“马列先生”，则因“孔家店”被妖魔化而得益，最终诡变成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亦即**马列毛主义**，从而促成了浩劫中华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文化大革命和先辈们“打倒孔家店”，都是对儒释道文化的颠覆！

儒释道文化是延绵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种文化，与马列毛主义所信奉的丛林法则——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对立，水火不容。儒家突出一个“仁”字，强调克己复礼和三纲五常，把仁义理智信视为最高最美的道德标准；释家突出一个“悟”字，强调慈悲，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转世轮回、彻悟是佛，把积德行善视为人生的最

高价值；道家突出一个“真”字，强调无为、返朴归真，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把“道法自然”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儒释道三家从不同角度提供精神动力，使中华民族为追求人生理想——**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而在儒释道文化中，以孔孟之道代表的儒文化，则是华夏文明的精华。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几经战乱，多次改朝换代，又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各民族仍能在乱后走在一起，如三国四十多年后归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二百七十多年后被隋统一，宋、辽（后为金）、夏三足鼎立三百多年后归于元，以及唐、元、清等朝代少数民族统治者被儒化、汉化，等等，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释道文明功不可没。如果没有马列毛主义的强权阻遏，这种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释道文化，必将与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融合在一起，造福于中华民族，宛若今日的**港、澳、台**和**新加坡**。因此，“打倒孔家店”及其以后对孔孟之道的错误批判，特别是在批林批孔中对“克己复礼”和“三纲五常”的否定，是颠覆华夏文明的历史反动。

2、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

在查抄林家大院时，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张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于是，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成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之一。

“克己复礼”源于《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颜回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具体如何去做？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表示：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显然，“克己复礼”是孔子要求人们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克己”就是战胜自我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合理、公理或天理；“为仁”是“克己复礼”的目的，使人的内心达到“仁”的完美的道德境界。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孔门传授的“切要之言”，是一种紧要的、切实的修养方法。宋代大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朱熹说：**“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复，譬如尘垢既去，则镜自明；瓦砾既扫，则室自清**。”又曰：**“克己复礼，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敬如治田灌溉，克己如去恶草。”**等等。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有云：**“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克己就是要灭己心中之**“贼”**。吊诡的是，毛左们在批林批孔中大声颂扬的**“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竟与孔子、朱熹、王阳明阐述的儒家思想，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复礼，”孔子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显然，孔子要“复”的“礼”是周礼。古代学者认为，《周礼》是自五帝以来的典制，是**“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是五帝至禹（夏禹）、汤（商汤）、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姬旦，周武王弟周成王叔）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孔子对黄帝、帝喾、颛顼、尧、舜五帝大同之世，极为推崇，称其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与一百多年前亦即19世纪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共产主义平等理想，几无二样。——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要复的礼，就是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之礼。

春秋之际，天下大乱。当是时，诸侯混战，攻伐不断，年年战火，处处硝烟，百姓涂炭，民不聊生，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子弑父，父杀子”时有发生。孔子对春秋诸侯之间杀伐的结论是：**“春秋无义战”**。究其原由，是周礼被破坏了，亦即他说的**“礼崩乐坏”**了。因此，孔子力主恢复西周的秩序。

对此，毛左集团在《林彪和孔孟之道》文中抨击道：**“春秋末年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又说：**“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因此，孔子要“从周”复周礼，就是复僻和倒退，毛要打倒孔子也就有了“充足理由”。

毛要打倒孔子的“充足理由”是建立在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上的。马列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五种社会形态前后更迭的历史。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其发展规律是后者取代前者。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简称为“五形规律说”），是苏共党魁斯大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五种社会发展说教，在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中定型下来的。这种哲学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硬教条，把丰富多彩的社会划归成五种形态，再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条条，“规定”了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亦即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必然性”，犹如他们说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一样。由于斯大林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定型”，就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因此，中国史学界上层精英们，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上，不得不按照“五形规律说”去编写中国古代史。但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分期问题没有具体指示，中国史学界就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对此，一位学者叹息道：“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接受过历史教学的人，都简单地接受了这一‘规律’，动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究竟某个时期属于什么阶段，历史学家们从来没有给过我们统一的‘指示’。”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禁锢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浪费了大量资源。

按照“五形规律说”来推断，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什么社会形态呢？在中国古代何时进入所谓封建（2）社会的问题上，在“一定的自由空间”里，史学家看法不尽一致。除夏代奴隶说、商周早期奴隶说外，还有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甚至还有魏晋封建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认为，秦朝以后，一直是君主集权制，君主们学着秦始皇的口吻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其治下的奴隶制，则一直延续到清代，买卖家奴就是证明。更有史者指出：“自秦后两千多年，使用奴婢、农奴的大地主庄园和小土地自耕农并存的生产方式，一直是中华诸帝国的生产方式，官方和民间的蓄奴生产方式在中国长盛不衰。”（行文到此，笔者提醒史学家们注意：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否再现了官奴制？）毛泽东呢？为了批孔，他力排众议，将西周钦定为奴隶社会，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则被他钦定为封建社会，尽管西周人民生活负担比春秋时代低得多。著名史学家、北大教授翦伯赞因持“西周封建说”，被斥为反马列主义史学家，文革

中被毛点名，遂遭残酷批斗。1968 年 12 月 18 日，处于绝望中的翦伯赞，与妻子一道服药，双双自杀身亡。于是，西周奴隶说、春秋封建说（或过渡说）便成了中共的正统学说，批孔的《林彪和孔孟之道》一文，就有了“科学”立论的根据！

死背马列毛教条的毛左们，根据斯的“规律”和毛的“钦定”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后一种社会形态比前一种社会形态优越、进步，因而后一种**“优”**的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种**“劣”**的社会形态，是“规律”之必然，任何怀古、复古都是倒退、复僻，都是历史的反动。于是，孔子用“克己复礼”抨击“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和力主恢复西周的秩序，就是复古，就是倒退，因而是历史的反动。

但这种用“五形规律说”所规定好了的**“前劣后优”**理论，并非像官方宣传马列哲学说得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1978 年，邓小平的中共用“猫论”（3）的“改革开放说”，推翻了**“优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恢复了**“恶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层建筑也做了调整——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仅可以入党，而且可以做官，可以在“官商一体”中大显身手。到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八个**共产党国家也发生了巨变，纷纷清算了马列主义，推翻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万恶”**的资本主义体制，同邓小平的“猫论”联合在一起，否定了“前劣后优”论，把“五形规律说”打了个颠倒。对此，有人写道：“正确的评判事物的优劣，应是依据该事物的性质，而不能依据该事物出现或产生的时间的先后。”

邓小平用“猫论”的复古、倒退，使中国取得了进步和成功，到 2010 年，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和东欧八国清算了马列主义和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后，也获得了新生和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多数国家进入到了发达国家行列。孔子用“克己复礼”批评“春秋无义战”和“礼崩乐坏”，力图恢复西周社会的繁荣昌盛，却没有那么幸运，迄今还遭许多人诋诟。为什么呢？为了永远执政，中共不愿放弃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他们利用权力，投入大量资源，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把他们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诡称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以继续愚弄民心。在这种充斥谎言的政治氛围里，孔孟之道的冤情，难以申张！

3、抨击董仲舒的三纲五常

古人没有崇洋媚外尊奉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的条件。在历经了十五年的秦始皇暴政后，汉武帝采纳了大臣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广为传播，成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主流思想之一，从而使毛说的**“百代多行秦政治”**的政治，至少成了跛足政治。从维护传统文明的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催生了“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思想，而短命的秦始皇暴政，却使“三纲五常”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然而，这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明的思想，却被毛左们贬为“复古”、“倒退”，成了毛泽东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的重点。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是孔孟思想的集粹，是儒家学说的精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发展而来。“纲”者，关键、表率也，其中主次、主从关系一目了然。在君臣、父子、夫妻的主次、主从关系中，要求为“次”为“从”的臣、子、妻，要**遵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为“纲”为“主”的君、父、夫，要“克己”，做臣、子、妻的**楷模**，使“主”“从”双方相互制约。“五常”——“仁、义、

礼、智、信”，则是孔孟思想的直接表述，是规范和制约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主次、主从关系的道德准则。

董仲舒把他的“三纲五常”说成是“天道”、“天理”是有道理的。因为“三纲”确定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主次、主从关系，是至今未变的客观现实。

应当肯定，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主次、主从关系，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质的变化。面对这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三纲”在制约“主”方“从”方的同时，用“五常”来规范和制约这种不平等关系，使**君臣相义、父子相亲、夫妻相爱**，从而使不平等关系趋向平等。

对于“五常”，古人云：**“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又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据此，“五常”按孔孟之道的思想，用现代语言可以表述为：

仁者忠恕——以人为本，修养人性，笃行人间相亲；
义者守道——公平正大，抑强扶弱，维护人权善行；
礼者敬德——恭谨宽厚，倡导文明，遵奉人世伦常；
智者明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探究人生价值；
信者笃厚——忠于职守，诚实践约，恪守人际真情。

“仁义礼智信”者，善也，人性之属也。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来观察华夏文明时，无论是在和平环境或在动乱年代，“三纲五常”在尊重人权、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功不可没！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在君主集权主义的统治者那里，“三纲五常”往往被曲解、歪释。

显然，“三纲五常”远比胡锦涛设计的以中共党国利益为基础、以“维稳”为出发点的“八荣八耻”（4），具有更普遍、更公正、更人性、更文明，是古代自由主义的体现，因而是一种更加深入人心的、能与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文明融合的**崇高思想**。这种思想，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权之宗，和谐之源，强国之本，尽管没有党、国二字。但遗憾的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利益考量，“三纲五常”没有纳入法制范畴，只能在道德层面上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遇到暴君，遇到专政或一党天下，便失去意义。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特别是毛泽东批孔颂秦以来，“三纲五常”再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毛左们批判“三纲五常”**是封建统治者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是确立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的镣铐**，因而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等等。

“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的思想，一定是反动思想吗？否！任何一种正确思想和科学发现，在不同的统治者手里，都会制造出不同的结果：

核能可以造福人类，亦可毁灭人类；
战争可以争取和平，亦可制造混乱和强化独裁；

资本主义可以提高生产，增加财富，亦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能使财富平均化，亦可使全国人民丧失自由而共同贫困化……

同理，“三纲五常”既可以成为规范统治者统治行为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被统治者曲释，变成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君主集权主义体制下，统治者既是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又是监督者、裁判者，没有也不许有独立的、有效的制衡机制。因此，在古代君主集权主义者那里，“三纲五常”被他们曲解、歪释，使主次特别是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倾斜，甚至使其极端化：**“遵从”作用被放大，“楷模”作用被弱化，制衡主次、主从关系的“五常”道德标准，成了“主”方（官方）节制“从”方（民方）的政治手段，**甚至用男尊女卑的“三从四德”枷锁，来限制妇女的自由，等等。显然，他们抛弃“三纲”中主次关系中的关键部分，亦即“主”方做表率、应承担起更重的道德责任和更多的社会义务部分，换言之，即抛弃了“三纲五常”中的自由主义内蕴，变成了“从”方绝对服从“主”方的精神枷锁，从而使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倾斜或极端化。

吊诡的是，激烈批判“三纲五常”的毛泽东和中共，却是“三纲”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的维护者。

“解放”后，毛共反复强调“**人民当家做主**”，甚至鼓吹“**造反有理**”，但中共党章“**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规定的“君臣”主从关系，并没有因“造反有理”有任何变化；老百姓在“**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和“**无限忠于毛主席**”等训导中，成了“**党妈妈**”的子民，没有因“人民当家做主”而改变了“君民”或“母子”的主从关系。（直到2012年的7月26日，中共《解放军报》还在鼓噪“党叫干啥就干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显然，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在批判“三纲”中维护“君臣”、“君民”主从关系最极端、最虚伪的表现！

在“新中国”，子承父业、袭父产，孝父敬母等“父子”主从关系，也未因在“**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唱红”声中有所改变。在美国，“父子”间的主从关系也没受中国批孔的影响。当选了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在其父亲老布什面前，仍被人屈称为“小布什”。尽管毛共抨击“父子”主从关系是孔孟流毒，但在毛共制定的阶级路线中，“父子”的主从关系是明确的：干部子弟大都能享受父辈的荫庇，处境优越，是当然的接班组群，而“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子女，不得不依从父的阶级成份，成了当然的“准阶级敌人”，学习成绩好的也被拒之于大学校院门外。“**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能在中国横行，对联的批评者**遇罗克**被中共“依法”枪决，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在批判“三纲”中维护“父子”主从关系最极端、最野蛮的表演！

在现代世界里，夫主外、妻主内的夫唱妇随极为普遍，甚至妻随夫姓也屡见不鲜。尽管毛泽东高唱“**男女平等**”，并将两个女儿改从江青的“李”姓（另说：姓“李”是因随毛泽东的曾用名“李得胜”之故），但“夫妻”间的主从关系并没因而改变。甚至在毛的家庭里，江青的从属地位是十分明确：她的权利就是服从毛。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共在批判“三纲”中维护“夫妻”主从关系最极端、最伪善的表白！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的家庭里，江青是个受害者。她是个争强好胜、个性张扬的女人，但她的自由天性被长期约束在服从中，得不到伸张，从而使她的人格走向分裂：一方面在毛面前，她惟命是从，自甘菲薄，甚至在毛的纵欲面前，委屈忍让，不敢声张；另一方面，在

他人面前，她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恣意宣泄。江青的人格分裂，在成全了毛泽东的同时，却使她自己跌入罪有应得的替罪羊的羊群之中！

显然，毛泽东和中共把“三纲”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的思想，与“三纲五常”中主次、主从相互制约的思想南辕北辙，截然相反。

事实确乎如此。如今，现代中央集权主义者继承了古代君主集权主义者的衣钵，在任意曲解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曾被推崇为“毛泽东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等。在老百姓享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上，“毛泽东宪法”可以与民主国家的自由宪法媲美。但在没有独立的、有效的制衡机制的一党专政下，中央集权主义者学着君主集权主义者任意曲解“三纲五常”那样，毫无顾忌地任意“释法”，使“君民”主次特别是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国家领导人被指定，地方各级领导人被上级任命，自由结社被“释”为非法，批评官员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居住和迁徙自由被一纸户口锁定，以及买官、卖官等官本思想泛滥成灾，**等等，《宪法》中规定的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像古代帝王玩弄“三纲五常”那样，成了中共橱窗里的摆设。遗憾的是，君主集权主义者对“三纲五常”曲解和主次特别是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的愚弄，被“打倒孔家店”激进的前辈们错读，讥讽“仁义道德”为**“吃人”**，而中央集权主义者亦即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者，则将其责任栽赃到孔孟身上，称其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辱骂其为**“男盗女娼”**。因此，许多正直的史家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孟之道，是二十世纪共产党制造的最大冤案！

尽管有人认为，“三纲五常”无法节制皇权，有人说向专制独裁者游说“孔孟仁政”等于与虎谋皮，但笔者仍然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如果没有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引进马列主义，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释道文化，会自然而然地从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法律范畴，与“德赛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融合在一起，造福于中华民族。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不容否定的是，今日民主和科学发达之**港、澳、台**和**新加坡**，正是儒释道文化与“德赛先生”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孔孟冤案还在继续。据报导，2011 年 1 月 11 日上午，中国有识之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孔子塑像落成仪式，9.5 米高的孔子塑像竖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可是到了 4 月 20 日深夜，中国伟大思想家孔子塑像竟被撤走！——一竖一撤，仅存 100 天的文明被腰斩了。原来，竖立孔子塑像遭到了毛左们的肆意攻击，诟称**“今天搞的这个‘百日复古’，其性质完全是反动之举，是历史倒退！”**文明被诋毁为复古、倒退，可见，毛泽东的阴魂不散，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还在肆虐中华。**笔者呼吁：**

中国人要清醒起来，现在已经到正本清源还孔孟之道以清白的时候了！

附 1、文王

周公旦辅佐文王孙、武王子成王，把武王统一中国后的周朝疆土，分封了 800 多个诸侯国，或曰附属国、仆从国，而非文王。

附 2、封建说

“封建”一词本义是“封诸侯、建藩卫”，即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是西周的政治体制。但自马列传入中国后，“封建”一词已脱离了原来古代的蕴涵而被赋予了新义。对此，有学者称其为“概念错位”。在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里，封建主义成了代表地主阶级的君主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代名词，而且妇孺皆知。根据“约定俗成”语法规则，本书“封建”一词暂从“俗成”。

附 3、“猫论”

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比喻只要能增加粮食生产，不管他姓资（资本主义）或姓社（社会主义）。

附 4、“八荣八耻”

2006 年 3 月 4 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他提出的荣辱观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70-毛泽东的马列加秦始皇主义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是颠覆华夏文明——拒绝孔孟仁政，实行秦始皇暴政，为文革虐杀辩护，欲当现代秦始皇！此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从“**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马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蜕变为**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加秦始皇主义，或曰**马列毛主义**。——这是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的登峰造极！

1、什么是秦始皇

秦始皇名**政**，姓者有三：袭秦祚为**嬴**，承父支曰**赵**，依血统姓**吕**，13 岁立为秦王，38 岁自称秦始皇，50 岁病死，是中国古代暴虐无比的皇帝。史书《纲鉴》曰：“**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后不久，秦始皇下令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此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把用刀把子兼并出来的政权，据为己有，得意忘形地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他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即设守**（郡守）、**尉**（郡丞，佐守者）、**监**（御史，监督守者）”，以强化中央君王集权。他嫌恶儒家，崇尚法家，因法家讲究“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为维护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武力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任命法家李斯为丞相，实行法家冷峻严酷苛政。他在位统治中国的十二年间，杀戮成

性，穷奢极欲，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而民怨沸腾；他死后两年多，奴隶们便起来造反，把秦朝送了终，使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之一！

史书记载，秦始皇杀戮成性：

前 238 年，嬴政二十二岁亲政后，先拿“假父”嫪毐开刀。嫪毐者假太监也。昔日，太后赵姬与文信侯吕不韦私通，吕缠不过太后，怕事情败露，遂派舍人嫪毐冒充太监去“侍奉”太后。不年，太后秘生两子，隐情败露。**政**闻言大怒，率兵剿灭嫪党：“斩首数百”，车裂嫪毐，“夷三族”，20 多个党羽就戮，4,000 余人被流放；其母赵姬被囚，两个同母异父弟被政装入袋中摔死，27 个力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真父”吕不韦被赐饮鸩自尽。

前 228 年，在秦军攻下邯郸后，**政**下令“**与母家有仇者皆杀之**”，遂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嬴政少年时期，曾随父母在赵国邯郸当人质。

前 221 年，齐王建降秦后，**政**推翻了封齐王建领地的承诺，将其驱赶到共地（今河南辉县）林中，“**处之松柏之间**”，全部饿死！

前 218 年，因张良刺政未遂，**始皇**大怒，下令全国“**大索十日**”，多人罹难。

前 212 年，**始皇**“望见丞相车骑众”，不悦，恶之。有人告之丞相，丞相车骑骤减。始皇疑身旁有泄密者，推劾无得，遂将“**在旁者尽杀之**”。

同年，**始皇**采纳丞相李斯廷议，**焚书坑儒**。据史家考证，先后坑杀了 1 千多儒生，其中一次杀了 460 多人，另一次杀了约 700。

前 211 年，有一颗流星落到东郡（今河南濮阳县），有人在陨石上刻字曰：“**始皇死土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未果，遂下令诛杀陨石周围全部居民。

前 210 年，**始皇**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钜鹿县南）。丞相李斯与宦官赵高合谋，矫诏废太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秦二世**效法始皇**，杀太子扶苏、将军蒙恬等，并将自己的兄弟和堂兄弟 18 人斩首，10 个姊妹车裂而死，其它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不久，前 208 年，二世腰斩丞相李斯于咸阳，斯父、母、妻“**三族皆伏诛**”。

史书记载，秦始皇穷奢极欲：

据史家考证，秦朝人口约 2,000 万余，其中壮劳力约 600 万，全国设郡 36 个，“县政”约 1,000 个，平均每县 2 万人。秦始皇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在全国广修宫殿，宫殿数量号称“**关外三百，关内四百**”，尤其是**阿房宫**，占地几里，能容万人。

《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 70 余万人**”。这就是说:他在统一之前就开始了骊山**秦始皇墓**的工程,征用民工 7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3.5%,壮劳力的 12%。

前 221 年，始皇下令“**徙天下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以重建琅琊台，建筑关外规模最大的琅琊台行宫。

前 219 年，始皇南巡至湘山祠（今湖南省岳阳县西南），遇大风，“**大怒，使刑徒**（受刑罪犯）**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草木伐光）**其山**”。

同年，为求长生不老药，始皇“**遣市**（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徐率数千童男童女的庞大船队，东渡日本(另一说是墨西哥)，一去不复返。

前 215 年，始皇听信“**亡秦者胡也**”的谣言，不疑“胡亥”，却罪匈奴，“**乃使蒙恬发兵 30 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次年发民夫 50 万人修长城，约占总人口的 2.5%，壮劳力的 8%以上。

前 214 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皆为奴隶）、**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

南海，以谪遣戍。”集解：徐广曰：**“50 万人守五岭”**。就是说，秦始皇用 50 万奴隶当军人，征服了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并派兵留守驻防。

前 212 年，修绵延 300 里的阿房宫，**“役使隐宫**（宫刑者）、**徒刑者 70 余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3.5%，壮劳力的 12%。另外，修驰道征民夫 30 余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1.5%，壮劳力的 5%。

南怀瑾在《孟子旁通》一书中写道：（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阿房宫占地方圆三百多里，高到看起来快接近天日了。从北面的骊山一直南下，转向西边和咸阳连接起来。把渭川和樊川两条河川的水，也引导流进了阿房宫，造成了宫里的人工河流湖沼。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华丽精巧，形式多样，这样的宫室，像蜂室那样多。在水上架的长桥像卧在滚滚浪涛上的蛟龙一样。凌空搭的复道，从宫殿下面蜿蜒通到南山脚下，五色缤纷，有如挂在天上的彩虹。在这众多宫室中，几乎每一间房子，每天都可享受四季的不同气温和风韵。

“秦始皇又把没收来的六国财宝、美女，全部集中到阿房宫里。把夺来的鼎，当作煮饭烧菜的锅用，把玉石当石头用。他的妃子上万，早晨，宫女们打开的梳妆镜子，有如夜空中的繁星；飘拂的长发，有如乌黑的浮云。渭河河水，每天早晨要上涨，浮现一层粉红的颜色，那是阿房宫里宫女们泼到河里的洗除脸上的胭脂水；半山腰袅袅上升的云雾，那是阿房宫里宫女们焚烧贵重香料所形成的烟雾。秦始皇这位千古暴君，就在这个阿房宫里，朝歌夜宴地享乐帝王的一切。”

史书记载，秦始皇生灵涂炭：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所算的一笔帐：农夫一家 5 口，耕田 100 亩，平均每亩收粮 1.5 石（音：dàn），共收 150 石（秦汉时每石为 27 斤）；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税 15 石，余 135 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粮 1.5 石，全家共吃 90 石，余 45 石；每石卖钱 30 文，共得钱 1350 文；除去祭祀、庙会用钱 300 文，余钱 1050 文，每人穿衣用钱 300 文，全家共用 1500 文，还差 450 文；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而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呢？据专家们考证，秦朝的人民生活负担比战国初期高出 10 倍，比西周高出 20 倍。史书有两句话可证：秦朝人民**“服囚犯之衣，食犬彘**（猪）**之食**。”

从 1975 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的十二座秦墓的竹简中可知，秦国的**赋税比**战国时的其他六国重得多。农民除了缴纳田租外，还有军赋等其他名目，如赀甲、赀盾（加工铠甲、盾牌）一类变相军赋。田租不但要收取禾稼(粮食)，还要收取刍(牧草)、稿(禾杆)。至于劳役，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如所谓“傅”制度，即男子到一定年龄就须向官府登记服役，秦国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农民除了服劳役外，还要服兵役，并且要自备行装及费用。据史家考证，秦二世胡亥统治时，赋税超过农民收入的 2/3。

记述秦代奴隶买卖较具体的材料是云梦秦墓所出共 166 简的《日书》:“收日**可以入**（买）**人民、马牛、禾粟。**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牲**。”“**毋以**午（时）**出入**（卖买）**臣妾、马牛，是**谓并亡。”等等。这是《日书》记载的秦国在买卖奴隶时要遵守日子、时辰上的规定，其中“人民”系指奴隶，“臣妾”是秦时人对奴隶最常用的称谓。据史家考证，秦始皇年代，买卖奴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近几十年由于秦简出土，史家对**秦的奴隶制**有了新的认识，如奴隶在当时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仅是残余而已。

史书记载，秦始皇时代民不聊生：

前 221 年，始皇下令没收并销毁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于咸阳，以防暴乱，又迁各地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以便监控。

前 212 年，为修阿房宫等三百宫殿，**“因徙三万家骊邑**（今陕西临潼县），**五万家云阳**（今陕西三原县西）。”做劳役。

据专家们考证，秦始皇执政期间，无偿的奴隶式兵役和劳役的老百姓共 270 多万人，为兵役、劳役大军运送粮草和装备的民夫以及在内地驻防的军人、夫役，估计还有 250 万人，两项相加约有 520 多万人（占总人口的 26%）。《汉书.严安传》记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吊死）**于道树，死者相望**”。

秦始皇和秦二世暴虐、苛政和腐败，引发陈胜、吴广大起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宗庙毁）”——前 209 年，执政才 15 年的秦朝，民夫陈涉振臂一呼，旋被推翻。

自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秦朝，为什么短短十五年就灭亡了呢？历代史评、政论家，莫不众口一词地说：**“秦之速亡，亡于暴政**。”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汉书》等书，都讲秦始皇修长城、起阿房，醉心于领土扩张，无限制地赋役征求，等等，使民穷财尽，民怨沸腾。但两千多年后的 CCTV，竟借专家、教授之口，把秦始皇打扮成**“明君”**，一些作家、导演们，也紧紧跟上，生生地把千古暴君塑造成**“仁君”**。显然，这些专家、教授、作家和导演，不是毛泽东的跟屁虫，便是惟“主旋律”是从的御用精英。

2、毛泽东颂扬秦始皇

毛泽东业已认定，秦始皇思想与马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融相通。因此，他在狠批主张实行仁政的孔子的同时，多次明言要替杀人如麻、生灵涂炭的暴君秦始皇翻案，赞扬暴虐有理，显现他为当现代秦始皇的狂想已经歇斯底里化。据报导：

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有人指责毛泽东是“秦始皇”，毛对答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1958 年 8 月 19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规定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去领导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近臣、亲信和一些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毫不掩饰地褒秦贬孔，厚法薄儒。他说：

“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孔孟是唯心主义，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

“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只说空话”**的**“男盗女娼”**者，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主张法治”**和中央**“集权制”**的伟大政治家，因此，他要当**“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现代秦始皇。作为捭阖纵横的政治家，毛十分清楚，要把暴君说成明君，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是个制造舆论的能手，在批林批孔中，他找到了几条为秦始皇评功摆好的理由，借以说服、教育中国人。

毛泽东为秦始皇评功摆好理由之一是：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伟大政治家。

可惜这条理由缺乏根据，如果有根据，也是真假搀和。没有人否认，是秦始皇用武力结束了战国争雄局面，统一了中国；但不是“第一个”。在秦之前，统一中国的是周王，甚至可向上推之商、夏。周成王和周公旦，将统一的中国分封了 800 多个诸候国。又据史书记载：约公元前 900 年，西周孝王封秦始皇的祖先养马能手嬴非子于秦邑（今甘肃省清水县东北），始建秦国。大周的分封制很像今日欧洲。不同的是，800 多个小“国”都尊奉一个中央政府——周王，而且持续了 842 年。尽管其间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割据局面，但尊奉周王为中央未变。那时“度量衡”虽未统一，但文字、语言基本相同，否则历史上不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也不会有“连横”、“合纵”等说客政治家的活动舞台，更不会有孔子周游列国的文明史实。

毛泽东赞扬秦大一统的目的，不过是要人们赞扬他是现代中国大一统的“伟大政治家”而已。善于紧跟“伟大领袖”的精英们，数十年如一日地撰文说毛是统一中国的英雄，是洗雪百年被列强侵略羞耻的功臣，甚至说他“功劳盖世”。然而，查一查现代史，精英们的说辞同毛说秦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功臣一样，不是缺乏根据，便是真假搀和的谎言。中国人并不都是芸芸蠢生。他们不会忘记，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古国，即是在近代满清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中国也是由儒释道文明凝聚在一起的大一统国家。辛亥革命后，中国虽历经了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和八年抗战，国力衰微，但除被苏军武力占领后强行“独立”的外蒙古外，中国仍是一个大而统一的国家。儒释道文明的凝聚力在于，即是在国力衰微的清末混乱、辛亥后军阀混战年代和八年抗战时期，没有出现分裂，也没有出现过今日危及统一的活耀非常的藏独、疆独、台独势力。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一洗百年耻辱，同英、苏、美、法并列站在一起，成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毛泽东的共产党中国，不过是继承了国民党中国的遗产而已，而继承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则是在共产党中国成立二十二年之后的 1971 年 10 月 25 日。如果说毛有什么“功劳”的话，就是他击败了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个更加专制、更加腐败的共产党政权，达到了改朝换代的目的。看一看半个世纪以来大陆与台湾的巨大差距，看一看“殖民地”香港和澳门的发展和繁荣，上层精英们对毛泽东“功劳盖世”的歌颂，是多么可笑，又是多么可鄙！

毛泽东为秦始皇评功摆好的第二个理由是：秦始皇实行君主集权的郡县体制。

封建制与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社会里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都有其优势和弊端，有时并行而不悖。

在周代，以封建制为主，即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实行中央、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那时的分封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分封的诸侯不仅拥有封地，王位还可以世袭。周的中央与诸侯国的上下级关系，是以“礼乐”和自我约束来维系的。但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当“礼

崩乐坏”时，拥有相对独立的各诸侯国，便会发展成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使国家处于分裂之中。春秋和战国的出现，应当看做是封建制的悲剧。但如果当时有有效的监督机制，这种大周一统、诸侯国自治的共存政治局面，在继往开来中发展到现代，今日中国，也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完全统一的和各省、市、县高度自治的大中华联邦共和国。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采纳法家李斯的意见，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由于各郡县长官都有秦始皇亲自任命，而且只有年俸，没有封地，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君主权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割据和分裂势力的形成。但郡县制不仅缺乏竞争活力，禁锢各地的发展，而且它既不能消除割据，也不能防止分裂，秦始皇政权只存在了十五年便被推翻，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3、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体制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体制，只有相对比较好、比较差和比较坏的体制。封建制和郡县制**各有其弊端**。

对于秦朝的短命，历代学者有不尽相同的解读。汉初贾谊认为，强大的秦朝速亡于**暴政**。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中说：秦王朝的速亡“**失在于政**（苛政），**不在于制**（郡县制）。”显然，柳把“政”与“制”割裂开来，认为强大的秦朝速亡于暴政，而非郡县体制本身。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则认为两种政体各有弊端。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但在各打五十板中，他仅说出“失”之于“专”，而对“专”缺乏认识。对于“专”，无论是“下专”的封建制，或是“上专”的郡县制，都是为帝王服务的，不值得我们去赞美，更不能效法。因为“专”必独裁，独裁必腐败，腐败必内乱，内乱必镇压，镇压必引发内战与外患，而内战、外患的结果，不是统一，便是分裂——**封建制与郡县制殊途同归**。

翻开历史看看，不是这样么？西周分封了 800 多个诸侯国，三百多年后，因“专”而内讧、而兼并，到了东周，发展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前后五百多年。郡县制呢？据统计，自秦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处于分裂状态约 680 多年，如果加上改朝换代中的混战以及国内藩镇割据、类似太平天国的内乱，等等，分裂约在千年以上。因此，由于“专”亦即由于专权与独裁，封建制可导致分裂，郡县制也不能防止分裂。

吊诡的是，在东周封建分权的五百多年里，却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生产力空前提高，如冶铁技术和指南针的发明等等；而在郡县制的君主专权下，生产力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中央政权在外族入侵时，几乎不堪一击，如宋灭之于蒙，明毁之于满，清败之于列强。尽管间或出现过繁荣，如贞观、康乾之治，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这种君主专权下的“圣世”，不过昙花一现而已。由此可见，封建分权或可繁荣文化、科技，提高生产力，郡县制的君主或中央集权，一定阻滞文化、科技、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在抨击孔子要恢复西周的封建礼制，即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实行中央、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的同时，以“**百代多行秦政治**”来告诫中国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强化统一，上下分权的封建制势必分裂。他要中国人承认，他的中央集权制的一党专政，是继承“百代”

最合理的政治体制。

同古代帝王一样，毛泽东赞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对专权、独裁情有独钟。如果古代帝王钟情于郡县制是出于传位于子孙的家族之私，那么，毛泽东赞美郡县制是出于共产党一党独大、永远执政之私，两者没有质的区别。遗憾的是，至今还有那么一批学者，热衷于宣传郡县制能防止分裂的大一统一面，却对毛共的中央集权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恶端——扼杀民主、自由和阻滞发展、生灵涂炭的一面，视而不见！

4、毛颂秦的目的

毛泽东替秦始皇评功摆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马列加秦始皇主义**正名，亦即在赞颂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同时，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现代秦始皇评功摆好。

当我们把毛泽东与秦始皇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因而酷爱谎言的毛泽东来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不是谎言，而是记录在案的史实。

秦始皇杀戮成性，毛泽东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翻开“解放”后的历史看看，在他当权的二十七年间，枪杀、打死、虐死或自杀等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 800～1,500 万之间。其中被曝光的有：镇反中枪杀 100 多万人，自杀不计其数；土改中杀 100～150 万人，其中 20～30 万人自杀；“一化三改造”中打死、自杀 30～50 万人；肃反审查 400 多万人，非正常死亡 10 多万；反右致家破人亡者达 10 多万人；“四清”中自杀 4 万多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 200 多万。那么，未曝光的知多少？历年为数不清的“严打”又杀了多少？只有等档案解密、允许独立调查时，由历史工作者去了结。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枪杀的 100 多万人中，毛泽东承认杀了 46,000 个知识分子，是秦始皇一次坑儒 460 人的 100 倍。除此而外，由于数据不清，在杀戮成性上，笔者很难说毛泽东超过秦始皇 100 倍，只能说毛比赢政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始皇穷奢极欲，毛泽东则“穷”、“极”得多！

被曝光的行宫滴水洞，修建于饿殍遍野的“三年人祸”时期，花了一个多亿，可以供 60 万人吃一年。据传，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计有 30 多处。到底有多少处？花了多少钱？此属“国家机密”，无人敢打听。此外，为了争当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毛在位的六、七十年代，每年外援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保持在 5～7%之间。其中，支援越南抗美 200 多亿美元，支援阿尔巴尼亚反苏 90 多亿元，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打内战 10 多亿元，修坦赞铁路花掉 20 多亿元——这些都是被曝了光的。那些没有曝光的呢？例如，支援朝鲜多少个亿？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意大利红色旅和日本赤卫军等外国造反组织多少个亿？在批判刘、邓的“三和一少”后又增加外援多少个亿？据说，南美洲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北京领了 50 万美元革命经费回国后，不知去向——这些都属“国家机密”，也无人敢打听。

总之，秦始皇“欲”的是帝王宫殿和皇家陵墓，“奢”于百姓和官奴的劳役，毛泽东“欲”

的是行宫和当世界人民的导师和领袖，“奢”于慷国家之慨，花老百姓的血汗钱。相比而言，毛泽东的“奢”和“欲”，比秦始皇“奢”得高明，“欲”得有“理”，因而要“穷”、“极”得多！

秦始皇生灵涂炭，毛泽东的农民在“瓜菜代”中度日。

据报导，甘肃洮河引水上山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工程。工程规模很大，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多万民工，从 1958 年一直干到 1961 年。结果，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而饿死、累死、打死和致伤、致残的民工成千上万。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体制，仅在 1959～1961 年间，饿死了 3,000～4,500 万人。在其后十多年里，数亿农民，不得不在“瓜菜代”和“离了红薯不得活”中，艰难度日。相比之下，除城市居民还算幸运外，毛泽东的农民，不比秦的“**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好过多少！

秦始皇时代民不聊生，毛泽东则使民处于红色恐怖中！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七年间，接二连三地发动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反彭、民主补课和“四清”等批、斗、杀运动，平均每 14.5 个月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到毛死的十年间，又接二连三地发动了打倒“彭罗陆杨”、“横扫”、破“四旧”、夺权、武斗、“清队”、“一打三反”、抓“五一六”，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投降、批右倾翻案风等系列批、斗、杀运动，平均每 10 个月搞一次。由于每次运动持续时间长短不一，长的长达数年，短则短到数月，因此，运动与运动之间多无时间间隔，许多运动相互重叠在一起。**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间，共搞了二十七次批、斗、驱、杀的政治运动，造成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因冤假错案死亡上百万，伤残上千万、株连上亿万。**在毛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几乎每年都要搞几次“公审公判”式的“严打”，枪杀异己者以杀一儆百，使绝大数中国人都生活在红色恐怖中。在红色恐怖中，自由被扼杀，生产积极性遭重挫，从而使国民经济在“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歌声中，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毛的法西斯暴政，却被当今中共轻描淡写成“胡折腾”，是可笑？还是可恶？显然，毛泽东比赢政更残暴、更酷虐！

由此可见，毛泽东诋毁孔孟倡导的仁政，赞美秦始皇，是为他的“**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暴政进行辩护，借以美化他的**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从而证明马列无产阶级专政的暴虐“合情、合理、合法”——这也是许多中国人暂时无法理解的。

71-送终周公

作者 于松然

1、无疾而终

自从 1974 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全国上下所有广播和报刊，几乎口径一致地评法批儒：在批判孔孟之道的“**克己复礼**”、“**三纲五常**”、“**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和子虚乌有的孔子杀改革派少正卯等反动罪行的同时，对法家及其代表人物**秦始皇**大加赞扬。一贯以“厚今薄古”自居的毛泽东，并不讳言他“评法批儒”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为打倒政治对手所做的舆论准备。

当历史把周恩来推上第二把手的高位后，毛泽东心中老大不快。善于打扮历史的毛泽东，决定用权力改变历史。他十分清楚，周恩来是反孔的，他搞的批“克己复礼”、“三纲五常”甚至“评法批儒”，周都不沾边；但他是“**影射学**”专家，善于“指桑骂槐”。由于孔子的“吾从周”的“周”和孔子推崇周公姬旦的“周”，与周恩来的姓氏不期而合，这就为毛、江集团提供了“影”弹。他几乎明白无误地告诉芸芸众生：林、孔是“**桑**”，周是“**槐**”，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批的就是你“周公”周恩来。

6 月初，毛泽东认为，舆论准备形势已经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他的“**罗织学**”也派上了用场。何为“罗织学”？“罗织学”者虚构罪名也。其中，“张冠李戴”是“罗织学”的重要手段：在一党专政下，给你李姓戴上个“**张**”冠，你就甭想再姓你的那个“**李**”。于是，他把他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当打周“炮弹”，全部拿出来重新修改印刷。那九篇文章主要是抨击与毛对立的莫斯科派王明、博古和周恩来的。其中有两篇指斥周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教条主义的“**帮凶**”。在整风中，周的“经验宗派”又被指责为“**再来统治党**”的“**最危险的人物**”，等等。显然，他要用“亲苏”这个陈谷子烂芝麻来罗织“最危险的人物”的罪名，以期扳倒周恩来。江青接到扳倒周的“密旨”后，紧紧配合。6 月 14 日，她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她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借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尽管周姓“**马列**”而非姓“**儒**”。于是，新一轮“评法批儒”狂浪，腾涌而至。

然而，到了 7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却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突然批评起江青来：“**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当众宣布，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他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他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帮小宗派呢。**”使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请愿地又为他当了一次“屁股”。到了 10 月 20 日，毛泽东又发指示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

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毛在搞左右平衡，即在老干部与文革派之间搞平衡。权力平衡是政治家们控制政局的寻常手段，毛也不例外。因此，不能排除批江搞平衡。但毛在一个半月中，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则更像是毛、周角力的结果。

林彪摔死后，坚持“三不要主义”的周恩来，紧握手中的权力，首先借毛要解放干部的指示精神，解放了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将领，赢得了党内外右派的一片支持，从而成了他们拥戴的靠山；接着，他又借毛曾经的“批极左”讲话，大抓以造反起家的“五一六”分子并加以严惩，狠批文革派的极左思潮，让在前几年“造反”、“夺权”中备受折磨的右

派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同时，他又借毛的“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积极抓国民经济建设，到 1973 年，国民经济已全面好转，中止了文革以来不断下滑趋势，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许。这一切表明，“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开始走上了他匡正毛弊、拯救中共的务实路线。但天才的毛泽东很快警觉起来。他发现，周的务实路线与他的“继续革命”狂想尖锐对立。当他得知没有军职的周与叶剑英元帅联手，一举解放了 157 个高级将领后，他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与军方有很深渊源的周恩来，已经回到军中，并已插手军委领导工作。本来对周没有好感的毛泽东，决定在周、叶尚未形成联盟之前扳倒周恩来：在批周**“反极左”**、骂周**“放屁一通”**和批周**“投降”**后，又发动了倒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六月初，他对运动形势做出了判断：批孔赞秦警告周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他**的现代秦始皇形象已经树立了起来。正当他拿出九篇文章来一举扳倒周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 月 18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其中，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 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 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 3.7%。显然，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的势头，已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止，并又开始大幅度下滑。面对国民经济下滑局面，联想到去年批周后那同情、谴责的两股地下冷风，使毛又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今日的周恩来，已是集党、政、军、民威望于一身的强劲对手，绝非昔日的刘少奇、林彪等辈可比。在对敌斗争中，一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毛泽东，斟酌再三后，决定再放周一马。他对他的表侄孙女王海容小姐说：**“周不是不能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于是，7 日 17 日，便出现了批江的平衡术，历经半年多的风驰全国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也随之无疾而终**。对此，文革专家高文谦写道：“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老谋深算的周恩来，十分清楚“太极软功”的丰硕成果。不想“走”的他，借“组阁”之机，极力设法阻止极左派的人掌握实权。他对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说：**“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极左派)**手里**。”12 月 26 日，他不顾病痛，带着医疗组和抢救器械，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组阁”情况。经反复讨价还价后，毛一槌敲定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现在回头看去，那届人事安排，是个左、中、右基本平衡的产物，也可以看做是毛、周妥协的结果。对于右派来说，能与极左派平起平坐，就算取得了胜利。这当然要归功于他们的领头人周恩来。

2、毛的杀手锏

尽管毛、周角力使毛不得不“再放周一马”，但不等于说，毛在扳倒周问题上已无牌可打。毛扳倒周的王牌是周的膀胱癌。

1972 年 5 月，当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以内部制定的医疗管理规定，下达了“不准手术”和“保密”的指示，使周的膀胱癌错过了最佳手术机会。直到两年后的 5 月，周才被“恩准”住院治疗。1974 年 6 月 1 日，周恩来住院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术后不久，病情复发，8 月 10 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此后，手术不断。据报导，自第一次手术起到去世为止，周恩来做大手术四次，小手术达九次之多，平均每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到此，毛泽东终于放下心来：他最难缠的对手周恩来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当然，他已用不着再担心，他死后周能自然接班。

遗憾的是，迄今仍有学者认为，**“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更有甚者，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仁慈”的领袖，不会对昔日的战友、同事无情，更不会“心狠手辣”！

毛泽东是否有“恶意”？是否“心狠手辣”？笔者选编了一些资料，供读者自我判断。

毛泽东是否有“恶意”？据报导：

1972 年 5 月 18 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医疗组医生们立即报告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接到报告后，毛泽东以内部制定的医疗管理规定，否决了医疗组的报告：下令**“不开刀”**和**“保密”**，并要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王洪文、张春桥、叶剑英、汪东兴去贯彻执行。其中“保密”是不准将实际病情告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此，医疗组很不理解。他们拒理力争，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但汪东兴答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他要求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医疗组又提出对周的身体做进一步检查，汪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忽觉话无情义，随补充一句：**“不要慌么**。”

九个月后 1973 年 2 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但没有修改“不开刀”的指令。医生们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分癌细胞。

发现癌症两年后的 1974 年 5 月，周恩来的癌细胞开始扩散。9 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周的病情严重，敦促中央批准周尽快住院动手术。对此，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说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按统一的口径说，张春桥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显然，这是**“医疗为政治服务”**赤文化在医疗制度上的体现。面对膀胱癌，做为这种医疗制度的制定者之一的周恩来，只好听天有命——一切听任毛安排。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邓颖超只好拜托周医疗组里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化验员小李，带着医疗组的诊断报告，绕过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各个领导的审查，径直向毛泽东解释周尿血的严重程度。邓这一招果然高明，毛泽东见过小李后，终于批准了给周做手术的诊断报告。

1974 年 6 月 1 日，周恩来在 305 医院接受了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不幸的是，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不久病情复发。两个月后的 8 月 10 日，周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闻讯后，自鸣得意地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乎哀哉不止**。”事实果然被他言中：以后又接二连三地做了十一次手术，直做到周死。

毛泽东是否“仁慈”呢？看一看他昔日战友和同事**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下场，再看一看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间所发动的二十七次政治运动（1）以及运动造成的五千多万个冤魂怨魄（另说：毛共已杀害 6,378.4 万人），以及再看一看在 1978～1980 年三年间，中共中央平反了 300 多万件冤假错案的严酷现实，你能找到他“仁慈”的根据吗？

3、再批周投降

也许嫌周恩来“走”得太慢，1975 年 8 月，毛泽东借评《水浒》又给周来了个最后的

一击。是年，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抨击宋江驾空晁盖，篡山夺权，后又接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等等。《水浒》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宋江和108条好汉是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如果按毛氏反对“封建制”的逻辑，占山为王的宋江和他的前任晁盖，都是搞国家分裂，“理”应受到谴责，而不论这种分裂是否正义；与此相反，如果按毛氏赞扬“郡县制”的逻辑，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回归统一，“理”应受到赞扬，更不能视宋为“投降”。但信奉“理无常是”哲学的毛泽东，并不按他的“郡县制”理论出牌去评《水浒》，而是另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以“我”划线：他早已发现，周恩来要驾空他，要篡党夺权，于是，他狠批宋江驾空晁盖、篡山夺权的罪行，影射周的罪行不可宽恕；他早有预见，周恩来及其同伙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他又狠批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是投降行为，不指名地再批周的投降主义行径。人们不会忘记，1973年毛批周企图投降美帝、苏修，而今，他又批周妄图否定文革，投降资产阶级。毛的这一击是致命的，他要给企图在不断手术中求生的周恩来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周不能轻松地享用手术可能带来的一线生机。

病入膏肓的周恩来，当然知道评《水浒》是冲着他来的：那“架空”、那“投降”的批判，特别刺耳、揪心。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彬彬有礼的他，有时也会像嚎啕大哭林彪那样失控。1975年9月20日，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由于对生命和权力的渴望，躺在担架车上的他，在将被推进手术室的瞬间失控了。他突然伸手抓住门扇，竭尽全力喊道：

“我周恩来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呼喊，使在场的高官和医务人员，愕然相视，怔怔地站在那里。对于高官们来说，毛、周角力司空见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一贯能顾全大局的周恩来，怎么能在那么多医务人员面前情绪失控！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毛、周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怎么突然间，他们敬爱的周总理竟变成了投降派！当邓颖超要求汪东兴将周的话上报给毛主席后，邓小平示意医务人员继续工作，担架车才被缓缓推进手术室。

由于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手术以再次失败而告终。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明了自己病入膏肓的情况：他不久人世了。据传，在他弥留之际，有一次清醒过来后，他握住邓颖超的手，相互望着，嘴唇轻轻抽动了几下，一句郁积在心底很久的话，终于吐了出来：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说着，眼泪夺眶而出！——一个毕生反对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作茧自缚，最终不得不在极权主义的幽禁中，作痛苦挣扎！

1976年1月8日，不愿“走”的周恩来，带着无限惆怅和遗憾，先于毛泽东九个月离开了人间，终年七十八岁。

4、十里长街送周公

周恩来死了，但却成功了！

“九一三事件”后，毛、周之间角力，表现为毛的硬功与周的软功的角力。

“解放”后，周恩来长期坐在第三把交椅上，与毛泽东之间总有一个人坐在第二把交椅上。这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为的是不让雄心勃勃的周自然接班。出人意料的是，当毛、刘斗法时，周是毛争取、团结的对象，又当毛、林斗法时，周再次成了毛争取、团结的对象，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刘少奇和林彪，成了周的屏障，都先后中箭落马，死于非命。林死后，周自然而然地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对周来说，这既是机遇，更是生死挑战。

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周恩来，深知面临的危险。他说他是“**忠于党**”的，这话是真。从勒杀顾宪章全家老小，到撤离井冈山前处决战俘和伤病员，再从支持红卫兵“红八月”大屠杀，到屠戮异己的“一打三反”，都出于他对党的一颗忠心。他说他“**不是投降派**”， 此话也真。从助毛搞大跃进饿死数千万农民，到指挥造反派大破“四旧”，颠覆华夏文明，再到推动和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大寨人敢于提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革命口号，证明他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绝无“投降”之虞。“九一三事件”后，他发现，嗜权如命又独断专行的毛泽东，正在毁灭他所钟情的党。因此，他必须利用第一副主席的权位，与毛抗衡，匡正毛弊，以拯救中共于危难之中。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使他对毛泽东的品格、权谋和手段，都有深刻的认知。在绝对强势又不计后果的毛泽东面前，他吸取了刘、林的教训，既不采取刘少奇的软抗，也不效法林彪的硬顶，由是，他设计了以柔克刚的太极功和忍辱负重的“三不要主义”，以期与毛周旋到底。

周恩来以太极软功与毛的硬功角力中，从表面上看，他是节节败退。他十分清楚，他的太极软功虽已被识破，毛泽东不会放过他；但他坚信太极软功的魔力，他会取得成功，尽管在“膀胱癌”面前他的能力受限。因此，在毛咄咄逼人面前，他仍以忠毛、崇毛的姿态亦即所谓“保持晚节”来争取党心、军心和民心。在节节败退中，他不放弃任何可能做的工作。据报导，自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院到 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的一年半里，在大小手术 13 次的过程中，他的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 30.5 公斤。在癌症的折磨下，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与毛泽东周旋。据统计，在这一年半里，他除正常批阅、处理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 161 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 55 次，会见外宾 63 批，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 17 次，在医院召开会议 20 次，出医院开会 20 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 7 次，……显然，在坚守不“走”的“三不要主义”的前提下，他败得有理，退之有序，在败退中，他赢得了党心、军心和民心。

人们已厌倦了文化大革命，对毛、江左派集团声嘶力竭的批判和无休无止的屠戮，早已深恶痛绝。他们希望改变，盼望休养生息，渴望有一面旗帜，率领他们结束毛左集团的暴政。于是，他们从数年的毛、周角力中，找到了这面旗帜——**周恩来**！

此时气息奄奄的周恩来，历史地成了一面反抗毛泽东暴政的旗帜。党内、军内的右派甚至除极左以外的左派，都不约而同地走到这面旗帜下，人民群众——那些芸芸众生，已忘记了周的刽子手过去，也纷纷站到这面旗帜下。这是几股看不到、听不见的反毛潜流，正在汇合成汹涌澎湃的怒潮。

1976 年 1 月 8 日，在节节败退中的周恩来，最后败退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死了！但他的死，却给毛泽东和毛左集团以致命一击！

在“**不许用死人压活人**”的恐吓下，在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的痛斥下，数十万人勇敢地、

静静地站在长安大街的两边，为周送行。当年，小学课文《十里长街送总理》是这样写的：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

“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课文是“主旋律”声音。尽管课文里没有听到人民要求结束暴政的呼声，但“**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所向。

“民心所向”指什么？“**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场震惊中外的“**四五怒潮**”，在周死了两个多月后暴发了——4 月 4 日清明节前夕，接连数日，先后有一百多万人，抬着花圈，走上天安门广场，借祭奠周恩来之机，声讨毛泽东暴政，4 月 5 日达到了高潮。“**四五怒潮**”虽被毛泽东残酷镇压了下去，但毛左集团自此江河日下，声名狼藉，预示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末日！

对此，有人这么说：“一生无敌手的毛泽东，最终却栽在被他拖死的周恩来身上！”不过，文革后邓小平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却是耐人寻味的。他说：

“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

附 1、二十七次政治运动（数字是年份。如 48～53，即 1948 年～1953 年。）

土改 46～53、镇反 50～52、三反五反 52、思想改造 53、反“高绕”54、肃反 55、三大改造 53～58、反右 57、大跃进 58、人民公社 58～80、反彭德怀 59、学大寨 64～79、“四清”64～66、批文艺思想 64～65、批“彭罗陆杨”65～66、“横扫”66、破“四旧”66、夺权 67、“群众专政”67～68、“清队”68、上山下乡 62～78、“一打三反”70、清查“五一六”67～72、批林整风 72、批林批孔 73～74、评《水浒》75、批邓反翻案 76。

72-毛泽东同邓小平斗法

作者 于松然

一、邓小平效忠信（略）

二、紧跟毛泽东暨文革第七轮大屠杀

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中说：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邓小平何等聪明！当他看到中央的决定和毛的批示后，立刻意识到，要取得毛的重用，必须谨慎行动，主动接受毛的观察和考验。

在 1973 年这个多事之秋里，他冷眼观察到毛、周裂隙正在扩大。他清楚，从井冈山到北京，他都是毛的人。只是大跃进开始后，“大救星”情结使毛异想天开的狂想大暴发，他的务实主义才与毛拉开了距离，因而使他付出了代价：文革初期，被毛、林、周联手打倒，吃了不少苦头。他更清楚，毛这次叫他回北京，显然是念在他长期“紧跟”的份上。因此，要取得毛的信任，就要收敛务实，全力“紧跟”。如今，他已看出毛、周矛盾：一个要排除对方，防止对方自然接班，一个则紧握权力不放，力争党心、民心，与对方周旋。在这种情势下，他必须选边站队。从感情上讲，无论在井冈山或在延安，他同周都持有一定距离，文革初期，又加大了这一距离；然而，他的务实主义却与周不谋而合，这就为选边站队增加了难度。但他十分清楚，毛叫他出来特别是八月的“十大”上，又叫他当了中央委员，显然有叫他取代周的意思。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效忠，以接受毛的考验，尽管他并不认为周有什么大错。

1、接受毛的第一个考验：批周（略）

2、接受毛的第二个考验：代毛阐发三个世界“理论”（略）

3、接受毛的第三个考验：支持杀人魔王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何其人也？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 Saloth Sar 桑洛沙，1925～1998），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6 年至 1979 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美国学者 David Chandler 先后采访了许多波尔布特身边的人，写成了一本政治传记《第一兄弟》。书中记载，波尔布特是中学教师出身，青年时代，曾留学法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51 年加入法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待人热情，有修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与他崇拜的导师毛泽东极为相像，很快成了柬共总书记。就像中国共产党人把毛泽东封为“大救星”一样，在柬共那里，波尔布特被捧为“圣人”，人们很难把他与“杀人魔王”联系在一起。

然而，**波尔布特**同**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一样，“杀人魔王”是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历史书写的封号。

根据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1975 年 4 月 17 日，在中共的全力支持下，波尔布特统率十万柬共武装，“解放”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郎诺军人政变集团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的波尔布特等共产党人，遂将柬埔寨王国改名为**“民主柬埔寨”**，被世人称为**“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在国内实行的“民主”是铁和血。他们高唱的《国歌》就是“血”：

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红色高棉铁血统治，被遏止于 1979 年 1 月 7 日，历时三年另八个月又二十天。当是时，与中共分道扬镳的越南共产党，发兵 20 万，兵分六路，**叩关金边**，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率残部遁逃山林中，十多年后土崩瓦解。令人遗憾的是，杀人魔王波尔布特躲过了而后的国际审判：1998 年 4 月 16 日，他病死在山林中。

在红色高棉三年又八个多月的铁血统治中，当时拥有 600～700 万人的小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竟高达近 200 万。据报导，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劫后重生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对柬全国 170 个县中的 81 个县进行了勘察、发掘，找到了 9,138 个坑葬点，发掘出骷髅近 150 万个。另有勘察、发掘者统计：发现被集体屠杀、饿死后掩埋的尸体共 1,205,662 具。联合国与柬埔寨王国组成的特别法庭宣布，在红色高棉统治的几年间，大约 170 万柬埔寨人死于处决、酷刑、疾病和饥饿。其中：在金边附近的“S－21”杜斯兰监狱里，被囚的 1.5 万人中，仅有 14 人生还；监狱附近挖出了 9,000 多具尸体，监狱负责人康克由因而被特别法庭判处 40 年徒刑。（右图）曾一度做为“民主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他的五个儿子和十四个孙子，也被红色高棉虐杀。美国柬埔寨问题专家 David Chandler，在柬调查后认为，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有 100 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又据统计，当时柬埔寨有华人 43 万，死去 21.5 万人；越南裔 2 万多人，几乎全部死亡；泰裔 2 万人，死了 8,000 人。对此，许多学者认为，在波尔布特统治其间，**枪杀、酷刑、虐杀、自杀和饥饿**等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 170～200 万人之间**。因而，波尔布特被称为二十世纪继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之后的第四大杀人魔王（1）。



在首都金边钟屋纪念佛塔内默祷

同其他杀人魔王一样，波尔布特杀人也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革命等高尚而美丽的词藻掩盖下堂而皇之进行的。占领金边后，他的脚跟尚未站稳，便遵从马列毛主义的教导，急不可待地要**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共产主义，并提出了**“组织胜过列宁，超过毛泽东”**的超级革命口号。

首先，他要**消灭工农差别**。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毛泽东跟着在《五七指示》中宣布，要全国各行各业实行**“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这就为波尔布特消灭工农分工提供了革命依据。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就将被消灭，而商品对人的统治也将随之消灭。”**跟着，在红色高棉刚刚“解放”柬埔寨两个月后的 1975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接见波尔布特时面授机宜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这就为波尔布特消灭商品、消灭八级工资制的“资产阶级法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张春桥是毛泽东指定帮助红色高棉起草“民主柬埔寨宪法”的主笔，因而张的思想对波尔布特影响很深。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中写道：**“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于是，消灭工农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八级工资制和实行“供给制”，便成了红色高棉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他们说干就干，占领金边不久，便开始了**“胜过列宁，超过毛泽东”**的大革命。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下令全国取消**商品**生产，取消货币，取消交易，全民实行“按需分配”的“供给制”。

他们下令全国实行毛式公共食堂制，驱赶所有市民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同农民一起在公共食堂里集体就餐；他们还发起了**“反对吃闲饭运动”**，老弱病残也不能例外。在红色公共食堂里，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吃，过时不候。金边市民 Loung Ung 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这样描述柬共的公共食堂：

“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但没过多久，粮食供应跟不上，配给越来越少，饭由干变稀，没法继续按‘需’分配。当时，我是个六岁的小女孩，记得我盯着沉在碗底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数着、嚼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蚯蚓为食，甚至成了难求的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其中，很多人死于误食有毒蘑菇。活着的人连掩埋死者的力气都没有了，常常等到尸体散发出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由当地村民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推进坑里。”

红色高棉的公共食堂制，几乎是 1958～1961 年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翻版。那时，公共食堂使毛泽东的“全民皆兵”思想发扬光大，县、社、队都改编成了团、营、连，可谓一呼百应；取消商品的“一平二调”（2）和供给制，使公共食堂有了“可靠”的供应保障。然而，三年后，毛氏公共食堂留下的是数千万个饿殍。令人没想到是，十几年后，“三年人祸”的幽灵竟然在柬埔寨重现：由于制造数千万饿殍的罪行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加以粉

饰，以毛泽东为导师、以中共为榜样的波尔布特，便在柬埔寨依“毛法”又炮制了一百多万个饿殍！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下令全国实行供给制，全国男女老少一律穿黑色长袍，或着毛式中山装。“住”的呢？大概他们无法“按需”供应：数百万农民依旧住在原有房屋内，数百万驱赶下乡市民，不得不借住农家，在简陋狭窄、空徒四壁、风雨飘摇的吊脚楼里度日。由于房屋太少，不够按户分配，他们便把男女分开，分住男女集体宿舍里，夫妻也不例外。

多次到北京朝圣取经的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经**毛、邓等**面授机宜后认为：消灭商品、实行全民供给制，就能消灭工农差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像当年毛泽东使苏联共产党“**已经发慌了**”那样，三五年内，用一百多万人头的代价，便可完成中共二十多年完不成的任务，把毛泽东的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并使毛“**发慌**”。

其次，他们要**消灭城乡差别**。他们说干就干。据报导，柬共占领金边后不久，便用谎言、恐吓加枪杆子，把包括老弱病残在内的 200 多万都市居民，全部驱赶到农村，使首都变成一座空城。Ung 在她的自传里写道：

“1975 年 4 月 17 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取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 万人口的金边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

一位佚名作者这么写道：

“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灾难降临之际，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我在金边结识的 Vattanac 银行总裁、柬籍华人江女士告诉我，她母亲不仅携带了金银首饰，还临时缝制了一条条细长米袋，让他们兄弟姐妹缠在身上，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做手纸用。”



被驱赶出金边、走向农场的儿童

又据报导，在驱赶中，有数千人因反抗、不满而惨遭枪杀。在去农村长达一个多月的徒步跋涉中由于受到折磨、饥饿、过度劳累或缺医少药的折磨，成千上万老弱病残者，还没到达目的地，便倒毙在途中。到达目的地后，三年间，又有十数万人死于饥饿、疲劳、风寒和疾病。（右图）

驱赶所有城市居民到农村当农民，也非波尔布特的独创，而是**承前启后**的结果。**承前，即继承毛泽东和中共之前例**：早在 1962 年，当时被誉为党的副总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就公开说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阶级成份净化成“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有“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说：“**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于是，驱赶城市居民运动在全国

展开：数十万居民被赶到农村，一千多万个家庭被抄，数万人死亡，抄出黄金多达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银元、美钞不计其数。对此，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高兴地说：“成绩是伟大的！”**启后，即开创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之后来**，就是“不准携带行李，不准带城市的东西”，首都金边的男女老少、老弱病残一窝端。对此，1975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接见波尔布特时，当面赞扬道：**“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要向你们学习啊！”**

第三，他们还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有人说，毛泽东的得意门生波尔布特，把毛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书读得越多越蠢”**的反智主义思想，“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此话没错。“解放”之初，毛泽东就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思想改造。因改造成效不大，1957 年，他发动了反右运动，把 100 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其中，右派分子 55 万，弄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于担心知识分子造反，1966 年，他又发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把一百多万所谓漏网的右派分子和知识界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数十万被斗倒、斗臭，其中 20～30 万人被斗得死于非命。此外，他还使**“池浅王八多”**的大、中学校停课多年，其中，大学停办七年。到此，毛的反智主义并没有收敛，他又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驱赶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劳动，美其名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驱赶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五七干校”，去“学习”挖渠、改河、种地和植树等农业劳动，美其名曰“改造思想”。尽管毛泽东公开对知识分子评价很高，但骨子里认为知识是罪恶的渊薮，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对此，波尔布特心领神会，夺取政权后，对知识分子大打出手。据报导，红色高棉见到知识分子便处以酷刑，以致杀害；有些地方，见到戴眼睛的人便杀。为了躲避屠杀，许多知识分子伪装成没文化的农民，躲过了杀身之祸。据一个躲过屠杀的人回忆：

“下乡后，他们问谁是知识分子？那些医生、教师、公职人员等不知其意，站了出来，以为可以先一步回城。一万多人被带回金边，红色高棉把他们集中在一所学校中，对他们施尽了各种酷刑，最后全部折磨而死。剩下留在乡下的，隐名埋姓，再也不敢回金边。”

如果说毛泽东消灭脑、体劳动的差别是用“再教育”使高知弱智化，那么，波尔布特的消灭脑、体劳动的差别，就是要从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从而使全国弱智化和文盲化。

此外，波尔布特对**“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马列主义教义体会很深。来中国后，经肃反专家康生的指点，归国后，便对内大砍大杀。据报导，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从中国归来后，便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深**挖“病菌”，揪“叛徒”**。他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红色高棉在党内、军内实行了多次大清洗，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都被打成“叛国”、“反党”分子，有的则被打成越特、美特、苏特等反革命分子，然后予以处决。据权威人士统计，三年多，在红色高棉党内、军内和老百姓中，被处决的人高达十多万。其中，险遭毒手的原红色高棉高级官员韩桑林、洪森等，都率部逃奔越南避难，后又随越军杀回金边，赶走了波尔布特。其中的洪森，就是今日柬埔寨王国的首相。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消除三大差别的所谓公平社会。因此，马列主义者的“经典作家”们，不厌其烦地教导共产党人和老百姓说，只有消灭了三大差别——工农、城乡和脑、体劳动的差别，才能消灭阶级，才能建设人间天堂——共产主义。但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三大差别，只能缩小，不可能消灭，因而，消灭差别不是蛊惑民心，便是痴人狂想。也许马列主义者消灭三大差别的初衷，不是将**工业改办成农业，城市退变成乡村，知识分子弱化成文盲**，但毛泽东的“亦工、亦农”、城乡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干部走“五七”道路以及“书读得越多越蠢”等“理论”，显然是消灭三大差别的先声，因而是城市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倒行逆施，是现代文明的反动。但毛的历史反动，在枪杆子主义镇压下，却在小小的柬埔寨又顽强地展现了出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面对他教唆、鼓动和全力支持的红色高棉反现代文明运动，毛泽东抚掌叫好，得意忘形地说：**“吾道不孤也！”**

面对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反人类的滔天罪行，邓小平也是全力支持的。由于档案尘封，人们不知道邓小平对红色高棉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从官方公布的纪录来看，说邓小平“全力支持”波尔布特，不是空穴来风。

1965 年 11 月到 1966 年的 2 月间，波尔布特在中国学习了两个多月，先后接受了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和张春桥等大员的言传身教。那时，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批判包括“三和一少”在内的修正主义正处于高潮中。当时，做为主管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斗胆也不敢再搞“三和一少”，只能顺着毛的思路大搞“三斗一多”，即同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斗”，支援各国革命运动的钱要“多”。波尔布特做为柬埔寨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领袖，一定会受到邓的多方关照，满足其在粮、钱、物特别是武器方面的要求，从而表达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1975 年 6 月，正在柬埔寨实行灭绝种族大屠杀的波尔布特，再次来中国讨钱要物，并得到了满足。波氏这次来访，不仅受到毛的接见，主持中央工作、身兼国务院代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小平，也会见了波，并与之会谈良久。至于邓对波氏说了些什么，承诺些什么，因系绝密，没有报导，人们无法猜测。但据公开报导的一句话，却曝出了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

毛泽东在会见波尔布特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对波尔布特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邓小平支持波尔布特的暴政，是毛、邓政见一致的见证，也是邓向毛表忠的见证！

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尚未复出的 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又来中国要钱了。根据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对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他以最高规格的热烈欢迎，并满足了来访者的一切要求。一位佚名作者报导：（右图）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毛主席语录
热烈欢迎柬埔寨战友
社论
《人民日报》1977 年 9 月 28 日社论

“《人民日报》在 1977 年 9 月 28 日的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的消息。中国政府为波尔布特安排了只有金日成和前苏联领导人才享用过的奢华入城式：‘**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

的夹道欢迎。女青年跑上前来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了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簇簇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写道：‘**车队驶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波尔布特同志在敞篷汽车上亲切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设在柬埔寨的国际法庭，正在审判红色高棉活着的领导人的灭绝种族罪行，但道德法庭应不应该审判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共教唆与大力支持红色高棉的反人类罪行呢！

4、接受毛泽东的第四个考验：夷平沙甸

沙甸是云南省一个回族聚居的村寨，属蒙自县管，后归个旧市辖，是昆明到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个旧和蒙自县，是多民族杂居的县市，汉族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其他为彝、壮、苗、回、傣、哈尼等民族，其中，回族约占总人口的 3%左右。沙甸村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云南也是一个较大的回族村寨，有 1,500 多户，7,200 多人，绝大多数是回族，约占 95%。在其相邻处，还分布着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较小的回族村落。与沙甸相邻的鸡街镇，人口数万，汉族占大多数，回族约占 3.2%。

在“伟大领袖”发出“造反有理”的号召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地席卷全国。很快，这场红色恐怖的冲击波，也冲进了宁静而安详的沙甸等回族村寨。当是时，以汉族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在颠覆华夏文明的同时，还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文明。他们把沙甸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视作“反动”、“反革命”而任意践踏：清真寺被污蔑为“封建堡垒”，遭到封闭或砸抢；群众礼拜活动，在“横扫”中被严令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当做成“四旧”加以查抄、焚烧；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变成了“牛鬼蛇神”，遭到任意批斗，残酷殴打……这与驻阿富汗美军不慎烧掉“古兰经”从而引发全球伊斯兰信徒抗议美国事件，其天壤之别无法对比。历史上，回、汉民族本来就有积怨，在“横扫”和破“四旧”中，又埋下了新的仇恨种子。这种严重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倒行逆施，是在“**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好几年。

但回族是个宗教观念强烈的民族，且民风彪悍，抱团儿，处于汉族居民包围中的沙甸村的回族，更其如此。当头几波“横扫”、破“四旧”和夺权风暴过去后，信仰又使他们团结起来，抵制住了外来汉族造反派的冲击，成了红河自治州相对安宁的地方。由于相对安宁，州内蒙自、开远、个旧等市县遭受文革迫害的回族干部和群众，纷纷逃来避难，多时高达 500 多人。当外地政府或造反派甚至省革委来要人或揪人时，都遭到了他们的严辞拒绝，甚至武力抗拒。于是，他们成了远近闻名的“马蜂窝”。

1968 年 12 月 8 日，云南省革委会决定拿“不听话”的沙甸回族同胞试刀，以确立新生省革委的权威。他们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军宣队”，进驻沙甸，去捅“马蜂窝”。

进村后，“军宣队”无视宗教自由，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强硬的马列加秦始皇主义暴政下，他们把外来避难的回族干部和群众，集中关押在所谓的“学习班”中。在“学习”中，许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滇南挺进纵队”成员，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的牌子，武装押回原单位批斗、吊打，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他们又以“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小爬虫”等罪名，抓了 200 多名回族群众，集中到“学习班”里，进行毛式“学习”。在“学习”中，14 人被迫自杀或气绝身亡，160 多人被打伤、致残。他们还把回族群众要过的“开斋节”，批判成“反革命集会”，强行驱散，下令禁止。此外，为了强化用马列毛主义对回族伊斯兰教信徒进行思想改造，他们用枪杆子强迫其忠诚信徒阿訇、教长等，学猪叫，学猪拱，学猪滚。在清真寺里，他们大嚼猪肉，把猪骨头扔进回族群众饮用的水井里。

“军宣队”在沙甸捅“马蜂窝”的罪恶行径，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等反人类暴行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严重违反了民族风俗习惯，极大伤害了民族宗教感情，而且强化了回民对汉人政权的敌对情绪。

1958 年 3 月，毛泽东曾对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说：**“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显然，毛泽东要用共产主义丛林文化，去颠覆由中国各民族文化组成的华夏文明。由于汲取乌兰夫坚守“自治”、“信仰”而被打倒的教训，云南省委便顽固坚持毛泽东毁灭伊斯兰文化的文革路线，使民族矛盾不断升级。

也许受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受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鼓舞，1973 年 10 月，沙甸群众为了做礼拜，自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清真寺。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形势他们并不知晓，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势力，正在经受**“势必搞修正”**的批判，极左思潮已卷土重来。

沙甸回族群众打开清真寺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云南省委的**“高度重视”**。很快，红河州委便派出一支由近百名军人和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开进沙甸搞“反复辟”。工作队进村后宣布：**“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到了 1974 年 4 月，他们又宣布：**“批林批孔批清真寺**。”他们用武力封锁通向清真寺的道路，驱赶和扭打敢于上清真寺作礼拜的回族群众。为了支持工作队的非法行径，9 月，云南省委发出正式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

云南省委的《通知》，回族群众不能接受。于是，沙甸回民组织了几百人到昆明上访，要求宗教自由；接着，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 1,000 多人，到昆明游行，要求政府尊重回民信仰和风俗；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马绍华、郑全书**等人（右图），被逼上京告状。



沙甸 10 人上京告状；包括领队**马伯华**在内，多数死于清剿炮火中。

然而，上访、游行和上京告状，成了回民**“没有共产主义”**的弥天大罪。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回、汉矛盾不断加深。1974 年 10 月，当红河州革委

会在鸡街成立了针对回族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后，矛盾迅向极端发展。鸡街汉族民兵进行示威，用大字报“揭露”沙甸“**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还逮捕了两名沙甸回民，私设公堂，进行审讯，从而引发了回、汉流血冲突事件。流血事件后，沙甸回民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与鸡街汉族民兵相对抗。从此，双方你来我往，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双方伤亡日渐增多。

为了用毛泽东思想亦即马列加秦始皇主义统一全国各族人们的思想，云南省委决定消除以沙甸为代表的回民反抗。他们用罗织罪名的特权，给不到八千人的沙甸回民，炮制了个“**与苏修敌特挂钩阴谋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吓人大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小平**，根据云南省委的报告，迅速将沙甸回民反抗地方政府的维权行动，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下令派兵清剿。军令如山倒！昆明军区立即派出以四十二师为主力的万人清剿大军，在师长**廖锡龙**指挥下，进军红河州，清剿以沙甸村为中心的回族“叛乱”村寨。

1975 年 7 月 29 日凌晨，清剿战斗打响。由于回民的顽强抵抗，清剿开始并不顺利，解放军付出了死 100 多伤 600 多的代价，没能叫回民举手投降。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杨成武**，这位备受“四人帮”迫害、全家死了三口人、刚刚被平反的原代总参谋长，恼羞成怒，立刻凶相毕露。他下令调集百门重炮，向沙甸等回民村寨狂轰滥炸。8 月 4 日，不到一天，战斗结束。沙甸村和开远县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文山县的茂克等几个回族村寨，都被炮火基本夷平，其中沙甸 4,400 多间房子，仅剩下 3 间，击毙、炸死回民 1,600 多人，其中沙甸死 900 多人。由于杀红了眼，8 月 4 日，157 名男女老幼回民，在炮火中，举着双手出村投降，“**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一齐开火，一分钟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渠**”。一个八十多岁的回族老翁，据传他曾开枪打死、打伤八名解放军战士，俘获后，“**被捆上五十公斤炸药炸得不知去向**”。 ——这种杀俘行为，被当权人描述为“无法制止的阶级仇恨”，是有情可原的；而这种“有情可原”的发泄，的确让杨成武和四十二师指战员，出了一口恶气！然而，世界太大了，类似事件比比皆是，使人取舍失道。与“有情可原”强烈对比的是：四年前的 1971 年 3 月 31 日，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凯利终身监禁。其罪行是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清剿越共游击队时（1968 年 3 月 16 日），他下令射杀平民。当是时，以村民为肉盾的越共游击队，躲在村民中与美战斗，造成多名美军伤亡。由于分不清游击队员和村民，中尉威廉·凯利恼羞成怒，立刻凶相毕露，下令向人群扫射。据美军官方报导称：一共射杀了 168 人，其中 20%是越南平民。正是：

都道杀伐寻常事，奈何文明两重天！

回、汉仇恨在继续。战斗结束之后，云南省省委和政府，搞了个“武装平叛沙甸叛乱”30 条宣传提纲，还举办“**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在全省各地巡回展出。《提纲》和展览给沙甸等地回民罗织了许多罪名，诸如什么“武装叛乱”，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要“进攻个旧”，要“成立‘罕指奔拉协’（宗教性组织），派人与苏修联系，妄图背叛祖国”，“反对中央领导同志”，“搞打砸抢、挑起武斗”，“反对省委、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等等，**继续煽动仇恨**。回民数十人被判处死刑和徒刑，关押在“学习班”里批斗的回民，多达数百人。

迫于宗教界的压力和伊斯兰世界的声援，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做出了平反沙甸事件的决定。根据中央决定，1979 年 2 月，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了(1979)7 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

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作出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同中共中央把文革浩劫的罪责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样，沙甸大屠杀的罪责推给了两个死人，一个是 1970 年 12 月 17 日被暗杀于居室中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中将，一个是 1975 年 10 月 3 日因病死于北京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而将沙甸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并下令清剿回民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操刀刽子手杨成武，却成了“**正确指示**”的代表！

让两个死人为沙甸大屠杀负责，同把文革浩劫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样，是中共拒绝反省的表现。

八十年代初，政府拨巨款重建沙甸清真寺，抚恤回民，再次体现了“**先杀后抚**”即宽猛相济的权术。得到抚慰的回民，许多人已忘记了多年前的机枪哒哒和炮火隆隆声，感谢下令调动部队清剿他们的**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为他们平反昭雪；颂扬指挥屠杀他们的中共，给了他们许多好政策：拨款数亿，给他们盖房、建清真寺，抚恤亡者后代，救助鳏寡孤独，等等——人质情结（3）又在他们身上大发作！

但回族并非都是人质情结患者。生于云南省澄江县黑泥湾小山村里的回族诗人**马瑞鳞**，面对中共惯用的“**先杀后抚**”或曰“**恩威相济**”的统治权术，怒火满腔地仰天长啸：

这是一本万古常新的书，
这是一棵永不落叶的树，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感叹号，
这是一枚仰天长啸的音符。
这是一支催人进取的号角，
这是一面响彻云霄的战鼓。

记录下文明古国里的野蛮，
记录下人类历史上的耻辱，
记录下十年浩劫惨痛的悲剧，
记录下现代迷信残忍的一幕，
记录下雷的怒吼，
记录下血的控诉！

罪恶的毒焰夺去一个个生命，
罪恶的毒焰送来一片片焦土。

壮士们告别我们走了，留给我们一堆堆白骨！
壮士们告别我们走了，留给我们一条闪光的路……

⑸、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 年 5 月，新疆生产兵团内部发生“兵变”，新疆军区出动军队进行镇压，伤亡 7,330 多人，其中**打死 2,170 人**，另有 8,137 人失踪。遗憾的是，由于档案尘封，镇压的起因、过程以及重权在握的邓小平的作用等情况，笔者不得而知，无法书录于此。敬请后来人补遗。

附 1、杀人比较

红色杀人魔王统治期间非正常死亡
（处决、酷刑、虐杀、自杀和饥饿）人数比较

国　名	独裁统治时间	非正常死亡人数	年均死亡人数	当时全国人口数	死亡数占全国人口之比
柬埔寨	波尔布特的 3.7 年	170～200 万	50.0 万	650 万	28.5%
中　国	毛泽东的 27 年	5,000 万以上	185.2 万	60,000 万	8.3%
前苏联	斯大林的 29 年	约 6,000 万	206.9 万	19,000 万	31.6%

（说明：根据各方网传数据整理而成。）

附 2、一平二调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早期“共产风”的主要表现。根据毛泽东把“一大二公”做为人民公社指导方针的指示精神，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制，被称为“一平”；县、社两级政府可以无偿调走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包括社员个人的），是谓“二调”。“一平二调”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祸端。（详见“简评人民公社运动”）

附 3、人质情结

人质情结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是指罪犯的被害者对于罪犯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赞赏或帮助罪犯的一种情结。

1973 年 8 月 23 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劫持了三女一男银行职员做人质。绑匪在劫持人质达六天的时间里，曾多次威胁被劫持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错综复杂的心理转变下，四名人质竟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并帮助绑匪逃跑。这起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四名遭劫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据说，其中一名遭劫持的女性，曾多次探望服刑中的一名绑匪，并与他订婚。

心理学者认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是：

⑴、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⑵、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⑶、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⑷、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可以发生在一个或几个孤独人身上，更容易发生在相对封闭社会里的某些群体里。

有心理学者在评论专制社会里的人质情结时说：生活在各种各样风险下的人们，被迫无奈地学会了妥协；对于长期经受着欺负、压制、剥夺的群体而言，一旦有人给予他们点滴的好处，他们或许就会失去理智，黑白不分，甚至不吝感情地去赞美那些直接或间接伤害过他

们的人。

73-毛泽东与邓小平分道扬镳

作者 于松然

1、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翻案（略）

2、怒批邓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十分清楚，**谁否定文革就打倒谁，**这是毛的文革底线，而他的“全面整顿——翻案”之锤，已锤击了毛的文革底线。因此，他预感到，在“全面整顿”面前，他可能被撤，并做好了被打倒的准备。果然，1975 年 11 月，虚弱的毛泽东，已判定邓“右倾翻案”的用心，于是，他向邓小平发出最后通谍，要邓小平根据其在效忠信中所表达的立场即文革“**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和“**永不翻案**”的承诺，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善做“吹风”小动作的毛泽东，通过他侄子毛远新等人，已将他对文革的评价“吹”了出去：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
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前面我们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是个个性坚强从不认输的人。“解放”后，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是个不会犯错的“大救星”。笔者十三岁被“解放”以来，就没有听过他本人犯过什么错误，更没有听过他本人公开做过什么检讨、道过什么歉，或下过什么“罪己诏”。1959 年到 1961 年即六〇年那三年间，在他的领导下，虽然饿死了几千万人，出了那么大的事，也不过是个“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小事，或曰“一九开”，即九分成绩一分错误的小事，用不着大惊小怪；而那一分错，也是阶级敌人破坏和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他最多负点领导责任。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毛左们看来，文革以来，非正常死亡虽有两三百万之众，但不及六〇年三年间的 5%，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虽无起色，但农民们还有几个月的“瓜菜代”充饥，远比“解放”前吃糠咽菜好过得多，通过“忆苦思甜”教育，就可以使农民们心安理得。因此，他们认为，从“一九开”到“三七开”，是“伟大领袖”胸襟坦荡、宽宏大量的表现，也是对企图否定文革的党内右派所做出的重大让步！

个性坚强从不认输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资料显示，他的“最后通谍”是他通过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在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面前当众宣布的。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姿态：在威逼邓小平屈服的同时，震慑抱有异志的高级干部和将领，就像当年他威逼广州军区司令丁盛那样：1971 年 8 月 28 日，在长沙，他召见了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政

委刘兴元等亲林彪将领，要他们向广州军区两千多名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倒林的《南巡讲话》，借以达到威慑亲林将士的目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邓小平全无当年丁盛等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当“最后通谍”宣布后，他立即站起身来，表达了与毛切割的决心：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至此，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展开了与毛、江为代表的党内左派新一轮的斗法——这是毛、周角力和毛、邓斗法的继续。

邓小平的反叛表态，使在场的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十分震惊。如果在两年前，听到这种反叛言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振臂一呼“打倒邓小平”，立刻就会引发群情激愤，纷纷起来响应，邓当场就会被人揪出批斗、打倒、坐“喷气式”。如今呢？那一百三十多名高级干部和将领，经过毛、周角力和毛、邓斗法的洗涤，大多数人的立场已悄悄站到邓、周一边。而其中，尽管不乏有崇毛反邓反周者，也不敢妄自振臂。这些，邓小平心底有数。

会议情况很快汇报上去，气得毛泽东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刻，他怎能不生气？是他把邓小平“解放”回京，又是他亲委邓以党、政、军大权；然而，邓却以怨报德，真乃气煞人也！（1980 年的超级审判中，江青说毛泽东是邓小平气死的，这话颇有一些道理。）而此时，因运动神经元疾病困扰而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的毛泽东，头脑尚不糊涂，他决定打倒邓小平。于是，他借清华大学刘冰的告状信发难，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由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右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人民网》编辑的《中共大事纪》记载：“11 月 3 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据知情者传：在一次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会议上，一贯紧跟毛泽东、但对文革怀有一肚子牢骚、又在“全面整顿”中曾紧跟邓小平大显过身手的胡子上将王震，拍案而起，大声嚷道：**“他妈的，老子上山打游击去！”**只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剑英元帅对他吼道：**“王震，你想干什么？”**继而又说：**“有毛主席健在，你怕什么？”**一句话，化解了王的反叛。在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劝说和拉扯下，王震才在座位上坐下。

又据《中共大事纪》记载：“1976 年 1 月 21 日和 28 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 月 3 日，中央正式发出文

件。”“2 月 25 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四五怒潮”被镇压后，邓小平问题的性质突变。4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是时，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升格为敌我矛盾，他本人已变成了“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批为“**走资派还在走**”的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但第三次被打倒，却为第三次复出，积累了资本，并为而后的“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总是要见血——拿人祭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能例外。1976 年 4 月 12 日，受邓小平株连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像平时一样到部机关参加“学习”。在“学习”中，他没能顶住新一轮的“学习”折磨，终于昏倒在批斗会的现场。送入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不治身亡。59 岁的教育部部长，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第一个殉难高官。周的命运与当年 59 岁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命运相仿：1967 年 1 月 22 日，张为毛泽东夺权祭旗而被打死，两人殊命同归。

3、“四五”怒潮

1976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前夕，数日之内，为祭奠“反抗毛泽东暴政的旗帜”周恩来，先后有 100 多万人抬着花圈走进天安门广场。有三五成群的，也有整齐列队的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和军人。据记载，3 月 19 日，朝阳区一个小学的一队小学生，把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3 月 28 日，南京学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游行示威，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声讨张春桥遥控的上海《文汇报》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很快，南京大游行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南京“反革命事件”传到北京后，往天安门送花圈的人激增，到 4 月 5 日达到了高潮。据官方统计，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 2,073 个，其中一个是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用钢筋、铝合金焊接成的高 4 米多的大花圈；送花圈的单位有 1,400 多个，其中包括部分军事单位。

据信，“四五怒潮”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本来在同周的角力中已处下风的毛泽东，本应以“宽以济猛”的权术，向以周、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势力示宽、示好，借以缓和对抗，但他却一意孤行，不仅高调打倒周的盟友邓小平，而对被他拖死的周恩来更无哀挽之心。据报导，被江青等人所左右的政治局，竟对周恩来的后事下达“五不准”的规定，即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挂总理像，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五不准”激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周、邓右派集团的强烈不满，使党内右派对抗情绪进一步发展。又据报导，当一些高级干部和将帅们上书毛泽东，希望他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以表达共事四十多年的情谊，他却不近情理地回应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当他看到邓小平致的悼词后，气愤地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最使周、邓右派集团不能容忍的是，从来不准放鞭炮的中南海，在 1 月 30 日即农历乙卯年的除夕那天，突然放起爆竹来。据传说：仅鞭炮纸屑就拉了一车。周、邓右派集团认为，这是毛、江左派集团在庆贺周总理的死，向老干部示威。周、邓右派集团的对抗情绪，被进一步激化。于是，他们借清明节之机，鼓动他们的子弟和亲朋好友，赋诗、送花圈悼念周恩来，煽动那些对毛、江左派集团不满的群众，去天安门广场上示威，掀起了声讨毛、江左派集团的怒涛。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此时的周、

邓右派集团领军人物邓小平，组织或参与了“四五怒潮”，但毛、江左派集团仍然认为，邓是闹事的总后台。根据当年报导，笔者综述如下：

在烈士纪念碑上的一侧，张贴着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指毛泽东），**更不要那拉氏**（指江青）。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著。人们都知道，这是对邓小平的拥戴。（下图）



“四五”天安门事件

在碑的另一侧，悬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在碑上还张贴了一百多篇手抄诗词。例如**“昔日妲己毁一商，今朝‘艳妖’舞蹁跹。”“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周逝世日）。”等等。

此外，还有一首《莫猖狂》打油诗广为传播：**“娘们秀才莫猖狂，三落三起理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指邓小平），**老子还他三百枪**。”传说是许世友将军所作。在“四五”前后的郑州，笔者曾见到过这首打油诗的抄件。

最为著名的是高干子弟**王立山**所作的《祭雄杰》，堪称“四五”代表作。该诗当场被众多人传抄，有人则登高朗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指周恩来），**扬眉剑出鞘**。”“四五怒潮”平息后，这首诗被中共列为“001 号反革命案”进行查处。

这些标语、诗词，表明毛、邓为代表的党内左右两派新一轮斗法，已趋白热化。

4 月 2 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设立了由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开始节制人们的悼念活动。他们发布命令，称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俗，要求各单位禁止职工送花圈，阻止职工上天安门广场。那时市内还没有出租的士，上广场，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但有些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不理会指挥部的命令，他们公然在站点上高喊：**“去天安门的，一律免票！”**

4 月 4 日，联合指挥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将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运走。在清理过程中，指挥部警察与守护花圈的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多人负伤，数十人被抓走，矛盾由此激化。第二天 4 月 5 日，十多万人聚集在联合指挥部和大会堂门前，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口号。接着，发生激烈冲突：在联合指挥部门前，愤怒的群众首先掀翻、点燃了门前停放的四部小汽车；又有数十人冲进指挥部，搜出了很多记录闹事人的“黑材料”；但见“黑材料”，不啻火上浇油，盛怒人们，放火烧楼。到此，局面已经失控。

4 月 5 日下午，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君子动**

口也动手”的最新指示。于是政治局决定：下午 6 时，向广场反复播放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命令群众离开广场，8 时出动民兵，对滞留广场的群众，采取武力清场行动。吴德在讲话中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9 时许，民兵、警察开始武力清场。对此，知情人刘天成写道：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据报导，那些在广场上演讲、赋诗、点火、烧车等活跃分子，大多数都是有党、政、军背景且消息灵通的人。当听完吴德讲话后，他们迅即逃离广场，剩下了一千多没有背景的自以为清白来“看热闹”的群众。

历史反复证明，中共上层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付出鲜血代价的，总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

“四五”当晚死伤究竟有多少？众言不一。据报导，有现场目击者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事后用水龙头冲刷了三天。但吴德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看来，只要档案不敢解密，不许民间人士独立调查的禁令不解除，“四五怒潮”中伤亡人数，同“三年人祸”中饿死了多少人一样，在“高度机密”的强权下，将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

显然，“四五怒潮”是毛、周角力的结果，又是毛、邓斗法的继续，因而是中共党内左右两派较量、逐鹿的反映。

4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正式确定五十五岁的华国锋为毛的接班人。但决议对邓留下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尾巴，没有把他再次推成“敌人”。邓小平为了保全自己并为东山再起做准备，4 月 8 日他立即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毛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五怒潮”中，尽管周、邓右派集团被镇压了下去，邓小平还在软禁中，但周、邓右派集团在暗中摩拳擦掌，重整旗鼓，很快在党内形成了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邓、叶右派集团，展开了与毛、江左派集团新一轮恶斗。五个多月后，这种恶斗，使权力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4、毛泽东郁悒而终

毛泽东为什么选定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呢？

华国锋（1921.2～2008.8），山西省交城县人。原名苏铸，字成九，1938 年改名为华国锋。同年 6 月，参加交城抗日游击队，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 年，随军南下湖南，历任湘阴县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等职。1956 年后，历任中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 年后，历任湖南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中，历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69 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 年 1 月，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3 年，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1975 年 1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76 年 1 月，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五怒潮”平息后，4 月 7 日，被毛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决定华国锋命运是从 1952 年开始的。那年，他在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当县委书记**，1954 年又升任湘潭地委书记，是个名副其实的毛家乡的“父母官”。在湘潭的任职，给他创造了接近毛的条件。1955 年夏，当毛泽东用“枪杆子”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把亿万农民拖入共同贫困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时，华国锋紧紧跟上，推波助澜，连续发表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农业合作化，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 年秋，毛泽东到湖南视察时，在长沙，指名道姓要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见时，面相忠厚的华，又给毛留下了老实厚道、忠实可信的印象。1959 年，当被问及大跃进情况时，他说“田瘦了”一句话，被毛誉为“**老实人**”。同年，在庐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庐山会后，湖南省掀起了批判周小舟高潮，华国锋成批周的干将，遂被毛钦点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就在华国锋荣升的同时，周小舟被贬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由于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在 1966 年 12 月 27 日毛生日那天，周终于含愤自杀身亡。据报导，湖南省在批彭、批周的同时，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据官方统计，仅湘潭一县,全县粮食由 1958 年的 672,485 万斤，骤减到 1960 年的 278,500 万斤，锐减 58.6%，生猪也由 33 万多头骤减到 14 万多头，锐减 57.6%。当然，做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华国锋，要负一定责任，但不能全怪他。最使毛泽东赞赏的是，1967 年 5 月，正当毛号召全面夺权时，主持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下意识地对书记处书记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对毛忠心耿耿的“老实人”，将其告发，王延春旋被打倒。自此，华国锋官运亨通，踩着别人双肩，更上多层楼，官至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

尽管“老实人”对毛忠心耿耿，但缺乏政治家应具有的权谋和决断，上调中央后，并没

有进入毛接班人的行列。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林彪摔死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接班人已意属江青和张春桥。但在他接到邓小平“永不翻案”的保证和两年多的对邓的考验后，在他的心目中，又形成了江青——邓小平——张春桥三架马车接班架构。然而，当罢黜了邓小平后，接班人又只剩下他意属的江、张两人。毛泽东是个“理无常是”的哲学家，出尔反尔已习以为常。尽管他曾认为：江青太张狂，甚至认为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堪重托，但她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性很强，且对他忠心耿耿，仍是接班人的最佳人选；张春桥在党内、军内树敌较多，势单力薄，不足以扛大旗，但他有马列毛主义理论，足智多谋，且对他忠心耿耿，与江青一起接班，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仍是他最理想的选择。

然而，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斗法中，江、张两人受到了党内右派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将领的强烈反对：病入膏肓的总理**周恩来**和政治局常委**康生**，先后公然当面向他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不可重用；政治局常委**朱德**拿着外国人写的书，向他状告江青有企图当女皇的狼子野心；在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上，**王震**上将怒拍桌子，声言要上山打游击，抗议罢黜邓小平；**宋时轮**上将等高级将领，预谋发动支持邓小平的“兵谏”，意在清除江、张、王、姚等人；因受迫害住在 301 医院的将领们，在病房里，发出了反叛的呼喊：“**老家伙们，做好准备，拿起武器！**”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中将对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并对在福州治病的**罗瑞卿**大将说：“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最令他不安的是，他曾下令调整军委领导班子，调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主持军委工作，下令右派首领**叶剑英**元帅“病休”，给陈让座；但叶“病”而不休，没有奉命让座，仍端坐军委高堂，并假他任命的陈锡联之手，发号施令，指挥一切。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没有冒然直接向江、张两人交棒。

毛泽东是个意志坚强又非常自负的人。他的一生中遇到过多次“严峻的政治形势”，他都能从容化解；他很自信，这次不例外。他之所以没有冒然直接向江、张两人交棒，只是感觉时机未到。他不会屈服于右派的逼宫，更不会把棒交给右派，他要创造条件，使逼宫者付出代价。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为了击败右派，在他的头脑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架马车接班架构，即华国锋——江青——张春桥架构。没有列为接班人的华国锋，出人意料地成了一号接班人。真乃时势造英雄也！

但上调中央后经历证明，“老实人”华国锋，缺乏共产主义领袖应具备的政治素质。民初思想家李宗吾，在其《厚黑学》中指出，只有“面厚心黑”的政治家，才能“成大事”，才能成为“英雄豪杰”；16 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说，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能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者。由此可见，在政治素质上即在权谋和决断上，“老实人”不能与毛、周、邓相比，而与江、张也存有较大差距。显然，毛泽东突然让华接班，是他不得已的选择；把权交给华国锋，他并不放心。

“老实人”华国锋，有时并不老实。当他被毛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后，为了证明其“合法”性，常拿毛用铅笔给他写的条子来炫耀：“**你办事，我放心**。”但“老实人”却隐瞒了毛对他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其他六个字：

“有问题，找江青！”

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掌舵的不是华国锋，而是江青。这点，姚文元 1996 年出狱后印证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中央主席的位子传予江青。”毛的“其他六个字”，也给华、江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其他六个字”的初衷，绝不是要华、江对立，而是要华辅佐江，完成他三架马车接班的构想。显然，他抬出华国锋，不是因华有领袖才干，而是因华是“老实人”，在中央没有班底实力，是个党内左、右派都能接受的人物。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策略的毛，不会在“严峻的政治形势”条件下去硬碰硬，他抬出华国锋，是缓兵之计，无非是想在左、右势力中找到一个暂时的平衡点，使他有时间徐图倒右良策。他铅笔写给华国锋的条子中，就流露了他的这种思想：

“慢慢来，不要着急。”

然而，上帝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太少，已容不得他“慢慢来”了。

1974 年 7 月，正当报纸上在反复宣扬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可活到 120 岁以上”时，医生们已知，他得了绝症，还有两到三年的活头。

进入 1974 年后，毛除两眼白内障看不见东西外，他还得了更加严重的疾病。据他的“御医”李志绥说，他**“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17 日，讳疾忌医的毛，被迫做了全面检查。检查后，医生的结论是：**毛患了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大脑延髓和脊髓内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文献统计表明，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医生们的报告很快呈报到政治局。由于毛讳疾忌医，经常批评医生**“夸大病情”**，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专会吓唬人”**，并认为自己没有大的毛病；江青也说：**“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因此，报告对运动神经元病只做了些轻描淡写式的描述，而对预后的恶变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医生们隐瞒病情不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他们却把毛的绝症，用口头报告给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

到了 1975 年 2 月，毛口齿不清进一步发展，连“大总管”汪东兴都听不懂。对此，汪无可奈何地说：**“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可见当时，病人毛泽东，正在通过张“秘书”来指挥全国。

到了 1975 年 10 月，毛的病情有明显加重趋势，咳嗽、气喘加重，连续吸氧气时，稍有停顿，便出现缺氧症状，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完全靠张玉凤喂饭，而且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然而，就在这种恶劣的身体条件下，他竟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向党内右派兴师问罪。

进入 1976 年，毛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医生们看来，毛的病情正在恶化，并准备好了多种抢救方案；但讳疾忌医的毛却不以为然，他拒绝鼻饲，甚至拳打医生，叫他们“滚”。他的“秘书”张玉凤，也认为医生们夸大毛的病请。她公开对医生们说：“我看没有那么严

重。”但毛的病情并没按张“秘书”的想象发展。6 月 20 日，毛发生了心肌梗塞。在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下，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毛泽东病恶化传出后，以叶剑英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情绪极为亢奋，以清除江、张、王、姚为目标的“兵谏”，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一日，曾指挥炮火夷平沙甸回族村寨的杨成武上将，带着聂荣臻元帅的口信，谒见“病休”中的叶帅，请他动手。叶帅摇摇头说：“再等等。”胡子上将王震，在叶府叫嚷着，催促叶“动手”。叶帅要他保持冷静。他向王震示意：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後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一按。王立刻领悟：叶帅要等毛死后动手。肩负叶帅秘密使命的原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向原属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少将，指点要津，使其迷途知返，听命于叶。与此同时，毛泽东后院起火。“大总管”汪东兴少将，深夜接待了原领导王震上将的突然造访。造访中，王要汪保护好邓小平，不得出错，并向汪暗示了军方的动向，使汪深为惊骇。本来看不惯江青的汪东兴，知毛大势已去，便与已成傀儡的华国锋联手对抗江、张、王、姚，即后来官方所称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并与党内右派核心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沟通，形成了反毛、江左派集团的统一战线。



1976 年 5 月 27 日，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在沙发上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毛左集团，也不示弱：他们一方面派毛侄子毛远新充当毛泽东的特别联络员，向中央政治局发号施令，以节制右派；另一方面，他们暗中向民兵发枪，力图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与右派对抗。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病入膏肓（右图）。他每次讲话，都是张一张嘴，叽叽咕咕几句，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型进行“翻译”；不然，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张的“翻译”传达到中央政治局，就变成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这最新的“最高指示”中，究竟有多少话是毛的？多少话是张“秘书”的？只有天知、地知、张玉凤知，其他无人能知。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右手微瘫，执笔颤颤抖抖，下笔歪歪斜斜，不成字形，毛远新拿来做最新的令箭，要中央政治局遵照执行。这最新的令箭中，究竟有多少是毛写的？多少是毛侄儿的“矫诏”？只有天知、地知、毛远新知，其他无人能知。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统治八亿中国人的。——**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病入膏肓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糊涂：也许他已知自己时日不多了，他无法再用“慢慢来”的“层层剥笋”计谋，来与右派斗法，借以最终挫败右派；也许他已发觉后院起火，但他已无力灭火，眼睁睁地看着火光甘着急，因为他已无力使华、汪、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也许他恨江青太不争气，缺乏高瞻远瞩的协调能力，不会主动团结华、汪以对付右派；也许他抱怨张春桥书生气十足，没有设计出制服右派的方略，成了一个徒具虚名的军师；也许他还对国民经济江河日下忧心重重……总之，太多的遗憾、太多的忧虑纷至沓来，使他思不胜思；但他已无能为力了！——1976 年 6 月 15 日，病中的毛泽东，在召见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王海容时，不无悲凉地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笔者：另一件指没有收回台、澎、金、马。）**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不认输的毛泽东，突然发现，在生命面前，他竟然是这么不堪一击；“**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突然发现，在天的面前，他竟然那么脆弱。他想到了他的后事，也想到了如何与党内右派妥协，因为那是他惯用的平衡之策。他为他曾交待汪东兴保护好邓小平而欣慰；在他看来，他死后，邓很可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想到了被他下令“病休”的叶剑英，在十年中，叶基本上处于他的保护之下，对他不会怀恨。当是时，如果他想与右派妥协，其对象非叶剑英莫属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此时的妥协，等同于托孤，这是他不情愿做的事。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希望有些渺茫，因为，他早已知道，许多人反对文革。他担心的是毛家安危：妻子江青、侄儿毛远新可能受累，受惩罚；还担心有人可能会借机鞭尸。他对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寄于厚望，并为此铅笔草书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但他并不完全放心。9 月 2 日，当再次心梗被枪救过来后，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摆在他面前那条托孤之路，也许能缓和左右的冲突，他想试试。犹豫几天后，从不服输的他，不情愿地指名召见“病休”中的叶剑英。当叶剑英应召来到他床前时，在他那张灰色的脸上悬吊着的那双无神的眼，直勾勾地盯着叶；他像要握手，但伸出来的手只颤抖了一下，竟没有抬起来；他似要说话，但嘴角只微微抽动了一下，竟没有吐出一个字。生性多疑的毛泽东，也许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使托孤没有托成！这是他戎马倥偬、叱咤风云一生的悲剧！

据报导，讳疾忌医、对医生半信半疑的毛泽东，在他临终前，竟神奇般地吐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难受，快叫医生来，救我**。”但身边的医生们，已无回天之术。1976 年 9 月 9 日 0 时 10 分，一代魔王毛泽东，戴着**权谋盖世**、**罪恶滔天**的头衔，怀抱着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走完了他谎言、野蛮、邪恶的一生，终年八十三岁。

74-天灾人祸祖龙死

作者 于松然

中共是个一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党，它的领袖都是“伟光正”的化身。因此，他们没有认错、道歉的习惯，也没有下“罪己诏”的义务，拒绝像古代帝王在大灾大难面前责备自己有不道言行而触犯“天条”那样。如果发生了某种无法回避的错误，转移视线的本能，使他们不是将错误归咎于天灾，便是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这几乎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但当人们不相信阶级敌人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制造大灾大难时，他们也不会硬揪阶级敌人来充当替罪羊，却能制造出新的“行为准则”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为此，他们利用“舆论一律”的无产阶级专政利器，命令全国所有媒体大喊大叫：一方面把大灾大难中“坏事”即人祸因素，捂得严严实实，洗得干干净净，使人们无法知道真情，看到实景；另一方面把抗灾救灾中“好事”即党和政府抗灾救灾中的积极活动，无限放大，从而达到“把坏事变成好事”的目的。于是，一条新的媒体报导原则又被他们制造了出来：**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据报导，这条报导原则，早在 1950 年已开始强制实行，到今天，早已

成了报喜不报忧之**赤文化传统**。

1、板桥溃坝说革命


板桥水库溃坝后的惨境

1975 年 8 月 8 日，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的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7～10 米高的水头，呼啸而下，横扫下游一切！又几乎与此同时，竹沟、田岗等五十六座中小型水库，也先后溃坝，扫荡下游一切！洪水所到之处，使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等七个县城，瞬间变成水深数米的泽国。据统计，溃坝洪水使 29 个县市受灾，河堤决口 2,180 处，积水面积 12,000 多平方公里，灾民一千二百多万人，毁房 680 多万间，冲毁京广线铁路一百多公里，京广线因而中断 18 天，影响正常通车 48 天，直接经济损失约 100 亿元。（上图）

1975 年 8 月初到同年 10 月，即河南水库大溃坝使 200 多万农民在水灾中挣扎期间，正是党内左、右两派争斗再度白热化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简而言之，革命就是夺权。这样，为革命而争权夺利，就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在毛、周角力中，由于党内以周、邓右派集团势力反弹，使毛泽东不得不批评江、张、王、姚为“四人帮”。邓小平与周恩来、叶剑英结盟，乘机争到了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大权，并主持了中央工作。到了 1975 年 5 月底，邓决心打着毛旗反毛左，明确提出以毛的学理论、搞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向毛、江左派集团发难，夺取他们的权力。

正当周、邓右派乘胜追击毛、江左派和左派伺机反扑的时候，“7503 号台风”夹带着狂风暴雨，来到河南伏牛山区。8 月 4～8 日，以 1631 毫米的瓢泼大雨，倾注到驻马店地区的近百座水库里，使水库暴涨，很快水位超过警戒线，接近到了坝顶。板桥水库管理局人员，焦急万分，他们在瓢泼大雨中，急电上级管理部门，请求打开泄洪闸排洪。然而，他们连接急电三次，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据传：“上级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因有对“全面整顿”不理解的嫌疑，都进“学习班”学习去了，值班人员无权答复。无奈之下，他们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擅自决定开闸泄洪。然而，十七孔泄洪闸，除五孔能打开泄洪外，其他十二孔全因锈蚀而**无法打开**。情急之下，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下游撤离，但电话线路已中断，**无法接通**，使下游村镇、县城，在水头砸来之前，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预警。在管理区院内，他们眼睁睁地看见水已漫进院里，漫上小腿，更使他们不安的是，水开始漫过坝顶。8 日凌晨 0 时 40 分，他们突然发现，水库水位极剧下降，管理局一名科长**马天佑**的脸，“刷”地吓白了。只听“轰”地一声巨响，数亿立方米库水，在狂风暴雨中，破坝而出，以十多米高的水头，垂直砸下，向下游横扫而去。几乎与此同时，石漫滩等五十多座大、中、小水库，也相继溃坝决堤，使 12,000 多平方公里的豫南地区，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

1975 年的夏天，中共党内左、右两派，都在忙于角力的部署。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进行整顿的周、邓右派集团，正在以上半年生产统计数据向以“四人帮”为中坚的毛左集团施加压力，炫耀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他们报告说：**“3 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 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但人算不如天算。驻马店溃坝事件，让左派抓住了右派的把柄：没有促好生产，反而促成洪灾

了。于是，他们借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

正当近两百万人泡在水里和围困在屋顶上、树上或河堤上等待救援时，8 月 14 日，毛泽东发出了评《水浒》、批投降的指示，为反击右派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但“评《水浒》、批投降”无法排泄洪水，中共只好决定炸掉班台闸，使洪水流入安徽，让安徽农民分担泡在水里的约 200 万河南农民的痛苦。就在毛泽东发出“评《水浒》、批投降”指示的当天，一声巨响，班台闸所有的闸门、胸墙、桥面和部分闸墩，被炸得腾空而起，分洪口门由此打开。不到一天，安徽阜阳地区也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十七万农民仓皇逃离家园。

溃坝洪水究竟吞噬了多少人命，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政府拒绝公开报导。8 月 12 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带着《中央慰问电》飞抵灾区慰问。随行的新华社新闻记者当即请示如何报导，纪副总理指示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他特别嘱咐：**“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显然，这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赤文化早已规定了的。果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大、小报纸，除头版报导中央慰问团慰问灾民和几段河南军民奋勇抵抗洪水灾害的新闻外，仅仅向中国人说明，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发生了洪水，而灾害情况特别是伤亡情况，报纸无权报导。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便为传说、谣言打开了传播之大门。

在大陆出版的气象学和水利学的著作中，虽有提及这次灾难的，但死亡人数说法出入很大。时至今日，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调查报告和系统的灾难分析。据说，灾难四年后的 1979 年，水利部的淮河委员会，曾作过一个板桥和石漫滩等水库溃坝灾难的调查报告，因系政府机密，没有公开发表，至今还锁在保险柜里。又据传，政府曾拍摄过一部河南省水灾科教片，记录了板桥等大、中水库溃坝事件；但该片仅在内部发行，只供教学和气象、水利专业人员观看。

由于讳莫如深，灾难究竟有多少人丧生，迄今说法各不相同。笔者从各种版本的著作中，筛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当年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在为板桥水库重建时所撰写的碑文中说：**“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说，事故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万人。”**这位省部级高干说的理由，很具中国特色。他说，死亡超过一万，国际上会有报导！

中国科学院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写道，1975 年，河南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 2.6 万人。”**

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在同一部书的前言中写道，1975 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 85,600 人。”**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认为，溃坝**死亡近十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等人揭露，**死亡人数达 23 万人**。

2005 年 5 月 28 日，美国《Discovery》栏目在编排的一期专题节目中，把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列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十大灾害》之一，**死亡高达 24 万**。其中直接死亡十万，瘟疫，饥饿夺走 14 万。

笔者不想论证孰是孰非，也不想证明哪个是传说，哪个是谣言。既然政府不愿让你知道真相，扼制调查，尘封档案，一切伤亡和损失的论证，都仅仅是“可能”，无法成为教科书。

发人深思的是：1975 年的河南人为什么不去接受 1963 年河北省的溃坝教训？1963 年 8 月 2 日的暴雨，曾使邢台地区东川口水库溃坝，造成 500 多人死亡,400 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60 亿元；同年 8 月 8 日的暴雨，又曾使保定地区刘家台中型水库溃坝，死亡 900 多人（另说，仅保定地区死亡 1,928 人，重伤 2.4 万余人）。然而，河北省的悲剧发生十二年后，却在河南省重演，而且“剧情”更加惨烈。这是为什么呢？

闭目塞听、严惩异己是导演这种恶果的元凶之一。当年，大陆媒体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河南人，对 1963 年发生在河北省的悲剧，毫不知情；更不知道，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同河北省的东川口、刘家台等水库一样，都是五十年代大跃进的产物，都存在着许多致命的隐患。但水利部和河南省的一些高官的无知，却把板桥水库称之为“铁壳坝”，对它的安全性根本没有怀疑。同时，他们为官尊严，又把曾对河南重蓄轻排政策说三道四的水利专家**陈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贬流到信阳去劳动改造。陈惺曾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闭目塞听、严惩异己，为溃坝创造了必要条件，犹如 1957 年反右运动，为六〇年前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创造了必要条件那样。

“抓革命、促生产”是导演这种恶果的主要元凶。“抓革命，促生产”是文革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周恩来于 1966 年 9 月 15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首先唱响的，一直唱到文革结束。这个口号的设计表明，革命第一，生产第二，亦即在抓革命的基础上搞生产。如果颠倒过来，在抓生产的基础上搞革命，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文革以来，毛泽东反复批判**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就是要确立“革命第一”不动摇。在毛的鼓噪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思想，成了各级干部不约而同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领导干部都去“抓革命”了，一直“抓”得值班人员成了摆设；工作在基层干部和工人，在“抓革命”的同时，还要“促生产”，一直把生产“促”到泄洪闸锈得打不开，不能泄洪，电话线路断了没人修，无法通话！

9 月，在“评《水浒》、批投降”的革命高潮中，笔者随工作组下乡到舞阳县北舞渡公社救灾。那里因沙河决堤被淹没，房屋 80%倒塌，死 2 人。省委救灾的指导思想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生产自救。**工作组同公社干部一起，敦促农民发扬大寨先治坡，后治窝的共产主义精神，先把土地整好，小麦、油菜种好；同时、教育农民将倒塌的砖、瓦和木料，从淤泥里清理出来，再用上级拨来的油毛毡，盖好越冬房屋。此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工作组干部们，早已从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学生，摇身变成了农民的先生和领导者。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革命风声渐紧之时，在工作组和公社干部的领导、教育和敦促下，灾民们在第一场大雪来临之前，都住进了自建的油毡窝棚中，终于取得“抓革命、促生产、促生活”的胜利。我们工作组，也因而完成了使命，撤出灾区，回到城里。

2、唐山大震说政府 （右图）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 53.8 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百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导，其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整篇报导几乎都在大讲毛主席、党中央如何关怀灾区人民，人民解放军和各级领导，如何迅速到达灾区，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灾区人民如何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中抗灾救灾，等等，但对群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伤多少人等等，却讳莫如深，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句轻轻带过。这与云南通海 7．7 级强烈地震的报导同出一辙。那次强烈地震发生在 1970 年 1 月 5 日，4 天之后，《云南日报》才奉命在省内做了报导：《**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人们还能看到许多这样类同的新闻：“**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于那次地震伤亡损失，政府秘而不宣，30 年后才不情愿地对外公布：死 15,621 人，伤 26,783 人，倒房 34 万间。显然，这些都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规定之使然。


震后鸟瞰唐山市

十年九次强震后的 1979 年 11 月 17 日，姗姗来迟的中国地震学会正式成立了。在这个学会成立的大会上，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最大地震灾难的唐山大地震，在它制造了大灾难三年多之后，死伤人数才首次曝光：**死亡 242,769 人，重伤 164,851 人**。会议闭幕第二天的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会议新闻：唐山地震死亡 24 万多人。学会是政府的御用机关，它不仅不向中国人民说明唐山大地震的经验和教训，也不愿对唐山大地震的严重伤亡做认真反思。

三十四年后的 2010 年 7 月 12 日，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唐山市首影。影片在赚足了观众的热泪的同时，也叫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具有中共特色的反思——被地震震得家破人亡的女主人李元妮，站在废墟对天大骂：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在李元妮的大骂中，影片将一场悲剧简化成对上苍的审判，而悲剧中的人为祸端，却被冯导用观众的泪水洗刷的干干净净！

人们都知道，地震是不可抗力，既是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地震预报也是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但人们同样也知道，在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上，世界各国在**地震预报、设防和救援**上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而且能够把灾害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水平。因此，钱钢 1986 年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 2005 年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等著作，对唐山大地震的反思，远比冯小刚的反思诚实得多，深刻得多。

在地震预报上，钱钢认为，“老天爷”在震前已经对我们发出过严重警告：

7 月 20 日前后，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

7 月 24 日，赵各庄煤矿陈玉成家里的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

7 月 25 日上午，抚宁县坟坨公社徐庄徐春祥等人，看见一百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或是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钻出一个古墙洞，向村内大转移。

7 月 27 日，在棉花地里干活的社员反映，大群密集的蜻蜓组成了一个约 30 平方米的方阵，自南向北飞行。

同日，迁安县商庄子公社有人看见，蜻蜓如蝗虫般飞来，飞行队伍宽 100 多米、自东向西飞，持续约 15 分钟之久。蜻蜓飞过时，一片嗡嗡的声响，气势之大，足以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笔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冯导也不得不把蜻蜓乱舞做为大震前兆加以展现。）

同日，天津市郊木厂公社和西营门公社都可以看见成百上千只蝙蝠，大白天在天空中乱飞。

同日，大厂回族自治县陈福公社东柏辛大队李番：他亲眼看见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

……

在地震预报上，专业人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实地调查，张庆洲和钱钢都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英雄，他们都是在基层工作的地震监测者。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在大震到来之前，都曾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过准确预报：

1975 年 12 月——距唐山大地震八个月。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专家**黄相宁**，向国家地震局写了《1976 年地震趋势意见》，明确提出**“1976 年，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沿海海域，可能发生 6 级地震……”**唐山恰好在这条线上。

1976 年初——距唐山大地震不到半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实际负责人、敢说敢做的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从 1968 年起，他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在唐山市及其周边建起了四十多个业余地震监测台站。他综合唐山市 40 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 50 公里内，1976 年 7、8 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 5 到 7 级强震发生。**

1976 年 7 月 6 日——距唐山大地震二十二天。杨友宸属下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做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预报**。

1976 年 7 月 13 日——距唐山地震十五天。北京市地震队的专家们提出了七大异常。**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该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其他多位地震工作者，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等，**合称为七大异常**，并在第二天电告国家地震局，要求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1976 年 7 月 14 日——距唐山大地震十四天。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和渤海沿岸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到杨友宸属下的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唐山二中教师**田金武**在汇报工作时，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 年 7 月底 8 月初，就在脚下的唐山地区，将发生 7 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 8 级**。与此同时，杨友宸属下的赵各庄矿地震台台长**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 5 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 年 7 月 16 日——距唐山大地震十二天。杨友宸属下的乐亭红卫中学教师**侯世钧**，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7 月 23 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 5 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 年 7 月 22 日——距唐山大地震六天。杨友宸属下的山海关一中以物理教师**吕兴亚**为首的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山海关西南 100 公里左右的地方(唐山南火车站附近)，七月底八月初将发生 6 到 7 级地震**。

1976 年 7 月 24 日——距唐山地震四天。耿庆国说：**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地区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六级以上地震，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前**！

1976 年 7 月 27 日上午十时——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又说：**“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1976 年 7 月 27 日 18 时——距唐山大地震九小时。杨友宸属下的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 7.3 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然而，这些比较准确的预报，都被权力斗争忽视了，革命斗争废弃了。据两书记载:

1976 年 7 月 12 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国家地震局召开“批邓反右”会议，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批判。”**此时的国家地震局，“充满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

1976 年 7 月 22 日——距唐山地震六天。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等地震专家，无法直接向局长汇报震情，只好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他建立的四十多个地震监测台站，选用的监测人员，大都是地质、物理本科生，不仅懂业务，也很有责任心。由于他敢说、敢做、敢预报，在他领导下的团队，到了“眼看就要摸着大震”之紧要关头，被以**“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罪名，由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李世信代表“组织”宣布，将他免职并流放到 104 干校劳动改造。

1976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点——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听取了汪成民汇报后决定：下周一（笔者：即 8 月 2 日）开会再研究一下，并叫汪成民等专家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遗憾的是，大地震没有给副局长们留下“下周一开会再研究一下”的时间！

但也有例外者。在 7 月 17～18 日的座谈会上，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竟敢违犯纪律，擅自向下捅了震情：**“7 月 22 日到 8 月 5 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 5 级以上地震**。”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便火速赶回县里，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县委书记**冉广岐**当即拍板抗震，并派百名干部奔赴各个公社，传达和落实预防措施。青龙县经受住了大震考验，全县 47 万人，无一死亡（原报导死一人，后经核实，该人死于心梗），被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Jeanne-Marie Col）称为**“奇迹”**！

青龙“奇迹”是外国人的观念，但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奇迹”是一种政治负担。例如，创造“奇迹”的领头人县委书记冉广岐，二十多年后，仍拒绝接受记者采访，甘当无名英雄。因为，他懂得**“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真实内涵：**不治未病治已病**。“辩证法”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只有通过抗震救灾，才能体现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无限关怀。因此，他用预报、预防所创造“奇迹”，等于给党脸上抹黑。事实上，他也没有因“奇迹”受到褒奖或升迁。正是：

预报设防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为了减少伤亡，世界各国减灾的通行做法是对建筑物进行抗震设防。不幸的是，同中国各地一样，没有抗震设防的唐山大小建筑，在大地震来临之瞬间，被夷为平地，使唐山地震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难。三十二年后的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又发 7.8 级地震，除一些政绩工程外，许多城镇房屋大部分倒塌，政府统计的遇难人数已超过 8 万，比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 9 级大地震大海啸死亡人数高出四倍，又创造了二十一世纪初地震死亡人数的世界最高纪录。这次大地震中，同样也出现了“预报设防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的故事：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平时重视预报、设防和防震教育，全校 2,300 人无一伤亡，因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校长”，但却无资格荣登抗震救灾功臣光荣榜；相反，北川中学死了 1,600 多人，但由于校长刘亚春等人，抢救人财有功，因而成了抗震救灾功臣。

中共党和政府如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呢？《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写道：

“在最初的十天里，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

“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

“将军们回忆起唐山救灾，都认为第一天开进时没有携带大型机械是重大的失策之一。本来应该从天津、北京等城市调去大批吊车，野战部队也可以多携带锤、锹等工具。可是在猝不及防的灾难面前，谁也无法镇定自若、周密而冷静地作出快速反应。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直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这也就是说，废墟上这一场空前的残酷的赤手空拳的生死搏斗，已持续了十天之久！”

由此可见，唐山大地震之所以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难”，除地震本身不可抗力外，**预报受制、防范无为**和**救援迟滞、失当，**是无法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水平的主要原因。但中共和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在大讲地震不可抗力性的同时，否认预报，淡化和回避设防功能，力图把救援变成政治宣传阵地，以达到**“把坏事变成好事”**，从而达到讴歌中共救援之德、颂扬政府重建之功、衷心感谢“党妈妈”的目的。

3、天崩地裂祖龙死——是巧合？还是天人感应？

1976 年，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那一年，对中共来说，是个步履艰难的一年；那一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继 1975 年溃坝导致 23 万人死亡的大洪水之后又一个充满苦难的大灾

年！

那一年天崩——3 月 8 日，吉林省吉林市发生陨石雨。陨石雨降落的范围约为 500 平方公里，搜集到陨石标本 138 块，碎片 3,000 多块，总重量达 2,700 公斤。其中，最大的 1 号陨石重 1,770 公斤，堪称“世界陨石之最”。

那一年地裂——5 月 29 日，云南省西部的龙陵县先后发生 7.3 级和 7.4 级的强烈地震，伤亡 2,540 人；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 7.8 级地震，伤亡 60 多万，其中死亡 24.2 万多人，重伤 16.4 万多人；8 月 16 日和 23 日，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发生了两次 7.2 级的强烈地震，人员伤亡为 800 多人。

那一年高官相继殒殁——1 月 8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去世；7 月 5 日，人大委员长朱德病故；9 月 9 日，中共党主席毛泽东驾崩。（右图）



1976 年 9 月 9 日，一代魔王驾崩

那一年权力重新分配——4 月 5 日，右派借悼念周恩来之名，在天安门广场上声讨毛皇暴政，遭到残酷镇压；10 月 6 日，右派发动宫廷政变，逮捕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那一年河南许昌发生踩踏事件——根据中共中央要各地“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指示精神，5 月 1 日，许昌地区革委会召开了十多万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当晚，又组织了“五一”批邓烟火晚会。在大放烟花中，多处发生踩踏事件，数十人丧生，成了声讨邓小平的殉难者。5 月 2 日上午，笔者仅在地区医院院内，就看到停放的尸体 31 具。临近死难现场的市、县两所医院，停放了多少具尸体？全国各地是否发生过同类事件？因系党的机密，老百姓无权知道。

1976 年“天崩地裂祖龙死”的自然特异现象，引发了中共上层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结束了浩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自然特异现象都集中发生在一年之中，匪夷所思。

但这种匪夷所思的自然特异现象，并非 1976 年独具。十年文革，是人怨沸腾的十年：两百多万人惨遭杀戮，一千多万人致伤致残，两千多万人挨批挨斗；那十年又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十年，是人怨加天怒的十年。就地震灾害而言，“解放”后毛执政的二十七年间，七级以上大地震共发生过十二次，其中有九次都发生在十年文革中。如果把河南驻马店溃坝导致 23 万人死亡的大洪水计算在内，便构成了“十年文革十大灾难”的自然特异现象。那九次大地震是：

1966 年 3 月 8 日，河北省**邢台**发生了 7.5 级强烈地震，8,064 人死亡，38,451 人受伤，倒塌房屋 508 万余间。有人认为，这次地震是文革浩劫的先声。

1969 年 7 月 18 日，**渤海**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由于地震发生在渤海，距离陆地较远，造成 9 人死亡、300 多人受伤。

1970 年 1 月 5 日 1 时，云南**通海**县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死亡 15,621 人，伤 26,783 人，倒房 34 万间。（这次强震，中共在 30 年以后才对外公布）

1973 年 2 月 6 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卢霍**县发生 7.9 级强烈地震，死亡 2,175 人，伤 2,756 人，损失牲畜 40,427 头，粮食 2,011,800 公斤，倒塌房屋 15,700 幢，破坏 2,867 幢。

1974 年 5 月 11 日，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生 7.1 级的强烈地震，死亡 1,423 人，伤 2,000

余人，倒塌房屋达 28,000 余间，破坏水利 500 余顷，耕地 4 万多亩。

1975 年 2 月 4 日，辽宁省**海城**县发生 7．3 级强烈地震，死亡 1,328 人，伤 22,000 人，毁坏房屋 112 万间。由于地震工作者预报准确，在震前两个半小时内，辽宁省南部六市、十县有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死亡人数仅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被世人称为“科学的奇迹”。

1976 年 5 月 29 日，云南省**龙陵**县先后发生 7.3 级和 7.4 级的强烈地震，死亡 98 人，重伤 451 人，轻伤 1,991 人，房屋倒塌和损坏 42 万间。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死亡 **242,769** 人，重伤 **164,851** 人，唐山市夷为平地，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最大地震灾难。

1976 年 8 月 16 日和 23 日，四川省**松潘**、**平武**之间发生了两次 7.2 级的强烈地震，粮食损失达 500 万公斤，牲畜死亡 2,000 余头。由于地震震前有预报，采取了人员撤离的措施，因此，人员伤亡约 800 余人。

面对“天崩地裂祖龙死”和“十年文革十大灾难”的自然特异现象，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回答，那是“**天人感应**”，但中共唯物主义者认为，那是“**巧合**”！

“天人感应”是把“天”人格化，把“人”比附于天。这是西汉董仲舒思想。董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如果天子违背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降灾害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祥瑞以鼓励。理学家张载也说：“**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的老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儒家也主张“天人合一”，把“诚”视为天人一致的表现。《礼记》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显然，古人把天人合二而一，而天则是“合一”的主宰者。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天人感应”论很容易被他们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中的谎言、野蛮和邪恶是忤逆天意的，于是天降震灾洪灾，以示惩罚。但容易被老百姓接受的学说一定正确吗？大地震和大溃坝的受难者，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善良而愚昧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患有媚骨、软骨病，且对暴政逆来顺受，甚至还为施暴者摇旗呐喊，高呼“万岁”，但他们大多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呀，天降大震大水来“惩罚”他们，公平吗？笔者由此而怀疑古人“天人合一”的说教，因而对“天人感应”说持保留态度：太玄了。玄者，深奥虚幻而难辨也。《老子》曰：“**道可道，非恒道**。”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笔者一介草根，“道行”太浅，对千变万化“玄之又玄”之道，望“众妙之门”而叹曰：“妙门，非吾辈能入也！”

持“**巧合**”论的中共唯物主义精英们，他们说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他们认识的。他们宣称：“**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又说：“**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互联系的，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等等。这就是说，他们懂得，板块运动的应力积累到何时才会释放，才会发生地震，至今地震学家们尚无科学结论，因而，他们把自然特异现象说成是偶然地巧合，这个“理”是容易被人接受的。但既然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是“巧合”的必然性呢？迄今没见有人能回答。到此，宣称“**唯物主义与不可知论根本对立**”的中共唯物主义精英们，在回避“巧合”的必然性中，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之中。

尽管中共唯物主义精英们无法回答“巧合”的必然性，但他们却有权批判“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称其为宗教、神学、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反科学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原理规定，“天”（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决定”了“人”们必须这么想，必须那么做，否则，必遭挫折或受到惩罚。如果说“天人感应”者，是把“天”看做是以天为主、天人互感的统一体，那么，唯物主义精英们，则把“**人**”（意识）看成是顺“**天**”（存在）而行的奴仆，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尽管有时“奴仆”也会影响甚至改造“主人”，但在唯物主义精英们看来，那不过是“主观能动性”或偶而“反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从“天”“决定”“人”这个意义上来说，唯物主义精英们并没有同宗教、神学和迷信的“天人感应”彻底切割，尽管他们说的“天”不是神，而是“客观存在”。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因而是多元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神学**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世界一流科学家中，许多人都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的信徒，他们笃信科学，更敬畏上帝或佛祖。例如，科学家们发现，当今我们生活的宇宙空间，是由 137 亿年前的一个单独的无维度的“奇点”突然爆炸创造的。这个突然爆炸“奇点”，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无尺度但却包含了宇宙全部物质及其运动规律，而且还在继续膨胀扩张中。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却不敢借此否定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学说。因为，“奇点”是什么？没有爆炸前的宇宙是什么？这些都是科学家们难以回答的问题，尽管有科学家认为，追究“奇点”之前是无意义的。自然界是那样的宏大，又是那样的渺小，是那样的诡秘，又是那样的多变，人们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去逐渐认识它、把握它。尽管人们在探索自然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个世界，探索的路途还相当艰辛而遥远。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对任何自然现象见仁见智都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那种企图用一种学说去统一世界是愚蠢的、徒劳的。因此，可以这么说，自有人类以来，科学和神学都在蓬勃发展，而且并行不悖。

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些自然特异现象呢？据报导，当他与零距离“护士”孟锦云谈及吉林陨石雨时，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毛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他好像是在问孟，又像在问自己。如果把他对这个特异现象的沉思与他常说“**死后去见我的上帝马克思**”的话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革命家并不坚定，他还没有割掉神学即所谓唯心主义的尾巴。

1976 年由大灾难引发的政治大转折，是必然还是偶然？伴随文革的九大地震和一大洪灾，是警告还是惩罚？如果不是“天人感应”，又该是什么？由于对“唯物”“唯心”滥用“唯”字的反感，笔者不愿被“唯”字奴役。笔者期望于后来人，像锲而不舍地追根“UFO”不明飞行物、特异功能等超自然特异现象那样，去寻求十年文革的中国，解读发生在 1976 年和其他年份里那种大灾大难大转折的必然性或偶然性，解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人祸天灾相伴而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不管后人如何解读大灾大难大转折的自然特异现象，但已刻入历史的是：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驾崩”，同年 10 月 6 日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兵不血刃地逮捕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毛左核心成员“四人帮”，为 1977 年 8 月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